

彭述之選集

第二卷

出版說明

本卷編入的著作，頭一批是作者在國民黨監獄中寫的一些通信和論著，在過去都沒有公開發表過。第二批是抗日戰爭時期，論抗戰和革命路線的文章、文件，它們都曾刊於當年的地下刊物上。第三批是國共內戰時期，在蔣治下上海的公開刊物上以陳人白、歐伯的筆名發表的，因而在用語表達方面似乎受到了約束。

《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及其後果》，和《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兩文，直到近年間才在香港《十月評論》上先後首次刊出。他們之極具政治、理論價值，當不因時間差距而有所減少，今天依然是特別有助於研究世界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

由於作者在此期間許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需要多方設法尋找，因而比第三卷延遲了出版，結果雖有幾篇仍無法找到，也祇好放棄了；而且，因篇幅大大超過了預算，有些本已編排好而被認為較不重要或少具代表性的文章都要臨時抽出。

作為附錄刊出的《中國革命共產黨黨綱》，原是由本書作者起草的；由於無法找到最初的草稿，雖部份經過增刪、修改，但大體上仍可表現出其政治思想和主張。這些，對其他落後國家的革命都是有其重大參考價值，儘管其中對當時內戰的具體評估判斷事後證明犯有錯誤，三年後作者已作檢討指出（見本選集第三卷《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去年十月間，本書大體上已編排好，作者雖在兩年來心臟發生了幾次嚴重沖擊之後，仍寫來了《第二卷前言》。非常遺憾的，他在一個月後，因心臟病再發而終告不治。現在把作者這篇簡短遺作刊在卷首，並用以悼念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

第二卷前言

選集第二卷包括的文章是我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作品，這是國民黨統治的最黑暗的時代和日帝進攻中國最瘋狂的年頭（日帝佔領了中國大部份達八年之久）。我們雖然盡力出版刊物以暴露國民黨和日帝的野蠻殘暴，但我們的刊物總是被沒收，甚至人也被拘捕（我本人即被國民黨拘禁了五年）。例如，「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我們即出版《熱潮》，以從事宣傳和鼓動，但沒有多久（約半年）即被禁止，並連出版的刊物都沒收了。「八·一三」後，我們出版《動向》（包括《西流》、《破曉》）和《鬥爭》，在上述這些刊物中我寫了不少文章，但都被沒收了。差不多與上述刊物同時，我寫了三個小冊子：《要怎樣才能長期抗日？》、《西班牙革命失敗的教訓》以及《奧國革命是怎樣失敗的？》；所有這些小冊子都失去了。甚至我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評胡適之的哲學及其政治思想》、《五毒說》，和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等問題的，也失去了。

這些失去的文章及小冊子現已無法找到，所以只好希望我的朋友和同志們將來在那些刊物中去找尋，以後再版時補救這個缺點。

彭述之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

目 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〇年)

辯訴狀(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	1-6
論領袖等問題(一九三三年)	7-31
論民主鬥爭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32-57
(一) 民主鬥爭，經濟復興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37
(二) 「民衆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	43
(三) 國民會議問題	51
對陳獨秀幾個文件的批評與答覆(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58-78
(一) 「民主運動」與不斷革命問題	58
(二) 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問題	63
(三) 民衆政權問題	71
(四) 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問題	75
(五) 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及策略問題	77
對石凡同志〈不斷革命論？還是階段論？〉 的答覆與批評(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79-84
評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九三四年二月) ——再論十月革命的經驗	85-105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學思想(一九三六年)	106-137
佛陀時代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	107
反婆羅門運動與佛教的產生	117
原始佛教的宗教哲學思想	127
佛教與基督教	135

對兩條路綫的鬥爭(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	138—171
(一) 黨內思想鬥爭的意義	138
(二) 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痴	140
(三) 長了鬚子的幼稚病	148
(四) 調和主義的混亂與危險	157
(五) 正確的前提與謬誤的結論	164
(六) 今後黨內思想鬥爭的方向	169
為常委答覆少數派同志書(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	72—180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少數派出版獨立機關報	
《國際主義者》對外聲明(一九四二年五月)	181—184
悼陳獨秀(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	185—195
活的少數派在依附死的陳獨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196
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的	
「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及其後果(一九四三年三月)	
——「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鬥爭的新發展	215—271
前 言	215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小資產階級的官僚層	217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	
的徹底背叛	223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對內對外政策	
——極右機會主義時期	236
「一國社會主義」與特爾米多——反革命的政變	242
從極右機會主義到極左冒險主義時期	243
「第三時期」的對外政策——德國革命慘敗的大災禍	249
從第三時期的冒險主義又回到極右的機會主義	254
結 語	268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九四六年四月)	272—292
(一) 老子的時代	272
(二) 老子的哲學——一元論與辯證思想	275
(三) 老子的社會思想	283
(四) 老子與托爾斯泰	289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一九四六年四月)	
——陳獨秀、胡適之與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的貢獻	293—326
民主主義反封建傳統思想的鬥爭	294
文學革命——白話文與文言的鬥爭	304
科學與社會主義的輸入	312
結 論	322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327—352
民主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	329
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的經驗	332
中國的民主任務	337
中國過去民主改革運動的教訓	341
怎樣實現民主	347
回頭是岸(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五日)	353—362
論官僚制度(一九四六年六月)	363—376
從歐洲歷史上的官僚制度說起	364
中國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變	367
現時官僚制度的新發展	371
怎樣才能清除官僚制度	375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子思想》(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377—426
(一) 關於學術思想論爭的態度問題	377
(二) 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	382

(三) 李季先生對於老子哲學的「影子」觀	386
(四) 老子的社會思想與其哲學思想的關係	390
(五) 關於老子的理想社會問題	394
(六) 關於老子思想所代表的階級問題	398
(七) 孔子究竟代表甚麼階級	402
(八) 孔子思想體系的本質	409
(九) 關於李季先生「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幾點妙論	412
(十) 關於「孔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的檢討」之檢討	419
(十一) 結 論	422
後 記	424
論官僚資本(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427—438
官僚資本的起源與發展	428
官僚資本的現狀及其趨勢	431
國營與民營問題	435
怎樣解決官僚資本問題	437
青年與文藝(一九四六年九月)	439—449
論國民會議(一九四六年十月)	450—467
民主與國民會議	452
西方先進國家議會制演變的經驗	455
我國議會政制運動的教訓	459
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與各方的態度	462
人民所需要的國民會議	464
結 論	466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468—491
舊調重彈	469
科學與人類	470

原子能與戰爭	476
潘光旦的「人學」	482
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一九四九—五〇年)	492—525
「中國歷史的特點」究竟何在?	494
甚麼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	499
中國社會各階級與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斷革命	504
「新民主主義」的根源	508
「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	517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甚麼?	521
五十年來的中國政局(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八日)	526—538
(一) 政治背景	526
(二) 從變法、立憲到辛亥革命(1901—1911年)	528
(三) 從袁世凱的反動到五四運動(1913—1919年)	530
(四) 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	532
(五) 國民黨的專政與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1937年)	534
(六) 中日戰爭與國共衝突(1937—1945年)	535
(七) 從國共內戰到共產黨奪取政權(1945—1950年)	537
附 錄：	
(一)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黨綱	541—566
(二) 詩聯四則	567—570
輓師友(聯)	567
浪淘沙—反第二次世界大戰	568
鄉村偶住(詩)	569
去國行(詩)	570

辯 訴 狀

——對國民黨政府的挑戰書*

(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

余生平之一切政治行動，悉本於余所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張。余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張，大都已公佈於世（一部份具見於起訴書所提供之各項證據），余當然負完全責任。

余等所堅抱之政治理想為共產主義，其終極目標在根本改造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廢除私有財產，廢除階級，易

* 這份《辯訴狀》由香港的《十月評論》重新發表於該刊一九七六年九月號，並寫了《編者按》如下：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慘遭失敗後，國民黨政府實行血腥的白色恐怖政策，無數工農革命份子、中共黨員及領導幹部，都不幸被拘禁、被屠殺。中共黨內因接受托洛茨基主張而被開除黨籍、轉而參加了左派反對派（即托派）的人，也不斷遭受拘禁甚至屠殺。其中一次，陳獨秀、彭述之等十餘人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他們本要被送到南京軍法處的，但由於當時許多著名人物（如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以及一些有名的教授等）紛紛致電要求把他們送司法機關公開審判，這才避過了立即被軍法處秘密行刑的厄運。在開審時，陳、彭都各寫了答辯詞。這裏發表的就是其中一篇。從它可看出他們是如何勇敢地堅持共產主義的立場、不畏瘋狂的白色恐怖強暴！

言之，即廢除人剝削人之殘酷的奴隸的社會制度，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人類臻於共同生產共同享受之完美的合理的共產社會。

共產主義此種理想，絕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為少數人之自由發明，實乃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之自然產物，與資本主義制度之為封建制度的自然產物同。共產主義將來必取資本主義而代之，亦當如過去資本主義制度之代替封建制度，同為歷史發展之必然趨勢，絕非人力所能阻止者也。

且共產主義之理想與預測，已在在由事實的發展證明其為絕對正確。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由事實盡情證明其無法前進，資本主義所造成之一切混亂與罪惡，已在向其自身作嚴厲之襲擊。如現時普遍全世界之深劇的經濟恐慌，

在第一審中，陳、彭兩人各被判徒刑十三年，經上訴後，減為八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因日機炸毀南京監獄，他們才提前重獲自由。但彭述之的弟弟彭道之（他曾留學莫斯科，繼而積極參加托派運動，雖在重病纏身中仍趕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一書），却因無錢醫治而不幸病逝於同一南京監獄中。

中共黨人，即使完全知道這一切歷史事實，但僅僅由於政治見解主張的不同，便給彭述之、陳獨秀等政敵加上「為蔣介石國民黨効勞」之類的莫須有罪名。雖然它在統治中國大陸後長期間內也絕無任何證據證實這類罪名（因為這些根本就是虛構羅織的），但今天在香港刮起的反托風中，人們仍在任意進行這一類的誣衊，彷彿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會變成真實也似的。因此，轉載這篇《辯訴狀》，實有其現實政治、教育意義。」

*

空前之大眾失業，資產階級向工人之殘酷剝削，帝國主義向被壓迫民族之拼命進攻（此次日帝國主義瘋狂地進攻中國，即其顯著之事實），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反抗運動之日益尖銳，帝國主義間衝突之日益加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之日益迫近……凡此一切，處處暴露資本主義自身正在加速崩潰過程之中。惟此種崩潰過程，係以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為其犧牲品。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欲縮短其犧牲與痛苦，只有從速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統治，建立無產階級與被壓迫者之專政，始有可能。共產主義這一結論，已不僅為一種理想，且已有歷史事實之證明。蘇俄十月革命之勝利，及其近年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發展，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與大眾失業日趨尖銳面前，獨顯其在經濟上能邁步前進，勞動者及一般民衆生活能不斷提高。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之如何優異於資本主義，足為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確切表徵矣。

自資本主義壟斷全世界之後，中國民族即受帝國主義之重重箝制，益以近二十年來國內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之狼狽為奸，造成帝國主義之加緊侵略與國內連年軍閥混戰，致現在全部國民經濟幾趨於完全破產，尤以農村經濟為甚。一切軍閥官僚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復從而加緊剝削人民，如對工人之嚴削工資，劇加工時，對農民之勒加地租，厲行高利貸，以及對一般人民之種種色色的苛捐雜稅，乃至綁架勒索，勒種煙苗，公賣鴉片等，無奇不有。全國工農大眾及一切勞苦人民幾盡陷於絕境，失業人民佈滿全國，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極盡人間地獄之慘劇！至於一般人民在帝國主義之直接的武力進攻與國內軍閥連年混戰中，所直接間接遭受之生命財產上的犧牲與損失，簡直無從推算。處在此種悲慘狀況下之一切人民，同時更受政府當局之種種橫暴摧殘，無絲

毫申敘自己意志及採取任何自衛行動之自由（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罷租、反抗苛捐雜稅等），甚至連反抗帝國主義武力侵略之自由（所謂愛國自由權）亦全被剝奪，違者甚至處以極刑。似此狀況如再繼續拖延與向前發展，勢必導中國全民族於滅絕之途。

故余等認爲中國民族目前唯一出路，只有全體被壓迫民衆，尤其是工農階級，迅速自動團結起來以自己的力量掃蕩一切帝國主義及國內壓迫者與剝削者所加於民衆頭上之一切束縛，建立自己的權力，中國民族才能免於滅亡，才能走向自新的坦途。且余等對於目前過渡時期，曾提出具體政綱，以爲民衆鬥爭之指南，如：民族獨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驅逐帝國主義在華武裝勢力）與國家統一（制止軍閥混戰，解除軍閥武裝），提高民衆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貧農，及廢除苛捐雜稅及高利貸等），國內少數民族完全獨立，以及立即召集普通選舉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等。

尤其對於日帝國主義「九一八」以來之窮兇極惡的武力進攻，余等更會堅決主張全體民衆自動武裝起來，與日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武力抗戰，即以民族自衛戰爭答覆日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並詳敘種種理由，指明只有此種堅決的民族抵抗戰，才能奪回滿洲，才能制止日本之繼續進攻，才能挽回淪爲朝鮮第二的命運。余更曾經指出，國聯爲國際帝國主義打劫被壓迫民族之分贓機關，無論國聯或美國，均絕不能幫助中國以抑制日本。依賴國聯或美國以解決滿洲問題，不僅等於哀求帝國主義自行放棄侵略政策，且行將引起以中國爲戰場之帝國主義戰爭。余等更不斷指責國民黨政府所固持之不抵抗政策，必至招引日帝國主義之加緊的不斷的進攻，不啻直接投降帝國主義，從根斷送中國民族之命脈。而一年餘來事變之發展，已完全證實余等此種觀點和主張之絕對正確。

今者國民黨政府，竟以「危害民國」及「叛國」等罪狀逮捕余等，控告余等，此不僅顛倒黑白混亂是非，實乃企圖摧殘中國民族利益之唯一保護者。其實余等所抱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張，若謂為「危害」帝國主義在華之特殊利益以及中國一切賣國殃民者之利益，當屬事實，余等亦決不否認。但就對中國民族利益，對絕大多數民衆利益的主張而言，都為挽救目前危機之唯一可能途徑。而國民黨政府幾年來之設施，事實已充份證明其本身實為危害中國民族利益之主體。余等主張無條件廢除帝國主義在華之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國民黨政府則從而繼續鞏固之，增訂之；余等主張制止軍閥混戰，解除軍閥武裝，完成國家統一，國民黨政府則不斷製造軍閥戰爭，加強軍閥割據局面（各地軍閥，均為國民黨黨員，並為其政府所正式委任或承認之軍事政治領袖）；余等主張改善工人生活，國民黨政府則幫助資本家壓迫工人；余等主張土地歸農民，廢除苛捐雜稅及高利貸等，而國民黨政府則站在各地軍閥官僚土劣地主方面，盡量抑制農民的要求，且肆行屠殺之；余等主張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罷租等之完全自由權，國民黨政府則以「出版法」「緊急治罪法」等加緊束縛之；余等主張召集普選全權之國民會議以解決當前之緊急問題，國民黨政府則以召集指定的「國民會議」或「國難會議」以搪塞之，欺騙之；余等主張對日侵略進行全民族之堅決的武力抵抗戰，國民黨政府則堅抱不抵抗主義，以致既失滿洲，復召上海「一二八」之慘劇。今者熱河又失，平津且陷於危急存亡之中矣。尤其奇異者，當日本帝國主義舉全力進攻中國民族之時，而國民黨政府治下之軍人，不急起禦侮，反而自由進行相互混戰（如廣東之二陳、山東之韓劉以及最近四川貴州之戰爭）……上敍此等鐵一般之事

實，究竟誰爲「危害民國」，誰爲「叛國」，不已昭然若揭乎！如認民國爲現政府當局少數人之國，少數人之「私有財產」，可以任意支配斷送，此固余等所堅決反對者，雖磨頂放踵，亦所不辭。若以「民國」顧名思義爲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生死存亡利益所關之國家，則余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張，正所以代表此種利益，爲中國絕大多數民衆之生存而鬥爭，以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及一切依附帝國主義叛賣中國民族利益者之唯一正確路線也。

至政府當局據以控告余等之「緊急治罪法」，則余等認爲此等法律自身，既未經過任何民衆選舉機關，是則毫無根據，不過由少數人爲其自身特殊利益所製造，藉以箝制民衆、陷害民衆之最殘酷的武器而已。幾年來爲中國民族利益、爲勞苦群衆利益而奮鬥之革命志士與民衆，犧牲於此酷法中者，不知凡幾！由此一端，亦足以深深象徵政府當局之摧殘民族精華、違反民衆以至全民族利益至何等程度也！

總之，就國民黨政府幾年來對內對外之一切政治設施所產生之惡果與余等正確的政治主張及政治行動對照觀之，則「危害民國」或「叛國」，絕不在余等，而在逮捕余等控告余等之政府當局。苟司法機關尙具些少獨立性，不致全爲刺刀所挾持，罪惡所操縱，便應立即還余等以自由，並賠償余等自被捕以來所遭受之一切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損失。至少亦應將余等之一切政治文件盡行公佈，以待全國人民之公判，看究竟是非誰屬？

論領袖等問題*

〔獄中書信五封〕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一）

致羅世凡、彭道之、濮德治、宋逢春等：

.....

在前次信中我雖然說了許多，但還不過是我的意見的幾分之幾。我想在這裏反正有的是時間，還是再來補充幾句吧。

關於領袖問題這問題似乎無關要緊，而且人們亦每諱而不言。其實這是應該拿來公開討論的，應該說清楚的，尤其是現在（在前次信中我對此問題說得太簡單）。在過去反對派的糾紛中，政治問題固然要佔若干成份，但個人的『野心』——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慾』，確亦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是在一定的混亂狀況下所常有的）。人們對於領袖的觀念大概是這樣：『領袖』——這是『光榮』的所在，也就是『權利』的所在，而且可以用各種手段（如逢迎上級機關，——斯大林派中所通行者；或拉攏、勾

* 這是著者保留下來的書信之一部份，大都是在三十年代寫於國民黨的南京監獄中，這裏不但見到了著者當時在特殊處境下的一些積極建議，而且也反映了陳獨秀的倒退傾向，對研究他的思想演變是很有幫助的。信內不必要的部份略有刪節，收信人都曾經是中共重要幹部，後來加入了左派反對派（即托派）成爲負責人。其中常常提到的「老先生」是陳獨秀；羅世藩「八·一三」事變釋放後，在湖南當教師，被中共黨員打傷致死；彭道之於一九三四年八月病死於獄中；濮德治在雲南被捕，於一九五五年由周恩來釋放；宋逢春爲了提早出獄，於一九三五年自動投降國民黨

結、互相抬舉——斯派及左反中所常發現的)取得。此等人既絲毫不了解領袖的歷史意義，不了解領袖的形成及其責任和作用，當然不會為革命為團體着想，而只是為自己個人打算盤而已。如果人們抬舉他為「領袖」，他就同你合作（實際是拉攏或利用），也就承認你抬舉你，不管你為人怎樣，你的能力和言行怎樣。否則就同你翻臉、決裂、否認你的一切，甚至造謠中傷、陷害，（此種情形在左反統一運動中表現得更為露骨）。最後見到各方面都不給他以成功的可能時，於是「輕則消極（也有專事搗亂到底的），重則叛變了（如梁幹朝等）」。這是過去經驗給我們記憶上深深地刻下來的印記，同時也就是左反，不，整個的黨的苦經驗之一。而由此苦經驗激出來的另一極端，就是厭惡領袖（尤其是群眾心理）、輕視領袖，甚至一般地否認領袖（老先生前日所發表的觀念實含有此種成分），以致走到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其實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否認別人作領袖，或表面自己不承認，而自身的內心却常是以領袖自居甚至是專橫的。在我們現時的狀況中，硬爭領袖與輕視領袖或否認領袖的兩種觀念，仍然存在着。這在組織上是一個很壞的現象。因此我認為這一個問題還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提出來討論。

領袖，在每個政治集團中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雖然不是決定的意義），尤其在革命集團中。領袖之對於革命政黨其作用幾相當於革命政黨之對於群眾。沒有好的革命領袖或領導幹部，革命集團是不會有力量的，正如沒有有力量的革命政黨，群眾不會有正確的有計劃的有組織的革命行動一樣。厭惡輕視或否認領袖，即無異於輕視否認政黨本身——以上只是就抽象的理論而言。從具體方面說，即就單個領袖份子方面說，問題當然要複雜些。但有一個基本觀念，就是領袖個別份子對於政黨，對於革命，都含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

應該在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下（左反已有此種路線），在鬥爭中培養領袖（幹部）人材，愛護領袖，發展領袖在黨中，經過黨在群眾中的作用與權威。但同時必須站在革命利益的基礎上去推動領袖，去監督他，在一切言論和行動上給予他以正當的批評，正如給予他以正當的擁護一樣。這樣以革命利益為標準，故在某時期必須堅決地擁護領袖（自然是指他的正確意見和革命行動而言），而在另一時期，如果領袖表現嚴重的錯誤時，又要無情地批評他，甚至堅決地反對他。——這就是我認為對於領袖之正確理解，及對領袖應取的態度。

至於我們每個人對自己，也應當有一個明確的觀念。無疑地、每個共產黨員（如果名符其實的話）都是群眾的先鋒之一，即群眾的領袖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說，每個黨員都應作到群眾領袖的真實地位，即是說，應在群眾中取得領袖的地位，導演領袖的領導作用。在黨內，每個人亦應力圖上進，發揮其一切可能的本能，與材幹，盡量起更大的作用。但必須明白：革命政黨內的領導地位，絕非現成的東西，更非一躍而就，尤絕非奉承或拉攏所能辦到（由奉承或拉攏而取得的領袖，只能算是官僚，絕不能算為群眾公認的革命領袖），而是在革命鬥爭的長期過程中有機地生長起來的。一個領袖的形成和生長，是以其在革命鬥爭過程中所表現的幹才（政治和組織的）及奮鬥的程度成正比例的。真正的革命領袖在革命鬥爭中生長出來，而虛偽的倖成的領袖（如由上級欽賜或一時用拉攏手段被抬舉出來的）亦在革命鬥爭中被淘汰下去。革命不但是各政黨的試金石，也是各色領袖的試金石。故在一個革命政黨內，個人的態度應是：對群眾鬥爭應儘可能起領導作用，對黨發揮其更大的工作效能，在一切工作中堅苦地勇敢地站在最前綫——把自己放在鬥爭中去經驗，去

鍛鍊，跟着事變與鬥爭而前進而生長，拿事變與鬥爭的經驗來豐富自己，來證驗自己，來提高自己。結果每個人在革命中，在黨中都會取得應有的地位，即能盡量發揮其能力而替革命服務的地位。

在這裏的我們，過去是多少負過點責任的，有一個時期內甚至是整個的常委，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責任。現在我們不能直接執行我們的任務，這正是我們在政治上的痛苦，但我們還應間接力求盡我們的責任。不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我們應特別準備我們的將來，應該借這『補習學校』〔指監獄——編者〕來充實和提高我們的理論基礎，鍛鍊我們更高的政治武器。但同時在理論的鍛鍊中必須使我們不要離開一切政治事變的進行，要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把我們與外界聯繫起來。就是說，我們應抓住一切可能研究政治局勢的發展，討論政治問題，對外提供政治意見——執行這種責任，此地* 比起曹蘇等處** 監裏的朋友來要方便得多。

關於政治意見草案問題 我是主張我們應有一個集體的意見給外面，這是表示我們所處的地位上之無可逃避的責任。我也贊成老先生起草，而他在這點上堅不負責，我認爲是不對的，他所持的理由是不正確的。他說，『最好我們各個人發表各個人的意見，免相牽制』。各人發表各人的意見，在一定的場合，是可以的。但在這裏却不應該。因爲我們的『地位』雖然是被敵人解除了，而我們對於政治上的責任却不容自己解除，我們應盡可能求得共同的意見給外面作基礎（在現時外面的混亂狀況下特別需要），讓他們討論批評，或者由此能形成一致的意見（如對目前局勢的態度）以便

* 指南京監獄

** 指上海曹河涇監獄和蘇州監獄

整個反對派對外能有一致的態度與行動。如果我們只寫各人的意見，自相分歧，這是表示我們忘記了自己所處的地位，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示，這樣將更增加外面意見糾紛的程度。假如外面有較堅強的領導機關，或者我們可採取各自貢獻意見的方式，而現時的情形却遠非如此。從現在左反的現狀看來，『中心』是在我們這裏，我們自知很『弱』，但外面卻沒有比較更『堅強』的。我們不好否認事實，因而不應拋棄我們的責任。關於過去爭論中我們間的不同意見，我主張可以各自簡明地寫出來，但也應當在這裏討論一番，而求得某些『同點』，而保留某些『異點』，用共同的，或各自的名義寄給外面作討論的參考。

× × × ×

我們這裏的『補習環境』比起『別的地方』（如曹、蘇等地）要優越得多，特別適宜於研究、我們不應輕易放過。這點想你們會同我一樣地瞭解，會堅定地抓住它的。至關於研究問題，大家也可以交換交換意見。左反現有的人材是很有限的，因而壓在我們肩上的負擔很不輕。現時我們雖被敵人把我們肩上一部份現實的負擔拉下了，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將來的負擔更重了起來。我們應利用一切可能來提高我們理論上和政治上的能力，每個人都應該起草一個研究計劃，交換研究的意見，並互相貢獻其研究的結果。我希望你們能提起興趣來討論以上的或其他的許多重要問題！

(二)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七日

致凡、道、卜、春等

.....

我本想找一個機會來同你們談一些外間情形及托洛茨基最近來對中國問題的意見。所以遲遲未答覆你們前幾天的信。就現在情形看來，我們面談一事，似乎不容易辦到。無已，還是用筆來談吧——雖然簡單些，但此外沒有別的辦法。

關於組織問題 據凡兄的來信似乎只是「力量與幹部的問題」，只要政治有辦法，似乎組織決不成問題。我却頗不謂然。在原則上，組織問題自然不能與政治問題分離——這是辯證法的兩面互相影響的。如果沒有基本原則上正確的政治路線，當然談不到組織。離開政治而談組織，那不過是陰謀家和政客的勾當。但如果已有一定的政治立場，而忽視組織，那又未免流於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了。列寧自確定他的政治立場第一天起就特別注意到組織問題，注意到創造有戰鬥力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他在未到西歐辦《火花》之前，就已經注意到黨的創立了。在《火花》出版後，他立刻提出了組織的意見（如《從甚麼作起？》及《怎麼辦？》）列寧的《火花》之所以很快地在俄國境內發生較普遍的影響，則他一向對於組織問題之密切注意——如對火花編輯部及其散發網之精密的佈置——是具有決定的作用的。列寧之所以成爲列寧，不但是他那政治的天才，創造了布爾塞維克的政治路線，而且還有他那特別重視黨的組織及其在組織上之正確意見和偉大能力，創造了布爾塞維克黨。

中國左反〔按即左派反對派，以下同〕的政治路線之正確明瞭，不但是建築在花崗石的理論基礎之上，而且已爲

後來許多事變的發展所證明。但何以直到現在組織上還如此混亂呢？難道是「政治破了產」嗎？凡兄所說的「組織上的破產，往往是由於政治上之破產」，在這裏能解釋嗎？固然，左反之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能在中國事變發展過程中好好地運用，即是說，沒有能及時地正確地抓住整個政治問題，給予群眾以明瞭的指出，這是事實，這正是我們過去在政治上的幼稚之表現。這是中國左反的弱點。然而這種幼稚和弱點，是有其歷史的根源的。即由於整個黨過去政治水平太低，黨內從未經過嚴重的思想鬥爭——中國反對派的路線非由黨內鬥爭中直接產生出來，而是從國際左反接受過來的。要補充這個弱點必須經過相當時間，決非一時所能辦到，只有在事變的發展中，在不斷的鬥爭中去學習馬克思的方法，去正確地發揮左反的路線。然而要好好地參加乃至領導鬥爭，應付事變，精確地明瞭群眾的要求與意識，不斷地散播及擴大左反的政治影響，沒有相當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是決不行的。像過去組織上之無了無休的混亂，一切精力幾乎消磨於完全不必要的自相爭吵之中——此種爭吵，曾使群眾厭惡，黨員消沉——如果像這樣繼續下去，能發揮我們的政治力量嗎？能提高左反份子的政治水平，能在黨的內部以及群眾中擴大左反的政治影響？現在留在外面（指監獄外——編者按）的能力是更加有限了，如果再繼續糾紛，當然只有愈趨於薄弱乃至潰散——現在已臨到了這樣的危機。雖然潰散也許是一時的，但一時的潰散對於反對派前途的發展却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會影響到前途的政治發展。比方沒有相當統一集中的組織，就無法出版統一的機關報，更談不到在政治上及時應付事變，領導鬥爭。即或有幾個小組織，形式上在上海及各地分立地存在着，那一定是毫無生氣的。而且會互相攻擊乃至責罵，回到更原始的狀態上去，給群眾以更惡劣的影響

——這種可能的情勢之推測，難道是神經過敏嗎？正因為以上這些理由，我認爲我們再不能坐視像現時組織情形這樣混亂下去了。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盡我們所能想到的辦法，盡我們的能力去幫助外面停止混亂，重新開始作點現有力量內所能作的切切實實的工作。這就是我前日起草組織意見的動機。

當然要停止混亂，決非單純開除某某或制裁某某所能辦到，尤非凡兄所說只是注意於打倒某人。我前日起草的組織意見是：(1)立刻恢復機關報；(2)保持對工人固有的聯繫；(3)過去及現在的不同意見，各自簡明地提出綱領來，一方發交黨員群眾討論，一方提請國際指示；(4)與國際盡速地恢復聯繫以便獲得政治上的指導……。在第三項中我曾提到對那些完全消極而拒絕任何工作的人，當讓他們在組織外面作同情者，免在內部起腐化作用。我主張對（劉）仁靜*予以制裁，如果他還固執己見而又無原則地使組織分裂。統一以後，仁靜經過短時期的休息又重新回到他的老路線，起初還帶着政治的假面具，隨後他索性丟開假面具，不顧一切地赤裸裸地與任何搗亂份子勾結，使組織混亂，妨碍工作的進行。他與張特的共同行動所給予組織上之惡劣影響，是爲你們所熟知的。自我們的事變發生之後，在仁靜的地位上，無論如何應平心靜氣地顧全團體的利益負點責任、作點工作。然而，在他當臨委書記時，反而專門施行種種政客手段，企圖拉攏別人來贊同他那絕對錯誤的理論和主張，放棄一切工作不作。隨後見無人能同意他的意見時，於是即藉此辭職，重復執行他以前與張特共同行動的路線。幾個月來他甚麼工作都不作，直至連國際的文件亦扣留不交團體，專門找人「談話」，鼓動反對這個或那個。尤其在電力和電話支部中藉教

* 劉仁靜又名劉鏡國，被國民黨遞捕後投降。

書爲名，鼓動某些糊塗份子反對組織，擁護張特，致使該兩支部弄得非常之糟，行將解體……。

像劉仁靜這種人，組織如果老是放任他，這還成甚麼組織呢？固然鬧個人糾紛的還有不少，但我認爲比起劉仁靜來總還有可恕之處。故我主張對劉仁靜予以堅決的制裁。對其餘專鬧糾紛的亦應予以警告，請他們爲左反着想，必須停止糾紛而從事工作。這裏也許你們又要說，我們的「訓令」不會有人「服從」，因爲他們「看不起」我們，不「尊崇」老先生。〔指陳獨秀——編者〕我想，我們不應這樣提出問題。「看不起」或「不尊崇」，這不是我們所應估計的。我們的責任在提出我們認爲正當而又可能執行的辦法。問題在辦法的對不對，而不應顧慮少數份子對於提出辦法的人之是否「看得起」或「尊崇」。我們提出的意見是給外面作解決問題的參考，我們希望他們能以執行，但是否執行，那是他們的責任，我們這裏只能盡建議的責任，——這也就是我們在這裏唯一能盡而且應盡的責任。

總之，立即停止反對派組織上的混亂，重新整理組織，恢復工作，建立真心願意而又能爲團體工作的臨時機關，其主要任務在恢復機關報（這是絕頂重要的，故在組織意見中曾特別加以比較詳細的說明）保持工人固有的聯繫與各地及國際迅即恢復關係，只有如此左反在組織上才算是存在，我們才能替組織作點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工作——如在可能範圍內經常貢獻我們的政治意見，替機關報作些政治論文或關於理論及政治路線上之解釋的文字——這是我們所能作的唯一的工作，也就是我們在此間唯一所能參加的政治生活。但組織如果依然無了無休地混亂下去，沒有機關報，則我認爲這裏的我們便沒有在政治上幫助外面之可能，也就是沒有參加「工作」之可能了。因爲我們要貢獻政治意見，先決的條件

必須組織與我們發生較良好的關係，必須不斷地將外面的消息供給我們，將斯派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情形告訴我們，將國際的刊物，尤其是托洛茨基的重要文件寄給我們。重復一句，對於組織問題，我希望你們不要忽視，而且不應存一種心理，以為我們在此地沒有可能談外邊的組織問題。當然，日常的細小的組織問題，是無法談的，也用不着我們談，但關於一般的問題，尤其是目前的組織混亂情形，我們不僅應當，而且有可能發表我們的意見。我們為甚麼要吝惜或隱藏我們的意見呢？在我看來，這是責任問題，這是我們的義務。

關於政治意見，老先生似乎不願意等。據我看，他似乎是有點消極。前幾天他不願意你們稱他作領袖，這一方面是他觀念上的錯誤，另方面也正反映了他的消極心理。其實所謂『領袖』固然用不着去硬爭，但也用不着否認（像老先生現時的地位）。硬爭領袖是極無聊的小資產階級性之表現，『爭不到時，重則叛變輕則消極』，但老先生似乎不應以此自擬。『領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重大的責任之所在，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革命勢力的象徵。革命的領袖既非任何人主觀所能爭到，但亦非謙讓所能推辭。他是歷史地從革命事變中生長起來的。同時也應明白，領袖能由革命事變所造成，但亦能由革命事變所毀滅。從個人方面說，革命領袖地位的形成，乃是由於他對革命之異常的忠誠、堅定、努力、幹材（政治的及組織的）……在長期鬥爭中結晶起來的。爭奪領袖固是無恥的幻想，但在某一時期內辭却應負的領袖責任，亦非美德。『謙讓』，在政治上不但不是美德，有時還可以造成罪惡，『當仁不讓』這句老古董話，在這裏是很適合的。我希望你們以『群眾』的力量推動老先生不要消極，請他往積極的方向走。

其次老先生說到『我諱言政治上的不同意見』，我認為

這種批評是非事實的。我從未諱言我們之間有某些不同的意見。而你們前幾次的信中，說『我們之間沒有不同的意見』，我當時倒覺得這話有點『諱言』的嫌疑。在我看來，我們之間的不同意見是存在着的，例如我同老先生間及我們同外面的某些人之間，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意見。而且這種『不同』是在一個政治組織內常有的現象，是無可避免的，一點也用不着驚奇。但是，在現時各種意見中，除仁靜的以外我認爲還沒有形成十分嚴重的原則上的分歧，只是對於某些問題（如革命性質及國民會議問題……）的解釋多少差異而已。固然，此種『差異』將來可以發展到原則上的不同，但究竟還是將來的問題，還要待發展的爭論與事實來證驗，現在不應過於誇張，而老先生似乎有點誇張吧！我想只要大家將意見簡明地寫出來，給群眾討論，請國際指示，是能得到相當解決的；而老先生如果起草一個關於目前政治局勢意見的草案，經過我們一番討論之後，在這裏就可以取得相當的一致。以此再徵求外面的同意，便有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見。——這不是爭取對目前局勢的估計和主張上的一致之最切實的辦法嗎？

現時中國的政治局勢是處在一個最重要關頭，統治階級的政府於公開投降日帝國主義（如唐沽協定）出賣平津之後，現在又正在積極準備哀求英美帝國主義共管華中華南，企圖藉此以保存其剝削的地位（宋子文之奔走歐美間就是如此）。這一計劃如果成功，不是引起日帝國主義的猛烈的新進攻，便要引起國際帝國主義的共管，並且最後會在中國領域內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燄。但同時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還在增長，他們的內戰還在醞釀，如果這一內戰爆發出來，或者使現時的中央政府崩潰，形成一個相當時期的混亂局面，在這種局面下，反帝運動會重新抬頭，

農民鬥爭會發展，國民會議會被提到實際的議事日程上，民衆有可能抬起頭來……這可以開展成爲革命的前途。當然這兩種前途也許因國際的複雜關係而有所改變，如日帝之新進攻，歐洲局勢之發展（或因奧國問題而引起……），英美的衝突等等。現時無論在國際上，在中國，其情形都是日趨嚴重化，我們應切實加以注意，求得明瞭而正確的意見以貢獻於外面。

托洛茨基近來對於中國的意見，據史朝生說，有以下幾點：（一）對目前根本的政治口號是：『打倒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萬歲』；而對於民衆政權問題，却未曾提及……（二）對『紅軍』問題，他估計將來左反如果領導無產階級在城市勝利時，也許『紅軍』在斯派指導下成爲反對工人的勢力；（三）對於利用愛國口號，他表示懷疑態度，他的意思似乎須得避免國家主義的傾向。——以上不過從老史口頭所得的一些。現在此地有幾份《戰士報》其中有好幾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如對德國問題，奧國問題、蘇聯問題等，我正在閱讀，讀完即送交你們。

我寫得如此之多而又雜，也許你們在此種極端炎熱之下，看了覺得麻煩，但望不要因怕麻煩而忽視問題的重要吧！

(三)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

致羅世凡、彭道之、濮德治、宋逢春等

.....

這次我對於領袖問題所以發表的那些意見，是由於仲甫同志（即陳獨秀，後同——編者）於厭惡「假領袖」之餘，只是以消極態度否認自己的「地位」，在我看來是否認自己的「責任」，是完全消極的表示。因此迫得我來說明「領袖」之一般的意義與作用，及別人對領袖和領袖對自己所應有的正當態度，歸結是：我們應站在正確的立場上糾正別人不正確的觀念，並糾正自己，在正確的觀念下擔負起應負的責任來——這就是我的「文所對之題」。

現在仲甫同志更進一步表示「連個人的意見也不願寫」，這是表示甚麼呢？不是表示更消極了嗎？這是由於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所產生的。要反對「無恥的假領袖」，「必須自己照照鏡子」，抽象說來，這是正確的；但如果因此而連自己適當的地位和應盡的責任也連帶予以否認，那就未免不正確了。我們拿鏡子來照自己時，不應站在道德的「謙虛」的，即消極的觀點上，而應站在積極的科學的觀點上，就是說，我們對自己應採取積極的批評的態度，正確地估量自己的弱點與優點，而用行為去改變它（弱點）和發展它（優點），並儘可能利用自己的優點以服務於團體和革命。一個人「妄自尊大」固是一種罪惡，但「故意謙虛」也不見得是美德——在政治上尤其如此。仲甫同志在過去黨的地位以及現時在反對派中的地位，都是站一個無可否認的領袖地位。固然他作了不少的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完全「將錯就錯」，而是在「改正錯誤」的路上走——這總算是他現時所表現的優點之

一，也就是他直到現在還是大家屬望的領袖的主要原因之一。仲甫同志怎麼好因厭惡假領袖而否認自己的地位，由否認地位而連帶地否認其責任呢？不用說，仲甫同志有嚴重的缺點，但對於那些缺點只有憑着正確的認識和努力去改正它們，而絕不是將自己退去領袖地位，推御責任這種消極方式所能糾正的。另一方面，對於『……非擺領袖架子不過癮的假領袖』也應該客觀地指責其所以發生此種現象之一般的原因與個別的原因，從觀念上和事實上用鬥爭的手段去糾正和制止它們，絕非『厭惡』所能解決，尤非憑謙虛的態度將自己退去領袖舞台『讓他們自己慚愧慚愧』的感化態度所能有濟。而仲甫同志竟然採取這種態度，我認爲這正是他的最大弱點——他這種消極的弱點曾經好幾次表現過，這是應該力加糾正的。仲甫同志前次的信上說，只有像列寧、托洛茨基那樣的人物才配稱領袖，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次於或更次於……列托的人也可以稱領袖。在一定的環境下和一定的時期內，會有各式各樣的領袖擔負一定的責任。像列托那樣的領袖，不是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度都可以產生的。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絕不能有列托那樣的人物，但我們有他們給我們所定下的根本路線及處理政治問題的方法，我們可以學習他們那種常態的堅定的替革命服務的積極精神，以及那種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而又能隨時抓住活事實『隨機應變』的精神……等。列托是無產階級領袖的典型，人們可以效法他們，却很難幾及他們，人們不可以把領袖的標準擬得太高，致使自己過分失望。

最奇怪的是仲甫同志說我企圖在此間組織一『太上機關的臨委』！這真是奇怪的推測！！我的意見本來十分明顯：只是就現時左派反對派的客觀情形觀察，就外面現有人才、力量估計，比較起來我們這裏是『中心』，因此我們在政治上

應該儘可能負責，儘可能幫助外面；我們應儘可能地求得共同的意見給外面作基礎，使外面或能由此得出統一的意見，以便對外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難道這裏面含有組織太上機關的企圖嗎？問題是我所估計的左反內部現況對不對。如果情形真如我所估計力量的對比，我們這裏比外面的多少要強些，我們爲甚麼客氣呢？爲甚麼不可以負起責來，仔細研究目前的政治局勢，求得比較正確的共同的政治意見，以作統一外面意見之基礎呢？我想如果我們不擺虛偽的道德家的臉孔（官僚臉孔的另一面），無論在一般的經驗上，政治上，我們這裏合攏起來，比上海現有領導機關無論如何要強些。所以我說：『中心』在我們這裏，雖然尚弱，但外面沒有更『堅強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仲甫同志也常常說外面怎樣怎樣不行，沒有辦法，甚至主張讓它潰散下去，將來再說……這不但完全承認了我所估計的事實，而且比我所估計的更壞哩！同時仲甫同志更（對任曙）說：『對那些搗亂份子應採取不姑息的手段，如果我出去，我一個人也要怎樣怎樣……』，這不是表示仲甫同志的『自信自負』嗎？我也可以說，我們這裏正因爲有他，所以是『中心』，但也不否認還是『弱』。事實上當我們在外面負責時，雖然作得並不怎樣好，可是比起現在的混亂情形來是不同的。——這就是我由事實上得來的經驗，證明我們確要強些，因此我們更應負責。但在政治上負責任，以我們的政治意見去影響外面，乃至統一外面，絕非甚麼太上領導機關的行爲，只要不是『強制的』，『橫霸的』，而是採取『貢獻的』態度，『說服的』精神——如果是『強制的』『橫霸的』態度，事實上也辦不到，不但不應該。

仲甫同志以『組織太上常委』的企圖加之於我之後，即以『把自己除外』來表示譏嘲，並聲明『政治意見也不願意

一，也就是他直到現在還是大家屬望的領袖的主要原因之一。仲甫同志怎麼好因厭惡假領袖而否認自己的地位，由否認地位而連帶地否認其責任呢？不用說，仲甫同志有嚴重的缺點，但對於那些缺點只有憑着正確的認識和努力去改正它們，而絕不是將自己退去領袖地位，推御責任這種消極方式所能糾正的。另一方面，對於『……非擺領袖架子不過癮的假領袖』也應該客觀地指責其所以發生此種現象之一般的原因與個別的原因，從觀念上和事實上用鬥爭的手段去糾正和制止它們，絕非『厭惡』所能解決，尤非憑謙虛的態度將自己退去領袖舞台『讓他們自己慚愧慚愧』的感化態度所能有濟。而仲甫同志竟然採取這種態度，我認爲這正是他的最大弱點——他這種消極的弱點曾經好幾次表現過，這是應該力加糾正的。仲甫同志前次的信上說，只有像列寧、托洛茨基那樣的人物才配稱領袖，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次於或更次於……列托的人也可以稱領袖。在一定的環境下和一定的時期內，會有各式各樣的領袖擔負一定的責任。像列托那樣的領袖，不是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度都可以產生的。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絕不能有列托那樣的人物，但我們有他們給我們所定下的根本路線及處理政治問題的方法，我們可以學習他們那種常態的堅定的替革命服務的積極精神，以及那種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而又能隨時抓住活事實『隨機應變』的精神……等。列托是無產階級領袖的典型，人們可以效法他們，却很難幾及他們，人們不可以把領袖的標準擬得太高，致使自己過分失望。

最奇怪的是仲甫同志說我企圖在此間組織一『太上機關的臨委』！這真是奇怪的推測！！我的意見本來十分明顯：只是就現時左派反對派的客觀情形觀察，就外面現有人才、力量估計，比較起來我們這裏是『中心』，因此我們在政治上

應該儘可能負責，儘可能幫助外面；我們應儘可能地求得共同的意見給外面作基礎，使外面或能由此得出統一的意見，以便對外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難道這裏面含有組織太上機關的企圖嗎？問題是我所估計的左反內部現況對不對。如果情形真如我所估計力量的對比，我們這裏比外面的多少要強些，我們爲甚麼客氣呢？爲甚麼不可以負起責來，仔細研究目前的政治局勢，求得比較正確的共同的政治意見，以作統一外面意見之基礎呢？我想如果我們不擺虛偽的道德家的臉孔（官僚臉孔的另一面），無論在一般的經驗上，政治上，我們這裏合攏起來，比上海現有領導機關無論如何要強些。所以我說：『中心』在我們這裏，雖然尚弱，但外面沒有更『堅強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仲甫同志也常常說外面怎樣怎樣不行，沒有辦法，甚至主張讓它潰散下去，將來再說……這不但完全承認了我所估計的事實，而且比我所估計的更壞哩！同時仲甫同志更（對任曙）說：『對那些搗亂份子應採取不姑息的手段，如果我出去，我一個人也要怎樣怎樣……』，這不是表示仲甫同志的『自信自負』嗎？我也可以說，我們這裏正因爲有他，所以是『中心』，但也不否認還是『弱』。事實上當我們在外面負責時，雖然作得並不怎樣好，可是比起現在的混亂情形來是不同的。——這就是我由事實上得來的經驗，證明我們確要強些，因此我們更應負責。但在政治上負責任，以我們的政治意見去影響外面，乃至統一外面，絕非甚麼太上領導機關的行爲，只要不是『強制的』，『橫霸的』，而是採取『貢獻的』態度，『說服的』精神——如果是『強制的』『橫霸的』態度，事實上也辦不到，不但不應該。

仲甫同志以『組織太上常委』的企圖加之於我之後，即以『把自己除外』來表示譏嘲，並聲明『政治意見也不願意

寫」來表示消極——我認爲此態度更是不應該的。仲甫同志如認爲我的意見不正確，應該採取嚴正的批評精神，採取積極的態度以糾正別人和說服別人。

至於仲甫同志說到目前世界及中國政治經濟局勢之轉變，實不容易估量，不容易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也許是事實。但我們究竟是政治家，不能因爲不容易估量，不容易得出正確的結論，而遂停止我們的『估量』與『政治結論的提出』。我們必須依政治家的任務，在艱苦用心的搜研中作出相當的政治結論，也許不正確，甚至錯誤，但總比沒有政治意見要好些——因爲即使錯誤了，只要不固執，我們也會得着錯誤的教訓。我們應該注意一點，就是反對派差不多一年以來對於中國政治局勢的遷移沒有任何政治估量和政治主張了，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了外面負責人太不行，同時也就是表示反對派的嚴重危機。

最後，我希望在這裏的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來討論一些重要的問題，尤其是目前的政治問題。我們不應該像過去或現在在外面的一部份人一樣，將我們自陷於意氣或感情之爭的漩渦中。

我現在仍是希望仲甫同志起草，至少寫他個人的政治意見。我一定準備寫點個人的政治意見，以作大家討論的參考。

(四)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

答凡與春

.....

閱了凡春二兄的信後，我覺得有幾點還得加以解釋和聲明。

一、凡兄說，我們這次爭論不過是屬於概念或觀念的範疇內的問題，實際問題是寫政治意見。似乎『概念』的爭論，無關重要。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言論和行動，都是為一定的觀念所支配着或為其所影響着的。觀念不正確，一定產生不正確的言行。例如對領袖的觀念問題如果不正確，則無論是自己站在領袖地位或對待別的領袖，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不正確的態度。其他一切問題，如政治問題，組織問題，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忽視觀念範圍內的爭論，而應儘可能地求得對於某一問題的正確觀念——如果問題已經提出來時。而仲甫同志此次之表示消極，我認為就是他對於『領袖』（同時即對他自己的地位）認識不正確，而『觀念』上不正確之反映。

二、春兄說，在現時我們與外面交通不便，尤其在將來更壞的環境（如模範監）下，像我主張經常貢獻意見於外面，未免有流於『太上領導』之虞——這樣地給我以『同志的忠告』。但這『忠告』在我看來是多餘的。很明顯地，我說我們應經常地貢獻意見於外面，是從我們的責任上說，是說我們『應該如此』。但並非是說，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如此。如果將來的環境假定完全是隔絕的，那就根本談不到貢獻意見，何況『經常』！但我們主觀上無論如何總應設法與外界取得交通，與外面發生關係，以便多少能貢獻些意見。我在

前一次信中曾經說過：『我們貢獻意見的先決條件是組織必須與我們發生較良好的聯繫，必須不斷將外界的情形告訴我們，將斯大林派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情形告訴我們，將國際將刊物寄給我們……』，這還不明顯嗎？退一步說，就是意見貢獻錯了，也不能算是甚麼『太上領袖』，只要不是強制執行的，而是貢獻討論的態度——這一層在上次信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其次，春兄說我似乎『翻悔』不寫政治意見了。其實不然。我自始即主張仲甫同志起草一個集體的意見，我個人也寫點像政治論文式的意見，一方以作我們討論的參考，一方寄到外面去，或者作刊物上的文章。現在我還是如此。就是仲甫同志不肯寫，我個人還是要寫的。

三、總而言之，我們應當將我們的眼光注視到左反的現狀與前途，不要因我們一時落在敵人手裏而消極，我們要常常提起我們的積極精神，利用各種可能向外面貢獻意見，盡我們主觀上能盡的力量幫助外面，而且時時準備機會到來時立刻踏上戰場——在我們前面，在現在客觀環境下，這種『機會』的可能是存在着的，這就是我這次說了許多話的根本用意之所在。

四、我們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當然還可以而且應該細細地省察個人自己整個的過去，但必須帶上正確的嚴肅的『批評鏡』，既用不着『掩藏』，也用不着『謙抑』，而要恰如其分地尋求自己過去言行的實質，明瞭地認識其弱點與優點（每一個人都有弱點與優點，不過其比例的成份各有不同而已），而積極糾正之和发展之。『宗教式的懺悔』與『道德式的謙抑』，都不會產生甚麼積極的結果，反而有害處，——因為在另一環境中很容易將已經懺悔的謙抑的『廉價貨』收回去呢。最後，我也同意你們的一些提議。即關於『結束

我們的討論』，我也相當地贊成。不過我應當指出，我們的爭論尚未得到明瞭的共同的結論，這是表明尚缺乏嚴正的討論與批評精神，這點是值得注意的。

(五)

一九三三年八月卅日

致凡、道、卜、春等

.....

我本來不想說話了（關於領袖問題），但今天看了仲甫同志的信，又迫着我不能不再說幾句。據仲甫同志的信的內容，大概包括以下幾點：（一）『領袖』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不是預定好的，更不是永久固定的；（二）在他（仲）沒有具備一定的條件，所以他不認自己為領袖；（三）似乎過去一切糾紛就是因為有人妄認他為領袖並妄想造成中心所釀成的。關於第一點，一般說來是正確的。但關於條件問題必須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一定的條件』因所要的時空不同，即因在一定國度革命事變發展的階段不同而有高低。發展這就是說，『領袖』自身也是『生長的』或『變化的』東西。一個人可以在某地某時配稱為領袖，假使不隨着時間而前進，而在另地另時又往往不能稱為領袖了。所以我說：『領袖由革命事變把他提起來，但也可以由革命事變的發展把他推倒下去』，正是這個意思，正是辯證法地說明沒有『預定的領袖』，更很難有『永久的領袖』的意思。關於第二點，即關於領袖的條件，我認為最低的是：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堅定不斷地

奮鬥，並經過相當事變的證驗及群眾的信賴。最高的條件是：高度的理論修養與政治主張常態的正確（包括理論及政治路線的創立），也須經過事變的證明。當然，此種最低與最高條件的區別，只是相對的，而在一定限度內是相互錯縱的。從這一觀點出發，我認爲仲甫同志多少是具備了第一個條件，而所最不夠的是第二個條件。但是第二個條件，不是每個領袖都能完全具備的。這『條件』的自身亦有其一定的『歷史條件』，且爲一定的歷史條件所限制。如馬、恩、列、托，都是在一種國際的同時又是特殊國度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所以他們成爲普遍國際的全無產階級的領袖，成爲一切領袖的典型。不用說，一個革命的領袖不能以第一個條件自限，應儘可能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政治水平，應儘可能站在正確的理論基礎上，經常地發表正確的政治主張，尤應具有改正自己錯誤的精神，以保證其對革命事業的忠誠與奮鬥之永續。至於仲甫同志已否具備有領袖的條件，如果他不是站在一種謙虛的或虛偽的觀點來否認自己的地位，我却認爲已是歷史的事實，是群眾公認的事實。

仲甫同志是由最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走向共產主義，他領導過很有歷史意義的（使中國歷史前進一大步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他創立了黨（雖然絕大部份是由於國際的推動），領導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雖然這一革命失敗了，作了許多極嚴重的錯誤，就仲甫本人說來應該負責，但主要的責任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自然仲甫同志在這一革命失敗之後，如果也同斯大林布哈林一樣，仍舊堅持其錯誤觀點，抵死不悟，那他的革命的政治生命便跟着革命的失敗而葬送了，他的革命領袖地位也就完結了。可是他是從失敗中相當地認識了錯誤，承認了錯誤，且在改正錯誤，接受了左派反對派的路線，走上了新的道路

—— 這個事實，不但在仲甫同志個人方面是一種對於革命事業尚在繼續奮鬥的象徵，而且在客觀上是反對派政治路線之無可抵抗的反映，在客觀上嚴厲地批駁了斯大林主義的錯誤。仲甫同志—— 黨的創立者，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者—— 之轉變到反對派，在黨在革命都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因此我認爲仲甫同志的領袖地位並未因爲過去革命的失敗、過去的錯誤而降低，反而提高了。但仲甫同志本人却沒有能認識這一點，過去或現在左反內的許多「英雄」們更是盲目地否認這一點，拼命攻擊他，硬要把斯大林的全部錯誤責任加在他身上，這不但不公道，而且是過去左反的許多糾紛原因之一。不待說，我並非認爲仲甫同志單單轉變就夠了；恰相反，我認爲他更應進一步地精細地從過去的錯誤中，從整個革命運動的失敗過程中，尋出無數寶貴的經驗來，尤應深切地認識自己所犯的種種嚴重錯誤，從其中獲得教訓，利用一切可能研究理論，研究政治，發揮左反的路線，密切地注視每一事變的發生和發展，儘可能地提出正確的政治主張，總而言之，應明白認識自己地位的重要，積極起來擔負偉大的歷史的任務。而仲甫同志却說，我不配稱領袖，因此我也不能負領袖的責任，這就是說，我當一個普通黨員好了。而且理論地解釋道：領袖不是預定的，不是永久的，這就等於說，我從前是領袖，現在不應當是了。因爲不應「永久是」的。這是表示甚麼呢？這就是表示更深度的消極，更深度不願負責（就他現有的地位而言）。其實我並沒有想將仲甫同志用定命的公式斷定他爲「永久的」領袖，我是就他過去的歷史，就他現有的客觀地位而言。至於將來，誰能完全斷定呢？但我們希望他能跟着中國革命事變而前進，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理論，不斷地積極奮鬥，及時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除去自己的弱點—— 如此而已。此外，我們都不知道。同樣，我

們自己也不完全知道自己，我們自己也只有依着上敘的態度前進。但無論如何，在現在的情況下，仲甫同志預先從主觀上否認自己的地位，因而採取消極的態度——這正是他的重大弱點——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關於第三點。十分明顯地，起初中國反對派有兩個旗幟：一是國際反對派正確的政治路線，一是仲甫同志個人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如果人們最初認識這點，大家以正確的態度從事於理論上和政治上的討論，在原則上大體取得一致的意見的前提下，馬上從事於工作，不鬧那些根據個人野心的無聊攻擊，以正當的批評態度代替下流的誣蔑，以積極的工作精神代替意氣的爭吵，怎麼會弄到這樣稀糟呢！我記得仁靜初回國時對我說：『反對派的旗幟一定會落在老頭子手裏』，在那時這話是對的。但他的意思是仲甫在他的『理論的政治的』影響之下要承認他是老托的『駐華代表』，他才承認仲甫同志的地位而與他合作。他後來見事實上有點辦不到，於是翻過臉來大揮其誣蔑中傷之筆，鼓其如簧的毒蛇之舌，以最稀有的仇視態度攻擊仲甫同志，將斯大林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錯誤責任都加在他的頭上（不惜替斯大林辯護），詆之為稀有的機會主義者，斷定他為絕無希望的人，大聲地要打倒他，埋葬了他（見《十月》第二期仁靜的《論陳獨秀》一文）。可是隨後不久，同一的仁靜又卑諂地向仲甫同志言和，尊之為唯一領袖，譽之為老革命家，願作他的『部下』效勞（見仁靜致仲甫的幾封短信），而一般盲目者更附和之（如整個的十月社及戰鬥社的人物），這樣便掀起了更混亂的波潮。所以我說仁靜是過去製造糾紛的罪魁。但這裏並不是說，過去一切批評仲甫同志的言論都是錯誤的，更不是說不應該批評。我還可以說，仲甫同志政治觀念上的錯誤，甚至嚴重的錯誤，都是存在着的，但無論如何在那時還

不應採取那樣的猛攻態度，幫助斯大林派毀壞反對派的地位（那時仁靜及其他許多份子對仲甫的批評比斯派來的更辛辣和惡毒）。我引仁靜的例子就足說明過去糾紛的大部份原因之所在了。我現在同過去一樣，認為應該承認仲甫同志的地位，仲甫同志也應『當仁不讓』，負起責任來。（不用說，仲甫同志將來如犯有嚴重錯誤時，我們是應當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和反對的，因為這是每個革命者的責任所在）。政治家絕對用不着道德式的『論讓不還』的精神，列托諸人是從來沒有表示過此種精神的。也許有人說，（仲甫本人在內）斯大林正是常以領袖自居的人物。其實，斯大林的罪惡不在他以領袖自居，而在乎他以不正當的乃至陰謀的手段排斥別的領袖。斯大林是一個『權位的追逐者』，他首先有意地無原則地組織小組織，不惜拉攏一切官僚保守腐化份子，毀碎黨的民主主義以箝制任何人發表意見，排斥十月革命的真正領袖，及黨中一切老幹部，抵死不肯承認錯誤，一意孤行，將自己放在萬能的絕無錯誤的『上帝』寶座上。列寧何嘗不是『以領袖自居』的人，（在列寧看來，領袖只是一積極負革命責任的地位），與斯大林之所以不同者，除理論上和政治上之無可比擬的優越外，列寧同時承認別人的地位（如對老托等），尤其承認群眾的『地位』與作用，尊重黨的民主精神，尊重別人的正確意見，接受『群眾』和『事實』的批評，尤其具有大無畏的承認和改正錯誤的精神——雖然他的錯誤很少。

其次，也不要將『中心』或『核心』看得過於嚴重，他的本身也是有時間性的。『中心』就是所謂黨的幹部，其組成份子往往因時間的遷遞而起變化，但無論如何必須承認每個具體時期的中心幹部或領袖份子，——如果絕對沒有，便必須培養這樣的『中心幹部』或領袖份子。

最後，我重複地說幾句，現在我們同仲甫同志都應對於『領袖』求一個明確的觀念，明確地認識各個人的地位與作用，盡各人的責任及集體的責任。尤其是仲甫同志自己，應將自己放在被研究的對象地位，審查自己整個的過去，自己的功績與罪過（當然是就政治上而言），自己的優點與弱點，對於反對派的，即對於中國未來革命的責任與作用，定出積極工作的方針。在我認為仲甫同志應該：（一）經常地注意國內及國際政治局勢之發展，儘可能及時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見貢獻於外面；（二）切實負責研究過去革命的經驗，用歷史式或回憶錄式的寫成專書（這對於自己和群眾都有重大的理論和政治教育上的意義；（三）補充基本理論——系統地研究馬恩列托一些重要的著作。

此外，仲甫同志對於自己個人的脾氣（如粗暴的發脾氣以及專橫的態度等），也得切實加以改變。因為他這種種性格是很有害於黨的民主精神的。過去有許多人因為害怕他發脾氣，便不敢當他面前說心裏要說的話，更不敢自由地批評他（雖然是正當的，人們總有所顧忌），這樣便形成了當面不敢多說，而心裏總是不舒服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一個民主集中的集團內是絕對不應該有的。並且在某時期因害怕不敢說話的人，待到了另一時期則又毫無顧忌地甚至誣蔑地大肆攻擊起來——據我所知道的事實，這種人是不不少的，如〔瞿〕秋白及仁靜就是顯著的代表。然而所以釀成此種壞現象的，仲甫同志的脾氣是不能不負責任的。本來，個人的脾氣只要不妨礙工作，是沒有甚麼關係的。不過從處在負責地位的人說來，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應相當謹慎，更不要因為輕易發脾氣而阻止或截斷別人應該說的話與批評。應當儘可能尊重別人發表正當意見與正當的批評。即令別人說得不對也應採取說服的精神，粗暴的發脾氣只能引起誤會與糾紛。

因此，我主張你們應當自由地各人說出各人心裏要說的話（因為凡有一次對我說，他實在害怕老先生發脾氣，所以不願意說），不管是批評仲甫同志或批評我或自相批評——這不但是革命家應有的態度和精神，而且也是一種責任，我之批評仲甫同志，也正是根據這一點。

陳獨秀附言：

此函第一頁三點，(一)(二)我的意思是這樣，(三)我現在的意思和過去的事實都不是這樣。述之批評我的話，我都不反對，正因為如此，他希望我責備我的話，只有努力準備在政治理論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將來動的時期即鬥爭中去創造；在目前靜的時期，特別是牢獄中，只好期諸他人。斯之『以領袖自居』和列之以『領袖自居』有天淵之別。餘不多贅了。

與舜君論民主鬥爭與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七日)

序言

在這個小冊子裏所收集的，一共是四個文件。這些文件都是在九年前（一九三三年冬至三四年初），在一個事變（閩變）當中和一個特殊環境（監獄）裏寫的。除了其中第二文件外，從來未曾付印發表過。

現在重檢舊稿深覺其中所討論到的諸問題不但沒有因時間的變遷而喪失其意義，反而因着時間的進展，事變的證驗，尤其是抗戰後幾年來黨內的劇烈爭論，更顯得這些文件所論及的諸問題具有一種鮮活而深刻的意義了。爲了幫助一般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們了解我黨內部過去思想鬥爭的淵源，爲了幫助他們去進一步探討現時爭論的根底，特別爲了幫助他們認識每種錯誤思想的邏輯發展是怎樣地推動着堅持錯誤思想的人們走到何種地步起見，我覺得把這些舊文件發表出來是必要的，深合時宜的。

第一個文件所談的問題是：「民主鬥爭，經濟復興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民衆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及「國民會議問題」。第二個文件所包含的是：「民主運動與不斷革命」，「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民衆政權問題」等（上兩個文件內還涉及「閩變」及對當時時局的估計和策略問題）。第三個文件是專論「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問題。第四個文件，

* 這四個文件都是作者最近檢出寄來，無法查出其中那兩篇曾在何處發表。舜君即劉伯莊。

則略釋不斷革命論與國民會議的聯繫。但如果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那就只是一個問題，即民主鬥爭（民族鬥爭在內）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不斷革命的根本問題。

關於這一根本問題，自中國左派反對派諸小組組織出現的第一天起，即發生了不同的意見。諸小組組織統一後，表面上似乎「意見獲得一致」了，但實際上各種不同的意見仍然是隱伏着的。並且這些不同意見往往跟着每一新事變的發生而重新暴露了出來，以致形成了不斷的鬥爭。單就這個小冊子所收集的文件，已經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八一三」以來黨內的思想衝突於此更獲得了充分的證明。因為一種錯誤的思想或主張，如不經過充分的討論，如不經過錯誤者公開的承認和自覺的糾正，總是要隨着事變的發展而發展的。結果不是堅持錯誤思想的自動離開黨，就不可免地要被黨拋開出去。

這小冊子中第一個文件（覆伯莊的信）所論及的問題，可以說是中國左派反對派發生至「閩變」（一九二九——三三年冬）這一長期間的各種分歧意見之一個總清算。其中各種錯誤思想的代表人物從王凡西、代青到仁靜、任曙和舜君，最後說來其根源都是由於不懂得民主鬥爭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相互關係，即不懂中國革命中之不斷性的根本理論。因此他們在對第三次革命的前途上，在經濟復興問題上，在民衆政權與國民會議問題上，都以各自的荒謬成見來任意曲解。雖然這些人們的出發點各自不同——或從極左方出發（如王凡西與代青），或從極右方出發（如仁靜、任曙和舜君）——但其結論總是與不斷革命背道而馳的。最富有教訓意義的是：這些懷抱錯誤見解的人們，在往後事變發展的過程中，都以各自的行動證驗了他們原來的錯誤思想，不過是

其邏輯發展之後果。最左的陳代青，即高唱第三次革命是簡單的社會主義革命，極端蔑視國民會議的人物一經被捕到南京之後，便立即自行揭破其「左傾」的假面具，而異常卑劣地以「悔過」的方式公然接受三民主義的反動思想了。劉仁靜則是沿着自己極右的思想邏輯，在被捕後則坦直承認三民主義，並聲言願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去協力「復興經濟」，「發揮生產力」。我們的凡西比較堅持得久些。但在「八一三」事變發生後，他以前的極左思想也立刻化作煙雲，而尾隨在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之後，躍躍欲試去嘗試一下軍事投機的勾當。現在雖然在右傾投機碰了釘子後又回到極左派主義的超麟胯下，但將來一遇到新的事變到來時，其極左的假面具是不難被揭破的。舜君對於我給他的批評雖沒有聽到他的固執，但從他多年來表現的消極，也可證明他思想上的錯誤或不堅定，是有其根源的。

在第二與第三兩個文件裏，同獨秀所曾爭論關於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問題，乃是不斷革命論中最具體和最中心的問題。在反動時期爭論這個問題，雖只有理論上的意義，但到第三次革命到臨時便要成爲生死的決定問題了。獨秀在這一異常重要問題上所抱的見解，已異常之明顯，僅僅是俄國孟什維克和西歐一切機會主義者的老調。獨秀後來所發表之超時代和超階級的民主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蘇聯，擁護「民主的」英美，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是從他以前對於國民會議和蘇維埃的曲解中邏輯地演繹和發展下來的。最有趣的（也是最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獨秀以前還同作者一致堅決地反對劉仁靜的生產力論（即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提高生產力，增加無產階級的數量等），可是，到了「八一三」事變後，即在這一點上他也完全投降了劉仁靜，而大唱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來增加無產階級數量的妙論了！

這裏又一次證明獨秀所常常自誇的「獨立思考」或「用自己的頭腦分析客觀」所得出來的見解，實際上僅僅是和仁靜們同一小資產階級思想邏輯的影響之下的一種應聲蟲而已。

最後，從這個小冊子所爭論的諸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最明顯的基本傾向：右傾的機會主義與極左傾的教派主義（機會主義的變種）。前者以獨秀和仁靜為代表，而後者則以代青和凡西為代言人，這兩種傾向，都是不斷革命論的死敵，都是出於同一小資產階級的根源。所不同者只是：前者企圖從右方來破壞不斷革命論，即死死抓住民主鬥爭而否認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後者則企圖從「左方」來拆毀不斷革命論，死死抓住社會主義一個抽象名詞而否定實際上走上社會主義的民主鬥爭的橋樑。這兩種傾向，當「八一三」抗戰發生後，在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上達到了頂點。右方的主要代表仍然是陳獨秀，只是「左方」的主要代表是以超麟填補陳代青的位置罷了。（關於獨秀和意因的思想，請讀者參考《火花》第三卷第五期作者的《對兩條路綫的鬥爭》一文）。

我們平常都喜歡說，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人都應尊重和繼承列寧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但思想上不可調和地鬥爭的傳統，即馬克思主義與各式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鬥爭的傳統，正是布爾塞維克黨的主要傳統之一。這個小冊子乃是我們根據布爾什維克傳統在黨內與各式小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了鬥爭之一個無可否認的具體的表現。我們最近幾年來之與陳獨秀及少數派（新孟什維克）進行了極嚴重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也正是沿着這個小冊子的精神、觀點和思想路綫前進的。也可以說，我們今天的鬥爭，只是這個小冊子內的思想鬥爭在新的事變中之邏輯的展開而已。當然，我們絕不是說，我們自己的思想從開始就是完全正確的，無誤

的，但我們在長期的不懈的思想鬥爭中，大體總是一貫的、認真的，一步一步地前進的，因而不僅揭穿了對方的錯誤，教育了同志，同時也教育自己，加深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只有在不斷的長期的鬥爭中，才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政治水平。

青年一代的同志們，沒有能參加過去的思想鬥爭，因而不甚了解過去的鬥爭傳統，這無疑地是一個重大的弱點。要補救這個弱點，只有從過去思想鬥爭的舊文件去認真地研究，耐心地學習，並以此來理解現時的鬥爭，來積極參加現時的鬥爭，並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我曾經不止一次說過：「黨內的思想鬥爭，乃是未來的偉大的活的階級鬥爭之預演。」因此我們可以說，凡是對於過去黨內思想鬥爭感不到興趣，對於當前黨內思想鬥爭採取迴避或調和態度的人，即令不中途離開黨，那也在未來偉大的階級鬥爭中還是站不住腳的，是難免要溜到迴避，調和甚或滑進反動的泥坑裏去的。

從過去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思想鬥爭中去研討，去學習，並積極地不妥協地參加現時及未來的一切思想鬥爭，以此來鍛鍊自己，來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政治水平，來鞏固黨和發展黨的政治立場，來培養新的幹部，來準備建立一個群眾的革命新黨，這是我們在反動時期內的最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彭述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

舜君兄。

十八日的信，因時間匆促，只是略一提及了閩變問題。茲特將一些較重要的論爭問題及我們間的不同意見分敘如下：

(一) 民主鬥爭，經濟復興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據來函稱「在民主鬥爭上，不管各人對於這一鬥爭在許多具體問題上表現的不同，甚至實質地表現出拒絕這一路綫的部分觀點，但大體上都承認是左派反對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所以誰贊成民主鬥爭，或不贊成，是不容易說的。」據這一段輕描淡寫的話看來，似乎問題不在「各人對於民主鬥爭的態度」，而在乎「具體問題的表現上」。但依我的觀察，「各人在許多具體問題上表現得不同，甚至實質地表現出拒絕這一路綫的部分觀點」，正是由於對「民主鬥爭」的認識與態度不同所致。從過去直到現在，反對派內部一切意見的糾紛，一切論爭的混亂，歸根究底說來，都是原於對「民主鬥爭」，即「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關係——這一根本問題上沒有一致的明確的認識。斯大林主義者由承認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出發，而否認了在這一革命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拒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但反對派的許多份子則因反對斯大林的機會主義而走到另一極端，他們只是抓住了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却又根本忽視了民主革命的本身，民主鬥爭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間的相互關係。即就你所說的「大體上都能承認民主鬥爭是左派反對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一句話中，亦無形中表露了對「民主鬥爭」的意義與作用認識之不充分和多少輕視的心理。我真不明白：在目前除了民主鬥爭的任務，還有什麼別的任務？其次，民主鬥爭難道只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嗎？其實民主鬥爭不僅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且是目前

全部任務之所在。即在將來，直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日，亦是最重要的任務。誰不了解這點，誰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走上政權。因為中國的革命客觀上就是要求解決民族民主的革命的任務（主要內容是民族解放與農民解放），如果沒有此等民族民主任務急待解決，根本上就無革命之可言，更不用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僅僅是民族民主鬥爭發展之邏輯的結論。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民主革命鬥爭達到勝利的必然產品，反過來說，鬥爭不達到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革命必然歸於失敗或流產，民族民主的任務決不會得到解決。托洛茨基同志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表現於完成民主革命之後，如拉狄克所說的——在此種場合裏它在俄國簡直不可能，因為在落後國家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不能走上政權，假如農民任務（即俄國革命的民主任務——著者）在過去階段中被解決了。不，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專政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是可信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因為沒有別的力量和方法解決農民的任務。但由此便開闢了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不斷革命論俄文本五八一—五九頁）。這是不斷革命論之最基本的見解。但人們多不了解此種見解，甚至輕視這一見解，即輕視民主鬥爭的作用。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似乎不是由民主革命過程中產生，而須由什麼社會主義革命中去創造。過去凡西同志就是抱持此種見解的代表之一。如他說：「將來第三次革命一開始時，就是社會主義的」，這顯然是將馬車套在馬的前面，與「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是完全相反的。十月革命的教訓是：先有了自二月，尤其自八月至十月廣大洶湧的民主鬥爭（主要是農民暴動）的潮流，無產階級才獲得可能乘此潮流踏上了政權。中國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不但起初將由民族民主鬥爭引起，而

且必須經過翻天覆地的民族民主鬥爭的巨潮，而無產階級又成了這一巨潮的引潮兒，牠才能真正踏上政權。認為第三次革命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這無異於承認民主革命在過去已經完結了，將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是在民主革命的巨潮中，而是在「社會主義的革命中」——但這種見解適與不斷革命論站在相反的地位，是一種變相的階段論。人們說：「在革命起來時，我們即應提出沒收工廠銀行礦山等口號，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嗎？」但這些口號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前，只是宣傳的口號，而且還要謹慎地適合時機地提出。而無產階級能以走上政權，並非由於這些口號之宣傳的力量，而是由於民族民主口號鼓動的力量，這是十月革命鐵一般的事實所昭示的。社會主義任務的口號提出議事日程，必須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或許是第二日）。所以不斷革命論說：「……落後的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任務在我們將直接引向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將社會主義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這是不斷革命論中心觀念之所在」（同上書十一頁，重點係本文作者所加）。像連根同志所代表的意見，表面上似乎很注重第三次革命的社會主義性，是「左」的，實際上是眼望着目的地而忽視了走向目的地的道路。換言之，就是忽視了民主鬥爭的作用，忽視了走近無產階級專政之民主革命運動的階段。「民主專政」的階段可以跳過，但「民主革命運動的階段」是決不能跳過的。

忽視民主鬥爭之另一代表是小陳同志。也是從對第三次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前途認識不正確發生出來。據他的意見，第三次革命之為社會主義性，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是因為在第二次革命中資產階級已完全取得了政權，階級關係已完全轉變了（大意如此）。我們知道，二月革命後，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以反對那些「老布爾什維克」的民主專政的幻想時，曾提到資產

階級已取得政權爲其「轉換武器」的理由之一。固然階級關係的轉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實際步驟上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但這却不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以代替民主專政口號的真正理由。民主專政的口號根本上是一種幻想，這已爲列寧後來自己所說明：「在階級矛盾已經發展的社會中，所能有的或者是公開的或帶假面具的資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專政，任何中間的政制是不會有的……」（見不斷革命論一三四頁所引）。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在第一次革命中即已獲取了政權。故第三次革命之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與小陳同志所依據之「資產階級已完全取得了政權」，在根本上無多大關係。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於民族民主任務在第二次革命中未曾得到解決，因此民主革命的潮流必然會到來，而第三次革命在這一革命潮流的高漲過程中又必會推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假如不是失敗的話）。在這裏，小陳的出發點雖然與凡西不同，而其不了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與民主革命的相互關係，即忽視民主鬥爭的作用一點上，是一致的。

至於仁靜的「生產力論」（據仁靜最近的來信對經濟復興的意見似有些改變，但他的根本立場，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不能奪取政權的意見還未放棄）則走得更遠，是企圖從根推翻不斷革命論。你說：「對於經濟復興的意見，即小劉（即仁靜——作者）的意見，只是他個人的，沒有任何人同意他。」你這一評論未免過於表面和樂觀。在我看來，小劉的意見實代表一廣大的社會基礎，是一種階級意識的反映，不特在社會上，在斯大林派中現時充滿了仁靜的生產力論的意識，即反對派中亦有許多份子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傾向於此種理論（伯垂就是完全贊成他的，所以他這次不辭而去福建不是無根據的）。因爲仁靜的生產力論或經濟復興論，其基點是：①根本不相信無產階級有力量能奪取政權，

因為牠的數量太少；②忽視農民的力量，因為在他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全賴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農民群眾的力量。所以他的結論只有復興經濟，發展生產力，即發展資本主義，增加足夠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數量，然後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種理論完全合乎一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口胃和要求。從戴季陶、陳公博到陶希聖，都是這一要求的代言人。最有趣的是黨的一切叛徒們凡是宣言說明他們投降國民黨的理由時，總是千篇一律地說，「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無產階級數量太少，談不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三民主義的『革命』」，這雖然對於仁靜的理論是一過於刻薄的諷刺，但確是代表一個階級意識的宣言。這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最後分析起來，仁靜的「經濟復興論」或「生產力論」也是由於根本不了解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關係，特別不了解農民解放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重大作用。他說「中國無產階級在全人口比例中佔很少的數量」，彷彿這是他天才的發明，其實這早已成了小學生的經濟常識。但中國無產階級之有可能奪取政權，不是以牠的數量來決定，而是決定於它在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作用，決定於牠在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之領導作用，最後決定於牠與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關係。如果單從經濟或生產力的觀點出發，那只有西歐和美國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才有資格奪取政權，那只有服從考茨基和蒲列哈諾夫的理論，但十月革命的事實已無情地將這一理論摧毀了。所以托洛茨基同志在不斷革命論中不厭重複地說：「落後國家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可以在民族民主的任務基礎上較先進國家早獲得政權。」他並且說：「當政權轉入無產階級手中，非直接繫於生產力的水平，而是由於階級鬥爭的關係，由於國際的局勢，由於主觀的因素……認無

產階級專政與國家的技術能力和手段之自動聯繫的見解，乃是簡單化到了極端經濟唯物主義的成見。此種意見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總結與前途）。仁靜的生產力論就是無生氣的玄學的布哈林式的或考茨基式的「簡單化到了極端經濟唯物主義的成見」。而此種成見的根源，即由於他根本不了解由民族民主任務所引起的民主革命之對於推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作用。

在政治的動力學上說來，落後國家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之能比較先進國家早獲得政權，是依賴廣大農民群眾的力量，沒有此種力量，無產階級根本談不到奪取政權。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說俄國無產階級是在農民暴動的高潮踏上了政權，它的專政之維持也就建立在農民的擁護之上。仁靜是看不起農民的力量，他不相信無產階級在領導農民的鬥爭中因獲得農民（當然是指大多數貧農）的擁護而有可能踏上政權，故他不得不求援於生產力的發展，不得不求助於陳公博的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幻想。他之主張共產黨員退出紅軍，退出農民戰爭的隊伍，正是他的生產力論在策略上之一貫的運用哩。

在這裏我應附帶指出的，在反對派內忽視農民作用的不僅仁靜一人，他不過比別人走得更遠而已。其實許多人都有這種傾向（從對現時農民戰爭的估量上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此點往後再說），這是由於反對斯大林的「農民主義之一種反動」。其實斯大林主義者的錯誤不在於他們重視農民的作用，而在於他們認為農民有獨立的政治作用，認為農民可以與無產階級平等享受政權，因而堅持機會主義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但托洛茨基同志之反對斯大林主義者，只是否認農民的獨立政治作用，否認農民有獨立組織獨立政黨與無產階級在民主專政口號下平分政權的可能。至於農民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乃至

維持其政權之偉大的決定的作用，他是異常重視的。他同列寧一樣，均認無產階級不取得農民的擁護絕不能走向政權，更不用說維持政權了。誰要是忽視農民的作用，就等於實際上拒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結果不是乾脆離開革命，就是走到仁靜的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共產黨不要參加（更不用說領導）農民戰爭。

總而言之「對於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間的關係」如果沒有明確的了解，不是右傾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接受民主革命而拒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是左傾於清談主義，只抓住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而忽視走向這一前途的民主鬥爭。至於仁靜的生產力論更是露骨地代表資產階級由忽視民主革命而根本取消革命的企圖了。所以我認為對民主鬥爭的態度，必須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有機地聯繫起來。我們應公開地堅決地說，在落後國家如中國，如果沒有民主革命，沒有民主鬥爭，根本上談不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途，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鬥爭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只能在民主鬥爭中去準備奪取政權的前途。無產階級應堅決地勇敢地積極地無保留地領導民族民主的鬥爭，也只有用這樣的態度領導民族民主的鬥爭，它才能在政治上生長成爲農民的及全民族的領袖，才能真正踏上政權（至關於怎樣進行領導民族民主的鬥爭，在鬥爭中怎樣準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策略問題，此地不及備敘，這裏所注意的只是對民主鬥爭的根本態度）。

（二）「民衆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民衆政權」這一口號，就其提出後所引起的意見之混亂看來，即已證明這一口號之弱點和不合時宜了！我原來對這一口號的意見是：「民衆政權」就其本身說來是不確定的、含糊的、代數式的，每個階級都可以稱自己的政權爲「民衆政權」。在

沒有革命局勢，在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我們絕不應用牠。因為我們宣傳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作用，是在向先進的工人及真正同情工人的份子耐心解釋：政權只有兩種：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並說明：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客觀上必然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才能真正解決革命的民主任務，才能不致中途停頓而能走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徹底改造整個民族的生活。並在這樣的宣傳解釋中，我們要無情地批評對政權問題之一切欺騙的模糊口號，尤其要批評斯大林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使群眾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十分明確而堅決，不致為任何含糊的口號所混淆迷惑。但我同時亦認為在有革命局勢時，像中國小資產階級群眾（農民和城市貧民）佔人口如此壓倒多數的國家中，在某種場合裏向群眾進行鼓動（如鼓動的論文與演說）之下，或者不妨將「民衆政權」用作「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的說明，通俗的翻譯。因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內）既常稱自己的政權為人民政府或民衆政權，則無產階級更可稱自己的政權為「真正的民衆政權」。托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鼓動論文中有時曾用過 *HAPO DHOR CPACME*，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完全的民衆政權」或「真正的人民政府」，後來列寧有時亦稱十月後的無產階級政權為「蘇維埃人民政府」，也是這個意思。「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專政」的口號（托氏有時用「靠在農民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嚴格的政治科學的口號。在革命時期向群眾進行鼓動時，可以而且應當用各種更通俗的口號來解釋牠，翻譯牠。如「工人政府」（這是「二月」後托氏所慣用的），「工農政府」，「蘇維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前用的最普遍的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但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布爾塞維克從沒有提出別的政權

口號以代替「工農民主專政」（那時認爲科學的政權口號），托氏在一九〇五年是提出過「工人政府」的意見的，但在反動時期他亦從未提出別的通俗的政權口號來。因爲在沒有革命局勢時，「立憲會議」即是日常的政治鼓動的總口號，在鼓動上無提政權口號之必要，在宣傳上又必須不懈地解釋嚴正的科學的政權口號，在我們此時政權的宣傳口號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此時如提出「民衆政權」的口號，在宣傳上是混亂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在鼓動上是削弱了「國民會議」口號的力量，而且一方面含着冒險主義的成分，另一方面又徒供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團利用以欺騙人民（福建的「人民政府」就是顯例）。無論在任何方面說，此時的民衆政權口號對於我們都是有害無益的。

就你所報告的對於民衆政權的四種意見，在我看來，前三種反對的意見固然各有錯誤，但牠們多少還反映了一些真理。至於第四種贊成的意見，即你同昭昭（即任曙）的意見，那就錯得真有點可怕了！據你說：「昭之最堅持這一意見的理由，多半側重於牠（民衆政權）的作用和國民會議一樣是過渡階段所必需的（?!）。所以他提出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的口號」。看到這段話，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對派竟然還有這樣荒謬的見解，以「民衆政權」的口號爲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即以之與將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對立，即是說，主觀上預先自覺地準備：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前，還來一個「過渡時期」的「民衆政權」，即克林斯基式或國民黨式的政權！！妙哉，妙哉！！我只有請你向昭昭問一聲：他爲甚麼要反對斯大林派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斯大林派不也說「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只是「過渡時期」的口號，將來還是要「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麼？實在說，我們的昭昭比斯大林派還走得更遠！你還在替他申辯說：

「當然，我們不能說他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很顯然的，他是以此為過渡時期的口號」。但他之「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真憑確據就在於：「他以此（民衆政權）為過渡時期的口號！」如果以民衆政權的口號來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不算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則斯大林派將更有權利說，他們絕非因主張工農民主專政而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了，因為他們亦曾屢次聲言工農民主專政「實現」之後，即要「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呢。但反對不斷革命論的反動的階段論之中心觀念也就在這裏。

至於你自己關於贊成民衆政權的意見，可算發揮得淋漓盡致，且自成一系統。但正因為如此，其錯誤與危險也就頗為可驚。據你說，你是「以辯證的不斷革命的觀點去理解牠」。因此你解釋「民衆政權不但應該而且必然因不同的階級而認識其內容性質不同，並且也時時因鬥爭過程革命發展階段不同而成爲變動的發展，隨革命的進步不同的程度而改變其內容性質」（!?!）「假使我們把牠不分時空，不分其變化發展的內容、形式、性質、而給牠一個絕對資產階級性或無產階級性的固定的意義，這是形式邏輯的——是，否——否的理解法，是階段論的理解法」。你這兩段話的根本意義是：不要給民衆政權一個固定的階級性，讓牠在時空發展過程中去改變其內容、形式、性質，換言之，即讓牠在發展過程中依着「量變質」的公式轉變其階級性。這就算是「辯證的不斷革命的觀點」，可是太天真了，太濫用了!!要知不斷革命論不是在任何具體問題上可以隨便搬來套上的。隨便亂套，必致牛頭不對馬嘴。過去的羅門那子和瞿秋白等就是如此。其實，不斷革命論的真正意義是指整個革命發展的趨勢和路綫而言。其基本內容約有三點（據托氏自己說明）：（一）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與內外階級敵人

不斷鬥爭的問題；(三)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後不斷推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我們所稱現時中國革命之不斷性的意義，是着重於第一點，即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而這一問題中之「轉變」的中心關鍵，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這「專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結束，同時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是革命發展轉變的產物。雖然如此，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本身是確定不移的，無所謂發展與轉變。因為政權的口號是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集中和團結革命階級力量與政權誰屬之指標。故馬克思主義者規定政權的口號時，不但絕不含糊其辭，絕不隱蔽其階級性，而且必須明確地赤裸裸地表顯其階級性，其意在：一方集中無產階級及擁護牠的其他階級（如農民）之鬥爭視綫於一中心目標，他方不讓其他階級政黨有任何假冒利用和混亂旗幟之可能。所以「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自馬克思提出以來，一直成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所擁護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不變的確定的口號。托同志論「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時，曾說這一口號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進行鼓動時可以運用，但在政綱上和正式的文件上還以「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專政」爲宜（大意如此）。像托同志此種對政權口號的嚴正的態度，就是告訴我們：關於政權的口號不應含糊，必須明確地露骨地顯示其階級性，表現其不可移易性。在這裏「是」就是「是」，「否」就是「否」，你所譏笑的「形式邏輯」在這裏完全有效，（形式邏輯在一定限度內是科學的真理，不過牠不能代替辯證法或與之對立，牠的正確性係包含於辯證法之中）不然，就成爲絕對的騎牆主義或絕對的懷疑主義了。你將政權口號看成爲「沒有階級性的固定意義」的「兩方的」、「發展性的」，這就等於把牠看做「軟泥團」，可以任意被捏成爲

「玩意兒」，這在客觀上是替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開闢道路，毀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這與不斷革命論的觀點簡直風馬牛不相及！

你接着說：「……在現階段中其（民衆政權）含糊性正是有利於革命的發展，他向國民會議有同等的作用……在反動時期牠的模糊性，即小資產階級的民衆政權的幻想與無產階級專政之民主政權之不能明確地區別，雖是有利於革命，但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到來，這就有區別的必要……」在這段話中包含有幾個嚴重錯誤點：第一，你將政權的口號與國民會議的口號之作用等量齊觀，混而爲一。其實在反動時期，國民會議的口號是民主運動口號之總的政治上的標幟，其作用在於日常鼓動一切下層民衆（小資產階級在內）不斷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反抗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引導一般民衆走向政治鬥爭的舞台，引向革命鬥爭的道路。至於政權的口號在此時只有宣傳的意義，沒有現實的鼓動作用。就是說，只是在先進的工人份子中解釋將來革命局面到來時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只有如此革命才不致流產，才能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才能走向社會主義，並指示他們必須事先準備奪取政權。正因為如此，我們此時不能提出這種模糊不明的「民衆政權」口號來代替和混亂「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之宣傳。第二，你是在主觀上有意利用「民衆政權」之模糊性，就是說，在反動時期讓「民衆政權」自己適合於各階級的要求，尤其是爲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計，不要說破牠的階級性，等到革命到來時才去「區別」牠，因爲那時才有「必要」。這種見解，顯然地是爲了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將無產階級專政變成爲資產階級性的口號，實際上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替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準備將來克倫斯基式的或武漢政府式的政權，使第三

次革命重演一回第二次革命的不幸悲劇！！不管你預先怎樣否認這種前途，但如果依照你對於民衆政權口號的了解與運用，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只能是「武漢政府式的道路」。

你說：「我們為什麼有提出民衆政權之必要」，是因為「在一切可能談說政權時，不談政權問題不能滿足民衆的要求，但可能談政權時又不能說一定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可以提出蘇維埃」。你爲了解決這「難題」，避免「碰壁」，所以提出「民衆政權」，既可以吸引廣大群衆行動起來，又可以預伏無產階級專政於此口號內，既可以推動革命向前，又可以不背我們本來的要求」。這個如意算盤，表面看來似乎面面周到，無奈你犯了底下的錯誤：(一)政權口號此時（你也承認還是反動時期）不能「吸引廣大群衆行動起來」。如果說「廣大群衆」可以由政權口號的鼓動而「行動起來」，即爲奪取政權而鬥爭，那就等於說已然有了革命局勢。但這是你自己也不承認的。可見這時政權口號還仍然在宣傳時期。既然是宣傳時期，我們為什麼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給群衆」（事實上還談不到向群衆，只能向先進工人份子）以解釋呢？為什麼要用含糊不明的口號去混亂他們欺騙他們呢？(二)事實上放棄了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少是承認國民會議口號在此時不夠，不能「吸引廣大群衆行動起來」，企圖以民衆政權去「代替」國民會議口號，或「補助」這一口號。但國民會議口號如尚不能「吸引廣大群衆行動起來」，奪取政權的「民衆政權」口號能嗎？你自己在這些錯誤觀念的糾纏中，當然像蒼蠅飛進玻璃瓶，只有四面「碰壁」！其實如果能正確了解和靈活運用，我們的路綫是無往而不通的。當我們向群衆進行鼓動時，我們堅決地主張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同時我們不懈地向工人的先

進份子及同情工人的革命者宣傳，必須根本推翻國民黨軍閥的資產階級政府，建立工人貧農的蘇維埃政府，才是真正的出路，並指示他們怎樣向這方面準備。這樣那裏會碰壁呢？

當一個同志向你談閩變問題說：「福建民衆如此起來了，並有強大的力量。如果十九路軍一中途叛變起來，我們有力量推翻牠，這時我們非用蘇維埃去代替不可了」。你竟然被這一段十分昏聩糊塗的話難住了，迫得求援於民衆政權的法寶，即以「民衆政權」去反對民衆政權來解圍！這樣解圍法，直等於犀牛角，愈犀愈不通。你爲什麼不好好地將那位糊塗的同志教育一番呢？第一，福建真正的民衆並沒有「如此起來」，更沒有「強大的力量」，閩變不過是帶改良主義假面具的上層軍人政客的政變勾當（固然客觀上是多少反映了民衆反帝國主義和反國民黨政府的影响，正因爲如此，牠比平常軍閥獨立較有進步的政治意義）；第二，領導閩變的軍人政客爲的是自身權利，並非真正爲了民衆利益，其與南京妥協，或與廣東幹什麼別的勾當都是可能的，壓迫民衆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無所謂「叛變」，（至多只是叛變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不過表示福建運動的本身流產而已。故我們現時還談不到去「推翻十九路軍」，更談不到用「蘇維埃去代替」牠，因爲我們在那裏根本就沒有力量。將以上的事實剖析之後，則應更進一步說明閩變的客觀原因、意義、趨勢及我們對牠的態度和策略等。我想，只有如此才能教育同志，不致加深他的糊塗和幻想。

最後，你說民衆政權口號在反動時期必須提出，「只有到了革命局勢成熟了才可以放棄」。這是把政權口號視同檸檬，吸完了汁液就把牠拋開。可惜政權口號絕非檸檬，而是奪取政權的旗幟，是不能隨便拋開或掉換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經提出政權口號，

便必須堅持到底，爲牠鬥爭到底，直到取得政權爲止。因爲政權口號是戰略（STRATEGY）上的口號，而非策略（TACTIC）的口號，不能因有無革命局勢和革命浪潮的高低而有所變更的。

在你論民衆政權的原文中，還有不少可議之點（差不多從頭至尾都是錯的），上面所舉僅其主要者。總之，你爲擁護民衆政權的口號所創造出來這一頗費深思的有系統的理論，不但離此口號創議人的意見太遠（獨秀同志曾聲明此口號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形式），簡直將牠繪成了一特爲準備斷送未來革命之可怕的機會主義的畫圖。因此，我個人最後應堅決地聲明：民衆政權這一口號，經過了許多同志對牠的意見紛歧，尤其經過你同昭昭對牠奇異的運用，經過此次福建的「人民政府」之建立，同時又在斯大林主義者極力鼓吹「工農民主專政」以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此時期（尙無革命局勢時期）無論是宣傳上或鼓動上我們均絕對不能採用這一口號。即在將來有革命局勢，此口號對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在鼓動上之通俗的解釋或通俗的翻譯的用途亦十分有限了，甚至沒有必要了。因爲那時我們儘可以用「工農兵政府」或「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類的口號作爲政權的鼓動口號哩。我們此時不但應該而且必須不懈地堅決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這是左派反對派路綫所以和斯大林機會主義路綫根本不同之最顯明的標誌，這是不斷革命論的旗幟！誰害怕這旗幟，不敢爲牠宣傳，企圖以別的旗幟來掩蔽牠或代替牠，客觀上都是表示放棄這旗幟，背叛不斷革命論。

（三）國民會議問題

國民會議問題你「認爲比較簡單」，但實際却不然。黨內外

許多人（甚至同情的人）之誤會和不了解反對派的路綫，大都源於這一口號，反對派內部過去意見之特別分歧的亦多集中於這一口號。實際上，國民會議是一最複雜的，因此是一最不容易弄清楚的問題。人們因為沒有明確認識國民會議所含內容的複雜及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作用，尤其是牠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關係，往往只抓住某一點而忽略全部（所謂見樹枝不見森林）卒至走到錯誤的，甚至反國民會議口號的結論。現在我可以舉出幾個代表來，他們是各自代表一種主要傾向的。

代表中的第一位是小陳（即陳代青——作者），他彷彿是從「左」的觀點出發，他特別注意於國民會議之「民主的幻想」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兩點上。在他看來，國民會議是沒有什麼多大作用的。故在「一·二八」事變中他毛遂自薦地起草的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上簡直沒有提到用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他平常雖然沒有否認國民會議這個口號，那只是因為在反動時期找不出別的政治口號來代替。在革命時期，他認國民會議的口號是不需要的（就他的傾向而言），因為那時可以直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尤其他害怕「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故在「一·二八」事變時他極言「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目前最兇惡的敵人」（那時指的是十九路軍）。其實國民會議本身包含有「民主的幻想」，我們是知道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妨害牠在民主鬥爭中之重大的政治作用。你在論民衆政權中有一段話，如果移到這裏來倒頗足以開導小陳。那裏說：「在現階段中其含混和模糊性，（這裏應改爲「國民會議的民主幻想」）正有利於革命的發展……即在這時期能夠吸引群衆起來。那怕小資產階級乃至工人階級對牠發生幻想，但是不怕他們有這幻想，要有這幻想他們才肯起來行動。而他們的幻想在行動中自然會打破，也只有行動中才能打破」。至於國民

會議之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即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民族獨立、統一和土地問題等），那也是自明的，不然，「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必要，而且不會發生了。但認真說起來，小陳同志對國民會議這種「吹毛求疵」的消極精神不是偶然的。他之接受反對派路線只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即社會主義前途。而對於國民會議口號，原來是根本反對的，但「爲了接受母親，不能不勉強承認帶來的孩子！」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間的，即民主鬥爭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間的關係（這點在上面已經指出）。凡是忽視此種關係的人，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即是民主鬥爭運動逐漸發展中準備起來的人，一定要輕視國民會議乃至實際上否認牠的存在作用的。

而我們的仁靜之對國民會議的理解，則是從另一極端觀點出發。他不但認爲國民會議可以完全解決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他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共產黨一定佔大多數，那時的國民會議可以通過土地法，通過蘇維埃政制等。這樣一來，國民會議不但解決了民主任務，而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了。國民會議經過仁靜這藝術大家一描繪之後，實在美妙極了，理想化極了！但在這一理想化的美妙中可惜包含有不少的漏洞：(一) 如果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這就等於說革命的民主任務已經被無產階級在城市巷戰中和農民在農村暴動中用刺刀和鋤頭解決了，蘇維埃政制事實上已經成立了，這時即令國民會議在會場上舉手表決通過承認這種已成的事實，這只能算是「認可」，怎能說得上他們真正解決問題呢？(二) 那時的國民會議既還由普選制產生，則無論共產黨員佔若何的多數，這種會議的性質依然是資產階級的。因為民主普選制就是資產階級性之表徵（這是舜君同志所說到的）。至若謂由無產階級召

集即改變了牠的性質（這點是仁靜最堅持變質的理由），則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如由無產階級所解決，難道亦因之而改變了性質嗎？如果這也算改變了性質，那就根本無所謂民主革命了。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是否必須召集國民會議，這還要看國民會議運動的發展過程和當時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主要是農民）是否要求而定，這只是一種或然的前途。這是老托所估量而仁靜所承認的。但仁靜竟以此種「或然的前途」即「假定」來規定國民會議一般的性質，這是常識的邏輯所能容許的嗎！？以上只就仁靜對「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所持的理由分析一下，其本身的矛盾與不通有如此！！但真正的問題不在這裏，真正的問題在於：仁靜同小陳一樣，根本不懂國民會議鬥爭對於推動無產階級走向政權之作用。我們已知道，仁靜認無產階級之能以取得政權，只是靠復興經濟，發展生產力，增加自己的數量，與民主的革命鬥爭是沒有多少關係的。這樣在一定時期代表民主鬥爭的總的政治口號的國民會議口號，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當然沒有什麼作用了。僅有的作用只在於由無產階級政府召集來通過蘇維埃政制這一點！！！！所以仁靜自「一·二八」以後，只聚精會神地宣傳如何「復興中國經濟」，如「提倡抵制日貨，……開闢國內市場等」（見他給獨秀同志的信）。而對國民會議口號這一個調兒則不彈久矣！！像這種特殊的經濟主義難道是偶然的嗎？！

在國民會議論爭的半路上突然殺出一個手握雙斧的李達來，這就是我們的昭昭，他左手握住「過渡時期的民衆政權」口號，右手握着「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的招牌！但在反動時期不問怎樣召集和誰來召集的國民會議，一般喊出「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的口號，這是真正的議會主義者，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在有革命局勢時，即已經有蘇維埃存在時（革命局勢到來我們必須組織蘇維埃），若提出這樣的口號，那等於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曾稱這種人爲無產階級的叛徒（見列寧論立憲會議提綱）。但昭昭這種荒謬的來源，也是由於根本未曾了解民主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間之關係。他與小陳仁靜不同之點即在於他認定在民主鬥爭時期需建立「過渡的」「民主政權」（或民衆政權），國民會議既爲這過渡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是當然可以代替政權的口號，依照形式邏輯，當然可以提出「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他絲毫不懂得反對派之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並不是指望由國民會議本身產生或變成政權，而在於藉此口號鼓動一般民衆反抗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推動他們走向革命鬥爭的道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

上述三種傾向，對國民會議運動都是同樣的「制止機」，尤以追隨小陳的人（有意地或無意地）爲最多，因爲他是「左」的，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的。我想在這裏略微有重複申敘國民會議的一般意義和作用的必要。反對派之提出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之一般的歷史的社會的根因，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沒有解決，民主革命沒有完成。在政治上，國民會議口號在反動時期是民主運動之總的鼓動的政治口號，它與國家獨立統一和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口號緊相連繫着，不斷地鼓動一切下層群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反抗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反抗一切軍閥貪官污吏等的專橫壓榨，使群衆由參加一般的政治活動而走向革命的鬥爭。在革命時期，它將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口號：一方面逼迫資產階級不斷向群衆讓步，榨取資產階級最後的一滴民主主義，直至揭穿一切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民主假面具；另一方面，牠在一切落後的群衆中幫助他們在實際生活上放棄民主的幻想，證明只有

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才能給他們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賴無產階級，決心起而擁護和幫助牠奪取政權。故我們對於國民會議口號，不但不害怕它所包含的民主幻想，而且正要利用此種幻想以引起群眾參加政治活動，走向革命鬥爭，使他們在實際活動和鬥爭中打破幻想，決心贊成革命主張，不顧一切地參加決生死的奪取政權的革命暴動。我們更無需問它能否真正解決問題，我們只在於利用它引起以至推動民衆走向革命，走向能真正解決問題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絕對不希望由它本身變成政權，或產生政權，而只希望在它的運動過程中能準備無產階級的專政。至於在無產階級專政後是否須要召集，那更是次要而次要的問題，因為那時真正的基本問題已被武裝暴動所解決了。我們在進行國民會議運動過程中所應特別注意的問題是：怎樣使國民會議口號與其他的民主口號有及時的適切的配合；在沒有革命局勢時期，怎樣使這口號的鼓動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有密切的聯繫，在有革命局勢時，怎樣使牠在各方面適合和幫助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鼓動影響之擴大。無產階級領導國民會議運動愈勇敢愈堅決，則在民主革命鬥爭中留給別階級的地位愈少，它領導鬥爭的範圍愈大，他的勢力愈易開展而愈易於踏上政權。

至於你論國民會議的意見，我認爲有兩點比較重要的錯誤。第一，你將國民會議口號與政權（民衆政權）口號對比討論，處處比較其作用。其實它們之間不僅作用不同，而且在性質上亦是迥然各異的。這點在前面我已說過了。第二，你說國民會議「的本身是資產階級的和平議會主義，它自身不能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的東西……因爲它不能跳出資產階級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像這樣地了解國民會議是完全不正確的。國民會議本身可以成爲「資產階級的和平的議會主義」，那就是說，它在資產階

級民主任務已經解決的國家中，或在民主任務來解決的國家中，而國民會議運動為資產階級所領導。歷史上曾經有過極革命的國民會議，那就是法蘭西大革命中的「康文興」(即制憲會議——編者)。在我們的時代，在民族民主任務未解決的國家中，國民會議運動如果為無產階級所領導，國民會議本身可以成為革命的。因為它能在其運動過程中替無產階級專政開闢道路，換句話說，即客觀上幫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至於它「自身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的東西」，「不能跳出资產階級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是它的歷史性，它的民主的階級性所使然。但這並不妨礙它在一定時期(如法國大革命時)和一定情形底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之能成為革命的而非「和平改良主義」的。反對派之採用這一口號，首先就要排除它的「和平主義」性，而盡量利用它的革命性，利用它的「極端民主主義性(如普選制……)」以打擊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以掀起革命的風潮——這就是它巨大的革命作用，如此而已。如希望它「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內容的東西」，和「能跳出资產階級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就成了仁靜的「國民會議即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了！我想有常識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應存這種幻想，而且不應這樣提出問題。

總而言之，討論與運用國民會議這一口號必需特別注意它所含的極端民主主義性——普選制等——並使它與其他的民主任務口號和國民會議運動的前途之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有機地聯繫起來，才能得到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否則必致「異端」百出。

對陳獨秀幾個文件的批評與答覆*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民主運動」與不斷革命問題

(一) 關於此問題，我已在覆伯莊的信中發表了不少意見。現在只提出獨秀同志對此問題的幾點錯誤加以批評。獨秀在論民主運動中對不斷革命論與階段論作了一番不很確切的比較之後說：「我們還很可以有理由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推論在法國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鬥爭中，如果當時有相當力量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會首先在法國民主鬥爭中實現了。」在這一段頗為奇特的歷史「推論」中，暴露了獨秀超歷史的觀點，誤解史實和完全不了解不斷革命論產生的時代性。假使可以假定「在法國大革命中如果有相當力量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會在民主鬥爭中實現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那何不更進一步假定：如果從希臘羅馬時起，商業資本一直發展下來，不經過中世紀一千年的停頓，則全世界久已「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甚至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了——這不更美妙嗎？！馬克思主義者怎麼可以這樣提出「假定」。馬克思主義之了解歷史從來只能根據既成的歷史事實，怎麼可以這樣憑空假定來牽強附會呢！？這裡引起我們一種有趣的回憶：蔡和森在黨五次大會上，曾宣佈說，如果法國大革命中雅哥賓黨採取了現在國際給我們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的路綫」，則當時法國可以走向非資本主義的

* 出處見前文。

前途。和森這段昧於歷史發展常識的笑話，頗能與現在獨秀同志的假定先後媲美！實際上，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工業資本主義還在英國開始，法國那時還沒有現代的無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是資本主義初期的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革命之達到雅各賓的民主專政已是登峰造極了，怎樣扯得上無產階級專政，更怎能用資本主義末期的十月革命去「推論」？！不斷革命只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絕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能的。故當托同志論不斷革命論時，總常常提出一個大前提，即「我們的時代」，他說，我們的時代就單個的國家說來，問牠是否已經成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那是很難答覆的，但就全世界的經濟關係說來是成熟了。因為有此種全世界的經濟關係的基礎，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才能談得上不斷革命的前途。但在工業資本主義剛萌芽的法國大革命時代，怎能談得上這一前途呢？「相當力量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從何處假定起呢？但如果我們真能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不是憑空假定去理解法國大革命的經驗，亦很可以找出不斷革命論的根源，就是：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曾不斷表現由害怕革命而反對革命，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排除了資產階級，幹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托語）。雅各賓團結城市的沙克洛特（當年法國革命中的左派——編者）建立獨裁政府，領導農民戰爭，徹底地解決了民主革命的任務。托同志便是由這樣研究的結論指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一定比法國的更要反動些，同時，又不能有法國那時較有政治獨立性的小資產階級，故俄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現代的沙克洛特）專政來解決。其次，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在法國大革命鬥爭過程中，下層群眾（尤其是巴黎的沙克洛特）曾不斷表現向前進要求徹底解放，即侵犯私產要求經濟平等的傾向。

由此可以指示我們：在我們的時代，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鬥爭勝利必然要走向根本廢除私有財產的道路。十月革命已證實了以上兩種傾向。只有這樣才算是真正了解不斷革命的十月革命與牠的前輩法國大革命間之歷史淵源。

至於拿巴黎公社鬥爭也放在不斷革命的觀點來比十月革命的經驗，更有點過於滑稽，因為巴黎公社鬥爭是在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久已完成之後，公社鬥爭的本身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與民主鬥爭風馬牛不相及，並且公社本身已然是「無產階級的專政」。換句話說，巴黎公社鬥爭已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斷了後，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第一次是一八四八年）。並在這次革命中「實現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至於失敗這是另一問題）怎麼獨秀同志竟連這些含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事實都完全弄錯了！？

假如我們一定要將不斷革命論與西歐歷史上的革命發生較確切的關係，那就只有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不斷革命論的根源即起於此。就是馬克思本人從這次革命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意見。這次革命從馬克思看來，「僅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之序幕」（托語）因為那時德國的民主任務既未解決，同時又有了現代的無產階級。事實上，一八四八年沒有實現馬氏的估量。但馬克思錯了嗎？托同志回答說：「他的錯誤是事實上而非方法性質上的。」故托同志仍然採取馬氏的方法應用於俄國，並被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為絕對正確。獨秀同志如果想以十月革命的經驗去「推論」以前的歷史，只有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中才能找到相當的條件（一方民主任務未解決 另一方又有了無產階級）但他偏偏忽略了這一與不斷革命論有直接血緣關係的革命事實！從獨秀這種對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鬥爭之時間性的事實錯誤上看來，

不斷革命對於他，彷彿成了超時空性的抽象公式。

(二) 獨秀同志說：「不斷革命應用於這些國家，例如蘇俄，如將來的英法等，乃是世界革命……」（見致SP的信），這裏又顯出了獨秀同志忽略了另一個重要點，就是除發展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托氏稱此為不斷革命論之第三基點）外，還有與國內外敵人不斷的鬥爭。托同志說：「國內和國外的戰爭將跟着和平改良的時期而爆發出來」。故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必須採取不斷鬥爭的態度以對待國內外的敵人——這就是托同志自稱構成他的不斷革命論之第二基點。斯大林不了解此點，因此幻想出在一個國家內可以和平地建立社會主義，（他以前之向富農及新經濟人妥協，亦是根據於此），蘇聯可以長久地和平地與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共存共榮——這就是斯大林所以放棄革命的國際主義之根因。而獨秀同志不了解此點，則產生了他現時「帝國主義沒有進攻蘇聯的必要」的主張！

獨秀同志接着說：「如果資產階級完成了牠的革命，無產階級不能停留在這一階段上，而應接着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兩個革命緊接着這當然也是不斷革命」。這段話又是超歷史而完全違反不斷革命的精神的。因為不斷革命之第一基點即是建立在「資產階級不能完成牠的革命」一點上的。如果資產階級完成了牠的革命，無產階級那裏來的「民主任務」做「基礎」去奪取政權呢？！這又不是同不斷革命開玩笑嗎？獨秀還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來作證，（這裏指的當然是法國的革命，因為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中資產階級並沒有完成了牠的革命），更有點稀奇，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早在六十年前完成了，所以馬克思稱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獨秀在這裏所了解的歷史事實和經驗，至少又是一個疏忽的錯誤！

我們且看獨秀對不斷革命所下的結論：「不斷革命是無產階級一般的戰略，在落後國家資產階級不能執行民主革命任務，因此在客觀上革命有不斷性，無產階級採取不斷革命的戰略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這段話大體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大錯，但從「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的形容詞中，顯然含着半懷疑主義的不確定的不堅決的精神，此種精神，在政治行動上是很危險的。如果依真正不斷革命論者說，就是：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只有堅決採取不斷革命的戰略進行鬥爭才能勝利，否則一定失敗，中間沒有別的道路，何止「有理由些，有把握些」而已！

(三)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獨秀同志如何在了解與不斷革命論極有關係的「民主任務」的內容吧！他說：「應堅信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不是資產階級所能解決的了，例如：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全國政權的統一，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召集人民選舉的國民會議，由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等等，沒有一樣是社會主義的，沒有一樣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所能解決的，只有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勝利，取得政權，才能完成這些任務。」在這裏獨秀將民主任務（國家獨立統一和土地問題）與代表民主任務鬥爭的總的政治口號完全混同了。此種混同，不但違反了革命政治的常識，且含有重大的策略上的危險。沒有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上稱國民會議（議會制）為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任務之一。國民會議口號是號召群眾起來為解決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而鬥爭之一種嘗試的工具或機關，猶之無產階級專政其本身並非社會主義任務，而是實現社會主義任務之一種工具（在民主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為解決民主任務之工具）。民主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完成，這是絕對的，但國民會議却不一定要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召集或「完成」。托同志說得非常明顯：無產階級奪取

政權後，是否需要召集國民會議，要看農民對牠有無幻想而定，這只是一種「或然的」前途。但獨秀把牠看成必然的絕對的前途，於是他再也跳不出國民會議的圈子了！下面我將詳細指出他這種傾向的危險。且先提一提他對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了解之錯誤和危險。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這一口號，原來只是反對官僚制度之純粹鼓動性質的口號，將牠來與必須解決的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口號等量齊觀，不知何以謬誤若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是用武力根本打破官僚制度，至於取得政權後，牠是不會採用什麼「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這種辦法的，因為這樣就根本違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如果獨秀堅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立刻必須「完成」「由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的「任務」，那時他就將不可避免地站在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方面反對或破壞無產階級的專政！

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問題

（四）獨秀同志既將國民會議口號與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完全混同，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完成」之「任務」（即認為絕對需要召集國民會議），由這前提出發，他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就同左派反對派的見解分離了！於是也「只有（請注意這二字！）努力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民會議而奮鬥，為驅迫牠解決我們所要求解決的問題而奮鬥，以至大眾走向武裝暴動……」。在另一地方他說：「必須號召民眾為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這裏已十分明顯，他眼中心中只有國民會議，只有為牠而奮鬥，……只有為牠而號召民眾武裝暴動！但蘇維埃口號呢？在他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他口頭也還說說）。更不用說在革命高潮中為蘇維埃而奮鬥，為在蘇維埃口號下號召民眾起來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

了，因為這是「階段論」者的主張哩！（說明見後）真不愧一個「國民會議狂」！但一切革命史上的經驗，尤其十月革命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怎樣呢？就我們所知道的革命史，連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內，從未見過民衆爲要求國民會議或國會而直接武裝暴動過的事實。不錯，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國倫敦的民衆會爲擁護「長期國會」而暴動反對查理第一，一七八九年夏天巴黎民衆亦會爲擁護網球場所宣佈成立的國民立憲會議而暴動反對路易十六，但這只是擁護既成的國會，或國民會議而武裝暴動，並非是爲召集牠而直接暴動——這算是初期資產階級革命中僅有的事實。此後呢？還有兩個國民會議的「典型」，那就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即恩格斯所謂無能可耻的老娼婦）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但這兩個會議都不是由民衆爲牠們直接暴動所產生，牠們只是革命的副產物而已。前者更是一最不名譽的副產物。只有爲國民會議而奮鬥 只有號召民衆爲國民會議而暴動的人們，能否告訴我們以歷史的榜樣，歷史的經驗嗎？但我們却很可以指出民衆爲蘇維埃（指革命高潮時期）而奮鬥，並在擁護蘇維埃口號之下而武裝暴動成功，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的榜樣和活的經驗，那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

（五）俄國革命中不斷革命的創議者堅持者——托同志在二月革命後對立憲會議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是否也像獨秀一樣「只有」爲立憲會議而奮鬥？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從二月到四月，托同志所提出的主要口號是：「沒收沙皇和地主的土地轉給農民！」「打倒帝國主義的強盜！」「民衆的和平與親善！」

（此口號是專對當時的戰爭而提出的——述之），「工人政府萬歲！」（托全集卷一，一六一—二八頁）這裏沒有立憲會議的口號。但他對於立憲會議口號的態度究竟如何？他三月十九日在論

「俄國革命中的內部勢力」中說：「立憲會議的決定，差不多全繫於誰和怎樣召集牠。所以現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立刻以革命的工農兵代表機關（蘇維埃）與臨時政府的執行機關對抗，團結正在興起的民衆於自己的周圍，應以奪取政權為直接目標……。」這裏有沒有「只有」努力為立憲會議而奮鬥，「只有」號召民衆為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的意見呢？不是明顯地指出：工農兵代表機關……應以團結民衆於自己的周圍（不是團結民衆於國民會議的周圍），應以奪取政權為直接目標（不是號召民衆為召集立憲會議而暴動）嗎？托同志此種指示，就是此後他領導十月革命的總路綫，並完全為事變所證驗。我們再來看不斷革命的實行家——十月革命的最高領導者，列寧又如何？列寧的四月大綱是人所共知的。但四月大綱中除了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必要及怎樣準備奪取政權的基本策略外，簡直沒有提到立憲會議的問題。自四月大綱決定以後，總的政治口號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及與相連繫的土地與和平的民主口號。當時布爾什維克對於立憲會議口號只視為補助的鼓動口號，從沒有提出過為立憲會議而武裝暴動的意見。布爾什維克的全部政治活動都集中於爭取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和領導權，及在兵士中鼓動以國內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在農村中鼓動農民自動以武裝奪取土地。誰也知道布爾什維克是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和「土地歸農民」的武裝暴動之下奪取了政權，且蘇維埃本身即為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發動和指揮暴動的機關。立憲會議呢？牠只在資產階級政府故意遷延召集之下，使群眾失望，打破了群眾對牠的幻想。正因為如此，後來的蘇維埃政府很容易地解散了牠，解散後引起的反响亦很少，如此而已。這是事實，也就是無可否認的活的經驗！但獨秀同志用背對着十月革命這種活經驗說：「我們的階段論者都認為民主口號

(按指國民會議一述之) 是資產階級的，只能用在反動時期，到了革命高漲起來便不用牠，無產階級只有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到了革命高漲起來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即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之下奪取政權」，算是「階段論者」！這將何以解釋十月革命的經驗啊？！那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雖然沒有在革命高漲時放棄立憲會議口號，並儘量利用了牠的作用，但事實上奪取政權的暴動是千真萬確地在蘇維埃口號，即「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之下舉行的。難道布爾什維克(列寧與托洛茨基在內)真如我們的獨秀所詛咒的是「階段論者」，或「披左派反對派大衣的孟什維克」嗎？！其實那時真正的孟什維克——階段論者——是反對「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雖然有一時期他們是蘇維埃的支配者)自覺地願將蘇維埃變成臨時政府的附屬物；他們更堅決地(堅決得同我們的獨秀現在一樣)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下暴動奪取政權(那時布爾什維克內的應聲蟲就是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等)；他們堅決地告訴群眾：一切問題(民主任務)「只有」靜待召集立憲會議來解決，其意在讓資產階級政府獲得時間鞏固自己的地位，再來召集一個牠所需要的立憲會議以供其驅使，如不合意時，則以對待佛蘭克府國民會議的手段去驅散牠！孟什維克這一路綫與我們的獨秀現時所堅持的路綫有什麼同點和異點呢？其同點是：反對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更堅決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之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當時的孟什維克認此為不斷革命論者的主張，而現今的獨秀則認此為階段論者的主張，這是他們間同點中之異點！)主張一切政權只有等待國民會議去解決。其異點是：孟什維克主張由資產階級政府和平和合法地召集國民會議，而我們的獨秀則要激烈些，主張號召民眾暴動來召集牠。但試問：如果當革命高潮中群眾已經團結在蘇維

埃周圍，願為蘇維埃口號奪取政權而暴動，獨秀則同季諾維埃夫一樣，起來堅決反對，主張「只有」號召民衆為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致放過時機，此其為幫助資產階級政府獲得時間鞏固自己地位，有可能利用立憲會議來欺騙群衆，破壞革命，在這點上，獨秀之與那時的孟什維克有什麼不同？由此可以看出，無論那時的孟什維克也好，現在的獨秀也好，在根本立場上，其輕視蘇維埃，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迷信國民會議，是完全一致的。我真不知道究竟誰是「披左派反對派大衣的孟什維克」！

（六）歷史上既未曾有過民衆為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的事實如彼，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又如此，然則獨秀主觀上的根據（客觀上的根據是孟什維克的）究竟是什麼呢？他重三覆四地所引用的只是托同志底下幾句話：「國民會議須由民衆暴動來實現，中國的黨能在國民會議之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原文是否全如此待查）。我們並不排斥這段話在理論上有某種假定的根據，即在某種條件下，假如民衆已積極起來要求召集國民會議，而當時資產階級的政府又故意遷延召集，此種雙方相持的情形達到相當緊張的程度時，民衆有可能為召集國民會議而舉行暴動。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在那樣的情形下，何以不成立蘇維埃呢？如果已然有蘇維埃的存在，那時蘇維埃的作用又是什麼？假如我們在革命浪潮到來時即及時組織了蘇維埃，據歷史的經驗，蘇維埃的勢力必然隨着革命浪潮的前進而發展（假如沒有機會主義者從中阻礙），必然逐漸成為團結革命群衆的磁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將蘇維埃口號降低至國民會議口號的附屬口號，還是以國民會議的口號為蘇維埃（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輔助口號呢？由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看來，顯然是後一答案。中國如果沒有什麼特殊國情，沒有強有力的機會主義（像獨秀現在的主張）在革命到

來時阻止蘇維埃之成立和發展，我們十分相信，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總趨勢將類似俄國的。所以同一托同志不懈地指示我們：當革命局勢到來時，必須組織蘇維埃。他在「六大」後論國民會議一文中末了並鄭重地聲明：國民會議口號以之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比，只是輔助的口號。因此他特為我們準備奪取政權訂定四個條件，意在於預先防止由國民會議運動中可能產生的機會主義的危險。即在武漢時代，托同志那時對中國的策略，除了力爭共產黨立刻退出國民黨獨立外，所特別着重的亦是立刻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準備為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工具。托同志從來沒有像獨秀同志這樣說過，「主張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的人是階段論者」，因為這種說法是根本違背十月革命的經驗，這正是孟什維克的見解。但獨秀同志何以竟走得如此之遠！當然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獨秀同志之對於反對派路線是從右邊來接受的。就是他最初只贊成國民會議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點恰與小陳相反（一九二九年秋獨秀給黨中央的信將國民會議與工農民主專政並列，我那時主張他應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但他拒絕了這個提議）固然在最初接近反對派路線從右邊或左邊去了解和接受，還不能說是根本的壞處，只要後來能改變，所不幸者，直到今天獨秀同志還保存原來這種傾向。只贊成在國民會議之下舉行暴動而堅決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之下暴動奪取政權——這不過是他原來傾向之一種較尖銳的表現而已。

也許獨秀同志還要申辯說托同志不是明明說「國民會議須由民衆武裝暴動來實現牠」嗎？我以為托同志這句話的真意，只是預先防止那種和平議會主義的傾向，告訴反對派應為最民主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並指出最民主的國民會議須由武裝暴動才能實現。但這種意見無論如何絕非主張在革命高潮時以國民會議去代替蘇

維埃，或將國民會議口號提高到蘇維埃口號之上，更非以「號召民衆爲召集國民會議暴動」去反對「號召民衆在蘇維埃口號之下暴動奪取政權」的主張。因爲如果是這樣，像獨秀同志所了解的，則就完全與托同志整個的不斷革命路綫和他在十月革命中的實際行動完全相反了！托同志曾教訓過拉狄克那些不肖門徒們，教他們不要只是抓住列寧某些文句或在某時期爲某一問題而發表含有特定意義的意見，那些文句或意見如果分割起來看和運用，難免與他別的文句或意見不發生矛盾。因此，他說：「把握列寧不應教條地，而應歷史地去把握他。」我以爲我們對於托同志也應如此。如果只抓住托同志某幾句話就自己的偏見以解釋他給我們整個的路綫，那是很容易走到反不斷革命論的歧途的。從小陳仁靜到獨秀對國民會議之如此誤解，其根源就在這裏。

（七）獨秀同志責備我說：「…如果照述之所指出的聯繫（指國民會議運動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聯繫），只反對軍事專政，而不鼓動民衆以武裝暴動來爲解決民主任務而召集國民會議，這樣推動一萬年也不能推動他們走上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看起來，述之把托同志給我們之「革命的民主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即是把國民會議口號只限於反動時代反軍事獨裁的東西…」這裏我的答覆是：第一、我並非將國民會議看爲「只反對軍事專政」的東西，我可以引一段話來作證：「國民會議口號在反動時期是民主運動之總的鼓動的政治口號，牠與國家獨立統一和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口號緊相聯繫着，不斷地鼓動一切下層群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反抗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反抗一切軍閥貪官污吏等之專權壓榨，使群衆由參加一般的政治活動而走向革命的鬥爭」（述之覆伯莊的信，着重點新加）

種意見不正確，應從這段話中加以分析，指出不正確的所在。第二，我並沒有「將國民會議口號只限於反動時代反軍事獨裁」，也有底下的話爲證：「在革命時期，牠（國民會議）將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口號，一方面逼迫資產階級不斷向群眾讓步，榨取資產階級最後的一滴民主主義，直至揭穿一切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民主假面具；另一方面，牠在一切落後群眾中幫助他們在實際上放棄對民主的幻想，證明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才能給他們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賴無產階級決心起而擁護和幫助牠奪取政權。」（同上）。第三，獨秀謂我將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大概是指我說國民會議口號「在革命時期將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口號」，及我主張在蘇維埃口號下暴動奪取政權而言。這倒是我們間意見的真正分歧點。這點此地毋庸重覆，在上面已經說得很詳細。我只加一句，這種「將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的，不是我的創造，而是十月革命經過的事實，我們讓獨秀去詛咒十月革命歷史的錯誤吧！

×

×

×

總結起來說，在國民會議問題上，我們與獨秀同志間意見的分歧焦點是：一、獨秀將國民會議與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完全混同，認爲同是無產階級須絕對「解決」的任務，我們則認爲後者是絕對需要解決的任務，而前者，即國民會議之召集，只是「或然的」。二、獨秀從無產階級須絕對「解決」國民會議「任務」出發，故他只有爲國民會議而奮鬥，只有號召民衆爲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只有號召民衆爲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堅決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之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而我們則認爲革命潮流到來時必須組織蘇維埃，蘇維埃機關應與資產階級政府的執行機關對抗，牠應在民主任務（民族獨立統一與土地歸農民）的基礎上

「團結正在興起的民衆於自己周圍，以奪取政權爲直接目標」，換言之，即在蘇維埃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口號）之下號召民衆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國民會議那時只是「輔助的口號」藉牠鼓動群衆擁護蘇維埃，參加蘇維埃所指揮的暴動，告訴群衆，只有蘇維埃暴動勝利之後，才有召集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可能——這是兩條不可調和的路綫！這兩條路綫在反革命時代大半還只限於思想上的鬥爭，到革命高潮到來時則將成爲最後的決死戰，第三次革命的命運將全繫於此！故我要求每個共產主義者對這兩條路綫應加以慎重的考慮，堅決的選擇！

民衆政權問題

（八）關於民衆政權問題，我在覆伯莊同志的信中已有詳細的批評，此地僅說明幾點事實及此口號提出後在反對派內部所發生的政治影響。第一、現在獨秀重覆地聲明：「關於民衆政權口號，我提出來是有時間性的」，是在「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漲時提出的」，是「臨時鼓動的口號」等等。實際上，直到上海「一二八」事變完結之後，即在「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漲」已經過去很久以後，直到前年九月時，他還堅持此口號，致在反對派內部引起無數的爭論和糾紛——這證明獨秀提出此口號的原來用意與現在經過反對的解釋是不能一致的。第二、獨秀後來解釋民衆政權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意思。但他在「抗日的康莊大道」上說：「民衆政權將經過抗日救國會或國民會議而實現。」大家知道「抗日救國會」是什麼東西，「經過」這樣的機關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民衆政權」嗎？經過國民會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民衆政權，更是滑稽的錯誤。因爲真正的國民會議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才能實現，而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召集的國民會議一定

是資產階級佔優勢，像此種國民會議怎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民衆政權」？老實說來，獨秀所謂的「民衆政權」就是現時福建的「人民政府」一類的貨色。第三，獨秀謂我「由反對這一口號，走到根本反對在宣傳鼓動上涉及政權問題，主張只提出國民會議，不說政權」。好像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同時又兼議會主義的人。其實我反對此口號的意見十分明顯：在沒有革命局勢時，我們應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因此反對以「民衆政權」來代替牠。在政權問題的鼓動上，我認爲那時的客觀局勢還談不到。在「九一八」後一時期的抗日反國民黨的潮流中，認爲可以直接提出政權作鼓動的口號，那即是準備奪取政權。但這種主張顯然是斯大林的盲動主義（現在我還可以附帶聲明：「一二八」事變中我們提出的蘇維埃口號是不正確的，冒險性的）。依上敘同樣理由，自然只主張提出國民會議，而反對以政權作鼓動的口號了。第四、獨秀又說我根本反對提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問題也並非這樣簡單。我在「九一八」以後幾乎每篇論文的結論都歸結到：「民衆要真正反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首先摧毀賣國投降的國民黨政府」，這是有許多文件爲憑的。但我當時亦反對將「打倒國民黨政府」與「建立民衆政權」聯系起來成爲實際鼓動的口號。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末曾提出「打倒臨時政府」，「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以試探群衆的情緒。但他在一次示威運動中經過一番觀察之後，他覺得情形尙未成熟，立刻將「打倒臨時政府」作爲鼓動這一口號收回來了。我在當時反對將打倒國民黨政府同建立民衆政權一同提出來作爲鼓動口號，正是根據以上的理由。第五、當我主張將來革命局勢到來時，「我們儘可以用『工農兵政府』或『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一類的口號作爲政權鼓動的口號」。而獨秀却輕率地批評說「後一口號，在還沒

有蘇維埃或蘇維埃還是有反動傾向的小資產階級代表佔多數時，當然要不得（好武斷——述之）；前一口號，（工農兵政府）和民衆政權有什麼不同呢？而且牠明顯地表示階級性，豈不更容易被人看做和斯大林派的『工農民主專政』一樣嗎？」「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在沒有蘇維埃時不能提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革命局勢到來時爲什麼不組織蘇維埃。「蘇維埃還是有反動傾向的小資產階級代表佔多數時」，不能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就是大錯而特錯了，這是純粹教派的觀點！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從二月到七月（甚至更後些）的長時期中，在蘇維埃內「還是有反動傾向的小資產階級代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述之）佔多數，然而布爾什維克並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實際上從四月起即提出這一口號了，難道這也是「當然要不得」的嗎？！僅僅在七月事變之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公開表示站在資產階級政府方面壓迫工人群眾，封閉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和報紙，逮捕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等，列寧才主張撤回「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獨秀不注意這些史實經驗，竟脫口而出「當然要不得」，未知究竟何所根據？！至於說「工農兵政府」與「工農民主專政」一樣「明明表現階級性」，獨秀同志在這裏又是一個大大的「疏忽」！他忽略了「工農民主專政」中間的「民主」一字——這是資產階級性的表現——如果沒有「民主」一字，而單獨稱「工農專政」，我們就不能說牠一定是資產階級性的，至多只能說「階級性有點模糊」而已。實際上，十月後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時被稱爲「工農政府」或「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文件中所常見的。

（九）現在我應該指出，獨秀同志兩年來堅持和宣傳「民衆

政權」的主張，在反對派內部已發生了深厚的影响，從前我們還不十分覺得，現在在福建事變中暴露出來了！一向擁護「民衆政權」的老劉（伯垂）不辭而去福建實行「民衆政府」去了！堅持「民衆政權」口號最力的仁靜則主張對福建的「人民政府」一般地也不要批評了！整個的滬市委則提議怎樣派人去參加「人民政府」！臨委則主張不批評「人民政府」的政綱：而負主要責任的伯莊雖較爲穩健，但因爲自己擁護民衆政權的口號所束縛，弄得沒有辦法，只好以「民衆政權去對抗民衆政權」，這就等於以「王麻子去反對王麻子」！！……這還不是「民衆政權」口號的擁護者在政治上的破產嗎？！這還不是獨秀同志兩年來堅持和宣傳民衆政權口號的真實收穫嗎？！！獨秀同志見到此種情形也深深感覺不安，於是想出了一個脫身妙計，說這是我主張打倒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錯誤主張的結果。奈何事實是勝於雄辯啊！伯垂和仁靜根本就沒有看過我的論文，臨委和伯莊是根本反對我的見解的，這有伯莊的信爲證。我的主張怎麼可以影响根本反對我的意見的人們呢？！我想獨秀這種嫁罪避責的手術，在政治上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坦白的！

現在我應當堅決地說，「民衆政權」或「人民政府」的口號，反對派應該毫不顧惜地把它埋葬了，因爲我們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同現在的陳銘樞及將來的無數陳銘樞去打官司，說「民衆政權」口號是我們獨秀同志發明的專利品，不許他們假冒的。我們還是老實些罷，在沒有革命局面時，老老實實宣傳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到革命局面到來時，再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類的口號去翻譯無產階級專政作爲鼓動的口號。從全部十月革命的經驗看來，這種老實態度大致是不差的。

對國際局勢的估計

——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問題

(十) 獨秀同志對於國際局勢的估計（見致臨委的信）除了說明「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這三年中，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以外，德國法西斯取得政權給國際局勢所起的變化，滿洲問題所引起的危機，在他看來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他估計國際局勢所指給我們唯一的結論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綫解體了，並且沒有進攻蘇聯的可能和必要了！爲什麼呢？他答覆說「帝國主義迫切的武裝進攻蘇聯是因爲受到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之威脅，在斯大林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由這一理論之無條件的和平政策統治下之蘇聯，帝國主義並不甚感到這一威脅了。」原來如此！托同志推動世界革命的政策足以招致帝國主義迫切進攻蘇聯之武裝進攻，即足以危害蘇聯，而斯大林「無條件的和平政策」能使帝國主義無進攻蘇聯之必要與可能，即足以保衛蘇聯——這樣一來，托洛茨基是應該被驅逐的了！！對於這問題，我實在說的太多（見論國際局勢與覆伯莊的信），此地沒有重覆的必要。這兒我只答覆獨秀給我的一個問題。他說，「托同志反覆說明帝國主義自始就沒有聯合進攻蘇聯之可能」，「沒有必要」更不用說了。因此，他說我是「假托」和「誤解」托同志的文件，責令我指出證據來。現在我且遵命摘出托同志說到關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的幾段文字如下：

「德國法西斯勝利以後，反蘇聯戰爭是必要的」。

「希特勒如果勝利的時候，將是世界資產階級的超蘭格爾」。

「爲使進攻（指蘇聯——引者）成爲可能，需要高度工業化，而且是歐洲大陸的大國的國家，牠要，而且能擔負在自己身上反蘇聯神聖戰爭的主要重量。更精確些說，一個沒有東

西可以失去的國家，試一望歐洲的地圖，將使我們相信，只有法西斯特的德國能擔負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特沒有別的路可走。在付了無數生命代價取得了政權之後，在一切國內問題暴露牠的破產以後，在對於德國，因此亦對半附屬國那樣的波蘭投降以後，法西斯特政府將必然被迫而找一種脫離破產和脫離國際形式中的諸矛盾之孤注一擲。反蘇維埃的戰爭，將由這些情形中如定命的、必然一般的生長出來」。

「希特勒的政府與蘇維埃政府之間的戰爭是必然的，在形式上無論誰發動這一戰爭」（以上所引均見「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一書）。

像這樣的話還可引出許多，但這至少已夠證明我們不是「假托」和「誤解」托同志的文件吧！由此更可證明托同志對於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之說明不算含糊吧！未知能否「壓倒」獨秀同志？在我認為托同志的估計，直至此刻大體上還保持牠原來的正確性。獨秀如果認為錯誤，那只好讓他直接同托同志去打官司。但這裏我無論如何有權利將獨秀送給我的「是讀書馬虎，還是有意欺騙同志呢？二者必居其一」的一段責言，「完璧歸趙」了！

最後還須重覆一句，左派反對派如果真依照獨秀對蘇聯的估計去宣傳，其唯一的結果將是教蘇聯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到事變迫近時慌張失措！

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及策略問題

(十一) 獨秀同志對於國內局勢之估計，同對國際局勢一樣。在國際局勢上，他既只看到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綫之解體，在國內則只有國民黨政府允許的一九三四年三月召集的「國民大會」。此外，什麼也沒有提到，至少在他看來不值得注意。他由此種「估計」所得出之策略上的結論是：「我們的力量應集中於後年三月國民大會的鬥爭」，爲了適應這一年半以後的鬥爭起見，他提議：「那時在上海召集一活動份子會議，決定關於參加國民會議運動（一年半以後的——述之）的政綱」。並提議在此政綱中……應加上一項：「反對國民黨起草的憲法草案」（最好還加一項：請獨秀起草憲法草案，以便與孫科的對抗）。爲了以上所指爭憲法的鬥爭，他更主張改國民會議爲「國民立憲大會」。這就是獨秀同志「只有爲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之實際的具體的表現，這就是他給反對派今後二三年內的鬥爭路綫！！但我們要問：現在日帝國主義已經佔據了東北四省，並且還在準備新的進攻，對此有關民族最危險的問題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呢？難道主張將這問題推到一年半以後國民黨政府所允許召集的國民大會上去解決嗎？！現在湘鄂贛及四川等省幾千萬農民正在拿起武裝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死活的鬥爭，我們對此又怎樣告訴民衆呢？難道也主張將此問題交給一年半以後的「國民大會」去解決嗎？！軍閥不斷地混戰，南京政府不斷地賣國殃民，蒙古、西藏及新疆等民族問題不斷地糾紛！！所有這些重大的問題，難道統統都推到一年半以後「國民大會」裏去嗎？！爲什麼我們現在不立刻號召民衆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擁護農民戰爭反對賣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爲什麼不號召民衆起來要求立刻召

集普選的國民會議，以解決上敘的這些有關全民族及全體民衆最迫切的問題呢？一切現實的重大問題都不顧，只注意於一年半以後，國民黨所允許召集的國民大會（是否召集，還是大問題），並照國民黨這個「預約」來「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鬥爭」，特別集中於憲法問題——這究竟是一種什麼路綫啊！我真不知道，獨秀同志想將反對派引導到那裏去！據我看來，他的「革命的國民會議，已經轉變成爲和平的憲法夢」了！

對石凡同志《不斷革命論？還是階段論？》 的答覆與批評*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L (石凡) 同志批評我『對於不斷革命論見解錯誤』之獨一的論據，就是他抓住我『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一句話中的『轉變』一詞，由此發了一大篇議論。斥『轉變』這一個詞所表現的是『階段論』的觀點。真不幸得很！如果我早聲明這一句話是完全抄自托同志的，也許免掉L發這一大篇議論了！上面那一句話的原文是『NEPEOCAC AM GEUOPPAMU - RE CRML REBOLIOYUN R COYUAUNCMUREEKAN』(《不斷革命論》一三頁)。「NEPEXOG」一字可以譯為『過渡』，但譯為『轉變』似乎更恰當些。然則托同志用這個字來表示兩個革命(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發展銜接的關係，果用錯了嗎？是果真如L所說的是『階段論』的觀點嗎？不但沒有錯，而且在這裏，在這一字句上更表現了確切的歷史轉變的辯証法的意義，即由量變質的意義。L站在機械論或『有機論』的觀點上，怎樣能了解這個字所表示的辯証的意義呢！

L說：『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之可能而且應該在民族民主任務的基礎上比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正是民主革命能夠直接生長(圈點是原文有的)為社會主義革命之具體表現』

(原稿一頁)，這段話如果正確的了解，是不會大錯的，但以L之反對『轉變』的意見看來，從似乎企圖以『直接生長』來與『轉變』對抗看來，這就不僅錯誤，而且危險了！由底下『這其間，絕無甚麼階段之可言，而且有機地綜合和統一的(圈點是

* 出處見前文。

我加的——著者——原稿一頁)這幾句話中的『有機地』顯然與他前面的『直接生長』是相關聯的。這樣，依L的意見，革命只是『有機地直接生長』。難道兩個革命中間真沒有量變質的特殊現象，即大破裂的關鍵嗎？在這裏L完全忘記了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經過一個量變質的大爆裂，才能走上社會主義。這『大爆裂』就是無產階級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這就是托同志所謂的『轉變』，我所說的『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中之轉變的中心關鍵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其意亦即指此。而L公然反對這種見解，顯然證明他是站在反對無產階級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進化主義的觀點上（雖然是不自覺的），『有機地直接生長』，就是無可否認的證據。這裏令我們想起斯大林曾用『生長』（因列寧曾用過此字以說明兩個革命間的關係）一字以反對不斷革命論，並形成他由『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之有機生長』，即由民主革命至無產階級專政不經過暴動的有機生長的社會進化論。但托同志在論西班牙革命的一篇文章中曾痛斥過這一理論，並在去年四月公佈的左反國際綱領草案上為這一理論特訂了一條：指明：『由民主革命到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經過暴動』（大意如此）。不幸，我們的L現在又抄襲斯大林的『有機生長論』來反對我們的不斷革命論了！

L說『既然是轉變（而不是直接生長），那麼必須先有一個特定時期專門幹民主革命，然後才能轉變到別的特定的階段來幹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不是這樣，必然不合於轉變的規律』（原稿二頁）。這段話充份暴露了L了解問題的可怕的機械觀！特殊的形式邏輯頭腦！在L看來，一切歷史不是沒有大爆裂的有機生長，就是兩個截然不相關連的極端階段！可惜歷史總是違反L這一類人的形式邏輯頭腦，既不是兩個截然不相關連的階段，又不

秀幾個文件的批評和答覆』中已說得頗為詳盡，我請L去參考那篇東西。我是完全根據不斷革命論，尤其是十月革命之『不斷革命』的活經驗來解釋國民會議這一問題的。故我在這裏只指出幾點：

第一，L說：『革命的國民會議口號，不僅是目前反動時期的，而且是將來革命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這完全是他腦子裏的空想，是違反十月革命的活經驗的。二月革命後，托同志即提出『工人政府萬歲』為總的政治口號。四月後列寧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作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總的政治口號。那時的立憲會議只是一個輔助的口號，這種既成的歷史事實，無論L如何神通，也是無法改變的。故後來列寧論立憲會議問題時說：有立憲會議的共和國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共和國要好些，但蘇維埃的共和國比立憲會議的共和國更要好。他並且斥那些企圖以『一切政權歸立憲會議』口號去對抗或代替『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為無產階級的叛徒。L說國民會議口號『是在革命時期群眾舉行武裝暴動的直接目標』，那就是說『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但革命時期的蘇維埃口號到那裏去了呢？L這種傾向顯然是準備在革命時期中以國民會議代替蘇維埃口號。這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傾向。十月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才是那時『群眾舉行暴動的直接目標』！L討論這種重大的政治問題時既不根據理論，又不根據經驗，未免太武斷而空想了！

第二，我說國民會議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是科學的解釋，是共產主義者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真實了解，並以此向先進的工人份子不斷解釋。只有具有了這種了解後，我們才不致陷入議會主義或小資產階級民主幻想的泥坑中，才能隨時準備領導無產階級走向奪取政權的道路，不致中途叛變無產階級。托同志重三復四

地說，民主任務在落後國家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從來沒有說過，國民會議本身可以解決民主任務問題。如果國民會議真能解決問題，又何必要無產階級專政呢？而且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會發生了，因如果說國民會議真能夠解決民主任務，就等於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機關可以解決民主任務了！所以二月革命後，列托都堅決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蘇維埃機關為奪取政權的工具。斥那些企圖等待『工農民主專政』或『立憲會議』來解決民主任務的人為叛徒！何以我們的L對這些極端重要的歷史經驗視若無睹呢！

至於在一般群眾中的鼓動宣傳上，我們當然不能說國民會議不能解決問題，而且要號召他們為『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普選國民會議奮鬥』。我們主觀上却明白知道極端的民主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但小資產階級本身既有此種幻想，我們便不能單靠宣傳去說服他們，只有讓他們自己從事變中去經驗，放棄幻想，然後轉到堅決的革命行動方面去，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托同志說，民主幻想，在某一時期是一種動力，就是這個意思。假如群眾沒有幻想，一來就相信無產階級專政，而願堅決參加革命行動，那我們就用不着國民會議口號了。所以國民會議口號的作用，是在於推動一般民衆從反革命時期走向革命時期，走向真正解決問題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靠它本身來解決問題，這是十分明顯的。也許L還要堅持說，我們自己既認國民會議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同時又號召群眾為解決問題的國民會議奮鬥，這不僅自相矛盾，而且是有意欺騙群眾。但這不是『矛盾』，而是辯證法的活用。也不是欺騙群眾，是群眾自己原來有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幻想，我們不過利用這種幻想使他們活動起來，鬥爭起來，最後則領導他們離開幻想，脫離自欺，走向真正解放的道路——無

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是了解群眾認識的真實程度，因利而導之前進，而不是將自己降低至群眾意識的水平。L的老實態度，就是將自己降低到同群眾的原始意識的同等程度上去了。

總之，L對國民會議的見解與獨秀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同L間在這一問題上是很難得調和的，但我總是希望L放棄自己的錯誤見解站到我們這方面來！

評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

——再論十月革命的經驗

(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七日)

獨秀在論《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中，除了重複以前的錯誤與空洞外，更加上了許多新的錯誤，因此我還是不能緘默，不能不再給以批評，雖然也許更引起對方的不高興或動火。但爲了擁護正確的政治路線，爲忠實於真理和革命，我們便不能有所顧忌。

爲着集中我們間爭論的焦點，確定我們討論問題的範圍，不致被其他不相干的意見或謠言所混亂，我必須首先聲明幾點：第一、在反動時期對於國民會議問題，我們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同意見，因爲我們都承認國民會議是這一時期總的政治口號。至於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問題，即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總口號的直接關係問題，在反動時期根本談不上，因爲我們之間沒有誰主張在這時期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的。故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我們所爭論的當然是指在第三次革命時期中之實際的基本戰略問題。第二，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戰略，獨秀認爲『國民會議』還是『總的政治口號』，『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反之就是認『蘇維埃』或『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不是革命時期中總的政治口號，故他斥主張在此種口號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的人爲『階段論者』。而我們則認爲在革命局勢到來時，『國民會議』將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口號』，根據十月革命的經驗看來，我們應當於真正的革命初起時，及時組織蘇維埃，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類的口號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 出處見前文。

出來的資本家地主政府』（托話）。立憲會議成爲實際的要求，乃是資本家地主的『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此時應當召集立憲會議已不成問題。問題在於『誰和怎樣召集它』。臨時政府正企圖『召集立憲會議爲擁護君主制反對共和國的鬥爭』，『甚至後補皇帝米海伊。亞列克山特洛維奇也明白，欲登皇位不經過「普通、平等、直接、秘密的投票」是不可能的』（托氏文集卷三第一篇一二一一一三頁）。故此時托同志便說：『立憲會議的決定，大都繫於誰和怎樣召集它。因此，現時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立刻以自己的革命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去與臨時政府的執行機關對抗。無產階級在這一鬥爭中團結正在興起的民衆於自己周圍，應以奪取政權爲直接目標。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決心和能力於立憲會議的準備時期在國內施行激烈的民主清除，從上至下地改組軍隊，將它變成革命的民軍，事實上向農民的下層證明，幫助他們只有維持革命的工人政制。在這樣的準備基礎上召集的立憲會議才會成爲真正反映國內革命的創造的努力，其本身成爲革命往前發展的有力工具』（同上，一三頁，引文重點係我所加，以下仿此一一著者）。托同志這些話我在別一文中曾解釋過。異常之明顯，那時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故鬥爭的中心目標已不是召集立憲會議，而是奪取政權。在甚麼總的政治口號之下去鼓動羣衆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呢？那時托同志所提出的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萬歲！』（同上，一六頁）。第二天（按上面的話是俄國歷三月六和七日在紐約俄文報《新世界上》發表的）托同志更進一步將這一意見加以解釋說：『不要等待立憲會議，從各方面掃除專制主義的和農奴的殘屑。須教訓農民不要相信羅荅苛的約束和米留哥夫的愛國主義的謊言。須結合千百萬的農民在農民戰爭和共和國的幟旗下反抗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欲完滿執行這

一工作只有依靠在無產階級身上的革命政府……只有在這樣的政府之下，在這樣的準備工作之下，立憲會議才不是地主和資本家利益的屏障，而是民衆和革命真正的機關。」（同上，一九頁）。

。列寧在《從遠方來的信》中，與托同志的意見完全一致，最中心的意見也就是指出革命的『第二階段』是無產階級應準備直接奪取政權。而對於立憲會議的問題，列寧甚至沒有提及。即他在後來十分重要的《四月大綱》中也沒有提到立憲會議問題，他所提出總的政治口號是建立『公社政府』。

我們大家都知道，布爾什維克對於十月革命的總路線是由『四月會議』決定的。在四月會議中曾經有過嚴重的鬥爭。但這一鬥爭的實際情形，即政治的各種傾向究竟是怎樣呢？後來托同志在《十月革命的教訓》裏概括地描寫道：『整個的黨的四月會議是集中於這一根本問題：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下去奪取政權，或者幫助（誰）完成民主革命……』。『列寧的立場是：不可調和地與保衛派鬥爭，爭取蘇維埃內的多數，推翻臨時政府，經過蘇維埃奪取政權，革命的和平政策，對內的社會主義改革政綱和對外的國際革命』。這裏沒有提到立憲會議，如果立憲會議是『革命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爲甚麼連提都不提呢？但這裏却明顯地提出了『蘇維埃』，並指明『奪取政權』須『經過蘇維埃』，因此須『爭取蘇維埃內的多數』，因此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托同志接着說：『我們知道，與這一立場（指列寧的——作者）相對抗的立場，是站在完成民主革命的觀點上，以壓迫臨時政府爲手段，在這裏蘇維埃停滯爲對資產階級政權的『監督』機關。由此便發生了對保衛派異樣無比的最調和的態度』（同上，二十八頁）。這裏所謂與列寧對抗的立場，是指當時右派加米也夫等的路線，即事實上的孟什維克路線。托同

志並對這一路線加以解釋說：『……在完結民主革命之下被理解爲經過立憲會議實現一批改良，布爾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中導演左派的作用。在此種實際內容的概念下「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完全被剝奪喪失了』（同上二十九頁）。然則現時獨秀的路線與當時加米也夫等的路線有何根本不同呢？獨秀主張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經過國民會議，因此主張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舉行暴動，但『在這種實際內容的概念之下「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或其他類似的口號）不是完全被剝奪了』了嗎？！不，獨秀是公開主張不要『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類口號的，因爲他認定『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口號之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的人是『階段論者』啊！

『四月會議』雖然接受了列寧的路線，決定了布爾什維克『經過蘇維埃』，即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的總戰略，但右派的路線，即沿着立憲會議的河床去完成民主任務，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的路線，還是在黨內與列寧路線明爭暗鬥，到十月暴動之前夕達到了最高峯——根本反對舉行暴動奪取政權。這點，在以後我們還要提到的。現在我們且看托同志回國後的主張如何？托同志在抵彼德堡當天（五月五日）出席彼德堡蘇維埃會議的演說上，末了他自問地說：『我們將介紹甚麼呢？』他接着說：『我想，我們在下一步驟中的是轉給一切政權於工兵代表之手。只有單一的政權才能挽救俄國』（同上，第四六頁）。他在另一演說（五月七日）中又說：『我們自己規定明瞭的確定的任務——轉移全部完整的政權於蘇維埃之手。這一問題對於我們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長的過程，並且與事變開展的程度相關聯。但我們不能說避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爲它是一切革命民主統治的代表形式。我們只應在

蘇維埃內造成自己的多數，在其工作上執行真正革命的內容，組織廣大的民衆於我們口號的周圍』（同上四七頁）。由上面的話可以看出托同志回國後完全與列寧的路線一致，全幅眼光却注視於奪取政權問題，注視於『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注視於在蘇維埃的『造成自己的多數』之上。雖然當時蘇維埃還是爲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妥協派機會主義者所把持，但列寧和托同志並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像現在獨秀所堅持的。他們只注意於在蘇維埃內造成自己的多數。托同志並且說：『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乃是革命全部過程和革命深入之自然的集中點……當認定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是民衆革命政權之唯一可能的唯一實際的形式』（同上四八—四九頁）。因此他主張以一切必需的手段去改變蘇維埃的政策和改造蘇維埃內部的組織，驅逐機會主義的保衛派，使蘇維埃轉向堅決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才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獨秀那種教派的抵制主義的恰合乎妥協派要求的觀點。

在五月末托同志論『中心任務』一文中說：『食物供給的破壞，「無政府」，農民問題，消除戰爭——所有這些問題，現在對於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都被引向一個中心任務：奪取政權。應向工人群眾說明轉移政權於革命群眾機關（蘇維埃——著者）之不可免與必要，在這一趨勢上去影響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組織和政策——這便是我們報紙現時的中心任務』（同上五九頁）。托同志在這裏已很明顯地將『土地』與『和平』問題歸納於奪取政權，即『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之下了。總之，自二月革命後直到七月三、四日的事變，列托都一致主張黨的中心任務是準備直接奪取政權，而奪取政權必須經過蘇維埃，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爲奪取政權的總的政治口號，真正立憲會議之能否召集

須視一切政權能否歸蘇維埃爲定。故立憲會議在那時僅僅是一個輔助的口號。七月事變的政局反動使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一時受了挫折。因爲蘇維埃的上層領導者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成了七月事變的組織者，要強迫兵士上前線和壓迫布爾什維克，故列寧和托同志都主張撤回『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在八月哥爾尼洛夫事變中，蘇維埃下的群眾壓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向左轉，他們並自動組織革命委員會，拿起武裝反抗資產階級的陰謀暴動，終於壓平了哥爾尼洛夫的變亂。因此布爾什維克又重新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九月間一個短時期內列寧甚至主張用和平方法將一切政權轉移於蘇維埃。

在九月下半月和十月上旬這一時期，即所謂『民主協商與預備國會』運動的時期是黨內爭鬥最烈的時期。那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看到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內勢力膨脹（彼時布爾什維克在彼德堡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已取得多數），企圖以『預備國會』爲橋樑將蘇維埃引向立憲會議的道路，無形取消『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即打消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企圖，而布爾塞維克的右派加米也夫等則迎合此種傾向在黨內鬥爭，堅決主張參加民主協商和預備國會。列寧和托同志嚴厲地反對此種傾向。列寧那時寫道：『我們方面對於民主協商，即對於國會的態度是一最嚴重的錯誤，是一最嚴重的民主白痴病，因爲即令它（指民主協商會議——著者）宣佈自己爲國會和革命的統治國會，亦一樣不能解決甚麼（相信立憲會議真能夠解決問題者請聽！——著者）。問題的解決是在它之外，在彼德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域中』（同上頁數原稿看不清待查）。托同志在『布爾什維克黨團對民主協商會議的宣言』中更是明白地指出：凡土地問題，工人監督生產問題，和平問題，保證國內民族自決問題等，只有『一切政權

歸蘇維埃』實現以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同上托文集三九三—三九八頁)。這是將一切民主任務口號聯繫於『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總的政治口號下去更明顯地鼓動的表示。托氏十月九號在彼德堡蘇維埃會議上論預備國會時說：『我們退出預備國會，爲的表示，只有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才能舉起和平的口號(因此時一般民衆，尤其兵士需要最迫切的是和平——著者)並經過帝國主義的頭將這口號拋送到其他國家的民主主義者。』所以托同志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波拿巴特主義者！打倒虛偽的預備國會！爲轉移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而與篡奪者鬥爭萬歲！』(同上三二五—一三二七頁)。托同志在上敘的同一會議上作結論時更聲明：『當政權轉移於蘇維埃的觀念在軍隊中找到絕對的開展時，蘇維埃政權應表示：立刻的和平，救濟食物恐慌，保證立憲會議……』(同上三二五頁)。他又向彼德堡的工兵蘇維埃發出警告號說：『挽救彼德堡和國家，在於轉移政權於蘇維埃之手』。他主張彼德堡蘇維埃政權應向全體民衆建議立刻休戰，並在締結條約前自己掌握作戰的軍隊以資保證，以保衛彼德堡和國家。同時彼德堡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應號召彼德堡的城防軍採取一切手段以擴展和鞏固自己的戰鬥準備』(同上三四七頁)。這一段話是武裝暴動兩星期前寫的，且是爲彼德堡的蘇維埃而寫的，顯然含有動員的性質。這正是實現托同志三月初所提出的『蘇維埃……團結正在興起的民衆於自己周圍，應以奪取政權爲直接目標』，和列寧在『四月會議』所指出的『爭取蘇維埃內的多數，經過蘇維埃奪取政權』的路線。換言之，即是以武裝暴動實現『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那時企圖破壞這一路線的不但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黨內的右派加米也夫和季洛維也夫等也拼命地公開反對武裝暴動，主張應遵照完成民主革命的路線，一切問題應靜待立憲會議去解

決等（見季等當時給黨中央論時局的信）。幸而在列托的領導之下，黨不顧這些機會主義者先生們的反對，終於成就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但現在的獨秀以其特有的機會主義傾向，還企圖否認這一既成的歷史事實，不免太令人惋惜！

我們且聽獨秀說吧：『在十月前，列寧曾主張取消「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武裝暴動前一月，黨的中央委員會在蘇卡洛夫家開會時，列寧還大罵把暴動計劃與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聯結在一起的人們，堅決主張使暴動獨立於大會！』依獨秀的話看來，彷彿列寧在十月前是一般地反對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下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似的，而且彷彿證據很確實似的。這倒值得我們費點時間來『證實』一下。我在上面已說過，列寧在七月事變後曾提出過撤回『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哥爾尼洛夫事變平定後（八月尾），列寧又重復提出這一口號了。獨秀在這裏籠統地宣言『在十月前列寧曾主張取消「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種說法，究竟是昧於歷史事實，還是有意騙人，令人頗費猜疑！至列寧反對將『暴動計劃與蘇維埃第二次大會聯結在一起』，這當然是事實。列寧在九月二十九日曾寫道：『在我們的中央和黨的上層間有一等待蘇維埃大會的流派或意見，反對立刻奪取政權，反對立刻暴動。應當與這種流派或意見爭鬥』。但列寧與當時中央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歧意見，據托同志說：『……不屬於原則的範圍，而是純技術的問題，雖然有鉅大的實際的重要性』（《十月革命的教訓》九十八頁）。更不是一般反對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托同志承認列寧提出立刻武裝暴動不放過時機含有重大意義，但他同時認為將暴動與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聯結起來鼓動，在當時會有很大的作用，能使暴動在『蘇維埃合法的掩護』之下更易於進行和勝利。所以他說：

『但同時十分明顯，在準備蘇維埃第二次大會的擁護之下和在擁護它的口號之下準備和進行暴動，給了我們以不可計量的優勢。從那時起，從我們，彼德堡的蘇維埃，反抗克林斯基調三分之二的城防軍上前線的命令時起，事實上我們已經走上了武裝暴動的狀態。住在彼德堡外的列寧完全沒有估計到這一事實的意義。就我所記憶的，在他那時的一切信件中沒有一字提到這種情形。……當我們在這時反對（克氏命令）的當中便已組織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十月十六日），在一切軍事機關中已任命了自己的軍事指導員……。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和擁護將來應當解決政權命運的準備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口號之下，事實上我們這裏已經有了武裝暴動——彼德堡兵士反臨時政府之武裝的，雖然是未流血的暴動。』（同上九十九頁）。『將奪取政權適合於蘇維埃第二次大會的時機，僅僅是因為「平靜的」，差不多是「合法的」武裝暴動——至少在彼德堡——已經有四分之三，維令不是十分之九，被這一事實完成了』（同上一百頁）。關於爭蘇維埃的合法性問題，托同志還有一段極重要的話說：『在我們與妥協派之間會進行過爭取蘇維埃合法的鬥爭。在群眾的意識上蘇維埃乃是政權的源泉。克林斯基，蔡利特勒，斯柯白萊夫都是從蘇維埃中出來的。而我們亦曾以我們基本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去與蘇維埃緊相聯繫着。資產階級從國會導出自己的合法繼承權，妥協主義者從蘇維埃導出自己的合法繼承權，但以此使蘇維埃歸於消滅。我們亦從蘇維埃導出自己的合法繼承權，但以此轉給蘇維埃以政權。……』（同上101頁）。固然，像『十月革命』這樣地利用蘇維埃的合法性到底，即以武裝暴動去與蘇維埃第二大會緊相聯繫，這當然不能算是一個原則，僅僅是純粹技術上巧妙的運用，而且是絕不會常有的，不會重複的。但無

論如何這總是一個事實，這是獨秀無法否認的。獨秀企圖引列寧的話來證明『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不是十月革命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總的政治口號，不但落了空！而且反加深了他自己的錯誤和對十月史實的無知！

× × ×

上面對於十月革命經過的敘述，屬然帶些考據性，似嫌煩瑣，但爲具體明了在十月革命過程中立憲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及這兩個口號之具體的作用，這種敘述是十分需要的，尤其在許多重要文件未譯成中文時更屬必要。現在我們更有權利作出底下的結論：二月革命後，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是無產階級準備直接奪取政權，而奪取政權是『經過蘇維埃』，其奪取政權的總的政治口號，托氏所謂『我們的基本口號』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立憲會議口號在那時只是輔助性質的口號。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宣傳上鼓動上都是將立憲會議口號與土地同和平等民主口號聯結於『一切政治歸蘇維埃』的中心口號之周圍，在各方號召和鼓動民衆走上武裝暴動以實現『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一總口號——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托同志所謂『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以之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較，只是輔助口號』，在這裏得到了具體事實的說明。在十月革命中以立憲會議爲中心口號，並以之與『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對抗的，是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布爾塞克黨內的右派（半孟塞維克）加米也夫季諾維也夫等那班民主白痴，立憲會議狂。

布爾塞維克在反動時期以立憲會議爲總的政治口號，在革命時期則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爲總的政治口號，在極端形式邏輯頭腦的先生所看來似乎犯了『階段論』的『錯誤』。其實這樣才是真正不斷革命論的表現。無產階級應當在民主任務（十月革

命中主要是農民問題)上奪取政權，但奪取政權的總的政治口號却不是立憲會議的民主口號，而是帶社會主義性的蘇維埃口號。這是革命動力之具體表現，並且是由革命運動中自然產生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列寧托洛茨基有時稱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那班孟塞維克和半孟塞維克的真正階段論者，依據他們的形式邏輯，方認定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只有在實現總的民主政治口號——立憲會議之下才有可能。換言之，即以實現民主的立憲會議或國民會議去完成民主任務。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以完成民主任務』，當然是違反了他們的形式邏輯。可惜十月革命的『辯證法』已無情地從根摧毀了孟塞維克這一『形式邏輯』。然而現在的獨秀還在企圖以此種形式邏輯去否認『十月』的經驗，並以此來解釋左派反對派的路線，叫我們怎能緘默不言。

× × ×

在獨秀的論文中還有許多錯誤的論據，是構成他錯誤的系統意見之報源，為釜底抽薪計，我們不能不擇一些比較重要的論據加以批判。

獨秀引托同志的話說：『俄國當前是擺着資產階級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當前任務是完成民主革命，……當前的中心政治口號是立憲會議』，因此他推斷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中的『中心政治口號』也是『國民會議』。這裏他完全沒有知道同一托同志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說了些甚麼！上面的話托同志顯然是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說的。在一九〇五年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在內）以立憲會議為中心的政治口號，其主要的理由是：蘇維埃那時才第一次發生（均發生於六、七月間），在很長的期間內還帶着原始的僅限於領導罷工的性質，其在政治上之重大的歷史

作用還沒有能立刻顯露，至少還未被人們明確地認識，當然談不上『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問題。其次，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唯一對象是代表中世紀農奴專制性的沙皇制度，資產階級還是站在沙皇反對派的地位，換言之，階級關係的分化還不十分深刻。但經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尤其經過莫斯科十二月的武裝暴動，經過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消滅了，階級的對立十分露骨了，蘇維埃在政治上的作用表現得十分明顯了，二月革命後革命的直接對象已經不是沙皇而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了。因此，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奪取政權的口號，都主張『奪取政權須經過蘇維埃』，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為『中心的』或『基本的』政治口號——這點我們在前面已詳細地證明過了。並且列寧會不變地聲明：『在二月革命後，我們雖然有了蘇維埃，但我們並未曾放棄立憲會議口號』（這是托所常引的），就這段話的語氣看來，還明白了嗎？如果立憲會議還是革命的中心政治口號，怎能說得上『放棄』兩字呢？意思顯然是說：『我們雖然有蘇維埃為基本的政治口號（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但我們還是不拋棄立憲會議口號，還是用它作為輔助的口號』，盡可能利用它的政治作用。中國早已經過了『二月革命』（辛亥革命），又經過了『一九〇五年』，階級的對立已達到頂點，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我們又有了十月革命中蘇維埃的經驗。因此，第三次革命的路線不應是『一九〇五年』而是『一九一七年』的路線。

獨秀說：『十月革命中能夠吸引廣大群眾是土地與和平』。這是不錯的。他接着說：『並沒有簡單的懸空的「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回事』。『過去沒有這回事，將來也不會有這回事』。這就有點奇怪了！但我們要問：『簡單的懸空的在國民

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過去有沒有過這回事呢？我真不懂，爲甚麼要這樣提出問題！難道有誰主張簡單的懸空的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去奪取政權嗎？實在從來，獨秀此種說法還是由於根本不懂得國民會議和蘇維埃口號與一般民主任務（民族獨立與土地問題）等口號之區別，不知前者僅係代表一種解決問題的機關或工具的口號。無論國民會議口號或蘇維埃口號，如果離開了民主的或社會主義的實際任務（如沒收土地和沒收工廠等），那只是一個空洞的毫無生氣的形式。然而過去布爾塞維克運用這些口號時，却總是以民主的任務去充實它們的內審。換言之，如果我們要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時，必須將土地問題，民族獨立問題等口號與之緊密地聯繫起來，絕不使之成爲『簡單的懸空的』。我們可以說：『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爲中心口號，聯結其他民主口號於其周圍去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在過去既有這回事，在將來也會有這回事的』。但無產階級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我們且不說簡單的懸空的），過去既沒有這回事，大概將來也很難有這回事吧！

獨秀又說：『「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乃是一個有時間性的口號；因爲這口號之第一個條件，必須蘇維埃是半政權的蘇維埃已經存在；第二個條件，必須已經存在的蘇維埃是繼續革命的，而不是帶反動傾向的中間分子佔多數……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一公式……包含了幾方面的錯誤，澈頭澈尾的錯誤！』真夠武斷！我們首先且反問一句：難道『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舉行暴動奪取政權』這一公式，才算得『包含了幾方面的正確，澈頭澈尾的正確』嗎？至於說『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或類似的口號是臨時性的，這即是說蘇維埃口號是臨時性的，這樣，難道『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下奪取政

權』才是經常性的嗎?!但我們就十月革命的經驗知道，『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除了七月事變後一短時期列寧主張撤回外，始終是堅持到底的。這點我們在前面總算證明過了。至所謂第一個條件，說甚麼『必須是半政權的蘇維埃已經存在』，這顯然是機械的規定。我們認為只要重要的城市已經有蘇維埃普遍的存在就可以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了。所謂第二個條件之第一點，『已經存在的蘇維埃必須是革命的』，這不成問題，因為我們絕不會擁護『反革命的』蘇維埃。但要『不是帶反動傾向的中間份子佔多數』，這就不盡然了，這就與布爾塞維克四月會議後的政策相反了，這點在前面我們也指斥過了。總之，獨秀在前面這段話中說『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一公式是……澈頭澈尾的錯誤，無非想從反面證明『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一公式』才算得『……澈頭澈尾的正確』!!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胆大』與『機巧』!!

獨秀爲了更進一步從根打破無產階級對於『蘇維埃』的信仰他想到了『蘇維埃拜物教』的問題。他說：『我們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所罵「蘇維埃拜物教的官僚，」我們可以說，德國社會民主黨謝德曼所領導的蘇維埃並不及法國一七九三年的國民大會』。關於『蘇維埃拜物教』的問題，獨秀已經不止一次提及過，這值得我們解釋一下。托同志第一次提到蘇維埃拜物教問題，是在他『十月革命的教訓』一小冊子中。托同志在這裏指示我們：『俄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在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運動的本身中產生的，是鬥爭達到一定水平之自然的組織形式』。但歐洲的青年黨採用蘇維埃多少看成一種『教條』，『常常對蘇維埃發生拜物教態度的危險』。譬如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中，那時工廠委員會已經成了群眾的組織，根本上執行了蘇維埃的作用，而此時德國的

黨却突然將蘇維埃口號提出，企圖以空洞的機關去代替工廠委員會領導暴動，這正是拜物教的危險，一方面要使工廠委員會喪失其原來指導群眾的政治作用，而空洞形式的蘇維埃又完全不能代替它，當然會產生失敗的後果。從這一事變中所得的教訓是：德國的黨早應於八、九月間立刻成立蘇維埃的（托同志那時有此種提議——著者），但黨的領導放過了時機；而到十月時工廠委員會事實上已執行了蘇維埃的作用，此時便不應再提出蘇維埃，應讓工廠委員會盡量發揮『蘇維埃』的機能（托同志那時正是如此主張——請參考托集卷三第一部 107 —— 108 頁）。托同志指出的第二個事實，就是十月革命中七月事發後列寧曾提出撤回『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他說：『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的蘇維埃既已成了七月事變的組織者，公開強迫兵士上前線和壓迫布爾塞維克，則工人群眾的革命運動能夠而且應當替自己找尋別的道路和運河』（同上）。這裏指示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注意於活的事實，不應拘泥於教條形式，應當知道『臨機應變』。但托同志無論在這裏及在別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說過蘇維埃是無關重要的組織形式。反之，極力說明『蘇維埃有鉅大的優點』，『是奪取政權鬥爭的組織』，『是全部改革過程和革命深入之自然的集中點』，『是民衆的革命政權之唯一可能的唯一實際的形式』。所以托同志重三復四地提示我們：『必須於革命局勢到來時及時組織蘇維埃！但獨秀却企圖利用『蘇維埃拜物教』一句話來降低和損毀蘇維埃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一般的偉大的政治意義和作用。他自己由反對『蘇維埃拜物教的官僚』不自覺地走到了另一極端——『國民會議民主的白痴』！至於說『謝德曼領導的蘇維埃並不及一七九三年法國的國民大會』，但在我們的時代，一七九三年法國的那樣國民大會是再也不會復現了，猶之

再不能有那時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雅哥賓黨一樣。法國大革命時的康文謝（國民大會），在我們時代就是蘇維埃，正如雅哥賓黨就是布爾塞維克。

當人們問獨秀：『你們要求國民會議解決民主任務，那麼，蘇維埃做甚麼呢？』他的答覆是：『我們所要求真正民主的國民會議應該有權解決民主任務；蘇維埃在未曾成為政權之前，當然不能自上而下在法律上解決民主任務。蘇維埃成為政權形式之後，解決民主任務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這已達到了問題的中心』。假如我們現在不是向群眾鼓動，而是處在共產主義者的地位自求真正了解問題的實質。那末，我們就必須知道，真正的國民會議應該有權解決問題，是一回事，它事實上能否解決問題，又是一回事。如果說『蘇維埃在未曾成為政權之前，當然不能從上而下在法律上解決民主任務』，那試問：『當無產階級未曾取得政權之前，國民會議能自上而下在法律上解決民主任務』嗎？如果說『蘇維埃成為政權形式之後，解決民主任務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那末，國民會議更談不上能解決民主任務了！『這才真正達到了問題的中心』！但我們還得指明一點：『蘇維埃在未曾成為政權之前』，它是政權形式的組織雛形，它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中心基本口號，它能成為民眾真正解決民主任務的希望之寄托所，因而成為民眾鬥爭的指標。『蘇維埃既成為政權形式之後』，它本身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再不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分離（分開來就變成了玄學）。它可以自上而下在法律上解決民主任務——這是十月革命後無可否認的事實。『在戰略上預先把國民會議和蘇維埃對立起來，視為兩個絕對衝突，而任何時不能調和的東西……』，這是獨秀用以重復地詛咒別人的。但將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對立起來的，究竟是誰

呢？我們嗎？事實具在！在反動時期，我們既根本反對組織蘇維埃，而主張國民會議是總的政治口號；在革命時期，我們主張及時組織蘇維埃，並以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類的口號爲中心政治口號，國民會議則成爲輔助的口號——這中間不但毫無對立之可言，而且是有機地緊相聯着的。但究竟誰在將這兩個口號互相對立，弄得『絕對沖突』，『任何時期不可調和』呢？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就是獨秀自己。他主張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堅決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並斥抱持此種主張的人爲『階段論者』。這還不明顯嗎？！這不僅是將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對立，簡直是以國民會議口號去代替蘇維埃口號，並由降低乃至消滅蘇維埃口號的作用了。

獨秀最後說：『如果無產階級不願意在民主鬥爭中奪取政權，這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這要算他全文中唯一正確的話。但是他從這一正確的前提所作出的推論就完全錯誤了。我們且聽他往下說吧：『如果我們反對在國民會議鬥爭中，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反蔣派必然拍掌歡迎，必然贊成我們道：你們是對的，現在既是國民會議運動時代，你們用國民會議口號幫助我們，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罷，蔣倒了政權還是我們的，你們將來在蘇維埃鬥爭中，「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吧」！』。這段話是獨秀企圖用以誣蔑我們唯一得意的論據，這值得我們破費點時間來分析一下。第一，我們所謂『民主鬥爭』，不單是『國民會議的鬥爭』，其中還包括有民族鬥爭與農民鬥爭等。譬如，在『九一八』後一時期有較激昂的民族鬥爭，却沒有國民會議鬥爭；在現時湘鄂贛川等省都有廣大的農民鬥爭，然而也沒有國民會議的鬥爭。固然，我們主觀上的策略是要將國民會議鬥爭與民族的農民的鬥爭聯繫起來，但客觀事實上往往不

能如願。第二，在反動時期，我們進行國民會議鬥爭，主要的作用是：將國民會議運動與其他民族的農民的和反軍事獨裁的鬥爭聯繫匯合起來，鼓動群眾重新由參加政治活動，走上政治鬥爭舞台，即走向革命的道路。鬥爭未達到真正革命局勢之前，我們還談不上直接奪取政權的問題。籠統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如果在反動時期也這樣說，這是比斯大林更壞的冒險主義。第三，在革命時期，如果不因受甚麼特殊情形的障礙，我們必須及時組織蘇維埃，那就能簡單說：『只有在國民會議鬥爭中，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如果那時有人（像獨秀現在一樣）這樣主張，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當然是資產階級各派最歡迎的，如賴可夫，米留可夫，克林斯基等之拍掌歡迎蔡利特勒，斯哥白萊夫乃至加米也夫一樣。第四，關於蔣倒的前途，我們會有兩種估計：一、是在日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農民戰爭的發展，其他軍閥的武裝反抗……之下，雖然民衆運動還不甚有力，蔣亦有場台之可能；二、是在城市與鄉村的猛烈群眾運動之下，由民衆直接推倒蔣政府。如果在前一種情形下實現了倒蔣，這時我們主觀上還不能有足夠力量直接奪取政權，我們還只能盡量將局勢推向真正直接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如果蔣倒是在後一種情形下，則在蔣倒之前必然已有過廣大洶湧的群眾鬥爭，必然有過相當普遍的政治罷工，示威……隨後進到武裝暴動。如果是這樣（假如不是這樣，我們便無從想像羣衆直接倒蔣的可能），那麼在政治的罷工中，我們爲甚麼不乘機組織蘇維埃呢？如果已組織了蘇維埃，那時蘇維埃的作用是甚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注意於『國民會議的鬥爭』，主張『只有在國民會議之下奪取政權』，放過組織蘇維埃的機會，或忽視蘇維埃的作用，反對『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類的口號，反對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去奪

取政權，那時反蔣各派的資產階級一定齊聲叫好歡迎道：你們真不錯，現在既是民主鬥爭時代，是國民會議運動時代，當然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鬥爭中暴動以倒蔣，同我們過去在北伐和武漢時代一樣，只有在國民黨旗幟之下北伐，反蔣，蔣倒了後我們再說。組織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是沒有必要的，主張『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人是危險的份子，因為即對於你們（獨秀們）也是『階段論』者啊！這樣一來，其後果當然是重演一回武漢時代的悲劇！！然而這正是我們現時的反對者獨秀所拚命爭取的前途！！

× × ×

總之，獨秀在論《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中，其全幅精神（即孟塞維克的精神）是在『將蘇維埃盡量用墨色去描寫，而用紅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讓我套套托氏語），虧他還責備別人『把國民會議形容得不堪』，其實他自己早已將蘇維埃說成一文不值了！托同志給我們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主要原是爲了反動時期反軍事獨裁的鬥爭，他說：『在中國怎樣也不能跳過反革命的階段，像俄國不能跳過四個國會的時期一樣』。『在羣衆發展中，跳過實際的，即客觀規定的階段之一切企圖，都是表示政治的冒險主義』（《不斷革命論》原文一二六頁）。他又批評拉狄克說：『在革命高漲時期他反對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在反革命的獨裁時期他反對在民主口號（指國民會議——著者）下動員中國的工人。這是等於夏天著皮袍，冬天打赤膊』（同上一二七頁）。在這裏，說明提出國民會議主要是爲了反動時期，總算很明顯了吧！至於在革命時期，托同志承認可以跳過『民主階段』，『在俄國無產階級曾「跳過」了民主的議會主義階段』，因爲這正是由於『歷史的不平衡發展律』。他並引列寧的話說：『難道我們錯誤了，如果我們說……在俄國的落後性與

其「跳躍」至民主主義的最高形式間的，即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跳躍至蘇維埃或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在西歐特別難於或遲鈍地了解蘇維埃的作用，這種矛盾也就是原因之一」（《列寧全集》卷十六，一六三頁）。托同志并加上了一句話說：『列寧在這裏已直截了斷地說，俄國已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飛躍」（《不斷革命論》一二七頁）。我們請主張『只有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完成或解決民主任務』的人們多注意一下列寧和托洛茨基這些意見啊！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論殖民地問題時，曾特別着重說，殖民地可以跳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說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團結農民最好的組織形式，但未曾提到國民會議的問題，托同志在中國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曾替我們力爭建立蘇維埃，也沒有提到召集國民會議的問題。此後，托氏幾乎在一切論到中國前途的重要論文中都提示我們，『第三次革命到來，必須及時組織蘇維埃』。列寧和托同志難道也是『蘇維埃拜物教的官僚』嗎？實際上，他們全是根據十月革命的經驗和傳統。將來中國第三次革命到來的具體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此時無從推測。但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沒有理由放棄十月革命的經驗傳統。最後，我們再重複聲明一句，我們并不輕視國民會議，我們是恰如其份地去了解和運用國民會議的。國民會議在反動時期是我們的總的政治口號，在革命時期還可以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口號，可以在各方面鼓動群眾幫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學思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佛教同基督教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現象之一。佛教之在東方，亦同基督教之在西方，無論在一般的歷史演變上，在社會生活上以及人類的精神上，都曾起過鉅大的作用，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一直到現在，它還或多或少地支配着或影響着我們東方千百萬人的生活和靈魂。緬甸人和暹羅人至今還視佛教為唯一的國教，其虔誠崇奉幾與中世紀歐洲人之崇信基督教無異。就是我國和日本的人民，尤其是我們的農民們，其中大多教的信仰（假如他們有信仰的話）也還沒有脫離佛教的影響。消極的精神與因果報應之說，還深深地潛伏於無數人們的血管之中。由此便證明佛教還是一種潛在的勢力，即令在現在來重新對它加以檢討，還不能算是已經失掉現實的意義了。

但我國向來研究佛教的人們，殊少站在科學的批評的觀點上，他們不是爲了專門宣揚教義，就是把佛學當作閒餘消遣的玩意兒。這樣，自然不能產生甚麼有價值的結果。近年來的『佛學家』

中更發生兩種新的傾向：一是否認佛教的宗教性（見歐陽竟無所著《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南京支那內學院刊行），一是使佛教科學化（見商務印書館出版《唯識研究》王季同「序言」），這在表面上似乎是進步的現象。但實際上，前者不過是企圖抹去佛

* 原刊於《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冬季號），發表時用「歐伯」筆名。

教中那些原有的粗野的宗教迷信（這是佛教之所以成爲佛教的所在），替它再披上一件單純的玄學外衣，後者則企圖將本質上原與科學正相矛盾的佛教施以現代科學的洗禮而已。日本與西方的佛教研究家，在方法上要比較進步些，但他們亦不能超越他們的形式邏輯所允許的範圍。就他們的方法所能產生的結果，至多亦只能提供一些較有價值的材料，却不能給我們以理解佛教奧秘之鎖鑰。

我們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佛教，不但必須拋棄一切迷信、成見、玄談以及種種牽強附會的玩意（如以佛家言附會現代科學），而且還必須脫離形式邏輯的束縛。必須運用現代的歷史研究法從容觀上去探求佛教的起原，從它在印度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去顯露它的真面目。

教陀時代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

佛教的創立者大家都公認是佛陀（BUDDHO）。佛陀的生存年代雖至今尚無一致的確定見解，但東西學者，大概都認定他是紀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間人（紀元前五六五——四八六年）。這恰當古代印度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

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的雅利安族（ARYA——原爲白種，與歐洲希臘人，羅馬人等出於同一祖先）社會已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已經由原始的氏族共產制度進到封建王國的邊界上了。大約在紀元前千五百年頃，雅利安人以游牧民族由波斯侵入印度的五河流域（即今般遮布一帶），征服原有的土著民族（DRAVIDA和KALARIA族等），纔開始從事農業的定居生活。隨後更逐漸向東方的恆河流域進展。到佛陀降生時已經佔領整個的恆河流域，而開始向德干高原及南印度開拓了。自雅利安族開始進佔五河

流域至佛生，這一千年間，史家通稱之爲『吠陀時代』。因爲反映這一整個時期的史實遺留有最古的典籍四吠陀（VEDA，爲贊美神祇的頌歌）及其後來附加之《梵書》（BRAHMANA）和《奧義書》（UPANISAD）等。四吠陀中以《梨俱吠陀》（RGVEDA）爲最古，其代表的時代約與雅利安族停居五河流域的時期相當（約在紀元前一五〇〇—一〇〇〇年）。《梵書》和《奧義書》則約可代表開拓恆河流域的時期（約當紀元前一〇〇〇—五〇〇年）。《梵書》又可代表這時期中的前半期，《奧義書》可代表後半期。《沙磨吠陀》（SAMAVEDA），《夜尤吠陀》（YAJURVEDA）和《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等大約爲從五河到恆河之過渡期間的產品，故可代表着過渡的時代。

依據《梨俱吠陀》，雅利安族在五河流域時代雖已開始經營農業，但還十分幼稚，牧業似乎還佔主要的地位，至少在初期是如此。那時的社會組織完全以氏族血統關係爲基礎。最初共有五個氏族，每個氏族分爲幾個VIS，每個VIS，又分成幾個GRAMA——這便是當時氏族社會之最基本的公社組織。一切土地、牧場、森林、房屋、工具乃至生產品等，均歸公有，由公社會議公舉的族長管理和分配。保護牧場修理水道以及祭神和對外戰爭等亦由族長指揮。那時除被征服的土著民族被降爲奴隸（稱之爲首陀羅SUDRA——這個字含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兩種意思）外，雅利安族內部尚無階級存在。此種情形，差不多通過五河流域時代數百年間，沒有甚麼根本的變化——就是說，原始的氏族共產制在基本結構上一直維持下來。

但雅利安族既經佔領恆河流域之後，甚至在佔領的過程中，情形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因爲恆河流域是雨水豐富而土壤肥沃的大平原，最宜於農業耕種；同時又因爲征服該區域中之衆多

的土著民族，獲得了廣大的奴隸勞動，於是農業生產便大大地增加起來了。並且開始運用了大群的奴隸勞動以經營大規模的田莊。在另一方面就是商業經濟之迅速的發展。在五河流域時代雖早已開始了商品的交換，但還只限於少數特殊的生產品（如工具等），並且大半是在氏族與氏族團體之間，還帶着偶然的物與物交換的性質。這由於那時代的末期尚不知使用金銀為貨幣，而僅以牝牛為交換的標準可以看出來。但到此時期，尤其到了此期之後半期的《奧義書》時代，商品交換已經成了在經濟上最重要的因素，不但超越了氏族團體的狹小範圍，而且已然集中到許多鉅大的商業城市之中了。當佛陀出世之時，恆河流域中已有許多著名的新興城市興起，如摩迪陀（MAGADHA）之王舍城（RAJAGRHA），橋薩羅（KASSALA）之舍衛城（SAVATTHI），彌嗟（VAMSA）之橋薩彌（KASAMBI），迦尸（KASSA）之羅奈城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均為人口密集，商業繁盛之中心。而且那時印度的商品已經超越了印度的範圍，經過波斯，巴比倫或亞拉伯而達到地中海沿岸各國去了*。隨着商業範圍的推廣和商品需要的刺激，於是手工業也就自然發達起來。王舍城，舍

* 黑爾茨費德(HERZFELD)在其所著《古代猶太貿易史》(COMMERCIAL HISTORY OF JEWS IN ANTI-QUITY)中敘述紀元前六七世紀以前從東方到西方的商業道路時，曾有這樣的一段說：「…還有別的一條路線，從波斯到格爾拉(GERRHA)收集巴比倫及印度的貨物，橫貫阿拉伯而達到彼德拉(PETRA)。再由彼德拉分為三條路線：一條到埃及。」這便顯然證明古代的印度已經加入古代中亞細亞，小亞細亞和地中海諸國的國際貿易圈中了。

衛城，羅奈城及其他城市，不但是新起的廣大的商品市場，而且同時也是手工業者集中的所在地。絹織物，棉布，象牙及寶石等，均為當時印度輸出西方的重要商品。此外，還有高利貸資本也跟着商業的足跡在城鄉各方面展布了起來。

新的經濟的發展自然要形成新的階級，促進新的階級的對立。我們前面說過，在五河流域時代，只有征服民族（雅利安族）與被征服民族（首陀羅）的區分，尚無階級的存在。但在這時，階級的對立便已十分明顯而且很尖銳化了。自然這種形勢是經過長期間的逐漸發展所形成的。最初是由那些氏族的族長隊伍中發生兩種擁有專門技能的分子：即祈禱神靈的祭司和指導戰爭的軍事領袖。但在起初，這兩種分子除分任祭神和指揮戰爭外，尚無何種特權。隨後因佔領的土地日廣，經濟日見發達，財富日見增加，於是祭司們和軍事領袖們便逐漸攫取了各種剩餘產品歸為己有，並替自己規定種種特權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廢除原有公社選舉制（原來的祭司和軍事領袖均由公社全體會議選舉和罷免），把他們的職位改為終身制和世襲制。這樣，便產生了婆羅門（*BRAHMAN*——祭司）和刹帝利（*KSATRIYA*——貴族）兩個特權等級。當時商業發達，新的商業城市興起時，又產生了商人，手工業者和遊民無產者的新階級成分。

另一方面，商品和貨幣乃至高利貸資本跟着商業的觸鬚伸入農村，刺激了私有制度的發展，同時又因有奴隸大農場的設立，於是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度發生動搖，土地變成可買賣的商品了。這樣，在鄉村中又產生了無土地的農民和擁有大宗土地的地主，這恰同城市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互相對立——這便是在古代印度氏族共產社會的廢墟上所展開來的一副新的階級畫圖。

新的階級的產生，自然要威脅到舊特權階級的地位和利益。

首先感覺到這種威脅的是聰明的婆羅門——壟斷當時一切智慧的知識分子。因此婆羅門便想盡種種方法，利用當時人民對於神的迷信，對於傳說習慣的服從，換言之，即利用神的權威和人民的愚蠢，把自己高高地舉起在一切人民的頭上，攫取了一切特權。它擅自將人民分成婆羅門，刹帝利，吠舍（VAISYA 包括工商農等）和首陀羅四姓（即四個等級）。它並援引《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PURUSA SUKTA，此歌定非《梨俱吠陀》所原有，大概為婆羅門得勢後所偽造附加於其上者），謂由原人之頭生婆羅門，由其肩生刹帝利，由其腿生吠舍，而首陀羅則由其足所生。企圖以此證明『四姓間有先天的差異』，為神所命定，絕對不能更改。根據這種偽造的原理，於是婆羅門便將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權利都重新加以分配。它說（又是一種偽造）婆羅門的保護神為祈禱主（BRHASPATI——所謂梵神宇宙之主宰神中之王），刹帝利的保護神為恩陀羅瓦奴那（INDRA-VARUNA），吠舍的為一切神（VISVEDEVĒH），至於首陀羅則連保護神亦沒有（見PANCAVIMSA《梵書》）。其次，它聲稱自己是『人神』，應當受人民的『布施』（婆羅門所收受的布施，等於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所收之『什一稅』），就是說，它如天神一樣，應當領受人民的供物。這稱為婆羅門至上主義。它按四姓的階位規定各自的終身職務。它把自己放在神與人的中間地位，一方面代表神對人民表示神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替人民向神求福免禍。所以祭神便成為它唯一的職務，也就是它唯一的能夠操縱人民生死禍福的特權；因為人民只有經過它這個經紀人纔能接近神，向神辦交涉。正因為這點，它把祭神的頌歌書《吠陀》經擡高到與神同等的地位，凡《吠陀》中所言者均認為是神的意見，是神聖的法律，絕對不能移易，人民只有遵守的義務（誰要是違反

了《吠陀》的教言，就是表示對於神的反叛）。這叫做《吠陀》神聖主義。因此，婆羅門後來又製造了各種《梵書》、《奧義書》（有一部分《奧義書》為刹帝利所作）和《經書》（SUTRA）等，依照自己的意見以解釋和發揮《吠陀》，使《吠陀》中的教言更能有利於它這個階級的地位。婆羅門不僅壟斷了祭神的特權，而且壟斷了一切知識，它視自己為《吠陀》及其他傳說的唯一保有者。不論是刹帝利或吠舍，要想學習《吠陀》或其他知識，都必須從師於它。它給刹帝利規定的任務是：執干戈以禦外敵，保護宗教（即婆羅門教），保護有情的（婆羅門和吠舍的）財產，維持境內的安寧秩序。並規定刹帝利必須以婆羅門為帝師，不但不得向婆羅門收租稅，還必須納款於婆羅門，名之為『布施』。刹帝利向人民所收之租稅數額，每由它代為確定（以上這些規定，均見載於BAUDHAYANA和APASTAMBIYA法典之中）。吠舍（農工商等）的任務是：終生經營各自的職業，虔祭神靈，供奉婆羅門，獻納租稅於刹帝利等。至於首陀羅，既淪為奴隸，除以勞動服事上面所敘之三姓外，當然不能有任何權利。不許經營獨立的生活，不許祈禱神靈。因此婆羅門稱自己與刹帝利和吠舍三姓為再生族（DVIJA 意即除父母所生之第一生外，尚能從宗教方面獲得第二生命），稱首陀羅為一生族（EKOJATI）為宗教所不屑救之賤民。甚至連聽唱《吠陀》讚歌也不許，而加以恐嚇說：『如果首陀羅故意聽聞《吠陀》之誦聲，則其耳聾，口誦《吠陀》則舌爛，心念《吠陀》則心壞等等』（KAUTBUMA 法典）。由此可見婆羅門代表當時上層階級對於首陀羅之壓迫和賤視達到何等的程度了！此外，婆羅門更進而嚴厲地規定着四姓不得互通婚姻，企圖以此種人為的方法去永遠隔離四姓，使不致混亂血統，因而得以保持那種『神聖』的等級制度（關於四

姓的權利義務備載於《梵書》和《法經》DHARMA SUTRA 中)。

當婆羅門這一姓的人口日見增加，日趨於奢侈縱慾的時候，它便巧妙地想出了開闢財源的方法，那就是增立各種各樣的祭祀名目，或將久已廢棄的祭禮重新提出加以確定，迫令其他等級的人們按期舉行。這種傾向在《梵書》中已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了。迄到後來的《天啓經》(SRAUTA SUTRA)和《家庭經》(GRHYA SUTRA)中更有詳細的規定。在《家庭經》中所規定的祭典有二類，其名目繁多，難以盡舉。即家庭中定期的主要祭祀必須舉行者亦有七種之多。甚至一個人由托胎出胎以至結婚期間所必須舉行的主要祭祀亦有十二次(如受胎禮，成男禮，分髮禮，出胎禮，命名禮……)。《天啓經》中所規定之祭典名目亦是同樣地不可勝數。其中有所謂供養祭(HAVIRYAJNA)一類，包括最重要的祭典有七種。有蘇摩祭(SOMAYJNA)一類，亦包括有必須舉行的八種祭祀。以上這兩類祭典都必須敦請婆羅門代為舉行。不用說，每舉行一次必須有一定的報酬(所謂『供物』)。並且連報酬的物品數額亦有明確的規定呢(如在國王舉行的『力飲祭』中，便規定國王須布施婆羅門牛百七十頭，衣服十七，車十七，黃金十七，即是一例)。所以祭祀舉行得愈多，婆羅門的收入也就愈富。正因為如此，婆羅門也就愈加多多地規定祭祀的數目，愈加提高祭典的尊嚴與重要，愈加注重祭祀的儀式制度。這叫做祭祀萬能主義與上敘的《吠陀》神聖主義和婆羅門至上主義，統稱為婆羅門教的三大綱，其被重視，恰等於後來佛教中的所謂三寶——佛法僧。

次於婆羅門的是刹帝利。如果婆羅門是靠同神辦理交涉起家，它的權威和權利是建立在神權的增長和祭典制度的發達之上，

那末，刹帝利的興起是靠着和敵人戰爭，而其權威與權利之擴大更是靠在戰爭之不斷的發生和勝利上面了。很顯然地，雅利安族之佔領恆河流域那樣廣大的區域，征服那樣衆多的土族，必曾經過長期的無數的兇猛戰爭，纔能達到成功。而這種長期的無數的戰爭之勝利，正是刹帝利勢力之不斷地膨脹。雅利安勢力向前推進一步，刹帝利的勢力也就跟着前進一步。尤其當商工發展至一定程度，城市制度發生的時候，刹帝利的高級領袖們（諸王們）便憑藉着城市的優越地位，利用城市的財富，訓練較大的常備軍，以從事於侵吞兼並的戰爭。這種刹帝利內部的互相兼並的戰爭，從大敘事詩「摩訶波羅多詩篇」（MAHABHARATA）中明顯地反映了出來。該詩篇所描敘的是以般多國（PANDU）五王子拘羅國（KURU）王子互相戰爭爲中心的故事，其時間約當紀元前六七世紀，史家通稱之爲古代印度大戰亂的時代。實際上，這並不是刹帝利內部簡單地互相殘殺，而是反映了整個刹帝利勢力之膨脹，要求由那些雞零狗碎的小國兼並爲大國的一種傾向。自然，此種傾向又恰是反映了當時商業經濟的要求。因爲那些族長式的無數小國的互相對立，互相仇視，對於新興的商業經濟實成爲一種不堪忍受的障礙物了。事實上，當佛陀出世前，在恆河流域中已經產生了幾個強大的新興國家。如摩迦陀（MAGADHA）喬薩羅（KASALA），迦尸（KASE）和彌嗟（VAMSA）等。而且這幾個國又恰是依靠在幾個新興的商業城市基礎上（如摩迦羅之王舍城，喬薩羅之舍衛城，迦尸之羅奈城，彌嗟之喬薩迷等）。這就夠說明刹帝利發展之客觀的新趨勢了。

擁有廣大土地和以新興的富足的商業城市爲基礎的刹帝利，此時不能不感到自己手中已具有強大的物質力量。另一方面，刹帝利在以前完全忙於軍事，忙於戰爭，在知識上是十分幼稚的，

差不多一切重大的問題都要依靠它的『國師』婆羅門來解決。但到了這時候，刹帝利亦極力從事於知識的爭取，研究《吠陀》，並參與《奧義書》的著作，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婆羅門。『據聖德格耶云，昔有婆羅門五人，以「普遍我」問於吠陀學者阿爾尼（UDDALOLAHA ARUNI），阿爾尼不能答，於是六人至卡義凱爾王（ASAVAPATI KAIKEYA）處而受其教。又據《布利哈德奧義書》云，吠陀學者巴那格（GAGYA BALAKI）訪問卡西國王阿闍世問梵之教義，王曰，「婆羅門乞教於刹帝利，雖反於古昔，特余欲教汝」，乃授之教義』（高楠順次等著《印度宗教哲學史》商務版二四二頁）。由此便足以證明刹帝利在知識上之進步，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了。刹帝利的物質勢力既經如彼膨脹，而知識又如此增進，自然會發生一種提高自己權威和權利的要求。這首先就要對於婆羅門從前替它所規定的階位（在四姓的第二位），所規定的權利，感到不滿。而對於婆羅門之無厭足地以祭祀為名強令它和吠舍『布施』，尤難忍受。於是刹帝利與婆羅門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吠舍中的商人是一個完全新興的階級。它隨着商業範圍的擴大與城市勢力的增長而發達起來。它挾着商品和借貸資本深入窮鄉僻壤之中，搜刮農民的剩餘產品，甚至農民必需的生活費亦走入它的腰包了。並且收買了農民的田地。城市的手工業者更不用說要完全依靠它，因為它是他們的生產品和原料以及借貸資本的主要供給者。就城市的實際經濟生活說，商人是城市的主人。而且這個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因為經營商業於海外，往來各國，不但獲得了大宗的財富，並且擴大了眼界，獲得了許多新奇的知識。因此，這個階級對於婆羅門的那種妄自尊大，及婆羅門對於它的地位及權利的限制，（與農民及手工業者同一看待），尤其是那

種繁多的祭祀和帶強迫性的布施，都感覺得不滿，漸漸地不能忍受了。農民和手工業者，在當時社會中是一個最廣大的生產群眾，是最感受壓迫，剝削和痛苦的群眾。但他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不只是婆羅門，還有刹帝利的貴族和商人。不過婆羅門當時所採取的壓迫和剝削形式是比較地明顯和露骨。因為一切祭祀，法律和種種社會規程，大都由婆羅門所規定。譬如對於四姓的權利義務之種種限制，就是最顯現的例。這樣，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婆羅門之懷抱不滿，甚至憤恨，那是很自然的了。但這些群眾有一弱點，尤其是農民們，既無知識，又特別富於保守性，所以他們對於婆羅門的壓迫和剝削（如強索供物）雖深懷不滿，而對於婆羅門的宗教大致還是信仰的——這便是婆羅門教在當時及以後尚能保持其相當地位之唯一基礎。至於首陀羅，這個被征服的奴隸階級，其所受之壓迫、剝削、賤視、虐待及種種痛苦，自然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因為商業的發達，生產品的增加，同時就要刺激統治階級和剝削者的奢侈慾的發展和謀利心之亢進。但要無限制地滿足他們的奢侈慾和謀利心，就只有無限制地剝削奴隸。這是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的奴隸社會中所證明過的，古代的印度事實亦完全如此。所以首陀羅由於它的特殊的奴隸地位和所受之特殊的虐待，對於整個的雅利安族的統治者和剝削者，不論是婆羅門，刹帝利或吠舍（主要是吠舍中的商人）都是懷着敵視與痛恨的。但它必然特別痛恨婆羅門，因為婆羅門是四姓制度的首倡者，立法者。婆羅門不僅剝奪了它一切物質上的權利，而且剝奪了它一切精神上的權利，剝奪了它的靈魂（如禁止它信仰宗教，祭祀神靈，以及學習《吠陀》和聽唱頌歌等）。

由上敘的情形看來，古代印度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明顯地發生了空前的劇烈的變化：私有制度的發生，商業的發達，土地

公有制的破壞，新興城市的興起，貴族勢力的膨脹，商人階級的出現，農民的破產，手工業者的貧窮，以及奴隸之遭受極端虐待——這一切都證明不但原始氏族的共有制度久已崩解，即後來婆羅門所創建的『四姓』制度亦已根本動搖，『婆羅門至上主義』已成為衆矢之的，尤其是刹帝利對它表示不能忍受，大有取而代之之野心，於是醞釀已久的古代印度的階級鬥爭的戲劇便從此正式開幕了。

反婆羅門運動與佛教的產生

這種鬭爭的表演，自然要帶着宗教的面具，從宗教改革思想和創立新教運動中表現出來。這差不多是一切古代社會運動的公律。即歐洲中古時代的一切鬭爭亦多是如此。這恰如恩格斯（E. ENGELS）所說：『……中世紀的一切群眾運動，必然都帶上一種宗教的面具……但是，在宗教的興奮背後，却經常地隱藏着切實的人世間的利益』（《原始基督教史》）。不過歐洲中世紀末期反基督的運動大都為當時的資產階級領導，而在古代印度的反婆羅門教運動，則全為刹帝利（貴族）所主動指使而已。

在起初，刹帝利尚不敢公然站在反婆羅門教的地位，它只是在婆羅門教的範圍內表示一些異義，運用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吠陀經》，暗暗地反對婆羅門的教義——這從《奧義書》中明顯地反映了出來（《奧義書》為婆羅門和刹帝利共同的产品，已為東西古代印度研究家所共認）。例如婆羅門所極力鼓吹的祭祀萬能主義和四姓制度，《奧義書》中便常隱含有排斥或輕視之傾向；婆羅門在《梵書》（這是純粹婆羅門主義的作品）中所極力宣揚之梵神，在某些《奧義書》中則把它變成一種純粹抽象的宇宙原理，並力言『梵即我（ATMAN），我即梵』，以此減去婆羅門

對於梵所賦予之神聖性，此種反婆羅門的傾向，同樣表現於《摩訶波羅多詩篇》中。『據多依森 (DEUSSEN) 的意見，謂由文體上觀之，《摩訶波羅多》，在《吠陀》文體 (包含古《奧義書》) 與華文體之間；由宗教的觀點觀之，一方認《吠陀》之神權，重四姓之階級，他一方面又漸有表示非吠陀主義四姓平等主義之傾向』 (《印度哲學宗教史》——三八八頁) 並且依多依森的研究，在《奧義書》和《摩訶波羅多》中已含有數論派 (SAMKHYA) 和瑜珈派 (YOGA) 之基本思想。雖然，這裏所謂的數論派和瑜珈派與後來《僧佉經》 (SANKHYA SUTRA) 所代表之數論派和跋陀闍利 (PATANJALI) 所代表之瑜珈派，其思想主張大有差異。但他們大體上都帶有反婆羅門主義的傾向，至少是對於婆羅門之對於《吠陀》教義的解釋及其祭祀萬能主義，懷抱不滿，而企圖進行改革者。

這種對婆羅門教懷抱不滿，企圖有所改革的思想運動，在起初雖然是隱藏地，溫和地，緩慢地進行；但一經發動便不能停止；並且愈往前進必然愈加激烈，愈加顯露其獨立的面貌；最後則走到公開地明目張膽地反對婆羅門教的鬭爭，甚至根本反對吠陀主義，乃至根本否認宗教之存在——這也是歷史上一切偉大的社會運動的發展程過之自然的邏輯。

當佛陀出世時，古代印度的社會宗教改革運動，已達到了最高點。那時反婆羅門教的黨派團體，有如雨後春筍，到處發生。通例稱此等團體為沙門 (SAMANA)，以示與婆羅門區別。最有趣的是：這些沙門團的絕大多數均散佈於恆河流域的新興諸國中，並以這些國家為其根據地，為其活動的舞臺。就中尤以摩迦陀國為其中心。例如佛陀最初所師事之阿羅邏迦羅摩 (ALALA-KALAMA) 為鬱那迦羅摩子 (UDDAKARAMA UTTA) 均居

於摩迦陀的吠舍利 (VISSALI) 城和王舍城附近。他們都是沙門團的領袖。後來歸依佛陀之三迦葉所代表的羅底迦團 (LATILIKA) 亦為摩迦陀大沙門團之一。所謂有名的六師所代表的團體及佛陀本人所率領的沙門團，雖散布於新興各國，但亦多以王舍城為活動的中心地。《五分律》中曾載有摩迦陀王頻毗沙羅之弟迦留嘗設一大齋，會集九十六種外道互相討論的紀事。這些情形充分證明了：這些新興國家因為刹帝利在實際上已佔着優勢，它需要打擊婆羅門，奪取在四姓中的第一席地，於是它便提倡並保護一切反婆羅門的團體和運動。因此，這些新興的國家便成了當時一切反婆羅門團體之自由生長的絕好園地，它們可以在這裏自由發表反婆羅門的或其他的任何意見，它們各派間可以自由地相互討論並向民衆宣傳，而不致受到婆羅門的無禮干涉。於是關於宗教上，哲學上以及一般的人生問題上之一切新鮮活潑的見解，像潮水一般地湧現出來了。這樣便形成了古代印度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在當時各種派別，各種沙門團中，其影響比較大而其思想又略可考證者（依據《沙門果經》所載），是所謂著名的六師。六師在大體上都是非難吠陀神聖主義，反對祭祀萬能主義和婆羅門至上主義的。然而他們反對的出發點及其論調殊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富蘭那迦葉 (PURUNA KASSAPA) 是由倫理的觀點出發。在他看來，世界無所謂善與惡，更無善惡報應之說。所謂善與惡都依習慣而定。由這一見解推論下去，則婆羅門所謂凡遵從《吠陀》教言者為善，反之便是惡，祀神者能得善根，反之，必得惡報以及輪迴因果報應說——這一切都變成毫無根據了。末伽黎拘舍羅 (MAKKHALI GOSALA) 則主張極端的「定命論」 (FATALISM)。他以為一切皆由自然運行的規律所決

定，人爲的任何努力都無用處。人的行爲與命運，只有聽其自然，前後經過數百劫，自然會達到解脫之境。由這種觀點看來，婆羅門的祀神求福與種種繁文縟節的儀式主義，都成了多餘的毫無意義的舉動。散惹耶毗羅梨子 (SANYAYA BELLATTHIPUTTA) 則認爲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真理都由主觀的感覺而定。主觀覺得有時便是有，覺得無時便是無——依據這種主觀的感覺論，可以走到否認一切。浮陀迦旃延 (PUKUDHA KACCAYANA) 是主張心物不滅說的。因而有否認解脫說之傾向。尼犍子若提子 (NIGANLHA NETAPUTTA) 爲耆那教 (JAINA) 之始祖，算是當時六師中最有勢力者。但其所主張僅是一種極端的苦行主義，這不過是反對當時婆羅門之勒索『布施』和奢侈縱慾之一種極端反動的表現而已。以上五師的立場和見解雖有種種不同，然而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他們雖反對婆羅門教，但並未曾根本否定神之存在。他們亦未曾脫離古印度之傳統的厭世精神，他們總覺得有從這個現實的世界以外找尋終極慰安或解脫之必要，雖然這與他們某些主張不無矛盾。總而言之，他們只是一批宗教的改革家或創設新教的宣傳家而已。

完全站在無神論的觀點上徹頭徹尾去反對婆羅門教的，只有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AJITA KESAKAMBALI) 所代表之所謂順世派 (LOKAYATA)。這是當時所謂俗人，實即商人階級所組織的團體。依順世派的意見，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原素 (簡稱『四大』) 互相配合而成的，此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存在。人類及其他生物也是一樣。《成唯識述記》說：『順世外道，執有實常四大，生一切有情。一切有情稟此而有，更無餘物。死後，……還歸四大。』這是從根本上否認了神及死後靈魂之存在，因而也就否認了任何宗教存在之可能性。因此它歌唱着：

「不信天堂和解脫，
不信他界有靈魂；
也不信僧侶的儀文，
會生出甚麼報應。」

「聖火供祀、三吠陀，
三杖懺悔把灰塗，
用這些儀式——創造神司掌萬事！
從無智無勇的人們，
來搾取生活的糧食。」

從這兩首詩歌（見塔爾海瑪《現代世界觀》中所引——李達譯中譯本一〇三至一〇四頁）中可以看出順世派對於當時的宗教和祭祀所抱的見解是何等地明確而深刻！由於這種基本觀點出發，所以順世派對於人生的態度，完全反對印度傳統的厭世主義而主張現實的享樂主義。它說：『借債去求得美食，愉快地度過短短的光陰，在我們有生之日，盡量避去死路，生是不會再歸』（同上）。因此當時各派又稱此派為饕餮派（ISCHARWAKA），譏其只顧吃喝享樂。這正同希臘人之譏罵伊壁鳩魯（EPICURUS）一樣，只是因為伊氏堅持「無神論」，否認靈魂不滅說，主張現世的快樂主義而已。實際上，順世派和伊壁鳩魯派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代表當時最正確的最進步的一種觀點。因為只有這種觀點纔能把被壓迫的階級徹底地從神的和人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只有這種觀點纔能把人類從幻想的世界拉到現實的世界，由消極厭世的精神回復到積極奮鬥的精神。

然而從剎帝利的立場看來，這種觀點是走得太遠了！因為如果依照順世派的觀點推論下去，不但婆羅門教應徹底消滅，就是

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容許存在；不但婆羅門的特權應該推翻，就是刹帝利的特權也是應當取消的；不但刹帝利的地位應當提高，就是其他等級的地位也是應當改善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下層被壓迫和剝削的階級真接受了順世派的現實享樂主義的主張，積極鬭爭起來以謀獲得物質的滿足，那勢必根本動搖當時印度社會的全部基礎，然而這是一個大革命！這是刹帝利絕對不能容許的。就是順世派所代表的商人階級，如果它一旦覺到了它的結論的真正危險，自己也會馬上反對起來了吧！所以從反婆羅門教運動中發生出來之最精彩的偉大的唯物的無神的世界觀和現實主義，不但婆羅門視之為唯一的死敵，就是領導這一運動的刹帝利也覺得是一個真實的危險了。這種情形，從當時及後來之一切派別，從婆羅門到耆那教徒和佛教徒之對於順世派的仇視與反對，很明顯地反映了出來。

刹帝利之起而反對婆羅門，領導反婆羅門的運動，無疑地只是爲了自階級的利益。它之反對婆羅門的特權，爲的是增加自己的特權；反對『婆羅門至上主義』，爲的是造成『刹帝利至上主義』；反對婆羅門對其他等級的剝削（如勒索供物），爲的是保持和提高自己對人民的剝削權利；換句話說，刹帝利之反對婆羅門是企圖將自己提高到婆羅門原來的地位上，成爲四姓中之第一姓；它反對婆羅門教，是企圖創造自己的宗教代替婆羅門教去支配其他階級的靈魂，以鞏固自己的統治。這與歐洲宗教改革時代，許多國家（如英德等）的國王和貴族扶植本國的新教運動以反對羅馬教皇支配下的基督教的傾向，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刹帝利爲達到它的目的，爲要真正取婆羅門的地位而代之，它便必須有一種適合於新的社會結構，新的階級關係的宗教。這宗教在原則上必須能夠包容當時各階級的共同願望（雖然是幻想的）

；對於婆羅門教之一切陳腐的教義與祭儀，必須加以排斥，但婆羅門教中那些已經深入人心的傳統思想乃至神話，還得保留，對於那種極端的無神論與現實的享樂主義，固應反對，但那些富有活氣而又溫和的新思想，亦應酌量予以優容。總而言之，這種宗教必須具有改革的精神，但同時又不至走到極端，換句話說，必須是適合多方面的折衷主義的宗教。像這樣的宗教不單是刹帝利主觀的需要，而且也是當時的客觀條件所準備而為歷史所要求的。而佛陀所領導的新教運動便是在這種客觀的實際的要求基礎上逐漸地生長了起來。

佛陀本人即屬於刹帝利（印度北部一個小城主的王子），他對於當時的社會動向和本階級的需要，無疑地自始即有若干感悟。觀其決然出家並直向當時宗教思想改革運動最為興盛的摩迦陀出發，便已顯出他最初的意向了。佛陀出世較六師稍後，這是他能夠接觸和考察當時各派思想見解的一個優越條件。佛陀出家前曾受業於婆羅門，故對於婆羅門的教義頗稱熟悉。當他初到摩迦陀時即前後就學於當地著名的沙門團領袖阿羅邏迦羅摩和鬱那迦羅摩子（這兩人的思想，就佛陀傳所記概略，似屬於最初的數論派與瑜珈派）；隨後，又至尼連禪河（NAIRANNJANNA）畔苦行林中修苦行（修苦行為當時沙門中最流行的修道法，尤以耆那派倡導最力）數年，與諸苦行者往來論道；此外，他直接或間接所受於六師的影響，當更為深切。佛陀經過了這多方面的接觸和長期的思考之後，他對於創立新宗教的態度便決定了。他的態度就是折衷主義。日本木村泰賢說：『然則佛陀即佛教，創造之特色如何……今各自其態度約略考之，則以為要能綜合時代之最優勢者。故無論為傳說思想，或新思想，均能選拔其萃，以策應時代之精神……或當如赫克儒輩所言，以形式的婆羅門教為正面，

以六師諸派爲反面，折衷此正反兩面而綜合之，即佛陀之態度也。此種態度，不獨對於婆羅門與六師，亦爲對於一切問題，暨對於當時各派之主張……例如當時世所行之修養法，一方爲極端之快樂論者，他方則爲極端之苦行主義，佛陀乃折衷兩說，而力唱不苦不樂之精神修養。又對於靈魂問題，一方爲極端之常住論者，他方則爲極端唯物論之斷滅論者，佛陀兩非之，以之折衷，而確立於因緣流動之生命觀。爰對於其他一切問題，均用此流動之義。……由斯以譚，佛教對於當時各派之地位，一言以蔽之，即爲中道』（見木村泰賢著《原始佛思想論》商務本五四至五五頁）。由此可見東西比較認真研究的佛學家都已承認佛陀所倡導的新教是綜合當時各派思想的一種折衷主義的宗教了。不過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此外，還有一點，就是佛陀所『選拔』的不一定就是『新思想』中的『萃』，實際上有許多真正精粹光彩的『新思想』，如順世派和富蘭那迦葉派的見解，都被他完全『選拔』掉了。我們知道，凡是折衷主義，與庸俗主義是不能分離的。

在當時的一切問題上最富於實際的社會意義，而爲各階級所極端關切的，是『四姓制度』的問題。而佛陀對此所持的態度也是折衷主義的。他一方面提倡一切有情的平等主義，而同時又保留四姓制，並且公然把刹帝利放在婆羅門的頭上（如在佛典中凡說到四姓時，關於四姓的排列都是以刹帝利爲首，其次便是婆羅門，吠舍和首陀羅）。這樣，便一方滿足了刹帝利之最基本的願望，而他方又給了吠舍尤其是首陀羅以精神上的慰安——因爲佛教承認四姓在宗教上有平等的權利，有同樣修道和得到解脫之可能性（『如恆河，耶無那，阿夷婆羅提，薩羅浮，摩企諸大河，流注於海，則失其以前之名，僅得名爲大海。如是，此四姓即刹

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若亦依如來所示之法與律而出家，則捨其姓氏，同為釋子』——同上書二三五頁所引）。但佛陀所提倡的平等主義不是現社會實際權利上的平等主義，而只是宗教上的或世間以外的平等主義，這當然是唯心的，幻想的。然而這對於當時的社會還是一個偉大的進步。特別是對於首陀羅——這個久已完全被剝奪了宗教信仰權的姓族——含有重大的社會意義。這也是佛教後來能夠在被壓迫民衆中以及其他的民族中獲得信仰和發展的基本因素，換言之，即佛教後來之所以能變成爲超階級的（自然是表面上）和國際的宗教之基本因素。

關於祭祀和供物（布施）的問題，也是關係當時各階級的實際利益之最迫切的問題。佛陀對此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雖然同樣不利於婆羅門——就是：他一方面在理論上斷言，要從輪迴獲得解脫，不是單靠祭祀和供物可以達到，只有徹底了悟因緣關係，努力消除無明（煩惱），纔能成功。這不啻從根本上斷絕了婆羅門的財源，解除了其他等級人民的擔負。但同時他又主張施主可以自由布施僧侶，使之得以生活，爲人民的解脫事業服務。並且佛陀及其門徒曾親自托鉢沿門，乞求施主布施，過極清苦之生活，以示別於當時奢侈腐化的婆羅門。自然佛陀這種主張和行動，除婆羅門外，很容易獲得其他階級人民的讚許，尤其容易吸引貧苦民衆的同情。佛陀主張的托鉢制度與清苦戒律，在客觀上當然是當時印度上層階級的腐化和下層民衆的異常貧苦之反動與反映，但同時亦是反對腐化的婆羅門祭司和取得貧苦民衆的信仰之最有效的手段。這種手段與歐洲中世紀聖佛蘭西斯（ST. FRANCIS）所領導的托鉢僧運動甚相類似。

此外，佛陀還提倡一種政治理想，所謂轉輪王（CAKKAVATTI）的治世，意即建立一印度的王國，以『法』治之（其

詳見於《增一阿含》與《轉輪王修行經》)。這亦是代表當時刹帝利勢力膨脹之更進一步的傾向(具體地說來這是當時摩迦陀王國的傾向)，更進一步地反映了商業經濟的要求。

總觀上敘佛陀所持的基本態度及其具體主張，證明了佛陀所創立的新教，是最適合於當時刹帝利的願望和時代的要求的。因此，佛陀便成了當時印度中古時代的驕子，而佛教之發展的前途也就從而確定了。

據佛典所載，自佛陀確定其對於創立新教的態度(所謂『成道』)，進而宣傳教義(所謂『轉法輪』)起，不久便獲得了廣大的信眾。他初至婆羅捺斯(BARANASI)城，便立刻說服了那曾經離棄他的侍從橋陳如(KONDANNA)等五人(後人稱之為佛弟子五比丘)和當地長者耶舍(YASSA)及其親友多人。至尼連禪河畔，又說服了著名的羅底迦沙門團的首領迦葉兄弟三人，其弟子千餘亦均皈依佛陀。再至摩迦陀首府王舍城，向摩迦陀王頻毗婆羅(BINBISARA)說教，王率大眾，歸依佛法，並以竹園相獻。王舍城著名的沙門舍利弗(SARIPUTRA)和大目犍連(MAHAMAUDGALYANA)亦歸佛稱弟子。後來刹帝利中最有權威的橋薩羅王波斯匿(PRASENAJIT)和摩迦陀王阿闍世(AJATASATRA)等，亦皈依佛陀的新教。至於其他王侯長者富人及其他人民之繼續入教者，更是難以勝數。佛陀並將所有出家弟子組成團體，名為僧伽(SAMGHA)。據說，成道之第一年便已有僧伽弟子千餘人了。經過數十年以後(佛陀曾傳道四十餘年)，其僧伽人數之增多，當可推想而知。但凡佛典中關於佛陀吸引信眾的這類紀載，自然不免有些過分誇張。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種顯明的重要傾向：第一，自佛陀確定他的教義向各方宣傳後，有好一些沙門團確受了他的影響，內部發生

了分化和解體的現象，其中有不少徒衆甚至領袖轉而投歸佛陀；第二，許多刹帝利甚至最有權勢的國王（如阿闍世），對於佛陀所倡的新教表示歡迎，表示信賴，認為是自己的宗教——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夠證明佛陀所創立的新教，在實際運動中，在他生存時的實驗中，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經表現它具備有代取婆羅門教地位的基礎了。所以佛滅後二百年間，佛教由於刹帝利的扶植和佛弟子們的努力，其勢力便逐漸地遍佈了全印度，不但壓倒了各派的新教團體，而且實際上凌駕在婆羅門教之上了。迄至紀元前三世紀，阿育王（ASOKA 其在位期間約當紀元前二七二至二二六年）統一全印度時（這正是佛陀所預期的「轉輪王」之出世），佛教便正式地被宣佈為國教，正式地代替了婆羅門教的地位。於是，佛教同着刹帝利一道達到了最後的勝利。

原始佛教的宗教哲學思想

由前面的解說，可以看出佛教之產生，既非偶然，也沒有甚麼神秘，它同其它一切社會現象一樣，僅是一定的社會環境之產物而已。我們從這樣的前提進而考察佛教的宗教和哲學思想，纔不至陷入神秘與玄奧的泥潭之中。

但佛教所包含的教義和思想，它同其他現象一樣，是逐漸地形成，不斷地變化。並非如一般佛教徒所說，是佛陀本人一手造成的。這一點，只要把小乘派和大乘派兩方面所解釋和主張的教義略加比較，就明顯地證明出來了。但就宗教的觀點上說來，小乘教是最能代表原始的佛教的，就是說，是比較能代表佛陀最初的根本見解的，雖然小乘各派中亦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大體上還是比較的一致——這從北方所遺傳下來之最古的經典（如漢譯

《四阿含》和南方傳下來之《巴利文經典》（主要的也是《四阿含》），觀其對於最基本的教義之解說並無根本分歧，就足為證明。故我們可以稱小乘派（包括上座部及說一切有部等）所代表的佛教，即是原始的佛教。

原始佛教中最中心的思想或最基本的教義，是集中於下列幾個問題的解說上面：輪迴與因果或業力說；及由此而起的緣起觀，無我論以及解脫說或涅槃論等。而連繫這一切問題的最普通的公式就是所謂四諦：苦、集、滅、道。

所謂輪迴（SAMSARA）與因果或『業』（KARMA——在佛教一切派別中常把因果論與業力說相提並論）的思想，在印度起源最古，從《梵書》中已可看出它的萌芽。迄至《奧義書》時代，這種思想已成爲各階級，尤其下層民衆中牢不可破的迷信了。那時對於輪迴因果說最普遍的見解大概是：人死後，不但其靈魂不滅，而且必須重復轉生——可以轉爲神，可以轉爲人，也可以轉爲禽獸等——如此循環無端。即以人而論，凡人在今世的命運之或樂或苦，或福或禍，均爲其前世所行所爲之或善或惡所決定；而來世之福禍苦樂，則又決定於今世的行爲之或惡或善。即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思想，自然有些奇特，究竟何以產生，致東西思想家議論紛紜。如法蘭西著名的福爾特爾（VOLTAIRE）認爲由於印度之氣候；格爾伯（GARBA）則謂由於原始土人之信仰而轉傳於雅利安者。實際上，却是由於古代印度之特有的嚴格的世襲等級制度與低級人民之異常痛苦的生活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因爲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各級人民的命運都是預先決定了的，在今世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超越等級（四姓）的範圍。因此，在今世的地位和痛苦，決不能由今世來改善和解除，只有希望來世轉入更高的等級。此等思想，起初大約只

流行於低級的人民間，他們藉此以安慰他們的無可忍受的痛苦。隨後因為上級的人也時有不測的災殃疾病，尤其是那不可避免的老死，使他們也感受到痛苦，因而也就逐漸信仰起輪迴因果說來了。當着階級的對立愈加發展，低級人民的生活愈益困苦的時候，再經過婆羅門教的利用和宣傳，於是這種思想在民衆中的勢力便更加普遍，更加鞏固了。事實上，所謂輪迴因果說，同基督教的天堂地獄說一樣，不僅完全是一種幻想，而且是引導人們避開改革現社會不良制度之一切奮鬥和改善現實生活之一切努力使之完全趨於消極夢想的一種麻醉劑。

原始佛教對於輪迴因果說，並沒有甚麼創造，只是承襲原有的東西，略加修改，使之定型化和抽象化而已。所謂定型化，就是將原來不甚確定的輪迴圈加以確定：如三界（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五趣或六趣（五趣為地獄餓鬼傍生即禽獸人和天人DEVA，六趣則加阿修羅）以及四生（胎生卵生溼生化生）之說是。所謂抽象化者，則將原來的靈魂不滅說加以排除，而專門主張業力說。如說『有情以業為自體，為業之相續者。以業為母胎，以業為眷屬，以業為所為者。凡此上下一切之區別，均為業所分配。』『世間依業而轉。有情依業而轉。有情為業所纏，猶如車之依軸而行』（木村氏《原始佛教思想》所引巴利文《雜阿含經》語）。換句話說，凡有情所以流轉於三界，六趣和四生等的輪迴圈中者，均是由於以業力為其動力，為其引線。但究竟甚麼是『業』呢？在佛典中却沒有給我們以確定的一致性的定義。有的解作『因果』，有的解作『意志』或『識』，有的解作行動或行事，有的解作行動的結果，令人甚至有附會為『遺傳性』或『超越經驗』者。實在說來，『業』的本身是一種不存在的幻想物，所謂業力說便是一種玄學而已。

企圖進一步從理論上解釋輪迴因果論的是緣起 (PATICĀ-ASAMUPPATA) 說。一切佛典及一切佛教派別都稱此為佛陀本人所獨創，均認之為全部佛教教義之基礎。其實，所謂緣起的十二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這些名目都曾散見於《吠陀》及《奧義書》中，阿羅邏曾組成與這十二支緣起相類似的系統（見《佛陀傳》），數論派的二十四支與此亦很相似。由此可見十二緣起不過是佛陀或佛弟子將前人及當時別派的意見收集起來加以修改和系統化而已。至於對於十二緣起所含意義的解釋，原是異說紛歧，莫衷一是，但據邁格爾的研究『小乘各部所見顯然相同。他們把輪迴之說攙入，說十二支裏面的前二支指前生，以下八支指今生，最末兩支指來生』（見邁氏著《佛家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版一五九頁）。這證明小乘各部，即原始佛教各派都認定十二緣起是為着進一步解釋輪迴因果論所造的一個新系統了。然而這個新系統比輪迴因果論原來的系統並不見得高明，反而更顯得經院主義與牽強附會。只要稍微將十二支緣起加以檢視，便可看出它們完全是雜湊的混亂的不相關連的，連相互間的形式邏輯亦沒有。譬如『無明』與『行』，何以發生必然的因果關係，又怎能代表過去世呢？『識』怎麼能生『名色』呢？如說識能生名色，不是等於說肉體的身為心理的識所產生的嗎？這等於兒子產生母親。假如真有所謂過未現的三世輪迴，那末每一世都必須經過生老病死，怎麼說它們只能代表將來呢？這或者是佛教的特殊邏輯吧！

至於『無我論』（ ANTTA VADA ）似乎確為佛陀所獨創。因為從《梨俱吠陀》以來，一切紀載，一切派別的主張，都不曾有過否認我的存在者，而且往往認定我為最高的原理，如《奧義書》中之阿特曼（ ATMAN ， 意即我 ）數論派二十四支中之

神我等便是著名的代表。而佛教却反以『諸無我法』與『諸行無常』和『涅槃寂靜』併為佛教三法印，認為順此者為佛說，違此者即非佛說。但究竟為甚麼如此呢？《彼論破執我品》說『越此依餘豈解脫，理必無有。所以者何？虛忘我執所迷亂故。謂此法外諸所執我，非即於蘊相續假立，執有真實離蘊我故。由我執力諸煩惱生，三有輪迴無從解脫。……』原來佛教的無我論，全是站在消除煩惱，解脫輪迴痛苦的觀點上而造出來的。由佛陀看來，世間一切煩惱苦痛都是由於『我執』，而我執則由於主觀認定有『我』，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如果一旦證明『我』並不存在，則一切『我執』及因此而生之一切煩惱痛苦自隨之煙消雲散了。其次，所謂我者，是「即於蘊相續假立」，非真實有。換言之，我是由因緣而生，由於『五蘊』（色、受、想、行、識，色代表外界，物質原素，後四者均為心理原素）與無明或業力互相結合而成。但因緣與五蘊都是無常的，時生時滅的，故『我』亦無常，『我』是隨着因緣五蘊等的生滅而生滅，而人們所執的『我』僅是一『假我』而已。這種見解，從一定的意義上看來，實含有一種真理。因為『人』這一生物也同其他一切的物體一樣，是由一定的物質原素按一定的法則結合而成，其存在至一定的時期必定死滅，死滅後其身體又復分解為各種原素。人是無常的，生滅的東西。但却不能因此便否定人在一定時期（即生存期）內之相對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否認『我』在一定時期內之存在。這樣，佛陀的無我論不過是一種主觀的唯心的否定主義罷了，事實上的『我』還是依然存在着的（當然是在其生存期內）。並且佛陀雖一方面聲言由因緣和五蘊等而生的『我』，即肉體的『我』是『無常』的和『無』的。但同時又承認（實即幻想）有一種與『我』俱生的『無明』或『業』並不隨着肉體的『我』之消滅

而消滅，反而流轉於三界六趣和三世的輪迴圈之中——這證明佛陀的無我論並不是徹底的。因此，無我論不能達到解脫的目的，因為無我論沒有能否認與「我」俱生的「無明」之存在，即一切煩惱和輪迴之根的存在。

佛家徹底的解脫說是涅槃論（NIRVANA）。所謂「涅槃」，就是「寂滅」或「消散」（涅槃原文NIRVANA NIBBANA一語，即由於消散NIR-VA一語而來）的意思。所謂「入涅槃」，就是斷絕無明，消除煩惱，解脫輪迴，進入「妙樂境界」或「常樂我靜」的意思。但涅槃有兩種形式，一種名有餘涅槃（SAUPADISESA NIBBANA），是指現身所達到的解脫輪迴之境界；一種名無餘涅槃（ANUPADISESA NIBBANA），則指身歿後所達到之完全寂滅的妙樂境界。但不論有餘涅槃或無餘涅槃，同基督的天堂或樂園一樣都同樣是心理上的想像，是一種幻想的空中樓閣。所不同者，就是佛教的涅槃比之基督教的天堂，更為抽象玄虛，更為不可思議而已。正因如此，佛教的涅槃論不能像基督的天堂說那樣使群眾容易了解（實即迷信）容易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正因為如此，佛教中後來發生了淨土宗的「極樂淨土」或「極樂佛國」，代替了涅槃說。

最能概括佛教的宗教思想者，是所謂苦、集、滅、道四諦的公式。依照這個公式：世間一切有情無情都是「苦」，苦中最著者為生、老、病、死；苦的原因是「集」，即業與煩惱；「滅」是涅槃；「道」是達到涅槃的途徑或手段，如戒、定、慧等。要解脫生老病死等痛苦，消除業與煩惱，達到涅槃，必須藉助於「道」或經過修道的途徑——這便是原始佛教教義的精髓之所在。不用說，這是一種逃避現實世界的消極厭世的人生觀。但它在一定的社會制度裏，在一定的人們當中亦能給予某種安慰（自然是幻

想的)，並能幫助統治者『安定人心』——這便是原始佛教所以發展和存在之理由。

從哲學的思想說來，原始佛教中有兩種最值得注意和指出的見解，那就是因緣論和無常論。因緣論包含有兩個最基本的觀點：第一是承認世間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現象（所謂『有爲法』）之發生，都有一定的原因。故了解現象必須尋求其發生之原因。例如說：『比丘之欲得正智者，去尋求名與色（即心與身）所由生之原由，猶之乎智巧之醫，見一種病，即去尋求病原……』（見《佛家哲學通論》一五七頁所引巴利文VISUDDHI MAGGA 史所載佛陀語）。第二是承認世間一切現象是相互連繫，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例如說：『恰如二束蘆得互相倚立。如是，以名爲緣而有有識，以識爲緣而有名色。……二束蘆中如去其一，他一必仆，如取其他，他之一亦仆。於是，吾友，依於名色滅則識滅，依於識滅則名色滅』（見《原始佛教思想》九八頁引巴利文SANRYUTTAN中所載佛陀語）。像這樣的因緣觀，雖爲古代印度所有，但佛陀却是特別堅持這種觀點而又反對當時的『偶然論』或『無因論』的——這是一種正確的科學的態度。但佛陀的因緣觀，同一切唯心論一樣，亦有其根本的缺點，就是他不了解因果律只存在於物質與物質及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之中，換言之，因果律只是客觀世界運行的法則之反映，物質世界是因果律的基礎，離此它便不能存在。所以當佛陀說：『名色滅則識滅』，這是完全正確的，但當他一說到『識滅則名色滅』時，那就根本錯誤了。至於十二緣起中所表示的因果關係及三世因果之說，更是牽強附會荒唐無稽了。

所謂無常論，就是變化論，與因果論是不可分離的。依據這理論，宇宙間的一切現象（有爲法）都是運動的，變化無常，生

滅不定的，換現在的話來說，是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這表現在人中，是所謂『生老病死』，表現在物中，是所謂『生住異滅』。這是辯證法的觀點。佛陀會持這種觀點反對過當時一切『有常論』的玄學觀。佛陀會運用這種觀點建立了他的動的變化的世界（所謂『器界』或『世間』）觀。這是原始佛教中最精彩最有價值的思想。這也就是原始佛教在思想上所以最爲活潑而高出於其他一切宗教之所在（因爲別的宗教的觀點都是靜止的玄學的），但如果把原始佛教思想中所包含的辯證法觀點過事吹噓，而不注意它的基本缺陷（如王季同先生竟稱佛家的辯證超越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見《唯識論研究序言》），那就未免有點盲目了。第一，原始佛教的無常論是傾向於單純的流動說，有類於後來柏格森（H. BERGSON）的見解，否定了質變量，量變質的關係（這是黑格爾辯證法中最優越的本質之所在）。例如它在無我論中否認『我』在一定期間以一定的特殊形態（人）的那種存在，就證明它完全不了解：『我』雖由物質原素（佛教稱之爲『極微』）變成，但我與物質原素之間有着性質上的區別。第二，原始佛教的辯證法是唯心論，甚至神學的（這是與馬克思的辯證法根本不同的地方）。例如它的業力運動說，十二緣起之相互轉變說，以及三界，六趣和三界之輪迴說等，都是完全違反客觀的事實而幻想出來的。第三，原始佛教的無常論完全是由倫理的宗教的觀點出發，認爲『諸行無常』是一切有情與無情痛苦的根源，所以結果便走到了完全相反的觀點和努力。就是它不從客觀世界的無常變動中去認識運動變化的真理，反而企圖造成一個有常的不動的世界。例如，它在無常的有爲法之外又建立了所謂『無爲法』，在『色界』（即物質世界）之外建立了『無色界』以及『世間』外的『涅槃』等等許多系統——在這些系統中，一

切都是靜止的，不變的，『有常』的，換句話說就是死的。這證明站在唯心論或宗教的觀點上的辯證法，其最後結果不可避免地要走到相反的玄學主義（絕對靜止主義），偉大的天才的黑格爾尚不能逃出這一命運，則我們對於原始佛教當更不足為奇了。

總而言之，原始佛教的宗教思想的本質，是認定『世間』，即我們的現實的世界，是『苦』的，是不可忍受的。要解除這種不可忍受的痛苦，只有根本脫離這個現實的世界，即謂所『出世間』。這種見解，在本質上可以說與一切其他的宗教，尤其是與基督教毫無差異。至於原始佛教所含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因緣或無常論，本質上說來都只是為着證明和解釋世間及人生如何痛苦以及應當和怎樣解脫之一種說法，這正如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哲學（如經院主義SCHOLASTICISM的哲學）一樣，不過是為宗教服務的一個婢女罷了。我們知道，婢女的本質縱好，如果不從主人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是不能有甚麼獨創的行動，幹出偉大的事業來的。而因果論與辯證法在原始佛教中終於變成無花果葉，其原因也就在於此。

佛教與基督教

我們從佛教的起原的研究上，已明顯地看出了佛教並沒有甚麼神奇奧秘的所在，僅僅是古代印度社會的階級鬭爭，剎帝利所領導的反婆羅門的鬭爭之產物而已。這恰同基督教是古代羅馬社會中被壓迫的各階級（奴隸手工業者破產的農民以及游民無產者等）和被壓迫的民族（如猶太人希臘人馬其頓人……）之反對羅馬統治階級的產物一樣。所不同者是：基督教起初是由於被壓迫的各種民衆從下面發動並秘密地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原始的基督教會——在很長久的期間內，備受了羅馬帝國統治者的壓迫

與摧殘），以反對羅馬的統治者。在他們的組織中會帶有極濃厚的社會主義的色彩，迄至教會勢力發展之後，教會的指導權逐漸由被壓迫者的手裏轉移到了富有階級的手裏，終於由君士坦丁帝定為國教，而變成了羅馬帝國統治者的工具——雖然後來基督教代替了羅馬帝國統治的地位，但已遠非原始基督教的性質了。而佛教則由自始即由於上層階級，刹帝利所發動，領導和扶植，一直到它成熟由阿育王（刹帝利的首領）定為國教時，其性質並無何種改變。但此外，佛教和基督教還有幾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基督教會把當時羅馬一切被壓迫的階級願望，解除痛苦和要求平等的願望，通通綜合起來從地上搬到天上去實現，換句話說，即以未來的天堂來代替現實的人間地獄；而佛教亦同樣把當時印度一切人民的願望（解除輪迴痛苦和平等主義），移到它所發明的『涅槃』中去實現。其次，基督教的教義是當時一般被壓迫者的幻想和古代猶太神話與希臘唯心哲學的混合物，而佛教的教義亦是當時印度一般人民的幻想，古代印度的傳統思想和新起的各派沙門團的主張之折衷主義的產品。最後，基督教，因為是由於當時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之反對他們的共同敵人——羅馬帝國的統治者——而發生，所以在它的教義中始終保持了一些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願望，那就是平等主義和國際主義，同樣，此兩種主義亦包含於佛教教義的精神之中，因為佛教也是站在刹帝利的立場上以代表被壓迫的各階級（和特別被壓迫的民族首陀羅也在內）去反對婆羅門的支配特權而產生的。最後這一點——平等主義和國際主義——不論是表面的或幻想的，但究竟是這兩種偉大的宗教所以在歷史上獲得勝利，終於成為世界的宗教之根本原因。但是這種宗教上的平等主義和國際主義經過了兩千年來的歷史試驗後，其教訓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人類應

該有一種新的平等主義和國際主義來代替它們——應該將天國中的平等主義和國際主義搬到地上來實現啊！

對兩條路綫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

(一) 黨內思想鬥爭的意義

最近我們黨內因對日美戰爭的態度和策略所引起的爭論，已迫使我們對於過去幾年來（即自『八·一三』以來）所發生各種不同的思想見解不得不來加以清算了。因為在這次爭論中，已明顯地表現出每個發言人的思想見解，都是與其過去的思想見解緊相連系着的。換句話說，現在對日美戰爭的各種思想見解，不過是過去各自對抗戰或世界大戰所抱的思想見解之邏輯的發展而已。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每一種錯誤思想都有其客觀的原因和內在的邏輯，如不自覺地及時加以改正，便不可避免地隨着事變的發生發展而發展起來。因此，爲了明確地決定當前的政治任務，爲了糾正某些人的錯誤，爲了教育一般同志，爲了鞏固和發展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都不得不把過去不同的意見放在馬克思主義的光照之下來檢討一番。

但要檢討過去的不同意見，便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會或責難，認爲『這又是有意把問題擴大』，『製造糾紛』、『算舊賬』、甚至是『有意攻擊個人』……其實這不過是一些最庸俗的調和主義的口吻，與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精神——黨內民主討論與自我批評的精神——毫無共同之點。這種庸俗的調和主義精神，在某一長時期內（可以說自抗戰以來直到現在爲止）曾大大地阻礙了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如反對和

* 本文原刊於一九四五年出版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第一卷——反機會主義、教派主義和中派主義——「政治之部」。

避免討論 D S (即陳獨秀) 的意見等)，引起了不少的混亂，乃致使黨無法進行工作。而這次領導機關對於日美戰爭竟作不出一個多數贊同的決議案來，就是最明顯的事例；因此我們在檢討各種錯誤思想之前，對於黨內思想鬥爭的意義，不能不先說幾句。

列寧曾再三指示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內的思想鬥爭，乃是階級鬥爭之最尖銳的反映』。所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對黨內的思想鬥爭從來就採取最莊重而堅決的態度，隨時把無產階級的思想使之與各種錯誤的思想，即反映異階級的各種思想對立起來，清楚地劃分出來，讓黨員和群眾有所分辨，讓他們在行動上有所遵循。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只有在此種對內思想不斷的和長期的鬥爭過程中才能鍛鍊出來，也只有如此才能領導無產階級走上勝利之路。害怕或避免黨內的思想鬥爭，就等於害怕或避免階級鬥爭。反過來說，如果在黨內主張思想調和或妥協，就等於主張階級的調和或妥協。因此，我們必須排斥一切對黨內思想鬥爭的調和態度，而代以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態度，來處理黨內思想分歧的問題。

自然，我們必須承認，在左派反對派各小組組織開始成立的時期當中，乃至統一後的一個時期內，人們常常藉黨內思想鬥爭之名，以行其達到各自小組組織利益和個人野心之實。人們常常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挑撥離間，甚至造謠誣蔑，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批評，因而不但使思想鬥爭毫無結果，反而引起了思想上無窮的混亂，造成了組織上可怕的糾紛！破壞與叛變不斷發生，致使組織日趨削弱而陷於長期的停滯狀態之中。而後來害怕或企圖避免黨內思想鬥爭的調和主義，正是從這種情形下產生出來的。但這正等於『被開水燙了嘴，看見冷水也害怕起來！』這種『調和主義』的態度

，不但絕對不能調和或彌縫黨內思想的分歧，只有把這分歧拖延和醞釀到更廣大更猛烈的爆發點而已。但這種「爆發」常足以引起黨內的最大混亂，甚至招致不必要的分裂出來。固然，我們必須根據過去慘苦的教訓，防止小組主義者和野心家們藉黨內思想鬥爭以遂其私圖，以「攻擊個人」，以製造組織的紛亂或分裂；但這絕不是採取調和主義或「害怕冷水」的態度所能辦得到的。恰好相反，只有採取更嚴肅的更堅決的鬥爭態度，來進行黨內的思想鬥爭，在鬥爭過程中不但要劃分無產階級的思想與其他受異階級影響的思想界線，而且還要無情地揭露和打擊小組主義者及野心家的每一私圖和舉動，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八·一三」事變，第一次給了我們的黨一個實際的嚴重試驗。在這次試驗中，證明我們的黨還能在政治上站得住，還能大體無誤地運用第四國際的路線於我國具體的環境和實際的運動中，但同時也深刻地暴露出了我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教派主義及各式調和主義的面貌。現在我們又站在一個更鉅大的更複雜的事變——日美戰爭——之前將被迫受着第二次更嚴重的試驗。因此，我們已刻不容緩地必須根據過去鬥爭的經驗，尤其是抗戰以來的經驗，將黨內已經暴露出來的機會主義、教派主義及各式調和主義在全黨及無產階級面前清楚地、確切地與第四國際的路線劃分開來，以作為今後鬥爭的基礎。

（二）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痴

在我們黨內，深刻地、尖銳地代表右傾機會主義的是 D S

D S 在他近一年來連續致某些同志的六封信中，已異常明顯而深刻地暴露出了他的一貫的機會主義思想。他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如對戰爭與革命、對蘇聯的態度、及最後對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列寧稱「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無產階級鬥爭中之最主要的問題」——《國家與革命》中文版一九一——一九二頁），把他的機會主義觀點推到了極端，推到了完全離開無產階級，離開馬克思主義，離開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而走到極端庸俗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泥坑中去了。關於這一點，中央臨時委員會對他的兩個決議〔由作者起草的〕已指責得非常之明顯，我在此無須再事重覆。我這裏所要補充的只是：（一）D S 的機會主義並非他的獨創，而僅是歐洲幾十年來機會主義之大規模的有系統的中文翻版；（二）他的機會主義發展程序及其小資產階級民主根源。

D S 否定這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而認為只是「民主及法西斯的戰爭」，並自詡這是由於他『用自己的腦子觀察分析此次戰爭的環境和特質』得出來的。其實這全是謊詞！他不過是抄襲第二國際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斯大林在戰前以『民主陣線對抗法西斯陣線』的爛調而已。而這種『爛調』又完全是抄愛國主義者之民主主義反對德國軍國主義的老調。所以托洛茨基早在《第四國際與戰爭》（這是綜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全部理論和策略以及第一次大戰之全部經驗的總提綱）中就曾加重地指出：『現代列強的戰爭並不表示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衝突，而只是一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爲了民主的商標而擁護「自己的民族帝國主義」，那是否認獨立的政策並使

工人腐化在帝國主義當中』。D S現在爲了『民主商標』而反對在英美及其殖民地（印度）進行失敗主義，進行反本國資產階級的工人革命和反宗主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這還不是亨德曼、格德和樊迪文以及現在的阿德列等人的狹隘愛國主義之中文翻版嗎？

D S之否認蘇聯的無產階級性，並認爲斯大林的官僚獨裁是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專政之邏輯的發展』也不是像他所說的是他『用自己腦子』『觀察分析』出來的。早在八九年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尤其是西安勞拉、蘇瓦林以及掛左翼招牌的烏爾班斯等就已經企圖從『理論』上否認蘇聯的無產階級性了。並且在三年以前，伊斯特曼和路易斯等人又更進一步『證明』斯大林的官僚專政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必然的結果，因而得出了根本否認布爾什維克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等等的結論，以便替帝國主義服務。而我們的D S在這一點上不過是勞拉和伊士特曼等人的應聲蟲罷了。但托洛茨基早在八年前起草的『第四國際與蘇聯』中就已經預先指出過：『如果在「非無產階級性」的藉口對蘇聯表示失望，他就將冒險成爲帝國主義的消極工具』。現在D S事實上已經成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消極工具，且在將來還有成爲牠們的積極工具之可能。

至於D S之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並宣稱這是他『根據蘇聯二十年來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的意見』。然而實際上這『意見』也只是更陳舊的爛調。早在馬克思生存的時代，一切機會主義者（如路易布蘭派、拉塞

爾派)和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派及巴枯寧派)就已經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了。整個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從伯因斯坦到考茨基)之背叛馬克思主義,也是首先從思想上否認或曲解無產階級的專政開始(關於這方面,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已闡述無遺),爲的是以便在實際上去有效的癱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阻止無產階級走上政權。正因爲如此,所以特別鄭重地宣稱:『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是在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當歐洲的歷史使工人階級實際上去解決基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都變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者,民主派……』(《國家與革命》四四頁)。

列寧說這段話時,遠在二十年以前,即還在俄國無產階級尙未走上專政的時候,然而『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就已經先我們的D S而『沉思熟慮了』並『決定』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見』。這裏證明D S『用自己的腦子觀察分析』出來的並沒有甚麼新的東西。D S肆意謾罵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抄襲陳文的八股家』,實際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抄襲」「一切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考茨基主義者」的『陳文的八股家』哩!

但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如此登峯造極的D S的機會主義,是否突如其來的呢?絕不是的。這是牠在長期過程中逐漸發展下來的結果。遠在一九三四年初,當作者與D S爭論國民會議與蘇維埃關係問題的時候,他就已經對蘇維埃表示極端

的輕蔑，主張『只有努力爲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民會議而奮鬥，』『必須號召民衆爲召集國民會議而暴動』。並詆責主張爲蘇維埃而奮鬥而暴動的人是『階段論者』。同時還提出了以「民衆政權」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隨後不久，當他與連根〔即王凡西〕同志等討論民主問題時，他又把「民主主義」描寫成爲超歷史超階級的。並且於同時已開始否認蘇聯之無產階級性。

但在此時以前，D S的機會主義主要還只限於理論上的表現。迄到『八·一三』事變發生後，他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就立刻表現到實際問題、實際的策略上來了。他在承認（實際是誇大）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抗戰的進步意義這一前提下，便幾乎全忘記了這個黨所進行的抗戰政策所具有之完全反動的作用，及其與日帝妥協的一切企圖，因而他便簡單地號召民衆『要相信政府抗戰決心』，『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並稱此爲『我們勝利最大保障』。同時還主張『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戰之最高統率權……』這還不等於號召民衆去『相信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是革命的，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承認國民黨對於抗戰的最高領導權，並服從其軍事獨裁』嗎？！

事情不只於此。D S在號召民衆及各黨派去承認國民黨的抗戰最高領導權和其軍事獨裁之後，他更進一步說：『社會主義在中國之經濟的成熟，自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只有在相當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沒有相當工業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自然談不到政治成熟……』。因此他認爲『資本主義在中國還

有發展之餘地」，他叫青年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這就等於說，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尚未成熟』，而將來的第三次革命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即等待『社會主義經濟『成熟』之後，才有勝利之可能。但這與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所說的：『在殖民地國家內，由於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和在數量上比較軟弱的無產階級，能夠在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比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在純粹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早些取得政權』的思想有甚麼共同之點呢?! 這裏很明顯地證明我們的D S已完全背叛不斷革命論而墮落到斯特盧威主義！墮落到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階段論』中去了。

此外，D S在抗戰期中對於我們的政綱口號（如八小時工作制及沒收土地歸農民等）之加以修改和縮小，對於斯大林黨之採取調和態度，否認他自己是托派以及無視黨的組織等等，這一切都在在暴露了他的機會主義是有機的和有系統的。

現在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說，D S今天對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之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思想，乃是他過去對於國民會議與蘇維埃關係的態度，對於蘇聯的態度，對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對於抗戰的政策，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估計等等：這一連串的機會主義思想之邏輯的發展。我們還可以預言：D S對於日美戰爭的態度，一定是站在國民黨方面擁護『民主』的美國的。如果蘇聯將來捲入大戰漩渦，他也一定會站到反蘇聯的立場上，最後，D S將轉到反動的小資產階級陣營裏去進行反第四國際的鬥爭。

但D S這種機會主義的發生和發展，是偶然的嗎？這不但有他個人的歷史和社會根源，而且還有其他國內的和國際

的環境。大家知道，D S 是出身於破落的官僚貴族家庭，由這種家庭出身的人，在時代的環境壓迫和推動之下，有可能轉變為民主主義的急先鋒，法蘭西的福祿特爾及米拉波等人便是如此。D S 之以急進民主主義者的資格起而領導『五四』運動，正好似福祿特爾之提倡『啓蒙運動』和米拉波之領導法蘭西大革命運動初期。D S 因為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引誘和本國工人運動勃興的推動之下，便由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啓蒙運動者一躍而踏進無產階級運動的隊伍中，並為其領袖。這種人是很難理解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際的。所以他雖參加這一運動達十餘年之久，但他從未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方法、理論和策略。所以在中國第二次革命經過悲慘的失敗，經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長期壓迫，經過共產黨的腐化與惡化，經過左派反對派運動的無數挫折；同時再加上蘇聯之愈來愈墮落，斯大林的官僚獨裁之愈來愈橫暴，世界革命運動之不斷失敗，法西斯主義在意、德、西之接連勝利……這一切匯合起來，便使得小資產階級或破落官僚出身的急進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家完全陷入到了悲觀失望的死巷中。這種人既對於蘇聯，對本國及世界革命，對於自己的前途完全失望，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發生恐怖，於是自然而然要乾脆地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離開馬克思主義而退回到原來的小資產者的民主主義立場上，企圖在保存殘存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秩序之下以終其餘生。歐洲和美國的維塞它維區、伊斯特曼等人是如此，我們的D S 也是如此。

D S 既已退回到了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立場，於是他便『用』他那超時代的超階級的民主主義（這正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特徵）的『腦子』來『觀察分析』一切。於

是當他『觀察』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即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時，便只喜歡民主的國民會議而討厭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當他『觀察』蘇聯時，便只看到斯大林的官僚專政，而看不到那種仍然存在着的財產公有化的無產階級內容；當他『觀察』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時，便只看到其反抗日帝的民族民主的進步性，而看不到其所進行的抗戰政策之資產階級的反動性；當他『觀察』世界大戰時，便只看到民主與法西斯的對抗，而看不到雙方的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當他『觀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便只看到民主內容，而看不見其對無產階級和一般民衆之資產階級的專政性。總而言之，我們的D S帶着小資產者的民主染色鏡，除了他所能認識的「民主顏色」外，甚麼也看不見了，於是便完完全全成了一個極可厭的民主白痴！

當D S以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領導『五四』運動時，他是進步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在今天，在經過二次革命、經過十餘年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猛烈鬥爭之後，而D S竟從無產階級退回到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陣營，這就表示他已變成爲澈頭澈尾的反動者了。因此我們以爲D S在今後中國的革命運動中除了起反革命的作用外，再不能起別的作用。因此，我們今天的責任，首先就必須與D S之系統的頑強的機會主義思想作無情的鬥爭，務必肅清他在我們隊伍中一切影響，然後進一步把牠公開於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衆之前，以毀滅牠的欺騙作用。

(三) 長了鬍子的幼稚病

在我們組織內與DS站在另一極端的是意因〔即鄭超麟〕同志的教派主義。意因同志的教派主義思想在他對抗戰所堅持的失敗主義中已是暴露無餘。他的基本立場是以『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對抗『民族獨立運動』（見〈討論大綱逐條批評〉），因而根本否認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因而在中日戰爭中主張對領導抗戰的國民黨政府採取『失敗主義』的立場。

但意因同志此種極端教派主義的思想，也像DS的機會主義一樣，並不是甚麼新發明，只是歐洲最近幾十年來的教派主義之最壞的譯本。從盧森堡（這裏應聲明，盧森堡除在民族問題及黨的組織問題上犯了較嚴重的錯誤外，在其他各方面都是最卓越的革命家），到拉狄克和畢達可夫等人就早已用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觀點進行了反『民族自決』、『民族獨立運動』的鬥爭。他們的論點正同我們的意因一樣，不是說『民族自決』是『幻想』或『籠統』（盧森堡）；就是說牠『已經不存在』或『開倒車』（拉狄克）；或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相矛盾（畢達可夫——他稱民族自決與無產階級獨立革命為『二元論』）等等。但列寧却斥這些人的思想是在與機會主義者合作而替帝國主義者服務，因而他寫了大批文件無情地攻擊了這些人。（請讀者參考〈列寧選集〉中文本第七集二九九頁至三五四頁及第九集一七三至二二八頁）。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就是幾個大列強對於世界上各民族

施行變本加厲的壓迫，是牠們爲着擴張並鞏固對各民族的壓迫而互相戰爭的時代……因此，在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述之）的政綱內，正是應當提出各民族之間分爲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區分作爲中心點，這種區分組成帝國主義之實質。而社會國家主義者及考茨基却假仁假義置之不談。從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或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區分是不重要的，可是從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的觀點來看，他恰是重要的。而從這種區分中就應得出我們對「民族自決權」所作的澈底民主的、革命的、與立刻爭取社會主義的總任務相適應的定義。列寧由這種「定義」出發，便主張『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應『堅持着對民族自決權的真正承認。』而『被壓迫的社會民主黨人，應使被壓迫民族的工人統一而融合起來。』（《列寧選集》第九卷一九三至一九四頁）所以列寧批評拉狄克說：『他爲着社會主義革命而藐視地拋棄民主主義方面徹底革命的政綱，是不正確的。……如果把社會主義革命與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拿來同民主問題之一——在這裏就是民族問題——對立起來，那是荒謬的，我們應當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與一切對民主要求（共和國，民警，官吏由人民選舉，男女平權，民族自決等等）的革命政綱及策略聯結起來』（同上一九二頁）。而後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提出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綱要》，正是根據上述的基本思想而來的。而我們的意因，却直到現在還在堅持着拉狄克等人的『荒謬立場』哩！

不錯，意因同志已感到他的立場與列寧的太相矛盾，於是他也同 D S 感到他對於民主主義的立場與列托太相矛盾而批評列托（說他們不懂『資產階級民主的內容』）一樣，也

就大肆批評列寧來，說甚麼『列寧關於殖民地的部份……沒有經驗可為依據』。列寧起草此文件（指《民族殖民地問題綱要》——述之）之前，沒有一個殖民地運動曾經引起馬克思主義者去深刻分析的』等等。他甚至於說：『……而後來親身參與殖民地大事變的人們（自然連托洛茨基也指在內——述之）又不能作這種考驗』。所以結論是全靠他來『考驗這個問題』。這是何等的盲目而狂妄啊！

其實，列寧對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理論與策略，尤其是他所起草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綱要》，是經過了長期的精細研究，和『深刻分析』，並曾經與許多人爭辯過，才得出來的最後結論。他一方面，完全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如馬克思之反普魯東主義者以社會主義革命去對抗民族問題，堅持對愛爾蘭的民族分立權，以及贊助波蘭的民族獨立運動等——這些都是列寧曾經加以分析和研究過的。另一方面，列寧曾研究過歐洲的全部民族運動史和當時一切落後國家（如土耳其，中國等）的民族運動的經驗，尤其是十月革命當中及其以後的一切民族運動的經驗，更是列寧所親身參加並曾『深刻分析』過的（這有列寧所寫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全部文件為憑）。事實上，十月革命的本身及其以後一切民族運動的經驗，都證明了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主張完全是正確的，同時也就是證明了普魯東主義者、盧森堡、拉狄克和畢達可夫等人的主張是荒謬的。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在民族問題上完全站在列寧一方面，他並不斷聲明：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策略（列寧寫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綱要》在內），完全被第四國際繼承下來了，最後他並且把牠寫在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之中。我們現在請意因同志回答一個問題：托洛茨基之完全同意列寧對於民族問

題的主張，並把牠寫在第四國際的綱領之中，是否盲從呢？是否他對於「親身參與的殖民地大事變」沒有「能做」「考驗」呢？

而且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主要也就是建立在落後國家（俄國在內）的革命經驗和對民族問題的正確理解之上。不斷革命論告訴我們，落後國家，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在民族民主運動的鬥爭中較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早些走上政權。反過來說，假如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沒有民族民主的任務急待解決，不領導民族民主的廣大鬥爭，便根本談不到奪取政權問題。如果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對立起來，那不是等於根本否認了「不斷革命論」，而變成爲「階段論」的俘虜嗎？！〔註〕

意因同志說：「一個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辭，必須（或假定）這個革命成功之後能成立一個民族的國家、能獨立發展民族的經濟（即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段話充分證明，不斷革命論對於意因還是一部未曾打開的書。因爲不斷革命論的基本思想正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之成功，不在「成立一個民族的獨立國家」以「獨立發展民族的，即資本主義的經濟」，而是要「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建設」。正因爲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取得政權，建立專政，一方面解決民族民主的任務，另一方面使生產機關國有化——這正是史特盧威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即一切階段論者所絕對不能了解的，同時也是托洛

茨基所千百次解釋過的。不料十餘年來自稱爲不斷革命論的擁護者的意因同志，還說出這種根本違反不斷革命論的話來，這迫得我們不得不向意因重新介紹：『還是請你把不斷革命翻出來仔細讀一遍！』

所以意因同志在理論上根本否認民族問題的存在，一般地否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這就等於根本離開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立場，離開了不斷革命論（同時也就是否認了我們過渡綱領中的『對外民族獨立』與『國內民族自決』），而在實際上便不免地要變成爲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自然是站在『左的』立場下，但正因爲如此，危險性也更大）。把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送給資產階級，以便癱瘓和出賣這一運動；而在另一方面，又必然要變成爲本國資產階級對國內其他弱小民族（如蒙、回、藏等）的壓迫政策之辯護士。於是所謂『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恰好就變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以阻止無產階級走上政權的鬥爭』。不管意因同志的主觀如何好心好意，如把他的理論徹底運用到實際上去，那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果來。這正是『用好意來敷設地獄』。而意因同志對於抗戰的主張，正是他的理論之第一次試驗哩！

說到這裏，也許意因同志要跳起來說，你完全忽視了我對於中國第二次革命的經驗之『深刻分析』！我因爲篇幅所限，無法把意因同志分析第二次革命經驗的那篇糊塗賬通通指責出來。但我可以簡單答覆幾句：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並不在於共產黨參加了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連北伐戰爭在內），而在於牠聽從斯大林的命令而把這一運動的領導權完全奉送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不自覺地作了牠欺騙民衆的工具，因而阻止了無產階級領導民衆（特別是農民），去進

行奪取政權的鬥爭。換句話說，第二次革命的失敗，並非證明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綱要》是錯誤的，而恰好從反面證明了斯大林的政策是完全違反了列寧的《綱要》。但這正是意因同志所完全不了解的。托洛茨基說：『一個錯誤的政策不僅妨害現時的工作，而且還迫使人們用一種虛偽的見解來解釋他自己的過去』，這裏又得到了一次證明！

至於意因同志在中日戰爭中主張『失敗主義』所持的一切理由和論證（如說抗戰無進步性等），我不想浪費筆墨來一一反駁，只把托洛茨基駁斥賽萊爾和愛佛勒（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文件抄幾段下來就夠了：

『在我給資產階級刊物上所發表的意見裏面，我曾說，所有中國工人組織的任務是自動參加這一戰爭的前綫以反抗日本，但一點也不能放棄工人組織的綱領及其獨立的行動。但是愛佛勒派却寫着說：這是「社會愛國主義」！這是在蔣介石面前投降！這是拋棄了階級鬥爭的原則！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布爾什維克派曾經主張革命的失敗主義。西班牙戰爭和中日戰爭一樣，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立場同樣是反對中國的戰爭。對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唯一的出路是：以獨立的力量反對雙方軍隊，以同樣的方法反對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這幾句是抄自一九三七年愛佛勒派的文件中的（幾乎令人疑心是抄自我們意因同志的文件中的——述之）。這已夠使我們完全肯定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叛徒和蠢才。其愚蠢和叛逆，程度正是相等。

『我們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把各種戰爭放在同一的平面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支持愛爾蘭反對大不列顛的革命戰

爭、支持波蘭反對沙皇的革命戰爭，縱令在這兩個國家的戰爭中其首領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甚至是反動的天主教徒的環境中，有時還是封建階級……。

「列寧在某些著作裏曾指出區別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以及形成人類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重大的必要性。只一般地說「革命的失敗主義」，而不把壓迫人的國家與被壓迫人的國家加以區別，這是給布爾什維克製造的可憐的諷刺畫，並拿這諷刺畫去替帝國主義服務。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日本在我們眼前是要將她變為殖民地的國家的。所以，日本方面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反動的；中國方面的戰爭則是求解放的、進步的。

「但是蔣介石呢？我們對於他，對於他的黨，以及所有中國的統治階級，沒有存一絲一毫的幻想，正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愛爾蘭和波蘭的統治階級不存在一絲一毫幻想一樣。蔣介石是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劊子手，我們一點也用不着別個來從新提起。不過今天。不管他有怎樣壞的意向，他却總算是為中國的獨立，發動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明天他會有新的叛變，這是可能的，有真實性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今天他總算是在從事戰爭。要是不參加這一戰爭，那將僅僅成為卑怯的，或是道地的蠢才。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因為不幸他在這一獨立戰爭中握着指揮權——參加軍事的戰爭，同時便是準備以政治的力量推翻蔣介石。這才是唯一革命的政治路線。愛佛勒派却用他們的「階級鬥爭」的路綫以反對在他們認為是「社會愛國主義」的路綫，殊不知列寧一生便是打擊着這種空言的

反對派。爲了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利益，我們必須在反帝的民族與中國的戰爭中援助被壓迫的民衆。要是直到現在，而世界大戰後幾乎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十月革命已經過了二十年，還有人不懂得這種路綫，我們應該把他看作內部最壞的敵人，堅決地從革命的先鋒隊中驅逐出去。愛佛勒派及其一類的人，正是應當如此處置！

我幾乎把托洛茨基的全個文件都抄了下來，雖不免多佔篇幅，但拿來駁斥意因同志的「失敗主義」的根據，也就覺得再好沒有了。真所謂「針針見血」，假如你把賽萊爾和愛佛勒的名字都換成意因，誰敢說上面所抄的每一句話不是針鋒相對地在駁斥意因同志，教訓意因同志呢？！

不錯，意因同志對此也預備好了一個盾牌，說「托洛茨基同志住在墨西哥，中國沒有人向他做誠誠實實詳詳細細的報告等等」。然而他完全忘記了：托洛茨基手中握有最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最豐富的世界革命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對於此等有關於基本戰略的重大事變的問題，即沒有任何詳細的報告，他單只根據他的理論和經驗也可以從遠處完全正確地決定的。意因同志對於托洛茨基同志的話，不但證明他絲毫不懂得托同志，而且是大大地出奇地侮辱了他！這裏又一次告訴我們，人們爲了辯護自己的錯誤意見，甚至不惜出奇地侮辱他平生所敬仰的導師！

最近，意因同志感到日美戰爭快將來臨，於是急忙地又把他在中日戰爭中所堅持的同一失敗主義搬運到了「日美戰爭中」並大吹大擂。假如中國是日本或美國，是高麗或菲律賓，這倒是正確的。但意因同志這一次的「失敗主義」，却並非要使日本政府或美國政府「失敗」，而依然是要使國民

黨政府『失敗』，要『分化和破壞中國正規軍隊』。可是他完全忘記了，中國當前的主要敵人還是日帝；『中國正規軍隊』還正在抵抗這個當前的主要敵人，國民黨政府也還沒有公開放棄抵抗。如果『從今起』就要『分化和破壞中國正規軍隊』，要使國民政府失敗，這不依然是等於同汪派分工合作，替日帝服務嗎？！

由此我們看到，在對中日戰爭問題以及對其他某些問題的觀點上，我們的意因同志却恰好與 DS 站在兩個極端，並且都開始批評到列寧和托洛茨基了。如果我們稱 DS 爲『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則我們的意因同志就是害着極沉重的『教派主義幼稚病』了。並且其病源都是出於同一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悲觀失望的情緒。不過 DS 是乾脆地離開了階級鬥爭，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去了；而意因同志却還死口抓住『赤裸裸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尤其是『失敗主義』，以此作爲他的『象牙之塔』來迴避現實，來安慰自己坐在亭子間裏清談清談。但我們應當警告意因同志的是：他的最心愛的『失敗主義』，如果仍同從前一樣，僅限於在茶餘酒後當作清談之資，或者無多大妨礙；但若要把它放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去向群眾宣傳，那就未免太危險，不但他自己準『碰破頭皮』，而且還要使我們的旗幟蒙上難以洗滌的污點。

因此，我們爲了保護我們的『旗幟』，並保護意因的『頭皮』起見，不得不堅持地要求意因同志嚴重地重新考慮他的『失敗主義』的立場，並及時改正過來。年輕的小夥子害幼稚病，還值得同情，但像意因同志這種長了鬚子，甚至禿了頭的人，還要頑固地害着『幼稚病』，就未免太令人生厭

了。但我們知道意因同志是個誠實可愛的人。大家必得幫忙他醫好這個毛病，我這個對於他的『批評』就算作第一個藥方奉送給他吧，藥味或者未免苦些，但對於他的毛病我相信是很有益處的。

(四) 調和主義的混亂與危險

站在我們與 DS 及我們與意因之間搖擺着的是各式的調和主義傾向，現在的主要代表便是室川和連根兩同志。

調和主義的主要特點是：沒有或不能有堅定的一貫的政治立場，往往搖擺於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或教條主義之間。當牠受到右方的壓力時，就罵馬克思主義為教條主義；當牠受到『左』方的影響時，又誣同一的馬克思主義為機會主義。調和主義之另一重要特點，則是思想上的混亂、矛盾、動搖、易變、喜新厭舊（托同志稱之為『印象主義』）。調和主義者對於機會主義者和教派主義者常採取友好、寬容及退讓的態度，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却常以輕蔑、嫌惡甚或以仇視的態度出之。

讓我們先就室川同志所一貫地表現的調和主義來略加探討吧。當『八·一三』抗戰開始時，室川一方面贊成參加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但同時又堅持繼續宣傳『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為此問題，作者曾與之作過兩次爭論，但他仍頑強地堅持己見，後來僅因為多數人所壓迫才勉強屈服）。當十一月上海代表會議通過我們對抗戰的政治決議案時，室川在 DS 的影響之下又開始轉到另一方向，他一方對抗戰前途作了一些空想的樂觀的估計，甚至說『即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抗戰亦有勝利之可能，土耳其就是先例』（在某

次臨委會議上說的)，因此他拚命攻擊我們反國民黨妥協傾向的宣傳（見他以「紀它」署名的《論中日戰爭的前途與我們的鬥爭道路》一文）；同時他對於DS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大事袒護，並阻止了內部同志對它的批評。當武漢和廣州失陷後（即當室川從重慶見過DS回來後），他又從對抗戰的樂觀主義走到了另一極端，而作出了「中國甚而可以說亡了國」的結論。因此，他攻擊我們批評「國共合作」「及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虛偽性、批評國民黨抗戰政策之反動性、批評斯大林黨的投降政策、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及「沒收土地歸貧農」等等，說這一切都是「教派態度」，是「死守原則」「不看事實」，是「有方向却無道路」等等。於是他教訓我們應當「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領導力量這一事實」，應當放棄反國民黨妥協的宣傳、應當把「八小時工作制」改為「減低工時」「增加工資」……把「沒收土地歸貧農」改為「反對苛什」、「反對一切分配不均的戰稅」……總而言之，他要求我們根本放棄我們《十一月決議案》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而按照DS所提出來的機會主義路線，即在「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之下去用國共合作，形成民族統一陣綫（因為「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以對抗日帝（請參考室川的《應合新局勢剷除教派觀念》一文）；他同時並對DS主張大加讚美，說他是「實際的政治家」，反對我們把DS的主張報告國際。當我們不採取他的「建議」時，他便以威脅負責者和怠工相要挾。

現在室川的思想已走得更遠了，這從他最近所發表的《現局勢，其前途與我們的鬥爭道路》一文中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他一方面斷定抗戰已「失去其進步性」（他認為抗戰的進步性不是建基於國民黨抵抗日帝的軍事行動上，而是要視

「民衆從抗戰活動中」，「有無抬頭的可能」爲斷，這與連根同志之以國民黨依賴美帝的程度來推斷變質的謬誤思想屬於同一範疇），但同時又說「抗日運動仍將是有力的推動力」；他一面堅持「民衆只有擺脫了牠（國民黨——述之）的剝削才能抗戰」，但却又說：「我們不直接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在室川文章中像這類的混雜和矛盾，真有如亞先的馬廐，我們爲篇幅所限，實在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來對他執行赫克列斯區的「清理」工作。所以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其最基本的傾向來。

室川在那篇「綱領式」的文章中用一種極庸俗的新聞記者的觀點敘述了抗戰以來的「三大轉變」之後，便得出結論說：我們的政策「必須加以澈底修正和改變了」。但怎樣「澈底修正和改變」呢？那就是：「圍繞物價問題與鄉村治安問題作全力鬥爭」（重點是我所加——述之）。他最後並加重地聲明：「解決物價問題與鄉村治安問題應當爲目前革命鬥爭之起點，及首要任務」。這裏異常明顯地證明，擺在我們面前極端重要的、並要求我們立刻解答的抗戰問題和日美戰爭問題，已被室川同志完全忽略了。事實上，他對於這兩個問題都沒有提出任何積極的主張和口號來。原來他所謂「澈底修正和改變」我們的「政策」的，不過是以「物價問題與鄉村治安問題」來代替「抗戰問題與日美戰爭問題」而已。

「解決物價問題」，即臨時地部份地解決民衆當前生活痛苦的問題，自屬重要；但欲以此種臨時性的部份性的「經濟問題」來代替全般的基本的「政治問題」，並聲稱爲之「作全力鬥爭」，這還不是極端庸俗的經濟主義是甚麼？！至

於說到『解決鄉村治安問題』，並認為這是『首要任務』、且欲爲之『作全力鬥爭』。唉，真令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人們何以墮落到如此程度！試問：甚麼叫做『鄉村治安問題』？土匪騷亂嗎？飢民搶食嗎？農民抗租稅或暴動嗎？……在一切資本家、地主、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總而言之，在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看來，這些都是妨害或擾亂治安的，那是有關『鄉村治安的問題』（所謂鄉村治安問題，只能作如是觀）。剝削者和壓迫者『解決』這種問題是簡單而明瞭的，憲兵與警察，監禁與屠殺。請問我們的室川：你又怎樣去『解決』呢？！怎樣爲之『作全力鬥爭』呢？去當憲兵和警察吧！去充獄卒和劊子手吧！！

從調和主義或折衷主義到『經濟主義』，最後到『秩序主義』！這便是我們室川的全部思想之發展過程！然而他還敢於公然罵我們爲『愚蠢的機會主義』（他以前罵我們爲『愚蠢的教派主義』），我實在不知道用甚麼名字來回答他！

最後應順便聲明的是：室川之罵我們爲『愚蠢的機會主義』，是根據於『不論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抗戰是否失去其進步性，然在目前，並在今後相當時期內，繼續抗戰仍是我們的最主要的政治任務』。其實我在《日美戰爭與我們的態度和任務》的《提綱》中就已指明：在目前，甚至今後相當時期內，抗戰並未變質，即並未『失去其進步性』，且以此駁斥連根。而現在室川竟自行捏造一段與我的見解完全相反的話來攻擊我；這裏又證明：在政治上墮落的人對於自己的論敵是『不擇手段』的！

至於連根同志的調和主義傾向及其特別表現在日美戰爭問題上的思想，因爲已有耀如〔即劉家良〕同志對他的詳細

批評，我爲避免重複起見，只作一些必須的補充而已。

我首先應當指出，連根同志這次在日美戰爭問題上所表現的調和主義傾向，並不是偶然的，這乃是他過去的調和主義傾向之繼續和發展。當他從漢口回來的一個時期內，一方在原則上同意我們的路綫並對 DS 表示不滿；但他同時總覺得我們「太機械」、「太原則」，沒有把原則具體化，沒有能適應群眾的要求等等——在這些方面，他差不多同室川一致站在 DS 的影響之下反對我們。尤其當他看到我們不懈地頑強地批評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斯大林黨〔指中國共產黨〕的投降政策時，他認爲這會使群眾發生反感，有一次甚至於說，他自己看了《鬥爭》就發生反感。他對於「沒收土地歸農民」的口號，也認爲拿來作直接的公開的宣傳不妥，而應首先提出「沒收漢奸的土地」的口號等。此外他對於組織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也是帶取消主義的（如主張停止出機關報）。但那時連根同志的調和主義傾向表現得最露骨的，是他對於 DS 的態度及對於黨內思想鬥爭的態度。他對於 DS 的思想雖然比別人知道得最清楚（因他曾與 DS 相處若干時），並已懷抱不滿。但他自己却不願（甚至不願別人）對後者公開而嚴正的批評。因此，他對於黨內的思想鬥爭便採取避免的甚至嫌惡的態度（如他不注意內部爭論文件、不願參加討論，就是實例），總而言之，在那個時期內，連根同志的思想，無論在政治問題上或組織問題上，都是站在我們與 DS 之間搖擺着，即多少是在 DS 的影響之下，企圖把我們的路綫去遷就 DS 的某些主張。

隨後，連根同志逐漸地並相當積極地參加了黨內工作，同時 DS 的機會主義思想已愈來愈趨明朗而尖稅化，於是他最後脫離了 DS 的影響。但同時意因同志的影響又開始在連

根同志的頭腦中產生作用（當然主要還是由於客觀的原因，此層往後再說），因而推動他急劇地向極左方盤旋。他的《日美戰爭與中國抗戰》及《日美戰爭與我們的態度的再確定》兩文，就是他向極左盤旋的具體表現。前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失敗主義」，而後一文的重要發明是「抗戰變質論」，但兩者都是有機地聯繫着的。

關於連根同志的「失敗主義」，作者在《日美戰爭與我們的態度和任務》的《提綱草案》中已有簡明的批評，往後批評今同志時還要略事補充、故此地不贅。至於他的「抗戰變質論」，經過了耀如同志的精細批評後，我認爲他已被「駁得體無完膚」了。因此我在這兒所要指出的只限於以下幾點：（一）連根同志一方面說：「不管中國民衆願與不願，而他們之必須成爲帝國主義進行大屠殺的犧牲者，總是確定的命運了。」但同時又說：「中國無產階級……在國內國外的事變影響之下，必然要重新站立起來，……它將使中國的民族革命生長成爲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使中國不但成爲一個獨立國家，而且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個自由單位。」前者是一種宿命的客觀的悲觀主義，而後者則是一種同樣宿命的主觀的樂觀主義。但兩者都與根據客觀分析和主觀戰鬥的馬克思主義很少共同的地方。（二）連根同志在將日本與美國、蔣介石與汪精衛完全放在同一平面上之後，即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力量與領導權（事實上是把領導讓給國民黨），強調「我們的目的是在於分化軍隊，使抗日戰爭的指揮權操在兵士手裏」……這裏表示他以前所咀咒的「太機械」，「太原則」，沒有把原則具體化，沒有能適應群眾的要求，會使群眾發生反感……這一切教派態度，現在竟由他本人從極左方親自導演出來了。（三）連根同志在「我們的任務與策略」一項中，竟沒有

一句話提到抗戰的問題。而以「工人與一切被剝削者的經濟鬥爭」排列在第一位，這又表示他同室川的經濟主義有某種聯繫。四連因同志在日美戰爭問題上所表現之稀有的混亂與矛盾（如他既一方斷定抗戰已經變質，同時又不敢否認抗戰的重要性等等），這乃是他在意因的影響與我們的批評壓力之下狼狽地反映出來的結果。這正如他過去搖擺於我們與DS之間一樣，今天則搖擺於我們與意因同志之間，企圖把我們的路綫去遷就意因的主張。

連根同志的調和主義，比起室川同志的來自然要「高明些」，有「理論些」，「左些」，特別是「新鮮些」（印象主義的新鮮），但正因為如此也就更危險些。其主要的危險即在於牠會使每個動搖的同志，不大覺悟的工人看了有如「墮入五里雲霧」之中，弄得頭昏腦脹而迷失方向！使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與教派主義之間「進退維谷」！托同志批評夏克曼時曾說：「事實的每一次新轉變都出乎這位經驗主義——印象主義者的意外，迫得忘記自己昨天所寫的東西，而且在新的思想未浮現於他的腦際之前，便生出瘋狂的對新公式的渴望」——這段話如果借用來放在連根同志的名字下，我認為是很適當的。

調和主義也同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一樣，有着一定的社會根源，即反映着那些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情緒。我們試回憶一下吧：當抗日戰爭初期，一切小資產階級及其黨派，特別是斯大林黨，對於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發生幻想，對於馬克思主義（托派）的主張和批評發生嫌厭時，我們的DS便即在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壓力之下愈加向右盤旋，

否認自己爲「托派」，並公開攻擊我們。我們的室川則跟在DS之後加我們以教派的頭銜。而我們的連根呢，不是說我們「太機械」或「太原則」，就是說他看了我們寫的東西起「反感」。但當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不斷趨於失敗，陷於絕路，對斯大林黨的壓迫日趨加緊和露骨，並公開準備將抗戰出賣給美國時，於是斯大林黨開始從「左」方回擊國民黨及其主人英美帝國主義，我們的DS則從思想上乾脆地脫離了「托派」，投降了民主的帝國主義，我們的室川則除了走向經濟主義和秩序主義外，同時還罵我們爲「愚蠢的機會主義」。至於我們的連根同志呢，則拚命向極左方移動，以便叫人們忘記他的昨日，並準備從「左」方來批評我們。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還不是鐵一般的事實嗎？

所以，我們要澈底劃清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中間的政治面貌，對於各式各樣的調和主義便不得不加以無情的批評。而我們爲了挽救調和主義或帶有調和主義傾向的人，不致走得太遠，不致於最後墮落成爲純粹的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只有同他們進行嚴厲的鬥爭才有可能。因爲任何調和主義如果不回復到馬克思主義，最後的墮落是不可避免的。

(五) 正確的前提與謬誤的結論

在意因同志的極端教派主義之外，還有一個「小教派」從南方的沃壤裏（一個缺乏革命傳統的青年學生佔多數的組織裏）生長出來，並多少有系統地發展起來。這個教派的現在代表就是今同志。當作者去年十月底在華南臨委會議上第

一次提出對日美戰爭的態度時，今同志即以「失敗主義」相對抗。當時雖經作者的駁斥，今同志沒有能堅持自己的主張，並同意了我在《紅星》第一期上所發表的《我們對於迫近的日美戰爭的態度》一文的見解。但當他見到連根同志的《日美戰爭與中國抗戰》的文章時，即舊態復萌，又起而堅持並發展他原來的「失敗主義」了。因此使整個的華南臨委及大多數同志都陷入「失敗主義」的泥坑之中。

今同志的基本見解是：日美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日美戰爭一爆發，資產階級必然立即將抗日的戰爭變作美國對日戰爭的一部份……」（這正是我們《紅星》報上所指出過的）於是得出結論說：「在這種具體的（?!）情形下，我們今天的兩個策略——暫時收起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打倒國民黨——便不適用了。我們這時應該把美國與日本並列起來，把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平列起來，同時打倒」（重點是我加的——述之）。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前提與謬誤的結論」之一個典型的例子！

首先我要問：所謂「具體的情形」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現時的整個中國局勢，即日帝幾年來對華侵略所造成的「具體情形」（如日帝侵佔了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主要的工商業城市、交通網及全部海岸等等），是否因為「日美戰爭一爆發」，便一下改變了呢？換句話說，是否因為日美戰爭一開火，日帝在我國所佔有的全部地位即一下被抹去了呢？假如今同志不迷信魔術，不用純粹的抽象公式去抹殺具體事實，而用一點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具體情形」及可能的變化趨勢，則縱令「日美戰爭一爆發」，甚至「爆發」了相當時

期，日帝幾年來所造成的『具體情形』還是不會一下子就根本改變的。不錯，戰爭是最容易改變『具體情形』的。但要改變這樣的『具體情形』也得經過相當的時間，尤其要經過幾場惡戰。我們固然要異常警覺地時時注意並根據『具體情形』的變化及時改變我們的策略，但尤其要緊的是在『具體情形』未改變前，我們必須抓住牠以規定我們的『具體策略和口號』去領導群眾行動。否則，我們將變成毫不負責任的清談家。因為任何正確的『戰略』，如不經過正確的『策略』（這策略即根據於『具體情形』的分析和了解）是無法實現的。

今同志口裏雖說甚麼『具體情形』，但他最大的毛病正在於只在抽象的公式內翻筋斗，絲毫不願或不能去分析一下『具體情形』。假如他能認真地將日帝幾年來侵略我國所造成的『具體情形』及這一情形在將來日美戰爭爆發時可能引起的變化，略加分析，我想他絕不至如此輕率地作出他那種『失敗主義』的結論來。

其次，把日本與美國，汪政府與蔣政府並列和平列起來，『同時打倒』，勇敢是勇敢，但也是太欠『具體』的。在原則上，在基本的戰略上看來，日與美、汪與蔣，不用說，同樣是我們無產階級不可調和的死敵，我們要準備通通打倒牠們。但在具體的策略和行動上，我們却要分個輕重緩急，即根據『具體情形』分別今天誰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誰是我們次要的敵人。如不懂得此種『分別』，在理論上是盲目，在實際行動上則等於混亂自己的作戰目標，結果一定是忽視或放過當前的主要敵人，也就是客觀上幫助這個主要敵人。當列寧從無產階級革命一般的觀點上，從基本的戰略上，去

觀察哥洛尼諾夫與克倫斯基時，他雖用不着給他們加以「分別」，但當前者舉行暴動時，他就不僅要分別前者是當前的主要敵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與後者「共同行動」去打擊前者。我們試問今同志：在將來日美戰爭爆發時，如果「具體情形」並未根本改變（即抗戰並未變質）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將列寧對待哥洛尼諾夫和克倫斯基的態度拿來對待汪精衛和蔣介石？我自己的答覆是肯定的。列寧教訓荷蘭「左派共產主義者」時曾說過：「毀謗一種新政治思想（不僅是政治的）最正確的方法便是表面上擁護牠，而實際上把牠弄得荒誕不經」。我們的今同志（連根同志也在內）之對於「失敗主義」，恰好是「把牠弄成荒誕不經」！

至於今同志此種「荒誕不經」的教派思想，在華南組織內部有深遠之淵源，是很明顯的。所以此次大戰開始時，華南組織以已經脫黨的寒君為代表，就已認為帝國主義戰爭既經發生，則我們對於抗戰的政策就應加以大大的修改了。主要的「修改」是：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代替「打倒日帝」。這種思想，在香港市委對大戰所發表的宣言上會明白地公開地表現了出來。並同時主張在香港採取「失敗主義」（請參考《校內生活》對華南問題的專輯）。現在今同志主張在日美戰爭一開始時即以「失敗主義」代替我們現在的路綫，主張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這還不是在繼承寒君過去的思想嗎？有趣的是，當我的文章在《紅星》報上剛發表時，曾經幹過最污濁的投機勾當並因此脫黨的寒君也趁機用他自己原有的「失敗主義」來批評我，並罵我為「機會主義騙子」，企圖藉此以洗刷他在過去所染的滿身污垢，我不知今同志對此作何感想？

「根據作者上述的觀點，發表在《紅星》報第一期上的

鏡徽同志的文章之觀點是很錯誤的」。今同志這樣告訴我們。但他除了從正面的敘述自己的「失敗主義」的「觀點」外，並沒有分析和批評我的文章究竟錯誤在甚麼地方。因此，我把他的「失敗主義」思想加以駁斥之後，也就無須再替我自己的文章辯護了。我這裏祇聲明一點：我在《紅星》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因為限於對外宣傳，並且為文甚短，其中自不免說來簡單，不充分，甚至含有某些缺點，但在基本的態度上，我至今還認為正確，與我後來寫的《日美戰爭與我們的態度和任務》的《提綱草案》，在根本思想上是相連貫的、一致的。至於今同志指責我「把利用矛盾強調得很厲害」後，並接着說：「在今天，我們提出正確的『利用法』來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不是不可以的，但絕不能把他作為我們的口號或政綱之一條」。我試反問一句，誰把「利用」「作為我們的口號或政綱之一條」呢？我的文章是很清楚的，正是提出正確的『利用法』來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而已。並且我最後還警告地指出：「像這樣的「利用」是帶有危險性的，特別是一個弱者利用強者時，危險性更大……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即準備防止國民黨在日美戰爭中將中國變成為美國反日的補助工具，在日美戰爭後（日帝失敗後）把中國變成為美國金元統治的菲律賓。」難道這還不夠明白嗎？

最後，我應當指出：我們過去與華南組織內部的教派思想（還有極壞的機會主義傾向），雖作過長期的鬥爭，並寫過許多糾正它的文件，但就今同志的「失敗主義」看來，尤其從整個華南組織見到連根同志的文章即一下轉入「失敗主義」的泥坑中這一事實看來，充分證明華南組織並沒有了解過去的錯誤，更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這裏又一次告訴我們

一種錯誤思想，如不經過自覺的公開的承認和改正，不可避免的要隨着新事變的發生而重演出來。因此我提議；在華南組織內部討論這次日美戰爭的問題時，必須將牠過去與中央臨委的爭論重新提出來作一番檢討，並與這次爭論聯繫起來，作出決不含糊的結論。否則不但教派主義的思想無法肅清，就是寒君那種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傾向，在新事變的引誘下，仍大有抬起頭來的可能。

(六) 今後黨內思想鬥爭的方向

從前面的分析看來，現在我們黨內思想分界已是異常明顯：一方面是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另一方面是極端左傾教派主義，而在這兩種主義與我們布爾什維克路線之間搖擺和盤旋着的是各式的調和主義傾向。在黨內思想分界上顯得如此廣泛、深刻、清楚而尖銳的，不但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內的思想鬥爭史上是第一次，即是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全部思想鬥爭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一個政治組織內的思想已走到如此紛亂、矛盾和對立，自然是一種大大的危險，但同時也是表示我們的組織在政治上已踏進了一大步，即表示中共同盟已能在政治上反映着中國廿餘年來的階級鬥爭之廣度和深度，而變成一個具有戰鬥精神的政治思想的組織了。

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只有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與各種各式的機會主義和教派主義進行不斷的無情的鬥爭，才能『成長壯大和鞏固起來』。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在反對孟什維克的机会主義和『類似無政府主義』的教派主義，（如抵制主義、召回主義等）的長期鬥爭中

『成長壯大和鞏固起來』（請參考《左派幼稚病》第四章）。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更爲我們大家所週知，是在反對斯大林的機會主義及其盲動主義或冒險主義的長期鬥爭中『成長壯大和鞏固起來』的。正因爲如此，托洛茨基把『反機會主義』和『反教派主義』列爲專章寫入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之中——這是值得我們大家特別注意的。最大的危險自然是機會主義，但教派主義常常是『機會主義的補充物』。所以反機會主義與反教派主義的鬥爭，是不可分離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愈是堅決而澈底，則留給教派主義的生存地盤就愈狹小。反之，反教派主義的鬥爭愈是不可調和，則留給機會主義藉口欺騙群眾的資料也就愈加缺乏。

但要澈底進行反機會主義和教派主義的鬥爭，則對於任何調和主義都不應採取容忍的態度。所以，當列寧反對謝德曼等人的機會主義時，他對於考茨基的調和主義便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同樣，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的機會主義及其冒險主義時，也對於『倫敦國際局』所代表的中派主義及其其他的調和主義，也採取了毫不妥協的鬥爭態度。因爲任何調和主義，不論其在口頭上如何不滿於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但實際上總是替兩者服務，掩飾兩者的本來面目，混亂群眾的視線和頭腦，使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之間徬徨迷亂，以便最後把他們帶進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的死港之中。

現在我們必須堅決地認定：此時我們組織內思想上最危險的敵人是 DS 所代表的機會主義，而意因所代表的教派主義乃是前一機會主義之『補充物』。因此我們必須採取最堅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務必使我們的組織脫離他們的影響而

後己。但爲執行和完成這一任務，則我們對於室川和連根同志等所代表的調和主義傾向，也不得不採取同樣堅決的態度來對待了。

但同時我必得指出：我們這次黨內的思想鬥爭在中國無產階級黨內的思想鬥爭史上固然可算是第一次，但絕非最後一次。在中國這種小資產階級成份佔絕大優勢的國家內，小資產階級的巨大影響不可免地要經常反映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因此，我們必須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經常警覺地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傳統和方法，去與未來各種各式的機會主義、教派主義及調和主義進行鬥爭。

錯誤是很難避免的（因爲「不犯錯誤的人不會有過」——列寧），我們不怕犯錯誤，但我們必須事先盡可能避免錯誤，尤其要具有革命家的勇氣來認識、承認並及時糾正錯誤。我們對於各種錯誤思想之批評，絕不在於攻擊個人，而僅在於指出錯誤的嚴重性及其根源，以便大家盡可能把他們糾正過來。

我們現在是處在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變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行到了第三年、而革命局勢行將到來的時期，如果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大戰轉入革命內戰的關頭，則今天便已開始走向「一九一七年」了。在這樣的時期，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加緊準備。而從黨內肅清各種危險的錯誤思想，便是我們準備迎接這一大時代的鬥爭之出發點。如果「無產階級隊伍內的思想鬥爭是階級鬥爭之最尖銳的反映」，則我們這次黨內的思想鬥爭也可以說是未來偉大的階級鬥爭之預演。我希望每個同志都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精神來積極地參加這一「未來偉大的階級鬥爭的預演」吧！

爲常委答覆少數派同志書*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

意因、連根、室川、谷和、廣原諸同志：

我們早就密切地注視着並擔心着你們所頑強地堅持的政治立場和組織觀點，依照你們所不自覺的一種邏輯向前發展，正在推動着你們向公開同黨分裂，公開背離第四國際的道路上走去。現在接到你們五人聯名的信，我們的『注視』和『擔心』是被證實了！這是一個不幸，特別是對於你們！但我們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爲了第四國際這一面無疵的旗幟，最後且爲了你們的政治生命，不得不懇切地向你們作一最後的忠告。請你們暫且『懸崖勒馬』把頭腦冷靜下來，認真地考慮一下擺在你們面前而爲你們自己所提出來的極端嚴重的組織問題！

你們來信的總目標是：要求常委『形式』上『准許』你們出版一個公開的『獨立的』，向黨外『廣大群眾說話』的刊物。但這樣的刊物，就是等於『同黨公開分裂』！因爲一個嚴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黨，絕不能容許有二種思想上根本對立的刊物或路綫向黨外群眾宣傳的——這是常識而又是『原則』的『紀律』，大概你們還不致於完全忘記吧！

自然，你們已經搜羅了並編製了一套『必須的理由』來辯護和掩飾你們久已進行着的分裂企圖，但你們的『必需理由』不但不足以辯護和掩飾你們的分裂圖謀，反而證明了並暴露了你們不僅在政治上遠離第四國際的路綫，而且在組織上也完全背棄了第

* 此信是作者應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常委會委托而起草，並獲得通過後發出，原刊於《保衛馬克思主義》第四卷。意因即鄭趨麟，連根即王凡西，室川即陳其昌，谷和即樓國華，廣源即毛鴻鑑。

四國際的原則立場——民主集中制，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傾向在黨內鬥爭上感到絕望的冒險勾當！讓我們來將你們認爲堂皇的「必需理由」略事檢討一下吧！

你們說：「事變，尤其是此次戰爭擴大於太平洋，不僅證明我們主張正確，而且證明所謂多數派路線經不起考驗的」。說得很好！你們很開心！但根據在那裏呢？啊！有了：

「多數派始終認爲有個獨立的戰爭，即使太平洋發生戰爭，那不過是中國戰爭的擴大罷了，不過是美國（和英國）來干涉罷了。但事實證明中日戰爭不過是世界大戰的一個部份，夏威夷砲聲未響以前就已作爲太平洋戰爭一部份而進行着的。中國作戰的利益和目的，早已沒有獨立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國際主義派早已認識到，而且主張着的」。

如此說來，對於太平洋戰爭，好像我們多數派純粹是「從中日戰爭的角度出發」，只有你們少數派才是「從國際主義的觀點上」去考察的。但請允許我們問一句：你們是根據何種文件，而得出這樣的推論呢？根據我們自己寫的文件，還是根據你們腦子裏的空想，你們對於政治敵派的文件一向採取極端輕蔑的態度，不耐煩閱讀，現在却迫得我們不得不把自己寫的文件抄兩段下來麻煩你們：

「日美戰爭，是一個帝國主義強盜的分贓戰爭，並且是這次帝國主義大戰之直接擴大，直接展開至太平洋的戰爭。他的主要目的是：日美（英國在遠東現已退處次要地位）兩個帝國主義企圖爭奪太平洋霸權，重新分割遠東的殖民地，特別是爭取對中國民族的奴役權。因此，日美戰爭一旦爆發，不管我國願意與否，必然要被迫捲入這一戰爭的漩渦之中，就是說，我們的抗日戰爭必然要被迫與日美戰爭糾纏在一起。」

『中日戰爭與日美戰爭相糾纏，這一方面，是表示中國已直接捲入帝國主義大戰的漩渦中，同時也就是表示中國民族的解放鬥爭已與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直接地、密切地聯系了起來。因此，中國民族解放的命運，也就更加密切地直接地與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命運聯系起來了。』（引自《日美戰爭與我們的態度和任務》——圈點係現在所加。）

這兩段話，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十個月寫的，請你們睜開眼睛去讀一遍吧，看這當中的文字和意義，與你們前面所描述的『多數派的路綫』有甚麼共同之點？這還不夠證明所謂『多數派始終認爲有個獨立的戰爭，即使太平洋發生戰爭，那不過是中國戰爭的擴大吧了！不過是美國和英國來干涉罷了！』這些話頭，全是出於你們的憑空虛構，自由編造用以加在多數派頭上，污蔑多數派，並藉此來攻擊我們，來構成你們實行分裂的『必需理由』嗎？這種行徑，不但太欠忠實，而且太欠高明了。

真實的情形是如此：我們多數派認爲，日美戰爭一旦爆發，中日戰爭，必然被迫與之糾纏在一起，但這兩個戰爭雖然被糾纏到一起，雖然前一戰爭是帝國主義的，但是後一戰爭的反帝國主義性却並沒有因此被融解、變質（正如蘇聯的抗德戰爭，雖然與整個帝國主義戰爭糾纏在一起，而並不因此改變其反資本主義性一樣）因而還具有進步的意義，還值得我們參加、支持。而你們少數派呢？則認爲日美戰爭一爆發，甚至遠在爆發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便已經變質了，已不值得我們參加與支持了，日帝不復成爲中國民族當前的主要敵人了，主要敵人是重慶國民黨政府，首先應當打倒它！應當對抗戰實行「失敗主義」。這是有許多文件，可資證明的事實，假如你們不否認這種事實，那就讓我們來看：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的真情實況吧！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帝國主義不但奪取了英、美、荷的殖民地及其許多軍事要點，而且還不斷地向中國進攻（如進攻長沙）加緊包圍中國，並計劃截斷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主要交通線（滇緬路），企圖把整個中國併吞下來。中國的人民，尤其是淪陷區的工農大眾，愈益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切情形，只要不是瞎子或神經病人都可以看到、感到和理解到的，這難道還不夠證明日帝仍然是中國民族當前的主要敵人嗎？這難道還不夠證明中國工農大眾從日帝蹂躪和侵略下解脫出來，仍然是當前最最迫切的任務嗎？由此，也就愈加證明，我們前此主張繼續抵抗日帝，即繼續參加和支持抗戰，這一基本路綫是正確的了；同時也從相反方面，愈加證明了你們藉口中日戰爭已變成爲日美戰爭一部份，而反對支持抗戰，即反對繼續抵抗當前的死敵日帝，是絕頂荒謬的。至於你們主張首先打倒重慶國民黨政府和對抗戰採取失敗主義，我們且不說這是在替日帝和汪派漢奸等去欺蒙在他們直接踐踏下的千百萬人民，混亂他們的視線，轉移他們反日反汪的目標，至少你們已忘記了一件事，怎樣去打倒重慶國民黨政府呢？難道叫淪陷區域的工人（幾佔全國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和其他民衆借乘日本軍閥飛機到重慶去打倒國民黨政府嗎？你們現在屯在日帝和汪派漢奸絕對統治下的上海亭子間裏，高唱『抗戰變質』，『當前的主要敵人不是日帝而是重慶國民黨政府』，『對抗日戰爭採取失敗主義』，這一類的口號，舒服是舒服的，首先就是危險很少，但要人們相信你們不是在替日帝和汪派漢奸服務，却沒有可能。醒醒吧！人民有自己的眼睛，『國際主義』的招牌，是掩蓋不了背叛的實質的。

你們藉口分裂的第二個大理由，是半年來領導機關沒有工作

，停止了機關報，於是得出結論道：『就政治影響上說，我們的黨已經是不存在了。』並乘此把你們的工作大吹特吹了一番。我們且先從事實來看看吧！

自第二次代表大會開過後，領導機關即立刻進行整理上海及各地方的組織，注意發展政治影響。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曾親至香港，推動此項工作，因此香港的黨，無論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獲得了進一步的開展，黨員尤其是團員的數量增加了，政治水平提高了，黨報的影響也擴大了。在上海方面，短時間內組織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尤其是在工人方面），起初黨報是繼續出版的。並且耀如同志還寫了一本對外宣傳托派主張《甚麼叫做托派》的小冊子。但因為技術機關發生了問題，不特小冊子未能出版，即黨報亦被迫停刊了。因此，領導機關不是有意停止黨報，而是出於不得已。並且我們總是繼續地催促技術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盡速重建技術機關，恢復黨報，無奈當時找房子十分困難，而負責人又作事不力，以致遷延復遷延。而那個負責人正是你們現在當中的廣原，他至少可以把事實告訴你們，假如他對『事實』還是忠實的話。『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上海的情形（主要當然是租界）是完全改變了，日帝以更瘋狂的攻勢，向中國人民進行壓迫了，而我們的組織更陷於極端嚴重的困境之中。我們被迫不得不暫時退守到極端嚴重的防守陣地，以便盡可能保衛我們的原有組織，維持我們原有的同情關係。因此，更無法把技術機關立即恢復起來。但我們並沒有放棄恢復黨報的計劃，像幾個月來因技術關係及『一·二八』事變而停出黨報，當然是一種損失，但這損失是有其客觀的困難的，雖然我們不應該將一切責任都推之於困難，但人們却不能因為不負責任而乾脆否認這些客觀困難的事實。尤其當攻擊別人時，應當回憶一下自己從前負責時的情形。（在

代表大會前，你們爲要拖延政治的討論，曾經堅持將黨報無限期停止，這不但證明你們對黨報的態度，前後相反，而且證明了你們對於黨的對外政治影響是絕不關心的。你們今天攻擊我們停止黨報，顯見得僅僅當作一種藉口來掩飾你們的分裂行爲而已。但你們自己在這一時期內究竟怎麼樣呢？廣原且不用說了，你們當中的連根竟藉口意見的不同而公然拒絕了替黨報工作，以便專門幹小組織的把戲。「一·二八」後，當日帝極盡狂暴地向中國人民進攻，黨陷於空前未有的險境時，你們不但不站在黨方面來防禦外來的危險，却反而企圖混水摸魚，你們的行爲，惟恐黨不迅速地破滅以便證明你們的主張之絕對正確。這裏應當提醒你們，「你們這種對黨內的失敗主義，是與你們對中國民族的解放，對抗日戰爭的失敗主義緊相連結着的，你們企圖以翻譯兩篇托同志的遺著和幾篇攻擊黨的文章來表示你們是替黨、替革命盡了偉大的責任，未免有點太過誇張吧。

如果你們真有誠意爲黨爲革命負責，即令你們覺得領導機關工作不好，停止黨報不對，你們首先就得向領導機關積極建議，尤應積極參加黨內工作，催促恢復黨報，並回到黨報來從事工作，至少可以作點翻譯工作。不幸，你們所表現的事實是相反的。我們且更退一步說，即令一切都如你們所指責的，但無論如何尚不能構成你們公開同黨分裂的理由，因爲你們還可以進一步向黨員群眾控訴，要求全黨同志起來，改造領導機關哩！

根據上面的分析和解釋，你們爲要分裂而提出的『必需理由』不但不能成立，反而更明顯地證明了你們的分裂企圖是荒謬的，因而你們援引托洛茨基同志的『以後怎麼辦』一書中所寫的那段話，來作爲分裂組織的直接辯護，更屬荒謬。

你們必須了解，托同志寫那段話的客觀具體情形如何，那是

一九三二年的二月，正當德國的無產階級鬥爭臨到異常緊張而危急的時候，最後的決死戰已快臨頭，而當時指導這一革命的斯大林領導機關，一方面既以他前所未有的極左的機會主義（哀的美敦主義）在加緊叛賣工人階級，而另一方面又以官僚集中制的紀律禁絕黨員群眾討論黨的政策，阻止他們去進行革命鬥爭。在這樣的情形底下，當然，『誰如在紀律的掩飾之下容忍那種在他們看來明顯是災禍的政策，也決不是革命家，而是無決斷的下流廢物了』。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客觀具體情形究竟怎樣呢？是德國一九三二年的二月麼？我們黨的領導機關，連國際局在內，是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不容許黨員群眾（連少數派在內）討論黨的政策，阻止他們去進行鬥爭嗎？『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如果把真理完全抽象起來而任意瞎扯，就一定變成荒謬。你們對托同志話語的引用正是如此。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史上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他堅持了並發揮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創造了布爾什維克黨，保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不但承認了列寧建黨的正確與功績，以及自己以前對於黨制的觀點的錯誤，而且還積極地爲繼承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黨制——民主集中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托洛茨基之反對斯大林的黨制，絕非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如斯大林黨徒所污蔑的），而是反對其官僚集中制。正因如此，托同志把民主集中制寫進建立第四國際黨的一切基本文件之中，作爲第四國際黨的組織原則。托同志死前與美國少數派的小資產階級份子鬥爭時，更特別地孜孜不倦地論敘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因爲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只要討論的民主，而完全忘記了或不高興「行動的集中」。但托同志看來，沒有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紀律，就根本不能建立一個真正

革命的黨，更不用說革命的行動和勝利了。你們現在不但完全忘記了列寧建立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切理論和實踐，忘記了托洛茨基擁護和堅持布爾什維克黨制的一切文件和行動（尤其是最後與美國少數派小資產階級分子鬥爭的文件和行動），而且要把托同志對某種具體歷史條件下所寫的一段具有特定意義的話，抽象起來替你們急切地要同黨分裂的陰謀作辯護。可是，這是徒然的，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於建立布爾什維克黨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理論和經驗還活在人間，特別是活在我們第四國際的隊伍及全世界革命的工人中間。

黨會給你們在黨內以極充分的民主，今後亦當如此。但你們必須尊重黨的集中制，即必須在行動上，在對外的宣傳和鼓動上服從黨，服從國際局，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服從黨的紀律。即令你們認為你們的思想路線是正確的，你們也得首先在黨內運用民主的討論和批評以爭取黨員群眾的擁護，以便進而修改黨的路線，並改造領導機關。像你們現在立刻要求分裂，那只有在兩個條件之下才是可思議的，（一）革命潮流已臨到決定階段，再不容許從容討論，放過時機；（二）黨已經禁止了黨內的民主討論和批評，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官僚集中機關。但我們試問，上舉的兩個條件，現在是否已經存在呢？假若你們還具有理智的話，只能用「否」來答覆。由此證明你們分裂的企圖，不但暴露出你們思想上的荒謬，而且還暴露了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路線也完全缺乏信心，因為你們甚至連黨內現有的異常充分的民主自由，也不願或不敢利用來說服黨員群眾哩。

也許你們要說：「我們並不是要分裂，只是要求黨准許我們出版一個公開刊物向黨外群眾說話。」（據說你們當中已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你們從未進過布爾什維克黨，沒有過過布爾

什維克黨的生活，沒有聽過列寧或托洛茨基關於布爾什維克黨制的意見，說這樣的話是可以原諒的。但你們現在都自稱爲布爾什維克的老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自稱國際主義的理論家和實行家，聲言要教育革命幹部，要創造革命，要建立新黨，而竟然說出這樣的話，那未免太可笑了。

最後，我們應當嚴重地向你們聲明：你們的『請求』，我們是無法『准許』的，縱令是『形式上』，因爲我們若准許你們的『請求』，就等於破壞了第四國際的黨制，也就等於破壞了革命，這是一種莫大的罪惡。假如你們不顧一切地根據你們的『必需理由』，而公開對黨外散發你們已經印好了的刊物，那時，我們將被迫地只有向黨外聲明：你們是自動的離開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政治立場和組織關係了，其後果是你們推測得到的，但這後果的全部責任應由你們自己去擔任，那時絕不是我們開除你們，而是你們自絕於第四國際，自絕於無產階級革命。美國少數派的『覆轍不遠，可資殷鑑』。

現時分裂的鎖鑰，尙握在你們自己掌中，要知『分裂』絕非兒戲，萬丈深淵，擺在你們前面，『一失足將成千古恨』，尙望再四思維！在你們『懸崖勒馬』從事認真的思考時，請接受我們

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常委會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爲少數派出版 獨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對外聲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

最近我們發現一種公開油印小刊物，封面款名爲『國際主義者』，並在其下面小標題上簽加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國際主義派機關報』。但該『機關報』的內容，除了登譯幾篇托洛茨基同志的遺文之外，幾乎全是用明鎗或暗箭中傷着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現行政治路線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向工人階級及一切革命者作如下的解說和聲明：

這個『國際主義者』所代表的『國際主義派』，原來就是我們中共同盟內幾個知識分子所構成的一個小組織（我們稱之爲少數派）。其中的主要分子爲意因、連根及室川等。這些份子，在對日美戰爭與中國抗戰關係問題的根本態度上，與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立場完全站在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

第四國際中央局去年三月的決議案及同年七月中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都一致認定未來的日美戰爭雖然徹頭徹尾是帝國主義強盜間爭奪太平洋霸權，搶劫遠東殖民地，特別是爭取對中國民族奴役權的戰爭；雖然日美戰爭一旦爆發後，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可避免地要被迫捲入這個強盜戰爭的漩渦，與之糾纏到一起，但中國的抗日戰爭並不因此而完全喪失其進步意義，因爲在日帝還佔據中國大部份土地，繼續侵襲和蹂躪中國人民時，它依然還是中國民族當前的主要敵人。中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從這個主要敵人的侵襲和蹂躪下解脫出來，依然還是當前最最迫切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們認爲領導抗戰的國民黨政府一向所採

* 原刊於一九四五年出版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第四卷【組織之部】

取的抗戰政策（壓迫民衆與依賴英美帝國主義）是徹底反動的；它在日美戰爭中之公然參加美英同盟，接受華盛頓參謀部的直接指導，將中國民族的抗戰隸屬於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更是反動之至，是奴隸選擇奴主的卑鄙勾當。因此，我們必須與之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我們主張工農及一切民衆必須儘速自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政綱去參加抗戰，去抵抗日帝，驅逐日帝於國境之外；同時防止美英帝國主義從中利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轉變抗戰的領導權，解決當前最迫切的民主問題（如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貧農、國內弱小民族自決……），直至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後已。這原是本着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托洛茨基的全部遺教（尤其是托同志的不斷革命論等著作）所規定下來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政策。

但所謂「國際主義派」的主張則與此完全相反。他們認爲日美戰爭爆發甚至遠在爆發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已經變質了，即變成爲反動的、「幫兇」的戰爭了。日帝不復成爲中國民族當前的主要敵人，而當前的主要敵人是重慶國民黨政府了。因此，他們堅持在現行的抗日戰爭中採取「失敗主義」，「首先打倒重慶國民黨政府」。這不但完全背叛了第四國際曾經明確地規定的《過渡綱領》（該綱領規定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援助非帝國主義國家——如被壓迫的中國及蘇聯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見第四國際《過渡綱領》第四一頁）和托洛茨基再三諄囑的遺教（托同志在其被刺前夕所起草的對這次大戰的宣言中肯定地宣稱：「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爲了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戰爭，因之爲了「保衛祖國」，在原則上是與帝國主義國家情形不同的」——見《第四國際緊急大會宣言》第二二頁），簡直是一種絕頂荒謬、

背叛而愚蠢的思想！事實上，這種思想完完全全地是同汪派漢奸一鼻孔出氣，替當前最兇惡的民族敵人服務！！

至此種絕頂荒謬的背叛和愚蠢思想的來源，乃是出於第二國際的孟什維克或掛左派招牌的半孟什維克，根本否認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之進步意義。『國際主義派』中的政治靈魂意因就是一個顯著的代表。他繼承孟什維克根本否認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具有進步意義的基點出發，因而否認了『八·一三』以來中國抗戰的進步性。他在抗戰開始時，即宣稱中日戰爭是『日本天皇與蔣介石間的戰爭，我們對之應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但同時托同志却堅決地無情地駁斥此種主張說：『日本方面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反動的，中國方面的戰爭是求解放的、進步的』。在這樣的戰爭中，『只是一般地說「革命的失敗主義」，而不把壓迫人的國家與被壓迫的國家加以區別，這是給布爾什維克製造的可憐諷刺畫，並拿這個諷刺畫去替帝國主義服務』（見《鬥爭》卷二第十二期托同志給里維拉的信）。可是雖然經過了托同志這種嚴厲的指駁，一直到現在，意因還是頑強地堅持其『替帝國主義服務的諷刺畫』的主張的。不特意因如此，就是連根們（他們以前是反對意因的主張的，不過是站在右派的立場上）也完全墮落到這一諷刺畫（『革命的失敗主義』）的泥沼中去了。因此異常之明顯：現在所謂『國際主義派』，對日美戰爭的荒謬主張，僅僅是第二國際的孟什維克或半孟什維克對民族解放鬥爭的背叛思想在現時具體問題上的翻版而已。其不同之點僅僅在於：我們的孟什維克披上了一件『國際主義的』外衣，以便繼承久已破產的老孟什維克去欺蒙群眾罷了。但其以『否認民族解放的進步意義』去替帝國主義服務，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

套上『國際主義』外衣的新孟什維克，既然在政治上完全否

認了民族解放鬥爭的進步意義，把被壓迫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戰爭與帝國主義強盜間的戰爭完全混同起來，因而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採取了『失敗主義』，即背叛第四國際的抗戰政策之後，於是在組織上也完全地背棄了第四國際的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以其特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無政府自由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主義，公然拒絕在行動上服從國際中央局及中共同盟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擅自印發公開的『獨立機關報』，即公然毫無忌憚地破壞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紀律（在行動上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而分裂組織了。這是與一九〇八年俄國的波格達洛夫派之以極左教派態度拒絕參加議會鬥爭，破壞黨紀，以及最近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少數派夏克曼等之以同樣教派態度拒絕保衛無產階級性的蘇聯，並破壞黨紀，是如出一轍的。這同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內損害政治和破壞組織的代理人！

因此，我們有充份的理由和權利向黨外一切民衆鄭重地聲明：以《國際主義者》這個刊物爲代表的所謂「國際主義派」，實際上就是掛左派招牌的孟什維克，波格達洛夫的後裔，夏克曼的同輩。他們現在不但在政治立場和組織原則上完全背叛了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而且擅自破壞黨紀而脫離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組織關係了。不論該派打的甚麼招牌，但與第四國際旗幟下的任何組織都毫無關係。故今後該『國際主義派』的一切言論和行動，應完全由該派份子自行擔負之。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

悼陳獨秀*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

陳獨秀沒有了！

這個在輓近中國史上起過巨大作用的人物是與世長辭了。人們也許以獨特的傷感來追悼他，或以各自的成見來毀譽他。但這一切都與我們無涉。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第四國際黨人，只想在他蓋棺之餘，給他的生平一個客觀的歷史評價，以便後一代革命青年們有所借鏡。

獨秀原出身於官僚貴族家庭。但他却領導了民主的「五四」運動，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推進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並參加了中共左派反對派運動（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前身）——這表示出他在中國最近歷史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上，都盡了推動的責任。這是值得他驕傲的。他的名字將同這些歷史發展的事變永垂不朽。

獨秀所領導的「五四運動」，是繼承「戊戌政變」及「辛亥革命」而來的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但這運動是進步的，如果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姑不論其改良與革命之別），是企圖在政治上替資產階級開闢踏上權力的道路，則五四運動，便是企圖在思想上替同一資產階級擺脫封建傳統的束縛，故從民主思想的演進上說，「五四運動」是劃時

* 原刊於《鬥爭》報第六卷第一期。

代的。它是東方資產階級一個典型的「啓蒙運動」。

在這一運動中，獨秀不但佔據了無比的領導地位，而且還表現了他的堅決和勇敢的精神。他高舉「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民主和科學——編者〕的旗幟，向一切封建舊思想、舊道德、禮教、迷信及一切舊傳統猛攻。尤其表現他在那時的過人之處的是，他一眼看定封建殘餘思想的堡壘是孔教，不顧一切地向它射擊，並大膽地高呼以白話代替文言。

假如可以用康有為的名字代表戊戌政變，用孫中山的名字代表辛亥革命，那我們更有理由用陳獨秀的名字來代表五四運動。但近年來，國民黨人和斯大林黨人爲了卑鄙而狹隘的黨派利益，一談到五四運動或紀念這一運動時，往往把陳獨秀在這一運動中的作用說成無足輕重，甚至企圖以蔡元培（國民黨）或魯迅（斯大林黨）的名來頂替他。這是有意修改和偽造歷史事實。但歷史本身自有其公允的裁判官。人們如果不認真談中國近代民主運動史則已，若要認真談到時，康有為、孫中山和陳獨秀的名字及其作用，是無法割開的。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乃是表示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次自覺地要踏進政治舞台，企圖以自己的力量代替資產階級來解決延遲的中國民族民主的歷史任務，並藉此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這是另一個劃時代運動——第二次革命——的起點。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之創立中共，固然是由於時勢之推動，主要還是由於第三國際之催迫。但他們能毅然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立場一躍而至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實行組織新黨，進行進一步的革命運動，無疑地是值得崇敬的，其膽識和功績都是不可磨滅的。

固然，中國共產黨所發動和領導的第二次革命是悲慘地失敗了，獨秀應負相當責任。但後來斯大林及其黨羽把這次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加在他身上，這不但不公允，簡直是卑

鄙的誣陷。事實上，第二次革命失敗的主要負責者正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不顧托洛茨基的一切批評和抗議，以其特有的官僚孟什維克主義政策代替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政策，以致異常可恥地斷送了這個最有勝利希望的革命。當時獨秀的錯誤，主要僅在他過份地信任了斯大林的領導，盲目地執行了斯的指示。但後來他公開承認托洛茨基對於中國第二次革命的主張之正確，並接受其所指出的教訓，毅然起而加入托同志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以反對斯大林的官僚領導，這總算是多少補償了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犯的過失。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運動，產生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在的第四國際中國支部。這是反映着中國無產階級經過第二次革命的悲慘失敗，認識了斯大林的孟什維克主義領導破產之後，重新站到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準備完成中共所尚未能完成的使命。其劃時代的意義，當不在創立中共之下。獨秀之參加這運動無疑地又是進一步的表現，是他的政治生活還在向上的象徵。但當時左派反對派內某些極端份子（後來這些份子差不多都卑鄙地離開了左派）認獨秀之參加這一運動是一種投機，是不允許的，因而對之加以猛烈的攻擊（如劉仁靜所領導的「十月社」）。可是，托洛茨基却十分歡迎他，認為他之參加左派反對派運動，不但表示他的上進，而且還反映了左派反對派思想的力量之不可抵抗。

但現在我們必須指出：獨秀雖然參加了左派反對派運動，同我們一道創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並盡了不少力量，對於在中國的第四國際運動，有過相當貢獻。可是他當時對於左派反對派的理論與策略之了解是不很正確的，有些甚至是曲解的（如對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性質、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問題等）。正因為如此，獨秀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嚴

重打擊（逮捕監禁）之下，便一步一步地從思想上離開了第四國際的立場，以致最後形成了他在臨死前夕所頑強地堅持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反動思想。

獨秀在南京監獄生活的後期，便已開始對於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表示懷疑，並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發生了新的幻想（幻想一種超時代超階級的民主主義）。這是他思想上開倒車的轉捩點，也就是他背離第四國際立場的出發點。但獨秀的思想倒退之明顯而具體的表現，還是在他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問題上。

「八一三」後所爆發的抗戰，無疑地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蔣介石國民黨的領導政策（如壓迫民衆，投靠英美，並不斷與日帝進行妥協談判等）却是反動的，是其過去一貫的反動政策之延續。故當時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托洛茨基指導之下，一方面號召工農民衆在軍事上參加這一抗戰，支持這一抗戰，但同時提出自己的革命政綱，嚴厲地批評了蔣介石的反動領導。但獨秀在承認抗日戰爭的進步性之後，即進而承認蔣介石的抗戰政策也是進步的。因而他簡單地號召民衆起來信任國民黨政府，他的反動領導承認，甚至擁護它的軍事獨裁——這樣一來，獨秀便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獨立立場，背棄了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如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等），乾脆退到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執行的階級合作的老機會主義政策，而與當時斯大林黨的無恥投降政策（美其名曰「國共合作」）同流合污了！

但獨秀對中國問題思想上的倒退還不止於此。他甚至倡言：「社會主義在中國之經濟上的成熟，自是無稽之談……」，「資本主義在中國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叫青年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他的結論是：中國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後，才有可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走上社

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但這正是俄國及西歐一切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者的極陳腐的「階段論」，早已爲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事實所粉碎了的。這就表示獨秀已經從根本理論上完全背叛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獨秀的思想倒退更是驚人，這次大戰所包含的帝國主義搶奪性，就是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政治經驗的人們，也看得很清楚。但獨秀却認爲，它只是民主主義對法西斯主義「侵略」的戰爭，並肯定地說：在這次大戰中絕沒有革命的前途。因而他完全站在英法美民主帝國主義方面，堅決反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革命運動，甚至反對在印度及其他殖民地進行獨立運動。總而言之，他是在這次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根本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堅持的、第四國際對戰爭綱領上所大書特書的、「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戰略了。於是，獨秀便完全退到了亨德曼、格德和蒲列哈諾夫等的社會愛國主義的舊立場，而與現今的布魯姆和阿德里之流沆瀣一氣了！！

同時，獨秀看到斯大林之投降希特勒（與他訂結「德蘇協定」幫助他分解波蘭等），便由懷疑蘇聯的無產階級性（即其社會主義財產制）而根本否認了它，把仍然是社會主義性的（當然是病態的）蘇聯與資本帝國主義的德意日放在同一平面上，盡量加以詛咒和攻擊。從此，他就完全背叛了第四國際無條件保衛蘇聯（它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主張，而與一切反蘇的反動分子一鼻孔出氣的了。

蘇聯由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墮落到斯大林的官僚獨裁，自有其客觀的原因。這乃是世界革命不斷失敗與舊俄的落後性所交織成的結果。但獨秀却絲毫不懂得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而以其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公式來判斷蘇聯的墮落過程。因而他又進一步把斯大林

的官僚獨裁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混同起來，宣稱斯大林的官僚獨裁乃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展之必然產品，甚至把它與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專政歸納之於同一範疇。於是，他終於走到一切機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根本反動立場，以其過了時的反動的民主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革命和最中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了。

獨秀既將斯大林的官僚獨裁認為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展之必然結果。他於是更進一步把斯大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其一切政治上的罪惡，都歸咎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而斷言：「布爾什維克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主義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混合物」。他聲稱：「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時即公開發表」（見他去年十一月七日致 L 君私函）。從此，獨秀的思想便最後轉到了資產階級極端反動的陣營，而以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反第四國際的思想和政策的十字軍急先鋒自居了！

×

×

×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獨秀的生平簡直是前後判若兩人，如果以他被監禁於南京為標界，他在前一時期是不斷地勇敢地向前進取的——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走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由墮落的第三國際而轉入革命的第四國際。但在後一時期中却不斷地卑怯地倒退了，——由懷疑蘇聯和幻想民主而走到根本反對蘇聯、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反動政策，贊成英法美民主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直至公然背叛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中間，無疑地是異常之矛盾的。但這確是事實，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那末，這「矛盾」將怎樣得到解釋呢？人們也許這樣地提出問題。

要正確地解答這個問題，只有求之於陳獨秀自身的社會根源、個人弱點及其所處的時代環境。

獨秀雖出身於破落的官僚貴族，但其青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却大半是資產階級式的。再加上當時的中國，正是帝國主義任意橫行、腐化反動的滿清及北洋軍閥相繼統治的時代。於是獨秀根據其所受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與從他那時代環境所受的刺激，以其特有的敏感和直覺，便形成了他的民族民主主義的思想，因而發動並領導了「五四」的民主運動。恰於此時，無產階級在俄國第一次獲得了最後勝利，並第一次創立了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了共產國際，共產主義的思潮波及全世界，同時中國的工人運動也就第一次抬起了頭來（多謝大戰時中國工業的突進）——在這一切情形的吸引和推動之下，於是獨秀便由急進的民主主義者一躍而成爲共產主義者，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二次革命運動了。當這次革命失敗之後，獨秀一時原陷於悲觀消極。但由於托洛茨基對中國第二次革命所作的無比正確的批評和預測，及其對於第三次革命必然到來之明確的指示，又強有力地推動了獨秀前進一步，因而參加了左派反對派運動。這明顯地證明獨秀在這一時期之所以不斷上進，主要是由於客觀時勢所催迫、吸引和推動着的。

但當「客觀的時勢」發生變化時，獨秀的思想行爲也就隨之起變化了。經過左派反對派的許多挫折：外來嚴重打擊，內部不斷的可怕糾紛、叛變、破壞，卒至於自身被捕監禁；再加上斯大林的橫行無忌，第三國際的腐化、惡化，蘇聯的可怕墮落，德國革命與西班牙革命之接連慘敗，希特勒與佛朗哥之得意凱旋，法西斯主義的不斷生長，極權制度盛極一

時，整個的星球都陷於極端反動的深淵之中——這一切使得獨秀對於他的一向所希冀、所景仰和堅持的都幻滅了。所剩下來的，除了傷感和痛苦之外，就只有他從前藉以成功成名的民主主義殘骸。他便抓住這殘骸為救命圈，並以此來批評一切，來對抗一切。但這時的民主主義，却早已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而成了過時的反動透頂的象徵物了（就世界歷史發展說）！

假如獨秀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即令在極端反動的潮流中也還可以逆流前進的。但異常不幸，獨秀雖贊成共產主義，擁護第三國際，創建中國共產黨，甚至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參與第四國際運動，但他却不是一個具有理論修養和革命經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雖然有其高度敏感、直覺，甚至天才，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先進國家的革命經驗，殊少研究。就思想的本質上說來，獨秀始終還是停留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的基地上。這種民主主義者，在客觀形勢往上升，即往順利的方面走時，他是可以乘機上進的。但在客觀局勢往下降，往極端反動的方面跑，而他自身又遭到不斷的嚴重打擊時，他便很難掙扎得住，而不得不向後面倒退了，一直退到原來的出發點——已經過時的反動的民主主義。

我們可以說，陳獨秀是以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的政治舞台，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鑽進他的墳墓裏去。這是矛盾的，但是合乎辯證法的。

獨秀生平這種極端矛盾的現象，難道是中國的獨有特產嗎？不，如果從國際的歷史範圍看來，極是平常的，俄國的蒲列哈諾夫就是一個典型的先例。

蒲列哈諾夫以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一躍而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替俄國創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工黨，並成為極有

天才而博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要在哲學方面）解釋家和政論家，教育了整代的青年工人和革命知識份子，但往後（特別是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他却逐漸地倒退，終於墮落成爲社會愛國主義者（第一次大戰發生後），瘋狂地擁護帝國主義民主欺騙，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反對十月革命，變成一切反動階級反對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代言人。蒲列哈諾夫這種前後矛盾的表現，當然主要也只有從俄國歷史發展的條件中才能得到解釋，但蒲列哈諾夫個人亦有其致命的弱點，即：他只抽象地了解了馬克思主義，而對於西方革命的具體教訓，尤其是對於俄國歷史的具體發展（「不斷革命」的發展），都還是一個外行。

如果蒲列哈諾夫是一個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具體的歷史條件發展前拋開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則我們的陳獨秀便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其名的經驗主義者，在反動勢力嚴重打擊的「經驗」之下放棄了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現在陳獨秀是死了，但革命青年們必須從他學得教訓。獨秀之由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由第三國際轉到第四國際，無疑地是進步的，值得大大地效法的。但他從社會主義退到民主主義，從革命的無產階級陣營退到反動的資產階級陣營，却是絕頂反動的，應當深深地引以爲戒的。尤其要認真地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去學習高深的理論和豐富的經驗，從一切革命（特別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去學習寶貴的教訓。只有如此，才能免陷於陳獨秀的「有始無終」，才能在兇險的激流中逆流游泳，才能跟着歷史的車輪不斷前進。

我們這一代人的活動，幾乎是與陳獨秀的生平不可分離的，甚至是糾結在一起的。在五四運動中，我們曾經熱烈地信仰過他，贊成過他，響應過他；在創立中國共產黨和第二

次革命運動中，我們曾經同他一起親密地合作過，把革命推向前進。隨後，同他一起遭過失敗的打擊，嚼過失敗的苦果；在左派反對派運動中，我們又同他一起堅決反對過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創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並在外來反動勢力（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嚴酷迫害與內部不斷叛變之下進行異常艱苦的鬥爭；最後，我們並同他一起被捕，一起坐監，一起共患難。這時以前，我們對他是有深厚的友誼、同志的敬愛和對領袖的護衛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後來同他進行了極嚴重的鬥爭。當他曲解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的關係，幻想民主主義，在抗戰中提倡階級合作，在大戰發生後擁護英美的民主帝國主義，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批評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時，我們確是無情地批評了他，攻擊了他，因而在情感上厭惡他，乃至仇視他。但我們在思想上對他的批評和攻擊，我們情感上對他的厭惡和仇視，絕非出於私人的好惡，而只是爲了真理，爲了革命，爲了世界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衆的解放事業，爲了第四國際的旗幟，最後且爲了挽救他免於悲慘的墮落。關於最後一點，我們是失敗了，但並不妨礙我們另一方面的成功，那就是：陳獨秀的反動思想不但在我們中共同盟的隊伍裏很少得到滋蔓，反而使我們自己的思想因此（與他鬥爭）更健全起來。我們今後還要保衛他前期的光榮，檢討他後期的背叛，以此來替革命服務的。

現在陳獨秀是永離人世了！

讓斯大林的黨徒們，以其特有下作的犬儒主義去彈冠相慶，去任意譏謗他吧！

讓國民黨人及一切反動派，以其卑鄙的反動意識去抹殺他前期的進步意義，去利用他後期的反動思想以謀私利吧！

讓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以其慣

常庸俗的傷感主義和懷疑主義去哀聲嘆氣地吊唁他，莫明其妙地（毫無批評地）歌頌他或歇斯底里地懷疑他吧！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第四國際黨人，只能本着革命家的態度，運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這樣地來研究陳獨秀，分析他，批評他，從他學得教訓。

康有為也曾起過相當的進步作用，但以其可恥的反動（如擁護宣統復辟）告終。孫中山所起的進步作用當然遠超過康有為，但他的三民主義本質上是徹底反動的，他的幸運僅在他的早死，否則第二次革命的劊子手必然要落在他本人身上。陳獨秀所起的進步作用，比起孫中山來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為深刻的反動思想結束其餘生。歷史是殘酷的，落後國家的歷史尤其殘酷（因為其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綜合性）。許多進步的事物和人物，一轉瞬之間，就變成爲落後的或反動的了。人們如果不緊靠着歷史的火車頭不斷前進，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拋在後面，給人詛咒的。

陳獨秀既決然放棄其所發動且爲之長期努力奮鬥的光榮工作（中國不斷革命的工作），而負着反布爾什維克的不名譽的旗幟走進墳墓，那我們就更應緊緊地抓住這一工作，給它以徹底的完成——這便是我們今天追悼陳獨秀之死的唯一合理的表示！

死去的讓他死去吧！

還活着的我們必得從死者身上取得教訓，以迎接光明而偉大的未來。

活的少數派在依附死的陳獨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對於一個在歷史上起過鉅大作用的人物之死，馬克思主義者與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犬儒主義者，傷感主義者，懷疑主義者及阿諛主義者唯一不同之點，就是運用其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這個人物的生平，分析他，批評他，指出其進步方面及反動方面（假如有的話），從他取得真實的教訓，以爲自己及其他前進人們的借鏡。我們對陳獨秀之死，恰正如此。

在《悼陳獨秀》（見本誌前期）一文中，我們一方面排斥了一切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爲主要代表）和小資產階級（以斯大林黨爲主要代表）對於陳獨秀的誣蔑，並精確地（雖然不是詳盡地）指出了他在中國最近歷史幾個主要階段上所導演的鉅大進步作用（如領導『五四』，創立中共，推進第二次革命，發起中國托派運動等）；但同時，我們也不顧某些小資產階級份子的特有傷感和阿諛，如實地指出了他晚年思想上的倒退和反動（如幻想民主，反對蘇聯，擁護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反動領導，在這次大戰中擁護英美的民主帝國主義，反對在牠們本國及其殖民地進行革命運動，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乃至公然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然而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却大大地激怒了我們的『少數派』，引起了他們的瘋狂憤恨，因而一些昏亂的辯護和狂吠也就跟着爆發了出來。這却迫到我們不得不再來伸說一番。

首先讓我們看看少數派的靈魂意因是怎樣在替陳獨秀辯護吧。

* 原刊於《鬥爭》報第六卷第二期。

意因在其『悼陳獨秀同志』一文中（見所謂《國際主義者》第二期），除了表示一些如喪考妣的傷感外，除了對獨秀的進步方面作了一些既欠準確而又蕪雜的讚詞之外，對於他晚年思想上的反動，不但沒有明白地指責出來，反而替他巧為隱諱。如果只是『為其親者隱』，『為其尊者諱』，人們或者還可以原諒他。但他甚至還要替獨秀的反動思想曲為辯護哩。

獨秀在其思想上的反動，表現得最為深刻而又是最根本的，就是他完全否認了『不斷革命論』。他曾經向外公開表示：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經過無產階級的數量發展，即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有可能。因此，他公開地叫青年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不要幻想社會主義。但『不斷革命論』却早已堅決地肯定，中國及其他落後國家無須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直接走上社會主義，因而這些國家的革命，必須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斷地』走上無產階級的革命，才能達到完成。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已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正面）和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反面）的鐵一般的事實所證明了的。正因為如此，『不斷革命論』成了第四國際領導落後國家革命的唯一政綱。可是，意因却說：『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究竟處在怎樣的關係呢？—— THIS IS THE QUESTION!』。意因先生既認定『這是問題』，就是說，這是還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於是他認為陳獨秀否認不斷革命論也就沒有甚麼嚴重的意義了，可以替他原諒了。事實上，意因正是替陳獨秀對不斷革命論的背叛而原諒而辯護的。但他完全忘記了，托洛茨基的一生就是為了不斷革命論而奮鬥。他同一切孟什維克的決裂，尤其是同斯大林的決裂，以及同拉狄克一切叛徒們的決裂，都是為了不斷革命論。如果從托洛茨基主義中除去不斷革命論，還成甚麼托洛茨基主義呢

?!如果從第四國際的政綱中除去了不斷革命的政綱，第四國際與第三國際乃至第二國際在殖民地革命問題上的戰略與政策還有甚麼根本不同呢?!最後，如果不斷革命論還是『問題』，還待討論，還待解決，那末，托洛茨基主義及根據這主義所建立起來的第四國際政綱，不是統統都成了『THIS IS THE QUESTION 嗎?!果真如此，我們爲甚麼反對斯大林主義，爲甚麼要從第三國際脫離出來而建立第四國際呢?這些 QUESTION，意因能夠給我們以明確的解答嗎?!按照意因的頭腦（懷疑主義的）和邏輯（玄學），除了再用 THIS IS THE QUESTION 來搪塞而外，恐怕再沒有別的答覆了！

由此，我們不但看出意因在替陳獨秀的反動思想隱諱和辯護，而且還暴露了他本人對『不斷革命論』是抱懷疑主義的，他的思想根本也是反動的，事實上，意因同陳獨秀一樣，早已背叛了不斷革命論。他在『八一三』以來根本否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步性，以及最近公開宣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沒有進步意義等，都是他背叛不斷革命論的具體表現。他與陳獨秀間的不同之點，僅在於：後者是從右邊，從否認無產階級革命來背叛不斷革命論。而前者則是從極左邊，從否認民族民主革命來背叛不斷革命論，在本質上說來，意因與陳獨秀都同樣是『階級論者』。由此，我們不難了解，意因爲甚麼特別替陳獨秀對不斷革命論的背叛作辯護：原來在這一點上他也就是替自己辯護哩。人們『自私自保』狐狸尾巴，又不知不覺地在這裏被顯露了出來。不過還得補充一句，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背叛，在陳獨秀是公開的坦白的，而意因却是在『托洛茨基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的掩飾之下暗地進行吧了。

陳獨秀否認不斷革命論及他的一切反動思想，在意因的眼中

（尤其是經過他的隱諱、原諒和辯護之後）既無關輕重，不足介意，如是直到最後，直到獨秀之死，他還認定獨秀是他的『同志』，這是無足奇怪的。因為從背叛不斷革命論，背叛第四國際的基本政綱說來，獨秀確是意因『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意因即令要稱呼任何反動家為『同志』，也是他的『自由』。不過他進一步宣稱獨秀之死是『世界上於此損折了一員老戰將，中國無產階級於此喪失了一個大領袖』，我們便不得不出來提出抗議了。

陳獨秀自從在南京監獄中開始懷疑蘇聯的無產階級性，幻想超階級的民主主義起，他的思想一直向後倒退。故在『八一三』事變後，他就公開否認了自己是『托派』，並與斯大林黨及一切小資產階級政客們一起擁護國民黨的反動領導，完全放棄了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過渡綱領。在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陳獨秀的思想，更是反動之至。在否認這次大戰的帝國主義性及擁護英美民主帝國主義，反對在它們本國及其殖民地進行革命這一根本點上，他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黨徒們毫無差異。他甚至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斯大林黨尚未敢公然否認的），批評列寧和托洛茨基不懂民主主義。最後，他終於走到根本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去了。當然，像陳獨秀思想上這樣一直倒退，最後形成了他有系統的並頗為深刻的反動思想，絕不是偶然的。其客觀原因是在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運動的不斷慘敗之下，在蘇聯及第三國際的可怕墜落下，在法西斯主義及一切反動勢力的瘋狂威脅之下，使他對革命前途極端悲觀失望的後果。然而從主觀上說來，陳獨秀這種反動，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這是他對於自己過去的背棄，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對於托洛茨基的思想及第四國際的主張的背棄。假如像陳獨秀這樣

背叛自己過去，背叛他曾經所信奉過並爲之宣揚過的主義和其黨的主張的反動人物，仍然可以稱之爲『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中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那末，在第一次大戰後的蒲列哈諾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機會主義者，都可以稱之爲『世界革命的老戰將』，和俄國、法國及奧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了！不錯，陳獨秀曾經在一個時期，在他的思想倒退之前，確是堪稱爲世界革命的老戰將和中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的。然而蒲列哈諾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機會主義者們又何嘗不是一度可以稱之爲世界革命的老戰將及他們本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呢？但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以真名呼實物』。當蒲列哈諾夫、格德及安特烈等人的思想未反動之先，列寧和托洛茨基們都是稱他們爲世界革命的老戰將和他們本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的；但自從他們的思想反動後，尤其是自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示其反動態度後，列托諸人就只好稱他們爲機會主義者，爲背信者，爲叛徒了。我們之對於陳獨秀正是如此，也只能如此。

凡是替機會主義者、背信者、叛徒的言行隱諱、原諒和辯護，並到死後還稱爲『老戰將』、爲『大領袖』的人們，一定是他們精神上或意識上同這種機會主義者、背信者、叛徒有着某種關係。否則是不可解釋的，不合邏輯的。但我們的意因，自稱爲『革命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的意因，究竟與陳獨秀的精神和意識上具有着甚麼聯繫呢？在背叛不斷革命論上，意因與陳獨秀本質上是一致的，這一點，我們已在上面指出過了。其實，就是在對抗戰問題上，意因所堅持的極左主義，即根本否認抗戰的進步性，主張『失敗主義』（托洛茨基稱此種主義是替帝國主義服務的布爾什維克的諷刺畫），其破壞無產階級的抗戰政策，與陳獨秀從極右方面擁護蔣介石的反動領導，是殊途

同歸的，實際上也是一致的。從階級的觀點上最後分析起來，陳獨秀的極右的機會主義與意因極左的清談主義，都是根源於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意識之反映。因而這兩種主義都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裏面的代理人。正因為如此，極右機會主義的陳獨秀和極左清談主義的意因，能夠互相原諒，互為辯護。也正因為如此，他們都會以同樣憤懣的態度反對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這在表面上似乎很矛盾的，但實際上是十分合乎辯證法的邏輯的。

也許意因會跳起來反抗說，他對於陳獨秀並不單是替他辯護，而且也會反對過他，甚至『面紅耳赤』地『同他爭論』過的。因而他極力辯護他對待陳獨秀不是『王明主義者』。不過，事實上意因之反對陳獨秀的反動思想，未免是太可憐了。除了在陳獨秀死後他所發表的那封『寫給陳獨秀的信』以外，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批評陳獨秀的片紙隻字。在陳獨秀被捕到南京以前，我們很知道意因只是以陳獨秀意見為意見的。因此，在這以前的歷史上，找不出一點意因與陳獨秀爭論的事實來。到『八一三』後，意因與獨秀的意見似乎是背道而馳了。我們從當時獨秀寫給上海某些同志的信中知道這，並還看到獨秀對於意因意見的簡短批評。但意因對於獨秀方面的批評，却從來沒有聽到過。即當意因從內地來到上海時，就是獨秀對大戰的反動思想表現得十分明顯時，我們也沒有見過意因對獨秀有任何批評。最奇怪的是，他到上海後寫給獨秀的第一封信中，除了表示他承認『中日戰爭是日本天皇與蔣介石間的戰爭』是他自己的判斷及對大戰表示『冷淡』外，也沒有一個字提到他對獨秀的思想的反對或批評。至於最後，即當獨秀將近臨終時意因寫給他的那封信，也還是在我們的多次鞭策之下（因為我們時常抨擊少數派不同陳獨秀的機會主義

鬥爭)被迫寫出來的。甚至寫出很久以後，還不敢寄發，一直到獨秀死後才敢發表出來。假如真有所謂『王明主義者』的話(但我們認為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王明主義者，王明不過是斯大林官僚主義制度下的官僚，格柏烏的代理人，在世界各國都有的)，而我們的意因之對於陳獨秀所採取的可憐態度，就有點相似了。這態度，無以名之，姑且名之為阿諛主義者的態度吧。

× × ×

專替陳獨秀的反動思想作辯護，並企圖拉攏托洛茨基來作幫手的，是連根。這位連根先生，近來在一切問題上，都是以新聞記者、註釋家兼律師的腳色，尾隨於意因的每一發明之後，來從事註解、辯護，並乘機賣弄他的『博學聰明』。他對於陳獨秀當然也要如此。

意因既然承認陳獨秀一直到死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中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連根根據這一指示或發明，於是便更進一步而推斷道：『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着的思想是多麼錯誤，在大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的革命家來的』。但證據在那裏呢？就在『托洛茨基一向對陳獨秀所採取的態度』當中！於是『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得意大文寫下來了(見上指《國際主義者》同期)。

連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托洛茨基關於陳獨秀所說過的一些話語及其對他『一貫重視』的態度，都引述了出來之後，結論是：無論陳獨秀的思想如何反動，連否認這次大戰的帝國主義性，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根本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內，托洛茨基如果不先陳獨秀而死，他還是『不會對他絕望』的，『不會

乘機醜謗他』的（就是說不會批評他的，因為連根是把對陳獨秀的任何『批評』都算作『醜謗』啦），至多不過同他『決裂』吧了。這真可說是一個『天才的推測』！但最不幸的是：托洛茨基一生的鬥爭史，尤其他後期重視思想不與任何人隨便妥協的絕決態度，對這個『天才的推測』，未免成了一個無可跨越的障礙。

我們知道，托洛茨基爲了堅持他的革命思想，在第一次大戰中曾與第二國際的一切機會主義者們（如蒲列哈諾夫、亞克謝洛特、沙蘇利奇、格德、考茨基等）『決裂』，對他們『絕望』，無情地批評（即連根所謂的醜謗）他們。在俄國二月革命後，托洛茨基也以同樣的絕決態度來對待一切孟什維克，至於托洛茨基之同斯大林『決裂』，對他『絕望』，猛烈地抨擊他，因而決然從第三國際分裂出來成立第四國際，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在最近美國黨內的鬥爭上，僅僅爲了蘇聯的性質問題，托洛茨基也同班納姆及夏克曼等所領導的少數派『決裂』，嚴酷地批判他們，對他們『絕望』起來。這事實，更是新鮮。如果就思想上反動的廣度與深度說，即就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問題說，陳獨秀與第一次大戰爆發後的蒲列哈諾夫等人，以及『二月革命』後的孟什維克，有甚麼不同呢？至於斯大林呢？雖然他實際上已完全背叛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毀壞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口頭上還沒有像陳獨秀一樣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然而托洛茨基對他尚且是如此地『絕望』，如此地同他進行了極嚴酷的鬥爭。說到美國的少數派，其思想上的反動，還遠未達到陳獨秀的程度，然而托洛茨基也還是對他們『絕了望』，終於同他們『決裂』了。如果托洛茨基未死，看到了陳獨秀最後的全部反動思想，果能爲了『珍視』他的『革命經驗』，而還不對他『絕望』，不批評他，只是同他『決裂』

一下就算了嗎?! (要知道在政治上同一個人或一個派別『決裂』，一定是對這人或派『絕了望』才『決裂』的。)只有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一生在思想上的不可調和態度，及其在政治上的絕決態度的人，才能如此『推測』。像這樣推測的人，不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簡直是大大地污辱了托洛茨基(即把他看成為毫無原則的無骨氣的妥協主義者、拉攏者)。

不錯，托洛茨基在一個長時期內曾經重視過陳獨秀，對他寄予過不少的希望，因而當某些『青年托派』，尤其當別具用心的人們(如劉仁靜、施朝生等)過份地批評他，甚至誣蔑他，隨便開除他時，托同志常是站在陳獨秀方面，原諒他，袒護他，甚至替他辯解的。但托洛茨基這種原諒、袒護和辯解，絕不是沒有限度的。托洛茨基對於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勃列阿布列勝茨基及其他的老革命家也曾原諒過，袒護過，甚至辯護過，但這並不妨礙當他後來發見這些老革命家們的思想走上反動，完全背叛自己的過去時，對他們『絕望』，同他們『決裂』，罵他們為叛徒哩。當陳獨秀從斯大林的領導下脫離出來走上左派反對派而被『青年托派』(當時的連根正是其中之一)拒絕時，被別具用心的人們(這裏也有連根的份)辱罵時，托洛茨基當然要替他辯護，表示歡迎他，『重視他』的。即當陳獨秀的思想開始反動(如對蘇聯懷疑，對抗戰表示右傾等)，但尚未經過討論，尤其當未能清楚地明瞭他的反動思想的內容時，托洛茨基也還得慎重地對待他，盡量設法挽救他(如請他到美國去)。但由此便作出一個推論來，說托洛茨基不管陳獨秀的思想如何反動，一直反動到否認帝國主義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也還是原諒他，甚至還希望他(即『對他不絕望』)，且不說作這種推論的人是污辱托洛茨基，但何以解釋托氏以前

對待拉狄克及拉柯夫茨基等人的絕望態度呢？！

也許連根又要搬出陳獨秀的『革命經驗』或『實際革命者的陳獨秀』來作盾牌，來代為詭辯吧！但列寧早就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托洛茨基在批評美國的少數派時，更鄭重地指出理論的重要性，說在反動時代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人是最難站得住的（大意如此）。陳獨秀既不追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以他雖然長期地參加了中國的革命運動，但他始終沒有能正確地了解『革命的經驗』，始終只是一個『實際主義者』。正因為如此，他經不起嚴重的打擊，在嚴重的反動勢力威脅下站不住腳跟。所以他終於倒退下來，並回過頭來反對革命，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了。連根以為托洛茨基爲了『珍視陳獨秀的革命經驗』，即令陳獨秀的思想反動透頂（像他臨死時達到了的），還是會另眼相看，『對他不曾絕望』的。這不但證明連根絲毫不懂得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視，而且還證明了連根本人就是『實際主義』的俘虜。他之『始終敬愛陳獨秀』（這是他在一個文件上這樣聲明過的），擁護陳獨秀，替陳獨秀的反動思想辯護，大概這也就是原因之一。

至於說到陳獨秀如果不死，當他『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不管他今天的思想多麼錯誤，在大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的革命家來的』。如果這話是可靠的話，那就不但任何思想都沒有客觀原因，思想本身的發展沒有任何邏輯，而且任何思想鬥爭也就沒有意義了。然而這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自由主義和投機主義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毫無共同之點。

馬克思主義觀察一個人的思想轉變，例如從革命轉向反動，首先就必須分析其客觀原因，進一步則就其反動思想的廣度與深

度及其堅持性而推斷其發展的趨勢。陳獨秀的思想之轉向反動，其客觀原因，我們在『悼陳獨秀』一文中已經指出過，即在本文前面也略為提過了。至於陳獨秀的反動思想之廣度和深度，不但我們已經再三論述過，而且還有他發表過的許多文件可資檢查。總而言之，陳獨秀的反動思想，比之現時第三國際的普魯姆和阿特里們，只有過之無不及。如果陳獨秀不死，像他在許多文件上所表示過的，他是會堅持到底的，他在臨死前給L君的信中，更表明了他將以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資格，準備奮鬥到底。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托洛茨基不死，試問他會不會與之進行嚴重的鬥爭呢？我們相信托洛茨基是會同我們一樣，一定無情地打擊他的（像他過去打擊一切機會主義的叛徒們一樣）。但在鬥爭中，陳獨秀的反動思想只有按照其邏輯愈走愈遠，愈陷愈深。同時，一切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必然要利用陳獨秀的思想及其本人來反對革命，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特別是反對我們第四國際的主張。這種情形倒轉過來，又將影響陳獨秀的思想和行動，加速和加深他的反動過程。歷史上一切著名的曾經充當革命領袖的人物，如蒲列哈諾夫、考茨基、格德、安特列等，其思想的轉向反動及其反動的過程，差不多是如此。所以這種人到了後來，只能服從他們的反動思想發展的邏輯（不管願意不願意），雖然『在大事變的刺激之下』，也回不過頭來，只能替反革命去服務而已。因此，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陳獨秀如果不死，在同我們長期而嚴酷的鬥爭過程中，他的反動思想只有愈走愈遠，愈陷愈深，最後將變成國民黨、斯大林黨乃至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反對第四國際的最有效的工具。這樣的工具，即令在第三次革命到來時，『在大事變的刺激之下』，也只能替反革命服務而已。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起而不顧一切地批

評了他，爲的是預先減除他的反動影響，削弱他的反動作用。

假如連根的推測可以成立的話，那就只有把陳獨秀看作一個最沒骨頭的，東倒西歪的，隨便鑽營的投機政客，才可以思議。然而陳獨秀，按其個性及其生平爲人，還不是這樣一個沒骨頭的下流政客。遇到反動時，就往後退，看見革命時，就鑽到革命隊伍來贊成革命，這樣的人物，歷史上當然不少。但把陳獨秀想像成爲這樣的人物，似乎也是太過簡單，有點不合乎他的個性和身份的。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連根對於陳獨秀的推測都是不合理的。但有一點是差不多可以確定的，就是連根對陳獨秀的推測中，已經反映了連根的唯一主義，對思想鬥爭意義的輕視及其對革命之投機取巧的傾向。想像或推測他人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常常是會從其想像或推測中反映出自己的嘴臉來的。

從連根引敘托洛茨基對於陳獨秀的態度中，好像表明連根本人也常常是站在托洛茨基方面似的。因此，我們又不得不指出一個相反的小事實來，以資對照。例如他指責『狂妄的劉仁靜』曾經寫過一篇『可憐與虛偽的文件』『醜謗』陳獨秀，這好像與連根自己是毫無關係的。但事實是：劉仁靜寫的那個『文件』不但寄給了托洛茨基（這是連根已經指出來的），而且還在一個名叫『十月』的刊物的第一期上公開地登載了出來（但連根沒有指出這點），而連根呢，正是那個刊物主要編輯之一。因爲那時的連根是同劉仁靜屬於同一小組織（『十月社』），且成了劉仁靜的共鳴者和擁護者。假如我們用連根自己現在的話來說，那時他正是同着『狂妄的劉仁靜』一起，奏着第二把提琴，『參加於反動派的毀陳合奏』呢。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這位『參加毀陳合奏』的第二把提琴手，一轉手之間（反對派統一後），又變成爲『讚陳合唱』的第一名歌手了！

此外，當「八一三」抗戰開始，連根在武漢時不但是多少擁護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主張，並且還參與他的軍事投機企圖的。但自他來上海後，因為在我們的批評與鞭策之下，他又扭扭捏捏地轉到我們方面，並洩了陳獨秀在武漢時與某些投機政客們的拉攏勾當，最後還簽署了我們所起草的關於批評陳獨秀反動思想的幾個文件（在那些文件裏，我們曾經明白地指出：陳獨秀的思想是蒲列哈諾夫們之機會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的思想）。他甚至於私下裏對我們說：『陳獨秀是沒有希望的了』。可是，在陳獨秀死後，他現在又認為『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在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中『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的革命家來的』。這就可以看出，人們對於陳獨秀的態度，是多麼無原則，多麼反覆無常啊！

對於陳獨秀的態度，如果一定要說中國有人與托洛茨基所採取的立場完全一致的話，那就只有我們。當「一九二九年」『狂妄的劉仁靜』與其黨徒連根們『參加於反動派毀陳合奏』，極力『醜謗』陳獨秀時，我們即同托洛茨基一起，保護陳獨秀，指斥了這些人們的『狂妄』。當「一九三五年」『青年托派』施朝生等誇大獨秀的錯誤，『仍舊在狂妄的劉仁靜的領導之下』，輕率地，甚至是荒謬地『開除』他時，我們也是與遠隔重洋的托洛茨基不謀而合地向他們提出了警告和抗議（為此，著者本人當時曾有一函指責施朝生）。在「一九三七年」，即當「八一三」事變發生後，『一些青年托派爲了陳獨秀對抗戰的態度』（凡上面有括弧內的句子都借自連根的『托洛茨基與陳獨秀』一文），而主張與他公開決裂時，我們曾在領導機關內極力阻止了這一過火而輕率的傾向。隨後，我們看到斯大林黨徒們在其刊物及其所著的歷史書籍上公然抹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偉大作用時

，我們即爲文公開駁斥他們那種僞造歷史的無恥勾當，並表彰陳獨秀的不朽功績（該文曾發表於《中流》某號）。再後，當托洛茨基請陳獨秀去美洲，以便最後挽救他免於可怕的墮落，或就連根的話來說，『爲要免陳獨秀思想上的孤立』時，我們也曾舉起雙手贊成。我們在這整整十年的過程中，對於陳獨秀的態度是『保護』，『原諒』，『慎重』，甚至『優容』的，這些都是事實，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事實。

正因爲如此，我們更有權利，更有理由從思想上來批評陳獨秀，來同他鬥爭。所以，當陳獨秀的整個傾向還在往前進的當中時，我們雖然盡力保護他免於無聊的『醜謗』，但同時並不妨礙我們批評了他某些不正確的思想。同樣，當陳獨秀的思想已經向後面倒退時，我們雖然不可調和地追隨他每一反動主張加以評擊，但同時也不妨礙我們從國民黨，特別是斯大林黨人的惡毒『醜謗』下替他聲辯，保衛他的進步方面（尤其是屬於他前期的歷史方面）。

誠然，我們對於陳獨秀思想上的批評，比起托洛茨基來，不但數量上多得多，而且也更爲不客氣，更爲尖刻。但這並非我們好肆批評。只是因爲托洛茨基離得太遠，又無法直接從中文中獲悉獨秀反動思想的每一發展及其詳細內容和程度。但我們是能夠獲悉獨秀的思想反動的每一發展及其詳細內容和程度的。正因爲如此，我們不能不負起責任來擔負托洛茨基無法進行的批評工作。但我們對於獨秀思想的批評，一貫的目的只是希望糾正他，盡量地挽救他免陷於悲慘的墮落。因此，直到陳獨秀之死，在組織上我們還沒有提出『開除』他的問題來，只是給他以嚴重的警告而已。

至於我們對於陳獨秀思想上的批評，也只是根據於馬克思主

義的方法，根據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遺教，根據於第四國際的既定政綱，以及根據於一切歷史的經驗和客觀事實。我們從來沒有引證過不可靠的事實或傳言來批評陳獨秀，更不用說製造事實和無聊謾罵了。這是有我們的一切文件為憑的。我們在『悼陳獨秀』一文中，更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和歷史家的態度，雖然是簡括地，却是嚴正地科學地檢討了陳獨秀的生平，還他的本來面目，給了他一個歷史的評價。假如人們認定我們的『評價』在理論上或事實上有不正確或失實的地方，儘可以公開地指責出來，我們準備隨時加以解答，以為今後進一步研究陳獨秀的貢獻。因為我們認定陳獨秀是值得詳細研究的，詳細研究陳獨秀對於研究『五四』以來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是大有幫助的。

但不幸的是，連根意因們對於我們所給予陳獨秀的『評價』除了盲目地瘋狂地加以仇視外，就是翻過面來向我們含血亂噴而已。他們一點也指不出我們的『評價』究竟犯了甚麼理論上錯誤或史實上的失實，只是咬文嚼字地抓住幾個字眼，並且割裂開來，甚至故意修改來當作攻擊的目標。例如連根死死咬住『晚節不全』和『比孫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動』兩句話，以為這是我們『醜謗』了陳獨秀，向他『乘機拋擲污泥』，『參加於反動派毀陳合奏』，甚至是『卑劣小人』等等。總之，他利用了這兩句話，把他腦袋裏所能搬弄出來的惡毒字眼都搬出來加在我們身上，以圖逞他一時之快。凡是失掉了頭腦，為私利與私情弄昏了的人，總是如此的。但不管他這些，現在讓我們來略為解答一下吧。

不錯，我們曾說過陳獨秀『晚節欠佳』的話。然而我們說這句話，或下這一斷語時，絕非憑空瞎說，而是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具有最充分的根據的。我們的根據是陳獨秀最近七八年來思想上的不斷倒退，尤其是他對蘇聯，對抗戰，對這次帝國主義戰爭所採

取的態度，最後是他公然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極端反動思想等等。假如陳獨秀晚年所表現的這一連串廣泛而又深刻的反動思想，還算不得背叛，還算不得『晚節欠佳』，那末，蒲列哈諾夫、格德、安特列等老機會主義者，都算不得背叛，算不得『晚節欠佳』了。但何以列寧和托洛茨基總是指責他們曾經背叛了自己的過去，直稱他們爲叛徒呢？！連根在這裏替陳獨秀的『晚節欠佳』的評估叫屈，這不但表現他企圖修改陳獨秀晚年的全部歷史，而且還表現了他本人的頭腦也已經被機會主義的影子和液汁完全蒙蔽了、浸透了，以至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視若無覩。此外，因爲連根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曾與陳獨秀的反動思想同流合污，爲他辯護過，或者他想以否認陳獨秀的『晚節欠佳』來叫人們原諒他的過去吧！或者是因爲他現在已離開了第四國際，在思想上與汪派合奏，替日帝服務，藉此準備叫人們來『曲宥』他現在吧！或者是爲了更進一步地準備當他將來公開叛變時，叫人們來『曲宥』他的將來吧！但我們相信，連根替陳獨秀反動思想辯護的動機，上述的各種成份，多少都包含在裏面的。

至於『比孫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動』這個引句，不但是由連根割裂過，而且還由他修改過了的。我們的原文是：『陳獨秀所起的進步作用，比起孫中山來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爲深刻的反動思想結束其餘生』（『悼陳獨秀』圈點新加）。這種評斷不但完全合乎歷史事實，而且是最精確最辯證的。凡是稍具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懂得一點辯證法的人，對此都能了解。因爲孫中山的反動思想，只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主義之一般的普泛的和簡單的表現。但獨秀晚年的思想，却是經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學校，經過了階級鬥爭尖銳化，因而經過他的頭腦，從他口裏說出來的，就『更爲深刻了』。例如獨秀說：『布爾什

維克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主義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混合物。這段話雖是絕頂荒謬而反動的，但不能不承認是頗為『深刻』的，至少是孫中山絕對說不出來的。單就這一點，我們便很有理由斷定陳獨秀的反動思想比起孫中山來是『更為深刻』了。但連根却偷偷地把『更為深刻』的形容辭割裂出來，因而便修改成爲，陳獨秀的思想好像一般地『比孫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動』了。他這種『割裂』和『修改』，對於作文罵人時固屬方便有利，但一經我們揭穿之後，『不誠實』與『偽造』的頭銜就要落在連根的頭上了。他是常常喜歡罵別人爲『卑劣小人』的。但『不誠實』與『偽造』的人，應該將甚麼名字來稱呼他呢？！布卡說得真好：『作風就是人』！

× × ×

現在還剩下一個問題，陳獨秀晚年的思想是極右傾的，但『少數派』所肩着的招牌却是極左的。那末，何以極左傾的少數派居然會替極右傾的陳獨秀拼死作辯護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來加以說明。極右的機會主義與極左的清談主義（機會主義的變種），都是出於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意識。而陳獨秀之極右反動思想與少數派的極左空談，更是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對革命失望的悲觀意識。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了。陳獨秀與少數派的思想既是發源於同一的階級，反映了同一階級的悲觀意識，那末，少數派之替陳獨秀辯護，就已經在客觀上找到了解釋了。

就主觀方面說來，少數派與陳獨秀的地位當然有天壤之別。陳獨秀不管他後期的思想如何反動，但他是曾經在中國歷史上起過無比的進步作用的。無論從革命運動史上說，從社會關係上說

，都有他無可否認的重要地位，他無論站在那個立場上，無論在甚麼地方，只要他發言和活動，都能散佈相當影響，起相當的作用。總而言之，陳獨秀是具有着『號召力』的。至於少數派呢，無論是意因或連根（別的人更不要提了），他們在革命運動史上既沒有起過任何值得提起的作用，在社會上更是可憐而渺少的『侏儒』（請恕我在這裏抄襲了一下連根罵人的術語吧），而其政治資本又是那麼貧弱而陳腐，故他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難發生甚麼影響。說到『號召力』，更是與他們無關。最壞的是，每個都是『羊頭獅子心』的人物。同時又是一心專想在革命隊伍內『不勞而獲』的。在少數派與陳獨秀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對比上，就決定了少數派與陳獨秀間的關係。

當陳獨秀生存時，少數派的意因或連根乃至室川，都是希圖在陳獨秀的勢力之下，以便藉着他的『聲望』或『勢力』好在黨內和黨外活動，以便『不勞而獲』地滿足他們的獅子般的野心。少數派份子對於陳獨秀反動思想之多方遷就，曲為原諒，巧為辯飾，一直到最後還不敢從正面批評他，其原因就在於此。如果要挺起脊梁骨來批評陳獨秀，勢必同他招致公開的決裂，然而這是少數派所最害怕的，因為他們如果一旦同陳獨秀決裂，則就要變成無依無靠的孤零兒了。同樣的理由，也可以用來解釋少數派在陳獨秀死後還要稱他為『同志』，稱他為『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中國無產階級的大領袖』，斷言他如果不死，在第三次革命中『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的革命家來的』，以及拼死替他的反動思想，他的晚年變節作辯護等等——這一切，都無非為的是：希圖以陳獨秀的『同志』及其繼承人的資格（谷和曾經向外宣傳：繼承老陳的只有連根，這可見少數派份子早就把陳獨秀的『繼承權』『預定好』了！）以便現在和未來到社會各方面去從事

活動，去拾取『不勞而獲』的果實。凡是自身渺小無能而又不肯努力奮鬥的『侏儒』們，總是要依附一個『大人物』去滿足其某種慾望的。少數派之對於生的陳獨秀是如此，對於死的陳獨秀也仍然是如此。現在可以說是『活的少數派』在依附『死的陳獨秀』了。不過他們所依附的，不是陳獨秀的進步方面，而只是他的反動方面哩。

至於我們與陳獨秀的關係，則完全相反。當陳獨秀向進步方面走時，我們會以革命戰士的資格同他親密地合作過，艱苦地奮鬥過。當陳獨秀踏進了反動的道路時，我們也以同樣革命戰士的資格，堅決地、不斷地、同他的反動思想進行了鬥爭。

讓少數派以其特有的犬儒主義去替陳獨秀的反動思想作辯護吧，讓他們向以馬克思主義批評陳獨秀的反動思想的人去『拋擲污泥』任性狂吠吧！我們還是依舊『按着自己的道路走』。闡揚陳獨秀的進步方面，檢討他的反動方面，仍然是我們今後研究陳獨秀，乃至進而研究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一切值得研究的人物的指標。

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的 「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及其後果* ——「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鬥爭的新發展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九日)

前 言

現在發表的這篇文章，是一九四三年寫的「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的鬥爭」中的第三章。它的第一章概述托洛茨基自一九〇五年發表不斷革命後，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所引起的爭論。第二章論述不斷革命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後至十月革命的勝利所反映的情形。第四章論述不斷革命論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中國第二次革命中，從反面獲得了證驗。由於我在一九六〇年寫的「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該文英譯本發表於一九七二年五月紐約出版的「國際社會主義評論」，中文原本發表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香港出版的「十月評論」），差不多包括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內容，只有第三章一直留下來未曾發表。第三章的原標題為「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鬥爭的新發展」，副標題為「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及其後果。」我現在把原來的副標題改為正標題，以便讀者一看就可知道它的基本內容。

現在發表這篇三十六年前寫的文章。表面上似乎已陳舊，但它的內容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因為事變的發展更顯出了它的

* 原刊於《十月評論》、總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

意義的重要性。我們只須指出，去年（一九七八年）末，「社會主義的越南」侵佔了「社會主義的柬埔寨」，今年（一九七九年）二月，「社會主義的中國」又進攻「社會主義的越南」——這兩個奇特的事實，就夠表明：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如何的荒唐，對「社會主義」是如何的諷刺了！

但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侵佔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攻打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荒唐現象，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許多相信社會主義是國際主義的人們，都感到驚異，而無法解釋。實際上，這正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思想的邏輯發展。爲要用歷史事實來證明這種發展我又爲文論述了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和第二次大戰後發生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這裏須要特別指出的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在第二次大戰的二十年中，葬送了每個有勝利希望的革命，延長了早已衰朽的帝國主義的壽命，並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第二次大戰後，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同一政策，除了謀求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盡力阻礙了在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外，就是力圖控制新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了不能控制時，不是實行鎮壓，就是與之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並準備最後決戰。這就給了帝國主義的大好機會，得以利用和拉攏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準備反蘇的第三次大戰（即核子大戰）。要避免這種毀滅全人類文化的第三次大戰，只有在帝國主義的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在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保存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條件下，以群眾的政治革命摧毀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以斯大林爲首的「老布爾什維克」起而重新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思想，係開始於一九二三年末，正當十月革命剛渡過了它的第六週年，又正是列寧的病臨到絕望的時候——選擇這個時機來開始進攻不斷革命論，當然不是偶然的。

進攻的最初藉口是反對托洛茨基的「超工業化主義」，或「工業冒險主義」，及其「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隨後一直發展到「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來對抗「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此種「對抗」的鬥爭，在近二十年來蘇聯全部墮落的過程和世界革命的不斷失敗，以及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與爆發中，都烙上了它的最深刻烙印。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小資產階級的官僚層

但這一新的鬥爭究竟由什麼客觀條件所推動的呢？不斷革命論，既已完全由十月革命的勝利所證驗，且曾保證布爾什維克黨執掌了政權。何以這個執政黨內竟又形成了一個派別來公然反對這個已經被證驗的「理論」呢？這是首先須要特別加以解答的。因爲解答了這個問題，就等於解答了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及其「一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問題的大半。但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把十月勝利後所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環境，即它的國內情勢及其與整個國際的關係之變化，給以較爲詳細的檢討。

十月革命勝利後所遭遇的，是國內不斷的反革命暴動及物質的空前缺乏，與國外帝國主義聯合的不斷進攻和經濟封鎖。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最初三年，布爾什維克黨的根本政策，及其全部精力，差不多都放在以軍事對抗國內的反革命暴動與外

來帝國主義的軍事進攻上。而爲了這一目的，蘇維埃政府在經濟上不得不採取所謂「軍事共產主義」的政策。這是表示「那時的經濟生活完全屈服於前綫的需要」（見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二九頁，以後引語，凡未註出書名者都出自該書）。換句話說，那時蘇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盡力「支持軍事工業以供軍事的目標和維持城市人口不致於餓死」。但這政策「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快成功爲基礎的」。

軍事共產主義的嚴厲施行，雖然藉此勉強擊退了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攻勢，但同時使得國家的經濟愈趨枯竭，特別引起了廣大農民群衆的怨恨與反抗。因爲這個政策之最重要的一部份，正是強制徵收農民的穀物和原料。但農民後來竟以「埋藏食糧」和「縮小耕地」相答覆。於是「這時的國家和政府都陷於萬分危險的狀況之中」。同時，西方的革命因爲社會民主黨的無恥背叛，又未曾如願地成功來救援。這就迫使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改變政策，即以所謂「新經濟政策」來代替「軍事共產主義」了（這種改變，即使在順利的情形下，甚至在先進的國家也是不可免的）。新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是「由國家直接分配生產品的辦法」改爲「商業分配的制度」。依列寧的意見，乃是欲使幾百萬孤立的農民經濟通過商業經濟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即「工業要供給鄉村以必需的貨品，其價格要使國家無須乎強制徵收也能得到農民的生產品」。以此「在農民和國家工業之間」建立一種「聯系」，以便重新鞏固工農間的同盟，並藉此來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

但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結果，國家的經濟生活雖然很快地活躍起來了，可是同時有一層極廣大的社會成份也跟着活躍起來。這就是所謂「新經濟人」，或重新復活的資產階級份子，

其中是商人、小生產者，特別是富農，立刻在蘇維埃的經濟政治生活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富農們要求更多的土地以便重新剝削貧農，準備把持食糧，要挾政府。這種現象一經發見，就鼓勵了已在開始官僚化的一部份「老布爾什維克」，喊出了「面向農村」的口號，而事實上則是把臉兒轉向富農去。

這些老布爾什維克以斯大林爲中心（黨的總書記），季洛維也夫、加米也夫（他們分任彼德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主席）、李柯夫（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托姆斯基（全俄職工會主席），及布哈林（真理報總編輯）等則圍繞於斯大林的周圍。他們早在列寧抱病當中就已結成了一個小組，其直接目的在排斥托洛茨基。而十月革命後從各方面鑽進蘇維埃政府機關、職工會、乃至布爾什維克黨中的各式小資產階級投機份子（如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殘存政客、舊官吏、投機家、工人貴族及各種知識份子等等，他們是構成蘇維埃政府官僚化之人的源泉），更是自然而然地經過各種綫索開始聯系於斯大林的小組織周圍——在這些投機份子看來，斯大林的小組織乃是他們的利益之最適宜的保護者。我們應當回憶一下：十月革命，不僅是完全反對這些小資產階級投機份子的意向而進行的，而且也是大大地違反了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的意願（即違反了他們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論」）。於今十月革命是勝利了，而且勝利的果實正擺在面前，人們當然希望盡量來享受它，最好是盡可能設法來壟斷它——這便是斯大林在列寧病中拼命地拉攏「老布爾什維克」，組織小組，聯絡一切官僚份子，企圖把持黨政機關，排斥堅持不斷革命論的托洛茨基的全部秘密所在。這也正是列寧在病中異常憂慮政府機關的官僚化，不斷地警告黨，強烈地要求托洛茨基起而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列寧

爲此曾寫信給托洛茨基，——見美國伊斯特曼編的「蘇聯的真實狀況」），並在其「遺囑」中（這是列寧在病中寫給黨的領導機關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斯大林的性情粗暴，不忠實和濫用權力），堅決提議解除斯大林的總書記的職位之唯一原因。但當時斯大林的小組織不僅把列寧的警告和建議文件（連「遺囑」在內）向全黨隱瞞起來，而且更加嚴厲限制黨內的民主討論和自由批評。在這種情形下，托洛茨基當然不能再事容忍和沉默了。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面向農村」的經濟路綫，深深地感到有使農村離開城市，即農民脫離工人的巨大危險。於是，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提出了有名的「剪刀差」當作警告，即以兩片剪刀表示城市和鄉村，意思就是說：「假使工業停滯下去，繼續使兩片剪刀愈加分開了，那末，城市和鄉村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使兩片剪刀逐漸合攏起來，便必須發展工業。實行計劃經濟（當時托曾提出「五年計劃以代替一年計劃」的主張），使農民群眾能以其食糧和原料向城市換得較爲廉價的工業品。但要提高工業，首先必須籌得相當數額的資本。而這種資本，在當時除了向富農徵收外，實在很少辦法——然而這和斯大林「面向富農」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

同時，要提高工業，保護工農大眾的基本利益，發揮他們的創造精神，又必須認真制止官僚們的侵佔和壓制傾向，進一步讓工人和貧農出身的人們去代替他們。但辦到這點的前提條件，則需要盡量發揮黨、職工會和蘇維埃內部的民主討論和自由批評——這便是托洛茨基在列寧患病期間所屢次提出的。特別是在他的十月革命第六週年的紀念文中更着重地提出了「民主要求」。無須說，這又是和斯大林的「限制民主」絕不相

容的。

在國際情勢方面也愈來愈壞。布爾什維克及一般工農群眾所熱烈期待的西方革命經過一再失敗和遲延之後，從一九二三年重振起來的德國和保加利亞最有希望的革命，又被斯大林和季洛維也夫的錯誤政策斷送了。這不僅大大地增加了工農群眾的沮喪和消極，而且又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批評——工農的沮喪和消極雖可使官僚更無顧忌，但托洛茨基的批評，却是斯大林及其小組組織不能容忍的。

經濟上的不同意見，無產階級隊伍內的民主問題（即反官僚主義的問題），德、保革命失敗的爭論——這些滙合起來，就構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小組織間的嚴重糾紛。恰好這時一切象徵都證明列寧的病完全絕望。於是斯大林便大胆地、大規模地發動了反托洛茨基的鬥爭。這鬥爭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旬起，有如暴風雨般地在蘇聯共產黨內進行。僅因為列寧的逝世（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才把它暫時打斷了。但在這次鬥爭中也形成了「左派反對派」，由此發展成爲「第四國際」。

斯大林這時反對托洛茨基的「超工業化主義」或「工業冒險主義」，異常明顯地，事實上只是掩飾他犧牲工人和貧農的基本利益去遷就富農的那種拖延工業化的機會主義政策。而反對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更明顯地暴露他「完全企圖使黨的機關脫離黨員群眾的監督」。換句話說，就是企圖使官僚的腐化專橫脫離工農群眾的監視與批評。

斯大林的這種傾向，很露骨地代表着那個由小資產階級正在形成的官僚層，想憑藉黨、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來把持革命的果實，以便自由享受。換句話說，就是爲了新起的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企圖將革命的階級鬥爭按住不使前進，使它停留在一個階段。

裏。托洛茨基則完全站在工人和貧農的基本利益上，以繼續階級鬥爭，即不斷革命去抑制從新經濟政策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份子，特別要阻止官僚主義的發展，藉以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有時間等待並發動新的世界革命來救援。「不斷革命論」與「革命階段論」的思想衝突，便這樣地在第一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裏從新開展起來。

列寧之死，在表面上算是把這種「衝突」緩和下去了。但實際上，斯大林却是用加倍的努力，在各方面準備着一個更有效的進攻。他一方面以「列寧主義的徵求」為名將列寧「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黨門」「大大地打開」，讓「工人們、僱員們、小官員們成群結隊地擁進來」，使「革命的先鋒隊融解於沒有經驗的、沒有獨立性的、但是還帶着崇拜權威（指官僚的權威）的老習慣的落後人群之中」。其政治目的，顯然在「給列寧黨一個致命的打擊」，以便「官僚脫離無產階級的監督」，並藉此作為一個有力的武器打擊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最好的合作者，反官僚主義的倔強者——托洛茨基。

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開始撤換共產國際某些重要支部（如德國）的領袖，提拔較為柔順的新人（如特爾曼之流）來「負責」。這樣地準備好了之後，斯大林便於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七月召開了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莫斯科。前者「最後批准」了他的現行政策（包括面向富農與限制民主等）之「絕對正確」，這同時也就是斥責托洛茨基的主張之「絕對錯誤」。後者則「承認」了德、保革命失敗的責任是該國內負責的領袖們執行政策的錯誤。克里姆林宮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這同時也就斥責了托洛茨基對德、保革命失敗的批評是「錯誤」的。這就算是「合法手續」解決了黨內

思想鬥爭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上層少數官僚把持操縱，代替了黨員群眾的民主討論和批評精神。從此列寧黨的「民主集中制」就變成爲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了。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 「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的徹底背叛

但斯大林還不以此爲滿足。又於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公布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企圖以此「從思想上鞏固人心」，並打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之「空想」。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思想上公開表示與全部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傳統，即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決裂，以其新發明的反動思想體系來對抗它們。從這時起，「一國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國際主義」也就成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互相對抗的旗幟及他們之間的一切主張和政策的出發點。

但「一國社會主義」究竟何所根據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提出過：資本主義，就經濟的發展說，完全是國際性的。而社會主義更澈頭澈尾是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可以在一個國家內開始，但一定要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去完成。所以「共產黨宣言」最後高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都發揮了這種國際主義的思想和精神。而他們的行動，如組織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全是爲了實現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而努力的。那麼，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的根據究竟何在呢？

據斯大林最初說，「一國社會主義」是「根據布爾什維克

」的「傳統觀點」。後來直至甚稱這是根據「列寧的遺訓」。關於斯大林在這方面的無恥說謊和曲解，托洛茨基在其所著的對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綱領批評」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麼？」（該文載於「俄國革命史」第三卷附錄）兩文中，已精闢無倫和證據確切地給它們揭穿過了。但因為這個問題的異常重要和複雜，我們在這裏仍值得多費一些功夫給它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說明。

從布爾什維克的全部歷史和列寧的一切遺著中，假如不是有意附會和曲解，不但尋不出一點「一國社會主義」的影子，恰好相反，一切事實和文件都在證明：「一國社會主義」是絕頂虛偽的，荒謬的，極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布爾什維克的傳統立場和列寧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方向的。

早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通過的舊綱領中，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解放大運動，應當成爲，而且已經成爲國際的事業（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麼？」一文所引，下面引文，凡未註出書名者都出自該文，圓點是本文著者所加）。在一九一七年第七次黨大會上討論新黨綱的草案時，更加上了一段話：「……我們的社會革命，只能以國際革命的資格得到勝利。革命不能單單在俄國勝利，而讓資本主義仍然存在於周圍國家。」在第八次黨大會上（即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通過新黨綱的草案時，列寧在答覆一個代表不贊成黨綱內有一條提起「下次社會革命」的演說中道：「這個意見是顯然不能成立的。因爲我們的黨綱說的是世界範圍內的社會革命」。一九二一年共產主義青年團所通過的綱領也有一條說：「俄國雖然具有豐富的天產，但在工業上說仍不減其爲落後的國家，其中小資產階級人口又佔支配的地位。俄國只能經過世界無產

階級革命而達到社會主義」(這綱領是列寧所領導的政治局——其中包括斯大林——所批准的)。如果說，「俄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那在黨綱中一定會提到的。可是所有的黨綱中重複地指出的恰好相反：「俄國革命只能以國際革命的資格得到勝利。」「俄國只能經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達到社會主義」——這便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傳統觀點」，並且為黨綱所明文規定，為全黨所通過和擁護過的。斯大林怎能對此加以附會曲解呢？！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列寧對於這一最根本的問題所發表的意見究竟如何。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雖然堅持俄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經過「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但他認為俄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引起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而歐洲革命的爆發又必然反過來推動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走上勝利——這種將俄國民主革命而歐洲社會主義緊密地聯系起來的國際主義思想，在列寧那一長期內所寫的文件中就像一根紅綫把它們連貫了起來。這是隨便翻閱得到的。只要把「兩個政策」翻一下就夠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放棄了他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見「四月提綱」）。這正是從國際主義的觀點，即從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引起歐洲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並能從後一革命獲得直接的援助作出來的。所以列寧在他的「四月提綱」中，除了着重地主張無產階級準備奪取政權，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專政外，更強調「革新國際」：「發起建立革命的國際，建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反對中派的國際」，以此去加緊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使其與俄國的革命相配合。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便公開地宣稱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這就是說，在俄國「十月革命開幕」後，跟着而來的是「世界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對於西方革命的期待愈益強烈。這表現他把俄國無產階級保持政權的命運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不可分離地聯系了起來。底下是從「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麼？」一文中摘引下來的列寧對於這一問題所說的話：

「世界帝國主義和社會革命勝利的進展，二者是不能並立的」（一九一八年三月）。

「我們的落後地位推動我們走向前去；倘若我們不能支持到其他國家暴動的工人有力地走來援助我們的一天，我們就要滅亡的」（一九一八年四月）。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過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國家構成一個系統內過生活。蘇維埃共和國在帝國主義諸國旁邊長久生存是不可想像的」（一九一九年三月）

「我們明白，沒有國際革命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一年，重點是我加上的）。

上面所引的幾段話是非常明顯的：「沒有國際革命來支持」，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又怎能談得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呢？！

關於在俄國「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列寧說得更為詳細而更否定。讓我們從上面所引過的同一文件中摘引幾段來看看吧：

「因歷史曲折發展而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其地位愈落後，則愈難從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一九一八年一月）。

「我們容易開始革命，但難於繼續革命。西方更難於開始

革命，但易於繼續革命」（一九一八年五月）。

「同先進的國家比起來。俄國人更容易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們更困難繼續並進行直到最後的勝利，即直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全組織」（一九一九年）。

「建設之事，完全依靠於歐洲主要國家革命勝利的速度。唯有這個勝利之後，我們才能認真從事建設」（一九一九年）。

「我們指望着國際革命，而我們的指望毫無疑義地是對的。……我們始終提醒人們說：「社會主義事業不能在一國完成」（一九二〇年十月）。

「國際社會主義先鋒隊的光榮職務，我們現在清楚看見革命以後如何發展了：俄國開始之，德國、法國、英國完成之，社會主義就勝利了」（一九一八年）。

「切勿忘記，我們單獨……以自己的力量，並不能在一國國家裏完全成就社會主義革命，即使這個國家比俄國少落後也不可能。（一九一八年五月）

「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是不可思議的。這個勝利要求若干先進國家積極合作，俄國却不能算在先進國之內」。

「我們還未曾成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哩。臨終的資本主義還能以其敵對力量破壞我們。必須明白了解此點。因為最危險的東西莫過於幻想和糊塗，尤其當站在高位的時候。我們承認這個苦真理，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也沒有什麼真正令人失望的事情。因為我們屢次宣布這個真理，即是說：爲了社會主義勝利，必須好幾個先進國家工人的共同努力。這個真理乃是馬克思主義的A·B·C。」

（一九二二年初，上面引文的着重點是我加的）。

列寧上面的話，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共同之點呢？不但毫無共同之點，簡直是與之相反的。要建設社會主義或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至少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積極合作」，但「俄國却不能算在先進國家之內。」落後的俄國雖然「容易開始革命」，但「難於繼續它」，更不用說「單獨以自己的力量」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了。所以列寧重復地告訴我們：「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俄國革命不過是國際革命鎖鍊中一個環子」，「俄國革命不過是一個榜樣，不過是連串的革命的第一步」，人們怎能夠在一個革命的「序幕」裏，在它的「一個環子」裏，在它的「第一步」裏來完成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呢？

就是斯大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寧死後三個月，在他自命為發揮「布爾什維克傳統觀點」和「列寧精神」的「列寧主義問題」那個小冊子中也曾寫道：「在一國之中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還不是說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已有了保證。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在我們前面未曾解決。若無幾個前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解決這個任務麼？不，不能夠。爲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國的努力是夠了——這點我們的革命史已給我們證明了。爲了社會主義的確定勝利，爲了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則一個國家的努力，尤其像俄國這樣農業國家的努力，並不夠用——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努力，……」（重點是加上的）。雖然「列寧主義問題」中充滿着陳腐氣、公式化和機械化，是一種死版的教科書，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觀點」和「列寧精神」很少符合之點。但前面幾行的思想却是列寧的

，因為這是斯大林從列寧的著作中差不多按原文抄下來的。由此更加證明：「所謂「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不但在列寧所有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據」，就是斯大林自己寫的「列寧主義問題」，也是堅決地否認了它的。

可是，斯大林既已背叛了「布爾什維克的傳統」和「列寧的遺訓」而製造了「一國社會主義」的新公式來對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的國際主義，那無論如何必須從列寧的著作中找點「根據」，否則，不但無法欺騙工農大眾，就是要安慰他的官僚層也不可能。於是，斯大林便動員了大批「紅色教授」，鞭策他們到列寧所有的遺著中去搜尋。結果算勉強地尋出了兩個「根據」：一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論歐洲聯邦的文章中順便提到：工人階級應當不觀望別人而在每個國家奪取政權，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另一個是列寧在一九二三年論合作社問題時，說起蘇維埃共和國內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夠的東西」，「即使沒有新革命，亦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斯大林後來用以抵抗托洛茨基批評的全套武器的資源，並寫進第三國際的綱領之中。但列寧順便提到的這幾句話，如果把它們完全孤立起來，斷章取義，任意加以附會，不僅與列寧前後所寫的一切文件及其行動完全矛盾，就是和他在同一時期所發表的文章也是絕對衝突的。例如，列寧在一個一九一五年起草的黨綱草案中關於同一問題寫道：「俄國無產階級底任務，乃是澈底實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了燃起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之火。這第二個任務現在是同第一個任務非常接近了……在第一個任務，合作的是俄國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在第二個任務，合作的是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重點是加上的）。這不是明顯地從階級關係上否認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嗎！至於論合作社所

提及的「一切必需的和足夠的東西」，原文表示得很明白，指的僅是關於政治的和法律的前提，這有列寧於同時（一九二三年初）寫的論文中下面幾句話可為鐵證：「我們缺乏，正是一種能讓我們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文化，雖然已經有了為這個過渡之間的政治前提」（重點是加上的）。正因為俄國缺乏「一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文化」，列寧三番四復地警告：不能在「一個國家裏完全成就社會主義革命」。要認真從事「建設」，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歐洲主要國家革命勝利之後，才有可能」。難道這還有任何詭辯之餘地嗎？！但斯大林每次背叛列寧思想，到了無法自圓其說時，總是命令紅色教授從列寧的遺著中搜尋幾句話，斷章取義地用來掩飾他自己的背叛，以抵制別人的批評。這也是所有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們所慣幹的勾當，不過斯大林在這方面是登峰造極罷了。

最帶諷刺意義的是：當托洛茨基列舉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列寧的遺著，甚至斯大林自己寫的東西（如前面摘引他在「列寧主義問題」內所寫的一段話），來證實「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背叛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觀點和列寧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方針時，斯大林却反過來說這是由於「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不相信它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據列寧的意見，革命首先從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吸取力量，據托洛茨基的意見，則人們相信，不可缺少的力量只能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地盤上得到」。這有如拿手槍打人，打錯了目標，子彈反射過來落在自己的胸膛裏！真正「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的，正是斯大林自己和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們。因為他們不僅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在二月革命後至列寧回國前都堅決主張俄國無產階級不能在歐洲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

利之先奪取政權。甚至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夕，斯大林對暴動能否勝利還在懷疑，因而他對暴動所採取的態度是暗中阻撓的。至於托洛茨基呢，正因為他特別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所以從一九〇五年起即堅持它首先必須在俄國奪取政權。且曾以此觀點反對孟什維克，甚至反對列寧。十月革命的勝利，難道不是恰好證實了托洛茨基的「相信」嗎？！

至於說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能夠在俄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托洛茨基對此當然是「絕不相信的」。他早在一九〇五年就斷定過：「在俄國經濟條件底下，……若無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政權幫助，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政權，並轉變其臨時的統治為一種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因為「國際主義對於我們並非一個抽象觀念。……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直接的指導原則。除了歐洲革命之外，我們不能想像一個穩固的確定的成功（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三日「真理報」）。所以他在十月暴動勝利那天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即奪取政權之時便宣稱：「如果歐洲暴動的民衆沒有壓死帝國主義，我們就要被壓死的——這是無可置疑的。或者俄國革命激起了西方革命的怒潮，或者各國資本主義者將窒死我們的革命」。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問題時，更明白地指出：「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真正的猛進，須待歐洲最重要國家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前面各引文的重點都是我加的）。托洛茨基在上面幾段話內，以及其他的許多話內，雖然明白地表示「不相信」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在俄國一國內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但他異常「相信」歐洲無產階級的力量，希望他們的勝利來援助。這正是根據不斷革命的一貫的國際主義思想，把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密切地，不可分離地與歐洲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命運聯系了起來。但這正是列寧的思想，如我們前面所引證過的。由此可以證明：「十月革命」後，對於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前途與世界革命關係的基本問題，托洛茨基和列寧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在「四月」後（即列寧發表「四月提綱」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完全一致的一樣。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詆責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恰好暴露了他是站在一種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上，壓根兒不相信歐洲無產階級的力量，不相信國際革命對於俄國無產階級命運的決定意義，這又如他從前過份相信農民，堅持「工農民主專政」公式，而「一般地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可以領導農民走上自己的專政一樣。由此可見，一種反動思想的邏輯發展，對於庸人們頭腦的支配力真是無限的。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正式公佈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由」時，宣稱：「……我們的黨沒有權利欺騙工人階級，應當明白說：若無把握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則我們應當拒絕政權，而從當權者的地位轉到在野者的地位去……」（這也就是暗示反對派應當轉到在野者的地位去）。斯大林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保守主義，在這裏是以一種極端愚蠢的「目的論」提出來了！但共產國際竟完全接受了這個觀點，寫在決議案上，說：「反對派方面否認這個可能性（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啻否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托洛茨基答覆得很妙，原來「『前提』並不在世界經濟底一般狀況裏面，並不在帝國主義底內部矛盾裏面，並不在俄國階級關係裏面，而是在一國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預先保證裏面！」！不過我們還得加上幾句，而且並非不重要的幾句：原來俄

國革命的「目的」，只是爲了「預先保證」小資產階級官僚們能坐收革命的成果，在一個國家內關起門來和平地建設社會主義，安度他們和平而舒適的生活哩——「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全部秘密便在這裏面，斯大林之拼命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即反對他在國內繼續階級鬥爭，在國外推動世界革命的秘密也在這裏面，爲着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試圖激起貧農反對富農，激起工人和貧農反對新興的資產階級份子，反對官僚的壓迫，以期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推動世界革命，消滅資本帝國主義，以此打破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孤立狀態，並走向完成世界的社會主義，——這一切，在斯大林代表的官僚層看來，都是極度「危險的」。因爲對內繼續階級鬥爭反對官僚，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就是直接消滅他們；對外進行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說不定要將俄國拉進一個革命戰爭之中，大有可能打破官僚的統治。所以官僚們都一致地堅持：震動得夠了，我們現在有權利休息一下，我們要在國內和平地建設社會主義，信賴我們吧，信賴我們的領袖吧！——這就是全體官僚的呼聲，也就是斯大林的靈魂深處流露出來的呼聲！

於是，「一國社會主義」，不多不少就是小資產階級官僚層的意識形態之體現，而斯大林則是這一意識形態之人的體現！

現在，讓我們引一段最富科學預見的文字來結束這一問題吧：

「俄國無產階級從來不想建立孤獨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國內經濟和政治上若是小資產階級佔優勢，在相當限度內，可以接受這樣的一種國家，它設法同外界隔離起來，以鞏固

其經濟基礎——但在當代技術和當代經濟之下，這些形式變成爲最不穩定的」，（上面一段話是托洛茨基從斯特潘洛夫和斯克伏錯夫合著的那本著名的「電氣化」摘引下來的。這部書會經過列寧的審查和修正，並替它作了篇序才出版的。據托說：「這幾行可注意的字無疑地是出於列寧之手的」。重點是加上的）。

從上引的一段話裏表示了三個最基本的思想：（一）「俄國無產階級從來不想建立一個孤獨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綜合布爾什維克、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全部思想得出的總結論。這個結論，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前，就是斯大林也完全同意的。（二）「一個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像「經濟和政治上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俄國，「在相當限度內可以接受這樣的一種國家」，這裏所謂「相當限度」，就是指若無世界革命的直接援助，或世界革命的遲延到來。斯大林正是在這樣的「限度內」，在西方革命不斷失敗，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德國革命失敗之下，依據「經濟和政治上佔優勢的小資產階級」，且已形成了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而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即「一個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來的。（三）斯大林後來也正是把這種「理想」國家「設法同外界隔離起來，以鞏固其經濟基礎」，即以犧牲世界革命爲條件，同一切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乃至帝國主義者妥協，以幾個「五年計劃」來「鞏固其經濟基礎」，但在「當代技術和當代經濟之下，這些形式變成爲最不穩定的」——關於這方面往後就要談到，而且現在已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預見，這裏又一次得到光輝奪目的證明！

× × ×

斯大林的官僚主義，最後分析起來，乃是俄國社會經濟物質的一般貧乏，無產階級文化水準的一般低落，及小資產階級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支配地位——在這些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若得不到世界無產階級勝利之及時的和直接的援助，其墮落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墮落的原因，又是其結果。而「一國社會主義」則只是掩蓋此種官僚主義的醜惡之一副堂皇的面具而已。

孟什維克把俄國革命限於完成民主主義，拼命阻止它發展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去，可以稱之為「民主主義階段論」。斯大林把已經超過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限於在俄國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極力妨礙它發展到全世界去，這可稱之為「民族社會主義階段論」。

孟什維克的「民主主義階段論」，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幻想（即超階級的民主主義）觀點出發，而建基於對資產階級的妥協和對無產階級的不信任之上。斯大林的「民族社會主義階段論」，則從同一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自足（即民族保守主義，實際上也是幻想的）觀點出發，而建基於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妥協與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不信任之上。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則完全與之相反，它是最澈底的階級鬥爭論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之結晶，它對俄國無產階級抱着確信的態度，因而主張它乘着民主革命的發展去奪取政權，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它對世界無產階級抱着同樣確信的態度，因而主張已在俄國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去，藉以援助俄國的革命，直到完成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

從孟什維克的「民主主義階段論」到斯太林的「民族社會主義階段論」這是「階段論」的邏輯之進一步的發展。從俄國民主革命不斷地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到從俄國社會革命不斷地擴大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斷革命論」的邏輯之一貫的一往直前的展開，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的鬥爭中，斯大林成了孟什維克的繼承者，托洛茨基則始終忠實於他自己的主張。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對內對外政策 ——極右機會主義時期（1924-1928年）

斯大林自宣布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後，他的對內和對外的反動政策（所謂「總路綫」）也就愈益自信而胆大起來。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斯大林在國內實施富農路綫最無顧忌的年頭。他爲了討好富農，把農產稅的大部份加在貧農身上，並讓富農「把國家信用借款的好處奪在自己手中」（見托氏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以後引語未註明者仿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竟承認了農業「中僱用勞動者和租借土地爲合法」，這就根本破壞了列寧的土地法案（土地不許租借及不得僱用他人耕種）。同時，斯大林甚至準備放棄國有土地。有一個蘇聯記者向斯大林問道（這是他示意的）：「爲了農業的利益，把分給每個農民耕種的那塊土地，讓給他們十年，豈不更爲便利嗎？」他答道：「是的，縱然讓給他們四十年也可以」。「喬治

亞人民委員會委員，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會起草了一種解除國有土地的法案。」因此，迫着左派反對派不得不起而提出嚴重的抗議：「黨應當抵制並撲滅那些主張取消國有土地的傾向。因為土地國有，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之一」（見一九二六年左派反對派綱領）。僅因為此種抗議，斯大林才停止了取消國有土地的主張。這時代表斯大林小組織的理論家是布哈林，他曾向農民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努力致富」！這意思就是說，希望富農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斯大林爲了掩飾他向富農妥協的政策，對於當時左派反對派所指出的「農民向兩極分化」的現象，甚至極力否認。事實上，他既「承認了農業中僱用勞動和租借土地爲合法」，就等於承認農民向富農與貧農的兩極分化了。

斯大林對後來大吹特吹的農業集體化，在這期間所採取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但左派反對派却要求：「對於鄉村中個別農民的生長，我們必須加速集體農場的發展以抵制之。我們必須有系統地幫助貧農組織集體農場。一切合作社的工作，應當帶有轉變小的生產爲大的集體生產之目的」。可是，莫洛托夫（後來的人民委員長）代表斯大林重三復四地說道：「我們決不能『躍進』貧農的幻想裏面去，以爲廣大農民的集體化是可以實行的」。這已是一九二七年年底說的話。差不多同時，後來的農業人民委員雅可列夫也說：農村社會主義的建設，雖然只有經過集體化才能完成，但這不是在一、兩年或三年就可以作到的，也不是在十年以內可以成功的。「集體農場和公社，現在，乃至今後長久時期無疑地只是農民個體經濟的大海中一些小島而已」。然而不到一年，同一莫洛托夫跟着斯大林「躍進了貧農的幻想裏面」；同一雅可烈夫竟宣佈蘇聯農業已經百

分之八十至九十集體化了，農民的個體經濟快要消滅了，於是「大海」變成了「小島」，「小島」則變成了「大海」！

斯大林既以全力推行他那個教富農「努力致富」的政策，對於托洛茨基主張發展工業的政策也就愈加非難和嘲笑了。李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斯大林聲援之下，甚至公然主張「抬高穀物價格，以便給農村資本主義以更廣大的地盤，縱然將工業發展速度放低亦在所不惜」。這就迫使托洛茨基又不得不起來抗議了，他在一九二六年黨大會的演說中高聲叫喊道：「加速工業化，用對富農增稅的方法，將產生大量貨物和較低的市價，這對於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是有益的。……『面向農村』，並不是教你們把背對着工業，它只是說工業要向着農村。因為國家的『面』，假如不包含工業在內，那對於農村是沒有用的」。

（重點是加上的）。斯大林對此大發雷霆，詆之為「虛幻的計劃」，說「工業不應該跑上前去，而與農業分離開來，並放棄我們國家（實際上是富農）積累的步驟」。斯大林有一次甚至公開嘲笑建立得尼伯的大水電站，說這有如「一個農民不去買一隻母牛，而去買一架留聲機一樣。」當一九二五年托洛茨基提出的經濟綱領，主張將生產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時，官僚譏此為「一種未來的渺茫虛幻的音樂」。所以遲至一九二七年官方第一次草成的五年計劃，對於生產的增加，還只規定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但也正因此，反對派稱之為「烏龜速度」。總而言之，「國家資本若過多用在大的建設上，那是很危險的」，——這就是那時當權者給「超工業主義者」所下的最後警告。這是一九二七年黨十五次大會上所發出的，然而離斯大林的真正「超工業化」的新五年計劃已經很迫近，只差一年了。

但斯大林依靠富農阻止工業化的政策，到一九二六年初即

已露出它的政治結果了。「它使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信心，許多下級蘇維埃被他們奪去。官僚的權力和自信心也日益增加，對工人的壓迫也漸漸加重，最後是黨和蘇維埃的民主之完全禁絕」。這樣，一部份革命的黨員和工人群眾便感到切身的威脅了。還在當權地位的兩個著名人物，那就是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他們從斯大林的小組織脫離了出來，公然站在反對派的地位，並帶着他們的信從者加入了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反對派的勢力是生長了，但斯大林的壓迫也跟着增加起來。而且各式各樣的官僚份子和投機家們也愈來愈堅決地擁護斯大林。跟着，富農們的勢力也愈益增長而且愈益胆大。到一九二七年底至翌年初，他們竟公然以對城市封鎖食糧來威脅了。

斯大林的對內政策既是完全依靠富農，阻碍工業化，打擊工農群眾，並釀成了富農的大威脅，那他的對外政策又如何呢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無論何時何處都是國內政策之繼續與延長，因為二者都是由同一統治階級所執行，並追求同一歷史目的」。斯大林既以「一國社會主義」為前提，他就必須要「使蘇維埃的外交政策脫離革命綱領的約束了」。

約與富農路綫同時，斯大林經過布哈林宣佈了「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的福音。此種在國際上的「和平主義」政策，正是在國內「希望富農進入社會主義」政策之「繼續與延長」。而且人們實現和平福音的唯一辦法是：教世界無產階級給資產階級以「壓力」，使其保持「中立」，不起來「干涉」蘇聯，以便「和平建設社會主義」。在這一路綫之下，斯大林於一九二五年命令蘇聯赤色總工會中央委員會與英國黃色工聯總委員會建立了同盟，即所謂有名的「英俄委員會」

(一種純粹的上層拉攏)。爲的是經過這種機關去教英國工人階級給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以「壓力」，讓它「中立」，使張伯倫、包爾溫和邱吉爾等的反蘇聯計劃不得見諸實行。但事實上，却大大地幫助了英國那些黃色領袖們（如斯夫列、喜克斯、喜特林及白亞利之流），給他們已往的無恥欺騙和叛賣行爲塗上了一層頗爲光亮的淡紅色彩，得以重新更便利地欺騙工人的眼睛。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就是在這種「英俄委員會」（它會規定俄方不得干涉英國工人運動，所以在罷工中，斯夫列們拒絕了蘇聯工人的物質援助）的可恥政策下葬送了的。斯大林還未獲得英國資產階級在其工人階級的「壓力」下「中立」時，而他自己却首先在英國黃色領袖們的「壓力」（壓迫他不得干涉）之下對英國大罷工「中立」起來了。但托洛茨基曾堅決反對「英俄委員會」那種機會主義的上層勾結。在大罷工中，他更堅決地主張和那些黃色工賊決裂，把他們的叛賣罪狀在工人階級中宣布出來。然而斯大林却詆責此種主張乃是迎合着張伯倫和包爾溫的願望，事實上恰好是斯大林通過斯夫列和喜克斯們執行了張伯倫和包爾溫的「願望」哩！

斯大林對於中國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所實行的政策，不過是「英俄委員會」的政策在東方的表演。不同之點僅在其規模之大和失敗之慘，遠遠超過英國的大罷工而已。

斯大林一九二二年八月通過共產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企圖通過這種「合作」以推動國民黨走上革命，「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完成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使中國成爲蘇聯在東方的可靠「盟友」，好讓他在蘇聯「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所以斯大林對於蔣介石，不但沒有及時揭露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而且以蘇

聯和共產國際的聲望替他塗上一層粉紅色彩；在物質方面（軍火與金錢）盡量支持他武裝他；並強迫中共作他的「苦力」在群眾中替他作義務宣傳，提高他的威望。甚至在蔣介石實行了反共的「三月二十日政變」（一九二六年）之後，斯大林還是照樣支持他，承認他在政變中「建立的軍事獨裁」，接受他限制共黨的「整理黨務案」，擁護他「領導北伐」。但當蔣介石藉着北伐的進展，達到長江流域時，便立刻回過頭來實行了他的第二次反共「政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變」），轉身投在帝國主義的懷抱之中，成爲蘇聯在遠東的可怕敵人。在蔣介石實行反革命後，斯大林又轉而依靠汪精衛，希望他代替蔣介石繼續革命，「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但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最後舉行了他自己的「清共」（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同樣投降了帝國主義，成爲與蘇聯不可調和的敵人。

托洛茨基自始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隨後又不斷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實行獨立領導工農革命的政策。所以他嚴厲地批評了斯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斷言此種政策一定斷送中國的革命；只有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準備無產階級及時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最後他提出警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在蘇維埃的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失敗」（見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全會上講演，重點是加上的）。歷史的記錄，恰好證明了斯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是中國第二次革命的絞索，托洛茨基的「最後警告」變成了預言！

「一國社會主義」與特爾米多 ——反革命的政變

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之可恥的失敗，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悲慘收場，以及同年底蘇聯富農對城市封鎖糧食的威脅——這一切事實已暴露斯大林的「總路綫」完全破產了；同時，這些同樣的事實，從反面證明托洛茨基的主張和批評是完全正確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話來說，他此時「應該從當權者的地位轉到在野的地位去」。可是，官僚主義的本質却是：如果它自身的錯誤愈是被暴露就愈要把持政權。如果事實證明反對派的意見和批評愈是正確就愈非加以壓制，乃至根本加以剷除不可。當一九二七年鬥爭發展到異常激烈時，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指着反對派說：「這些幹部，唯有用國內戰爭才能趕走的」。這是「特爾米多」的一個預告。特爾米多很快就會到來了：

與列寧手携手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創造蘇維埃政府，建立紅軍，消滅國內反革命的暴動，抵禦國外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因而得以保全無產階級政權的托洛茨基，現在僅因為他堅持貫徹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十月革命傳統，在「托洛茨基主義反革命」的罪名之下，被開除黨籍，褫奪其一切職權，被投到流放地去了，一九二九年初又被驅逐到國外的土耳其。和列寧一起共同建立布爾什維克黨，並為其左右手的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則在「季洛維也夫主義反革命」罪名之下，獲得了差不多同樣的處分。在十月革命和內戰當中建有殊勳的幾百個革命英雄，及上萬的英勇戰士，也僅因為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和他對「總路綫」的批評，反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而被開除黨

籍，被撤職，甚至被監禁，被充軍流放地去了。其中有不少的烈士更因此被槍決或被謀殺了。而代替這些革命元勳和英勇戰士的地位的，不是墮落的老布爾什維克，就是新進的投機份子，有些甚至在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站在反對地位的。蘇聯領域這一幕悲劇，按年曆計算發生於一九二八年（一月開始），和法蘭西一八九四年特爾米多月發生的事變成了歷史的對照。歷史雖然並不重演，但階級鬥爭的邏輯自有其歷史的淵源，在一定類似的歷史條件下，其結果也往往是相類似的。

斯大林的特爾米多完成了官僚主義的「最後勝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是被絞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此讓位於官僚專政。十月革命的傳統和列寧的遺教澈頭澈尾地被背叛了。但十月革命和列寧的名字，仍然被特爾米多份子利用作掩護官僚專政的盾牌！

從極右機會主義到極左冒險主義時期

（1928-1933年）

斯大林實行特爾米多打敗了左派反對派後，官僚的統治地位似乎鞏固起來了。但富農對城市封鎖糧食的威脅却愈益嚴重，並大大地招致了城市工人群眾的不滿，甚至引起了官僚內部的分歧。在這種情形下，斯大林經驗主義地來了一次轉變，即轉到那個所謂「五年計劃」建設經濟的時期。如果從他在國際方面的宣傳和政策說，就是所謂「第三時期」。

斯大林這個轉變的顯著表現，就是不聲不响地放棄了以前起草的，並為黨大會原則上批准的那個「烏龜速度」的計劃，而以一個新的計劃來代替它。但這個新計劃的基本內容，是全部從被打敗的左派反對派綱領中借來的，僅僅是斯大林在這

個計劃內加上他自己的「超工業化幻想」和官僚的粗暴與混亂而已。於是，斯大林從極右方跳到極左方，「正如歷史上所常見的，機會主義一轉變，就轉到它的反面——冒險主義。」

「五年計劃」施行的結果，給蘇聯帶來了經濟的復興，無疑是值得大加讚許的。正當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在空前恐慌打擊下，而陷於稀有的衰落、痙攣與死巷時，蘇聯的經濟卻蓬勃地生長起來：無數的工廠和電站都在各地被建立，工業生產指數，由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一九二九年增加至二百，一九三三年增加至三百。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這成就却是由於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並證明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較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無比地優越，即令是在官僚的歪曲之下，還是顯現了它的優越性。同時，也就證明了托洛茨基以前之提倡工業化是絕對正確的，具有無比的遠見的。對於斯大林呢，只是證明他以前反對工業化及其「烏龜速度」的可恥和短視而已。

但斯大林的新「五年計劃」，既加上了他自己的「超工業化的幻想」，憑空要求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隨即又規定「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同時，對各工業部門間，尤其是對於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又很少顧及到它們的互相聯系、配合與平衡。而對於資本更無相當的準備……——這一切便使計劃本身埋藏了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矛盾。再加上那些脫離群眾監督的官僚們，以其特有的愚蠢和粗暴，手中拿着行政的鞭子，以致在施行計劃的當中，矛盾、混亂和脫節的現象，層出不窮，浪費了無數的物質和精力。官僚們爲了追求數量的堂皇，又使質量降低到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品的水準以下。（請參考新生命書店出版托著「十月革命與五年計劃」中「五年計

劃之初步估計」一章)。對於資本的缺乏，就全靠印刷機趕印盧布來補充。因此，盧布從一九二八年的十七億，到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八十四億。像這種通貨發狂的膨脹，反過來又尖銳地提高了一般的生產費，即提高了一般消費品的價格，大大地減低了工資的實質，最後使全部經濟失去了一種衡量和計算的尺度。最壞的是：工人大眾在官僚們的鞭策之下，在日常消費品的缺乏之下，在工資的實質減低之下，弄得生活痛苦不堪，——他們於無可如何時，只得以粗製濫造，損壞物資，機器，怠惰和不斷轉換工廠等等來答覆（請參考上引同書「工人生活」一章）。在這種情形下，被開除，被撤職，被流放和被驅逐的左派反對派，又不得不起來從事批評，向斯大林官僚們提出警告和建議了。

托洛茨基在五年計劃開始及施行的過程中，即以不倦地指出它的冒險成份，指出它對於各工業部門間之缺乏聯系、配合與平衡；指出投於重工業的資本如果太多，將太過份地減少日常消費品的部份，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提高。他並幾次三番地說：「在不正確的計劃之下，或者更重要的，在執行期間不正確地調節此種計劃，則五年計劃行將完結時，將有危機的發展；而在利用和發展其無疑的成績上，將發生不可超越的困難」。將五年計劃改為四年計劃，是輕率的冒險行爲」。賴哥夫斯基則指出，「無論在計劃中所規定的生產增加程度，或所擬的資本建設，都是沒有準備的」。因此他們發出警告：「資本建設的計劃，將發生極大的崩裂」。通貨的瘋狂膨脹，正是此種「崩裂」之表現。反對派又指出：「工人生活的水平以及他們在國家中的作用，是新社會勝利的最高標準」。如果斯大林的官僚們是從這個觀點上解決經濟計劃的任務及靈活地調節

經濟——如我們在二十年前所說過的——則他不會每次都遭到失敗，被迫而進行浪費的曲綫政策，亦不會遇着政治的危機」（「反對派公報」第二十五期第五頁）。對於通貨膨脹的態度，左派反對派更表示得嚴厲而堅決。它在一九三二年外國出版的機關報上寫道：「用鐵的手腕停止通貨膨脹政策的進行，並且要恢復一個穩定的通貨基礎」。「甚至大量減少投資亦在所不惜」。「以前『烏龜速度』的擁護者和『超工業化者』，現在好像是轉換了地位」。實際上，不過是官僚轉到極左的方面吧了。

在對富農和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上，斯大林的「轉變」更帶有可怕的瘋狂性。昨天還堅決否認「富農的存在」，而現在却突然發現富農已在「威脅城市的存在了」。官僚爲了維護城市，便手忙腳亂地採取了「非常手段」，即以武力「沒收餘糧，那時不僅施之於富農，而且施之於中農」。隨後則更進一步，以憲兵警察實行逮捕、監禁、流放、驅逐、甚至槍殺來「消滅富農階級」了。但結果連中農也遭受池魚之殃！並且李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及上萬的追隨者（他們大多數都是忠實於革命的），也跟着富農一道，被撤職、開除、監禁、流放去了。特爾米多打擊了左派之後，又掉過頭來打擊右派。其罪名是「擁護富農利益」。但當左派反對派攻擊斯大林和李柯夫們擁護富農利益時，斯大林却堅決斥之托洛茨基主義「忽視農民」的老調。無怪乎當時的布哈林異常憤慨地說：「斯大林是借用左派反對派的武器來打擊舊時的同盟者」！然而這正是斯大林的慣技呢！

按照在糧食恐慌下所逼迫出來的新計劃「集體農場」，起初被規定爲在五年計劃之末包含農民百分之二十；隨後則逐漸

增加，規定為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乃至八十、九十。並且還要「在最短期間內」實現，以便根本「消滅富農階級」（即在這個階級已經被宣佈消滅之後）。但農民們之對待集體農場，不僅對官僚們的堂皇宣傳不感興趣，就是對連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也不感興趣的。他們所能感到興趣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是加入集體農場後，是否比私人經營更有利些。可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一般農民還看不出集體農場的好處。所以他們並不踴躍參加。但官僚們手裏有的是行政的鞭子。於是命令一下，黨員，乃至警察憲兵都動員起來了。農民們迫不得已只好成群結隊地走進「集體農場」中。可是，他們却來了一個小小的抵抗，即「在加入集體農場之前，都把他們的農具、牲畜、甚至種子都搶先賣掉」。如果牲畜賣不掉時，就「把它們殺掉來賣肉賣皮」，並且這種人「要佔可怕的百分比」。所以，那時有一個外國批評家寫道：「全部集體化，使國民經濟破產差不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好像經過三年的戰爭一樣」。更壞的是，農民被迫加入集體農場之後，由於生產工具和種子的缺乏，以及自覺怠工的流行，生產物是可怕地減少了。例如穀物在一九三〇年已增加到八億三千五百萬担，以後兩年（即大行集體化之後）則跌落到七億担。糖的生產從一億零九百萬普特跌到四千八百萬普特。馬的數量從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六百四十萬匹，跌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萬匹。牛跌落了百分之四十，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羊跌落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的損失，可惜沒有統計表現出來，其人數一定是不不少的。當然，這些巨大犧牲的罪責，並不在於集體化的本身，而在於施行集體化所用的那種盲目、強暴和賭博性的方法。

最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農村的集體化，並未解決城市

的糧食恐慌問題。因為「許多集體農場抵抗糧食的徵收，把它收藏起來」（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真理報」）。因此，迫着官僚們不得不以武力去徵收農民的食糧，並恢復了「食糧證」的制度，「軍事共產主義」的陰影又重現出來，城市與鄉村間的剪刀差在農業集體化之下向兩邊開展了！

要想上萬萬的農民拋棄他們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來加入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必須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到了高度的水平，能夠生產豐富的物資，足以保證工農大眾的較幸福的生活，才能吸引他們。然而這絕非落後的俄國一國所能辦到，更非短時期所能實現。所以蘇聯的農民問題，即農業集體化的問題，最後說來乃是一個國際問題，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才能談得上認真地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國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也成了一條死巷。

左派反對派對於富農和農業集體化問題，也同對工業化問題一樣，仍然站在原來的立場上，從另一方面批評官僚們的行政的殘酷手段和冒險行爲。在他們看來，「鄉村的技術和經濟一日沒有完全的變化，……農民將從它自己當中分化出一富農層，必然傾向於資本主義。機械地消滅現在的富農，一點也解決不了問題。在過渡時期只能以逐步提高工業和農村經濟，提高貧農的地位和文化，並用適當的稅收去抑制富農的生長，他們對於集體化也是常常要求「採取更合理的步驟和更審慎的態度。既有了政權、又有了工業在自己手裏，官僚們應該節制集體化的過程，而不致於把國家送到災難的邊緣」。「集體化的真正的可能性，並不決定於農村無出路的危急情形，也不決定於政府的行政毅力，主要是決定於生產資源。就是說，決定於工業的能力，要它能夠供給大規模的農業以必要的機械才行。這

種物質的條件在現時是缺乏的。許多集體農場的建立，其設備大部份只適宜於小規模的農場。在這種情形下，那誇大加速集體化，即帶有經濟的冒險性質」（以上引文均見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重點是加上的），但「經濟的冒險」，同政治軍事的冒險一樣，其後果總帶來不幸和災難。然而這些只要不根本妨害官僚們的特權利益，他們是不管的。

「第三時期」的對外政策 ——德國革命慘敗的大災禍

這時期內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是在「第三時期」的名義之下進行的。爲了執行第三時期的路線，首先必得改造第三國際。第三國際的創立，原來是爲了代替第二國際來完成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時期，這個國際確實成了推動和領導世界革命的機關。但從一九二三年起，這個國際在斯大林、季洛維也夫和布哈林的領導之下，就開始墮落了。到了一九二八年，正當斯大林的特爾米多在蘇聯勝利之時，在這個國際內部也完成了一次「特爾米多」。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就是爲了這一目的而召開的，並完成了這一目的。從此，各國支部的老幹部，尤其是同意托洛茨基觀點的領導份子，都被撤離了領導機關，甚至被開除了黨籍。代他們而起的，全是清一色的斯大林主義者。從此，第三國際也就由領導國際革命的機關，而變成了替蘇聯外交政策服務的柔順工具，可以在任何時候供任何轉變之用了。但另一方面，却因此產生了一個「國際左派反對派」。

第三國際各國支部在「第三時期」內所起的作用，除了替斯大林在蘇聯所幹的經濟冒險從事虛偽的宣傳外，就是在它們本國內進行政治的軍事的冒險來補充。

按照「第三時期」的哲學，世界資本主義已到了最後時期，無論何時何地，共產黨都可以舉行暴動，奪取政權。實際上，這是前一時期的機會主義的慘敗之一種極端的反動，也就是完全脫離群眾監督的官僚之肆無忌憚的冒險和盲動。這種盲動和冒險，首先被光顧的是中國。斯大林不管資產階級如何壓平了城市無產階級，反動勢力如何取得了全般的勝利，還是命令中國共產黨繼續武裝暴動，在窮鄉僻壤組織「蘇維埃」，建立「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實際上，這正是以冒險主義來補充過去的機會主義，並替同一機會主義掩蓋其破產的罪行。但此種冒險主義的結果，如人所共知：在和蔣介石戰鬥了十年而被打敗後，反過來又向國民黨要求「合作」抗日。但在那個戰鬥十年中失去生命的數以萬計的戰士和百萬以上的農民，却成了斯大林在中國實行冒險主義的祭壇上的犧牲品！

從「第三時期」哲學派生出來的另一種哲學，就是「社會法西斯」（意即社會民主黨及其他的一切社會主義黨派，都同法西斯毫無差別）。這種「哲學」，在西班牙和德國革命的失敗中起了最決定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所發生的西班牙革命，原是一個很有勝利希望的革命。因為那時整個世界經濟正陷於前所未有的恐慌狀態中。托洛茨基在這個革命開始時，即主張建立工農兵組織蘇維埃，準備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並提議共產黨應公開向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工團派成立聯合戰綫，以反對正在興起的法西斯；要求他們和資產階級共和派（亞柴拉派）決裂，讓他們在自己的群眾面前暴露其妥協面貌，同時將國民會議與土地問題聯系起來，動員城鄉廣大群眾圍繞於無產階級周圍，組織工農兵蘇維埃，從此走上「十月革命」，這是不斷革

命的戰略路線。但斯大林對西班牙革命所採取的路線，恰好和托洛茨基的相反，他一方面，以「社會法西斯」的公式拒絕和社會民主黨及無政府工團派進行任何的聯合戰綫，以致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群眾與前兩派的群眾隔離起來，讓它們得以自由地與資產階級黨派妥協，繼續欺騙群眾；而另一方面，則又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對抗無產階級專政，不主張組織蘇維埃，反對用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與土地革命聯繫起來，去動員城鄉廣大群眾進行反資產階級反動派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的鬥爭。這種政策可稱之為機會主義（即階級合作）和教派主義的混合物。但這種「混合物」恰好粘住了西班牙無產階級的腳跟，使之無法前進；同時却給法西斯特讓出一條順利發展的大道，以此促進了一九三四年佛朗哥的暴動。

德國自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失敗後，經過相當時期的休養和經濟復興（當然是在道威斯計劃下），已經恢復了它的創傷。由於一九二九年末爆發的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嚴重打擊和凡爾塞和約的無情束縛，德國資本主義又撞進了死港。資產階級陷於徬徨無路，小資產階級動搖失望，無產階級向左移動——這一切都證明德國革命的基本條件又完全成熟了。這時橫在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物，就是社會民主黨在廣大工人群眾中所佔有的支配影響。要把工人群眾從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解脫出來，只有共產黨向這個黨提議建立反法西斯的聯合戰綫，因為這是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工人群眾所極願意實現的。「假如領袖們拒絕，他們將在自己的群眾中失去信仰，假使領袖們同意，群眾在實行中將比領袖們走得遠些和擁護共產黨員」。同時組織蘇維埃，武裝工人，準備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否則將替法西斯的勝利開闢道路。——這是從一九三一年起，托洛茨基對德國革

命所提出並堅持的路綫。但斯大林在德國所實行的政策，根本上和他在西班牙的一樣，他起初藉口「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是資本主義的孿生子」，拒絕同前者進行聯合戰綫以反對後者，並對後者抱着異常輕視的態度，說「它來得太晚了，」。迄至法西斯以瘋狂的速度發展時（事實上，正是由於獲得了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共產黨政策的幫助），斯大林又命令德國共產黨，同希特勒去玩弄冒險的「紅色選舉競爭」，並向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工人群眾大下哀的美頓書，命令他們起來擁護共產黨，反對法西斯。但同時又反對組織蘇維埃和武裝工人，其理由是「時機尚未成熟」。實際上，這是斯大林在法西斯勢力瘋狂生長之前，發生了恐懼，因而採取了旁觀等待、怯懦、並準備及時退却的態度。

托洛茨基這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力竭聲嘶地再三提出警告說：「德國……將由革命前期的狀況轉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時期。此後若干年德國的命運如何，甚至於歐洲與全世界的命運如何，全要看這次德國危機的解決向那方面走」。「共產國際的領導者正在引導德國無產階級到闊大無比的浩劫中去，在實質上即是引導到法西斯特面前倉皇失措地投降」。「國社黨得到政權，首先就是殲滅德國無產階級的精華，破壞他們的組織，毀滅他們對於自己和自己將來的信仰」。「德國法西斯特勝利以後，反蘇戰爭將是必然的」。而且「法西斯特在德國的勝利，將表明革命的一脈相傳的發展之中斷，共產國際的滅亡，世界帝國主義在其最可憎厭與殘忍嗜殺的形式中凱旋」。「凡是主張戰略上的退却，」都是「投降敵人」。其結論是：「無產階級必須迅速地堅決地準備自己去奪取政權。首先是德國共產黨立刻改變已準備投降的政策」，（見「托著「十月革命

與五年計劃」中「國際形勢之鑰在德國」一文。並請參考「以後怎樣辦」一書，重點是加上的）。

但斯大林和他的德國徒黨們對於托洛茨基的警告與要求毫不理睬。從他們的口頭上到論文中所表現的全部思想，不外是：「法西斯主義的生長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以人工抑止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總是不可避免的，與其『盲目地』鬥爭，自討失敗，不如慎重地退却，讓法西斯主義去取得政權，自毀信仰罷！那時候——呵，那時候，再看我們的力量！」（見上引同書）。在這樣的領導精神和路綫底下，當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初起而奪取政權時，德國共產黨果然下令叫工人們向後退却了，留給他們唯一的安慰是：「讓法西斯去奪取政權以消耗自己罷，隨後我們再來」。這可稱之為中國阿Q式的「精神」，實際上是「不戰而降」。正如托洛茨基所預測的：「冒險與輕浮之後，總是由屈服與投降來代替的」（見上引同書）。

可是，希特勒一踏上政權，事情就立刻明白地表現出來了！首先被「消耗」的「並非法西斯自己」，而恰恰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及其他的一切工人組織，是「殲滅德國無產階級的精華，破壞其組織，毀滅他們對於自己和自己將來的信仰」！此外，希特勒還急忙地向全體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宣佈：他是保衛「人類文明」而擔任反馬克思主義、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艱鉅任務，並以反蘇的十字軍首領自居，這就明白地告訴了斯大林：「反蘇聯的戰爭是必然的」。

假使德國無產階級不被斯大林所出賣，而能在一九三二年——三三年取得勝利（如依照托洛茨基的路綫，這勝利是十分可能的），那末，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將變成爲怎樣的一個新局面呢！不但蘇聯絕無西顧之憂，就是這次空前的屠殺（第

二次世界大戰)也會於無形中煙消雲散了。一個大有可能轉變和開闢國際新局面的無產階級勝利的德國，終於變成了威脅歐洲，特別是威脅蘇聯的納粹強盜的德國——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在這裏所造成的罪惡，在人類歷史上還有更基於此者嗎？！

從第三時期的冒險主義又回到極右的機會主義

(1933 年以後)

斯大林站在希特勒納粹強盜的勝利與恐怖之前，經過一番極度的驚慌措亂之後，即歇斯利地把他的羅針向右扭轉，一直轉到一百八十度。「第三時期」的哲學從此束之高閣，代之而起的又是「和平主義」的時期。其與以前的不同之點，僅在於對民主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的黨派更為奴顏婢膝，而對於一切革命份子更為兇殘迫害而已。

× × ×

在這裏，讓我們稍停一下，談談一個極富政治意義的故事吧——那就是斯大林和美國干貝爾（他當過蘇聯一時期的技術顧問）的「談話」。時間是在德國革命失敗的前夕。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斯大林先生……他不躊躇地和使人毫不懷疑地坦白承認：在托洛茨基當權時，曾有普及共產主義到全世界的企圖。他說這是他與托洛茨基的決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世界的共產主義，而他只想將自己的努力限於自己的國內。他沒有時間和金錢去企圖將世界共產主義化。縱使

他們願意這樣作，他的主要興趣在改善俄國人民（即官僚們）的狀況，一點也不干涉別的國家」。（見干貝爾著「俄國是市場還是危險」內所載干貝爾與斯大林的「談話記錄」。干氏並聲明：這個記錄是斯大林命令其書記用打字機打好的一他那時已在倫敦，「記錄」上署名：STALIN，並有附註說：「保存這個記錄，某日將成歷史文件」。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

前面這段話，很明顯地表現了斯大林已預感到他在德國的政策不可免地要造成希特勒的勝利恐怖，才「不躊躇地」吐露真情，希望經過干貝爾獲得美國資產階級的「諒解」與援救，並經過美國獲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僕從們的諒解與援救。換句話說，斯大林寄給干貝爾的「歷史文件」，①不啻是在希特勒的威脅下預先投遞給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紙降書。斯大林之對於世界革命的真實態度，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幻想，以及「他和托洛茨基決裂的最初原因」，總而言之，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真情實意，人們可以在他交給干貝爾的「歷史文件」中，從「他不躊躇地和使人毫不懷疑地坦白承認」的事實中，完全明白地看出來了！

× × ×

斯大林交給干貝爾的「歷史文件」，可說已正式否認了第三國際的任何革命作用。而他在德國革命失敗中所採取的稀有可恥的投降政策，更給這個國際的政治生命判決了死刑。從此第三國際完全和第二國際一樣，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前者和後者的不同之點，只是前者更為專橫（對群眾說）和無恥而已。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左派反對派」也就不得

不把完成世界革命的歷史任務肩負起來，決然離開第三國際，號召組織第四國際。這是近代世界歷史上劃時期的標誌。以前第三國際內部左派反對派和斯大林官僚派的鬥爭，從此就變成爲第四國際與第三國際的鬥爭了。

斯大林在希特勒的異常威脅下，循着他的「和平主義」的或「反法西斯侵略」的軌道，卑躬屈膝地向所有的「民主」帝國主義國家去叩頭，要求他們簽訂「不侵犯條約」或「集體安全條約」，擁護它們的「裁軍計劃」，加入它們的「國際聯盟」，要求它們建立「和平陣綫」或「民主陣綫」去對抗「侵略陣綫」或「法西斯陣綫」。同時，哀求和拉攏各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或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如社會民主黨（以前是稱之爲「社會法西斯」的）等，成立「人民陣綫」，企圖以此去抵抗每一個國家內的法西斯。總而言之。斯大林在法西斯所鼓動的戰爭威脅下，這時已將維持蘇聯的安全和存在寄托在「民主」帝國主義及其僕從——「民主的」黨派之上了。這有如一個掉下水裏嚇昏了的人，抓住稻草當救命圈一樣。

托洛茨基還只看到斯大林開始轉向「和平主義」時，他爲了挽救蘇聯，爲了喚醒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衆及時準備應付新的災禍——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即於一九三四年春天，起草了「第四國際與戰爭」的綱領。這個綱領所指出的主要思想是：「那引起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原因，現在比一九一四年前還要緊張多少倍」。「除了一個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世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的總傾向是絕對明顯的：即戰後時期已成了兩個戰爭中間的單純的休息期。而這個休息期在我們的眼前已走向終結了。裁軍的談判已爲瘋狂的軍備競爭所代替，一個新的戰爭在叩門了」。「每一個大的戰爭，不管它的最

初的動機如何，都會明白地提出干涉蘇聯的問題。爲的是灌輸新鮮的血液到資本主義世界的血管裏去」。「但無產階級保護蘇聯，並非保護民族的境界，而是保護一個暫時壓縮在民族境內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度。…沒有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國際革命，世界任何國家都不會得救」。因此，在戰爭爆發時，「雙方陣營的無產階級，只有用同樣的方法，才能幫助蘇聯，亦即幫助自己。這方法就是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奪取政權」（重點是加上的）。

此外，托氏又指出：「現代列強間的戰爭並不是表示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衝突，而只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因此，不但「保衛祖國」的口號，在雙方帝國主義國家內是同樣反動的，就是「保衛民主」的口號也是荒謬的有毒害的。這個綱領，不但給了斯大林用「和平主義」去掩飾帝國主義進行戰爭的可恥路綫以當頭棒喝，而且給了他往後的發展，如「民主陣綫」與「和平陣綫」等，以預先的批評（重點是加上的）。

列寧曾說過：任何「和平主義的口號，如在資本主義下的國際裁軍，仲裁法庭等，不只是反動的空想，而且是對於勞動者的欺騙，其用意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並使它忽了解除剝削者的武裝的任務（見列寧起草的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克黨大會通過的黨綱，重點是加上的）。所謂「不侵犯條約」或「集體安全條約」，在現狀下也只能是掩飾帝國主義蒙蔽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者準備戰爭的一種煙幕。「國際聯盟」，更明顯地是「在世界範圍內有系統地剝削一切人民，……壓迫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宰割一切弱小民族的強盜堡壘」（同

見上引黨綱)。關於這一點，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也是承認的，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却認為它（國際聯盟）是可以防止戰爭的「和平機關」②——蘇聯之加入這個機關，不僅是「特爾米多官僚向這個毫無信用的日內瓦機關之投降」，而且是以蘇聯的名義替這個機關去欺騙一切人民和弱小民族，並替它直接擔負其「剝削」和「壓迫」的責任哩！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固然表現了最露骨和最強烈的侵略面貌和渴求戰爭的傾向；但在托洛茨基看來，仍然只是一種帝國主義的面貌和傾向。它在本質上與「民主的」英、法、美等帝國主義是同樣的。法西斯的德意之所以特別傾向「侵略和戰爭」，僅因為缺乏殖民地以供剝削（日本亦然），而英法之特別主張「和平」，也僅僅爲了保持它們掠奪得過多的殖民地——贖物，斯大林把法西斯主義的德意和民主主義的英法對立起來，和後者建立「民主陣綫」去反對前者，這就無異於把一群飢餓的強盜和吃得飽飽的強盜對立起來，而擁護後者去反對前者一樣。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要求，絕不在於聯合或擁護一群強盜去反對另一群強盜，而在於努力設法把它們通通消滅。而且擁護民主國家去反對法西斯國家，必然會使前者國內的工人階級爲狹隘的愛國主義所毒害，而同時使法西斯的愛國主義得以在本國小資產階級、乃至工人階級中增加其欺騙影響，——這在實際上又等於助長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侵略，促進了戰爭（請參考托著「在新的戰爭之前」）。我們也可以用列寧的說法：以「和平陣綫」或「民主陣綫」去對抗「侵略陣綫」或「法西斯陣綫」，希圖以此去阻止戰爭，「不只是反動的空想，而且是對於勞動者的欺騙，其用意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並使它忽略了解除剝削者的武

裝的任務」。

所謂「人民陣綫」，則僅僅是第二國際的，亦即孟什維克的「階級合作」政策之更有計劃和更徹底的表演。其可悲的後果在法蘭西和西班牙馬上就暴露出來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法國靜坐罷工的偉大浪潮，表明無產階級已站立起來準備推翻資本主義的意向。假使當時法國共產黨不是在「人民陣綫」的束縛下，而是號召靜坐罷工的群眾在每一工場或每一經濟單位組織工人代表會議（蘇維埃），以此擴大成爲全國工人代表會議（全國工人蘇維埃），再向城鄉一切貧民和兵士呼籲，團結到他們的隊伍來，組成全國工農兵蘇維埃，準備推翻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這在當時是可能的。法國革命的興起，將立刻改變當時西班牙的局勢，而有利於革命的發展。這樣，不但戰爭將被遏止，就是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也將被淹沒於歐洲革命的浪潮中。但斯大林在「人民陣綫」幌子下，以全力幫助來翁·卜倫（以前被稱之爲法西斯的）組織「人民陣綫政府」，而後者則在「人民陣綫政府」的名義下，把這次靜坐罷工的偉大浪潮壓平下去了。跟着，來翁·卜倫又把「人民陣綫政府」的首領地位讓給了達拉第（人民陣綫的另一領袖）。而達拉第則轉過頭來盡力壓散了「人民陣綫」的群眾，並重重地打擊了斯大林的黨徒（法國共產黨人）。以後呢，「人民陣綫」也就被送進墳墓裏去了！

在西班牙，「人民陣綫」所造成的後果更爲悲慘。斯大林盡力之所及幫助亞柴拉和耐格林（西班牙的米留哥夫和克倫斯基），名義上是反對佛朗哥，實際上則是完全束縛了工農大眾的手足。因爲斯大林的政策，根本不許工人階級侵犯資本家的工場，不許農民侵犯地主的土地，尤其不許他們侵犯亞柴拉所

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政府，總而言之，不許跨越「民主階段」，——這乃是俄國二月革命後孟什維克政策之澈底地有計劃的重演。另一方面，斯大林對主張無產階級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領導農民沒收土地，並準備奪取政權的第四國際黨人及其同情者，則加以最可恥的誣衊和最兇殘的迫害（在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以自己的格柏烏和耐格林的特務隊合作完成了的）。因之，俄國二月革命後的「七月事變」在西班牙獲得了成功的表演。以致歐洲工人階級最後所屬望的一個可能勝利的革命（這個革命如果勝利了，不但新的戰爭會被阻止，就是整個歐洲的面貌也會發生大的改變），經過三年半的大血戰之後，跟着法國大罷工的失敗，又給斯大林葬送掉了！西班牙革命的悲慘失敗，不但表示戰爭的絕不可免，而且已預告戰爭很快就要到來了！

「人民陣綫」運用到中國，就是曾經以「蘇維埃」和「紅軍」形式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戰鬥了多年，並拋擲了無數頭顱的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卑躬屈膝地向國民黨要求重新「合作」建立「民族統一陣綫」；並自動取消「蘇維埃」和「紅軍」番號，放棄土地革命，接受「三民主義」，以此獲得在蔣介石指揮下參加抗日戰爭的權利。但其後果，不但抗日戰爭不斷失敗，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日益加強，人民愈來愈受壓迫，最後連中共也自食其果——如新四軍之被擊潰，延安之被包圍，就是顯例。

斯大林這一時期的對外政策所造成的災禍已如上述，現在讓我們來看他的對內政策吧：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遭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打擊（冒險主義造成的困難和危機），以及在托洛茨基和賴可夫斯基的批評鞭策下，第二個五年計劃已有了不少的改變。正因為如此，

生產的發展，比起以前來獲得了一種較穩定的進行。這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遠未能獲得的成就。但同時，斯大林在其他方面，差不多像在對外政策上一樣，一直向後倒退，為的是鞏固官僚層的地盤。例如在工人中，以史塔漢諾夫運動為名，特別造成了一層工人貴族，把他們的「收入」升高到「超過下層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並還予以種種額外的優待。這在工人階級中固然給官僚主義建立了一個鞏固的基礎，但工人階級自身的分化和對立也就愈加劇烈和尖銳了。在農村中，情形雖遠較複雜，但斯大林的倒退政策還是依照同一軌道進行的。在強迫的集體化之後，「為着安慰農民起見，國家不能不向農民的私有傾向和個人主義作很大的讓步。開始是正式賦予集體農場以『永久』使用土地之權，——這就在實際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見「被背叛的革命」第六章，以下引仿此）。可是，還有更重要的，國家已被迫恢復了小塊土地的經營，各塊土地有它們各自的牛、豬、羊和家禽等。無須說，這是違反了原來的集體化的。「土地的租賃雖然為法律所禁止，但事實上却是普遍地盛行，並且是在最剝削的形式之下進行的。這一集體農場租給別一集體農場，有時租給一個外邊的人，有時則租給本農場中那些有企業心的場員。說起來似乎令人不相信，蘇維埃農場——即是『社會主義』的企業，也實行土地的租借」。最值得注意的是：各集體農場間的「貧」與「富」相差常有天壤之別，因而那些「富裕的」和「貧窮的」農場的農民的收入相差甚遠。就是同一集體農場內「大農民」「每個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資和下層集體化的農民的收入要超過十倍至十五倍」。這樣，農民間的分化和對立也就加速地發展起來。因而「集體化就為官僚的寄生主義開闢了無限的機會，並

使這種寄生主義與集體農場的上層份子互相結合起來」。

官僚主義在工業和農業方面進一步築好了基礎，於是又將其注意力轉集到紅軍中。「廢除民兵制」與「恢復軍官等級」，就是其顯著的表現。把資產階級的常備軍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兵制，原是馬克思和列寧用以廢除官僚機構的根本條件之一。但斯大林官僚層既已把持了蘇維埃的國家機構，當然要廢除無產階級的民兵制了。不僅如此，他們還恢復了哥薩克的騎兵隊，允許他們有自己的馬匹及其他特權。因為「這是帝俄軍隊……享受特權的和最保守的部份」，這對於新官僚們當然是十分用得着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所公佈的「恢復紅軍中軍官的等級制」（從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帥），這一法令對於紅軍的品性乃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變，「這是賦予紅軍軍官們以資產階級的榮顯。這個法令予十月革命的原則以更為致命的打擊」。但斯大林為團結一切上層將領於其周圍，以鞏固其在紅軍中的統治基礎，當然顧不得十月革命的原則。而且為了完成他的邦拉巴特（拿破倫主義）的專政，這一層更是不可少的。

此外，斯大林為了「官僚們需要一個固定的等級關係」及其特權有所繼承起見，恢復了家庭制度，並連帶地禁止了婦女的墮胎權，復活了金錢婚姻等。另一方面，為了約束青年起見，禁止青年不得過問國家大事，即不得過問政治，只許參加「教育和文化的訓練」③。同時，斯大林對於蘇聯內的弱小民族，差不多已恢復了大俄羅斯主義的態度④。「因為關心到老一輩的權威，……宗教政策也起了「變化」，即以前布爾什維克堅決反對宗教迷信（馬克思和列寧稱之為鴉片煙）的政策，現在已為「對宗教中立」的政策所代替了。就是哲學、

科學和藝術也只許在官僚圈定的範圍內去活動（即限於對官僚政策的解釋，辯護及其功績的描寫與歌頌等）。總而言之，凡是十月革命所發掘出來的一切帶有反抗舊傳統和創造新社會的因素和精神的東西，因為有碍於官僚保守主義的特權統治，都得加以制止，並盡可能把它們拖回到以前的時代去——這便是斯大林政策的「精髓」之所在！（參考「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

在一切都說了和作了之後，最後所需要的，就是要制定一個「國家根本大法」來確定官僚的合法地位，規定並掩飾他們的特權——這就是一九三六年所公佈的「新憲法」。在這個憲法上除了欺騙和誇張的什麼共產主義的原則已經實現的夢囈之外，主要的便是部份地恢復私有財產制，以及虛偽的普選代替無產階級的公開選舉制。前者表面上是說保證公民對於家庭經濟、消費、舒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之個人所有特權。但在實際上乃是承認官僚在城市的住宅、鄉村別墅、汽車及其他一切「屬於個人消費和舒適之物品」，都是合法的。後者則利用秘密普選之名以掩蓋官僚的邦拉巴特專政之實——這當然不是斯大林的新發明，拿破倫第三早已實行過了。

但正當新憲法起草和公佈的時候，即官方宣佈「在蘇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階級已經消滅了」，因而不需要階級選舉制的時候，斯大林突然發現蘇聯內有一群極廣大的「反動敵人」在潛伏着，甚至潛伏在共產黨和紅軍當中。這樣，新的，更帶瘋狂性的「清黨」和「肅軍」又加緊進行了。單在一九三五年最後一月及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黨」時候，就有幾十萬黨員被開除黨籍，其中幾萬人是所謂「托洛茨基主義派」。最積極的份子，立刻被捕送進

監獄和集中營去了。至於其他的人們，斯大林經過「真理報」勸告地方機關不要給他們工作，「在國家就是唯一僱主這樣一個國土裏面，這種辦法就等於宣佈慢性的死刑」。實際上，受到這種「慢性死刑」處分的不只是這次被開除的幾十萬黨員，凡是多少表示一點反抗官僚的無數工人和農民，都遭到了這同樣的命運。

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莫斯科所舉行的幾次所謂「反革命大審判案」，曾經轟動了全世界。這是「清黨」之最高度的表演。但在這些審判案所判決和處死的「叛徒」，恰恰是列寧建立布爾什維克黨進行十月革命，創立蘇維埃政府，在內戰及抵抗帝國主義進攻之中最積極的、親密的合作者。其中季洛維也夫、加米也夫、李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都是列寧所領導的政治局的委員，即在火熱的鬥爭中被選出來的黨的領導層。於今全部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槍斃了，整代的老布爾什維克從此被剷草除根了！

一九三八年的「肅軍」，把杜哈車夫斯基（一個內戰中的英雄和天才的軍事家）所領導的整個參謀部加以摧毀，幾萬個具有專門軍事知識的人員都被撤職，監禁，流放，乃至被槍殺（杜哈車夫斯基即其中之一）。這無異於將紅軍最有才能的，在內戰和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英勇和建有功勳的大批幹部加以掃除。這不啻是砍去了「紅軍的頭腦」！

人們如果將斯大林對於「民主」帝國主義及其「民主」僕從們之妥協、遷就、卑屈和投降的態度，與其對國內外革命份子（托派）和一切反對者之無比堅決、兇殘、迫害和屠殺的態度，加以對照，則官僚主義的邦拉巴特專政的本質和面貌，也就躍然呈現在你的眼前了！

「麻煩的」西班牙革命已經被平定，「清黨肅軍」又消除了「國內的反革命者」，還有「和平的朋友」在國際間努力，「公開地工作」，……斯大林滿以為蘇聯的危險已經過去，戰爭的威脅減輕了。但恰在此時，希特勒在蘇聯的門口大掀其戰爭的喇叭！斯大林可嚇慌了，他在走投無路中，只好不顧一切，連「和平的朋友」也不管了，一古腦兒翻身投到「侵略陣綫」的希特勒的懷抱裏！於是，「德蘇和平協定」出人意料地簽下來了！（但托洛茨基甚至連這種最可恥的投降，早在半年前已經預言過了。）

希特勒得到「德蘇協定」的幫助（該協定不僅規定德國進攻波蘭時蘇聯不得干涉，而且允許以食糧及其他物資相接濟），就立刻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閃電地」分解了波蘭（自然，斯大林也嘗了一鱗）；席捲了挪威、丹麥、荷蘭和比利時；摧毀了「民主的」法蘭西。在這期間，斯大林不但完全履行了「德蘇協定」所規定的對德的物資援助，而且命令其黨徒們（各國共產黨人）在全世界替希特勒的「和平」主張大肆宣傳，攻擊英、法、美爲了「帝國主義的利益，而不肯讓步」等等。這樣一來，「侵略陣綫」與「和平陣綫」又完全顛倒過來了！

但當希特勒將其戰鋒轉向巴爾幹半島。同樣閃電地侵佔了南斯拉夫和希臘，降服了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因而完成了侵蘇的一切條件，並立刻向蘇聯進行閃電攻勢時，斯大林於異常狼狽的蠢態中，又卑躬屈膝地求救於以前的「和平朋友」，一轉瞬之間，剛被詛咒過的英美「帝國主義」，又變成「民主救星」了^⑤，斯大林在這方面的顛倒錯亂，反復無常，可說是登峰造極。

總而言之，斯大林對於這次帝國主義的大屠殺，事先既以「和平陣綫」或「民主陣綫」的煙幕蒙蔽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衆，「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並使他們忽略了解除剝削者的武裝的任務」。戰爭爆發後，斯大林始則倒在希特勒方面，替他的「和平」宣揚；當希特勒進攻蘇聯時，他又抓住英美爲救命圈，替它們的「民主」吶喊。他把蘇聯的安全希望，不是寄托於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就是寄托於邱吉爾和羅斯福。列寧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走向社會主義，並以此挽救蘇聯免於墮落的遺教，被斯大林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最惡毒的是：當托洛茨基繼承十月革命的傳統和列寧的遺教，領導第四國際號召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以此保衛蘇聯時（請參考第四國際緊急大會宣言），斯大林不但動員了他的一切徒黨們，盡量造謠誣蔑，並千方百計謀殺了托洛茨基（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

！

將近兩年來的德蘇戰爭，由於紅軍最有能力的幹部經過「肅軍」之被摧毀，反動的官僚們之腐朽無能，已使蘇聯吃了無數的敗仗，失去了數千哩的土地（其中包括許多工業城市、礦區和食糧產地），損失了不可計量的人命和物資。僅僅因爲十月革命所創立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及其所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紅軍兵士及工農群衆在保衛蘇聯（她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戰爭中發揮的無比英勇和犧牲精神，以及納粹強盜本身力量之有限，蘇聯才得以保持現有的地位，即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沒有被攻佔。

最近紅軍冬季反攻之奪回斯大林格勒和羅斯托夫等城市，

以及給予納粹強盜以沉重的打擊，其原因也在於此。但斯大林的徒黨及其阿諛者們，竟把這種勝利大肆渲染和誇張，甚至說是由於斯大林的「天才戰略」的結果。這表明斯大林及其徒黨們，在資本主義世界面前，不敢提出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在反侵蘇的戰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以及紅軍兵士和工農群眾為保衛此種財產制而發揮的無比英勇和犧牲精神。他們深怕因此引起邱吉爾和羅斯福的反感，終止對蘇聯的救援。實際上，羅斯福和邱吉爾「援蘇」的主要目的僅在：利用蘇聯的力量（主要是人力）去削弱納粹，以便容易摧毀它。但他們對於蘇聯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敵視，絕不會因為希特勒的存在或滅亡而有所改變的。直到今天為止（一九四三年三月末），我們仍然不能預斷這次大戰將延長多久，及其結果如何。但有一個基本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希特勒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希特勒的失敗並不等於蘇聯已完全脫離了危險。寧可說，希特勒被毀滅後，美英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將跟隨而來。因為十月革命所創立的國有財產制，是資本帝國主義絕不能容忍讓其長久存在的。正如列寧所說：「世界帝國主義和社會革命勝利的進展，二者是不能並立的。」蘇聯要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威脅，只有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和西歐的英、法、德、意）的無產階級摧毀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有保證。但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勝利，必然要引起蘇聯的工農群眾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的鬥爭。正因此，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為了保持自己的專政，決然拋棄了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期「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但帝國主義絕不以和「蘇聯和平共處」為滿足。因為在它們看來，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如不給予徹底

摧毀，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終究是致命的威脅。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這次世界大戰，沒有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來結束它，只是軸心國（德、意、日）的失敗（如前面所預測的），則這次戰後世界局勢的總趨勢，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帝國主義和蘇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之間的鬥爭。

結束語

我們前面詳細地論述了斯大林二十年來（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三年）的對內對外政策之左右盤旋的演變以及托洛茨基對其演變所提出的診斷、批評和建議，這對於一般讀者也許感到繁重。但我們的目的在於充分說明：階段革命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不斷革命論的「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絕非如普通人想像的，只是兩個抽象觀念的對立。而實際上，却是兩條具有血肉的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路綫，在世界歷史範圍內的生死鬥爭。雖然這個鬥爭還遠沒有完結，但已有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僅僅是空想，而且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災禍：它斷送了一九二六年英國的大罷工，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德國最有希望的革命，一九三六年法國的靜坐罷工潮，一九三一至三七年西班牙的革命。最後，斯大林爲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幻想，竟不惜幫助希特勒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毀滅了不可計量的物資，使全人類的文化倒退了許多年。另一方面，斯大林爲了「順利地」在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他謀殺了一整代的老布爾什維克和無數的革命青年，把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

黨，把無產階級民主的蘇維埃政權轉變為極端粗暴的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專政，因而造成世界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正因此，為了推進和完成國際主義的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為第四國際寫的「過渡綱領」，對解決蘇聯問題提出了如下的政綱：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國有這一社會主義發展的必須前提條件，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生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却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墜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越來越成為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變成為全能的特權等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重點是加上的）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墜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制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啓到社會主義之路。（重點是原有的）

「只有被壓迫群眾勝利的革命起義，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並保障它向社會主義作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群眾起義，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黨！

打倒該隱（聖經上殺弟的人）——斯大林的官僚匪黨！

蘇維埃民主萬歲！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註釋：

- 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接見美國「斯克利布霍華德新聞社社長羅依·霍華德時，他也發表了與干貝爾談話時的同樣意見。霍華德問斯大林：關於世界革命的計劃和意見，現在怎樣呢？斯大林回答道：「我們從來沒有這種計劃和意向，……這是誤會的結果」。這可算是斯大林交給干貝爾的「歷史文件」的一個補充，人們更不應該「誤會」斯大林對干貝爾的「坦白承認」了。
- ②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大會，公然決定青年不得參加政治活動。青年團的總書記在這次大會上演說道：「關於工業的計劃，關於減低生產費、經濟計劃、播種以及關於其他重要的國家問題，我們絕不能嘰哩咕嚕，好像這些問題是要我們決定似的」。「決定這些問題」是官僚的特權，青年人怎好「嘰哩咕嚕」呢！
- ③ 一九二二年，斯大林採取大俄羅斯主義處理喬治亞民族問題，列寧對此曾在病榻上寫了一篇文章嚴厲攻擊斯大林，但他拒絕把列寧的文章公開發表（即拒絕登真理報）。因此，列寧寫了一封同斯大林絕交的信（見伊斯曼著《蘇聯的真實狀況》）。這證明後來斯大林的大俄羅斯主義是有其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的。
- ④ 霍華德問斯大林：「戰爭是不可免的嗎」？他答道：「我覺得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變得更強了；和平的朋友能夠公開地工作，他們依照公共輿論的力量，他們有這樣的和平機關，如國聯，在他們手裏，……戰爭並不是不可免的」（見前面引過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

日斯大林同霍華德的談話)。

- ⑤ 當德蘇戰爭爆發時，斯大林的黨徒即宣稱：「這次大戰已變了質，英美反希特勒的戰爭，不但爲了『和平』與『民主』，而且爲了援救被壓迫民族，變成『革命』的了」（見當時中共中央對德蘇戰爭所發表的宣言及其機關報的社論）。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 老子的時代

老子的生存年代，在莊子、禮記和史記等古籍中，本已有明白的指示，即這些古籍中皆一致記載孔子曾見過老子，這證明老孔實為同一時代的人。胡適之推定老子的生年約當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十年，較孔子約大二十歲，與事實當相差不遠。但自梁啟超提出六項懷疑的理由（見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後，老子的生存年代似乎根本成了問題。但梁氏的懷疑理由經過許多人（如張煦、葉青等）的批駁之後，很少能站得住了。繼梁氏而起的一些懷疑家，其所持理由大都重複梁氏，更少新的發見；作者的目的只在闡究老子的根本思想，故不欲多費時間從事考證的批評。但有幾點應當特別指出：即孔子曾問學於老聃，不僅為史記所大書特書，為老派的莊子所數數稱道（見莊子天道，天運和外物諸篇），而且為門戶成見素深的孔門弟子所迭次引據（見禮記會子問篇），這證明孔子之親自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因而成為老孔兩派門人之共同的傳說。其次，在論語中有不少的處所，如「無為而治者……」，「亡而為有，虛而為盈」，「以德報怨」等，都與老子完全相合，這證明孔子在思想上確曾受過老子的影響。即就老子的文字和思想本身而言，老子一書與後來戰國時代的著作亦顯然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老子實與孔子同

* 原刊於一九四六年上海出版的《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時，或略長於孔子，曾一度爲周之守藏室吏，後隱於沛（據莊子天道和天運所載，孔子曾兩次見過老聃，蓋一在其爲周之守藏室吏時，一在沛，即歸隱於沛之後也），著老子（所謂道德經）上下篇。

至老子一書的內容，像古代其他的典籍一樣，不無後人竄入的僞作，故在某些節段和語句中，間有矛盾或不可通的地方。但就一般論，老子實爲中國古代第一部思想精深而較有系統（就其思想之連貫一致言）的最可靠的古籍，它深刻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矛盾，這絕不是後世妄人所能隨便假造的。

如果老子與孔子同時，則老子的時代便正當春秋的末期。這正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封建制度開始發生動搖和變化的時期（後來戰國時代之最激烈的兼并局面，以及秦之建立統一集權的專制帝國，都導源於此）。

在這時期中最顯著的現象，是各封建諸侯國間的戰爭之益趨頻繁和劇烈。並且戰爭的範圍也由黃河流域擴展到了長江流域（如楚與吳，吳與越之間，都時常發生戰爭，這是春秋前期未曾有的現象）。此等戰爭發生的原因，表面上似乎是由於『周室衰微，諸侯爭霸』，而實際上却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爲自春秋開始以來，生產技術日見增進（如鐵器之普遍應用，手工技術的發達等），商業經濟日見發達，貨幣使用的範圍日廣，奢侈品的生產愈多。——這一切，大大地刺激了和提高了一班封建貴族的享樂慾望。封建貴族爲滿足其享樂慾望：一方面，在其所領有的地域內對農民盡量施行榨取，如增加地租、延長徭役、提高賦稅等；另一方面，則拚命掠奪別國的領土，即向外擴大榨取農民的範圍。在封建時代，戰爭便是封建階級擴大榨取農民範圍之唯一的手段。同時，新起的商人爲了侵入鄰國市場，也往往幫

助了本國的封建貴族進行戰爭。

戰爭的後果，許多小國諸侯是被消滅（即為大國所吞併）了。但戰爭的全部負擔總是落在農民身上。農民不僅被迫參加戰爭，直接犧牲性命，並且還要擔負全部戰爭的費用和損失。不管任何一方戰勝，農民總是變成了戰爭的犧牲品。而且在戰爭時期，關於農業上最關重要的水道隄防和灌溉等工程必然荒廢，牛馬和人工等必然缺乏，因而往往釀成了極厲害的水旱災荒，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便成了一種定律。這對於農民當然又是『痛上加痛』！

其次，即在同一封建國家內的封建貴族集團間，為奪取權位的鬥爭也愈演愈烈。互相殘殺，互相驅逐，成了家常便飯，封建階層內的『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充滿了春秋左傳的記錄。封建階級內部這些鬥爭和殘殺，固然暴露了封建階級自身的削弱和衰敗，但同時亦愈加引起了社會的混亂和破壞，愈益加重了一般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痛苦。此外，封建階級為了保持其經常的安全與享樂，便不斷地修城築池，開園闢圃，建造宮第，屯集財寶，這一切不用說也是要靠榨取農民的勞力與財物來完成的。

所以在這一時期中，一方面是封建階級在內部進行劇烈的爭奪，對農民加緊壓榨，在生活上窮奢極慾，還要侈談仁義，誇張禮節；另一方面，是農民在不斷的戰爭和經常的榨取及壓迫之下感到異常痛苦，無法生存，強者鋌而走險（所謂『民不畏死』），弱者坐以待斃——這便是老子生存時代之最顯著的社會關係和矛盾——這種情形都深深地烙在老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中。

至於老子本人究出身於何種階級？頗為近時一般研究老子思想的人所爭論。有人說他出身『平民階級』，有人說他代表『奴隸領主』，更有說他是『極端破壞派』或『隱者』的。這些說法

，不是臆測，就是模糊。如果就老子所受的文化教育及其曾經一度爲周之守藏吏而言，說他出身於貴族階級，是比較可信的。但就老子的思想論，則顯然含有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成分，即強烈地反映了廣大的農民階層對於當時的統治階級種種不滿的意識。人們或許以此爲矛盾。但以出身貴族而同情農民的痛苦，攻擊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和專橫的人，並非不可能的事。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近代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自然，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農民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會只限於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而必然要將當時已發展到相當高度的貴族文化，貴族的宇宙觀及許多偏見，與之多少聯繫起來，而造成一個新的思想體系，即一個含有深刻矛盾的思想體系——老子和托爾斯泰都是如此。

（二）老子的哲學——一元論與辯證思想

老子思想中的重心而且最富於歷史意義的當然是他的社會思想，即他對於當時社會的觀察、批評和改革的理想。但老子是我們古代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家，他差不多吸收了古代的全部文化，所以他的目光所及不只限於社會現象，而且注視到整個的自然。他曾把自然和社會作過一番比較的研究，企圖從自然中找出一種根本原理以爲批評和改造他認爲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指針。這原理便是他的哲學，即他的一元的宇宙觀和辯證的方法論。

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一元的宇宙觀和有意識地運用辯證法以考察問題的人，要算是老子，也只有老子。在這一點上，老子在中國是盡了泰利斯（THAL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的開山任務（在希臘思想史上，泰氏第一次提出一元的宇宙觀，赫氏第一次揭出辯證法）。惜乎他的後輩沒有能繼承他、發展他。

在老子以前，關於宇宙諸現象及其構成的問題，《易經》和《洪範》

然是把『自然』與『人爲』對立起來，意思是說『自然』就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爲的干預，也用不着人爲的干預。一切聽其自然，不事人爲，便合乎『道』。這種思想，如果拿來對抗古代的宗教觀（即認爲宇宙或自然界中一切現象都是由多神或一神創造的觀點），是一個大大的進步，並且是接近唯物論的。因爲這種思想承認自然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爲的干預，同時也就否認了神的干預。並且依老子的意見，就是神也是取法於『道』，即取法於自然的（所謂『神得一以靈……神無靈恐將歇』）。但如果只簡單地把『自然』與『人爲』對立起來，以爲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則所謂自然便成了一種純粹的抽象，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了。真正客觀的自然法則，並不在於它的抽象的『自然而然』，而在於它本身就是自然物質自己運動自己變化的具體表現。所以這種法則首先必須承認自然物質的客觀存在。沒有物質，根本便沒有運動和變化的法則之可言。

可是老子却認爲他的『道』是獨立存在於自然物質之先和自然物質之外的。例如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顯然是說，『道』在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已經是獨立存在了。存在於何處呢？不用說，是存在於純粹的虛無之中。所以老子特別用『無』來代表『道』，並舉出一些『虛』與『無』的實例來解釋他的『道』的意義。如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這種對於『虛無』的作用之解釋，是頗爲巧妙的，並且也含有一部分真理。不過我們必須注意：所謂『虛』或『無』，只有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才有作用。試問：

沒有橐籥爲其範圍的「虛」（且不說空氣），能「動而愈出」嗎？離開了車轂，埴器和室的戶牖等物質條件的「無」能發生作用嗎？所以，在這裏顯然證明離開物質條件的任何虛無，只是一種純粹的抽象。而老子的「道」分析到最後的結果，便是一種純粹抽象的虛無。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老子雖然建立了一元的宇宙觀，說宇宙萬物都發源於「道」，取法於「道」，然而他的「道」却是抽象的，空想的，即超物質的。所以具有唯心論敏感的梁啟超說，老子的「道」等於佛家《起信論》中所說的「真如」（見梁著老子哲學），就其同是屬於客觀的唯心論一點說來，是不錯的。其實，老子的「道」，不僅等於起信論中的「真如」而已。即柏拉圖的「觀念」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與老子的「道」都是屬於同一的範疇，都是一種想像中的存在，一種幻念，在客觀的自然界中實際是不存在的。然而這恰是梁啟超所未會了解的。因為在梁氏看來，「道」與「真如」都同是客觀的真理哩！

但是，近來頗有人認定老子的「道」是屬於物質的範疇。例如葉青說它等於亞諾西米尼（ANAXIMENES）所說的「空氣」，甚至等於康德所說的「星雲體」（見葉青《胡適批判》一四一——一四二頁）。這自然是一種頗爲新鮮的見解，可不是老子原來的意思。這是由於葉青只注意到老子描寫「道」之迷離惝恍若有若無的一些形容辭，因而附會的結果。不錯，老子那些描寫「道」的形容辭（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等）拿來套在「空氣」或「星雲」上是很相像的，說得過去的。然而却絕不能解釋老子所運用到的許多問題。例如老子說：「道雖無名，……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假如依照葉青的意見，

把這裏的「道」套上「空氣」二字，試問將成爲甚麼意思呢?!只有依照老子自己的意見，即把「道」解作含有「虛無」和「自然」的兩重意義，那時對於上段文句才能解釋得通。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釋老子的全部文義。因爲「虛無」和「自然」的另一解釋，即「清靜無爲」，這是老子全部社會思想的骨幹。這似乎是葉青所未注意到的，因而對於老子的「道」發生了上敘的曲解。

現在我們來考察老子哲學的另一方面——他的辯證思想。

我們從前面已經看到老子承認宇宙萬物都是出於同一的根源的「道」，宇宙萬物是統一的。但是老子不僅看到了宇宙萬物的統一，而且還看到了它們相互間的對立矛盾。所以當老子考察一切具體事物，特別是社會現象的時候，他常常是從事物或現象的對立方面去解釋。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無，善——惡，禍——福，盈——虛，剛——柔，曲——直等等對立的公式。這絕不是偶然的。

老子從各種事物或現象的對立中，首先看出了它們相反相成的相互關係。他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

這便是後來黑格爾辯證法中之有名的「對立的統一」公式的表現。無疑地這是一種天才的發見。在古代只有希臘之偉大的天才的赫拉克利特曾經發表過與這同樣的思想。赫氏說：

「矛盾自相和致，各樣的聲音，產出最美的調和，一切都由鬥爭而來。」

「自然亦愛矛盾，它之產生和諧，乃是矛盾而不是同一。例如它綴合雄性之於雌性，而不是綴合同性，……技術顯

然一樣是模仿自然行事。繪畫配合着白色與黑色，黃色與紅色，這樣遂獲得圖像與原樣之相類形狀。音樂配合高音與低音，長音與短音，就成爲相異的調子而產生唯一的調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思想集，辛墾版一一六七頁)。

老子與赫氏這種辯證法的思想，當然不是一種『偶合』，更不是單純地從腦子裏空想出來的，只是因爲他們的天才與敏感而反映了客觀的現實，即客觀的辯證法而已。同時我們還必須了解：這種『反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即在社會的矛盾，階級的對立達到一定程度之下(像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及同世紀的中國春秋末葉)，才有可能。

老子既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對立的統一』，同時也就明白了一切對立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這就指出了『唯』與『阿』，『善』與『惡』中間並沒有絕對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究其極是相差無幾的。其他如美醜，曲直，禍福等，在老子看來都是如此。並且老子還進而指出了對立物之相互轉變的原理。例如他說：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這種思想，已經接近黑格爾所謂『質量互變』的原則了。『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惡，進步變成退步，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不是這種思想嗎？自然，我們還只能說是『接近』或『預見』。真正『質量互變』的法則，只有到更高度發展的社會制度和水平下，才能被發見的。所以老子的辯證思想，只能進到此地爲止。

有人說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外的對立，即表面的對立

，而沒有看出事物的內在矛盾。人們便以此為老子辯證法的最大缺點。不過，事物內在矛盾的法則，如同辯證法中『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兩種法則一樣，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偉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會發見這一法則。況且，老子還曾經說過『萬物負陰而抱陽』的話，這便已經多少接觸到事物內在矛盾或對立的法則了。我以為老子的辯證思想之最大缺點，則在於他一方面指出了各種事物或現象之對立，但另一方面他又異常厭惡這種對立，企圖用消極的方法去取消或調和這種對立。

對立原是由於矛盾，而解決矛盾的方法只有經過鬥爭（從溫和的到劇烈的）。鬥爭和對立是不能分離的。故赫拉克利特當其發現了事物的對立性和矛盾性之後，他便極力讚揚鬥爭，主張鬥爭。他說：『一切都由鬥爭而來』。『鬥爭是一切事物之父』。『凡為戰鬥而死的，就是神與人所尊重的人』。『人民為法律而戰鬥，必得像是為其城牆而戰鬥』（同上引書——七〇，七四和七六頁）。然而老子的精神則完全相反。他所最厭惡和反對的就是鬥爭。他雖然看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對立，但他認為解決矛盾和對立的唯一方法不是鬥爭，而是消極退讓。因此他提倡『不爭之德』。他認為『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所以他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在老子看來，凡是對立的局面，只要一方永久保持退讓的態度，完全站在消極方面，就可以獲勝而取消那種局面了。所以當強與弱，剛與柔，直與曲，榮與辱，福與禍，貴與賤，及奪與與等相互對立時，他都主張無條件地站在後者一方面。這樣一來，老子原來的辯證思想就完全成了反辯證的玄學了。

老子在對於事物運動和發生的問題上也表現同樣的矛盾。他

一方面承認萬物是運動的，有生有滅。如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但另一方面，他又極端忽視萬物的運動狀態及其生滅過程（這是辯證法最基本的原則）。他所注意的只是：萬物未生前之『無』和萬物既滅後之『根』。他說：『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常，知常曰明』又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老子所追求的不是現實事物之運動和變化的本身，而是事物之『始』與『終』的靜止狀態，即事物之死的狀態或虛無狀態。這也是十足的玄學。

（三）老子的社會思想

老子的社會思想便是由上敘的哲學觀點出發。宇宙萬物的本源既是『道』，而『道』是取法於自然的。所謂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己活動，自己變化，自然而然，不事人爲的意思。在老子看來，這樣的『自然』，是『無爲』的，然而又是『無不爲』的。於是『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便成了老子社會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說：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世，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反之，如果違反自然，妄事作爲，則一定得到相反的結果。『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在老子看來，天下一切爭亂，一切禍患，一切罪惡，一切腐敗，以及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都是由於在上者之妄好作爲所釀成的。因此他極力攻擊當時統治者的『有爲主義』

。他把統治階級的種種作為都加以考察、分析、批評。戰爭是當時一切『有為』中影響最大而又最壞的。因此老子極力反對戰爭。他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這是很明顯的非戰思想。其次，為老子激烈反對的是當時的嚴刑酷罰和橫征暴斂等。他說：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民之饑，以其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此外，凡是助長奢侈，引起爭奪，造成禍患的聲色貨利，游樂田獵，奇伎淫巧等，都為老子所厭惡所抨擊。他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關於當時統治者及一般上層階級（商人在內）的種種作為及其惡影響，老子算是深刻地指摘出來了。即我們在今天讀來還是

很生動的。但要怎樣才能取消或停止它們呢？換言之，要怎樣才能從『有爲』進到『無爲』呢？於是老子便以哲學家的態度進而追求一切有爲的根源，企圖從根源上消滅一切有爲的禍害。他以爲一切作爲，如戰爭、刑罰、苛征、恣意聲色、屯積貨財、競爭技巧、馳騁田獵等等，都是起於有『欲』。而慾望之多，又是由於『不知足』。所以他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因此他極力主張『少私寡欲』，主張『知止知足』。他說：『甚愛（指多欲）必大費，多藏（指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說：『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斯足矣』。這是一種消極的禁欲主義，不用說是純粹唯心論的。因爲人們，特別是當時一班封建貴族們的欲望之提高，不是由於單純的主觀之『多欲』或『不知足』，而是由於一般的社會生產技術和商業發達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由於奢侈品增多和貨幣使用範圍擴大的結果。有了客觀『可欲物』的存在，一定會引起或刺激起主觀的『欲望』出來。這一層老子似乎是觀察到了的。所以他進而主張消滅一切可欲的對象。他說：『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過老子在這裏仍然是主觀的唯心的。他不了解：所謂『賢』『難得之貨』一切『可欲』的東西，都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不因爲你主觀上『不尙』，『不貴』及『不見』而消滅。事實上，正因爲是『賢』，所以引起人們『尙』它，正因爲是『難得之貨』，是『可欲』的東西，所以引起人們『貴』它，和注視它。這是無可避免的，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於是老子的禁欲主義與人類自然發展的欲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也就是他的自然主義本身發生了矛盾。

與欲望問題相關連的是知識問題。人不但有欲望，而且有知

識。有了知識，自然會分辨事物的好壞、可欲的東西和不可欲的東西；自然會『尚賢』而抑不肖，『貴難得之貨』而賤易得之貨等。并且知識愈發達，製造的東西愈巧愈多，辨別力愈強，欲望也一定愈高，因而愈不容易滿足，這本來也是一種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但在老子看來，這是不『自然』的。因此他像反對欲望一樣地也極力反對知識。他對那些以知識治國的人曾作猛烈的攻擊，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同時他彷彿以身作則地形容自己是無知無識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他最後的結論是『絕聖棄智』。『使民無知無欲』。但在另一方面，老子又很希望有道者，即有智的『聖人』來統治。他甚至埋怨人們『無知』，不了解他的『道』，說：『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吾言甚易行，天下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這可見老子所提倡的無知主義不但與社會的自然發展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相矛盾的。

關於老子主張退讓或不爭的見解，我們在前面論究他的辯證思想時已經提到。現在應當特別指出的，就是這種見解的本身也是矛盾的虛偽的。例如他說：『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爲甚麼？因爲『柔弱勝剛強』。『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這是所謂以退爲進，以不爭勝人（他常說：『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實際上，這是一種變相的不抵抗主義。所謂柔弱勝剛強，與當時的歷史事實完全相矛盾的。春秋二百年的歷史都是證明強者征服弱者，大國併吞小國。假如你沒有實力，不拼命鬥爭，一切謙下或退讓，都只能引起敵人的輕視和進攻，自己的滅亡而已。

老子根據了他的「無欲」，「無智」和「不爭」等無爲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原理，最後便提出了他的理想社會的主張說：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爲原始社會的人雖然是結繩而用之，或者自以他們的飲食爲甘，以他們的衣服爲美，但實際上他們是十分缺乏的，艱苦的。他們的居住多是不安定的。尤其是各部落社會之間有着經常的戰爭，並不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他們不乘舟車，是因爲尙未發明；更沒有所謂什伯之器而放着不使用的事實。老子這種理想社會，與其他一切烏托邦主義者的主張一樣，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開倒車的。他企圖將當時已經發展到高度的，并且正在衰落的封建社會拉到原始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去，這顯然也是違反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是不「自然」的，等於要將「人」再回復到「猿猴」的形態去是同樣的空想與反動。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老子的社會思想，就其自身的邏輯結構言，雖然很能連貫一致，很有系統，似乎沒有甚麼矛盾，似乎「自然」、「無爲」、「不爭」和「無知無欲」等，都是從他的「道」邏輯地發展下來的。但從社會的歷史的觀點看來，却充滿了矛盾，僅僅是各種矛盾的混合體而已。除上敘的許多矛盾外，我們還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深刻地描畫出了各種事物的對立性、矛盾性，即鬥爭的不可免性；凡鬥爭的規律，永久是積極的因素戰勝消極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他却無條件地主張站在消極方面，企圖以此去取消或調和矛盾。一方面，他尖銳地攻擊了當時

統治階級的妄好作爲、嗜爭好戰、嚴刑酷罰、橫征暴斂、驕奢淫佚、以及使用種種智巧以欺騙人民等；這樣便應當喚醒人民，號召人民起來反對這樣的統治者，推翻這樣的統治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不爭』、退讓或謙下等消極的主張，即主張不抵抗主義，仍然希望有甚麼『守道』的候王或『聖人』（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來拯救人民。

但是這些矛盾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當然不能從老子思想的本身中去尋找解釋。老子思想的矛盾不過是當時社會中許多複雜條件所造成的矛盾，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層的地位的矛盾之反映而已。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老子的時代，春秋的末期，封建國家間的戰爭，封建貴族集團間的內鬩，以及封建貴族之一切豪奢縱慾等，最後都壓在農民身上，即全靠榨取農民來支持。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會發生種種不滿，憤慨和仇視等的感情與意識。農民首先對於封建國家間的戰爭，對於封建貴族集團間的私鬥，是感受痛苦最烈而又最直接的。他們對此自然要發生強烈的反感。但同時他們又感覺不到自己有力量可以停止或干涉那樣的戰爭和私鬥。所以他們除憤恨咀咒之外，只有希望統治階級自己相互退讓，『小國下大國，大國下小國』，用『不爭』的方法解決問題，免得累害他們。農民對統治者的嚴刑酷罰，橫征暴斂等也是如此。一方面表示憤恨、仇視，但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怎樣去反對它們、制止它們。所以結果也只有希望統治者實行『無爲』，即少作些事，自動地停止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農民根據自己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不但覺得一切戰爭、刑罰、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是多事、是有害的，就是一切知識也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所以『無爲』、『無知』、『無欲』、『不爭』和『知足』等，正是農民那種原始的實際生活的反映。最後

，農民對於當時社會所加於他們的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同時又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於是只有根據傳說，根據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大概每一民族的傳說和神話中對於遠古時代的生活都有許多美滿的描寫）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來的。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老子思想中的一切矛盾，一切弱點與優點，都能從當時的社會矛盾中，從當時農民大眾的地位中找到了說明。老子提倡『不爭之德』（以農民對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而言，就是不抵抗主義），提倡無知無欲、主張復古，這些固然是他思想中的弱點。但同時老子也有他最光輝的地方，就是他曾經無情地深刻地批評了當時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種種虛偽、以及對於人民之種種榨取和壓迫，這種批評精神對於燭照和揭發社會的黑暗是極可寶貴的。老子的自然主義或無為主義，從社會發展的觀點說來，固然含有反動的意識，然而拿來批評當時封建貴族那種橫行無忌、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也是含有它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在某點上說是幫助進步的。盧騷也會用過自然主義去批評當時法蘭西的君主專制政體之種種橫暴，種種違反自然的事實，這對於當時反君主專制主義的推動，以及對於後來的大革命，都給了深厚的影響。

（四）老子與托爾斯泰

如果我們拿托爾斯泰的思想與老子的思想來比較一下，那我們對於老子一定能獲得更明確的理解。自然，托爾斯泰的時代與老子的時代，不但相隔是十分遙遠，而且在本質上也是很不同的。在老子時代封建制度雖然開始衰落，但商業資本主義還在萌芽。而托爾斯泰的時代，不僅西歐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

國主義，就是俄國的資本主義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了。（這是就托氏時期的末期而言）雖然如此，但從托氏與老子思想的本質上，即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一點上說來，還是很相類似的。

所謂托爾斯泰的時期約當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即俄羅斯前革命的時期。在這時期中，舊的農奴制度已經崩潰了，但新的社會制度尚在準備當中。所以當時俄國的農民雖然處處感到變化、震動、擾亂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又看不出任何新的前途。雖然舊的農奴制度崩壞了，但建立在這個制度上的沙皇專政的官僚警察和地主貴族等，對於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却未曾減輕；雖然資本主義已經闖入農村，但在農民看來，這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禍。因此，當時俄國的農民仍然只有把他們的面朝着過去，去回憶他們那種原始『米爾』（MIR）式的共同生活——這便是托爾斯泰思想所由產生的基地。

所以托爾斯泰一方面嚴厲地無情地抨擊了沙皇官僚政治的橫暴、地主貴族的腐惡、資本的剝削，而另一方面却又主張『不以暴力對抗罪惡』；一方面尖銳地指出了一切上層階級的虛偽，宗教的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又極力宣傳『一切應訴之於世界精神』，即訴之於他的新的宗教；一方面深刻地描繪出了勞苦大眾的貧困、痛苦和不幸等等，而另一方面又宣傳禁欲、克己等的主張。托爾斯泰很慨嘆於俄國民眾的粗野和愚蠢，但他同時又極端反對西方文化，說那種文化是消滅人類天性中的一切天真和善良。他甚至反對學校教育。他說：『大學只是為那些易感的病態的自由派而設的，民衆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八六二年的論文）。托爾斯泰的這些矛盾，我們前面在老子的思想中差不多都碰過了。

甚至托爾斯泰也主張虛無。他說：『一切都是虛無，是物質的虛無』（見托氏論生活的意義）。托氏不承認歷史有進化律。

他說：『在人類面前一般的運動法則是沒有的』。所以他讚美靜止狀態，讚美東方人民的好靜。這種見解與老子的清靜無爲是很相符合的。托爾斯泰的理想社會，所謂『共同生活』，也是完全以俄國遠古時代傳下來的農村『米爾』制爲根據而加以理想化的結果，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屬於同一的烏托邦。

自然，托爾斯泰與老子中間也有不少異點，但從社會的觀點看來是次要的。例如托爾斯泰思想的最後歸宿是信仰世界精神，信仰他創造的新宗教；而老子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雖不否認神的存在，却沒有終極的宗教信仰。不過老子也曾說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便已經很接近於宗教的宿命主義了。

托爾斯泰曾在一些論文（俄文集刊爲一小冊）中專門研究老子的思想，他極力贊揚老子，欽佩老子（惜原文不在手邊，關於托氏推崇老子的話不能具引），這可見托氏與老子的思想中間之血統關係，已經由托氏自己認識出來了。

列寧稱托爾斯泰的思想，是俄國前革命期、即過渡時期中農民意識的矛盾之反映。農民要想脫離自己的矛盾，只有在一個更前進的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然而在托爾斯泰的時期中這個階級尙未生長成熟（至少在政治上如此），所以托氏思想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生在春秋末期反映農民意識的老子之思想上的矛盾，更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如果我們再把老子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略微比較觀察，就會更加顯出老子的思想是反封建貴族的。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故孔子的全部精神都集中於

糾正和重新確定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為這是施行改良主義的出發點。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以忠鞏固各級封建主的統治權，以孝鞏固家長權，這是從根本上維持封建的秩序），誇說『仁』的理想——這些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封建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核心。然而老子恰與孔子相反。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是揭破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虛偽的，違反自然的，這根本否認了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想只有站在被壓迫的仇視封建階級的農民的觀點上，才能發生出來。

老子是我們古代最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哲學家，最富有批評精神和表同情於民衆的社會思想家。他的一元論，他的辯證思想，特別是他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及其統治者的批評精神，直到現在還是光輝地映在我們眼前，值得我們研究、發揮。然而他的唯心論、他的玄學、他的虛無主義，禁欲主義、無知主義、復古思想、尤其是他的消極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精神，是十分有毒害的。但是自稱老子思想的繼承者，後來所謂道家者流，恰恰是繼承了他十分有毒害的這一方面；甚至現在人們還在爲他這一方面的思想而服務，這是等於在民衆中散佈毒菌。繼承并發揮老子思想中的優點而排除其毒素，只有站在中國最前進的一個階級的觀點上才有可能。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 陳獨秀、胡適之與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的貢獻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六日)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整整的二十七週年了！但對於這一運動之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對於它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的貢獻，似乎還不會得到應有的認識，科學的評價，雖然也曾有人稱這個運動是劃時代的，但它的劃時代的意義究竟何在？更少看到過明確的解釋。有不少的論著談到『五四』運動時，不是陷於機械的評斷，就是流於片面的描寫。而某些沉醉於派別利益，或個人野心的人們，對於這個運動的歷史事實及其領袖人物，也像對於其他的許多歷史事實和領袖人物一樣，甚至不惜任意加以抹殺、歪曲、閹割、篡改，乃至偽造，以期將客觀的歷史遷就於其主觀的需求。因此，即令在這個運動已經過去了廿七周年的今天，來對它重新加以檢討，也就不算是多餘的了。

固然，研究歷史，探討過去的事變，難免要滲透主觀的見解，追求『實用』的企圖。但必須忠實地尊重歷史事實，按照歷史事實本身的邏輯，去探求其變化的規律。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理解歷史，從歷史中獲得真正的教訓。也只有到這時，客觀歷史的盲目的必然律，才能轉變成為我們主觀的自由行動的指南。任意抹殺、歪曲、閹割、篡改，乃至偽造歷史，也許能『獲利』於一時，但結果一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的。

作者在本文裏，因限於篇幅，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不擬作全般的探討，也不準備批評別人對於它的誤解和歪曲，而只想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對於它的劃時代的根本意義，它對於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完全依照史實略予解釋，以便青年一代人從這兒獲得對於這一偉大運動的一個較明確而具體的概念，學得一點真實的歷史教訓。

『五四運動』，就它的直接意義說來，是對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內反對安福系專制政府賣國的一個政治運動。當時『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便是這一意義之最明顯的表現。至於北京學生羣衆，在這一運動中自動地勇敢地行動了起來，示威遊行，直接向賣國官僚的巢穴（趙家樓）進攻，用自己的手來懲罰賣國賊（如焚毀曹汝霖的住宅毆打章宗祥），引起了全國的同情與響應（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及抵制日貨等），以致迫使頑強反動的安福系政府，也不得不罷免了幾個賣國專家（曹、陸、章），宣佈了拒簽凡爾賽的分贓和約……這一切，都是這一運動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富有歷史意義的事實。然而『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意義，却還不在乎此，反而在它對於思想方面的貢獻。換句話說，『五四運動』之真正劃時代的意義，是在於它勇敢地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並在運動的進程中替另一個新的階級的啓蒙運動，準備了一個基礎。

以西方急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徹底地否定了中國的一切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以平民的白話，堅決地代替了貴族的文言；最後，則以認真的態度，將西方文化最高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這三點綜合起來，便形成了『五四運動』之劃時代意義的具體表現。

民主主義反封建傳統思想的鬥爭

中國最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如果專從政治及一般思想上來說，可以稱之爲民主主義與封建傳統的專制主義鬥爭的歷史，也

就是一般所謂東西文化衝突的歷史。

中國古典的封建制度，雖早已被秦始皇所破壞，但它的根本傳統，它那貴族的等級的宗法思想和倫理，却仍然被秦以後的君主專制主義者繼承了下來；並經過歷代專制帝王及其臣僕們（如董仲舒，韓愈及宋儒之類）的增補，修飾和發揮，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起來，因而形成了所謂『綱常名教』，所謂中國固有的精神文化。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便是這一文化的核心，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

但自從這一文化的負擔者——官僚貴族（所謂士大夫），一旦與西方資本主義正式接觸，並遭受了幾次猛烈的軍事打擊之後（如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之役），他們便逐漸感到了『相形見拙』，以前那種『尊夏攘夷』的『夜郎』態度，逐漸被對西方的恐怖和模倣所代替了。但在一個長時期中，人們所看到的西方，所恐懼和模倣的西方文明，還只限於兵艦槍砲，至多也不過是一些自然科學的技術知識（如所謂格致的聲光電化等），而對於中國幾千年相傳下來的『政教』，還認為是無上的國寶。李鴻章所曾進行的洋務革新，便是這時期的『模倣精神之實踐』。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公式，則為這一時期之『理論上的結晶』。

但經過甲午戰爭的慘敗以後，一部份代表資本傾向的『士大夫』——受過歐化的知識份子和新官僚們，便已感到中國的弱點不僅在物質方面，即政治上也必須予以『維新』。康梁的戊戌變法，乃是這一傾向的典型表演。康梁比之李張輩，確然進步了不少。但他們對於中國的舊傳統並沒有能脫離。因為康有為的『維新』，差不多全是在『尊孔』的形式之下進行的。孫中山之主張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比起康梁來更是跨進了一

大步。但由他自認『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及提倡固有的『智、仁、勇』看來，也還沒有完全與封建的舊傳統斷絕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將近半世紀以來的歐化運動，民主改革運動，直到辛亥革命為止，還沒有能超越與封建舊傳統思想妥協或遷就的界限。只有『五四』運動，才完全站在近代西方文化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同中國的『固有文化』，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及舊習慣等進行了全般的、徹底的、堅決的鬥爭。而著名的《新青年》雜誌，便是這一鬥爭之有系統的思想上的表現。

《新青年》，從最初起就在思想上發動，準備，並一直領導了整個『五四運動』的進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新青年》是在思想上從頭至尾領導着五四運動的一個總司令部。而在《新青年》中能夠代表幾個主要傾向的人物，則是陳獨秀、胡適之和李大釗。其中，陳獨秀更是這一運動思想上的發動者和主要的指導者。因為陳獨秀不但是《新青年》的創辦者，而且是它的長期的主編者及主要撰稿人。

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卷一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發行）『敬告青年』一文中，從『新陳代謝』的進化論的觀點出發，將『新』與『舊』，即整個的西方文化與中國的固有文化（在該誌同期中，汪叔潛解釋『新舊問題』說：『夫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完全對立起來：以『自主』對『奴隸』，『進步』對『保守』，『進取』對『退穩』，『世界』對『鎖國』，『實利』對『虛文』，『科學』對『想像』。在這種種的『對立』中，陳獨秀熱烈地贊揚了西方的新文化，而嚴厲地斥責了中國的舊文化。例如他在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節中寫道：「近世歐洲歷史爲『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權，求女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也」。而在『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節中則指出：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因此，他強烈地號召新的青年一代人起來與中國一切舊文化決裂，鼓勵他們「自覺奮鬥」，「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爲鄰，而不爲其菌毒所傳染」。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對中國舊文化所表示的這種猛烈的決絕的反對態度，及其對於西方新文化的熱烈贊揚，我們可以說：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對舊時代的宣戰書，而往後整個五四運動的基本路向也就導源於此。

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見上舉《新青年》同期）一文中，更明白地宣稱：『近世文明，東西絕別爲二：代表東方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此二種文明雖不無相異之點，而大體相同，其質量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爲近世，其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這差不多等於說，所謂東方文明，乃是代表古代封建的專制主義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則是代表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這是對於東西文化第一次較爲科學的區別和認識。

但甚麼是近代西方文明呢？陳獨秀接着說：『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他並指出『此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即皆發源於法蘭西（如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拉馬克的進化思想及巴布夫、聖西蒙和傅

里耶的社會主義)。因此，陳獨秀特別推崇法蘭西文明，尤其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者，『百科辭典家』深表敬仰，因而譯出了薛紐伯的法國《十八世紀之新思想》一文（見上舉同期所載《現代文明史》），以資介紹。這些都證明陳獨秀對於近代西方文明的基本內容及其起源之認識，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思想家之認識，在中國當時是較為深刻，高人一等的。由此可見，陳獨秀之起而發動並領導了五四運動，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陳獨秀指出了東西文化所代表的時代根本不同及西方文化的基本內容之後，於是更進一步從歷史上來檢討中國固有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觸後所發生的衝突及其影響。他在《新青年》一卷六號（發行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五日）《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寫道：『其足使吾人生活狀態變遷，而日趨覺悟之途者，其歐化之輸入乎？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現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接觸相衝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衝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跟着，陳獨秀即歷舉明末清初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輸入所引起的種種紛爭，如洋務與反洋務的鬥爭，中學與西學的鬥爭，以及共和政體與君主立憲的鬥爭等。最後，他認為他那時代『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的時代。而他本人即以擔任這一『大激戰』的號角手自居。

他高聲叫喚『青年國民』必須作『最後之覺悟』。他要求人民在政治上（所謂政治覺悟）應當覺悟『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由專制政治趨於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於國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趨於自治政治，此所謂立憲制之潮流，世界系之軌道也』。人民『應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應自覺進而建設政府，自定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

。正當新舊軍閥及官僚們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而老的革命黨人又全陷於軍事冒險及政治投機的時候，陳獨秀起而發表這種『人民應自覺自主』，『應自建設政府』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最能代表民衆利益，是最爲進步，最富有民主意義的。

在倫理上（所謂倫理的覺悟），陳獨秀指出『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爲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爲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倘於政治上否認專制，於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之特權，則法律上權利平等，經濟獨立生產之原則，破壞無餘，焉有並行之餘地。自西方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爲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爲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爲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惘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爲吾人最後覺悟之覺悟』。此種將中國舊倫理，『名教』，『禮教』等斷定爲『別尊卑，明貴賤』的『階級制度』，與現代的共和民主制度絕對地對立起來，而對前者加以公開的全般的否定，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確是第一次。這正如陳獨秀自己隨後所說的，是『倫理道德的革命』。這同時也就是表示陳獨秀在中國近代民主思想解放運動上所起的作用，較之他的任何前輩更爲深遠的所在。而五四運動的主要特點之一，也就在這裏。

陳獨秀既已公開而全般地否定了舊倫理，舊的「名教」或「禮教」，依照他的思想邏輯的發展，便自然而然地要走到完全否定所謂孔教為止。恰在這時，康有為及其徒黨們（即「孔教會」諸人）大肆提倡「孔教」，主張在憲法上確定孔教為國教（見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這便給了陳獨秀一個反孔的大好機會。

陳獨秀在《憲法與孔教》（《新青年》二卷三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發行）一文中，劈頭就說：「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於憲法不生問題」。這幾句話，在現時看來雖然簡單而平常，但對於當時尚承認孔子為「大成至聖」，為「萬世師表」的人們*，却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

接着，陳獨秀指出：「孔教問題，不獨關係憲法，且為吾人實際生活及倫理思想之根本問題」。因為「孔教之精華曰禮教，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根本」。而「禮教之根本教義」實為「三綱」。「三綱之實質」，如「教忠，教孝，教從」，則「皆片面之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尊卑之制度」，與現代「共和政體，西洋文明」，是「絕對相反」的。他的結論是：如「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合於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段話，我們可以說，直等於一篇最激烈最堅決的「討孔檄文」！

* 當時各學校的禮堂上，差不多都置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或懸有「萬世師表」的扁額，每於開學及孔子生辰時，學校當局必領導全體學生向之行禮致敬。由此足證孔子即在民國成立後，還是教育界崇拜的偶像呢！

而且，陳獨秀在反孔的鬥爭中，其思想也愈來愈進步，愈來愈深刻。他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二卷四號）一文中，便已接近了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當然是不自覺的），用『社會之生活狀態』（即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來解釋社會各種『學說』（即上層建築）的『興廢』關係了。例如他說：『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其變遷愈複雜，而期間愈速者，其進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獨尊一說，以爲空間上人人必由之道，時間上萬代不易之宗，此於理論上決爲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實上惟於較長時間不進化之社會見之耳。若夫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恒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爲變遷』。『現代生活，以經濟爲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爲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陳獨秀從這一歷史哲學觀點出發，於是進而抨擊『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爲人子爲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在『孝』的教條之下，爲人子者不得自由『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自由參加政黨及政治生活。在『從』的教條之下，婦女不但絕對談不到『參政』，且其身體亦絕對不能自由，甚至夫死還要『守節』，致釀成種種悲劇。此外，陳獨秀並指出『婦順舅姑』，父死守喪等禮教，均與現代的社會生活絕端矛盾。因此，陳獨秀更進而對於『孔教』或孔子的學說，作了一個最接近於現代歷史科學的評斷道：『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

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

正由於陳獨秀對「孔教」的本質有這種歷史的、深刻而正確的認識，於是他理直氣壯地最後向那些盲目地尊孔的人們高呼：「吾願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隨聲附和！試措爾目，用爾腦，細察孔子之道果爲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態？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惡·進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斷，勿依違附和！依違附和，爲真理發見之最大障礙！！」這種根據時代要求，根據理智判斷的強有力的呼聲，在當時是最足以感動人，說服人的。所以，自從陳獨秀這種呼聲發出之後，「孔教」的命運就被判定了。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大成至聖」、「萬世師表」，也就最後從青年一代人頭腦中抹去了它的痕跡！

陳獨秀自開始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反對東方文化，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直到站在歷史哲學的觀點上反對孔教，就獨秀本人的思想說，可算發揮到了頂點；就他的戰鬥精神說，也算達到了最大的限度。後來（直到五四運動的末期）陳獨秀之一切論著，僅只是依照上面的思想和精神加以開展，加以具體化。至於吳虞之特別反對家族制度（《新青年》二卷六號《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胡適之之專門批評婦女的片面貞操（《新青年》五卷一號《貞操問題》），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論文或演說，更不過是圍繞陳獨秀所發揮的基本思想的軸心，在各方面向封建的一切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舊習慣加以掃射，加以攻擊而已。

正由於陳獨秀對東方文化、對封建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特別是對孔教這種勇敢的、尖銳的、深刻的批評，這種無情的徹底的破壞，新的一代青年人的頭腦，才能從一切封建舊傳統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也正因爲有這種「解放」，他們才有可能無所

顧忌地接受了新的思想、新的學說、新的主義、新的道德觀念，大踏步地跨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於是要求各式各樣的平等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和社交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及離婚自由……像火山溶岩一樣地迸發，向四方八面奔放，最後匯成了一股洪流——這就是「五四運動」。

自然，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相當長期的進程中，他前後所發表的某些主張，某些解釋，不免發生矛盾，甚至混亂。例如他對於哲學，有時贊成進化論，實證論，甚至接近唯物論；但有時又宣揚歐根和伯格森的唯心論，或信仰實驗主義。在宗教問題上，陳獨秀更是矛盾得厲害，例如他在「五四」前期曾主張「必以科學為正宗，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這便已經達到法國啓蒙哲學家的「無神論」了（見《再論孔教問題》——《新青年》二卷五號）。但到了「五四」後期，他却又宣稱：「宗教在舊文化中佔很大的一部份，在新文化中自然不能沒有它。……因為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新文化運動是甚麼》——《新青年》七卷五號），這顯然是十足的實驗主義的立場。像與這相類似的矛盾和混亂，乃至幼稚，膚淺和錯誤的地方，還有不少。但人們絕不應利用陳獨秀這些「弱點」來「抹殺」他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思想上的領導作用*。因為陳獨秀這些「弱點」，差不多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家，特別是落後國的啓蒙運動家們，所絕難避免的。若就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尤其

* 像《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的著者華崗，談到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時，只特別指出李大釗，却根本不提陳獨秀的名字，便是有意抹殺的實例。

是在這運動的前期中所表現的基本思想看來，是具有一貫的系統的，合乎邏輯的，是代表當時最急進的民主主義，最富於反抗精神，最能反映時代要求，並推動時代向前邁進的。這已是歷史的事實，不管人們承認與否，或高興與否，『五四運動』的歷史本身，便是一個公正無私的裁判官。

文學革命 —— 白話文與文言文的鬥爭

新的內容，必須有新的形式相配合。因為『舊酒囊裝不了新酒』。所以一種新的思想內容，須要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它。這對於劃時代的新思想，尤其如此。

《新青年》所發動的運動，從反對一般的東方文化開始，到根本否定舊倫理，否定『孔教』，可以說是已經與一切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完全決裂了，同時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已推到了極端（陳獨秀稱之為『極端歐化』）。在這種情形下，那已經陳舊的，古板的，僵化的文言文，絕不足以表現這種新鮮的、活潑的、自由的新思想和感情，而需要一種同樣新鮮、活潑和自由的文學來代替它。換言之，那種封建專制主義的舊思想舊情感，既然全被否定了，而裝飾那種思想情感的『貴族式』的死文字，也必須連帶地予以否定；而需要一種能夠表達現代民主主義新思想新情感的『平民式』的活文字來代替。胡適之之起而主張文學改革，勇敢地，堅決地提倡以『白話』代替『文言』，恰好是反映了這一傾向，適應了這一時代的這項要求。

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出版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號）一文，不僅是『五四運動』中提倡文學改革的第一聲，而且是往後文學革命運動的一個綱領草案。該文

從現在看來，好像平淡無奇，且覺得態度過於溫和，但在當時不啻是一紙對舊文學，對文言文表示反叛的宣告！這與陳獨秀反對舊倫理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含有同等重要的歷史意義。

『文學改良芻議』，首先提出了『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腐爛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在這表面上雖然不是直接攻擊舊文學，但實際上却是針對着舊文學的諸弊端而發的。胡適之改革文學的基本觀點，是『文學進化』論。他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與陳獨秀站在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上，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政治倫理，實相符合。）他斥責那些專事摹倣古文的『文學大家』的文學，『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添幾許膺鼎。』他認為『獨有白話小說，』才『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因此他特別推崇『施耐菴、曹雪芹、吳敬梓』的白話文學，奉之為『文學正宗』。接着，他又歷敘中國白話文學進化的史實，其所得的結論是：『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學，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這不僅是明白地主張『必須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且還預言了白話文定『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

陳獨秀看到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後，即立刻表示了熱烈的贊賞和共鳴。尤其對於『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表示了『篤信而渴望』（見『文學改良芻議』附語）。並且緊跟着『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陳獨秀即提出了『文學革命論』

（《新青年》二卷六號），激烈地宣稱：『孔教問題，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吾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朗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的主要結論是：『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由此可以證明：陳獨秀深深地感到了他當時所倡導的政治的改革，『倫理道德的革命，』迫切地需要進行文學革命來輔助它們。換句話說，陳獨秀從社會的政治的觀點出發，認為舊文學（文言文）與舊的政治，舊的倫理思想等是不可分離的，必須一並毀棄。新的思想，必須有新的文字作工具來表達它，傳播它。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比起胡適之來，不但激烈些，且要深刻些。但在實際上，真正領導文學革命並完成了這一革命任務的人，還是胡適之。

因為胡適之對於中西文學及文字的一般修養和理論，尤其是對於中西文學及文字演變史的知識，在當時比任何人（連陳獨秀在內）都要高出一頭。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就已約略地指出了歐洲由拉丁文轉變為各國語體文的事實，以及中國白話文怎樣發展的過程。隨後，他更專著『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三卷三號），進一步地分析了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不可禁遏』的趨勢，因而更『深信』『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為正宗。』同時他又頗為客觀地分析了歷代文言文發展的趨勢，最後則指出『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遏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之文）代之。此種人可謂真正古文家。』

應當加以「攻擊」。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四卷四號——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發行）裏，從「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的研究中，指出歐洲意大利和英國怎樣從拉丁文解放出來，創造了自己的「國語」，自己的「白話文」。他特別認為「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因為……在意大利提倡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文代古文，有同樣的艱難。……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義的主張，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纔可以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由前面所引述的這一切看來，胡適之之起而提倡改革中國文學，絕不是偶然的了。無論在文學的一般理論上，尤其是對於中西文學及文學發展史的知識上，都有了相當充份的準備。胡適之對於中國古文學與白話文學以及西方文學史之了解，與陳獨秀之對於中國舊倫理和孔教以及西方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等的了解，恰好成了個對照。尤其有趣的是：陳獨秀特別推崇法蘭西的文化，以法國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思想改革家為模範，大膽地向中國的舊思想和舊倫理進攻；而胡適之則以意大利但丁時代的文學革命作典型，來供他在中國進行文學革命的借鏡；——人們也許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偶合，然而這恰好證明了：凡是落後國家一切偉大運動的前驅者們，為了有效地推進運動，不能不從先進國家去尋求和他們所領導的運動相類似的思想和經驗，以為其行動的指南。因為「先進國家是後進國家的榜樣。」凡是先進國家任何一個偉大運動的思想，經驗和教訓，都是含有「國際意義」的，對於落後國家都是極可寶貴，值得學習的。

胡適之在文學革命運動的進程中，也和陳獨秀在倫理革命的

進程中一樣，愈是往前進，也就愈加變得激烈而徹底。例如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對於舊文學的攻擊，便已不像在『文學改良芻議』中那樣溫和了。他說：『中國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的真有生命的「文言文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學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至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者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為甚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好文學。那些用死文字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的文言。』因此我說：『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這是用了極端煽動的口吻，以『死字』形容文言，以『活』字形容白話，給前者以徹底的破壞，而予後者以極力的推崇。而且這種破壞與推崇，確是具有充份的理由，在當時是最能說服一般青年人的。胡適之在這裏，真不愧為一個急進的文學革命家！

但胡適之對於文學的改革，不只是具有一般的理論，更不僅限於對文言的徹底破壞和對白話文的極力推崇，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建設新文學的方案。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便是他的『方案』的具體表現。在這個方案裏面，他告訴人們須怎樣鍛鍊白話文作為寫做的唯一工具；怎樣從各方面及實際上收集文學作品的材料；怎樣將收集的材料加以『剪裁』，及怎樣對整

個作品「布局」；怎樣用生動的寫實方法去「寫人」、「寫景」、「寫物」和「寫事」。最後，他特別主張用白話「趕緊多多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這個方案的內容，假如從現代新文藝的理論看來，是幼稚的、膚淺的；即同現在普通的文學概論比較，也是欠深刻的，至多只能適合於一般高中學生的作文教授。但人們絕不要忘記：這方案是在最初提倡白話文學的時候寫的。當人們剛剛從文言文的舊文學的銬鐐下解脫出來，開始向白話文的新文學前進的時候，有如一個生來就被關在監牢裏長期過活的囚犯，剛被釋放出來，一切都得從新學起，一切都得從頭作起。所以胡適之這個粗淺的甚至幼稚的建設新文學的方案，對於那時剛開始用白話文寫做新文學的人們，特別是對於開始學習新文學寫做的青年們，却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為這方案，不只是替新文學指出了應走的方向，而且還給從事新文學的人們，規定了一個頗為具體的實際準備寫做的步驟和方法——這在那時候是十分需要的。

最後，胡適之不僅是文學革命的號召者，白話文學的首倡者，而且還是最先實行用白話寫做新文學，即創作詩歌的人（他的「嘗試集」，即是最初試用白話寫成的詩集。）姑不論胡適之的白話詩的成就如何，但就他當時在這一方面所表現的那種勇往直前的實踐精神，那種「知行合一」的精神，實在值得贊許的。這對於當時新文學的推進上，無疑地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文學改革，自經胡適之提出而獲得陳獨秀的有力聲援和鼓舞之後，很快地就得到了當時一切進步的智識份子（如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的擁護。不久《新青年》本身即實行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從第四期第二號起——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號出版）。從此，《新青年》成了中國完

全用白話寫做的破天荒的一個刊物，也就是第一個實踐文學革命的刊物。「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配合起來了。跟着《新青年》之後，凡是贊成《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的雜誌報章，都採用了白話文。於是，純粹白話文體的散文、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外國文字的翻譯，有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在中國文壇上湧現了出來。而且凡是被認為第一流的新作品（如魯迅的小說），都是白話文學的作品。胡適之所「深信」的「今日文學，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現在是完全實現了！這同時也就是宣告：文學革命，已獲了光榮的凱旋！

「文學革命」的勝利，即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成為「文學正宗」的成功，這不僅是「五四運動」的最偉大的收穫之一，而且是中國全部文化史上的一個真正劃時代的表現。它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意、法、英、德等國以各自的「白話文」代替了拉丁文，差不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果歐洲各國不徹底從拉丁文的鑱銬下解放出來，近代的歐洲文化是談不到的。同樣，中國如果不從文言文的鑱銬下解放出來，也絕不會有最近二十餘年來文化上的新發展。因為在文言文那種舊「形式」的重重束縛下，現代新思想的新「內容」是無法自由生長的。胡適之關於這一點後來說得很明顯：「……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份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或精神，不能不打破那種束縛精神的枷鎖鑱銬。」（見「談新詩」）正因為文言文的「枷鎖鑱銬被打破」了，「自由的白話文體」被採用了，「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新思想

的內容或精神，才獲得了空前普遍的和深入的發展；而多少具有現代新內容和新形式的文藝，也就從此逐漸地被創造了出來。

在文學革命的進程中，胡適之關於反對舊文學和提倡新文學時所發表的許多見解或主張，也像陳獨秀在反對舊倫理和孔教時一樣，曾表現了不少的幼稚、粗淺、機械和錯誤。例如胡適之對於現代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從來沒有根據現代文藝的理論去加以檢討，去作過批評的介紹。甚至連現代文藝理論的術語，也不會運用。而他對於白話文學的詩歌，因為只注意到『自然』或『自由』的需要，以致走到極端，而根本否認了詩歌的『格律』。殊不知詩歌之所以成為詩歌，正因它具有它的格律或韻律的那種藝術的形式。否認『格律』或韻律，就無異於根本否認了詩歌本身之存在。可是，人們絕不應因此而抹殺胡適之在『五四運動』時代文學革命上的功績（像華崗之對待胡適之，也同對待陳獨秀一樣，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提起，却一味推崇魯迅，便是有意抹殺他的顯例），更不能因此而過分責難他，故意攻擊他（像葉青批評胡適時所幹的。）因為胡適之的弱點，也是代表資產階級的一般啓蒙運動家，文學改革家所難於避免的。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科學的觀點上，平心靜氣地來考察『五四運動』的史實，那就不管胡適之在文學改革運動中表現了如何的弱點，（甚至連他的哲學上的實驗主義和政治上的改良主義的弱點在內），但把幾千年相襲下來的那種陳腐的、古板的、僵化的，貴族專利的文言文，勇敢地加以徹底的破壞，而堅決地提倡用新鮮的、活潑的和自由的白話文去發表新興階級的新思想，及創造現代的新文學之唯一工具，——這不能不說是胡適之在『五四運動』中，在中國文學革命史上的偉大貢獻，這是堪稱不朽的。至於依據現代最新的文藝理論來批評和檢討現代文學的內容和形式，而指出新文學之更進

一步的趨勢，那不是胡適之所能盡的任務，而要期待站在另一新的階級的觀點上的人們來擔負它。

科學與社會主義的輸入

在近代歷史上，凡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民主改革運動，當它依照自己的邏輯而發展到最高峯時，往往要產生它的對立物：這在資本主義發生的初期已是如此（例如英國十七世紀的大革命，在其高潮中曾產生了『平等主義』的思想；法蘭西十八世紀的大革命，則產生了巴比夫的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末期，特別是在落後國家中，更成了一種規律。俄國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產生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而我們的劃時代的『五四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

『五四運動』，自從《新青年》最初以西方文化來完全對抗中國舊文化開始，根本否認舊倫理，否認孔教，提倡新道德，反對文言文，主張白話文，宣揚各種各式的平等自由……迄至『五四』（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前夕，這一資產階級的急進的民主思想運動，已走到了臨界點。於是，另一更新的思想，民主主義的對立物——社會主義——便開始探出頭來了。《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第六卷五號——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便是這一傾向之最明顯的表現。

關於一般的社會主義（連無政府主義在內），遠在『五四運動』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便已經有過一些介紹和討論。例如『同盟會』在日本所出版的《民報》上，孫中山和胡漢民等就已經談到了社會主義的問題，且會因此引起了和梁啟超的論戰。吳稚暉、李石曾等也會在巴黎辦刊物（如《新世紀》），介紹無政府主義。但那時所介紹或討論的社會主義，既異常雜亂而抽

象，且其動機，不是出於「趨時」，就是希圖利用社會主義來裝飾民主的旗幟。辛亥革命後的短期內，談社會主義的人更不少，甚至還組織了甚麼社會主義的黨派（如「中國社會黨」）。然而事實上全是投機的。自然，孫中山在那時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是高人一等的。例如他推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道：「……有德國麥克司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條理之學說，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見孫氏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演講詞）。他同時對於斯密亞丹的學說却批評道：「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佔一部分，資本家佔一部分，工人佔一部分，遂謂其深合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皆為工人血汗所成。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較資本所得者，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階級愈趨愈遠，平民生計，遂為資本家所奪矣。」（同上）。因此，孫氏曾預言：「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見民國元年四月，孫氏解臨時總統職後在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詞。）但孫氏雖然有這種認識和預言，他本人却只是相信亨利的資本主義式的「土地公有」說，及主張採用畢士馬克的改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見同上兩篇演詞。）這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距離尚甚遙遠。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第一次認真地，較有系統地，較為詳細地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介紹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還是《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

在這一「專號」中，所收集的文章（計共七篇），從馬克思的生涯到他的全部思想和學說，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都作了一

個較有系統的，較為詳細的探討和介紹。雖然，它們的探討和介紹，尚嫌抽象，不免幼稚，尤其是對於馬克思學說的許多批評，都是不得當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重複了當時修正主義者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如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一文），或是抄襲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空想主義的歪曲（如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的批評』）。但就一般說來，那些文章，除顧黃的兩篇外，都多少採取了認真介紹的態度和客觀研究的精神。其中尤以李大釗，是這一認真態度和研究精神的傾向之最重要的代表。

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上下兩篇，下篇則登載於《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中），對於馬克思主義那種有系統的頗為詳細的研究和介紹，不但在當時是空前的，就是在往後好些年中也還不多見。在這篇文章裏，李大釗開始告訴人們：「自俄國革命（指『十月革命』——作者）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着這世界的大變動，惹起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誤解。我們……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釀。」這段話，證明李大釗在當時已經理解馬克思主義對於『世界大變動』的影響，及其『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因而介紹過來，以便國內前進的人們對它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至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及其全部內容，李大釗在他的文章裏，首先作了如下的一個概括的敘述說：

「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分為三部：一為關於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為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於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

三爲關於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攻他的社會主義，簡直是不可能。因爲他根據於他的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變化而來的；然後根據這個確定的原理，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爲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預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於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命運。然後根據這個預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後的階級競爭。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部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他的資本論也是首尾一貫的根據『那今日社會組織下的資本階級與工人階級，被放在不得不仇視，不得不衝突的關係上』的思想立論。關於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於最後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

這一段對於『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概述，不但在當時是很扼要的，是十分精確的，就是到了現在看來，除了幾個術語應予以修改外（如『歷史論』應改爲歷史唯物論；『經濟論』應改爲政治經濟學或剩餘價值論；競爭應改爲鬥爭等），我們覺得還是扼要而精確。尤其是他指出了『階級競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部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的那種解釋，更顯得扼要而精確。因爲關於這一點，不但是以前所有第二國際的一切機會主義者所完全忽略了，就是現在自稱爲馬氏『真正門徒』的人們，也正在熱中於投機取巧，同馬氏的『階級鬥爭說』背道而馳呢。

李氏在往後詳細介紹馬氏社會主義的『三部理論中』（實際上只介紹了前兩部，即唯物史觀和經濟學，就停止了），是盡力

地引證馬氏的原文加以解釋，一般可說是忠實的。但他所附加的批評，却不免受了當時一些誤解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的影響，是錯誤的。然而他的『批評』，僅限於一些枝節，在大體上，他差不多是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因為他在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後，曾無批評地這樣寫道：『資本主義是這樣發展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腳下伏下了很多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到後來滅資本主義的就是他。現今各國經濟的形式，大概都向這一方面走。……凡物發展之極，他的發展的境界，就是他的滅亡的途徑。資本主義趨於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也是不可免之數了。』這段話的意思，確實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的最後結論，是早已被寫進了『共產黨宣言』裏面的。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上認識的深度，由這裏也明白地表現出來。所以就一般說，李大釗在那時不但是一個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介紹者，而且已是一個信仰者。他的缺點，不過是還沒有完全從那時頗為流行的『人道主義』（這種主義也是資產階級式民主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的產物。那時的陳獨秀在『答半農的D——詩』中也表現了這種傾向）的幻想下解脫出來而已。所以他研究馬克思主義所得的結論是：『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獨改造經濟組織，怕也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毋須說，李大釗在這裏所表現的完全是一種二元論的思想。他此種錯誤思想的根源，是由於他那時還沒有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不僅沒有反對改造『人類精神』，而且是極力主張要把『人類精神』從過去及現在的一切束縛下解放出來。人們只要看看馬克思本人及其門徒之特別努力於

教育工人及一切勞苦羣衆，特別注重於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及其階級意識，就夠明白了。

不過馬克思主義認定：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下，在絕大多數的工人及勞苦羣衆經常陷於生活的重壓底下，所謂『人類精神』的真正改造是談不到的。只有根本改造現存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得全體人類在經濟地位上平等之後，即絕大多數的人民從日常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之後，『人類精神』才有真正『改造』之可能。換句話說，『人類的精神』或思想，乃是被經濟所決定的。然而關於這一十分重要的見解，李大釗很快就明白了。不久之後，他所發表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新青年》第七卷二號——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出版），就是最好的事實表現。

在這篇文章裏，李大釗已經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發言。所以他劈頭就說：『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然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這不但表明李大釗已放棄了他以前那種『物心』二元論的矛盾立場，而且是完全站在以『經濟』為社會基礎的觀點，即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來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問題，特別是解釋『五四運動時代思想變動』的問題了。因此，『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不僅對於李大釗個人的思想發展上是一個劃階段的標界，就是對於整個『五四運動』時代思想的發展和轉變上，也是含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所以這篇文章，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

中國近代思想的變動，原是由於東西兩種文明接觸後發生了不斷的矛盾。這已為許多人所認識，特別是陳獨秀對此曾有過較清楚的說明（見『吾人之最後覺悟』）。但東西兩種文明的基礎

究竟何在？其根本區別點如何？却沒有任何人加以指出。然而理解東西文明的真正鎖鑰正在這裏。而李大釗便恰是從這裏出發。他說：『東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動的文明。』因為前者是以『定住的農業爲本位』，而後者則以『移住的工商爲基礎。』李大釗握住了這一鎖鑰，因而第一次撞進了中國『固有文明』的神秘之宮，將它的真相給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下面所引的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中國以農業立國，……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國特別發達。……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法、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層構造。看那二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那一樣不是犧牲被治者的個性以事治者？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全是『以修身爲本』；又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犧牲個性的第一步，就是盡『孝』。君臣的關係的『忠』，完全是父子關係的『孝』的放大體；因爲君主專制主義，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至於夫婦關係，更是把女權浸却……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因它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它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爲經濟上有它的基礎。這樣相沿下來，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與靜沉沉的農村生活相照映，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

一種死寂的現象。……」

由此可以異常清楚地看出：所謂東方文明，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所謂綱常、名教、道德、禮義……總而言之，凡「二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或「孔教」，全是建立在大家族制度上面的「表層構造」。而大家族制度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是以停滯的、保守的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所以，中國的「固有文明」的發生，發展及其長期存在，絕不是偶然的，實具有它的根深蒂固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它的改變，也只有等到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來動搖它，來打擊它的時候，才有可能。這「力量」便是建立在工商業經濟基礎上的西方文明。所以李大釗接着說：

「時代來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根本動搖了！……

「中國的農業經濟，既因受了重大的壓迫而生動搖，那麼首先崩頹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國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命運，孔子主義，也就不能不跟着崩頹粉碎了。」

上面這兩段話，不但指出了「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一般原因，而且特別給了「五四運動時代思想變動」（尤其是陳獨秀在這運動中所倡導的「倫理革命」和「反孔運動」）的客觀原因，一個最正確的解釋。根據這種觀點，李大釗接着便把「五四時代」的許多具體問題都提了出來，而加以更詳細的說明：

「試看中國今日種種思潮運動，那一樣不是打破大家族的運動，那一樣不是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

「第一、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運動，乃是推翻父權的君主專制政治之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義之運動。……

第二、社會上種種解放的運動，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是打破父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夫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男子專制社會的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義，順夫主義，賤女主義的運動。如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問題，短喪問題；社會問題中的私生子問題，兒童公育問題；婦女問題中的貞操問題，節烈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女子職業問題，女子參政問題，法律上男女權利平等問題（如承繼遺產權利問題等）婚姻問題，——自由結婚，離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戀愛，婚姻廢止，——都是屬於這一類的，都是從前大家族制下斷斷不許發生，現在斷斷不能不發生的問題。……現在因為經濟的壓迫，大家族本身已竟不能維持，而隨着新經濟勢力輸入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又復衝入家庭的領土，他的崩頹破滅，也是不可逃避的運數。不但子弟向親長要求解放，便是親長也漸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婦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漸要解放女子了；因為經濟上困難的結果，家長也要為減輕經濟的負擔，聽他們去自由活動，自立生活了。從前農業經濟時代，把他們包容在一個大家族裏，於經濟上很有益處；現在不但無益，抑且視為重累了。至於婦女，因為近代工業進步的結果，添出了很多宜於婦女的工作，也是助她們解放運動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勞動運動，也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派的學說，對於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治者的地位，

作治者階級的犧牲。……現代的經濟組織，促起勞工階級的覺悟，應合社會的新要求，就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這也是新經濟組織上必然發生的構造。」

李大釗對於『五四時代』這許多問題的有系統的詳細的說明，不但在當時是最為特出，最為深刻，證明他最能理解『五四運動』的特質，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是經得起批判，值得贊許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一文，不只是李氏個人思想發展上之最輝煌的表現，而且是整個『五四時代』思想發展之最高的象徵。因為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檢討中國自己的歷史：它一方面，清算了並解釋了『五四時代』思想運動的本身，而另一方面，又開啓了一個更新的思想運動的時代。所以從這時起，『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和擁護者間即起了深刻的分化：溫和的一派，便停留在原來的民主主義的陣地上，等待着時機去與反動勢力妥協，或把自己轉變成為新的反動派；而急進的一派，則接受李大釗的觀點（陳獨秀之接受社會主義，最初也是受了李大釗的影響）。而逐漸地踏進了社會主義的運動之中。

如果單就思想的發展方面看來，可以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化身。他最初以一個最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參加了，並幫助領導了『五四運動』；但當這一運動發展到了頂點而無法再前進時，他即轉變到了社會主義，而準備替另一個新的運動去服務了。如果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民主思想鬥爭的勇敢的發動者，和這整個鬥爭的領導者；那麼，李大釗便是這同一鬥爭的最堅強的殿軍，並在鬥爭達到高峯時，將它轉移到另一個新的鬥爭，社會主義的鬥爭去的急先鋒。

結 論

「五四運動」，就它的整個傾向，它的基本要求和成就說來，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

「啓蒙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歐洲先進國家中，是表示新興的資產階級發展到了相當程度，企圖在思想上從一切封建的專制主義的殘餘傳統的束縛下解脫出來，而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統，建立自己的世界觀或人生觀的一種運動。換句話說，啓蒙運動，就是資產階在思想上的民主解放運動。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運動，就其本質說來，是最初的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而法蘭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則是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之一個最完成的典型。因為這個運動會以「批評」爲武器，以「理性」爲標準，將當時橫暴的專制政治，不平等的法律，愚昧的宗教，貴族的藝術，封建的道德，反動的唯心哲學，以及一切維護僧侶和貴族特權的，束縛個人自由發展的思想、風俗、習慣等等，都統統放在「理性」的法庭之前，加以猛烈的尖銳的「批評」，嚴厲的控告，最後宣佈了它們的死刑。不用說，藏在這個「理性」幕後的乃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在當時，這「主義」正是代表歷史進步的傾向。所以啓蒙運動者在他們的「批評」奮鬥過程中，會展開了並完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最進步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狄德洛所代表的唯物論和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之最高的和具體的表現。而後來法國的大革命，乃是這一啓蒙運動思想發展的邏輯後果。與法蘭西啓蒙運動性質上相類似的啓蒙運動，在歐洲各先進國家中差不多都發生過。不過後者所表現的形式和內容，遠沒有達到前者的高度

和徹底而已。正因為如此，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近代全歐洲歷史上劃時代的。

自從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侵入東方後，東方的落後國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乃至日本等）也先後發生了各自的啓蒙運動。

中國的啓蒙運動，從歷史上說來，遠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前就已萌芽。而且有趣的是：最初發動這一運動的還是一些外國人，如李提摩太和李嘉白等。康梁的維新思想，受他們的影響是很不小的。『戊戌政變』後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也可以說是一種啓蒙運動的表現。梁啓超及其同道者們，在那時不但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一般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經濟知識、道德、哲學及自然科學等，而且還批評了中國專制政治的流弊，以及某些舊思想、舊道德、舊風俗的不合理，並大聲疾呼要培植『新民』（見梁氏所著『新民說』）。但由於梁啓超所代表的階級基礎在那時甚為薄弱，因而他的基本立場只能是與舊勢力、舊傳統、舊思想謀取妥協的改良主義。因此他所進行的『啓蒙運動』，也無法徹底，無法深入。但我們絕不能因此便否認梁啓超及其『新民叢報』在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所起過的重要作用。我們寧可說，如果沒有梁啓超在『新民叢報』裏替中國文化思想各方面所作的許多準備工作，後來的『五四運動』是絕不會進行得那樣順利和發展得那麼迅速的。雖然如此，但梁啓超所進行過的工作，只能算是『五四運動』前的一些準備工作而已。這正如法國的『人文主義者』在『文藝復興』時代所作的工作。只能算是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作了一些準備工作，是相類似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真正劃時代的啓蒙運動：它把二千餘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舊倫理（如禮教、名教

或綱常等），都給了猛烈的批評，徹底的否定；尤其是它以絕大的勇氣和決心摧毀了『孔教』，粉碎了這個『大成至聖』，『萬世師表』的偶像，這差不多等於在歐洲粉碎了耶穌基督那個偶像一樣；它同時也以同樣的勇敢和決心，廢棄了二千餘年來被『士大夫』視為『正宗』，居為『奇貨』的文言文，而以『鄙言俗語』的白話文來頂替了它，這又和『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各國以各自的俗語去代替拉丁文，很相類似；最後，則以最認真最嚴肅的態度，將近代西方文化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世界觀，——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次輸入到中國來，並立刻運用了這主義的哲學方法解釋了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特別解釋了『五四時代』思想變動的本身；——這些劃時代的具體表現，不但是我們以前的啓蒙運動家所不會作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過到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啓蒙運動的典型；那麼，我們的『五四運動』，便是東方落後國家的啓蒙運動的一個模範。雖然，我們的啓蒙運動，遠沒有像法蘭西的那樣具有創造性，達到那樣高度的成果，產生了那樣的『百科全書』；但比起東方其他的落後國家來，我們的啓蒙運動，是最富於批評精神，最富於歷史意義，而且是收穫最大的。

因為我們有了『五四運動』的貢獻，我們這一代人的頭腦，從孔子學說的一切銬鎖下解放出來了，我們從此纔有可能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信仰和自由批評；我們的筆從文言文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了，我們從此才有可能自由抒寫自己的情感，發表自己的意見，創造自己的文藝；我們得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和觀點，我們從此才有可能進一步地、科學地來研究全人類的歷史發展，考察整個世界的內在關係，預測這個世界的可能前途，研究改造這個世界的方案和步驟。尤其是『五四時代』對舊傳統、舊

思想的那種大無畏的批評精神；對新思想、新學說的那種認真研究的精神；對任何真理的那種熱烈追求的精神；——這些都是一個時代往上飛躍的精神的反映，是一份最好的遺產，是最值得我們後一代人繼承下來的。

自然，我們並不是說，『五四運動』是沒有弱點的。寧可說，它的弱點是很多的。它像任何落後國家的啓蒙運動一樣，一定要顯露，而且顯露了代表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某些『根性』，某些妥協性或極端性。例如：人們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思想，往往是無批評地接受；而對於自己的舊傳統或舊思想，則予以感情的而非理智的否定。以致今天否定的東西，明天又歡迎它，而今天接受的東西，明天又放棄了。然而這一類的弱點，並不妨害我們前面敘說過的『五四運動』所曾達到的那種劃時代的意義。而我們所要認識的正是這一劃時代的意義。因為認識了這一意義，對於我們的今天和明天都是很有幫助的。

自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又經過了整整的二十七年了！這中間曾經有過一次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那個革命，在思想上原是與『五四運動』發展的最後成果（李大釗所達到的）緊相聯繫的，是從那裏出發而不斷地準備起來的。它是應該繼續『五四運動』的最後成果，而將中國民族帶到一個新的歷史解放階段上。但它却被一種舶來的瘟疫思想（斯大林主義思想）和內在的反動勢力（國民黨所代表的）給毒殺了！

從此，中國又沉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淵。外來的侵迫，內部的混戰，軍閥的橫暴，官僚的貪婪，……交織成一幅網羅，人民就被禁錮在裏面，任其擺弄和宰割。如果從思想上說來，幾乎倒退到了『五四運動』的出發點。最荒謬而又最諷刺的是：在『五四時代』曾經反對過舊倫理，反對過禮教的人們，隨後又在『禮義廉

恥』的名義之下去擁護它們了！從前反對過孔子的人們，隨後又親身踏進孔廟裏去舉行祭孔了！從前反對過文言文的人，隨後又堅持以文言文『辦理公事』並教育青年了！甚至曾經自以為是科學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現在也認為那種『主義』不過是一種『哲學』罷了！好像歷史是在開玩笑，專替我們這個時代繪製諷刺畫似的！！

但歷史的發展究竟有它自己的邏輯，並不因為人們的故意倒退而就永遠踟躕不前。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情形已很明顯：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比之『五四』更為高級的時代，一個將繼承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時代，正在醞釀着，潛長着，準備着要從黑暗的深淵裏掙扎出來，邁步前進。歷史現在所要求於我們青年一代人的，是首先從思想上來重新武裝自己。『五四時代』在思想上所遺給我們的一份遺產，自然遠不夠用，遠不足以適應一個更高級的新時代的要求。但它那種對舊傳統，對舊思想的大無畏的批評精神，那種認真研究新學說，熱烈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現時青年一代人特別效法的。一個『飛躍的新時代』，必須有一種『飛躍的新精神』來迎接它！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取消專政』，『實現民主』，近來已成了我們全國一種最普遍的要求。不但一般民衆要求民主，一切在野的黨派高唱民主，就是當權的專政的政黨也被迫再三宣告要『還政於民』，預許『實現民主政治』了。不管將來的結果如何，這總算是一種強差人意的現象，是戰後唯一進步的現象，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來歷史開始表示轉捩的象徵。

但要求實現民主，是一回事，而怎樣才能真正實現民主，又是一回事。在中國要求民主的呼聲，早在半世紀之前就已喊出了，甚至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招牌也已掛出了三十五年。可是，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不但真正的民主沒有能絲毫實現，反而人民大眾越來越陷於極端軍事政的煉獄之中！這還不值得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們加以深深的反省，加以嚴重的檢討麼？

要想現時正在開始的民主解放運動，不致重蹈已往的覆轍，首先便須對於『民主的真實內容』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尤其對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須要有一個徹底的了解。但現在一般要求民主，高唱民主的人們，無論在其所發表的言論或政綱上，對此有關民主的最最基本的問題，却不曾有過明確的表示。最壞的是：甚至連認真探討的態度，亦很少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作者署名歐伯。

看見。人們所慣於重復的，不是一些最普通的民主口號，一些缺乏內容的民主公式，就是把過去致使民主解放運動失敗的許多錯誤思想，改頭換面地重新散播開來。像這樣的情形，如果聽其繼續蔓延下去，民主解放運動的前途是不許樂觀的。

人們應當知道：中國當前的民主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臨時政治問題，這乃是落後國家一個遲延未決的『歷史任務問題』。要深刻而正確地懂得這個問題，至少又必須將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發展，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以及與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關係，加以精確的分析和探討。然後才有可能從中抽出科學的結論，構成民主的綱領，以作民主運動的指南。其次，必須從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中去學得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將我們自己近半世紀以來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經驗加以科學的檢討，以便從中獲得真正的教訓；因為這教訓是我們自己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償付了極大的代價，對於我們的民主解放運動的前途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倘使對於『民主問題』不從這種嚴肅的態度和科學的研究上去求得理解，無論你主觀上怎樣渴望民主，要求民主，高唱民主，乃至不惜犧牲生命爭取民主，但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又是一幕悲劇的收場。在日常的生活上，人們也許偶然僥倖地獲得某種成果。但在廣大的歷史問題上，『偶然的僥倖』是絕不存在的。歷史是一個鐵面無私的裁判者，它總是將『勝利』（歷史進步性的勝利）判給那些理解歷史規律並忠實替這一規律服務的人們，而懲罰那些投機取巧貪圖僥倖的份子的。

現在既具有種種徵兆，足以預示中國歷史又快臨到一個轉捩點，這就是說，現時已在開始的民主運動，有可能轉變到一個新的解放時代的前途。但先決的問題，必須有正確的

理論（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民主解放運動的教訓）來指導行動。「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已由近代全部歷史證明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了。誰能聆悟並運用這一真理，誰才能獲得未來勝利的錦標。

自然，關於民主問題的全部理論，以及近代民主解放運動的許多經驗和教訓，絕非一篇短文所能勝任發揮。但我們深望誠心從事民主解放運動的人們，對此加以嚴重的注意和認真的探討。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民主問題的內容及怎樣實現這一民主的方法。本文的任務，只在將問題莊重地提出，並略予以闡究，希望由此引起大家來作進一步的討論而已。

民主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

民主主義或民主運動，也同其它的社會現象一樣，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因而它的發生，發展和衰亡，都要受着歷史發展條件的限制。雖然由於各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不同，因而其民主的內容及其解決的方法，不會完全一樣，但在本質上總是相同的。

民主主義（DEMOCRACY）的思想，本發源於古代的希臘，但在那時只是少數奴隸主或自由民的民主，而絕大多數的奴隸們是完全被擯絕於民主權利之外的。所以古代希臘的民主，只是近代民主主義的一個預言罷了。

近代的民主主義，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懷裏發生並發展至某一程度時，它便感到封建制度的束縛。而且這種經濟越是往前發展，則它所感到的束縛也就越不可忍受。因而在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利益的階級——資產階級中，便發出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進行民主解放的運動來了。因此，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

，又往往跟着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的。

近代的民主主義既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它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性的。它的歷史意義，主要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障礙，開闢道路。在經濟上，資本主義需要自由的勞動力，需要提高農民的購買力，需要自由的國內市場，需要自由地發展它的生產。在政治上，它需要法律的保障（私有財產），需要統一集中的國家政權。但在封建制度的或繼承封建制度的君主專制底下，勞動力是不自由的，因為農民既多半附着於土地，而手工業者又深受行會傳統的束縛。同時，農民因為自己沒有土地或缺乏土地，不得不忍受過份的封建榨取，無法發展自己的生產，根本談不上有購買城市商品的能力。此外，如行會限制生產的種種法規，封建的關稅壁壘，以及貨幣與度量衡之紛亂和不一致等等，都是妨害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的障礙物。但這些障礙物與封建的地方主義，貴族僧侶的特權，以及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是緊相聯繫着的。所以，新興的資產階級，爲了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便不得不要求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以便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並獲得自由的勞動力；不得不要求打破手工業生產的行會制度，以便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最後，不得不要求推翻封建傳統的君主專制，剝奪一切貴族僧侶的特權，以便組織自己的代議制政權，建立民族統一集中的國家，以此來統一國內市場，並進而向國外市場擴大自己的勢力或抵抗外來的侵略；——這些便是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而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思想、信仰自由等）和平等（所謂在法律前的平等），不僅是達到實現這一民主歷史任務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其應有的結果。歐洲自文藝復興時代後幾百年的歷史，差不多都是爲了爭取實現上敘的民主任務而鬥爭的歷史。十六世紀尼德蘭（荷

蘭)的革命，十七世紀英吉利的革命，以及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大革命，不過是這一民主鬥爭之最尖銳，最高度和最典型的表現。美國的獨立運動，也是屬於這一民主鬥爭之另一典型。十九世紀中葉法、德、奧、意的革命運動，國家統一運動，則是這一民主鬥爭之繼續。最後，就是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是由於此種民主的歷史任務所促成。

就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於運動的歷史體現看來，民主主義的內容或民主的歷史任務，其中最主要之點就是：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制政治，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而普選的代議制政治則是這一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現。這種民主主義，在近代歷史上確曾起了偉大的進步作用——它會替資本主義的經濟清除了封建制度的障礙，開闢了自由發展的道路。倘使沒有民主主義的幫助，資本主義是無法向前進展的。但民主主義自身亦有其一定的階級內容和歷史界限，絕不是像一般庸俗的民主主義者所想像：它是超階級，超歷史，『放之萬世而皆準的』永久真理。它同宇宙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它的發生，發展和衰亡。假如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主義，在十八世紀以前是發生和生長時期，十九世紀是繁榮時期，到了二十世紀初便已開始進入衰落時期了。因此，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主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是歷史進步的因素，而到了二十世紀便已開始變質而成爲負的因素了。所以在現時西方先進國家中所急切要求的，已不是甚麼一般的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範圍內所能容許的民主主義，而是更進一步的代表勞動民衆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了。而且事實上，像德意的資產階級已經放棄了以前的民主主義，而轉到了極端反動的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西方先進國家已經顯示衰落的確切表徵。然而這絕不是說，東方落後國家的民主

主義也達到了同樣的階段。相反地，民主主義在東方落後國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中還具有推動歷史進步的重大作用。假使這些落後國家不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如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掃除封建殘餘，解決土地問題等），便絕對無法向前發展。但同時也絕不是說，東方落後國家（像中國、印度等）之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一定要依靠畫葫蘆地循着西方先進國家（如英法德等）的軌道進行。我們根據落後國家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律和綜合律，寧可說，它們解決這一任務，有它們自己的途徑。而且這途徑也可以從西方先進國家歷史發展的經驗中獲得指示。

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的經驗

民主改革的運動，即解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歷史任務的鬥爭，在西方先進國家中一直延長了好幾個世紀。且其過程是異常之盤旋曲折，錯綜複雜而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有幾個主要的國家，可以作為民主改革的曲型，那就是英、法、美、德、俄。

英國，如大家所知道的，它是首先發動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革命（所謂工業革命）的一個國家。但在這個生產革命之前，英國却曾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的最嚴重的民主鬥爭，經歷了兩次的革命，尤其是第一次革命（一六四〇至六〇年）不但經過的時間最長，且其鬥爭亦最為嚴酷。因而它的經驗和教訓亦最為豐富。這次革命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它一度摧毀了代表封建特權的斯圖亞特君主專制政府，將國王查理第一送上了斷頭台，成立了民主共和國，解決了一部份農民的土地問題。但在這次革命的過程中，當革命越是往前進展，反封建君主專制的鬥爭越趨激烈，要求民主的解決越趨徹底（如均分土地，建立普選的一院制等），下層的民衆

(城市的工人，手工業者和鄉村的農民) 越趨積極，越表現得勇敢和堅決時；而資產階級的上層（如長老會派及清教徒會右派所代表的）便越來越往後退，越來越趨於同王黨貴族的反動勢力謀取妥協了。也正因為如此，一方面使革命推行到了極限（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言），而另一方面又使反革命獲得了新力軍（即從革命隊伍裏脫離出來的資產階級份子），當革命走到精疲力竭時，斯圖亞特王朝又重復出現於英國的歷史舞台。但英國經過了這一次大革命之後，整個的社會基礎是變化了，專制君主和封建貴族們的立腳地是動搖了，無論查理第二和詹姆斯第二及其臣僕們如何企圖恢復已往的權位，但歷史已註定了他們的命運。所以至一六八八年，當資產階級又感到不能忍受，起而向專制王權進行鬥爭時，即輕易地結束了斯圖亞特，獲得了所謂『光榮革命』的勝利，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政權，這便給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法蘭西的大革命（一七八九至九四年），比起英國的第一次革命來，進行得更為徹底。它不但徹底敲碎了布爾邦王朝的君主專制，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最革命最民主的共和國，而且還徹底地取消了一切封建貴族和僧侶們的特權，掃清了封建的殘跡，解決了土地問題（即無條件沒收一切貴族僧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或轉讓於資產階級）。但另一方面，當革命越是向前進展，革命的民主改革越趨於徹底，下層的群眾（巴黎的山克洛特和鄉村的農民）越趨於急進時，法國的上層資產階級（如米拉波，辣斐德及整個的基朗特黨）也同它在英國的前輩一樣，越來越脫離革命的行列，轉而陰謀破壞革命，力圖與王黨貴族妥協，積極進行反革命去了。結果便形成了德爾米多月的悲劇，產生了邦那巴特（拿破崙）的獨裁，最後又是布爾邦王朝的復辟。但法國大

革命所解決的民主歷史任務（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條件，無論路易第十八及查理第十如何想阻礙它們，却終究是徒然！所以僅由於『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的輕輕的一擊，布爾邦王朝也就最後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院。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是替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革命奠定了基礎；則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便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昭示了最完竣的模範。

美國的獨立運動（一七七五至八三年），是資本主義初期一個最典型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因為美洲完全沒有封建的傳統，所以當時北美的敵人只是單純的英國的壓迫和束縛。在獨立運動中，由於美國民衆反英的異常勇敢和犧牲的精神，以及其領導者（如華盛頓）的堅決意志和無誤的戰略，很快地就完成了北美合衆國獨立的使命，在新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此開闢了一條向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坦途。

德國，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還是歐洲一個落後的國家。它不但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傳統，而且還深深停滯在封建割據的四分五裂之中。所以那時橫在德國民族面前的民主任務，不僅僅是需要解決土地問題，而且特別急切需要的，是如何打破封建的割據，建立民族統一的國家。一八四八年的『三月革命』，原是適應這種歷史需要而產生的。但德國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卑怯，又鑑於法國『二月革命』的『恐怖』，於是竟在工農群衆向着王權及封建勢力英勇進攻的當中，即卑劣地同反革命勢力妥協去了。結果是革命陷於流產，土地改革和國家統一的任務，只得等待着採用另一方法去解決，那便是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及其『社會改良政策』。『鐵血主義』藉着兩次對外的惡戰（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

確曾把德意志統一起來了。但這種統一是以資產階級屈服於普魯士的地主貴族為代價的，因此，德國的資本主義也就和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結成了不解緣。而『社會改良政策』運用在土地問題上，則是將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封建傳統的壓榨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得普魯士的農民變成了資本主義化的地主們的馴服奴僕。正因德國的民主任務之解決，不是由於革命，而是藉助於俾斯麥主義（我們東方的日本，也是俾斯麥主義的蹩腳的模倣者），雖然德國因此很快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並很快地走上了帝國主義，但它所包含的爆炸性也就特別猛烈。兩次世界大戰之均由德國發動，與此種歷史根源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東歐的俄國，比起中歐的德國來更為落後。因此，不僅它的民主改革運動落後了半個世紀，而且它完成這一改革所走的道路也就成了另一典型。如果民主的歷史任務，在德國最迫切和最主要的是建立民族統一的國家，則在俄國便是解決農奴式的土地問題。但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又必須徹底摧毀代表地主貴族的沙皇專制政府。可是，俄國的資產階級（像立憲民主黨所代表的），比起德國的資產階級更為卑怯無能。所以它對於土地問題，自始就採取了藐視和怠工的態度，而對於沙皇政府則更希圖謀取有利於自階級的妥協。因為它與地主貴族保有着極密切的聯繫，所以不敢、也不願爲了土地問題去同它們決裂，以致打斷了自己和沙皇政府謀取妥協的橋樑。俄國的無產階級（如布爾塞維克所代表的）則完全相反。它不只是贊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而且還以解決這一問題爲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它認爲當前直接的政治利益，是在於同農民聯合去摧毀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的沙皇制度，以便乘此踏進政治舞台。城鄉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如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所代表者）雖然也同情於農民取得土

地，可是它們缺乏決心和勇氣去幫助農民解決問題。所以它們在這一問題上，也同對於其它的民主問題一樣，經常動搖於資產階級之間，結果總是幫助了前者，而拖延了土地問題的解決。

由於上敘幾個階級對於土地問題所採取的根本態度不同，因而便決定了俄國民主改革的特殊道路。這就是說，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不是由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而是由無產階級去完成。正由於無產階級決心領導農民來解決土地問題，所以能獲得農民群眾的忠心擁護，因而它乘着民主運動的高潮便踏上了政權。結果也就最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及其他的民主問題（如國內弱小民族自決問題）。俄國十月革命所表現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俄國的十月革命是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改革運動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有機地啣接起來了。

從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運動的一般經驗看來，民主任務（如土地改革，廢除封建特權，取消君主專制，建立民族獨立統一國家等）的解決，雖然是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道路，是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但資產階級本身對此却往往採取不徹底的妥協態度，這在最早期的英法民主改革運動中便已如此。而在後期的（即十九世紀以後的）民主改革運動中，特別在較落後的國家中（如德俄等），資產階級更是顯得卑怯和反動。反之，下層的平民群眾，特別是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總是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形成了最主要的和最堅決的動力。而且歷史越是往前進，越是在落後的國家中，這種情形也表現得越明顯。最後到了廿世紀的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甚至由無產階級才將它加以完成。但當俄國無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後，它却不能再循着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道路走，而是要跨進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前途了。

。這便是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改革運動發展的基本邏輯，是它們的主要經驗和教訓，是民主任務遲延未決的東方落後國家值得特別加以考慮和借鏡的。

中國的民主任務

中國是東方一個最典型的落後國家。而它的落後性，則主要表現於社會生產的長期停滯和被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上面。

由於生產的長期停滯，我們兩千餘年來（秦以後）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就停滯在自然性的農業上。但同時因為『前資本主義期』的商業和高利貸之某種程度的發展，土地却早已走上了私有化的階段。因此，一切官僚貴族，商人和高利貸者，差不多都取得土地為剝削農民增加財富的唯一手段。於是土地也就經常集中於它們的掌握中。另一方面，整個君主專制的官僚的上層機構，又全靠壓榨農民（如各種各式的賦稅）來維持。這樣一來，我們的農民便成了全部社會生活的負擔者，一切上層階級剝削和敲榨的對象了。這便是中國『農民問題』，亦即『土地問題』的歷史根源。

自鴉片戰爭的結果，西方資本主義得以自由侵入中國每一角落後，而首先遭受到嚴重打擊的又是我們的農民。因為外來商品的『價廉物美』，便破壞了它們的手工業（家庭副業）；因為農產物的商品化，使它們更依賴於商人，聽其操縱；因為專制官僚政府費用的急速擴大（連幾次對外戰爭的戰費及賠款在內），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負擔，即增加賦稅；因為一切官吏加速地貪污和腐化，其惡果自然也是落在它們身上；至於舊有地主們因商業發展而生活費用提高，更只有靠增加地租，加重剝削農民來維持；——這一切綜合起來，農民群眾便越益陷於貧窮化，陷於困苦的境地了。而暫時

解鬆困境的唯一方法，便是出賣土地或舉行高利債。前者的結果，使土地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官僚，軍閥，商人，高利貸者，工業家等）之手；而後者則使農民永久陷於高利貸的吸吮，迄至吮到最後一滴血為止；——這便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侵入後對於農民方面所造成的最一般的情形。這情形，經過滿清末期，辛亥革命後的軍閥統治時代，直至國民黨專政多年，不但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跟着時間的前進而日趨嚴重。尤其是抗戰八年，我們的農民既經過了敵偽的無比蹂躪和榨取之後，又遭受『勝利的』軍人官吏和土豪劣紳的種種強徵勒派（如派軍米），簡直是墮入了『人間地獄』！所以近來農民騷動（如西康及浙江寧平縣的暴動），日有所聞，這證明農民的痛苦，已達到臨界點了，再也難於忍受了！

但大家知道，中國的農民是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這個無比廣大的群眾，既日益陷於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軍閥、官僚及土劣的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日益陷於饑餓的死亡線上，它們的生產力當然只有日趨衰落，它們的購買力更是日益縮小以至於零；再加上天災人禍（如軍閥混戰，國共戰爭等），它們當中的一部份不是流於盜匪，就是舉行暴動，其結果當然又是轉而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內市場除了日趨衰落和縮小之外，還有甚麼前途呢？然而這對於城市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一個絕對的障礙！所以解決農民問題，或土地問題，即沒收地主土地重新配給無土地或缺少土地的農民，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和高利貸，制止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的橫敲勒索，乃是恢復並擴大國內市場，提高城市生產，復興國民經濟的最最基本的前提。同時這也就是中國民主主義最基本的內容之一。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經濟的異常

打擊、束縛、以及對於整個民族的危害，現在差不多已成了公認的常識。但人們所容易了解的多是那些最表面、最露骨的不平等現象，如：割據土地，建立租界，創設特別法權，以及外軍的自由駐紮，外輪的自由航行……。然而埋伏在這些現象下面最重要的作用，却是自由消售商品，購買原料，以及無限的投資（如築鐵路、開礦山、設工廠等），——這才是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最基本的經濟目的。爲要達到此種目的，便必須在經濟上操縱中國的海關權，在政治上用各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使中國的統治者變爲自己的代理工具。如果海關不完全獲得自由，中國的政府不徹底脫離任何帝國主義的羈絆，即令某些租借地收回了，租界廢止了，特別法權撤消了，外國軍隊不自由駐紮了，外國商輪不自由航行了，……但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是無法發展，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無法提高，整個的社會政治還是無法走上軌道的。這一層，我們只須略一注視現時的情形就夠明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不是名義上已被取消了嗎？可是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呢？不但香港、九龍和澳門仍然被握在外人手裏，而且東北的旅順大連和主要的鐵路幹線又在『雅爾達秘密協定』之下重新斷送了。最重要的是：海關權雖已從日帝掌握中收回來，但暗地又落在美國人手裏。所以最近美國的商品已如潮水般地湧進來。這情形如果繼續並開展下去，事實上也將繼續並發展下去，中國的一點民族工業一定會淹死的。同時，又以金元借款爲條件，企圖將整個中國擱在菲律賓的狀態之中。所謂『四強』或『五強』之一的中國，難道應該如此嗎？！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獨立還遠沒有完成。徹底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主權，脫離任何帝國主義的羈絆，求得真正的土地完整和獨立，——這一最重要的民主任務，還擺在我們面前

急待解決呢。

除了對外需要民族完全獨立，對內急待解決土地問題外，我們國內還有一個弱小民族的問題。所謂漢、滿、蒙、回、藏；除了滿族已完全漢化並與漢人混居外，蒙、回、藏三族確還保持着各自的經濟生活，各自的言語、風俗、宗教，並各據有一定的地域。這三個民族的人口，雖然比起漢族來是居於『少數』（但也不下三千萬人），並住於邊疆，但它們對於中國的統一與和平，對於整個國家經濟生活的發展，還是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中國歷史上，漢族和這些弱小民族，演過多少次的戰爭，耗過多少的物力和人力，凡是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的。即以最近的情形來說，『伊寧問題』已鬧得滿城風雨，『東蒙問題』亦一度提出，但這還不過是表示我們戰後的弱小民族問題尚在重新開始而已。倘使這個問題不迅速謀取合理的解決，將來糾紛的爆發是不可收拾的。正因此，國內的弱小民族問題，也是我們當前一個重要的民主任務問題。

其次，就是一般下層勞苦群衆的地位急待改善。尤其是工人群衆的地位必須提高，它們社最低限度生活，必須獲得保障。因為它們是現代生產的唯一負擔者。如果它們不能過活或陷於奴隸狀態，不但現代的生產無法提高，就是整個的國民經濟也是無法開展的。因此，在先進的國家中，訂定『勞工保障法』，早就成了一種迫切的民主任務。如『八小時工作』，『保護童工和女工』，『工人自由組織工會』，以及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權』等，早已成爲公認的民主權利了。但我們中國的工人群衆，幾十年來都是處於極端被壓迫和剝削的地位，它們的工資，除了極少數外，總是養活自己還不夠，更不要說供養家屬了。它們的時間，都是在十小時以上，有些甚至超過十五、六小時。自由組織工會和罷工，

直到現在還是視爲不合法的。至於童工和女工的保護法，更是談不上了。這種情形，不僅僅是表示中國的落後，而且證明我們的資產階級『只顧擠牛奶，連牛的死活也是不管的』。因此，改善一般勞苦群眾的地位，特別是改善工人群眾的地位，還是我們當前的民主任務之一。

最後，成爲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礙的，是專制傳統的政治機構。它的核心，是專橫而又腐敗的官僚制度。這制度，在滿清是以君主專制的面貌表現出來；入『民國』後，前一時期是在各個軍閥之下活動；而最近二十年來，則體現在一黨軍事專政的機構裏。官僚制度的階級成份，是跟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在滿清，主要是地主貴族和商業高利貸者；而往後則以買辦階級，銀行財閥及少數上層工業家爲其中心。正因此，這種官僚制度是最仇視任何民主的改革的。例如解決土地問題，便要侵犯到它所代表的地主的利益；對外完成民族自主，則要使它所代表的買辦失去其主子的歡心；提高工人待遇，又要得罪它所代表的工業資本家。而且這種官僚制度的本身，也好像有它自己的『進化』律。在滿清時代的官僚制度，早已爲西方人所驚異，可是以滿清的官僚制度比起現在的來，却是小巫見大巫了！所以，爲了要解決民主的任務，首先必得徹底摧毀這種根本違反民主，阻礙民主的官僚制度及其外殼，而以現代普選的民主制去代替它。

民主任務的解決，可以說是從落後國家走上進步國家的一道橋樑。凡是民主任務未經解決的國家，它一定永遠陷於癱瘓、混亂和聽人擺佈的泥沼裏而不能自拔的。

中國過去民主改革運動的教訓

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民主思想（當然不是出於侵略者的自願）。當中國的經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即發生了某種資本主義的經濟而要求向前發展，但同時又受到阻礙時，就逐漸要求民主，感到民主改革的必要了。戊戌的維新運動，乃是適應這種客觀的民主要求之第一次的表現。

戊戌維新運動的基本傾向，是企圖將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改變為君主立憲的國家，並以此從上至下來改革舊有的社會經濟制度，逐步地走向現代的資本主義。但事實上，滿清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絕非光緒皇帝一人所能代表。相反地，光緒不過是寄生在那個龐大而頑固的官僚機構上面而已。雖然年青的皇帝因受了種種外來的刺激（如甲午戰爭的失敗及隨之而來的各帝國主義的種種要素），志願「維新」，切望實行某種民主改良來延續清廷的命運。可是，實際上代表那個官僚機構的西太后及其黨羽們（如榮祿等）却絕對不能容許。而維新派的康梁等又完全沒有群眾作基礎。因為在那時真正需要民主改革（土地問題）的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但這正是康梁諸人所未會想到，甚至害怕想到的。所以戊戌的維新變法，不到百日就給西太后及其黨羽們打斷了。這裏不但證明了：滿清的君主專制官僚政府，已絕對不容許改造或改良；而且昭示了：離開群眾行動的上層改良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們，是最先懂得了滿清政府的無法改良（如孫中山曾一度上書李鴻章，請求政府自行改革，但得不到回響），才決心要推翻這個政府，掃除這個阻害民主改革的障礙物，建立民主共和國，以此來推動國家走上現代的道路。這一點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覺悟，是民主改革運動的一個大進步。但他們當時對於中國的民主任務，既遠未能了解，而對於憑藉何種群眾力量來解決這一任務，更是認識不清

所以他們提出的『民族主義』只限於『反滿』。殊不知這個以滿族爲代表的政府，早已同漢族的官僚們混爲一體，而變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工具了。因此，在當時阻害『民族主義』，即阻害中國實現民族自主和獨立的主要障礙物，已是國際帝國主義，是國際帝國主義多年來所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不僅僅是其代理工具的滿清了。而且滿清政府的實權又早已大部份落在漢族的官僚和軍閥手裏。如果只是單純提反滿，就無異在實際上放鬆了這班漢族的官僚軍閥（如袁世凱所代表的一群），表示可以同它們妥協。後來的結果正是如此。其次，關於土地問題，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雖已把它提出來了，其公式是『平均地權』。但怎樣才能將『地權』『平均』呢？換句話說，怎樣才能把地主的土地拿來均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呢？依照『平均地權』的方法，是由國家用款項從地主方面收買過來，然後再分配給農民。於是真正的問題又發生了：像如此大量的款項從何處獲得呢？當然是絕對無法獲得的。所以『平均地權』，對於農民不過是一個『畫餅』而已。往後的全部事實更都證明了這一點。復次，對於國內的弱小民族問題，辛亥革命也曾提出過。如『五族共和』的標語，就是一種表現。但它也僅限於提出這一問題。至於怎樣使這些弱小民族的下層廣大群眾改善其經濟生活，以此提高這些民族的文化水準，提高它們的政治地位，確定它們的民族自決權，却不曾具體說到。因此，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得到這些弱小民族的積極擁護，反而容易被反動勢力利用了去。最後，辛亥革命雖是一個群眾的行動（當然是偏於軍事方面），但這個群眾的主要成份，既不是城市在業的勞動者，也不是鄉村那個急需解決土地問題的真正農民群眾，而是那些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的『三合會』、『紅幫』、『青幫』及『新軍』中的士兵等。他們是流氓無產

者的一群，雖然因生活的窮困而具有某種反抗性，但他們是沒有固定的民主目標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腐化、被收買、被某些投機的份子利用的。一個民主的革命建築在此種群眾身上，不僅不會有好結果，且是最危險的。從辛亥革命中出來的軍事頭領們，差不多都利用他們的『革命軍』作工具，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新式軍閥，難道是偶然的嗎？

所以辛亥革命的結果，雖推翻了滿清政府，掛出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但伏在這個民國招牌後面的，仍然是傳統的官僚專制政治。與以前主要不同之點，就是：由多頭的軍閥代替了寡頭的皇帝，由軍閥的『分權割據』代替了君主的『統一集中』。至於對外的民族獨立問題和對內的土地問題，不但沒有提出議事日程加以任何討論和解決，而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却反而公開對外宣言承認滿清和列強所簽訂的一切條約（即不平等條約）為有效，並對內向地主聲明保護它們的產權哩！這裏告訴我們：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對於根本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民主任務問題，竟採取了如此的妥協態度！這就無異於暗示：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歷史任務，有待於另一個階級來擔負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上說來，是一個反帝國主義（日本）侵略和反官僚軍閥（安福縣）賣國的運動。但就它的全部歷史意義說，却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啓蒙運動。正因為是一個思想上的啓蒙運動，所以它沒有能從政治上提出民主任務的問題來，當然更談不到對這一任務的根本態度和行動了。而且『五四』運動從頭至尾沒有任何政黨從中指導和推進，這也就決定了這一運動的政治性之薄弱，決定了這一運動之偏重於思想解放的歷史意義了（關於這一方面，請參閱求真創刊號拙著『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一文）。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這是繼承辛亥革命而來的一個更進一步的**真正群眾**的大革命。而這個革命比之辛亥革命更進一步的主要特點，就是：(一)它將『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第一次明白而公開地提了出來，作為行動的號召。(二)這個革命的基本群眾，是城市的現代產業工人和鄉村的在業農民，而且其中工人佔了領導的地位。(三)在這個革命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的政黨——共產黨；並且這黨在運動中逐步地把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組織了起來，領導它們參加了一切經濟和政治的鬥爭。(四)這個革命與世界各國的革命群眾和組織第一次發生了直接的聯繫，取得了國際的援助（如各國工人對『五卅』罷工工人的募捐救濟以及蘇聯許多物質上的援助等），因而它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國際性的。因為具有以上幾種主要的進步特點，所以這個革命不僅僅是中國一個真正的大革命，而且可以說是全東方一個破天荒的最進步的大革命。

就這個革命之發動了最廣大的下層群眾來說，就它之具有現代最進步的政黨來說，就它之獲得了國際各方面的大量援助來說，它是應該走上完全的勝利，徹底解決中國的民主歷史任務問題，將我們整個民族推向一個新的根本改造的歷史時代的。然而結果，它終於是失敗了，而且比之辛亥革命的失敗還要更為可悲！

但這種可悲的後果，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這次革命，在政綱上雖然明確地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完成對外民族獨立的民主任務問題。但對於極關重要的土地問題，却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正確而具體的綱領來。所以當農民群眾運動達到高潮時，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便陷於徬徨、混亂和不知所措的窘境。而農民群眾本身，則經過相當時期的熱烈追求（土地）和堅苦奮鬥之

後，覺到仍然得不着土地時（由於領導者的自動阻止），便也逐漸陷於等待、疲倦和麻痺的狀態中。因此，當反革命獲得準備時間來向農民進攻時，它們更陷於驚慌失措，只得任聽敵人宰割了。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是代表革命群眾的政黨，由於年青和幼稚；缺乏本國鬥爭經驗的傳統；革命理論和政治水準的太低；對於西方革命運動，尤其是俄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全不了解；以及始終落在一種典型的外來的機會主義領導底下。將階級合作代替了階級鬥爭，將妥協談判代替了革命行動，以致不自覺地在思想上變成了階級敵人的俘虜，在政治上作了同一敵人癱瘓群眾的工具，因而在緊急關頭遭到昨日的同盟者掉轉槍來向它掃射時，就陷於倉皇失措，不是束手待斃，就只好臨陣脫逃了。於是革命的果實，就成了反革命祭壇上慶祝勝利的犧牲！一個最偉大的革命，竟如此悲慘而諷刺地結束了自己！所留下來的是一黨專政。在這個專政下，不平等條約依舊保存，『平均地權』依舊寫在紙上，勞苦群眾依舊任人壓搾，軍閥官僚照樣橫行，白色恐怖遍滿全國，……中國的歷史帶着遍體創傷，帶着一副較為新穎的專政面具，又倒退到老遠的過去了。

革命失敗了，中國新生的希望被打斷了，於是，整個的國家民族又重『陷於癱瘓，混亂和聽人擺佈的泥沼裏』。內部的軍閥混戰，農民暴動，接連不斷地發生。國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其自身陷於異常矛盾的日本帝國主義，也就乘機而起，冒險向中國進行前所未有的兇猛侵略，企圖吞併整個中國來解除其矛盾，這便迫使中國整個民族陷進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國難』時期。然而這正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邏輯後果。倘使這次革命獲得了完全的勝利，解決了民主的任務，踏上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實行了全般的政治經濟改造，使幾萬萬的人民獲得了自由發揮其創意力與活動力

，不但日本帝國主義絕對不敢向中國冒險，而且它的本身，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之下，在日本民衆響應中國革命而自尋出路之下，將自顧不暇，大有可能被送入墳墓呢！這樣，不但東方的面貌將大為改觀，就是整個的國際局勢也會受到決定的影響，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了。

如果從我們過去民主改革運動的全部歷史看來，差不多可以說，是一部不斷失敗的歷史。其根因就是我們的資產階級對於自身所需要的民主改革，始則幻想從上至下的改良，繼則採取畏縮妥協的態度，最後則完全走到相反的方面，而決心作了民主改革的敵人。這在西方經過整整的三個世紀，從英國、法國、德國到俄國所反映出來的經驗，而在我們這個落後國家裏，不到三十年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也就是現代落後國家的歷史，往往將先進國長期發展的歷史壓縮在短期內體現的『綜合律』或不平衡發展律的具體表現之一。這一規律充分證明：我們的民主歷史任務，只有依靠下層的工農群衆及一切被壓迫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獲得真正的徹底的解決，——這便是今後民主改革運動的指標。

怎樣實現民主

民主的歷史任務，即民主主義的真實內容，以及在客觀上妨害解決民主任務的障礙物，我們在前面不但已經具體地解釋過，而且還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上扼要地論證過了。現在擺在面前的問題，就是：究竟要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即要怎樣才能解決急待解決的民主任務問題。

民主的內容或任務，既是一種歷史進步的任務，是關係到全體人民大衆，尤其是工農大衆的切身利益的任務，那就只有依靠着人民大衆自己的真實力量才能得到解決。可是，

人民大眾又要怎樣才能從意識上覺悟和認識自己的力量，從組織上形成、集合、集中、並發揮自己的力量呢？這首先就必須爭取一般的基本的民主自由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及罷工的自由權等。

因為只有獲得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表示自己的願望、意志和要求；只有獲得集會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按照需要集合在一起來討論和研究有關於自身生活及一切社會國家的各種問題；只有獲得結社的自由，各種人民才能形成自己的組織（如各種產業或職業團體），集合自己的力量，組織或參加各自所需要的政治團體（政黨在內）；只有獲得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人民才能發表自己的根本主張，闡明自己的任何理想，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任何主義或宗教；只有獲得罷工的自由，工人及一切被僱用的職業者，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致任聽僱主們的剝削和壓迫而陷於饑餓與奴隸的地位。所以，爭取這些一般的民主自由權，乃是人民大眾培養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形成和加強自己的組織力量之絕對必須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人民大眾只是一盤散沙，絕難表現任何自覺的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力量的。正因此，凡是專制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一定首先要剝奪或限制人民的自由，以便輕易達到它們剝削和壓迫人民之目的。反之，凡是要想從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下掙脫出來的人們，也一定首先要爭取這些民主自由之實現。

但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爭取這些民主的自由權，並不完全限於向統治階級一方面。凡是在已經組織的民衆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職業團體、乃至各種政治集團內部，都必須爭取民主化。在任何群眾組織或政治團體內部，凡是其上層領袖不允許或限制下層群眾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要求，以及自由討論問題，自由批評領袖們的言論和行動的，

都是根本違反了民主的原則的。像這樣內部沒有民主自由的組織或團體，不過是一種『在野』的官僚機構，而那些『領袖們』也只是一些『在野的』或『候補的』官僚而已。但現在的許多群眾組織及政治集團，正是這種情形。然而這對於發展群眾的民主精神和組織能力，是異常之有害的；在事實上，這是阻礙真正民主運動的發展，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專政的統治階級而服務的。因此，在任何民衆團體內部爭取民主化，打倒官僚主義，打倒上層少數分子的把持操縱，也是在整個政治上爭取民主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但僅有民衆的意志和組織，還是不足以解決民主的任務及其他有關全國性的重大問題的。所以，必須有一個具有全國性的最高的政治機關，才能把全國各種民衆的意志和力量集合和集中起來。這便是現時人們所公認需要召集的『國民會議』。但這個國民會議必須由普選和不記名投票產生，並且必須具有解決一切有關國家重大問題的全權。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乃是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最集中的表現。

所謂『普選』，就是凡滿一定年齡的成年男女，都應毫無限制地具有選舉和被選舉權。而採用『不記名』投票，則為的是防止對於選舉人的任何干涉或操縱，以便自由行使其意志。所謂『全權』，就是國民會議具有全部權力得以討論，議決和公佈有關於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並選出行政機關來執行。如果行政機關違背決議案或執行不力時，國民會議得隨時重選或改組之。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大眾的意志、要求和利益，從上至下地實行民主改革，實行改變一黨專政的官僚制度，使整個國家民族走上現代的民主化。也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解決國共兩黨間的嚴重糾紛，使它們在全體人民大眾的意志和利益

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處置，以此解決其糾紛。

像現時當權政黨所已經決定召集的國民會議，其代表既完全由於圈定、指派或虛偽的選舉，那只能算是變相的一黨代表（？）會議，或一黨御用的會議，與人民大眾毫無關係。就是這個會議將來經過「協商」，讓「各黨各派」或「無黨無派」派出若干「代表」參加，那至多也只能算是當權黨與在野黨派的「代表會議」，與人民大眾普選的國民會議還是沒有共同之點。當然也就談不上真能代表人民大眾的意志和利益來解決當前各種重要的民主問題了。

至於普選的國民會議之能否召集成功，將以人民大眾能否行使一般的民主自由權（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信仰自由等）為條件。因為民衆只有在這種民主自由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選舉自己信任的代表。而候選人也只有在這同一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地向民衆發表自己的政見，宣傳自己的主張，並批評敵派的政見和主張，以此去爭取選民的信任。否則，國民會議的「選舉」一定是虛偽的，不是被當權政黨把持操縱，就是被各黨派的政客或野心家們賄買和玩弄的。我們已往的一切選舉及現時各種參議會的選舉，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教訓。所以，即是為了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也必得爭取一般的民主自由這一前提。

另一方面，國民會議必須以解決民主的歷史任務（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完成民族的真正自主，確定國內弱小民族自決權，制訂勞工保護法等）為中心目標，才能把整個民族國家從「停滯，混亂和矛盾的泥沼」裏拖出來，推上歷史進步的軌道，——這才是國民會議應有的歷史意義。如果國民會議不以解決民主任務為其中心職務，即令召開了，甚至是「普選」的（？），但一定是空洞的，不能起進步作用的。它只能提供各黨派的某些政客或野心家們一個活動的舞台，從

事拉攏勾結，或互相爭鬥，玩弄「議會把戲」，以遂其私圖而已。辛亥革命後某一時期內的所謂國會正是如此。因此，召集國民會議必須與解決民主任務密切地聯繫起來，才具有進步的意義。

至於將來中國究竟能否成功地召開一個真正普選的國民會議來解決民主的任務及其他的國家重大問題，這全靠人民大眾，尤其是在生產上起決定作用的工農大眾的覺醒和奮鬥程度來決定。我們這裏無須事先加以預斷。但就一般民衆（特別是農民）的利益說，就目前的客觀情勢說，儘速地召集一個普選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是十分迫切地需要的。假設這樣的國民會議能夠召集成功，將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大的進步。即使這樣的國民會議不能實現，但站在歷史的觀點上，在現時還是值得爲實現它而爭鬥的。因爲在爭取實現這樣的國民會議的進程中，民衆的覺悟會逐步生長起來，它們的政治經驗會逐步豐富起來，它們的組織會逐步發展起來，它們對各黨派政治面貌的認識會逐步清楚起來，最後它們對統治階級的了解會逐步深刻起來，——這是一個最好的「民衆政治學校」。民衆，尤其是工農群衆，經過這樣的「政治學校」訓練之後，縱或人們死死地要妨礙這種國民會議的實現，它們也就會自行尋找解決問題的另一道路了。也只有到那時，民衆才會有決心和勇氣採取超國民會議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民主歷史任務的。俄國所經過的歷史事實就是先例。

所以在目前，一切民衆都應該爲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而鬥爭，應該要求立刻召集普選的國民會議來解決急須解決的民主任務問題以及其他的重大問題（國共的糾紛問題在內）。凡是誠心要求民主，認真爭取民主的人們，都應該到民衆中去提醒它們，組織它們，號召它們起來向這一目標邁進！

我們未來歷史的進展，將以這一國民會議運動的進展來衡量。而我們的歷史要走上一個更高的超民主主義的新時代，也將藉着這一運動作橋樑！

回頭是岸*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五日)

李季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由求真雜誌編輯部將原稿轉寄給我，說這是李先生專門批駁我所寫的那篇《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載《求真雜誌》創刊號)，希望我能馬上作一回答，在《求真雜誌》第二期上同時發表。並限我於一定的時間內交卷，回答的字數也望不要過多(因為該誌第二期的篇幅已經預定)。在這種限定時間和字數的條件下，原擬不想接應的。但經過一位朋友的一番慫恿之後，也就只好勉強地接應了。

最初看到《行不得也哥哥》的標題，頗有點「莫明其妙」之感！待把李先生的全文閱讀一遍之後，才明白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論及老子和孔子所反映的階級關係時，曾大大地違反了李先生在「快二十年」前發表過關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的「主張」。因此，李先生心裏感到不大舒服，便唱起「行不得也哥哥」來了！既然如此，我就接着李先生擲下的「手套」來稍微周旋一下吧。

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裏，完全根據《老子》原書的全部內容，頗為詳細地論證了老子的根本思想，是「同情於農民的」，是「含有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成份」，即強烈地反映了廣大的農民階層對於當時的統治階級種種不滿的意識」。爲了確證這一見解起見，并將托爾斯泰的思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二期。

想來同老子的思想加以比較。最後，且將代表封建貴族階級的孔子的根本思想，同老子反對封建貴族的思想，加以對照。我認爲這已經夠清楚了（請讀者參閱《求真雜誌》創刊號）。但李先生的意見却與此完全相反。他認爲「老子是封建階級的代表，孔子是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表」，據他自己說，當他「寫胡適之哲學史大綱批判時，一一已經說明」了。可惜現在一時找不着李先生那部著作，我們無法知道他是怎樣「說明」的。（但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找着來一飽眼福！）不過就現在李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所表露的見解看來，不僅一點看不出他對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關係的「說明」，反而在那滿紙虛構，曲解和附會的煙霧中，令人愈加迷糊了。現在讓我將李先生的原文逐步來略加分析一下吧。

李先生首先從「老子」裏引出了「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幾句話以後，於是得意地作出結論說：「這是愚民政策最露骨的表現，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只要不故意曲解，誰也不能指這爲同情農民的證據」。可是，李先生這個結論作得太輕率了！這是「只見樹枝而不見樹林」的一種暴露。因爲這是將上面所引的幾句話從老子的全部思想割裂開來，并使之完全孤立起來所下的一種謬誤判斷。

只要稍微認真研究過《老子》一書的人，就應當知道：老子的全部思想，從他的哲學到他的社會思想或人生觀，都是建立在根本反對當時的全部文化（即封建制度的文化），而主張回返於「自然」（所謂歸於朴）和「無爲」的狀態之上。但要回返於「自然」，「無爲」，便必須從根本上消滅引起「違反自然」和「有爲」的一切智識。所以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因爲他認定「智慧出，有大僞」（古字「僞」與「爲」同）。「有大僞」，就不「自然」了，就要

弊害百出了。而且「智」是一切「欲」的根源，「欲」又是一切「不知足」的根源。「不知足」，一切禍亂和罪咎就因之發生了（「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如果懂得了老子這一系統的根本思想，則李先生前面所引的一段話，就絕不致於誤解是單純「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一種「愚民政策」了。（只有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真正站在封建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愚民政策哩）。

因為老子所主張的「愚」，絕不限於「民」，就是「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的（所謂「絕聖棄智」）。而老子自己就以「愚人」自命。例如他說：「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而我頑似鄙。」這還不夠證明老子所主張的「愚」，是指的一切人都應該「愚」嗎？而且李先生上面所引老子的一段文句，還是割裂過了的。其全文是：「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這顯然不是表示單要「愚民」，即治者本身亦應當「絕聖棄智」，應當「自愚」的。否則，就成爲「國之賊」了。李先生爲了辯護自己的成見，竟不惜「斷章取義」來誣衊老子！然而這種「斷章取義」的把戲，還有呢！請看下去吧！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李先生引出了這幾句後，接着便援引蘇轍對這一段的「解釋道」：「民安於政，故樂生長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因而李先生由此「證明」（？）「這又是替統治階級打算盤的說法。」但可惜李先生在這裏玩弄「斷章取義」的把戲玩得太露骨和太不高明了！讓我們將全文抄出來給大家看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這全段文句的意思，只要對古文學稍具根底的人都能看得明白。這意思就是說，用死刑恐嚇人民，是沒有用處的。而且「殺人」自有「天道」（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代替「天道」來殺人的人，自己也一定要受到傷害的。老子在這裏顯然是表示根本反對用死刑來處罰作壞事的人。這正是天真的好心腸的表同情於人民的觀點。然而我們的李先生却完全不顧前後文義，即從腰間硬斬一段下來，并借用主張嚴刑酷罰的蘇轍的曲解來武裝自己，來替自己的荒謬主張辯護。這種對於原文如此不忠實的態度，對於素常堅持採取科學態度以研究歷史的李先生，未免有點過於諷刺了！

李先生又引證「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的幾句話，認為是「替統治階級打算」，是「小罵大幫忙」，「是老子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秘訣」。從《老子》中數出它提到多少次的天子、一一王公、侯王、一一聖人及君子等，便證明這是「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以永久維持統治地位的術法」。從「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句話中，便看出了這「是不要去騷擾老百姓，讓他們安安靜靜地替你們做奴隸吧」等等。李先生在這些地方，真不愧為「別具隻眼」，對老子極盡了「深文周納」之能事！但不幸的是：李先生在這些「深文周納」的「裁判」中，却連最簡單的解釋，最普通的形式邏輯，也不顧及了。例如，李先生在數出老子「遺文」中載有多少天子、侯王、聖人等等之後，毫不加以解釋，即斷定這是「他從四方八面去教育統治者……」。難道一提到統治的頭銜，就是為的「教育統治者」嗎？其實，老子所提出的「天子」，「侯王」、聖人及君子等，全是抽象的，擬想的，理想化的。（《老子》書中從未具體提過任何統

治者或朝代的名字)他的根本目的是在於以這種抽象的、擬想的、理想化的天子、侯王、及聖人等，去對抗當時實際上嗜戰好殺，貪婪腐化及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一切統治者，并以此作模範去批評它們，暴露它們，攻擊它們，否定它們，甚至希望真有這樣的理想人物去代替它們。毋須說，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幻想的。但以此『作模範』去批評、暴露、攻擊和否定當時實際上的統治者們，却是含有實際的社會政治意義的。這正是農民的樸素觀點。因為當農民們對現實的統治者，當前的國王感到不滿而不能忍受時，往往希望有一個『真命天子』出來搭救它們，——這差不多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中外歷史的一般規律了。然而自命深通歷史唯物論的李先生，却對此也不願加以理解，似乎也是大可惋惜的！

至於李先生一口咬定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這就更加莫明其妙了！我真不知道李先生指定老子的『小國寡民』『是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最合於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究竟何所據而云然？『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我們是知道一點的，那就是；嚴格的等級制，專橫的教會制，封建諸侯間不斷的鬥爭，無情地壓榨農奴或農民，……這與我們春秋時代的封建社會是大同小異的（主要的不同點，僅是春秋時代沒有專橫的教會制），然而這些正是老子所極端反對的。如果照李先生的說法，則老子簡直是以同一的『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去反對『理想的典型的封建制度』了！其實，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與『歐洲封建社會所謂「天高皇帝遠」的情狀』，毫無共同之點。因為在『小國寡民』的簡短描寫中，不僅毫未提到等級，沒

有戰爭（因為「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甚至不用「什伯之器」，不用「舟車」，不用文字，並且各個「小國」間還是各自完全孤立的（「老死不相往來」）。像這樣的「小國寡民」，除了用理想化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來解釋外，實在找不出別的比擬。至於老子在這裏也「滿口小國、鄰國」，那只是因為他在那時還找不出別的實當名詞或術語來表達他的理想社會（因為那時還沒有發明「烏托邦」，「新村」或甚麼主義的社會呢），所以權且借用「國」來形容它。而且從用「小」和「寡」來形容「國」與「民」看來，顯然已證明老子是有意識地將他的理想社會與當時的封建國家加以區別的。但我們的李先生抓住了老子的一個「國」字，便硬說「他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這已是過於「唯名主義」了！還有更機械的是：「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那末，我試問：何以貴族出身而又做過沙皇軍官的托爾斯泰，也企圖「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去呢？（其實，在古代東方社會裏，這種情形是頗為普遍的）至於李先生說老子主張「不用文字，是貫徹他的愚民政策，為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先聲，而且在兩者之間也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以及「如果真要把他（老子）和外國人對比的話，那畢士馬克最為適當。不獨畢氏晚年所施行的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相當保障工人的生活，並且宣言「我亦國民」，這比老子更像同情於民衆。……」這種奇異的「對比」，可謂極盡「不倫不類」之能事！我因為篇幅所限，在這裏無法予以駁斥，只好暫時向之打聲「哈哈！」吧了。

此外，李先生提到老子《道德經》中的「一元論與辯證思想」時算是「慷慨地承認」了「也許還有一點影子」。但果真只是「有一點影子」嗎？（姑且丟開「也許」）在《道

《德經》中，「道」、「一」或「無」，像一根金線一樣貫串了老子的全部思想或章節，而辯證思想或矛盾邏輯，則又有如「經緯」，差不多交織在全部思想的各個部份之中。假如不是帶的特殊的玄學眼鏡，一定不會看不見的。而李先生却只能從「也許」中猜出「一點影子」。光從這一點看來，李先生對老子思想的認識程度，也就夠我們玩味了！

× × ×

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中，比較老子與孔子的思想時，曾說過：「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這雖然說得很簡單，但確是我根據有關於孔子思想的全部材料研究出來的總結論，本是無可否認的。而李先生却認為「這和事實相去太遠。」我們且就李先生所舉出來的「事實」來略予檢討吧。

李先生說：「封建貴族的特權，無過於世襲，一切大權都由貴族包辦，他人不得染指。但孔子恰恰反對這一點。春秋譏世卿是一證」。所謂「春秋譏世卿」，這一句話究竟是否可靠，及有何種根據？李先生絲毫不加以考察，便貿貿然用以「證明」孔子「反對」「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實際上，孔子不但不會反對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而且相反地，他是更有「理論地」，更有「系統地」在維護這一特權。孔子的「正名」主義及「禮」治主義，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不過在孔子看來，世襲特權是與等級制度或「名分」制度緊相聯繫着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這一「名分」制度之具體表現。所謂「春秋」的「微言大義」，亦正在於此。所以孟子說：「世微道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他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即莊子也承認「春秋以道名分」（見《天下篇》）。因為只有等級嚴，名分定，封建制度才能穩固，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也才能有「合理」（即所謂「禮」）的保證而不致受人侵犯。正因此，凡是亂「名」越「禮」的，孔子都加以嚴厲的譴責。例如：「孔子謂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這還不足以證明孔子會嚴密維護着封建的整個制度，保護着封建貴族的特權嗎？

其次，李先生引出「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方六七十，……求也爲之」，「宗廟同會，……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等等後，說「這是平民出身的子路，冉求，公西華要做卿相而爲孔子所首肯，又是一證」。此外，李先生又引「雍也可使南面」，認爲「竟要「犁牛之子」的冉仲弓做起國王來」。最後，引南宮适與孔子談話的故事後，則根據朱熹的註「解釋」，而遂斷定「「吾公也賤」的孔二先生竟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爲」。其總結論是：孔子「要革貴族的命」。如是孔子竟成爲封建貴族社會的革命家了！新奇的思想，偉大的發明！果真如此，我試問李先生：孔子的「正名」是甚麼意思？孔子所謂的「禮」，含有甚麼意義？孔子「作春秋」，爲了甚麼？孔子之譴責「八佾舞於庭」和「三家者以雍徹」等，其含意何在？孔子說「吾從周」，始終尊崇周天子，又是甚麼用意？孔子說：「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作何解釋？……李先生即令精於詭辯，恐怕也無法解答他所提出的上敘那些意見與這些問題之間的矛盾吧？但實際上，李先生是上了他自己的當。他把孔子平日與其生徒們閑談時，隨便稱讚他們當中誰有「能力」可以作甚麼官，甚或可以作皇帝（？）的閑話，也像煞有介事地引了來，「證明」孔子是想鼓動「平民」起來推倒封建貴族階級了！最

妙而又滑稽的是：李先生竟相信朱熹對於南宮适同孔子談話的那一種歪曲的「解釋」，竟然認定孔子是「想登九五之尊，帝制自爲」！李先生斷定孔子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關係，不從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上及他生平的行動上，反而從孔子平日與其生徒們的閑談中，乃至從朱熹的曲解中，這不僅是「不見樹林」，即連「樹枝」也弄錯了。

如果我們從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來看，即從他「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誇說仁的理想」來看；再從孔子在行動上之「一車兩馬，周遊列國」，勸說諸侯，重定名分（如對齊景公），等等來看；除了我所指出的「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以外，是無法正確地解釋孔子的思想和行動的。

× × × ×

爲了更簡明一點了解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關係起見，我最後再把他們雙方的基本思想，行動及其對於後世的影響來對照一下：

一、在哲學上，老子是一元論者（唯心的）和辯證法家（消極的）；而孔子則是庸俗的經驗論者，折衷主義者。

二、在政治上，老子是站在「自然無爲」的立場上攻擊當時一切封建統治者的胡作亂爲，如根本反對戰爭，反對封建的倫理（如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去。而孔子則站在改良主義的觀點上，批評當時封建制度的敗壞，希圖加以挽救，因而主張嚴定名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提倡忠孝，恢復封建的倫理，企圖以此將當時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回復到西周初期的封建制度形態上去（如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指西周）。

三、行動上，老子因爲完全不滿於當時封建制度的一切現狀，除兩度任職守藏室史及柱下史的閑官之外，終生過着隱遁生活，專從事著作以攻擊當時的一切社會現象。而孔子則『一車兩馬，周遊列國』（據說在外十三年），企圖實行改良當時的封建政治，并曾爲魯之司寇。迄至『道不行』，才轉而從事著作，教育門徒，藉此宣傳他封建改良主義的大道。

四、從對於後世的影響說，信奉老子之道（所謂道教）者，多爲下層平民，尤以農民爲甚。中國自東漢末千餘年來許多次的大小農民暴動，多以道教爲其思想上之旗幟（不僅東漢末張角之『太平道』，『五斗米道』，純粹信奉老子。即後來元末之白蓮教，清末義和團之八卦教等，亦多以道教爲中心）。但崇奉孔子者，則多爲上層階級，尤其是君主（漢武帝後）及官僚貴族（所謂士大夫）。他們甚至把孔子尊爲『大成至聖』，『萬世師表』，而以他的思想爲『天經地義』。至於農民對於孔子平常是冷淡的，到了他們進行暴動時期則多半是根本反對他的（例如太平暴動中，農民常將孔子廟焚燬）。

這裏所舉關於老、孔的幾點『對照』，自然是十分簡單的，解釋得極不充分的。但至少可以證明李季先生對於老、孔所代表的階級的『主張』是和歷史事實完全違背，是虛構的，曲解的，附會的。這當中的根本原因，是李先生在方法上已從辯證的唯物論跌進到了經院哲學的懷裏，再加上一種特有的成見，以致看了我的《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後，還認爲『沒有修改』他『快二十年前』所發表的主張『的必要』。這就證明李先生是走得太遠了！但我還是向李先生打招呼：『回頭是岸』！

論官僚制度*

(一九四六年六月)

在近來要求民主和反對專政的運動中，人們又開始特別注意到我們的「官僚制度」這一問題上來了。例如最近馬寅初教授就特別提出了「官僚資本」作為攻擊的目標，且獲得了社會某些方面相當廣泛的響應。至於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官僚把持操縱的呼聲，則早已普遍到了全國。但我們的官吏何以特別貪污，我們的官僚何以特別敢於把持操縱，甚至壟斷了國家一切重要的經濟機關呢？這却很少看到對此有過較為明確的解釋。換句話說，人們雖然痛恨貪官污吏，痛恨官僚們的把持操縱，但對於我們中國這種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BUREAUCRACY）的社會根源及其與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却很少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對於怎樣消除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也就得不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來。正因此，人們攻擊官僚或官吏時便常限於枝枝節節，而所提出的救濟方案，當然也就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

我們為了正確地推進民主改革的運動向前發展，有效地反對軍事專政及其官僚們的貪污壟斷，現在把官僚制度來重新作一番科學的探討，或者不算是多餘的吧！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從歐洲歷史上的官僚制度說起

凡是一種制度，如果形成了一種力量，不管好壞，便都有其客觀的歷史原因。官僚制度當然也不能例外。官僚制度就其表現說來，乃是政治上的一種病態，有時候簡直是社會政治上的一個贅疣，一個癌。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這種官僚制度是無法避免的。同樣的理由，在另一歷史條件和另一政治制度底下，官僚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了。

如果以歐洲歷史來說，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是和君主的專制主義或專制政治同時發生的。更確切點說，官僚制度乃是君主專制政治的派生物或附產品。在古代希臘的奴隸社會裏，我們不會看到官僚制度的出現。但在古代羅馬的「共和國」（奴隸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國）滅亡及凱撒的君主專制政治成立之後，官僚制度便踏上歷史舞台了。

在羅馬凱撒的絕對專制的統治底下，從中央到各省各州各縣，乃至各殖民地，都有各種各式的官吏。那些官吏們，從上至下地一級一級地管轄下去；從相反一方面來說，那些官吏們，又是從下至上地一級一級地服從上面，一直到凱撒為止。這整個的官僚機構，有如一個金字塔，底層是奴隸、佃奴及一般平民（如手工業者及小商人等），塔身是各級官僚，而站在塔頂上的便是凱撒。不但凱撒對於全部官吏具有絕對的權力，就是一個上級官對於下級官也往往有着絕對的指揮權。至於每一個地方官之對於奴隸、佃奴及一般平民們，那更是一個凱撒的縮影了。

構成這個官僚機構的階級成分，乃是奴隸主及一部分商人和高利貸者。奴隸主的貴族們大概是擔任行政上和軍事上的職務，而商人及高利貸者們則多半擔任財務官及收稅吏。

這種官僚制度，在凱撒的絕對專制所統治的龐大帝國內是必類的。因為沒有這種制度，沒有各級的官吏為其工具，凱撒是絕對無法統治那樣龐大的帝國領土的。但這種官僚制度一經形成之後，它也就依照自己的特有邏輯發展。而這種「特有邏輯」的主要趨勢是：官僚制度原來雖是為專制君主便於統治下層人民而建立，但它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却往往自趨於「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使得君主專制政治日趨癱瘓，並引起下層群眾的憤恨和反抗。結果常常是專制君主的統治，不是在下層群眾的反抗之下趨於解體，就是在外來勢力的侵襲之下被毀滅。而凱撒的羅馬帝國則是在內外這兩種勢力的夾攻下垮台的。凱撒的羅馬帝國瓦解了（自然，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羅馬的奴隸經濟已走到了絕路），於是它的派生物——官僚制度也就跟着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度下，官僚制度是無法形成的。因為這種制度的特性是各個地方的諸侯或地主貴族們各自分立和分治，中間不容許有各種各式的官吏的存在。但當中世紀的末期，商業資本獲得較高的發展而要求對內統一國內市場，對外擴大商業殖民地時，一種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政治又應運而生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英吉利，以及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便是這一時代最為典型的君主專制政治的國家。

在這種君主專制政治的制度下，久已消逝的羅馬帝國的官僚制度又跟着重現於政治舞台了。固然，這種官僚制度比之凱撒治下的官僚制度有不少特異之點。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基礎大大不同。前者的基礎是奴隸經濟，而後者的基礎則已是前資本主義期的商業經濟了。因而牠的階級之構成也就大有區別。這種新興的官僚制度的構成分子，已非奴隸領主和羅馬式的商人高利貸者，

而是一種從封建制度脫化出來的地主貴族和開始從事原始資本積累的商業資產者了。但新興的官僚制度的經濟基礎及其階級成分雖然如此不同，然而這一制度本身的結構（金字塔式的結構），及其對於幫助君主專制統治的作用，和對於壓制下層群眾的方式，在基本點上還是與古羅馬的官僚制度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官僚制度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也就「自趨於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變成了社會發展的贅疣，「引起了下層群眾的憤恨和反抗」，最後也就跟着君主專制政治的場合而被結束了。英國十七世紀的兩次革命，以及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就是結束此種官僚制度的範例。

代替君主專制政治而起的是現代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當這一民主制度還在往前開展，換句話說，當資產階級還依着它的朝氣向歷史的山峰上爬，還有勇氣運用自己的民主制度時，它確曾摒棄了官僚制度或官僚主義。十九世紀中葉左右的英國和美國便是這樣。但當這個階級開始趨於衰老，而又感到下層群眾（特別是工人）的某種威脅時，它又逐漸地從歷史的陳列所裏把古舊的官僚制度搬出來作為自己統治的輔助工具了。例如英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資產階級便在它的行政機構中以「保障事務官地位」的名義，將它自己的官僚制度逐漸地建立了起來。固然，資產階級這種官僚制度，在它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放棄時，與君主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是大有區別的。主要的區別就是：決定並擔任國家重要政治的「政務官」（如內閣閣員及各省市的省長和市長等），都是根據選舉的方法產生並定期更換的。在這種情形下的官僚制度，當然不會獲得充分的發展。但當資產階級完全放棄了民主制度而轉向極權政制時，官僚制度便又以更兇橫的面貌表現出來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專政，同時也就是資產

階級的官僚制度之登峰造極的表現。此種法西斯專政下的官僚制度，比起古代君主專政下的官僚制度來，固然含有許多特異之點，但就它的兇殘橫暴方面說，不僅和以往的官僚制度相同，而且是一切官僚制度中之最兇橫的。

從前面簡略的歷史敘述看來，官僚制度明顯地是寡頭君主或「領袖」專政的必然產物。它的政治作用，則是君主或「領袖」代表少數上層階級（如奴隸主、商人高利貸者、地主貴族或金融資本家等）的特殊利益用以壓榨人民大眾的一種機構或工具。這制度，由於它本身所導演的政治作用的特性，往往與貪婪橫暴和腐化無能乃至愚蠢無知，是聯繫在一起的。要根本消除這種制度，首先就必須消除任何形式的「寡頭專政」，其次則必須以人民大眾的真正民主制度去代替它，否則，即令一種官僚制度打倒了，另一種官僚制度又要跟着產生出來。這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尤其表現得明顯。

中國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變

歐洲的官僚制度既是發生於凱撒的羅馬帝國，則我國的官僚制度便顯然是起源於秦始皇所建立的統一集權的帝國中。

也許有人會說，西周也是一個集權的國家，在那時應當已有官僚制度了。但實際上，西周時代的「中央集權」（指初期），僅是一種軍事部落國家的中央集權，有如歐洲古羅馬滅亡後查理曼大帝時代的「中央集權」一樣，不過是替封建制度奠定基礎的一種工具而已。只有到了秦始皇消滅六國，破除封建制度，建立統一集權的君主專制帝國時，官僚制度在客觀上才有產生之必要與可能。

因為秦始皇既消滅了封建諸侯的割據和分治，剷除了封建貴

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把全國領土劃分為許多郡縣而統一於中央君主專制政府，這樣，從中央到各郡縣、各地方，便需要有大批的官吏，以便從上至下地來統治人民了。而這大批官吏也就從上至下地形成了整個的系統，變成了專制君主壓制人民大眾的機構，由此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舞台。

但秦代所建立的官僚制度，同它的君主專制政治本身一樣，還不會達到充分發展其機能的時候，便被一個兇猛的農民暴動所摧毀了。

從農民暴動高潮中湧現出來的西漢帝國，起初曾企圖在君主專政的集權制和地方封建的分治制之間從事調和（如劉邦一方襲）秦制建立中央的集權政府，一方又分封親族子弟及功臣於各地方，但結果釀成了「七國之亂」，封建的分治只得完全讓位於君主專制的集權政治，因而官僚制度也就得以逐步地發展下來。

從秦以後直至清代二千餘年的歷史，中間雖變換了許多「朝代」，但自政治的本質上說來，從沒有脫離過君主專制政治的軌道，因而我們的官僚制度也就有如影不離形地隨着君主專制政治的發展而積累起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機構，好像一副愈來愈重的枷鎖永久地套在人民大眾肩上。雖然中間會發生過幾次偉大的農民暴動，幾度摧毀過這一副枷鎖，但暴動的農民永遠提不出一個新的政制來代替它，所以結果總是在舊的官僚制度跟着舊的朝代被破壞之後，新的官僚制度又跟着新的朝代被恢復起來。而且這種官僚制度，每經過一次破壞和恢復之後，它的本身也就更增加了一次「經驗」，更加「嚴密化」，更加「發展」和「提高」了。到了滿清時代，這種君主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可謂已達到了它的頂點。所以當滿清末年西方人與這種官僚制下的 MANDARIN 接觸時，莫不表示驚異，「嘆為觀止」！由此，MANDA

RIN 竟成了一個代表中國官僚或官人的極大諷刺意義的代名詞。

就這種官僚制度的階級成分說，差不多都是地主和商人及高利貸者。雖然，下層平民中當有不少的分子（所謂「士」）不斷地爬進這一官僚機構中，充實了這一機構。但這一機構的階級性並不因為平民分子的加入而有所改變，至多不過是替這種機械灌輸了一些「新的血液」，得以更有力地「更靈活地」壓抑人民大眾而已。並且「平民分子」一經加入官僚隊伍中，立刻也就官僚化，以「陞官發財」為目的，而逐漸地變成為土地所有主或兼營商業和高利貸了。中國歷代專制君主之從下層平民中吸收一些官吏，可以說是一種頗為巧妙的策略（在古代羅馬的凱撒統治下，甚至從奴隸層中引拔了一些奴隸參加它的政治），這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容許某些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之參加政治，含有頗相類似的政治作用呢。

至於中國官僚制度的一般性質，當然與歐洲的官僚制度大體相同。但由於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之亞洲式的（即特別野蠻和橫暴的）特點，便賦予了我們的官僚制度以一種亞洲式的特性；同時又因為這種制度在兩千餘年來連續不斷地存在和發展（像歐洲古代羅馬的官僚制度便中斷了千餘年，到十六、七世紀才又復現出來），也就更具有一種特殊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了。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官僚制度比起歐洲的來要「進步」得多。這就是說，中國的官僚們，比起歐洲的來要更為「貪婪橫暴」，更為「腐敗無能」和「愚蠢無知」得多。

如果我們要把中國以往的官僚制度的一般特性和全部面貌描繪出來，簡直須要寫一部大書。因此在這兒，我們只能將它的幾個要點略加敘述罷了：

(一)凡是官僚，差不多都是爲了「陞官發財」，而所謂「陞官」，最後說來還是爲了「發財」。因爲官陞得愈高，發財的機會就愈多，財也就發得愈大。作官既然是爲了發財，於是自然而然地要盡量貪婪、盡量納賄、盡量進行搜刮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都充滿了貪官污吏，雖間有所謂清官者出，則往往被人們當作神話來傳奇。把「清官」當作「傳奇」，這就足夠證明中國官僚之貪污是達到如何普遍化的程度了！

(二)作官的既然是渴望上陞，或者希圖保持其固有職位，於是下級對於上司，便不得不表示「維恭維謹」。而且爲了博取上司的青睞或眷寵，更只有趨承奉侍，進賄輸財，卑躬屈節，甚至奴顏婢膝，吮癰舐毒，亦無所不爲。反之，上級對於下級，則往往虛驕橫暴（所謂「擺官架，打官腔」），藉端索賄，乃至任意排斥異己，任用私人。這樣，「奴性與驕橫」便成了官僚層的特殊習性。「天生聖明，臣罪當誅」乃是官僚「奴性」之最高表現。而「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以及「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則是官僚「驕傲」之確切寫真。至於同級的官僚之間，不是互相勾結，朋比爲奸，所謂「官官相衛」，就是互相嫉妬，互相排斥，甚或互相傾陷。

(三)凡是貪污，必然帶來「腐敗」，而「無能」又往往是腐敗的必然後果。至於諂上的奴性與驕下的橫暴，更是促成腐化與無能之另一重要原因。因此，官僚們在其職務上只會「等因奉此」，遇事敷衍。即有所謂「能吏」，由於上級多方牽制，下級陽奉陰違，也很難有所建樹。所以畏首畏尾，因循苟且，「泄泄沓沓」，便成了官僚們的一般作風。

固然，當着所謂有能爲的或「賢明」的君主在位時，也往往注意到了他的臣下官僚們的種種積習，以所謂明賞罰，獎賢能，

懲貪污等手段來救治它們，甚至設置御史官來檢舉它們。但官僚制度有它自己的邏輯，一經形成之後，就是所謂「賢明」的君主也無法改變它的特性（即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至多只能對它加以某種限制而已。因為任何所謂賢明的君主，都絕不能離開他的官僚機構來直接統治人民，這正如獵者不能離開獵狗來打獵一樣。所以結果，他總得遷就這一機構及其生成的特性。何況所謂賢明的君主，在君主專政的制度之下是絕無僅有的呢。所以，官僚制度下官僚們的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乃是君主專制的政制下之一種無法避免的產物。這已成了歷史的定律。要想避免這一「規律」，制止官吏的種種惡習，則只有採用另一制度，即採用徹底的民主制度來代替官僚制度，才有可能。然而這首先就要摧毀君主的專制政治。我們的辛亥革命，在客觀上是含有這一歷史傾向的。

現時官僚制度的新發展

但異常不幸，我們的辛亥革命只是推倒了滿清的君主，而這一君主治下的官僚制度不但原封不變地承襲了下來，而且在它上面更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把它推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了。這主要的原因是：代替滿清君主專制政治的，雖然名義上是民主共和國，而實際上，起初則是袁世凱的軍事專政，繼袁氏而來的是各系軍閥的軍事專政，最後則成了一黨的軍事專政。無須說，在這些專政底下，是絕對少不了官僚制度這一傳統的工具的。固然，現時的官僚制度，在其階級的成分上已有了大大的轉換。就是說，這一官僚制度的階級基礎已經不單是那些古老的地主和商人高利貸者，而主要是站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上的買辦、銀行家乃至工業巨頭了。然而這種階級基礎的轉換，並不會使我們的官僚

制度改變其原來的傳統特性，相反地，却使它的傳統特性發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奇觀！現在先讓我們把現時官僚制度的幾個要點來簡略分析一下吧：

官僚的買辦化。因為我們的國際地位是半殖民地性的，且這種地位已存在了將近一世紀之久，因而我們的買辦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階層。這個階層從政治上反映出來，首先就是官僚的買辦化。從著名的李鴻章，梁士詒，——直到現在的某些大員，都要依靠這派或那派帝國主義，以鞏固並提高其在國內政治上的地位，藉以謀取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某些特殊權益，——如政治借款的佣金，藉外債以把持國家的財政機關、交通機關、乃至某些工業部門等等。這種買辦化的官僚們，他們的利益不用說是與國家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他們不但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者，而且經常是此等條約的促成者。正因此，他們不但從不敢提起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反而是不斷地將新的權益送交外人。一直到此刻，我們的官僚們還沒有改變此種傳統的作風。例如：我們的關稅雖然已被宣佈自主了，但我們的官僚們却不敢自行訂定保護民族工業及一般國民經濟的關稅稅則。因此在關稅上仍然是任聽外人的操縱，致使外貨有如潮水一般地湧進來，迫著原來早已陷入困境的一點工業基礎迅速地在破產了。更可笑的是：甚至連海關總稅務司及江海關稅務司也要恭請「客卿」(李度及白禮查)來主持哩！又如：內河的外輪航行權，也是被宣佈取消了的。可是最近又自請外輪來恢復內河航行權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足證我們的官僚們的買辦性或帝國主義的代辦性，是根深蒂固的。現時我們的官僚們之對於某一帝國主義，簡直有如以前的官僚們之對待專制君主或「太上皇」一樣，大有「唯命是從」之概！正因此，帝國主義也就成了我們的官僚們之最有力量的靠

山。

官僚操縱金融和工商業。我們的官僚們，從清末以來即已把持了國家銀行及「官商合辦」的銀行和企業。到了一黨專政下，此種情勢更獲得了驚人的發展。不但國家銀行及一切「官商合辦」之銀行和企業，全為新舊官僚所把持，而且它們運用其特權和財力，將許多民營銀行和企業的「指導權」也逐步地奪取過去了。所謂「四大行」和「四小行」，簡直支配了全國整個的金融界。戰後，官僚們利用「處置敵產」的名義，把日帝在華的大部份產業組織起來（如中紡公司及中蠶公司等），完全放在它們的任意支配之下，儼然成了一種特殊的私產。此外，官僚們並組織了××××××××等大公司，企圖壟斷對外貿易。這樣一來，官僚們便形成了一個奇形怪狀的經濟集團，利用行政上的一切權利，利用國家的交通工具，並自訂稅率，自訂貨價，把持操縱，壟斷居奇，為所欲為了！這便是現時「人所側目」的、馬寅初教授所一再指責的「官僚資本」的輪廓和動態。此種官僚資本，不但在我們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現代的國際間也是一個僅有的可怕怪物。它現時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如果任聽其發展下去，它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富，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吮盡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國民經濟生活於離奇古怪和萬劫不復的深淵！

官僚與軍閥的結合。在以前軍閥（如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及吳佩孚等）統治時代，官僚們往往是軍閥的輔助工具，隨意支配，任其所為。但在一黨專政下，情形是逐漸改變了。各地的下級官僚們雖然仍舊是充當軍閥壓榨民衆的輔助工具，而高級的官僚們却已越來越居於地方軍閥之上，成了軍閥們在政治上或財政上的靠山，或工商業經濟上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官僚們亦常常利

用地方軍閥的武力，從事種種政治上及經濟上的非法活動。於是，官僚與軍閥便結合在一起，而構成爲「一人之下」與「萬人之上」的一副壓搾機了。

此外，我們的官僚們更在城鄉培植了一種「底層勢力」。那就是：它們在城市不惜利用流氓，拉攏「老頭子」，以爲營私舞弊之工具；在鄉村勾結土豪劣紳，以爲敲詐和剝削鄉民之爪牙。近來並以保甲制爲其機構，將上敘的兩種「底層勢力」有系統地團結起來，合法化起來，由此，我們的官僚們更加「深入民間」，得以「無孔不入」，「無爲不遂」了！至於黨的名義，更不用說，是我們官僚們的盾牌或保鏢哩。

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既具有如上所敘的許多要點，於是我們的官僚們的「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也就進到了「冠絕古今」，「蔚爲奇觀」！至於事實呢，且不要追溯已往，只須將戰後半年餘來各種報章雜誌對於官僚們所已暴露出來的奇形怪狀略加注意，就夠你驚魂動魄了！

單以各地所謂「接收敵僞產業」的官員們之所作所爲來看，其「貪婪橫暴」與「腐敗無能」，就已經使你搜盡字彙也無法形容。封洋房，搶汽車，劫物資，索金條，……花天酒地，狂嫖爛賭，……；至於工作呢，那就是把工場關閉，讓機器腐蝕，讓剩下的物資霉爛，……真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即以最近上海發生的「糧貸」舞弊一案來說，也就足夠象徵我們現時的官僚們之貪婪橫暴達到了何等駭人的程度！堂堂「糧食部」的官員，以「解決糧荒，救濟民食」爲名，貸款近十萬萬元，結果是勾結奸商，製造糧荒，劇抬糧價，藉以肥己！在「國際觀瞻所在」的「上海大都市」，「堂堂糧官」尚「擅敢舞此大弊」（十九日大公報語），則在其他的方面，我們的官僚們之

「胆大包天」(見同上)，營私舞弊，也就可推想而知了。因此，素以「溫和持重」著稱的「大公報」也不得不對此表示：

「說來傷心。近年官吏貪污已成了風尚，檢舉一案，又一案發生，官官相護，被包蔽起來的大小貪污案子，更僕難數。政府也好像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遇有貪污案件被揭發，不得已辦幾個倒霉的僚屬了事，高高在上的巨惡大慙，恒得逍遙法外。」(該報六月十九日社評)

「官吏貪污已成了風尚」，這就差不多等於說：「有官皆貪，無吏不污」了。大公報記者認為這是由於「政府也好像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所致。但「政府」何以「沒有整肅官箴的決心」呢？難道「政府」不是由「官吏」構成的嗎？所謂「高高在上的巨惡大慙」，不正是「政府」中的大員嗎？其實，這種貪污普遍化和極端化的情形，正是一種極權政制下的官僚制度發展之邏輯的後果。因為我們現時的極權政制是亞洲式的，所以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也就具有充分的亞洲式的特點。

總結起來說，我們現時的官僚制度已經達到了頂點，它差不多已吞沒了整個的國家，壟斷了一切，作盡了一切，它不但成了社會的贅疣，而且簡直是一個癌。假使這種官僚制度不加以徹底的消除，那我們這個民族便只有步古羅馬滅亡的後塵！

怎樣才能清除官僚制度

我們的官僚制度既已成了一個「癌」，但究竟要怎樣才能消除它呢？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徹底解決這種制度所由產生的基本條件——專制政治。我們必得重複說一句，在任何寡頭的專政底下，官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極腐惡的專政下，也就常常產生極腐惡的官僚制度，這有如「影之隨形」，簡直成了

一種歷史的定律。所以要徹底清除我們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須徹底廢除當前的寡頭專政或一黨專政，而以最徹底的民主政制來代替它。此外的一切辦法，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寡頭專政被廢除了，徹底的民主政制實現了，則官僚制度也就自會煙消雲散。因為在徹底的民主政制下，人民大眾不但具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思想信仰的完全自由，而且還有選舉和罷免一切官吏的自由權。官吏如由人民選舉，則人民自會選舉他們素常所信任的廉潔而有能為的人員。萬一被選舉的官吏仍然營私舞弊，則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評他，檢舉他，告發他，罷免他。在這樣的政制下，任何官吏不但不敢貪污，而且也不能貪污，不願貪污了。那時的官吏，將自動發揮其服務能力，廉潔精神，來取得社會的榮譽，以此逐步地走上官吏與人民間的界綫之廢除。這就是說，人人都可以服務於公眾的一切職務，這樣也就無所謂官吏與人民之分了。

我們中國，自秦以後曾經歷了二千餘年的亞洲典型的君主專制政治，因而也就經歷了二千餘年亞洲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統治。這無疑地是我們一種最壞的最腐惡的傳統。辛亥革命後，這一種最壞的最腐惡的傳統，不但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新的條件下更加發展了。正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洶湧澎湃的民主潮流來清洗它。讓我們人民大眾從今起就準備去迎接這一潮流，推動這一潮流吧！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子思想》*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一) 關於學術思想論爭的態度問題

我首先在這裏提出這個問題，好像是多餘的。但事實上，李季先生却已嚴重地把這問題提到我們面前了。因為李先生在『再論老子與孔子的思想——答歐伯先生』（《求真》第三期）的大文中，開始便特闢一節，標題為『針鋒不相對的宣傳式論戰法』，其中將我的『回頭是岸』（《求真》第一期）一文內凡是批評到他的思想和方法所用的一些形容辭，都一個一個地統統搜檢了出來，給我作出了一個譴責和罪案式的結論說：「充分表現他悻悻然的心理，與《求真》所標『嚴格的科學態度』，有些兩樣」，因此，李先生的『心理』竟『悻悻然』，幾乎『不擬作答』了！好在他『後來一想』，還是『出馬一次』（只是『一次！』）這才算使這次『關於老孔思想的論爭』，沒有因我的『宣傳式論戰法』與《求真》所標『嚴格的科學態度』有些兩樣而中斷！然而這就迫着我不能不首先來說幾句話了，因為這已牽涉到了關於學術思想論爭的一般態度問題哩。

不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由於兩千餘年來專制主義統制的流毒，在思想界異常缺乏研究和論爭的傳統精神，所以一遇到爭論某種思想問題時，常常表現出不正常的態度。人們對於思想上的論敵，不是無原則地遷就、敷衍、妥協、或乾脆地不理睬；就是往往避開思想本身的要點，而節外生枝，斷章取義，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甚或走到無聊的詆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四期。

譏和謾罵，將在思想上追求真理的論爭變成了「個人面子」的鬥爭。以致常使論爭弄得無結果而散。因此，我對於「求真」標出「對於任何思想，任何創作的討論與批評……都堅主採取嚴格的科學態度」，特別表示贊成。即李季先生這次對於我的「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求真創刊號）的批評論文（求真第二期——《行不得也哥哥》），雖然是避開了思想的要點，陷於枝枝節節，斷章取義，咬文嚼字，但我還是本着嚴格的科學態度，將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要點，盡量地提示了出來，作為答覆與批評，希望同李先生來一次尋求真理的正常的論戰。不料李先生反認為我的答覆與批評是「針鋒不相對的宣傳式論戰法」！

理由呢，那主要就是我在「六千字的短文中，嵌入了「不大舒服」，……「滿紙虛構曲解和附會的烟霧」，「見樹枝不見樹林」「割裂」……「誤解」，「成見」……「機械」……「特別的玄學眼鏡」……」這一些形容李先生的思想和方法的形容辭。在李先生看來，好像我們論爭時，應當完全保持「謙讓不還的紳士態度」（也就是虛偽的態度），對於論敵的任何荒謬見解和錯誤方法，都無須加以適當的形容辭去指責似的。果真應當如此，那李先生何以自解於他過去批評胡適之先生及其他論敵時所採取的態度？假如人們也學着李先生的辦法，將他的《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及他的論戰文章（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文章等）中對於他的論敵所使用的一切形容辭統統搜檢出來，我想一定可以編一部「小辭典」，或者也可以叫做「針鋒不相對的宣傳式論戰法」的「術語辭典」，未知李先生對此將何以自解？在最近求真創刊號上發表的《古史辨解毒劑》一文中，李先生不也是用了許多挖苦和譏諷等的形容辭以指責了他的對方嗎？（就標題的「解毒劑」看來夠挖苦了）即以這次《再論老子與孔子》一

文來說，李先生雖自己聲明「願平心靜氣地提出全般問題來加以討論，希望歐伯先生也採取同一的態度，減少宣傳式的說法」。可是在這一自稱「平心靜氣」和非「宣傳式論戰法」的文章中，我們仍然看到了「偷天換日，自欺欺人的宣傳手段」、「矯揉造作」、「莫名其妙」、「未免有些可憐」、「費盡氣力去強解」、「牛頭不對馬嘴」、「一無所知」、「東拉西扯」、「大玩其宣傳手段」……等等一大堆責罵的形容辭。假如不是「平心靜氣」的話，那不知道李先生還要「嵌入」一些甚麼樣的形容辭來進行「宣傳式的論戰」哩！然而我却不注意這些。

在我看來：凡是在思想論爭的過程中，參加論爭的各方面互相搜尋對方的「錯誤」，抓住對方的「弱點」來加以批評、指責、駁斥、甚至尖銳的諷刺或嚴厲的攻擊，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批評、指責、駁斥、諷刺和攻擊時，又絕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些一定的形容辭或術語。問題絕不在於應不應使用形容辭以形容論敵的思想和方法，而只在於形容得究竟「適不適當」。假如形容得不適當（李先生就常犯這種毛病），對於論敵不但毫無影響，反而暴露了自家的弱點。所以使用形容辭或術語以指責論敵時，必須儘可能採用合乎科學的術語，盡量作到「以真名呼實物」，不可只圖一時之快而輕率從事。然而這還不過是一些論爭態度上的技術問題而已。在論爭時最最緊要的還是：必須嚴格注意所爭論的問題的思想本身，注意對方的思想體系及其要點；儘可能避免斷章取義、節外生枝、離題發揮、咬文嚼字，……一類的把戲；嚴守正確的科學方法論，盡量從理論上和事實上（或史實上）加以批評和闡發，務求達到真理而後已。凡是學術思想的論爭，「旨在求真」，個人的勝負是無關重要的。爭勝了，固然可算是一種榮譽；即使爭輸了，只要有勇氣在「真理面

前低頭」，也算不得甚麼恥辱。但如果一味企圖取巧爭勝，或「死要面子」，不顧真理，那就不但毫無結果，反而一定要愈加暴露自家的弱點和錯誤的。再重複一句：對於任何學術思想的論爭，必須嚴格地遵守科學的方法論，特別注意所爭論的問題的思想本身，抓住論敵的思想體系及其要點，從理論上和事實上予以批評和闡發，務求達到真理而後已，一一這便是我認爲「嚴格的科學態度」，也只有如此，才能稱得上嚴格的科學態度！至於當爭論時採用甚麼形容辭或術語以指責對方的錯誤，是無關宏旨的。

我在「回頭是岸」一文裏答覆和批評李先生時，正是採用了「嚴格的科學態度」，這有原文具在，可資覆按。至於我對李先生的思想和方法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辭和術語，雖然引起了對方的「心理悻悻然」，但在我只是實行了「以真名呼實物」的原則。故直到現在，那些形容辭還是保持着它們全部的效力。

可是，李先生的論文，連這次「平心靜氣地」寫出的《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在內，都是缺乏「嚴格的科學態度」的。因爲李先生既完全忽視了老、孔思想的體系及其核心，而對我解釋老、孔思想的主要論據又故意躲避（例如：我在《回頭是岸》最末提出老、孔根本不同的四個要點時，李先生對於前三點即置而不論，單從第四點作文章）。始終只是依照他二十年來特有的成見翻來覆去地兜圈子。至於「斷章取義」、「離題發揮」、「任意附會」、「咬文嚼字」在這次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例如：當我指出老子那時尚未發明「烏托邦」等的術語而不得不用傳統的「國」字以形容他的理想社會時，李先生便一把抓住了「烏托邦」的「邦」字，從周禮、詩經、乃至金文和甲骨文中去大肆搜羅，將「邦」與「國」大大地對比了一番，文長至一千數百字，真叫人看

了「莫名其妙」！原來「烏托邦」這一術語是譯音，意思是空想主義或空想世界，李先生不是不知道的。但爲甚麼偏要將這個譯音的「烏托邦」的「邦」字割裂下來，「引經據典」地大作其考據文章呢？這不但是表示有意「丟書袋」，炫耀自家懂得金文、甲骨文之類的「淵博」，而且是更古怪地暴露了「東拉西扯」、「牛頭不對馬嘴」哩！如果像這樣地瞎扯下去，簡直有如我們的俗曲中之「十八扯」，扯一輩子也是毫無結果的，只是徒然愈扯愈糟而已。因此，必須忠告李先生，像這樣的扯法，我是不來的。

我在這篇論文裏，還是保持我原來嚴格的科學態度，只是從老、孔的思想本身上來同李先生論辯，並以此擊破其根本謬誤。至於李先生扯出來的許多雞零狗碎的詭辯，非絕對必要時不作解答，寧可讓讀者自去理會。因爲只要將老、孔的根本思想弄清楚了，那些雞零狗碎的問題自會烟消雲散的。

此外，我還必須聲明：我們這次關於老、孔思想的論爭，純粹是一種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又因爲老、孔的思想在我國二千餘年來的社會史發展上會起了重大的作用，對我國的社會人心發生了鉅大的影響，甚至直到現在還未曾終結，所以我認爲值得化一些時間來對他們的思想重新作一番科學的檢討和評價。但要作到這一點，我們這次參加論爭的人們就必須採取真正嚴格的科學態度，儘可能將老、孔思想的本來面目從已往烏烟瘴氣的混亂和歪曲裏發掘出來，再現出來，以便正確理解它們在當時及後世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以便作一次正確的清算。因此，我特別希望李先生及其他參加這次論爭的先生們，都能以「追求真理」爲主，保持思想家的風度，批評儘管批評，駁斥儘管駁斥，但絕對不要走到意氣用事，無聊謾罵，使這次的論爭又重蹈以往的許多思想上的論

爭的覆轍，弄得無結果不歡而散吧！

（二）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

老子的生存年代，原無問題，但自梁啓超提出六項懷疑說之後，已被人們攪得極為複雜，致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若要對這一糾紛問題作一番詳細的檢討，不但須要寫專門的文章才行，而且也不容易得出最後公認的結論來。我個人在論《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曾採取了胡適之先生的判斷，即是認定老子約生於公元前五百七十年，與孔子同時，並略附解釋。但這次蔡尙思先生在《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求真第三期）一文中，又重複把老子的時代問題提了出來，他除指責李先生對此問題前後矛盾之外，並批評我「很信古」。同時李季先生在《再論老子和孔子》一文內也提出了他關於老子時代的修正意見，即從「戰國時代的末年人」改為「戰國時代的中年人物」。雖然我不願意在此種專論思想的論文內來作考據工作，但蔡、李兩先生既已把問題提了出來，我也就不得不在這裏略微停留來解釋一下。

蔡尙思先生說：

「意見和李先生對立的歐伯先生也很信古的說：

「梁氏的懷疑理由，經過許多人的批駁（如張煦、葉青等。其後，很少能站得住了。……孔子曾問學於老聃，不僅為史記所大書特書，為老派的莊子所數數稱道（見莊子天道、天運和外物諸篇），而且為門戶成見素深的孔門弟子所迭次引據（見禮記曾子問），這證明孔子曾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見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其實，歐伯先生的議論，早在梁先生擊破之列。梁先生說：「……三、就令承認孔子曾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曾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

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於老子的紀述，十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諸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屬於老聃，有些屬於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確定。」

但蔡先生所引出梁先生的『三』『四』兩點意見，是經不起批評的。

- 第一、禮記曾子問篇把老子描寫成爲「一個拘謹守禮的人」，這只能說是孔門弟子眼中的老子，這正同莊子一書中，把孔子描寫得儼然像一個『道家』（如德充府篇孔子與顏回的問答）或老子的崇拜者一樣（如天運篇孔子見老子後對子貢的表示）。如果相信莊子書中所描寫的孔子，那我們也可以說：『和論語的精神相反』。
- 第二、『史記關於老子的記述』，假定『十有八九是從莊子天道、天運、外物諸篇雜湊而成』。但莊子這幾篇所說及的『故事』明明『確定主名』，即指的是老聃——孔子問學過的老聃，完全沒有提到老萊子或其他的人物。蔡先生說我的『議論，早在梁先生擊破之列』，實際上是蔡先生沒有看出梁先生的『議論』是『不堪一擊』的。

更有進者，我們從道家思想發展的進程上看來，如果承認梁先生斷定老子是戰國末時人的說法，那無異於承認老子是生在莊子之後，老子一書更不用說是出在莊子一書之後了。然而莊子書中所重三復四地徵引老子一書的文句而詳加解釋和發揮，像這樣的事實將何以說明呢？而且純粹從莊子思想的邏輯上說，如果沒有像老子那樣的思想存在於前，也是無法解釋其思想的淵源的。我們只要將老子和莊子兩書中的思想加以較爲精細的比較研究和分析，便可以發現後者在在都是在盡力解釋和發揮前者的思想邏輯，雖然其解釋與發揮另有偏向，但兩者間思想上的邏輯聯繫是十分清楚，而且絕對不可否認的。可是梁先生及其他的附和者們，却完全忽視

了這種思想邏輯發展上的聯繫，以致弄到結果使『歷史顛倒』（即將老子放在莊子之後），這不能不說是對玄學家門的一種諷刺！

至於蔡先生提出：『莊子多寓言而非信史』，『老子有重禮反禮兩個』，並徵引宋明以來諸家（如羅璧、方鳳、姚鼐及陳師道、張載和宋無名氏等——請參閱求真第三期三九頁）的意見以資左證，希圖以此來加強梁先生的主張。第一、我們且承認『莊子多寓言』，但可否就此得出一結論：莊子書中所敘述的人物與事實，全是虛構或偽造的！恐怕就是蔡先生自己也不敢作這樣肯定的結論吧！因為即使是『寓言』，其中也常常包含着若干可信的『史實』。例如『山海經』，以前是被認為最『荒唐不經』的著作，然而現在却已被人考證它當中所說及的人物和山川地域（例如『王亥』就已被甲骨文的發現所證實）等有許多是真實的了。就莊子一書說，例如其中常所提到的孔子與其弟子顏回、子貢等的問答，也許那些問答全是虛構或『寓言』，但你却不能否認在春秋末確有孔子及顏回、子貢的存在及他們的師生關係。莊子及其門徒都自認是老聃之『道』的繼承者，這是莊子一書中明白地表現出來的。難道他們對於自己根本思想上的，且最為崇拜的先師老聃，還一點不知道而要任意虛構嗎？而且必須明白：老子和孔子在當時的思想界是已經起了鉅大影響的人物，且距離莊子為時不遠，莊子或其門徒對於這兩個著名人物及其關係是絕不敢隨便虛構的。否則，一定會引起敵派儒家者流的指責和揭破。就儒家大師，像稍後於莊子的荀卿，雖對莊子的思想大加批評，但對它描寫孔子見過老子的事實，却未曾有一語指責；往後，儒家的禮記不僅沒有指責，反而完全承認加以引述了。單就這幾點，也就足以證明孔子見過老子，至少老子與孔子同時，在西漢以前是一公認的不成

問題的事實哩。

第二、關於「老子有重禮和反禮兩個」的問題，蔡先生並引張載的話爲證。張氏說：「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殊不知這正是梁啓超的「六項懷疑說」之第三項的來源，這我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了。至於陳師道說：「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後，孟荀之間乎？」「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殊不知楊子正是老子思想的一派代表，在戰國中期影響最大，所以孟子特舉而闢之。孟子之「闢楊」，正是「闢老」。

李季先生關於老子生存的時代，在他的《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中，除完全贊同梁氏的六項懷疑說外，並企圖自老子一書內摘出有關於經濟和技術的幾個文句（如「不貴難得之貨」及「人多技巧」等），企圖以此從工商業和技術的發展上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而是戰國末期的人物。但他現在又說老子是太史儋，以此將老子的年代提到戰國中期，即「後於孔子百二十九年」，「比孟子約早二十多年」。單由李先生對老子的時代這種移動看來，至少可以證明他以前從工商業及技術發展的觀點上所判定老子的年代，全是一種空洞的武斷了。假如像李先生現在的判斷，老子真是太史儋，「約大孟子二十多歲」，而老派的莊子又差不多與孟子同時，我們試問：爲甚麼莊子及其門徒們還要重三復四地敍說老子見過孔子的一些故事呢？距離當時不過數十年的人物，可以隨便瞎造嗎？而隨便瞎造又可以避免敵派的攻擊和揭穿嗎？！這些問題都是無法加以合理的解釋的。所以我說：老孔的門徒們都同樣承認孔子見過老子，是西漢以前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梁啓超及其附和者們，企圖用懷疑主義來推翻莊

子和禮記關於老、孔關係的記載，實在是經不起批評的。像現在的李先生，昨天還肯定老子是戰國末期人，今天又修改為戰國中期人，但不知明天又將老子定為甚麼時代人？

最後，我應當申明一句：關於老子生存的時代，只要有人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莊子、禮記及史記等所記載的全是錯誤，我是毫無成見的。但像梁啟超及其附和者們所提出的一些懷疑說，不但是出於臆測，而且多是自相矛盾。因此我寧願採取舊說，不怕人們賜以「很信古」之譏。

（三）李季先生對於老子哲學的「影子」觀

李季先生在《行不得也哥哥》一文中只承認老子的一元論和辯證法「也許還有一點影子」，因此我批評他「帶的是特殊的玄學眼鏡」。於是李先生更加不服氣，便特闢「老子的辯證思想的評價」一節來辯護自己。他說：

「辯證法所以可貴，因為牠是自然界一種活潑潑的法則，因牠含有正、反、合三個局面，代表發展。即以穀為例，最初是正，把牠種在泥中，發芽生根，將原來的種子否定了，這是反。後來成熟為穀，便變成為合。……在思想中，辯證法要有這樣的發展，才可寶貴，否則不成其為辯證法。……歐伯先生說：『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一無、善一惡、禍一福、盈一虛、剛一柔、曲一直等等對立的公式。』但這種對立只是單純的對立，別無所有：如果勉強稱為正反的話，便沒有合，即沒有發展。」

因此，李先生便斷定：

「這種沒有成熟的玩意兒質既低下，單是量多有甚麼用處？」（求真第一卷第三期四一頁）。

這段話，不但充份暴露了李先生是一個可笑的機械的玄學家，對於老子的哲學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意義毫不了解或完全抹殺，而且證明了他對於一般辯證哲學的了解也是異常機械和片面的。

首先，辯證法絕不僅僅「是自然界一種活潑潑的法則」，而且是人類社會乃至人類精神界的「活潑潑的法則」。用恩格斯的話來說，辯證法乃是自然、社會和精神界運動的一般法則（見《反杜林論》）。其次，「辯證法的所以可貴」更絕不是限於「正、反、合三個局面，代表發展」這一法則。據恩格斯的意見，辯證法包含有三個最基本和重要的規律，即：「對立的統一」、「量變質和質變量」及「否定之否定」（見《自然與辯證法》）凡是自然、社會及精神界，如果沒有對立或矛盾，便根本沒有運動和發展的可能（黑格爾說：「矛盾推着運動而前進」）。如果沒有質量互變，更加談不到發展。然而，李先生所謂「所以可貴」的辯證法則，不過是恩格斯所指出的三種基本規律中之一而已。並且依照列寧的意見，「對立的統一」或「統一的對立」是辯證法的「本質」。他說：「通常對於辯證法的這一方面（例如蒲列哈諾夫）是不十分予以注意的。……對立物之統一性（更正確些說「統一」……）的意思，是認識自然的一切現象與進行（包含精神與社會）的充滿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互相對立的傾向。對於一切世界之進行，如對於「自身運動」，如天然的發展，如在生的生存的認識的條件，就是牠們的對立物之統一的認識……」（中譯《辯證法經典》——亞東圖書館出版）。而李先生談到辯證法的「所以可貴」時，對於「對立的統一」這個「本質」的辯證法則，不僅「不十分予以注意」，簡直把它完全抹殺了！這正是李先生從老子的辯證哲學中只能看到「也許有一點影子」的根因。

實際上，老子的哲學，他的一元論，尤其是他的辯證法，乃是中國古代思想上一種最富天才、最爲光輝的表現。因爲老子的辯證法，恰是列寧認爲『本質』的『對立的統一』的辯證法（雖然尚未發展到完整的程度）。此種辯證法，據我們現在所知，在西方古代社會裏，只有古代希臘的赫拉克利特曾經第一次把它表現了出來。正因此，黑格爾和恩格斯都極力推崇他是古希臘的一個最偉大的辯證哲學家。老子的辯證法，固然帶着消極性，沒有能像赫氏那種富有積極性的和鬥爭性的精神（請參考《求真》創刊號四〇—四一頁），但在中國，甚至在全東方，老子的辯證思想總是最可注意，最爲光輝，最值得推崇的。

不錯，老子的辯證法遠沒有發展到『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的高度水準。但如果以此來輕視老子的辯證思想，如像李先生竟因此而說出『不成其爲辯證法』，『這種沒有成熟的玩意兒質既低下，單是量多有甚麼用處？』這就不但暴露了他本身對於辯證法是一個外行，而且也太唯心主義了！因爲辯證法思想也同其他的事物一樣，有它自己的發展進程，而其發展又全是受歷史發展的條件所決定的。高度的辯證法思想，絕不是任何時代隨便可以產生的，只有在高度發展的社會條件下才有產生的可能。『量變質和質變量』及『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想，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即資本主義高度的生產方法，階級關係及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反映在人的頭腦中之綜合的產物。黑格爾之完成辯證法的高度發展（且不管是唯心論的），絕不是偶然的。然而李先生却要求生活遠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封建社會條件下的老子，必須發明或發現『否定之否定』的高度的辯證法則，否則便『不成其爲辯證法』。假使真如李先生所想和所說的話，則所有古代希臘的辯證思想（連赫拉克利特的在內）都

「不成其爲辯證法」了！但試問李先生：何以黑格爾和恩格斯又那樣認真地研究了和推崇了古希臘的辯證思想及辯證法家呢？（見黑氏的《古代哲學史》和恩氏的《反杜林論》及《讀古代哲學史札記》等）實在說，像李先生對於辯證法思想發展的這種觀點，除了稱他爲帶着「特殊的玄學眼鏡」的唯心主義者，我們找不出更恰當的稱呼。關於老子的辯證法思想之受歷史發展條件的決定，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早已這樣地說過：

「真正『質量互變』的法則，只有到更高度發展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水平下，才能發見的。所以老子的辯證思想，只能進到此地爲止。有人說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對立，即表面的對立，而沒有看到事物的內在矛盾。人們便以此爲老子辯證法的最大缺點。不過，事物內在矛盾的法則，如同辯證法中的『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兩種法則一樣，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偉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會發見這一法則。」

這段話，不是等於預先指責了像李先生對老子辯證思想的這類看法的玄學觀嗎？但李先生帶着他的「特殊的玄學眼鏡」，是不管這一切的。

至於李先生之援引我對於老子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思想的弱點的批評（求真一卷三號四一頁），來辯護他自己對於老子哲學思想的抹殺和鄙視，這就愈加暴露了他自家的玄學觀。因爲我對於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是：一方面，如實地闡揚了它們的可寶貴的優點，同時又指出了它們的弱點的所在，且解釋了形成那些弱點的歷史根因。這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研究和評價老子的根本思想的嘗試。而李先生透過「特殊的玄學眼鏡」，只抓住了我對老子思想的弱點的批評，却完全置我推崇老子思想的優點於不顧，——這種態度

，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利於我者則取之，害於我者則棄之！」然而這又是玄學的唯心主義或主觀主義的特色啊！

總而言之，李季先生對於老子哲學思想之如此地抹殺和鄙視，不但充份證明了他對於老子思想的深度、廣度及其歷史意義，茫然無知，而且暴露了他對於唯物的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除了僅是片面的了解之外，還只是在書本上記誦公式，有如一個游泳研究家，只是在書本上研究游泳術，一落水時就沉跌下去了。

（四）老子的社會思想與其哲學思想的關係

我會說過：「老子是我們古代最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哲學家」，正因此老子的社會思想是同他的哲學思想緊相聯繫着的；換句話說，老子的社會思想或人生觀，是從他的一元的宇宙觀和辯證的（對立統一的）方法論邏輯地開展出來的，——這乃是老子思想中的最基本的特點。而李季先生既對於老子的哲學採取了極端抹殺和鄙視的態度，所以也就根本無法理解這一基本特點。但欲研究和評斷老子的整個社會思想而不理解這一基本特點，那便絕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迫着我不能不從這一方面來再加一點解釋，以便引起參加論戰的先生和讀者們的特別注意。

老子全部社會思想的核心或出發點，就是他的「自然」與「無為」的思想，即所謂「清靜無為」的思想，這差不多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然而這種自然主義或無為主義的核心思想，却全是從他的一元論的宇宙觀邏輯地演繹下來的。因為老子的一元論既認定「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便是「道」之別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但「道」雖為「萬物」所由「生」，是至高無上的，就「道」

的本身說來却是「自然」的（「道法自然」），「無爲」的（「道常無爲」），然而又是「無不爲」的（「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夫物莫之命而常自然」，「萬物將自化」，便是老子對於「自然」和「無爲」的恰切解釋。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所謂自然，所謂無爲，就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不受任何人爲的干預的意思。

老子從這種「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出發，進一步又派生出了他的「無知無欲」的另一根本思想，前者可稱之爲「無知主義」，（即莊子所謂「同乎無知」）或「愚人主義」，後者可稱爲「無欲主義」（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或「知足主義」。因爲依照老子的自然主義，一切知識，如「奇技淫巧」等所表現的，都是「人爲」的，違反「自然」的，因而是合乎「道」的。要合乎「道」不違反「自然」，便只有「絕聖棄智」，「絕巧棄利」，「見素抱樸」，「絕學」（「絕學無憂」），以「返於樸」。「智」的反面是「愚」，所以在老子看來，「愚」正是合乎「自然」的，因而也就是合乎「道」的。這便是老子公開地並堅決地主張「愚」的根本理由。其中絕不會含有甚麼「愚民政策」（像李季先生所描述）的意味。所以我曾道：「老子主張的「愚」，絕不限於「民」，就是「統治者」自身也必須「愚」的」（求真一卷二號四四頁）。換句話說，老子主張的「愚」是一切人都應該「愚」，一切人都應當「絕聖棄智」，應當「絕學」以「返於樸」，即返於無知無欲的「素樸」的或「自然」的原始狀態。老子說：「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這裏所謂「不學」，就是「愚」或「無知」，然而這正是「聖人」所「學」的。把「學不學」翻成現代的話，就是「學愚」，或「學得無知」，只有如此，才能合乎「自然」，所謂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正是合乎「道法自然」的意思。老子之自稱「愚人」，正因為他曾作到了「學不學」的功夫，所以才能「返於樸」，而表現其「沌沌」、「昏昏」、「悶悶」和「頑似鄙」的「素樸」的或「自然」的狀態。這又表明老子的「無知主義」是「知行合一」的。

另一方面，老子認爲一切「奇技淫巧」，一切「難得之貨」，總而言之，一切可欲的東西（如「五色」、「五聲」、「五味」、「文綵」及「財貨」等），都是「智」的產物，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大家「無知」（或「愚」），這些可欲的東西也就不會產生了，因而也就「無欲」，也就「知足」，也就「自然」了。如果大家都「無欲」，都「知足」，當然不會發生甚麼罪咎與禍厲。因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甚愛（多欲）必大費，多藏（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同時，老子從他的辯證哲學，從他的對立或矛盾的哲學觀點出發，看到對立物之中，往往是消極的戰勝了積極的。例如：「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爲奇，善復爲妖」；「物或損之而益，由益之而損」；……這就愈益加強了老子對於「自然」、「無爲」、「無知」、「無欲」等等消極思想的自信。

假如我們明白了老子的社會思想的核心與其一元論和辯證法的哲學之這種邏輯的有機的聯繫，則對於老子的一切社會思想和政治主張，對於他所給予當時一切社會現象的批評和攻擊，也就「迎刃而解」，不難得出明白的觀念和正確的解釋了（請參考《求真》創刊號三八—四二頁）。可是，李季先生恰好對於老子的哲學的重要性和在他社會思想上的決定性，全無理解，於是只有根據他特有的（化過裝的）玄學觀

點，他的經院主義（或煩瑣哲學）尤其是他『二十年前』所發明的成見，從老子一書中胡亂地去搜索一些文句，並用『斷章取義』，『咬文嚼字』以及各種各式的曲解和附會，將老子整個的社會思想系統與其本來面目，弄成一副完全相反的奇形怪狀，令人不可辨識了！

說到這裏，李先生將一定憤激地叫喊起來：你又在玩『針鋒相對的宣傳式的論戰法！』但我必須預先忠告李先生：假如你不進一步認真地去理解老子的哲學思想及其與他的社會思想的邏輯關係，你是一輩子也不會懂得老子的社會思想的。例如李先生看到了『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就斷定這是『愚民政策』；看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若使民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就斷定這是『替統治階級打算盤的說法』。假如李先生懂得了我前面所指出的老子的『社會思想的核心』，他是絕不會得出這樣與老子的根本思想完全相反的荒謬結論的。因爲根據老子的『無知主義』，所謂『將以愚之』，僅僅是叫人民『學不學』，『絕聖棄智』，以『返於樸』，即回復到『無知無欲』的『自然』狀態。同樣，根據老子的『無爲主義』，是反對任何人爲的干預的，何況『殺民』！因此，李先生在《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中之「老子的『愚』和『殺』的問題」一節內所扯出的一大堆議論，我覺得除了是在『舊的曲解和附會』上（參考《求真》卷二號四四—四五頁）再加上一些『新的曲解和附會』外，實在沒有別的甚麼了。假如人們看清了我前所說的一切，對於李先生的『新的曲解和附會』是不難一眼看穿的，所以在這兒便省得浪費筆墨去批駁了。

(五) 關於老子的理想社會問題

要判斷老子的理想社會究竟是一種甚麼性質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三個基本要點：第一、老子的根本思想是『自然無爲』，因此，他的終極的理想社會自然是回返到他那時代的人們（尤其是農民們）所能想像的或所能回憶的（根據傳說的）最原始的社會裏去。第二，老子既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思想家，因此，他除了對於當時的現實社會政治加以批評、指責，而提出某些『改良』的辦法外，勢必提出他的終極的理想社會來，——這看《老子》一書在前面對當時現實的社會政治現象從各方面加以批評、指責及提出一些改良辦法之後，把『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放在最末後，就可明白了。雖然，老子對於我們現代所謂『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或『過渡綱領』的區分思想尙遠未知道，但這類的意識在老子一書中却已經隱約可見了。第三，我們研究古代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去了解它，換句話說，必須了解他們的思想，尤其是說話，爲時代所限制，往往是雜亂的，有時是自相矛盾的，很少能一貫而自具條理，自成系統的。所以研究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必須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從常是雜亂而自相矛盾之思想和文句中去發掘其思想的核心而理出其邏輯的體系（這方法，即研究近代的思想家的思想也是必須運用的，如恩格斯之對於傅利葉，聖西門及歐文等就是如此）。

如果不理解上敘的『三個基本要點』，則對於老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句間的某些雜亂和矛盾，乃至他的對當時現實社會的批評和主張與其終極理想社會間的雜亂和矛盾，就不可免地要跟着自陷於雜亂、矛盾或武斷的泥沼之中。不幸，李季先生正是如此！他將老子對於當時現實社會政治的

某些批評和主張與其終極的理想社會的思想完全混雜起來，最後則以前者去代替後者。他這次在《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三節『老子的理想社會是甚麼？』（求真一卷三號四二一一四四頁）所表現的，就是顯例。

李先生在這一節裏提出了三種論據出來反駁我，企圖以此證明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初期的封建社會』。第一是他『統觀老子一書，提及『邦』字三次，『國』字二十二次，『國家』二次。……凡他講『國』或『國家』的各章，我們從上下文可以看出統治關係來』。由此便『證明』了『老子滿口小國鄰國爲他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先讓我們反問一句：在一個『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社會裏，可能『雖有舟車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乘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嗎？其實，李先生完全沒有理解：老子在前面所提出的許多『國』和『國家』，『從上下文可看出』的『統治關係』，只是批評或敘述當時現實社會政治時所帶出來的，與其『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的『國』是兩樣的，我們絕不應把前者的『國』來同後者的『國』混爲一談。（其說見下）。第二是李先生舉出『……故立天子，置三公』一點，也算是『老子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另一『證據』。但根據上面的同樣理由，老子所謂的『故立天子，置三公』也還不過是指當時封建社會所以設立『天子』『三公』的原意，與其所主張的理想社會並無關係。至於李先生將『食稅』一點也放在老子的理想社會裏作爲『老子要維持階級制的國家組織的證據』，那就更顯得奇怪了！因爲老子所謂『民之饑，以其食稅之多，是以饑』，顯然只是指責當時人民的饑餓全是由政府當局的苛捐雜稅所造成的，這怎能扯到他的理想社會當中去呢？！第三、便是李先生抄出了老子『五十章』（據《老子本義》）的全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證明其「所攻擊的正是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出現後的情形，即封建末期的情形。他假託聖人的口氣，要以『無爲』、『好靜』、『無事』、『無欲』去診治這封建末期的毛病，這完全站在統治階級說出的理想」。我們且承認五十章『所攻擊的正是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出現後的情形，即封建末期的情形』。但從何處便證明了『這完全是站在統治階級說出的理想』呢？難道在封建社會（連初期的封建社會在內）裏真有所謂『無爲』、『好靜』、『無事』、『無欲』的統治者嗎？即退一萬步說，承認在封建社會中也有無爲、好靜、無事、無欲的統治者，但還沒有能證明老子的理想社會內也一定有這類的統治者的。因爲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裏顯然標出『使人結繩而用之』。試問李先生：在人類歷史上有那一個封建社會是『沒有文字』的！？

所以我說：老子的『小國寡民』乃『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求真創刊號四二頁），就是說，老子的理想社會是『烏托邦主義』的。然而這正「是廣大的農民羣衆的地位之反映……農民……根據傳說，根據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來的」（同上引四一頁）。這不但是關於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之一種最合乎歷史科學的解釋，而且在老子以後的繼承者中還可以找出充分的證據來。讓我們先從莊子中摘引一段關於描述其理想社會的話來看吧：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雀之巢可攀援而窺。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踉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漫漫爲樂，摘僻爲禮，天下始分矣。」
(馬蹄)

這段話所描寫的『至德之世』的社會生活狀態，恐怕李先生也無法否認它是一種『原始部落社會』的反映吧！然而這正是根據於老子的理想社會的傳統思想加以發揮而來的。因此我們儘有理由說，莊子的『至德之世』不過是老子的『小國寡民』之第一次的較爲詳細而清楚的注解罷了。

最後，晉鮑敬言，被稱『好老莊之書』，是老莊思想之最光輝的繼承者。他說：

「仔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欲之者爲辭哉？夫強凌弱，則弱者服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夫役彼蒸黎，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羈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然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並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亂禍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葬？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絺冕玄黃之服。……夫獮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險，百官備則有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抱朴子』『詰鮑篇』）鮑敬言在這裏所描述的『曩古之世』，是一種『無階級無政府』的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想任何人當不致加以否認，因為他寫得實在太清楚太明白了。然而鮑敬言的『曩古之世』，又不過是繼承莊子的『至德之世』將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的傳統思想，加以進一步的解釋，描繪和理想化而已。

由此我再肯定一遍說：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是當時廣大的農民羣衆的意識之反映，不但從老子的根本思想中得到了確切的解釋，而且從莊子和鮑敬言的文件中也獲得了充份的證明。李季先生的『初期封建社會』說，不但與老子的根本思想格格不入，而且絕對無法解釋莊子和鮑敬言的那種理想社會的傳統根源。

（六）關於老子思想所代表的階級問題

如果老子的理想社會，像前面所充份證明了的，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之理想化』，是廣大農民羣衆的意識之反映，則老子所代表的是農民階層也就絕不成問題了。而且關於這一點，我在《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一文中早已明確地指證了出來（參考《求真》創刊號四三頁）。但李季先生在摘引了我的『指證』的原文之後（見求真一卷三號四五頁），不但毫無理解，反而提出了最可笑的最機械的反駁出來。現在且將李先生的反駁妙文抄錄如下，讓大家來欣賞一下吧：

「照這段話（指摘引我的話——歐伯）看來，老子的全部思想和學說都是由農民那種『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得來！但他不獨盡情諷刺『衆人熙熙』、『俗人昭昭』，並且說『我獨異於人』，當時佔絕大多數的農民即使不在『衆人』、『俗人』之列，總應該在『人』之列，老子何以這樣忘本？再就農民講，既能知道『戰爭、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這許多事爲多事，又懂得傳說、神話、能『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而且體驗到『一切的知識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那他們都是知識豐富的大博士，頭腦並不『單純』。……何以像一個垂死的階級一樣，『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竟反映『無爲』、『無知』、『無欲』、『不爭』、『知足』這一大串主張呢？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不去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和『無爲』等等的辦法來，真是未之前聞！最奇怪的是老子從農民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所學得的廣大知識，所反映的『不爭』、『無爲』等辦法，不從農民的立場傾吐出來，竟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曲曲折折，半吞半吐地予以發洩！」

我將李先生這一段煩瑣、冗長而又十分乏味的妙文引了出來，實在覺得有累讀者。但爲了暴露他的異常的機械觀點，咬文嚼字及其對於我的原文語意的曲解等等，也只好如此。現在且來一一檢討如下：

第一、老子所『諷刺』的『衆人』、『俗人』及『我獨異於人』的『人』，從語氣看來顯然指的是當時剝削和壓迫農民或一般人民的統治階層中人物及其自覺或不自覺的追隨

者們。而李先生却偏從「衆人」、「俗人」和「我獨異於人」的「人」字中，嵌進農民全體，以便得出老子不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就是「這樣忘本」的結論！這還不夠證明李先生的機械觀點和咬文嚼字的把戲嗎？

第二、對「戰爭、刑罰、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傳說」、「神話」、「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一切知識是多餘的，有害的」，……這一切，在李先生看來，不是農民完全不懂得或體驗得，就是完全懂得或體驗得之後而能自己看出「更好的前途」，總之，二者必居其一。但歷史上的經驗，尤其是古代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農民羣衆對於統治階級所加於他們的剝削、壓迫、痛苦、災禍，及統治階級本身的橫暴腐敗等現象，根據自己的直覺、經驗，他們是多少能懂得或體驗得一些出來的。然而他們自己不但往往是看不出「更好的前途」，甚至連他們多少所懂得或體驗得的東西竟也無法表現出來。正因此，農民往往須要別階級的人們來指引他們，或代表他們。這不但在古代是如此，就是近代也還不能例外。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時候，代表農民利益說話的常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如法國大革命時代），而在末期則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如列寧等）。假如我們明白了這種歷史的事實和經驗，則出身貴族的老子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意識和要求並爲之表現出來，不但毫不不足爲奇，而且是完全合乎歷史的辯證邏輯的。實際上，不但農民是如此，就是現代的工人也還是如此。李先生你能否認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是首先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映出來並代爲之完成起來的嗎？真想不到，李先生的機械觀點竟發展到了如此可驚的程度！

第三、李先生認爲「當農民『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的時候，起來暴動，是古今中

外的通例，是鐵一般的史實」。然而「史實」並不完全如此的「鐵一般」。就「史實」看來，農民起來暴動，往往是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如歐洲），或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的時期（如中國）。例如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波希米亞、法、英、德等國的農民大暴動，以及中國秦以後的農民大暴動等等就是這樣。但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和中期（如歐洲各國），甚至末期（如中國），農民大暴動是極少見的。這裏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工商業經濟尚不夠發展，影響農民的城市階級份子尚未生長至相當程度，因而封建階級的傳統勢力尚能勉強支配農民，使不致走到大規模暴動的地步（至於小規模的暴動或反抗一定是有的，不過未經歷史記載下來而已）。因此，在歷史上，農民雖然「受到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但並不起來暴動，仍然是「忍受」了下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農民的暴動也同其他的事物一樣，不是在任何時期和任何條件下都可以產生的。因此，我可以說，李先生所理解的農民暴動是超歷史的，玄學的。

第四、李先生說：「當農民受到……但不去暴動，却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去深思苦索，想出或反映出『不爭』、『無爲』等等辦法來，真是未之前聞」！這段話不僅僅是機械的，而是荒謬的。因為農民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但又不能起來暴動的時候，難道就連『想』也不能『想』了嗎？實際上恰好相反，農民在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而又不能暴動的時候，是更加要東想西想的，雖然『不和大思想家一樣，那麼含蓄地深思苦索。』也正因為農民在痛苦而又不能暴動的時候表現他們的情感和思想，大思想家（像老子和托爾斯泰等）才能『那麼地去深思苦索』，反映出農民們的意識形態來（如『自然』、『無爲』、『無知』、『無欲』及『不爭』等）。李先生對此表示『未之前聞』，其實是『少

見多怪」哩！

第五、李先生最後說：「最奇怪的是老子從農民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中所學得的廣大智識，所反映的『不爭』、『無爲』等辦法，不從農民的立場傾吐出來，竟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曲曲折折，半吞半吐地予以發洩」！我們看到這段話，覺得更加『奇怪』！因爲站在農民立場上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在當時，老子總算是最痛快，最勇敢，和最尖銳的了（參考《求真》創刊號四一頁所引的老子原文）。然而李先生鼻樑上架着一副『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眼鏡，不但在老子一書中所看到都是『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姿態，而且所聞到的聲音也都是『曲曲折折，半吞半吐』的了！

現在我更有權利學着李季先生作出如下的結論：『凡是不懷成見的讀者將上面所說各點綜合比較一下，馬上會看出：認老子爲反映農民的意識，爲農民的代表，非常切合真相，翻閱老子全書，甚至莊子和鮑敬言的許多解釋，無一處講不通；但如認老子爲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的代表，那就沒有一處是講得通的，即李季先生費盡力去強解，也終不能自圓其說。何去何從，不難抉擇！』

（七）孔子究竟代表甚麼階級

我們在前面已經明白地指證過：李季先生把同情農民反對封建貴族的老子說成爲最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是一種何等荒謬的曲解！然而對於真正代表封建貴族利益的孔子，李先生却又將他描繪成爲反對封建貴族的『士和自由地主』的代表或革命家了！『別有會心』，『顛倒黑白』，李先生於此可算達到了最高峯！然而李先生所以達到此種登峯造極的荒謬曲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由於他那根深蒂固的機械觀。

在李先生看來，彷彿社會的階級關係完全像機械的配置一樣：某一階級或等級出身的人，便一定代表那個階級或等級的利益而不可移易似的。老子既出身於貴族，便一定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吏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裏去』——見《行不得也哥哥》）同樣，孔子既出身於士（『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闕庶及人闕出身』），也就一定『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李先生甚至於斷定：『孔子爲士的代表，這是誰也承認，不會有爭執的』——以上引語，均見《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第『六』節。）依此推論下去：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一定代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出身於工人或農民的，一定代表工人階級或農民層的利益。但根據李先生的這一機械邏輯，我們怎能解釋：何以出身貴族的米拉波，會起而領導過資產階級的法國大革命？出身貴族的托爾斯泰，竟表同情於農民而反對代表貴族地主的沙皇制度？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和列寧，竟成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反之，何以許多出身於農民的人們常常替官僚貴族地主忠實地服務？不少出身於工人的人們，常常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走狗？顯然地：歷史的事實，客觀的階級關係及其利益的代表關係，與李先生簡單而機械的頭腦所想像的要遠爲複雜和辯證得多。就一般說，階級的利害固然是其代表者的思想和傾向的決定因素。就個別的人說來，其思想和傾向並不一定常常代表其所出身的階級。有時甚至相反：出身甲階級的人往往轉到乙階級或同情乙階級而變成了它的代言人或領導者。因此，我們觀察和判斷某一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代表的階級性時，固然須要注意他的『出身』，但絕不可單憑這點來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標準。我們寧可說：『判斷某一思想家或政治家所代表的階級性時，最主要的，含有

決定意義的，乃是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本質究竟是反映了那一階級的意識和利益？』但異常不幸，李季先生判斷孔子的思想所代表的階級性時，竟完全忽略了這一「最主要的標準！」而只是機械地注意孔子及其弟子們的「出身」並「旁搜博引」地以此來「證明」孔子「出身士閥」即是「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也正因此，李先生便鑽入了牛角尖，將黑的說成白的了。同時，如果讀者明白了李先生這一基本的錯誤，——即從某階級出身的人一定代表那個階級的機械觀的錯誤，——則對於他判定「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一切「論據」和「解釋」，也就自會看出其膚淺、機械和歪曲之所在了。

但機械思想牢不可破的李先生，對我們前面這種辯證的說明，也許又要大叫其「牛頭不對馬嘴的宣傳式論戰法」吧！我們爲了使他以後不致隨便亂用這套「護身符」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對於他那原無足道的煩瑣「論據」也就不得不耐着性子來揭破一番。先讓我們抄錄他在「二十年前」所寫現在又重抄出來的自鳴得意的一段妙文來看看：

「封建制度最重閥閱，不得互相逾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或庶人閥出身，並非貴族。……就閥閱講，他們應該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張，始終安於士閥，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而事實上，孔子對於「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方六七十……求也爲之……」。……孔子做過魯國的司空和司寇，子貢爲齊魯聘吳越，位居卿位，宰予仕齊也是卿，他們師弟簡直闖入貴族閥閱了。」（《求真》一卷三號第四七頁）

李先生以爲這段「從前批評孔子的話，現在看來仍然是對的。」但「對」在甚麼地方呢？即令「對」，又與「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有甚麼關係呢？實際上，這段話的本身

便是機械思想或形式邏輯的產物。「封建制度」固然「最重閥閱」，但並不是絕對的，即絕對地「不得互相逾越的」。如在春秋初期，正當封建制度最盛的時候，然而管仲和鮑叔牙却曾以「士」或「庶人」的資格而作到了齊國的卿相。「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這也是以「士」或「庶人」而躋於卿大夫之例。像這類的例子還有不少。由此可見，春秋末期的孔子及其弟子們，以「士閥」或「庶人閥」出身而作到大夫或卿相，「闖入貴族閥閱」，也就無足為奇了。何況所謂「士閥」，正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是那時的官吏（就算是「事務官」吧）的候補員，所謂「士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就是這個意思。而且我們還必須知道，所謂「士閥」，在封建貴族的等級制中，雖列在最低級，但本質上還是在「庶人閥」之上，是屬於或准許「闖入」貴族閥閱的。因此，有能力的士或「學而優」的士，不但可以，而且應該闖入貴族閥（如卿，大夫等）之中。李季先生「帶着特有的玄學眼鏡」，把甚麼都看成「絕對」，以致對於孔子及其弟子們由士而陞為官吏，躋為卿大夫，便也以為這是「逾越」了「封建制度的閥閱」，破壞了封建制度，其實這不過是「逾越」了李先生頭腦中所想像的那種「絕對的封建制度的閥閱」，破壞了他的烏托邦的封建制度而已。

我們姑且退一步說，孔子及其弟子們以「士閥」而躋為卿大夫，算是「逾越」了「封建制度所最注重的閥閱」。難道由此就可以證明這是「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嗎？李先生如果用「肯定」來回答這一問題，那以前歐洲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以及現在法意的社會黨、共產黨和英國工黨的領袖們之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直接組閣，更可算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在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甚或是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了！可是從馬克思主義

的觀點看來，這些號稱社會主義者乃至共產主義者之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直接組閣，都不過是一種可恥的機會主義的露骨表演，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穩定已在動搖的資本主義制度，以便其渡過難關而已。孔子及其弟子們之「闖入貴族閥閱」，躋為卿大夫，即算他們是代表「自由地主階級」，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可恥的機會主義者同現在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企圖以其改良主義去挽救當時封建制度的危機，以便其繼續存在吧了。

至於李季先生在我們前面所批評過的那段「引證」之後，所「補充」的三點意見（《求真》一卷三號四七一—四八頁），自以為「充分顯明」。但實際上，只是「充分顯明」地「補充」了或加深了他的原有的荒謬見解。因為：

第一、他援引芋尹無字所說的「人有十等」的說法，企圖以此證明「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多而且嚴的。」其實芋尹無字的話是大成問題的，我們姑且假定他的話是對的罷，然而不管「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如此的「多」，如此的「嚴」，總還不是「絕對的」（理由和事實前面已指出過了）。因而也就絕不足以解釋孔子及其弟子們之為卿為大夫，是代表自由地主反對封建制度。

第二、他說「士是封建社會中一個閥閱，充其量可以做現今所謂「事務官」」。即算只能作到「事務官」罷，但你總已承認了「士」是在「封建社會中」可以作「官」的一個「閥閱」，即有權可以「闖入貴族閥閱」中去的一個「閥閱」，因而也就是屬於、至少可能屬於貴族閥之一了。因為士乃是有「祿足以代其耕也」的，即屬於「食於人」的階級哩！士既獲有一定的土地以為「祿」，從土地上收取「祿」（地租）「以代其耕」，則士閥為小地主當然是可信的。但在孔子時代的土地是否已自由買賣，因而那時的「士」是否已

成了「自由的地主階級」，李先生尚沒有舉出一點可靠的史實來證明。他引韓非子說的「夫陳善田利宅，所以輕士卒也」。及管子說的「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這些顯然是指封建貴族爲了要打仗，不得不賜給「士卒」們以「善田利宅」和「爵祿」等，以「易民死命」。不知李先生何以竟從這些引句中得出了「這正是新興自由地主階級的一大來源，與周初的封建地主階級是不同的」結論來？！假如李先生所謂的「自由地主」，是依照科學的定義來說的，即是在土地自由買賣的條件之下產生的（從李季先生說的「自貨幣經濟發展，土地自由買賣，凡富有金錢的人都可以變成自由地主」這幾句話看來，似乎已承認了這一定義），那末韓非子和管子中所描寫有土地的士卒們，却與「自由地主」毫無共同之點。因爲他們的土地絕非爲金錢買來，而是由上面的封建貴族賜予的，因而也就是不可以自由買賣的，換句話說，仍然是「封建的」。此種「封建的地主」，怎麼李先生也慷慨地賜予以「自由地主」的頭銜呢？而且這種「封建地主」，在本質上與「周初的封建地主」究有甚麼「不同」呢？！很明顯地：李先生費盡氣力所搜羅出來以便證明孔子所代表的「自由地主」，恰是一種「封建地主」，這未免對於他自己的主張太過諷刺了！但對於我們的判斷——孔子代表封建貴族地主的判斷，倒是一個小小的幫忙呢！！

第三、李先生說：「孔子爲士的代表，這是誰也承認，不會有爭執的」。真好武斷！把他自己承認的東西竟誇大成「誰也承認」！孔子出身於「士閥」人們可以「承認」。但士閥的本身是在真正的「貴族閥」與「庶人閥」之間，有類於現代的小資產階級，是最不固定的。（事實上也沒有絕對固定的閥閥）其中有可能闖入貴族閥閥的顯達之士，也有淪

落在庶民層的貧寒之士。正因此，士個人的意識是變動不居的。企圖往上爬的「士」，便要擁護當前的封建制度，至多主張加以改良，孔子正是這樣的一個代表人物。而落在庶人層或接近庶人層的「士」，則可能同情庶人（如農民及手工匠等），反對當前的封建制度而主張改革，如墨子及陳相、許行之流，便是這種傾向的代言人。李先生斷定孔子代表士，但我們要問他究竟是代表「往上爬的顯達之士」，還是代表「接近庶人的貧寒之士」呢？李先生又說：「士的量既增，而士的質也變了。」但變成了甚麼樣的「質」？代表「自由地主」以反對封建制度的質嗎？不但孔子不會反對封建制度，企圖代替貴族閥，就是後來孟嘗、平原、信陵和春申諸君的名下士，也還是在拼命擁護孟嘗君等「貴族閥」，企圖維繫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至於李先生說：「孔門把士看做社會和國家唯一無二的中堅人物。……這正是孔子要以士閥去代替貴族閥，起來掌握政權的明證。在事實上，他們師弟也多少如願以償了」。其實「在事實上」，不過是孔子及其弟子們，看到當時封建制度的衰落，上層貴族的腐敗無能，認為士的責任重大，鼓勵「士閥」中的人們振作起來（即所謂「任重而道遠」），以便自己爬上較高的貴族閥，改良當時已在衰敗中的封建制度而已。然而當時的封建制度，客觀上實已無法「改良」，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們（如子貢、宰予等），雖然作到了卿相，爬上了貴族閥，但其改良的效果還是等於零。李先生的所謂「多少如願以償」，原來不過如此！

至於李先生指出孔子主張「節用」、「使民以時」及「富之」、「教之」等政策來治理國家，便也算做孔子是「代表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之「證明」，那就更顯得他的牽強附會了！因為像「節用」、「使民以時」及「富之」、「教

之」這類改良的思想或政策，即在封建制度的擁護者中也是很可能發生的。有名的管仲之治齊，就多少採用了這一類的政策。孔子之提出這一類的政策，只能證明他是一個站在擁護封建制度立場上的改良主義者，正如現代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之提出某些改良的社會政策一樣。假如以李先生「考察」孔子的同樣觀點來「考察」現時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則他們也可算「代表新興的工人階級」了！

總而言之，李季先生以其特有的機械頭腦，全用形式邏輯代替辯證法來「考察」孔子所代表的階級，所以其論據、其解釋、其結論，便無一不與歷史的事實背道而馳了。在我們，認為要正確判斷孔子思想所代表的階級性，首先而且必須辯證地從孔子思想體系的本質上去探求。

（八）孔子思想體系的本質

說到孔子思想的體系，我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原已大略敘述過（《求真》一卷二期四五一—四六頁）。凡是沒有成見的人們，當已看出孔子思想體系的本質或中心之所在。但爲了擊破李季先生頑強的成見起見，我們還是不得不再來重複解釋一番。

孔子思想的本質或中心，如果用一句現代的術語來說，便是「封建制度的改良主義」，換句話說，即維護當時已在衰落的封建制度而加以改良。而封建制度的本質又是從上至下的等級制度。此種等級制度，在封建割據及封建諸侯間常起戰爭的情形下，是容易破壞和混亂的。所以要維繫這種等級制度，便必須有一種強制的而又經公認的規範，這在我們的古代即謂之「禮」。「禮」有類如現代的「法」，是規定各封建等級的「名分」之一種共認的約規，凡上之使下，下

之事上以及各級封建貴族之一舉一動，甚至一言一語，均應合乎「禮」或以「禮」為依皈。因此，「禮」在封建社會裏便成了維繫封建制度的一條鎖鏈。沒有這條鎖鏈，封建制度是無法維繫而容易陷於破裂和混亂的。也正因此，在封建社會中特別重視「禮」（這從古代著作中評判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言行時，以「禮也」或「非禮也」作斷語，就是證明），這有類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重視「法」一樣。其根本不同之點僅在於：前者的精義是維持封建貴族的特權，而後者的精義則在保障有產者的私有財產權而已。

但在孔子時代，或由孔子看來，正是「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有之」的時候，換句話來說，正是「禮壞樂崩」的時候。因此，恢復禮制便成了孔子的中心思想了。所以當顏淵向他問「仁」時，他的答覆是「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他又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便可見「禮」的作用是如何地重要了！但要「復禮」，又必須從「正名」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和子路這一段爭論最烈的對話，在李季先生看來，只「是禮讓的孔門空前絕後的吵嘴談」，其實這是孔門中關於他們的中心思想，關於他們的政治原則，即關於他們如何從政治上去挽救當時已在衰敗的封建制度之一種最嚴肅而最激烈的論爭。在這種論爭裏已充分地表示出孔子挽救和改良當時

封建制度的根本態度和方法了。根本的態度是「興禮樂」，而其根本方法則從「正名」始。孔子之作「春秋」，是正名主義之一種最高的運用，因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這種正名主義在政治和倫理上之一種具體的表現。所以當齊景公聽到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時，不覺恍然大悟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但孔子要挽救並改良當時已在衰落的封建制度，又究竟以甚麼社會為標準呢？換句話說：孔子的理想社會是甚麼呢？孔子是經驗主義者，這當然只有從歷史的經驗上去尋求。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而有文獻足資徵信便只有「周」。所以他最後得出結論並加以讚美地道：「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裏所謂的「周」，當然是指「西周」。因為在他看來，只有西周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時代，是最合乎他的理想社會的。也正因此，他不僅讚嘆不住地嚮往它，甚至還自以繼承這種理想制度的開創人物之「文」與「道」自命哩！（例如他說：「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總而言之，就孔子全部思想體系的本質或中心說來，是企圖以「正名」，「復禮」來挽救當時封建制度的頹勢，並以此去改良它，使之回復到西周的形態，我們只有理解了這一基本點，則對於孔子其他的一切主張、言論、思想和行動，才能獲得明白而正確的解釋，不致陷於「只見樹枝而不見樹林」，或各種各式的附會和曲解的泥淖之中。也只有從理解孔子思想的這種本質上，才可以正確地指出孔子所代表的階級性來。

(九) 關於李季先生「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幾點妙論

由前面對孔子思想的本質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之頗為有系統而詳細的解釋，則對於李季先生在「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學說體系」一節中所提出的許多妙論（《求真》一卷三號四八一—一五〇頁）本已不攻自破，無須解答了。但「如全不回答，他一定以為我是辭窮理屈了」。「我如果一一回答，實近於無聊。」「因此，我只好就其中比較重要的來解答一下」

（恕我套用了李先生的公式！）

首先，我應當指出的：人們在李先生標題為「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學說體系」中，除了碰到些雞零狗碎的妙論之外，却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學說體系」來。這或者就是李先生的「學說體系」吧！

一、李先生最引以為得意且認為牢不可破的，是他的「春秋譏世卿」說。他這次引出了公羊隱公三年關於「尹氏卒」和同書宣公十年關於「齊崔氏出奔衛」的「譏世卿」的解釋，以為這就是「士閥」反對「世卿世祿」，破壞「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想取而代之」的鐵證。但可惜李先生這種「鐵證」仍然不過是一個肥皂泡，一點也經不起一鑿的。因為他首先就沒有注意到《公羊傳》並不等於《春秋》，而只是遠在春秋作成以後的一部註解書。此種註解書的「註解」是否符合於《春秋》的原意，是大成問題的。所謂「公羊學」，在清末的一些漢學家中早已意見分歧，莫衷一是。但實際上，公羊傳對於春秋的傳註，是最牽強附會，最少靠得住的。例如李先生所引出的「尹氏卒」和「齊崔氏出奔衛」兩句春秋原文，在《公羊傳》解為「譏世卿」，但在《左傳》和《穀梁傳》中却又完全是另一種解法。李先生如不信，讓我們將左傳穀梁傳和公羊傳的原文一同抄出來對照看看吧：

「君氏卒。（此君氏即公羊和穀梁中之尹氏）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左傳）

「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穀梁）

「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

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左傳）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何？舉族而出之之謂也。」

（穀梁）

「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

由此可以看出：左氏、穀梁和公羊三家對春秋原文的傳註，是各自不同的。但究以何家的傳註爲正確，何家是代表孔子的原意呢？這是很難確定的。但至少我們由此可以說，公羊傳的解釋，比起左傳和穀梁傳的解釋來，是最爲武斷，最少靠得住的了。李先生如果還不服氣，那我們讓穀梁來作一次正面的說明：「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隱三年穀梁）。「春秋之義」，既是「諸侯與正而不與賢」，則所謂「譏世卿」與「選賢」，之說，又從何而來呢？而且不但穀梁的解說如此，就是公羊也有與這類似的解釋：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甚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則子貴，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公羊隱公元羊）

公羊在這裏的解釋，是合乎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傳統習慣的。但根據「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這一嚴密的封建宗法傳統看來，則所謂「譏世卿」，即「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的說法，不全成了無稽之談嗎？

李先生曾趾高氣揚地向我們示威，要我「先提出不可靠的理由來」以證明「春秋譏世卿之不可靠」。現在我們的「理由」總算是「提出來」了。因此，我們有權利再說一句：李先生這回又是上了公羊的當了。「讀書三十年」的李先生，實在未免太不細心！然而這也是李先生作文章時「東拉西扯」，不加判斷的必然後果呢。

二、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曾說過「孔子始終尊崇周天子」，並引「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當做直接的證據，以爲他擁護封建制度的左證之一。然而李先生却認爲「這又是牛頭不對馬嘴」。他說：

「所謂『吾從周』，是指從周的文物，並不是甚麼始終尊崇周天子。至於從周的文物，也不是尊崇周的封建制度，不過是因周的文化比夏、商二代高，他要創造一種新文化，即以周爲藍本。」（《求真》同三期四八頁）

李先生在這段話裏不自覺地犯下了三個大錯：第一，所謂「從周的文物，也不是尊崇周的封建制度」。這是將「文化」與「制度」分離並對立起來，看成兩種絕不相干的東西

的最庸俗的觀點。假如李先生還沒有完全忘記他以前所學的學說，那就應當知道：所謂文物或文化，並非別的，只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之一。因此，「從周的文物」，不就是等於擁護了周的社會基礎及其整個的封建制度了嗎！第二、所謂孔子「要創造一種新文化，即以周為藍本」，這不但完全違反了歷史的事實，而且還直接地違反了孔子的聲言。大家都知道，孔子是自稱「述而不作」的。「吾從周」，正是「述而不作」的態度之一種具體表現，即以繼承和敘述「文武之道」為職志的表現；第三、「從周的文物，並不是甚麼始終尊崇周天子」。這也是全不懂得封建社會中之「文物」（封建制度）與「人物」（天子或國王、諸侯等）的相互關係。像在周代的封建社會中，只口頭上說尊崇周的文物，而不尊崇周天子，那就等於否認周天子的宗主權，這正是孔子時代各國諸侯的態度，然而這又正是孔子最所痛心疾首的。所以他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這意思就是表示他要恢復周天子的權威，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之作春秋，始終以周天子的年號冠首為綱，更是他「始終尊崇周天子」的表現。所以孟子說：「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李先生這次引子張與孔子的問答（「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得出結論說：「孔子如果『始終尊崇周天子』擁護封建制度，何能說出繼周者的話來？我們從帝制時代生長出來的人都知道，在當朝統治之下講改朝換帝的事，是大逆不道，腦袋要搬場的。孔子如此說，可見他有滿肚子的變更周封建制度的心事，目中已無周天子其人」。這是一種完全缺乏歷史知識和極端的唯心主義的表現。因為：第一、李先生完全不懂得孔

子與子張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客觀地推論歷史發展的傾向問題，這與孔子的主觀願望毫無關係。第二、孔子根據已往夏、殷、周次第相承下來的制度，而預測將來，則以為縱或未來有繼承周統的，即『百世』下去，仍然是多少類似周代的封建制度的。但這與他本人在當時尊崇周天子，主張維護周代的封建制度，毫無違背，更談不到由此可以看出『他有滿肚子的變更周代封建制度的心事……』。李先生以自己『從帝制時代生長出來的人』，便擬想孔子的時代也同後來專制主義的帝制時代一樣，絕對不容許談『改朝換帝的事』。但孔子所生長的却是封建時代，甚至還是周天子的權威被削弱得近於零的時代，所以他絕沒有像李先生那種害怕『頭腦要搬場』的恐怖心理。

至於李先生舉出孟子『王齊』及提倡『仁者宜在高位』的話來，企圖以此證明孔子也是同孟子一樣，目中已無周天子了，甚至『依孔子的本意，是士閥中的仁者來作天子』。這除了暴露其對於春秋戰國的歷史演變及孔門學說隨之而演變完全無知外，還暴露了一種可笑的唯心主義的推論。因為在孟子時代，周天子在事實上已等於完全不存在了，再也無法使之恢復其天子的權威了。所以孟子爲了要維持封建制度的存在，便不得不『求其次』而去找當時有權力的諸侯（如齊宣王）來代替他。無疑地，孟子的封建改良主義是儒家中最爲急進的，因而也是最爲空想的。然而這是孟子自己的事，至多只能說這是孔門思想在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上之一種新的發展，但絕不能將此新發展的思想寫在孔子本人的賬上去。說到要『士閥中的仁者來作天子』，那我們只好說句笑話：這可不是孔子的『本意』，而只是李先生的『本意』哩！『讀書三十年』的李先生，談到孔子的『學說體系』時，不從孔子的思想的本質（像我們前面概略地指出過的）和他

所發表的一些根本主張上去探求，而專「從這些微妙處去理解孔孟的用心」，無怪其鑽到「心」的牛角尖裏去了！

三、李先生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封建時代的各國分權，完全是兩樣的」（《求真》同三期四九頁）。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李先生所有用來反駁我的話中，比較具有科學常識的話。但如果企圖以此來證明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在反對封建制度，提倡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那就又要變成荒謬了。因為孔子所主張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以西周初期的情形作藍本，而加以理想化的。在西周初，不但武王伐紂成功後，分封了同姓及異姓許多諸侯，建立了許多新國，完成了從上至下的封建制度，並且還「制禮作樂」來維繫這一制度；就是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雖然有管蔡之叛，但周公仍然以輔佐成王的資格征伐了管蔡，討平了叛亂；——這些事實，在孔子看來，正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具體表現。正因此，孔子才以西周來作改良他當時正在衰敗的封建制度的標準。也正因此，他才以繼承「文武之道」自命，讚嘆不置地發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決心出來。

然而實際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周初時期，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在一個軍事部落社會走上封建社會的過渡期中之一種軍事集中統治的暫時現象。這種軍事集中的統治，可以幫助封建制度的形成。但當封建制度形成而向前發展時，地方諸侯分立的局勢便要取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而代之了。所以從歷史的發展上說來，後來春秋時代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倒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是封建制度發展過程中之必然的趨勢。此種趨勢發展到戰國末期，便已走到了臨界點，於是又為另一種中央集權制——專制主義的君主制所代替了。然而此種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與西周初軍事統治的

中央集權制是本質上不同的。前者是封建制度所由形成的保姆，而後者則是封建制度發展到最高峯的產兒。但周代封建制度發展的此種歷史過程，不但當時的孔老夫子無法知道，就是現代的所謂新歷史家也還是莫明其妙哩！

前面對於周代封建制度發展過程的指出，雖然過於簡略，但對於我們討論老孔思想及其他先秦思想家們的思想時，却是很有幫助的。假如李季先生明白了周代封建制度的發展過程，則他關於老孔思想問題的許多妙論也就不致發生了。至少，他不會因為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就認定他是代表自由地主階級來反對封建貴族，提倡「君權運動」，企圖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了。

其實，「君權運動」乃是後來戰國時代的產物，是法家思想的基本傾向。但此種傾向也只能到戰國中期以後才能產生，絕不是春秋末期所能發見的。在春秋末期，即老孔時代，封建制度雖已衰落，但還遠沒有走到臨界點。所以春秋末期的思想，無論老子或孔子，即令對於現狀不滿，也只能把頭向過去去探求他們的理想社會來作改革或改良當時社會的標準。但到戰國的中期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商業已逐步發展，新興的地主階級已逐步形成，封建貴族一天一天地沒落，小國一天一天地被大國削弱或吞併；農民大眾在封建諸侯的不斷戰爭與各種各式的壓迫和剝削中已一天一天地感到不能忍受；——在這一切情形下，一個強有力的和中央集權的政制憧憬便自然而然地發生了。這也就是法家之反對封建貴族的君主集權制思想所以發生的客觀的社會根因。而法家思想同儒家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即在於：後者主張「禮治」，主張「法先王」；而前者則主張「法治」，主張「法後王」。李先生完全不懂得儒、法兩家這種根本的區分，因而將他們混同起來，放在同一的「君主運動」中去了！

此外，李先生還說：『胡適之先生在二十八年前大談其孔子「却處處要保存那在紙上的封建階級」……我却曾加以嚴厲的批評。不意時至今日歐伯先生「根據有關於孔子思想的全部材料研究得出來的總結論」……仍不外孔子維護封建制度這一套』（《求真》三期五〇頁）。我對於『孔子維護封建制度』的論據，是否正確，已有前面所說的一切為憑。但最令人惋惜的是：李先生雖自命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嚴厲的批評』了胡適之先生，然而其結果竟比起胡先生來還要糟到不可以道里計！因為胡先生以其常識式的實驗主義去分析孔子的思想，雖遠沒有能達到科學的結論，但至少還沒有過份違反歷史的事實。而李先生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嚴厲的批評』胡先生時，却已完全走到違反歷史的事實方面去了。於此，我們不能不深嘆：一種好工具（歷史唯物論）落在一雙笨手裏，除了糟踏材料外，往往還要『削足適履』的呢！

（十）關於「孔子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的檢討」之檢討

李季先生提出基督教來比擬老子的所謂道教，我認為頗有意義。但可惜李先生沒有能作出正確的結論來。因為李先生只知道『基督教初為無產階級的宗教。過了三世紀，因為變質的關係，便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到了中世紀，牠擁護封建地主階級，到了近代，牠又擁護資產階級』。殊不知，基督雖曾由『無產階級的宗教』而變質為各時代上層統治階級的宗教，但原始基督教反抗上層階級的某些教義却仍然斷斷續續保存在下層階級之中。所以在中世末期及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歐洲許多農民暴動（如捷克、英、法及德國等）和城市手工業者的反抗運動（如法、荷等），都或多或少是在此

種原始基督教，或所謂「異教」的影響之下活動起來或被號召起來的。換句話說，中世紀後歐洲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們，是常常在基督教的影響或旗幟之下起來進行鬥爭，以反對其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李先生於基督教對後世被壓迫階級的此種巨大影響，「不知是一無所知，還是裝作不知，竟一字不提，希望以此來抹殺老子思想之對於中國農民的影響，未免太不忠實了！」（恕我又套用了李先生的公式！）

老子思想同基督教一樣，也因時代變遷而變質，即由代表農民的思想，到西漢為上層的新貴族，乃至為國王所利用。到了魏、晉，為一部份貴族所喜好，變成了「清談」。到了唐朝，甚至被「奉為太上玄元皇帝，……於是道教成為國家的宗教，……徽宗且被道士們尊為「教主道君皇帝」」。這都是事實（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沒有指出，因為我主要地是在注意老子思想對於農民的影響一方面）。但這些事實却並沒有能妨害老子思想之仍然斷斷續續地影響廣大的農民，（像基督教在歐洲之影響廣大的農民和手工匠人一樣），使他們多次在其影響下暴動起來反對統治階級，甚至推翻了統治階級。這是值得異常重視的。

至於李先生說東漢末「張道陵自稱得受老君秘錄行符水禁咒之法，講長生之術。其實，他的來源是神仙家，和老子風馬牛不相及」。李先生企圖以此來否認老子思想對於農民暴動的影響。然而李先生却完全不知道，或者不願知道，古代農民羣衆之對於任何思想或宗教的信仰或擁護，是與智識份子大大不同的。智識份子要認真追求思想的內容，要研究宗教的教義，而農民們却只要聽見那種思想和宗教同情他們，願意幫助他們解除痛苦，不管他的真正內容和教義如何，他們就接受的。而且無知的農民之接受任何思想或宗教，又往往是在一種最原始的或最迷信的形式之下接受的。這差不

多已成了一種規律。不僅以前的中國如此，就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歐洲也是如此。李先生以自己智識份子的觀點去『檢討』我們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以農民或其領導者們沒有能懂得老子的思想，或依照老子的思想去行動，因而就否認老子思想對於那些農民及其暴動的影響，那就未免過於不懂得活的歷史事實，不懂得農民及其暴動的本質了。

但我必須聲明：因歷代統治階級對於農民暴動情形的抹殺和掩蓋，對於農民領袖的思想和主張之誣蔑、歪曲，致使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已往農民暴動中的思想和主張的真實情形。正因此，我們單憑統治階級所留下來關於誣蔑某些農民領袖的思想和主張的一些斷片，是絕不足以正確理解老子的道教或其他的宗教（如佛教）對於農民影響之真象的。因此，我們只能說老子的思想對於東漢以後的農民暴動曾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是從它們常打着道教的旗幟判斷出來的。

此外，我還可以指出一點，西漢初陳平、曹參、竇太后，尤其是文帝『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爲』，這也是由於受了秦末農民暴動的影響。漢朝原來就是在農民暴動的怒潮中湧現出來的。因此，初期的統治層對於農民暴動的感印極深，所以在利用暴動而取得政權之後，不能不對農民讓些步（如劉邦的約法三章，減稅及抑制商人等政策），並盡可能設法使農民休養生息，於是老子『清靜無爲』的思想就成爲他們的應時藥方了。

至於孔子思想之爲後世專制君主及一切統治階級所尊重，視爲治國法寶，視爲『天經地義』，絕非如李先生所說的，是『因爲牠是代表士閥和地主階級』。只是因爲孔子的思想是澈頭澈尾代表統治階級的，主張馴服人民的，堅持等級制度的。因此，秦以後的統治階級比起先秦的統治階級來，雖然變了質，雖已由『封建地主貴族』變成了『自由地主貴

族和官僚」，但孔子的等級制度的基本觀念，它的爲上層統治階級服務以征服人民的思想，却是最適合於新興的統治階級的胃口和利益的。因爲任何新興的統治階級，一待到將舊統治階級推倒而取得政權後，都不可免地要從舊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中繼承某些有利於己的傳統思想和方法下來。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通律。而李先生對此却毫無所知，所以只好牽強附會了！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地指出：老子的思想，由於它原來是反映了農民的某些意識和要求，雖然後來被上層的統治階級所利用，但它仍然能繼續在農民羣衆中獲得影響，甚至往往成爲他們反抗上層統治階級的號召力；但孔子的思想，由於它從頭至尾是代表封建地主的統治階級，因而也就一直爲秦、漢以後的新興地主（還有商人及高利貸者）統治階級所繼承，而成了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的無上權威（所謂『天經地義』）。這便是我們從檢討老、孔思想影響於後世所得出來的唯一正確的結論。

（十一）結 論

最後，我們在這裏將老、孔的思想再作一簡單而扼要的對比，然後以之與李先生關於老、孔思想的判斷對照一下，作爲本文的結論：

一、老子的思想：反映農民階層的意識和利益，因而對當時的封建地主貴族的統治行爲及其制度表示強烈的反對和抨擊，主張回到原始的自由平等的氏族或部落社會時代去。從老子同情農民反對當時封建統治說來，是含有進步的意義的。但他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不但是烏托邦，而且是倒退的。但不管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如何

空想和反動，而他同情農民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和精神，却是最可能獲得農民羣衆的同情和信仰的。正因此，老子的思想也就成了往後農民暴動的號召力了。

二、孔子的思想：在本質上代表封建地主貴族，雖然對於當時已在衰敗的封建制度表示不滿，而加以若干批評，但不主張改造它，只是用西周的封建制度作範本來改良它。所以無論從孔子所代表的階級立場，從他對於當時社會政權的改良主張以及他所信仰的理想社會看來，都澈底是維護當時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的，是反動的。因而孔子的思想也就成爲一切統治階級統治人民大眾的法寶了。

李季先生對於老、孔思想的判斷恰與我們上面的判斷相反：老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他的思想是在維護封建貴族的特權以統治農民，澈頭澈尾反動的。所以往後的農民暴動與老子的思想毫無關係。而孔子則代表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其思想在破壞封建制度，企圖以「土閥」去代替「貴族閥」，甚至欲以土閥中的人來作天子，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因而孔子的思想是進步的，甚至「革命」的。所以秦以後「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就自然地繼承它作爲「天經地義」了。

至於從研究老、孔思想的態度和方法上說來，我是從老、孔思想的本質上，從他們的哲學和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問題所發表的最基本的主張上，去探求老、孔思想所含有的社會意義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而李先生則專從老孔的「出身」，從他們平時所發表的某些無關重要的意見，甚至從私人的閒談中，即從所謂「微妙處去理解」他們的「用心」，枝枝節節地，斷章取義地去找尋自己所需要的論據，編出適合自己成見的結論來。這些都是我在本文中已充分地指證過的

。『凡不懷成見而又具有思考的讀者，看了我上面對於老孔思想和學術的分析，階級性的鑑定，以及道儒二教影響各不相同的檢討』（再套一次李先生的公式），尤其看了我最後所指出關於老孔思想的根本異點和李季先生的見解的對照，以及我與李先生在處理老孔思想的態度和方法上的差異，究竟『同意』誰，那是讀者們自己的責任和權利。但我在這裏還須向李先生再一度打招呼：你『十五年前所開闢的道路』，原是一條死巷。你雖自以為『遨遊真理之域』，但經過我前面的詳細指點之後，證明你實際上已鑽到了牛角尖頂，再也無法前進了！朋友，『向真理低頭』是榮譽的，還是及時『回頭』吧！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後記】寫完這篇文章不久，即看到《求真》一卷四期上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李季先生的《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及蔡尙思先生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三篇大文，像這樣熱烈地來爭論老、孔的思想問題，總算是我們久已陷於停滯狀態的學術思想界一種開始活躍的可喜象徵吧！但爲了這一爭論得到良好的結果，並由此展開到其他的學術思想領域去，我覺得不能不對嵇，特別是李、蔡諸位先生貢獻一點意見：

一、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可說是一篇認真的作品。基本的觀點大體是正確的。但在方法上嵇先生還不免有點機械。例如：『小農』只是商業發展社會的產物，是農

民到了普遍分化後所分化出來的一個階層，這在古代社會裏是不會大量產生的。尤其以老子的思想來代表『小農』，更使老子的思想陷於極狹隘的範圍，這是很難說得過去的。其次，嵇先生以爲一定先有隱者然後才有道家，這也未免過於形式。道家的思想固然與隱者有若干關係，但不一定是出於或導源於隱者。尤其以老子的思想說來，絕非單純退隱的。它一方面固然表現消極，但同時在消極之中又含有積極性。換一句話，就是老子的思想是以消極的方法去積極地改造社會，——這一點只要注意老子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各方面的嚴厲抨擊和不斷提出主張就夠了。

二、李先生和蔡先生這次的爭論（指《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和《再答李季的老莊封建說》兩文而言），可說得是『針鋒相對的』。然而他們同樣表現了兩個嚴重的弱點：第一、兩位先生都沒有從老子的根本思想，即從他的哲學及其對社會的基本觀念和主張上去爭論，多是陷於枝枝節節，甚至咬文嚼字地互相攻擊或對駁。在方法上看，兩者也都是陷於形式邏輯的。第二、兩位先生論爭的態度，是多分帶感情的，甚至有不少處所是近於詆譏和謾罵的。這未免已逾越了討論學術思想的範圍，減損了思想家應有的風度。像這樣依照其邏輯發展下去，勢必走到離開學術的論爭而專事個人爭吵的庸俗道路上去的。尤其李先生對於陳振維先生的態度（見《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中的『餘興』一節），更已遠超過了前進思想家對於好學青年應有的態度。青年人就是說錯了，你也應當以道理去說服他，何況陳先生這次的見解並不算錯。而李先生竟以『倚老賣老』、『老氣橫秋』的態度，對之臭罵一頓，把青年人參加學術討論也算作『出風頭』，——這種態度，對於青年人固然是一個打擊，但對於李先生是更爲有損的。

上面的幾點意見，只能算是讀了《求真》一卷四期《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幾篇文章後的感觸。我這樣隨便寫出來，似乎太欠慎重，但我急切地期望着：凡參加這次老、孔思想論爭的先生們，尤其是李、蔡兩位先生，在論爭時應特別注意於論爭的方法和態度，免致使得這次論爭又走到無結果地不歡而散的道路上去。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論官僚資本*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官僚資本」，自馬寅初先生特別而公開地提出來，指責它是「民營事業」的絕大危險，大聲疾呼「打倒官僚資本」①之後，即已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別注意。近半年餘來，不少報章雜誌、座談會及政治集團等，常以官僚資本為題，進行討論，表示反對，發表各種各式的主張，這證明官僚資本已成了「衆矢之的」了。

但官僚資本究竟是什麼？它的危險究竟何在？尤其是要怎樣才能真正「打倒」它？人們雖然發表了許多意見，提供了不少主張，但綜合起來，還是很難得出一個明白而正確的結論。提出問題是一回事，理解問題又是一回事，而解決問題更是另一回事。要想將提出的問題加以正確的理解，首先就必須追究其客觀的原因及其發展的邏輯，然後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解決方案。我們的官僚資本，在當前不但是經濟上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而且也是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因為官僚資本，顧名思義，與官僚政治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要想認真理解官僚資本，懂得它究竟是什麼，便首先必須從歷史上去探索它的起源、發展及其與官僚制度的關係。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六期。

「官僚資本」的起源與發展

究竟「什麼叫做官僚資本」？馬寅初先生曾這樣地答覆道：「我對於官僚資本做不出什麼定義，我只覺得官僚資本的形成是這樣的：由官方來提倡一種事業，這事業慢慢地入於私人之手，於是官商合辦，到這事業發達以後，再把它收回官辦。」（馬氏在「上海各經濟團體聯誼會成立會」上的演辭——「經濟周報」二卷廿一期一三頁）從「官僚資本的形成」來解釋官僚資本，這在方法上是正確的。但可惜的是，馬先生未能將這種方法加以徹底的運用，只是將官僚資本形成之一個斷片描繪了出來，因而也就只給了人們對於官僚資本一個「斷片」的印象。

其實，「官僚資本的形成」，還不像馬先生說的那樣片面而簡單。它有其最為複雜而特殊的形成史。首先，官僚資本只是官僚制度下的一種產物，正如官僚制度只是寡頭專政下的產物一樣。但兩者之間也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凡有寡頭（不管君主或「領袖」）專政的地方，一定要產生官僚制度；但有官僚制度的地方，不一定產生官僚資本。例如在古代的羅馬及秦以後的中國，雖然都已有官僚制度的存在，卻不會產生官僚資本。因為那些時代的社會經濟還只是發展到初步的商業資本，而這種商業資本是極不固定的，因而沒有形成固定的官僚資本之可能。因此，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說：官僚資本，只是在某一定歷史階段和某種社會環境的官僚制度下產生的，換句更具體的話來說，官僚資本乃是資本主義時代某些落後國家的官僚政治下的產物。某些落後國家（純粹的殖民地國家除外），一方面，不斷地遭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襲、軍事打擊和政治壓迫，被逼着不得不與辦某些資本主義性的企業（如交通業、軍事工業、礦業及銀行等）來應

付；但同時，本國資產階級的「原始資本積累」還遠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於是只有由國家的名義籌款（不論是借外債或取自人民）來進行。但國家的行政是操在官僚們手裏的，於是以國家名義籌辦的企業，不管是「官辦」或「官商合辦」，官僚們總是起着「領導」（名之曰「提倡」）的作用，因而那些企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操縱在官僚們的掌握裏。這便是官僚資本發生的歷史根因，也就是官僚資本的起源。

此種官僚資本的起源及其過程，在土耳其、波斯、中國、甚至日本，差不多都同樣地經歷過，所不同者只是它們往後的發展過程而已。尤其是日本，因為某些特殊有利的條件，很快就由官僚資本的操縱而轉到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去了。而我們的中國，也因為某些特有的不利條件，却始終成了官僚資本獲得特殊發展的一個典型的落後國家。

我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遭到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猛烈的經濟侵襲及幾次嚴重的軍事打擊之後（如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滿清專制政府及其官僚們，爲了自保計，不得不在「富國強兵」的名義之下，來「振興洋務」，開辦一些新式企業，如兵工廠、礦山、輪船公司、鐵路、郵電、銀行、乃至某些輕工業（如紡織業）等；以資應付。因此，直至辛亥革命前一個時期內，從我國現代化經濟發展方面看來，可以說幾全是官僚資本活動和操縱的時期。如就此時期官僚資本的代表們的特性分析起來，約有以下幾個主要點：

- 一、由於他們的資本的補充來源常靠外債，便特別依賴帝國主義，不惜將國家種種權益斷送給外人。
- 二、因為他們要取得專制君主的信賴，便特別擁護反動的滿清，不惜以種種方法反對民族民主的解放運動。

- 三、因爲他們要鞏固和發展自己在經濟上的壟斷權，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便不惜用種種方法壓抑民營企業（如限制開礦及築路等）。
- 四、因爲他們「陞官發財」的傳統觀念，更「如魚得水」似地使用各種各式的貪污和侵吞手段從官營或國營的產業中謀取贓物，轉變爲「私人資本」。
- 五、由於他們的特有作風（因循，敷衍，及無能等），凡是官營的或官商合營的企業中，都充滿着官僚化，絕對缺乏計算和效率（如管理及技術方面），致使企業本身常陷於癱瘓，甚至破產停辦。

我們如將前面的幾點特性再簡約起來說：官僚資本是買辦化的，或與買辦資本相結合的；是專制政府手中的一種新式武器，幫助它來鎮壓人民大眾的解放運動的；是鞏固和提高官僚們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專門妨害民營事業的發展的；是官僚們「發財」的新領地，貪污腐化的新源泉；是國營事業的掘墳者，現代新式企業的送葬人。

官僚資本雖有以上種種危險的特性，但我們亦不應否認：滿清末年的官僚資本也曾替中國建立了一些現代的產業（尤其在鐵路交通方面，完成了幾條幹綫），準備了一些經濟現代化的條件或基礎。假如以後的繼承者們能解除其弊害而善用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未始沒有前途。

但辛亥革命後，滿清政府雖然打倒了，繼承滿清的軍閥們，不但將官僚資本的遺產原封不變地全部接受下來，而且將官僚資本的一切弊害傳統也接受下來再加以發揮。軍閥統治時代與滿清時代的主要不同之點只是：後者還建立了一些產業，而前者則只是將它們加以更不合理的運用（如利用鐵路運兵打內戰等）；後

者以全力壓抑民營事業的發生，而前者則以各種方法妨害民營事業的發展。

迄至一黨專政時代，除了繼承滿清及軍閥時代的官僚資本一切遺產和一切傳統之外，最大的變化就是：一、以「統制」之名將一切官僚資本集合和集中起來，操縱於極少數的官僚們之手；二、把某些民營或半民營的企業完全附屬於官僚資本（如以四小行附屬於四大行），使民營企業也官僚化，以增厚官僚資本的勢力；三、使官僚資本普遍展開到各方面去（如農村的貸款及所謂合作運動等），以期壟斷全國各經濟部門及國民生活；四、企圖將中國的經濟命脈寄托於太平洋彼岸的金元帝國，以便中國對外關係的「單元化」。以上這些「變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官僚資本」的傾向，同時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官僚資本自發生和發展以來走進新階段的一種特殊的傾向。但這一傾向，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空前侵略（日帝之決心大侵中國，害怕新官僚資本之此種傾向的成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時被阻止，至少被壓縮到一個落後的地域發展去了。然而自日帝失敗後，「新官僚資本的特殊傾向」，從此更獲得了「千載一時」的良機，而它也就「敏捷地」、「勇敢地」抓住了這一良機而躊躇滿志地、毫無顧忌地大踏步向前邁進了。於此，我們的官僚資本便達到了登峰造極，展開了我們歷史上的一個「奇觀」！

“官僚資本”的現狀及其趨勢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略微檢視一下這一「奇觀」吧。

首先，我們必須重複指出，官僚資本的基礎就是國有產業及省有和市有產業等。在八一三以前，國有產業中最主要的是金融業（銀行），交通業（如鐵路、郵電、航運業），軍事工業，礦

業及一部份動力業（電力）等。在輕工業方面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交通業的鐵路中，佔着最重要地位的（就鐵路的里數言）東北的鐵路已全爲日帝所有。在礦業中，不但東北（中國最大而最發達的礦業區）的礦業全爲日帝操縱，就是關內大冶的鐵礦及山東滋博的礦產，也絕大部份落在日人手裏。至於省有和市有的產業，原來很有限。因此，我們可以說，那時官僚資本的基礎還是薄弱的。因而在那時期內，官僚資本還不能完全支配民營事業。尤其在輕工業方面，官僚資本的勢力更是微弱。但自日帝屈服，它的產業被我國接收後，情形就大大的改變了！

爲說明這一「大大改變」的較爲具體的情形，我們且根據不甚完全的「接收敵僞產業」的報告，略舉其大概來看看吧：

(一) 蘇浙皖地區——計由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所接收的工廠六四二廠，內被敵強佔或租用之廠一九四廠，純粹敵產四四八廠。據敵產處理局估計，蘇浙皖區所接收純屬敵產工業其現存可用資產（包括機器設備、房地產及原料和成品等）之價值，共計一千二百七十億零八千萬元。

(二) 華北地區——從「華北開發公司」（以前日人統制華北經濟的總機構）接收下來的工礦事業，即有五十六個單位，每單位又包括若干工廠和礦山。其投資總額達三百六十七億八千五百萬日元。據非正式的估計，不下三十萬億法幣。而且其中有規模最大的重工業（如鍊鋼廠）和礦業等。

(三) 東北地區——關於這一區的接收工作，至今尙未完畢。但東北的工礦業，不但遠較華北爲發達，而且其規模是最爲宏大的。例如，單以電力而論，該區的發電力即在一百二十萬基羅瓦特以上，即等於上海市的發電量十二倍。即瀋陽一地的大小工廠總數亦達三千餘所。其總價值至今無法估計，但比之華北敵產，

當大十數倍是可斷言的。

(四) 台灣地區——接收下來的主要工礦業，據稱有二三六所。其中尤以製糖業規模最大而最主要。(請參考「經濟周報」三卷第一二期七—十頁)。

上面所指出關於接收的敵產的這幾點大概情形，雖然十分簡單而抽象，但人們至少可以由此獲得一個較為具體的概念，就是：我們從日帝接收過來的產業，如果以中國原有的產業相較，是最為龐大的，其中包括的重工業約佔全國重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即輕工業中的紡紗業亦佔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織布業且尤過之。現在這樣龐大的「敵產」已經「接收」過來歸為「國有」了。然而這正是我們的官僚資本所突然增厚而擴大起來的新基礎！

我們的官僚資本既獲得了這樣一個雄厚而龐大的新基礎，於是它不但壟斷了國家的一切交通業和重工業，而且突然地闖入了輕工業的領域中開始來壟斷這一工業部門了。例如「中紡公司」即把持了以前日帝的全部紡織業，並將其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大托拉斯，利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和救濟總署的美棉以及其他種種的方便（如電力及交通工具等），完全支配了紡織界，操縱了紗布市場，並毫無忌憚地在排擠民營的紡織事業了。「中意公司」的傾向，也差不多是如此，不過其範圍遠較狹小而已。如果再將我們的官僚資本在各方面所表現的壟斷情形和跋扈態度的趨勢列舉出來，可以得出底下的一幅縮圖：

一、在金融上，以四大行（中央、中國、交通及中農）挾着四小行及各省市立銀行支配了全國的金融事業，並以行政法令限制民營銀行的成立，以種種方法障礙已有民營銀錢業的發展，企圖完全壟斷全國金融界。

二、除操縱全國鐵路和郵電等交通業之外，並企圖完全壟斷全國航空業（如毫無理由地吊銷「大華航空公司」的牌照，就是一例），扶植招商局以摧毀其他民航事業（如對民生等民航公司之種種危害——文匯報八月十五日所載），把持全國公路運輸業，勢將獨佔全國交通事業而後止。

三、除已壟斷了全國的重工業（如煤鐵等礦業及鍊鋼業等）之外，並已進而操縱了紡織和蠶絲業，其趨勢將打進一切的輕工業部門之中而加以把持。

四、利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及外匯等等特權，操縱對外貿易。

五、以農貸、茶貸、蠶貸或絲貸及糧貸等等名義，壟斷農產品，剝削農民及一般消費平民。

六、最後，將操縱交易所，利用其特權，製造「消息」，用大規模的賭博手段來吸取各方面的資金。

就我們現時這種新官僚資本所已經達到的可驚程度及其顯著的趨勢看來，即就「它現時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的現狀看來：就「它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產，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吮盡一切民脂民膏」（以上引語均見求真第三期《論官僚制度》）的趨勢看來，這不僅僅是在我國官僚資本發展史上的一種空前的「奇觀」，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怪物！

此種官僚資本的基本作用，依照它的傳統，正如它的生母——現時的新官僚制度——的本性一樣，是對外盡其買辦之能事，發展外來資本的勢力，務使中國在經濟上完全隸屬於一個新的主人——一個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對內效其犬馬之勞，加強軍事專政的「經濟基礎」，務使中國人民大眾永久居於奴役地位，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狀態之中。至於由它本身所產生的無比貪婪，

腐敗、浪費與無能，那不過是其附產品而已。”

國營與民營問題

由於官僚資本既是在「國有產業」的基礎上，在「國營」的名義之下產生的；同時，官僚資本不但已與民營資本對立起來，而且有加無已地、極盡橫暴地在危害著民營事業，排擠它，浸蝕它；因而便發生了「國營與民營」的問題。這一問題雖然是一個陳舊的問題，但在現時官僚資本如此畸形膨脹和異常跋扈的情形之下被提了出來，却含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值得重新來加以討論。但本文為篇幅所限，只能在這兒略表大意。

國營與民營的問題，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在半世紀以前就已被提出了。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十九世紀末即已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於是某些改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便主張變某些民營企業為國營，希圖以此來減少私人獨佔資本過份地壟斷國家經濟，威脅國民生活，並由此逐漸地走上社會主義。這在客觀上是多少反映了一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即由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要進至公有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趨勢。單從這種客觀上的反映說來，「變民營為國營」的主張是含有某種進步的意義的。但主張「變民營為國營」的先生們却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們不知道國家究竟是什麼？如果國家政權的性質不改變，將某些企業「由民營改為國營」又有什麼益處？正因此，西方的那些改良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提倡了「變民營為國營」的運動已有好幾十年，但其結果總不外是以其改良主義的花樣替獨佔的資本主義裝飾罷了。

我國關於國營與民營的問題，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已成了爭論的問題。但我們那時所爭論的與西方恰好相反：在西方是主

張「變民營爲國營」，而在我們則是主張「以民營反對國營」（所謂以「商辦反對官辦」）。這裏的原因已如我們前面所說，我國的新式企業一開始即是由官僚包辦起來的。所以後來逐漸積累起來的資產者及其代表們，便主張以「商辦」來反對「官辦」了。這種反「官辦」的運動，在當時的政治上是含有進步的意義的（如四川和湖南的逐路風潮，曾作了辛亥革命的前奏，就是事實的表現）。但從我們落後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律（綜合律）說來，以民營反對國營的觀點，就不見得正確。因爲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來得太晚了，它絕不能像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能有那樣從容不迫的優裕的時間和優越條件，一步一步地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因此，落後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國家的全部力量有計劃地來從事建設，才有可能。所以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首先是一個國家政治改革的問題。

現時人們對「國營與民營」問題發表的許多意見，除了一些技術上或枝節問題上的不同點之外，本質上仍然是站在「民營」的觀點上反對「國營」，重複了辛亥革命以前的老調。從當前現實的政治觀點上說來，以民營反對官僚資本的專橫還是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的。但如果從經濟學的理論上，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前途上說來，以「民營」反對「國營」，不但毫無進步意義，而且是倒退的。因爲主張「民營」的人們，是完全站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自由發展的觀點上，然而這種自由競爭自由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已老遠地落在我們的背後去了。這對於我們這種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落後國家說來，尤其是如此。尤其在現時，在國家從日帝接收了一宗龐大的產業之後，要想將這宗產業（即令是像輕工業的紡織織絲等業吧），如數交給「民營」，不但道理上說不過去（因爲這是全國人民在抗戰中付了極大代價的一種補償品，

不好讓少數資本家拿去經營謀利的），就是事實上也很難辦得通的（例如：某些產業應該讓給某些人經營，及以怎樣的條件出讓？都是很難決定的）。最後，就是將這大宗的產業讓給「民營」，試問在現時全國經濟陷入深刻的危機，行將臨近總崩潰的時候，「民營」又有什麼把握呢？不是有很多的「民營企業」，正陷於掙扎、停滯而感到沒有出路嗎？！

因此，我們應當指出：如果因官僚資本以國有產業為基礎或憑藉它而橫行霸道，營私舞弊，就作出結論說：這是國有產業本身的罪過，是「國營」的不對，應當將國有產業讓給私人資本家去經營（「民營」），那就未免「因噎廢食」了！因此，我們又必須指明：現時橫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已不是什麼「國營與民營」的問題，而是怎樣將「國有產業」從官僚們的掌握裏搶救出來，變成為名符其實的「國營」問題了。

怎樣解決官僚資本問題

如果人們承認我們前面所陳說的一切，是合理的，是符合於客觀的歷史事實的，那對於怎樣解決當前官僚資本的問題，就會得出如下一個邏輯的結論：

官僚資本，既是某種專政下的官僚制度的產物，並依靠它的存在而存在，依靠它的發展而發展的，則這種官僚資本的一切罪惡，便是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專政本身的罪惡之一種表現。因此，官僚資本，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徹頭徹尾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與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緊相聯繫着的。所以官僚資本的問題，必須從政治上去謀取解決，換句話說，必須首先解決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專制政治。假如專制政治及其官僚制度被廢除了，政治真正民主化了，「國有的產業」完全放在人民大眾

的監督下，由人民自己選出或委託的代表們來經營和管理了，換句話說，「國有產業變成名符其實的「國營」了，則我們現時無惡不作的官僚資本也就自然被送進墳墓，將成爲一個歷史上的名辭！否則，把官僚資本問題從政治問題分離開來，企圖從單純的經濟觀點上去謀取解決，例如以所謂「民營」去代替或對抗「國營」，這不但在理論上是倒退的，而在事實上也是空想的。站在這樣的觀點上，無論你怎樣「大聲疾呼打倒官僚資本」*，高談「發展民營事業」，於事實上是毫無結果的，官僚資本還是「我行我素」的。

徹底廢除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軍事專政，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乃是徹底解決當前官僚資本問題之唯一有效的途徑，此外一切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換一句話來說，只有將反官僚資本與反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軍事專政結合起來，爲實現人民大眾的真正民主而向前奮鬥，那時官僚資本的問題才會與其他的民族民主問題一同獲得解決；也只有如此，我們的國民經濟才有可能脫離傳統的官僚資本的羈絆與毒害，而躍上一個新時代的前途，一個按照民衆需要的、有計劃的、集體主義的、名符其實的「國營」經濟的前途！

* 馬氏於去年十二月在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席上發表演說，痛斥官僚資本，其結語是：「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資本，發展民營事業，如果太遲了，要反對，也不可能…」（十二月廿四日重慶《商務日報》）

青年與文藝*

(一九四六年九月)

青年人，尤其是智識青年們，大都是愛好文藝的。這種情形，在落後國家特別普遍而顯着。因為青年人不但富於情感，而且特別喜愛具體的故事；而文藝（如小說及戲劇）正是具體地描繪着人世間各種各式的悲喜劇的故事，充滿着喜、怒、哀、樂、愛、惡等等的情感的。在落後國家裏，由於種種『落後』的條件（如經濟、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落後等），致使青年人處處感到不滿、煩悶、痛苦、甚至迫害，因而他們的感情更需要有所寄托和發洩。而文藝在一定的限度內頗可以滿足青年人這一需求。正因此，在落後國家中文藝對於青年們便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甚至常常是『啓蒙』的作用了。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但丁、蒲伽修、喬約和沙士比亞們的作品對於當時及往後幾代青年人發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凡是稍通西方社會文化思想史的人們都能知道。即以俄國而論，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直至本世紀初，好幾代的青年人都是受了西歐及俄國文學作品的感染，最初獲得了近代的啓蒙知識和思想，因而在各種各式的社會運動中扮演了推動的或領導的作用。例如前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到民間去』的運動中，成千成萬的青年學生們差不多都是受了果戈爾、墨爾岑及屠格涅夫等的文學作品的影響而行動起來的。就是往後參加了甚至領導了俄國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 原刊於一九四六年上海出版的《青年與婦女》第七號。（後改名《新聲》）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許多人物，最初也是或多或少地受過文藝作品的啓示，然後才更進而走上社會主義思想的道路的。

在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智識青年一代人，更明顯地多多少少是在西方文學的、特別是俄國文學的影響下最初獲得了某種啓示而踏進社會解放運動的潮流裏去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回憶『五四』前後一個時期內青年學生們對於易卜生、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之表示如何熱烈的愛好，就可明白了。固然，中國經過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後，整個社會的政治的情況已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那種帶原始性的文學啓蒙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新起的許多青年們仍然期待着甚麼新的文學作品來滿足他們某種情感上的要求。而事實上，確有無數的青年人在所謂新的文學作品中尋求他們被壓抑着的情感上的寄託和發洩，有時甚至希望從那些『新文學作品』中探索人生的慰藉和出路。因此，我們覺得對於青年與文藝的關係，特別是關於青年對文藝應有的認識和態度，是值得重新來檢討一下的。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在過去，絕大多數的青年們對於文藝的態度都是帶些原始性的，主觀的，不自覺的，甚至是盲目的。因為他們大都不曾懂得文藝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文藝與社會生活有何關係，它在人類的意識形態中佔據何種地位，對於人們的生活能起何種作用？一般青年人愛好文藝，往往是出於主觀的喜悅，或一時的興趣，很少能從文藝的本身上，用批判的眼光探求社會的和藝術的評價。因而他們不能以獨立的見解，根據社會學和藝術學的客觀標準去欣賞文藝，創作文藝，而是不自覺地成了某一文學流派，甚或某些文學家乃至某些文學作品的追隨者，模倣者或俘虜。對於文藝的這種態度，有時固然可能從好的文藝作品中獲得某種進

步的啓示，發生某種高尚的情操，但碰到壞的文學作品時，也就可能受到壞的影響，養成偏激、錯誤、頹廢、甚至反動的情感和意識。

或者人們要說，對於文藝的這種原始、主觀、不自覺、盲目和缺乏批判性的態度，乃是早已過去的事。現在的青年們已經大大地進步了，他們已經懂得文藝是甚麼，懂得用社會學和藝術學的客觀標準去欣賞文藝，評價文藝乃至創作文藝了。也許有少數青年進到了這一境地，但絕大多數的青年人，甚至是自命爲前進的青年們，却仍然是沉溺在主觀的盲目的濃煙密霧裏，不自覺地跟隨某些自命爲前進文學導師的人們兜圈子。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回憶最近十餘年來人們關於文藝理論和創作態度上的『朝令夕改』，混亂紛紜及對於某些文學家的盲目推崇，就夠清楚了。人們總還記得：有一時期某些『文藝理論家』曾大吹其『普羅文學說』，反對『民族文學說』，認爲凡是不贊同前者的都是反動或反革命。但會幾何時，那些曾經堅持『普羅文學說』的同一人物，忽然置『普羅文學說』於腦後而一下轉到曾認爲反動的『民族文學說』，乃至『國防文學說』的沼澤裏去了。現在『國防文學說』又已成過去，而甚麼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說正在開始抬頭哩！此外，還有甚麼反對技巧的『大眾文藝說』，反對古典文學的『新寫實主義說』，『宣傳文學說』，『改良舊戲劇說』，『羅馬化文字的文學說』等等，不勝枚舉。一些天真而頭腦簡單的青年們，在這些變來變去的五花八門的文藝『理論』和主張號召之下，不是弄得頭昏眼花，無所適從，就是盲目地跟着轉來轉去，瞎闖瞎碰，結果除了浪費光陰和精力外，就是養成了一些牢不可破的謬誤見解。

現在的青年們，要想真正自覺地接近文藝，認識文藝，欣賞乃至創造文藝，總而言之，對文藝採取一個正確的態度

，首先必須從那些自稱前進文藝導師的先知們的欺蒙和混亂束縛下解脫出來，重新從文藝的理論上學習一些最基本而正確的智識，然後以批判的精神去研讀一些古典的名著和現代的重要著作。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變成任何文藝流派，任何文學家及任何文學作品的盲目的追隨者，模倣者或俘虜。

文藝究竟是甚麼？先進而光輝的文藝理論家（如蒲列哈諾夫）早已提出了正確的答案：文藝不過是現實社會生活之反映。文藝的內容是否具有真實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就全看該文藝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是否真實和有無意義來決定。但文藝本身既是一種藝術，那就不僅僅以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為限，它還必須具有藝術的技巧。否則便不成其為文藝，只能算是一種單純的記事或記敘而已。所以文藝，從藝術的觀點看來，又可以說是社會生活之「昇華」，或社會之花。如果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文藝不但和其他的藝術（和音樂、舞蹈、繪畫、雕刻等）一樣，而且和一切科學，哲學乃至宗教等一樣，同是屬於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一。假如我們透澈地理解了文藝所含有的這幾個最基本的要點，那就不但以前人們所渲染着的甚麼文藝是理想的化身，是天才神秘的流露，是人類唯一最高精神的表現，都變成了無稽之談，就是我們的先知們十幾年來應聲蟲式的或自行捏造的關於文藝的許多「理論」和「主張」，也就迎刃而解了。

倘然你理解了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一，那只要你的文學作品真能反映社會生活中某一有意義的故事（客觀上可能的故事），或社會運動與事變中某一有意義的部份，某些起着一定作用的人物之行爲和心理狀態，且能用藝術的手法表現出來，烘托出來，那你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會具有某種社會學上和藝術學上的客觀價值了。同

時，假如你真能反映客觀的社會生活，能依客觀事實的邏輯去處理你的作品，那也就會自然而然地將進步的寫成進步，將反動的寫成反動，那時你的作品自然會與社會發展的邏輯和社會進步的動力（階級）相吻合，即使你不標榜普羅或前進，也自會吻合於普羅或前進的觀點和利益。否則不論你口頭喊些甚麼進步的口號，說些甚麼漂亮的名辭，其結果總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文藝只要忠於寫實主義的方法，真能將社會生活各方面有意義的部份反映出來，則這種作品自會具有它的社會學上的價值的。偉大的巴爾扎克正是如此。雖然他的主觀上的意識是同情反動的王黨和天主教，但因他最忠於他的寫實主義的方法，因而其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社會生活，描繪出來的典型人物，都違背了他的主觀意識而完全符合於社會發展的動向。

至於寫實主義本身，原無所謂新與舊，只有真與假及澈底和不澈底之分。像現時某些自稱前進的文學家們，雖然口頭上會大吹大擂過新寫實主義，但他們的作品所表現出的內容却往往是矯揉造作，歪曲或遠離事實的。同時，真正的寫實主義，自然會暴露社會的黑暗面而顯現其光明面，——這樣，所謂文學的宣傳意義或教育意義，無須你特別去標榜或提倡，自會含蘊在你的作品之中。否則，一味鼓吹宣傳文學，結果常是成了不三不四的標語口號或政治論說，與文藝風馬牛不相及。文學既是一種藝術，如果因為要求大眾化而否認其藝術上的技巧，那就無異於根本否認文藝本身。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可以說是大眾化的（因為真實地所反映出的社會生活是大眾可能了解的），同時也是藝術的。在文藝上冠以『新民主主義』的頭銜，等於以前被冠以甚麼『民族』或『國防』的頭銜一樣，同是一種應時而投機的裝璜物。假如文藝是寫實的，在民族受壓迫和被侵略的當中，自

會反映出這些受壓迫和被侵略的事實，以及爭取民族解放的各種可能的故事。假如民衆在實際生活上感受到了專制主義的壓迫而需要民主，寫實的文學也自會反映民衆這類的意識和情感出來。說到民主主義本身，原是近代歷史的產物，是含有一定的階級性的。從社會學上說來，所謂一般的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却與社會主義不可分離。所以民主主義絕無所謂『新舊』，只能有階級的性質之區分。舊戲劇的改良說，不但與以前的文言改良主張同一荒謬（因為舊戲劇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是反動的，腐朽的，只有對它革命，絕無改良之可能），而且在話劇已逐漸抬頭的今日，不去積極推動話劇的發展，反而幹些甚麼改良舊戲劇的勾當，這在文藝上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倒退行爲。至於提倡以羅馬字母拼音的文學來代替現時的漢字文學，則正有類於以前某些人們（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提倡以世界語代替漢文，是同樣地遠離事實，同樣的烏托邦。

最後，關於對某些文學家的推崇，假如值得推崇的話，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不過推崇一定須要有一個限度，尤其不可將被推崇者神化起來，當作拜物教去崇拜。但不幸，我們的文學界的某些先知們却把高爾基，甚至魯迅都神化起來了！固然，高爾基在現代的文學上確有不少的貢獻，他的某些文學作品（如『母親』）甚至在俄國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中曾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值得我們推崇，值得青年們學習。但人們把高爾基比作世界的『太陽』，將他的一言一語，一行一動都描成爲人類的典範，那就不但只是神話，而且也大大地違反歷史的事實了。凡是稍微熟悉俄國史實的人，都知道高爾基雖然是一個值得推崇的前進文學家，然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却是常常犯着錯誤，是一個很少可取的人物。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高爾基在政治上即追

隨着「召回主義派」反對列寧；而在哲學思想上他又是波格達洛夫的俘虜，盧拉查爾斯基的同道。在「二月革命」後，高爾基辦的「新生活」，曾不斷地反對布爾塞維克，尤其是堅決地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主張。「十月革命」勝利後，高爾基在一個短時期內雖替蘇維埃服務過，但不久即對俄國農民的無文化發生失望，並對列寧的領導發生反感，而逃到國外作寓公去了。迨至列寧死後，斯大林排斥了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元勳而獨攬政權時，高爾基才又被迎接回到蘇聯來，因而從此也就被人們神化起來，成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太陽」！其實，列寧早在一九一六年致高爾基的信中，便已正確地給了高氏一個評價道：「就文學上說，你是一個好文學家，但在政治上你却是一個壞政治家，你最好還是少談政治為妙」（因原文不在手邊，這兒所引的是大意）。至於我們的魯迅，無疑地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上最有成就的一個人。因此，他在我們這個幼稚的文壇上確然是一個最值得推崇的人物，同時也是青年們值得向他的某些作品學習的。但現在的某些人們却把魯迅描繪成爲中國的高爾基，不僅把他的文學作品推到至高無上的境地，甚至他的整個生平及一切思想和行爲都加以理想化，命令青年們無條件地效法他。但實際上的魯迅並不見得如此的「理想」，這是凡參加過「五四」以來一切社會活動的人們都耳聞目見，認得很清楚的。五四運動當中的魯迅，除了他在文學上確有其光輝的貢獻外（如《狂人日記》及《阿Q正傳》等作品），從其他的思想和行動方面說來，是微不足道的。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魯迅不但沒有站在革命方面，而且常是以譏諷的態度對待革命和人物。那次革命失敗後，當創造社的一部分人向左轉，多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而批評魯迅的小布爾喬亞的文學作風時，他即裝作「醉眼矇矓」的態度去

藐視他們，并以惡毒的口吻去諷刺他們。甚至當着「左派」的人們提倡「普羅文學」時，魯迅也是以「黃包車夫不懂普羅」來嘲笑他們。迄至最後，魯迅見到青年們越來越左傾，越來越離開他時，尤其當他看到了羅曼羅蘭和巴比塞享受到「左傾」榮譽時，於是他才「左傾」起來。也正因為如此，他便被「左傾」的人們加以神化而捧上中國文學的王座了。如說魯迅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上最有貢獻的人，是新文學的選手，是可以同意的。但就他的一般的思想和行動上說來，却始終不會脫離小布爾喬亞的根性。他對封建的殘餘勢力確是仇視的、反對的，對之極譏諷嘲笑的能事的，但對於最進步的革命思想和人物却也常採取了譏諷笑罵的態度。因此我們可以說，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雖遠不及高爾基，但確是高爾基一類型的人物，即在政治上也多少是接近高爾基式的。我們再重複一句：高爾基和魯迅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值得推崇的，他們的某些文學作品是值得青年們認真學習的，但如果因為他們在文學上的貢獻而把他們神聖化起來，叫青年們當作偶像崇拜，那就有害無益了。因為他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許多嚴重弱點，不僅不足以為青年法，而轉足以為青年戒的。

我們前面對於近十餘年來所最流行的一些對文藝的「理論」和主張的檢討，也許人們看了感到麻煩，但要想為青年們確定今後對文藝的正確態度，這種檢討絕不是多餘的。只有從過去的經驗（不管是壞的經驗）中學得寶貴的教訓，以為今後的指南，才能算得是認真地準備去迎接明天。凡是害怕回顧昨日的歷史，檢討過去的痛苦經驗的人們，是絕不會有自己的遠大前途的。

現在的篇幅已不容許我們再多說下去，就此來暫作一個結論吧：

一、我們的文藝經過了「五四」的革命(白話代替文言)和啓蒙(即無批評地接受西方的各種文藝潮流)階段，又經過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輸入及各種各色的文藝主張的混亂階段之後，我們現在應該是要踏進一個明朗而正確的新階段了。在這個階段裏，應該以真正的寫實主義爲指標。只有真正的寫實主義才能如實地暴露社會的黑暗面而顯揚其光明面，幫助其他的社會思想引導着人類走上光明的前途。

二、青年人爲要獲得真正的寫實主義的方法，便必須對於哲學(唯物的辯證法)及其他最基本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和歷史)加一番認真的研究，然後再進而探討一些最進步的文藝理論(尤其是蒲列哈諾夫的文藝理論應該研究)并閱讀一些西方文學的著作。

三、對於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一些可爲代表的古典文學著尤其是沙士比亞、哥德、狄根斯、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代表作，應該儘可能閱讀。因爲這是我們人類文藝上一份最可寶貴而豐富的遺產。誰不願意接受這份遺產，誰就休想懂得現代的文藝，欣賞現代的文藝，創作更進步的文藝。自然，在閱讀古典的文學作品時，絕不可採取盲目崇拜的態度，而必須以批評的精神去分析它們，鑑別它們，欣賞它們，學習它們，理解它們所代表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從它們吸取一些最好的方法和技術，以爲自己創造新文藝之借鏡和資助。

四、對於現代著名文學家(如羅曼羅蘭、哥斯華茨、紀德、高爾基、辛克萊、乃至我們的魯迅等)的作品，固然更應該去研究，但也應以同樣的批評態度來分析它們，鑑別它們。只有如此，才能從拜物教的神秘下解脫出來，看出它們的本來面目，學得一點真正的有用東西。

五、對於任何一種文學，必須首先從社會學的觀點上去

分析它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生活是否真實，是否合於客觀發展的邏輯。尤其要注意它所描繪的各種典型人物的階級屬性及其行動和心理狀態的變化，是否在客觀上可能存在，合乎邏輯的發展。最後，要看它所描寫的事變和人物，是否具有社會的意義和典型的性質。只有如此，才能對於一個文藝作品的內容得出正確的社會評價。也只有如此，才能從事有價值的文藝創作。

六、文藝既然是一種藝術，那就無論是欣賞或創作，都必須注意於藝術的技巧。例如：對整個作品的結構，對故事情節的佈置和配合，對事物及人物各方面的（靜與動的）描寫，對處理故事中的各種矛盾或糾紛問題的態度，對各階層及各種人物的言語或對話，……都不但要顯得自然、真實、恰切、生動、合理，而且要令人能發生優美之感。凡是一部偉大的文藝作品，一定具有它的某種藝術學的價值的。凡是要創造一部新的文藝作品，也一定必須儘可能提高它的藝術學上的價值。

上敘的幾點結論，自然是過於簡單的，太不夠的，如果從文藝的理論上說來還是初步的。但本文的用意，只在於替現時愛好文藝的青年們指出對文藝應有的一個一般的正確態度。假如青年們具有這個一般的初步的態度去接近文藝，研究文藝，欣賞文藝，乃至創作文藝，那至少可以不像過去某些青年人天真地隨便跟着別人亂闖，瞎兜圈子，滿懷成見。相反地，有了這個態度，一定可以發揚其獨立的，批評的和創造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無論是欣賞文藝，或創作文藝，不但可以避免錯入歧途，浪費精力，而且可能獲得「事半功倍」的報酬。

我們這個國家，就現狀看來，在任何方面都是落後的，混亂的，貧乏的，令人感到痛苦、憤懣和焦燥的。在文藝界

方面當然亦不例外。但正因此，我們青年一代人的責任也就更爲重大，更應當努力奮鬥，挺起身來清算過去，準備未來，創造自己的新的前途。我深深地相信；我們的文藝方面也將同其他的社會方面一樣，有一個偉大而光明的時代在等待我們的青年一代人！問題只在於：澈底擺脫那些半吊子的，走江湖式的，投機取巧的先知們的蒙蔽和『領導』。用獨自的頭腦，批評的態度和創造的精神去對待一切作品，一切事物和人物，大無畏地努力向前邁進！

論國民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

國民黨政府當局已於十月十二日明令宣佈決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會議」。這表示當權政黨久已預約，並在十餘年來多次宣佈召集，又多次宣佈延期而像謎一樣的「國民會議」，現在是再不準備拖延了！

但這一「宣佈」，不僅一般民衆對之十分冷淡，不感興趣，而且在野的某些黨派甚至表示憂懼，尤其是共產黨認為「張家口之佔領及國民黨之片面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乃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證據」（路透社南京十二日電傳中共發言人王炳南的表示）。人民大衆對於這樣的「國民會議」不感興趣，自有其原因；某些在野黨派對它表示憂懼，中共認定它的召開是「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證據」，也許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我們站在人民大衆利益的立場上，站在推進民主改革的運動上，却絕不能因此便忽視國民會議在我國當前局勢下的迫切需要，以及它在民主改革運動上的重大意義。假如人們認為當權政黨現時所宣佈召開的「國民會議」是非民主的、是「片面」而足以「造成全面破裂」的，人們就應當積極起來召集一個真正民主的國民會議，一個足以解決國家當前一切重大問題、足以「造成全面和平」的國民會議。但不此之圖，而僅以表示冷淡、憂懼及拒絕參加為限，那就無異於「因噎廢食」了。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七期。

人們應當知道，民主的（普選的）國民會議，絕不能由統治者的自願或恩賜而得。任何專制的統治者，在主觀上總是害怕民主，不要民主的議會政制的。即使為客觀情勢所迫，也只有製造一套非民主的議會形式來應付、來搪塞、來掩飾其專政的本質。正因此，民主的議會制必須由下層民衆的爭取才能實現。在落後國家裏，尤其是在反動的過渡時期，一般否認國民會議的歷史作用固然是一種可憐的幼稚；但專靠上層的協商，希望統治者的賜予，而不動員下層羣衆起來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也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幻想。

固然，現時的人們對國民會議抱着如此種種的錯誤態度，自有其更深遠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在客觀上，因為會議運動或立憲運動，在我國歷史上曾經遭受了不斷的慘敗，造成了種種的惡劣影響，因而養成了人們對於國民會議的許多成見和不理解；在主觀上，某些人們基於其特有的立場，以為現今需要的國民會議也是像我們以往的「國會」一樣，不是政治的交易場所，便是玩弄政治詭計的舞台，因而對於真正代表民衆意志和利益的普選國民會議不感興趣。而一般人民大眾則因為缺乏民主運動（連普選的議會運動在內）的經驗和傳統，對於國民會議的意義更難了解。但正因為如此，我們覺得對於一般國民會議的問題有重新提出來加以探討和解釋之必要。

特別在現時，國民會議已成了當前最現實而迫切的問題。不但人民在客觀上需要國民會議，各在野黨派會一致要求國民會議，就是當權政黨也被迫着不得不召開其所謂「國民會議」了。不論當權政黨行將召開的「國民會議」是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別具用心，另有作用，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就是：當權的政黨已經深深地感覺到，如果再以赤裸裸的軍事獨裁照舊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而不得不準備

披上一件民主政制的外衣來裝飾；——這就是證明中國現時的民主改革要求，已經發展到了某種成熟的階段，再也不能用簡單的軍事手段來壓抑了；這同時也就是證明，國民會議已成為公認的解決當前一切重大問題的工具哩。在這樣的情勢底下，對於國民會議問題如果沒有明白而確切的理解，在未來的政局演變上，在民主的改革運動上，一定會招致種種的混亂和罪惡。所以，我們當政府當局正在要召開它自己的「國民會議」之際，特將這一問題鄭重地提出來，略抒己見，希望一般人民大眾趕速起來加以注意和認識，尤其是切盼凡是真誠擁護民衆利益，願為當前的民主改革，為未來的社會改造而奮鬥的人們，來加以認真的探討，從正確的認識上去發動正確而有效的行動！

民主與國民會議

但國民會議的意義究竟何在？它與一般的民主主義又有甚麼關係呢？這是首先必須略予檢討的。

國民會議，就其本質說來，仍然是屬於所謂民主的議會或國會（PARLIAMENT）的範疇。民主的議會制，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乃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之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因為只有通過這種制度，才有可能使資產階級內各階層的利益和願望相當地反映出來和集中起來，形成所謂「立法」（主要是憲法），並以此去影響其「行政」和「司法」，藉以保衛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因此，民主的議會制是資產階級在其常軌的發展狀態下所需要而可能加以實現的。

如果就其歷史的起源和發展說來，議會制度又是資產階級藉以反抗封建傳統，反抗君主專制的武器（關於這一點，我在下一節中將予以較詳細的解說），並在此種反抗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資產階級踏上了政治的統治地位時，如果

它要想盡量在各下層人民中發展它的影響，利用各層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來替它有效地服務（主要是創造剩餘價值），則議會制度又是較能網羅各種力量（如改良主義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貴族工人等）的良好工具。但當資產階級的本身發展不健全，感到力量薄弱，而又處於不利的條件下時，雖然議會制度是這個階級之「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它都是不願也不敢採取這一形式，往往藉用某種專政的形式來代替它的。其次，當資產階級發展到最高階段（如帝國主義的階段），雖然它的本身勢力已登峯造極，壟斷了一切社會的資源，但因為無產階級勢力的發展和覺悟，尤其當後者向它進行堅決鬥爭的時候，它又往往放棄了議會制度而轉到更野蠻的專政。同時，在這個階級發展的最高階段裏，即令沒有無產階級起來向它作堅決的鬥爭而還保持着議會制的形式，但這種會議制的民主也一定越來越壓縮，在實際上是為少數的資本大王或財政寡頭所操縱的。最後，就是最常軌的議會制度，對資產階級本身內部雖然是最民主的，但對於下層民衆，尤其是對於工人階級，在本質上還是專政的。

就整個的議會制來說，它也像其他的事物一樣，跟着一般的民主主義，自有其發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當資產階級往上升的時期，議會制度不但是這個階級反抗君主專制的有力武器，是自己統治的合理形式，而且對於整個的社會發展也是盡了鉅大的進步作用的；但在這個階級走向斜坡時期，議會制度便不可避免地成為欺蒙和壓抑民衆的輔助工具，而變質為反動的了。正因此，議會制像它本身之代替君主專政的制度一樣，就要被另一種更高級的民主制度（蘇維埃制度之類）起而代之了。這乃是任何政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逃避的規律或命運。

至於我們現時所需要的國民會議，在本質上雖然是隸屬

於議會制的範疇，但它與歐美一般流行的議會却有兩個主要不同之點：(一)歐美流行的議會制，大多是兩院制的（上議院與下議院），而國民會議則為一院制。凡兩院制中的上議院，多是由於指派，或特種推選或間接選舉，因而是合於普選的民主制的。而國民會議則應當完全由普選產生，然後才是名符其實。(二)歐美流行的議會制，不僅是兩院制，同時是將「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械地割裂開來的。真正的國民會議，應當是一個具有全權處理國家一切重大問題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內的）機關。當然，先進國家歷史上所經過的國民會議並不一定合乎這一標準，但真能夠得上稱為國民會議的是大致接近這一標準的）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否則，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

關於國民會議與一般民主主義的關係，我在「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求真》一卷二期）一文中曾有過這樣頗為扼要的敘述：「就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的體現看來，民主主義的內容或民主的歷史任務，其中主要之點是：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制政治，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而普選全權的議會政制是這一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現」（請參考上指該期一四頁）。假如我們將這一段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再分成爲「民主的內容」與「民主的形式」來看的話，那我們又可以這樣說：「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政，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乃是民主的一般內容，而「普選全權的議會政制」則是民主在政治上的總的形式表現。如果以我國現時的情形來作例，解決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如八小時工作制），對外民族完全獨立及國內弱小民族自決，是一般的民主內容，則國民會議便是這民主內容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或總的

政治形式。因此，要求民主而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則等於在政治上沒有集中的表現，沒有總的政治形式將一般的民主內容聯繫和綜合起來，形成整個的統一的鬥爭路向。

但國民會議所能起的作用及其與一般民主主義的具體關係，也像一般的議會制度與一般的民主主義的本身一樣，是最為複雜而多種多樣的，是跟着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不同而發生變化，因而或多或少改變其形式和內容的。因此，我們要想對這問題有一個更具體的更進一步的理解，只有從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去探求。

西方先進國家議會制演變的經驗

一提到議會制，現在大家都公認英國不但是這一制度的典範，而且是它的搖籃。一二一五年之有名的『大憲章』，就是一種所謂國會的產品。但那時的『國會』是貴族的。在英國第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議會，乃是十七世紀的『長期國會』，這是由反抗君主專制的火燄中生長起來的。它曾發動了英國最廣大的下層群眾（以倫敦為中心）并武裝他們起來反抗專制的君主（查理第一），把他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推行了廣的泛民主改革。但正由於那個國會所號召起來的民主改革超過了它自己的頭，於是資產階級份子便自動退縮，寧願讓斯圖亞特的專制王朝復辟。但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的種種壓制下資產階級又感到不能忍受，因而又有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這革命算是替英國資產階級奠定了議會政制的基礎。但『光榮革命』所創造的議會不僅頭上頂着一個王冠（所謂立憲君主），而且資產階級也還是與地主貴族妥協的，選舉更是距離民主甚遠。所以英國的議會要變成真正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

要達到普選的程度，還須經過長久的時間，經過產業革命，經過幾次的『改革案』，尤其是要經過下層羣衆（特別是工人羣衆）的推動。一八三〇年——四八年代著名的『憲章運動』，就是一個顯例。在這運動中曾舉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羣衆會議和聯名請願，要求凡滿廿一歲的男子均享有選舉權，平均選區，秘密投票及取消議員財產資格的限制，議會年選及議員給薪等等，——英國的議會在這種運動的推迫下，才逐步完成了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性（普選制），取得了世界典範的稱譽。

現時英國的民主議會制可說已達到了飽和點。麥克唐納及愛特里這些改良主義的精靈之繼續起而代替張伯倫和包爾溫之流組閣執政，一方面固是英國的民主會議政制發展到最高度的表現，但同時也證明了這同一制度已臨到了極限。在下一歷史階段中，如果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不為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所代替，將不可避免地要像以前意、德一樣為法西斯主義所犧牲。

另一民主議會政制的典型是新大陸的美國。（美國與英國議會政制的主要不同所在，就是後者代表內閣制，而前者代表總統制。）但美國最初的一個議會——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也是在反抗英國的獨立鬥爭中產生和形成起來的。這個大陸會議曾發動了獨立戰爭，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言，一直將戰爭領導到最後的勝利，在新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建立了另一種典型的民主議會政制。無須說，美國的民主議會制度發展到今日，也是經過了多次的改革，尤其經過了羣衆的推動才完成的。但今天的美國議會制，表面上雖帶着最民主的面具，但本質上早已成了幾打資本『大王』或『六十家族』的御用機關了。

法蘭西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模範，因而產生了最民主

的革命的議會——國民大會（一七九二—一九四年）。這個國民大會雖然不是由於普選，但却是真能代表當時一切民衆的意志和利益的，且賦有解決國家一切重大問題的全權（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在內），因而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國民會議。這會議會澈底粉碎了封建的鎖鍊，處決了專制的國王，解決了土地問題，並動員全國力量，組織民軍，抵禦了歐洲一切反動勢力向民主法蘭西的進攻，這堪稱近代史上發揮了最偉大的權威，導演了鉅大進步作用的一個議會。但這種最民主的革命的議會，雖然本質上澈頭澈尾是代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利益的，而資產階級本身之害怕它，却有如害怕其影子。以致終於自願犧牲這種議會而接受拿破崙的軍事獨裁，最後且讓布爾幫的幽靈重新回到專制的王座上來，因而使法蘭西陷於反動與革命的漩渦中至半世紀以上之久。直至吃了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的無比敗仗之後，法蘭西才恢復共和國（所謂第三共和國），踏上議會政制的軌道。但第三共和國時代的議會，比起它的大革命時代的國民大會來是遠為落後的，雖然表面上推行了普選制，但實際上常是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政客，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及所謂社會主義的投機家和工會官僚們玩弄政治詭計，鉤心鬥角，追逐權利的舞台。因而所謂『議會把戲』，在法國會議中表現得特別露骨。也正因此，法國的議會是最為糾紛的，由它產生的行政機關是最不穩定和無能的。所以在希特勒輕輕一擊之下，法蘭西的民主帝國就崩解了。這次大戰後依靠英美而重新恢復的『第四共和國』，重新恢復的民主議會政制，其所表演的仍舊是過去議會的老把戲，因而重演其過去的糾紛，所產生的行政機關也重復其過去的無能與不穩定。這充分證明：法蘭西除了用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來代替現時的議會政制外，勢將陷於法西斯專政的悲劇之中。

德國的議會，是由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產生，即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但因為德國資產階級的卑怯，這個會議僅在歷史上表演了一下軟弱無能的諷刺後，就煙消雲散了。直至普法戰爭後，畢斯麥在工人運動的威脅之下，才召開國會，恩賜資產階級以「參議權」。所以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末期，表面上雖號稱君主立憲，但德國的議會始終是君主貴族的附屬物，不會發展到英美資產階級的那樣的議會政制。第一次大戰末，德國的工人和兵士暴動起來把威廉第二攆走，並成立了一些蘇維埃，德國資產階級依靠着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們之助，才熱心起來贊助民主共和國，召集國民會議，制定「威馬憲法」。然而這已遠落在歷史車輪之後了。因為那時，德國除了走上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外，就只有法西斯的道路。結果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威馬憲法及其議會政制，不過是替希特勒準備其踏上政權，造成這次戰禍的悲劇而已。

俄國的議會政制，正如俄國的資產階級之接觸政權一樣，不但是最落後的，而且也是最短促的。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先天的怯弱，自始就害怕民主主義，害怕民主的議會政制。但俄國的工人階級，却與之相反，不但一開始就接近社會主義，並且還堅決地要求實現徹底的民主主義。所以在沙皇專政底下，堅決主張召集立憲會議，成立共和國的，不是資產階級，反而是工人階級及其影響下的農民。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工人和兵士摧毀了沙皇政府，成立了蘇維埃，俄國的資產階級才勉強承認共和國，接受政權。但這個資產階級（以米留哥夫代表）還企圖建立一個不要議會制的共和國，一再延期召開立憲會議。也正因此——工農兵的民主蘇維埃得以迅速地發展，因而在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會議剛要召開之前，無階級便踏上了政權了。於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蘇維埃政制，便直接地跨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

這不但把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議會政制與社會主義民主政制緊扣起來，創造了另一典型，而且替東方的落後國家預示了一個極可寶貴的先例。

由上面略敘英美法德俄幾個國家的議會政制發展經驗看來，我們可以得出底下幾個主要的教訓：一、民主議會的政制，絕非由於和平談判，而是在羣衆反抗君主專制或外來壓迫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二、這種政制雖然是資產階級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但這個階級本身往往不願意運用這種政制，甚至害怕接近這種政制。三、因此，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只有在羣衆繼續推動和壓迫之下，才能獲得發展和完成。四、當這種政制發展到完成時，它一方面充當了籠絡工人貴族的羅網，同時又變成了少數財產寡頭的御用機關，除了用社會主義的政制來代替它外，就要醞釀法西斯專政的災禍了。五、在較落後的國家中，這種政制實現是極短促的，然而它的運動又是推進另一新的政制——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加速產生的動力。西方先進國家在議會政制的經歷上所表現的這些教訓，都是值得我們東方落後國家的人民十分注意而必須加以接受的。

我國議會政制運動的教訓

我們的議會政制或憲政運動，比起西方先進的國家來，只是一種諷刺，然而並不是沒有教訓的。

戊戌維新運動同時也就是一種憲政運動。但這種運動的領導者，只是在幕後推動光緒皇帝去拼命發佈維新命令，却完全不會注意到召集一個民主的議會來團集各級人民代表來擁護這一運動，加強這一運動並以此去抵抗反動勢力的壓迫。這一點雖然不是戊戌維新失敗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失敗原因之一。

戊戌維新的失敗招來了義和團的暴動，而義和團的暴動又招致了八國聯軍進攻的慘禍。滿清在這種慘禍之後，就是最頑固最反動的西太后也被迫着不得不把她最憎惡并親自取消了的戊戌維新政令重拾起來頒佈，宣言準備立憲，成立了資政院及諮議局（即現時的參議會）之類，以圖苟延殘喘，奈為時已太晚，——這又證明反動的統治者，總是要到迫不得已時，才肯準備採用一點民主政制的形式來敷衍搪塞的。

在另一方面，當時的同盟會，從戊戌政變中取得教訓，決心用革命手段來推翻滿清的專制政府，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但該會的領導者們，除了政綱上的缺陷及忽視農民羣衆力量外，對於當時已經發動的憲政運動不去參加，不去推動，不提出像普選國民會議一類的口號去號召各層人民起來參加政治鬥爭，而專注意於軍事暴動（實際上許多暴動是冒險的），致使憲政運動完全落在接近康梁思想的一班改良主義者手裏，這不能不說是鑄成往後辛亥革命形成流產失敗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宣佈了共和國，但沒有認真立刻召集一個普選的議會以團結并集中全國一切民衆的代表們來支持它，只是忙於同袁世凱進行談判協商，這無疑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民國二年初雖召集了國會，但這個國會的產生并非由於普選，所以它的構成份子——議員，除了一部份同盟會的老會員外，絕大多數是投機取巧的官僚政客（尤以清末康梁的立憲派佔優勢）；而從下層民衆出來并能代表民衆利益的份子，簡直絕無僅有。因而這個國會也就成了一班官僚政客們玩弄議會把戲的政治交易市場，以致袁世凱輕易地用威脅利誘的種種手段馴服了大多數的議員，最後則解散了它。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這是當時國民黨領袖們公開號召重新召集一個普選的議會來動員民衆，收拾時局的好機會。但不此之圖，他們專門從事於所謂『護法』運動，以致鬧得烏煙瘴氣，形成我國歷史上一個最紛亂最污糟的時期。而在這時期內，我們的議會的醜態，它的奇形怪狀，也就表演到了聞所未聞的程度。至於袁世凱之召開『國民大會』來『選舉』自己作皇帝，曹錕之賄買『議員』（所謂『豬仔』）來『選舉』自己作總統，那更是我國議會上最最惡毒的諷刺了！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與共產黨一致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反對北洋軍閥的軍事專政，對抗段祺瑞（執政）的『善後會議』，這在當時的政治上是適合時宜的。但人們既不會將國民會議與其他的民主任務（如對外民族獨立、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等等）密切地聯繫起來，同時對於產生此種會議的普選制又沒有明確規定（他們以所謂職業團體的選舉代替了普通選舉），最壞的是，甚至除了發表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宣言，在很短期間內鬧了一下『促進』運動之外，就不聲不響地把這一國民會議擱置起來了！這又證明人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政治意義，直到那時還是一部不會打開的書。

至於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悲劇中所建立起來的軍事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十餘年來雖然屢次宣佈要召開國民會議，成立憲政，但直到『八·一三』抗戰後，還只能以『參政會』來敷衍！這就不禁叫人又回憶起滿清末年當權者的『立憲』的故事來了。至於現時正在準備召開的『國民會議』，究竟與辛亥革命後的某種『國民大會』有何種不同，也不禁令人大起猜疑。

如果綜合上敘我國的會議改制運動或立憲運動看來，底下的幾點教訓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我們的專制政府（從

滿清到現在)對於民主的議會政制都是極端仇視的，倘若被環境迫到不得已時，則製造一個虛偽的議會形式來敷衍(如諮政院、善後會議及參議會之類)；假如有必要時，則製造一個假國民大會或國民會議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我們的資產階級比起西方的前輩來，更害怕民主的議會政制；而我們的政客們，平時既不敢要求民主的議會政制，不願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但一遇到某種形式的假議會出現時，又趨之若鶩，視為政治交易的絕好市場。三、民主的國民會議，沒有廣大下層羣衆的有力推動，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依俄國的經驗，這種會議的實現又將促成另一種更高級的民主政制的到來。這些教訓都是從痛苦中、甚至災禍中所鑄造出來的。假如想要推進民主改革運動的人們不理解這些教訓，不接受這些教訓，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誠心誠意，但在客觀上總是要成為民主改革運動的絆腳石或罪人的。

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與各方的態度

現時當權政黨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其根本作用，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已經指出。但據當局歷次的宣告：是爲了完成憲政，「還政於民」，因而規定這個「國民會議」的任務只在「通過憲法」，並根據「憲法」來改組政府。但像這樣的「國民會議」究竟能否「還政於民」，能否改組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爲使大家了解，還值得費點時間來分析一下。現在就讓我們將這個問題，「國民會議代表」的產生及其構成份子來略加檢討吧。

大家總還記得，現時的「國民會議代表」是遠在十年前產生的。而產生的方式，名義上雖說是「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憲法草案第二十八條)，但實際上却與此相反。因爲一千七百名的「代表」當中，即有五百名

是國民黨的中委員及由國民黨政府直接指定的。其餘的一千二百名表面上雖經由民選，而實際上不是各級黨部暗中操縱，就是公開圈定的。所以這次「國民會議的代表」，只能算是國民黨的代表，與人民大眾是絕少關係的。以這樣的「代表」來開「國民會議」，至多只能算是國民黨代表的擴大會議。以這樣的「會議」來「製定黨法」，「還政於民」、
「改組政府」即令不叫人感到氣憤，至少也感到滑稽。

誠然，政府當局已迭次要求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遣派若干代表所謂社會賢達參加，企圖以容納各黨各派的代表及「社會賢達」來表示這種「國民會議」是代表「國民」的。但即令如此，這個「會議」仍然與一般的「國民」無關，至多也不過是國民黨的代表們與某些在野黨派的代表們之一個聯合會議而已。由這樣的會議來「改組政府」，或者可以稱之為「聯合政府」，但絕不能稱為人民的政府，更談不上「還政於民」。

所以無論從任何方面說，現時國民黨政府當局所要召開的「國民會議」，是名實不符的，即以現時歐美各國一般民主議會的標準看來，也未免顯得太過諷刺。這就無怪乎一般人民大眾對之「表示冷淡，不感興趣」了。至於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現時對於這個「國民會議」所採取的態度，也是應予以批評的。

據中共發言人王炳南的鄭重聲明：「張家口之佔領及國民黨之片面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乃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表示」。從這「聲明」看來，共產黨對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並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場上根本反對它的不民主，它的虛偽性，而只是指責國民黨不應在「張家口之佔領」後「片面決定」「召開國大」，以為這樣便是「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表示」。假如國民黨不佔領張家口

或在另一種條件下召開這同樣的「國民會議」，共產黨是不會拒絕參加的，一一事實也正是如此。共產黨在過去的「協商會議」中早已不反對這個預定的「國民會議」，它所要求的只是多派幾個代表來參加這一「會議」，并在未來的「改組政府」中多佔幾個席位。所以爭來爭去，討價還價，總是不出乎對「國民會議代表」及「國府委員」要佔多少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國民會議」本身是否民主，由這樣不民主的國民會議是否能產生民主的政府，則早已置之度外了。其他的黨派，如民主同盟及青年黨的態度，也差不多是如此。這就證明：我們現時所謂民主的黨派，對於真正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政制，并不感到興趣。而它們所最感興趣的，倒是國民會議代表及國府委員的多寡，至於這個「會議」和「國府」本身之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只好任其自然而已。民主云乎哉，原來如此！

由此，我們更加有理由說，如果人民大眾自己不積極起來爭取民主的改革，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改革及民主的國民會議是不會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改革運動，民主的議會制運動，還是要重演過去的醜劇和悲劇的。因此，我們希望人民大眾，尤其是真誠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服務的人們，應當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索問題，用自己的行動來解決問題，首先要積極起來，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以推動一般民主改革之實現。

人民所需要的國民會議

但我們人民現時所急切需要的，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如果再用一句簡單的話來答覆，就是「普通選舉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

因爲我們國家現時所處的境地實在是太艱險了，我們人民現時所遭受的苦痛實在是再難忍受了！抗戰八年的結果，日帝雖被打倒了，但國家仍然處於半殖民地的困境；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因缺乏土地及遭受千百種的剝削和壓迫，愈來愈陷於死亡線上；千百萬的勞工愈來愈瀕於飢餓和奴役的深淵；國內弱小民族則因種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常起暴動（請參考《求真》一卷二期一六一—一八頁）；貪官污吏更橫行無忌，任意魚肉人民；尤其是國共兩黨則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極慘酷的內戰；——這表示我們的「對外民族獨立問題」、「土地問題」、「勞工改善問題」、「肅清貪污問題」以及當前的「國共紛爭問題」等等，都迫切地，急不容緩地等待解決。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從現時極端艱困、混亂、腐惡和苦痛的深淵中救拔出來，踏上解放的復興的大道。但要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在現時只有立刻召集一個普選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

所謂普選，就是按照一定的年齡，不分男女性別，不受財產限制，人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並由直接和不記名的投票進行選舉。因爲只有由這樣的普選制來產生國民會議代表，才能杜絕任何的指派圈定，防止黨派的把持操縱。也只有如此，才能集合并集中全國一切有能爲而又能代表各層人民利益的代表們於一個國民會議，來認真討論和決議國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問題。

所謂全權，就是由這樣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不受任何干涉，任何限制，有權自由討論，議決和公佈任何重大問題，乃至制定國家根本憲法^①，并具有全權推選行政機關（包括司法機關在內）來執行。如行政機關違背決議案或執行不力時，國民會議得隨時重選或改組之。對於任何行政官吏，如發見其違害人民利益，或貪污腐敗時，國民會議得隨

時議決予以罷免或懲戒之。只有這種全權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和利益，從上至下地實行民主改革（如民族獨立、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等）實行改變一黨專政的官僚制度，使整個國家走上現代的民主化。也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解決當前國共兩黨間的嚴重糾紛，使它們在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處置。」（請參閱《求真》第二期二十頁）

最後，實現此種民主國民會議的前提條件，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因為只有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人民才能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發表自己對於國事的主張，各個政黨才能自由宣傳自己的信仰和政綱，好讓人民自由選擇。也只有這樣，在進行選舉時，人民才能自由選舉自己的代表，各政黨才能自由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用自己的政綱去自由爭取人民的信任和選票。所以爭取一般的民主自由，又是爭取實現民主國民會議的絕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結 論

歷史現在已明白地將國民會議問題提出於我們的議事日程了。各階層各黨派都將要在這一問題上受到一次難以掩飾的「民主測驗」。專政者將不可避免地要繼續以虛偽的國民會議來應付，來掩飾其專政的實質；投機的黨派或政客們，定將忽視民主的國民會議，而以某種虛偽的國民會議為滿足，企圖從中弄玩議會把戲，追逐私利；但真正為人民大眾的解放利益而服務的黨派或革命家們，也必然要反對任何虛偽的國民會議而為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後者一定是會勝利的，因為這是人民大眾所需要，人民大眾最後一定會擁護他們的。

在爲此種民主的國民會議的奮鬥進程中，人們應當記取西方先進國家議會政制發展的經驗（尤其是俄國的經驗）及我國自己的教訓，藉作指南。有了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和自國的教訓作指南，民主改革運動（連國民會議運動在內）一定要達到勝利的彼岸，——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超民主主義時代正在等待我們呢！

① 許多人都喜歡談憲法，殊不知沒有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憲法是不會產生的。即會產生，如果沒有民主國民會議去監督其施行，也是等於空文。所以作者認爲當前的急切問題不在憲法，而在於能夠制定民主憲法的民主國民會議之召集。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附論潘光旦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李林台爾 (D. E. LILIENTHOL)，以前美國著名的田納西 TVA 計劃的主持者，現時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不久以前曾發表了《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一文 (已由《東南日報》譯載於其十月十九日的《世界知識》欄)。這篇文章，不但它的標題引人注目，就是它裏面所討論的問題也是特別現實而重要的。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不只是一般的科學問題，而且是在這次世界大戰後每個人都深深地感到異常威脅的『原子能與新的戰爭』的問題，這確是一個真正有關於我們全體人類之未來命運的問題。

尤其這一問題由代表美國官方輿論權威的李林台爾提出來表示其『高深』的意見，更值得注意。大家都知道，現時聯合國管制原子能的建議，就全是根據李林台爾的主張，即他在美國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的有名的《報告書》作出來的。所以李氏的主張和思想，不但在美國引起了各種報章雜誌及許多團體集會的附和與討論，而且在國際上也已發生了不少的影響。即以我們的潘光旦教授最近在《觀察周刊》上所發表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的大文 (見該刊第一卷第二期)，也是李氏思想在我國之一種明顯的反應。因此，我們認為對李林台爾的思想和主張有提出來加以檢討之必要。

* 原刊於《求真雜誌》第一卷第八期。

舊調重彈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李林台爾在《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中所表現的思想，表面上雖好像很新穎，但實際上却是一種陳舊論調的再版。

人們總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自然科學在軍事上之突飛猛進的應用，在殘殺和破壞的技術上（如遠射程大炮、潛水艇、轟炸機、坦克車及各種毒氣和細菌等之大規模使用）所發揮之空前巨大而可怖的威力，致使戰後有不少的人們起而懷疑科學、詛咒科學、攻擊科學；其中某些人甚至因此對整個『西方的物質文明』發生了反感和失望，希圖從『東方的精神文明』中，從人性中，甚或從宗教中去探求人類命運的歸宿。因而在第一次大戰後的一個時期內，關於『東西文明孰優孰劣』，『科學對於人生是否有價值』，以及『人類應當怎樣利用科學』等等的問題，在東西某些所謂學者和宗教家們當中，曾一度引起了頗為熱鬧的爭吵。無須說，那些爭吵是毫無結果地過去了。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自然科學在軍事上所發揮的威力當然遠較上次大戰為甚；其所產生的惡果遠較悲慘，尤其是原子能利用的成功（原子彈），更加使人們深刻而尖銳地感到了現代戰爭之極端殘酷和恐怖。而最可恐怖又最難忍受的是：第二次大戰剛告結束，顯然將以原子能為主要武器的第三次大戰，又在開始宣揚並加緊準備起來，似乎整個人類就快要陷進最後毀滅的原子彈爆炸的火海之中了！於是某些人們又舊調重彈，不是歇斯特里地說甚麼現代的科學對於人類成了大問題，甚至成了『魔鬼』*；就是說要挽救這個罪惡與

* 「在若干人看來，現代的技術明明是魔鬼。他們大聲疾呼的反對科學與機器，把牠們一律視作魔鬼」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恐怖的世界末日，只有重新回到宗教的信仰上去（如法國皮杜爾之流）。李林台爾輩要比較聰明一些，他們既不反對科學，也不求援於宗教，他們認為科學或技術的本身無所謂善惡或好壞，問題只在運用科學的「人」，在於人的「信念」與「忠誠」。於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問題便轉變成了一個單純的人的問題了！從李氏的思想只是抽象地單純地在「人」與其甚麼「信念」和「忠誠」等的圈子內打滾，而完全避開戰爭與社會制度的基本關係一點看來，這在本質上還不是與第一次大戰後的「東方精神論者」只在「精神」上兜圈子，屬於同一的範疇嗎？

科學與人類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檢討李林台爾的詳細論據吧！李氏在其《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中開頭就提出了如下的問題：

在我們這時代人們將以餘下的生命不息地與之搏鬥交綏的問題只是：機器與科學究是用來降低人類的地位並且毀滅他們呢，還是用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人們將如何才能運用並指使科學與機器以增進全人類的幸福？

單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這樣地提出問題是有相當意義的。這就是說：由我們人類在無數世紀間費盡了無數勞力與心血所達到的現代高度發展的自然科學（連一切技術與機器包括在內），究竟應當用來增進全人類的幸福，還是用來為少數人謀私利，甚至用來毀滅人類呢？答覆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由全人類的勞力和心血所創造的自然科學，當然應該用來增進全人類的幸福，絕不應用之於替少數人謀私利，用之於毀滅人類。但真正的問題却在於「如何才能運用並指使科

學與機器以增進全人類的幸福？」要正確地解答這一問題，從自然科學的本身中去追求是毫無結果的，只有現代的社會科學才能勝任。但不幸，李林台爾却恰恰避開了社會科學，而專從自然科學或機器中去鑽牛角。他擺出研究家的派頭發問道：

科學是好的嗎？——或者它們是否是魔鬼？

像這樣地發出問題，不僅僅是可笑的玄學，而且是異常幼稚的。固然，現時有不少的人們在詛咒科學，在咒罵科學為魔鬼。同時也有不少人們在歌頌科學，崇拜機器的萬能。然而這些「詛咒」與「歌頌」不是昏聩的、盲目的、就是愚蠢的、廉價的、實在沒有批評的價值。因為自然科學和機器，就其本身說來，是人類在為生存而與自然鬥爭的長期勞動過程中之結晶；換句話說，是人類在與自然鬥爭過程中所體驗或認識出來的關於自然界物質運動的規律。這種規律（自然科學）本身對於人類不但絕非魔鬼，而且是絕對有利的。人類之能以從「自然的奴隸」逐步走向「自然的主人」，就全視對此種規律的認識程度來決定。至於人類之利用自然科學來互相殘殺，互相毀滅，與自然科學本身毫無關係，那完全是另一問題，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

但李林台爾不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評斷自然科學之被人妄用，指出某一階層人利用自然科學以謀私利，貽禍人群，反而專從自然科學的「非善非惡」或「可好可壞」上去大發其議論！例如他說：「機器的本身既非善亦非惡的。只有當人把它用在好的目的上就變好，當人用作壞事時，它就變壞。」像這樣的議論，當然得不出任何正確的結論。因為機器的本身原來只有「好」並不會有「壞」，而它之所以被「用作壞事」，僅是由於某一部份人們藉以謀取私利而已。而某一部份人之所以利用機器謀取私利，「作壞事」，那又是一個

社會的制度問題。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例如在一切財產和機器歸社會公有的制度下），機器就將盡其原來的作用而為全人類的福利服務。但在現今這個不合理的私有財產的社會制度底下，機器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少數人利用來謀取私利（榨取剩餘價值、剝削大多數勞苦群眾），製造戰爭（如帝國主義的兩次大戰），毀滅人類的了。

李林台爾既不從現代社會學的觀點上，將科學或機器與現今的社會制度聯繫起來討論，所以他對科學或機器便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我們可以有所抉擇，……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智慧與決心，如果我們有作為選擇的基礎的充分智識與事實的根據，我們就能控制機器，促使它只服務於好的目的。我們不真是毫無抵抗為不可抗力拖進無底的深淵。」

但根據甚麼樣的『智慧與決心』來『抉擇』呢？李氏沒有任何說明。他只是指出了他在田納西區所進行的 TVA 計劃的效果來作『事實的根據』。意思好像是說，只要全世界都像田納西區利用科學或機器來開闢自然的話，人類就有福了。但他完全忘記了，科學與機器之為人類服務，已經有了好幾個世紀，已經創造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豈止田納西一區而已。但何以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充滿了罪惡與災禍，掀起了兩次的大屠殺戰爭呢？何以人們不早就『控制機器，促使它只服務於好的目的』，反而要把人類『拖進』極殘酷的戰爭『深淵』呢？李林台爾對於這些極關重要的問題都有意或無意地力事迴避，反而提出了下面的議論來：

「我們決不能僱用機器來造福人類，除非我們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作為有效果的基石的，應該對於人類、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不滅的忠誠。技術應該有個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就是這一目的以及為

實踐這一目的方法在決定技術究將促進人類的福祉，還是威脅人類的福祉？」

這一段議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很堂皇的、動人的，但實際上不僅全是抽象的空話，而且是一幅最迷人的煙幕。試問：誰『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而所謂『不可動搖的信念』究竟是甚麼？甚麼叫做『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所謂『技術』的『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又是甚麼？李氏對此絲毫不曾加以解釋。但我們知道，在現今的社會裏（也可以說在長久以來的社會裏）人類是被分成爲利害不同的各種階級的。因而『對人類』、『對生命的價值』、對社會，乃至對一切事物，便有各種不同的『信念』、不同的『忠誠』。要判斷誰的『信念』和『忠誠』不是代表少數人的私利，而是代表人類的福祉，便必須有一個客觀的具體的標準。這標準就是人類中從事勞作和生產的絕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和幸福。如果以現時的美國來說，就是佔全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和農民群衆的生存和幸福。但要想保證和提高這個人類中從事勞作和生產的絕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和幸福，又必須實現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必須將現時的私有制度廢除，將一切財富，一切生產機關（連所有的機器在內）收歸公有，使財富和生產機關從替私人製造利潤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轉變爲替全人類的生存和幸福服務。因此我們又可以說，『轉變私有財產制爲公有財產制』乃是現今『造福人類』的絕對前提。誰是否『對於人有不可動搖的信念』，誰是否具有『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將以他或她是否對於這一切『轉變私有財產制爲公有財產制』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和『深沉而持續的忠誠』作尺度來測驗。因爲只有在這種『轉變』的任務完成了之後，我們才有

可能談得上真正『僱用機器來造福人群』，而不是『僱用機器來替私人製造利潤』。也只有到這時候，『技術』才能談得上『有個道德的倫理的目的』（假如可以說機器有甚麼道德的倫理的目的的話）。『就是這一目的（財產公有制）以及實踐這一目的的方法』（財產從私有到公有之『轉變』），才足以最後『決定技術』來『促進人類的福祉』，而不是『威脅人類的福祉』。

在現時美國絕大部份的財產，絕大部份的生產機關為極少數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所佔有，為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所壟斷的情形下，李林台爾不指出這種『情形』的不合理，絕對避免提及『轉變這極少數人的私產為公產』的問題，而高談甚麼『對於人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甚麼『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甚麼『機器應該有個道德的倫理的目的』，這還不是等於在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面前施放煙幕彈嗎？打開天窗說亮話，李林台爾所謂『對於人類不可動搖的信念』、『對於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實際上不過是『對於美國極少數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美國的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以及對於他們的『生命最高價值的深沉而持續的忠誠』罷了。但在人類史歷的現階段裏，以這樣的『信念』與『忠誠』來運用科學、『控制機器』，則『科學』與『機器』怎能避免『用作壞事』、『威脅人類的福祉』，將人類『拖進無底的深淵』呢？

現代的自然科學，原是資本主義的產品。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現在帝國主義的階段，尤其發展到了現時美國的程度，已經登峯造極了，再也不能前進了，它往後除了替人類不斷製造災禍、掀起戰爭、威脅整個人類的生存以外，再也不能有別的好結果。固然，資本主義在以往的歷史上曾經起過

偉大的進步作用，大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準，創造了輝煌的文化（自然科學正是這一文化的顯著表現），把人類社會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峯。但現在這同一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制動機，正在有組織地降低人類生活的水準，大規模地摧殘人類的文化了（兩次大戰就是鐵證）。因而由資本主義產生的現代自然科學，也就被資本主義有組織地大規模地利用來降低人類生活的水準，摧殘人類的文化，把人類社會倒拖到野蠻的狀態裏去。因此現時擺在我們全體人類面前最最迫切而基本的問題是：怎樣將自然科學及一切生產技術和機器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使其得以自由地無邪地為全體人類的福祉服務？如果做照李林台爾的提問方式便是：

在我們這時代人民大眾將以餘下的生命不息地與之搏鬥交綏的只是：讓『機器與科學』繼續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來降低人類的地位並且毀滅他們呢』，還是毀滅資本主義讓『機器與科學』獲得自由『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增進全人類的福祉？』

但李林台爾是絕對避免這樣地提出問題的。因為他要『忠誠』地維護資本主義的存在，尤其是要維護美國資本主義之獨霸世界。所以李林台爾特地將『機器與科學』從資本主義的關係中割裂開來、孤立起來，以此抽象地去討論『機器與科學』對於人類的禍福問題，以便引導人們來迷惑在他的這一煙幕裏。因此我們必須指出：要使『機器與科學』不致再『來降低人類的地位並且毀滅他們』，而『來增進人類的尊嚴與權威（對於自然界），來增進全人類的福祉』，首先就必須根本改變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尤其是要根本改變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有到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自然科學和機器才能與人類的福祉無間地有機地聯繫起來，不斷

地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原子能與戰爭

李林台爾在《科學與人類的命運》一文中的主要用意，是企圖發揮他對於『原子能與戰爭』的主張。他在前面關於科學與人類禍福的一般解說，不過是替他對於原子能與戰爭的問題安置一個『理論的基礎』而已。他的『理論』已如我們前面所指出，只是一個煙幕彈。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看他是如何『運用』他的『理論』到原子能的問題上吧。他說：

「所有前述的討論，都可以立即實際地運用到原子能問題上來。用實際的說法，今日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把那碩大的原子能從破壞之神的手中奪出來轉而用之締造一個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這段話，表面看來又是冠冕堂皇而動人的。但真正的問題却又在於要怎樣才能使『原子能從破壞之神的手中奪出來轉而用之締造一個和平的新世界』？要正確而徹底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找出甚麼是『破壞之神的手』來，然而李林台爾對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又是故意迴避。但迴避這一問題，便等於『放過強盜大喊捉賊』。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不加以較為詳細的探討和揭露。

現在大家都知道，壟斷原子能的就是美帝國主義。它的代理人，以前是羅斯福，現在是杜魯門及其同僚，不久的將來也許是杜威及范登堡之流吧？但這些代理人都是無關重要的，隨時可以調換的。因此必須將美帝國主義的核心及其經濟基礎找出來。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現時壟斷美國絕大部份的財富、絕大部份的生產機關的是極少數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是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這正是美帝國主義的『核心』，而它們所壟斷的財富和生產機關便是這個帝國主義

的「經濟基礎」，——這才是真正的「破壞之神的手」的所在！

也許還有人要提出疑問：何以見得美國的財政寡頭、托拉斯大王、六十家族的資本貴族是「破壞之神的手」呢？這個問題雖然很複雜，但也很簡單。我們只須舉出幾個具體的事實就夠明白了。例如：煤油大王洛克費爾家族，爲了保持它的煤油業的壟斷權，便不能不到全世界上去爭取油礦和油市場；汽車大王福特家族，爲了保持它的汽車業壟斷權，也不能不到全世界上去爭取有關製造汽車的原料和銷車市場；同樣，銀行大王莫爾干家族也必須到全世界去爭取投資市場。其他如鋼鐵大王、罐頭大王、玻璃大王……等等無不如此。因而這些「大王」們，這些資本貴族們的對外搜求原料，銷場和投資地的傾向綜合起來，便形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不管用和平手段或戰爭手段，都不過是爲着達到實現這種「對外政策」的目的，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都只能替這種「對外政策」服務。威爾遜之領導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爲的是實現這種「對外政策」，羅斯福之領導美國指揮這次世界大戰，爲的也是貫徹這一「對外政策」。美國以外的國家，民族或集團，誰如願遷就它這種「對外政策」或向它表示屈服，就是「盟邦」或「盟友」，否則便是「敵國」或「敵人」，必須用「外交手段」來克服它，如果對方不甘屈服，那就只有訴之於最後的手段——武力了，在現時，這武力的最高體現就是「原子彈」。因此，原子能便成了現時美帝國主義「對外政策」的最強有力的「後盾」，因而人們稱之爲「原子外交」，不是沒有理由的。

固然，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只是美國。在這次大戰前有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以及英、法等。但在現時，德、意、日帝國主義都被打倒了，英、法也向它表示屈

服，至少是表示遷就了。現時還站在與美帝國主義對立地位的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正因此，蘇聯便成了美帝國主義的『眼中釘』。不管克林姆宮主人對白宮主人如何表示妥協，（如解散第三國際、取消無產階級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主張來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政制）不要戰爭；但代表美帝國主義的白宮主人還是死死要壟斷原子彈的秘密，且不斷增造原子彈來威脅蘇聯、威脅全人類。難道這一切還不是鐵一般的事實嗎？

然而李林台爾絕對避免道破這些『事實』，絕對避免指出『破壞之神的手』的真實名字並藏在甚麼地方，只是輕輕的極端抽象的一提之後，便接着敘述他在美國國務院原子能委員會上『關於原子能管制的報告』，『經美國總統及國務院的認同』，已『由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代表巴洛却正式提出為美國政策的基礎』。其結論是：

「美國的建議如能通過聯合國而討論實施的話，它能夠使原子能不用於罪惡的目的而保障世界的安全。」
我們姑不深論美國對於管制原子能的『建議』是一個怎樣的圈套，是一種暫時在外表上緩和局勢來加緊製造原子彈的『緩兵計』。且問：

『聯合國』究竟是甚麼？

我想，只要沒有特殊偏見而稍具現代政治常識的人們，看了『聯合國』這一年半來所表現的各種事實：它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無視（如對印度尼西亞、越南的獨立運動等）；它對於處理戰敗國的無能；它對於國際重大問題的敷衍；以及在它所召開的各種各式的會議上之無了無休的糾紛與爭吵；……究竟所謂聯合國是個甚麼東西，也就不難理解了。

事實上，這次戰後的『聯合國』，不過是第一次大戰後

的「國際聯盟」之一個更壞的翻版而已。就其本質說來，它同以前的「國際聯盟」一樣，仍然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是一種強國處置弱小民族的工具。它與國聯主要不同之點是：後者是操在英國手裏，而前者則為美國所把持。此外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不同點便是：「國聯」是當時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共和國視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分贓機關」，因而站在外面加以攻擊，正因此英國企圖通過「國聯」以種種方法去消滅它；而現在的「聯合國」則被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視為「民主國家的和平機關」，因而加入了這個機關，企圖從中取得「和平」的利益，但也正因此美國企圖通過「聯合國」用種種方法來壓制它，使它就範。因為蘇聯不願隨便就範，便引起了美國與蘇聯間在「聯合國」內的嚴重而不斷的糾紛。這種糾紛的後果，假如沒有世界勝利的革命來干涉，就不免地要陷進原子彈的毀滅戰爭哩。

像這樣的「聯合國」，能談得上「通過」一個甚麼「原子能管制的建議」（不管這建議是出之於美國或蘇聯）而「付諸實施」，「使原子能不用之於罪惡的目的而保障世界的安全」嗎？只要不是政治白痴或民主幻想家，是絕不會相信的。就是李林台爾自己也不敢相信。所以他隨後又把論調轉到「人」的方面去了。我們再看他關於「人」的妙論吧：

「談到原子能，我們就不能不想起那些指導其進展及運用目的的人們。這是一個崇高的責任，而這責任唯有借托給對人類有深邃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人們方才完全可靠。」

但我們又得問：所謂「完全可靠」的「對人類精神有深邃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人們究竟是誰呢？李林台爾在這裏又沒有告訴我們。或者他心目中所指的是像羅斯福一類的人吧？可是這次領導計劃製造原子彈來作戰、來毀滅人類

(長崎和廣島的人民就已經遭到了這種毀滅的慘禍)正是羅斯福本人。這個被美國尊為民主偶像，被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連社會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在內)所歌頌、所崇拜的民主典型領袖尚且如此，那其他的民主人物還有甚麼希望呢？實際上，『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目的的』，絕不是人的問題，而完全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如果在社會一切財富、一切生產機關歸公有的制度底下，任甚麼人來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運用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有利而無害的。但在現社會的私有制度之下，在世界尚分成幾個集團在互相爭奪的情形下，尤其是在美國尚為六十家族壟斷絕大部份的財富和生產機關的局面下，任何人來『指導』原子能的『進展及其運用目的』，都難避免原子能變成毀滅人類的武器。如果一定要找出甚麼人是『完全可靠』的『對人類精神有深邃的忠信以人類利益為首要的』，那就是全世界的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群眾，而在美國便是那個從事生產的工人群眾。然而就是要這個群眾指導原子能來造福人類，來完成這『一個崇高的目的』，也還得把現社會的私有制度，把美國六十家族的財富收歸公有之後，才有可能。但這種『可能』正是李林台爾及其同僚們所絕對害怕而須要盡力避免的。所以李氏最後還是回到他的原來的出發點，他的所謂『抉擇』的公式上去了。底下便是他那篇《科學與人類的命運》的大文的最後結論：

「我們有個抉擇。在一方面很明顯的，在魔鬼手裏的科學能使我們成為奴隸，——也許被飼養得很好，但正因為如此而更其悲慘。在另一方面夠明顯的，可以用科學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但是它將如何被運用，就得決定於人民的選擇，只是基於明白是非的選擇才是真實的。而人們使行選擇的工具，就依恃那

一神聖不可侵犯的過程：智識的傳佈。

因為對人民的忠信必須攜同忠信於事實，忠信於智識，忠信於觀念的自由流傳；簡言之，就是忠於教育以及教育為過程。」

這一大段話，表面上又是極冠冕堂皇之至。但裏面仍然充滿了問題。究竟『魔鬼』是甚麼？甚麼人並在甚麼條件下『才可以運用科學（原子能在內）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甚麼是『是非的選擇』的標準？所謂『智識的傳佈』又指的是何種『智識』？『忠信於教育以及教育為過程』的『教育』又根據甚麼來作教材？這些問題，李林台爾都不曾提出來，只是用些抽象而美麗的辭句以便含糊過去。但我們必須將這問題弄得清楚。我們是最主張『人民的選擇』的，可是必須讓人民知道『選擇的標準』。我們更主張『智識的傳佈』，但先要弄清『智識』的真偽。我們也主張『忠信於教育』，但必得先審查其教材。因此我們應當說，在現時『手裏』掌握着『科學』（連原子能在內）的『魔鬼』，不是別的，正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所堅持的壟斷制度。要想『用科學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夠明白的』，只有在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大眾推翻了帝國主義者及其制度之後，才有可能。讓帝國主義者及其制度利用科學來毀滅人類，還是摧毀前者而使後者來盡量替人類的福祉服務呢？——這便是人民從事選擇的唯一標準。真正的智識必須與這一標準相符合。真正的教育，也一定要以這類真正的智識為教材。因為只有這樣，才稱得上『對於人民的忠信』並『忠信於事實』。但李林台爾却完全與此相反，他專以抽象的、堂皇的、甚至美麗而動人的辭句來掩蓋事實的真象，製造一些虛偽的智識出來，企圖以此來『教育』人民去繼續替美帝國主義及其制度的存在服務。因此我們可以說

：李林台爾的《科學與人類的命運》，實質上說的只是『科學與美帝國主義的命運』。因為李氏很明白，原子能的壟斷權是與美帝國主義的命運緊相聯繫的。所以他才運用了極端抽象而歪曲的妙論並挾着美麗而動人的辭句，來掩飾着美帝國主義保持這一原子能秘密（原子彈的製造）的壟斷權！然而這正是爲了準備新的原子彈的第三次大戰，爲了準備把人類『拖進無底的深淵』！

假如人類要想真正避免將以原子彈爲主要武器的第三次大戰，避免被『拖進無底的深淵』，真正『把原子能作無限制的有利的運用……，來緩和人類的苦難，開發這一美麗而複雜世界的智識，裝備解除奴役及窮困的新的力量源泉』，『來加強人類的自由、來發展人類的天性』；——總括一句話，要想真正避免原子能毀滅人類的戰爭而利用原子能來建設人間的樂園，那就只有人類中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從一切欺騙（李林台爾的欺騙在內）之下覺悟過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用自己的手來剷除這個世界的『魔鬼』——帝國主義，以自己的『建設之神的手』來代替『破壞之神的手』，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此外的一切說法都是騙局，此外的一切道路都是死巷。

現時人類中的絕大多數正在被極少數人『拖』着走向『無底的深淵』，應該是覺悟的時候了！應該是行動的時候了！否則，便來不及了！

潘光旦的『人學』

潘光旦先生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我們在開頭已經指出過，是李林台爾的『思想在我國之一種明顯的反應』。但潘先生除了重複李氏論調，說科學『本身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的見解之外，他特別着重

而大發其議論的是關於「人」的問題。他認為「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在於「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爲甚麼如此呢？因爲：

「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並沒發達到昌明人的身上來，即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濶不切，便是支離破碎。結果是，我們窺見了宇宙的底蘊，却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駛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慾；我們誇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却管不了自己的行爲，控制不住自己的命運。」

接着，潘氏指出「人是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他並列舉「人類學和社會學」（如「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與法律學」）都不曾研究到人；就是「人類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對於「人的研究」雖被他「承認是進了一步」，也還是「犯的」「支離破碎」的「通病」。但這些科學爲甚麼都不曾把「人」研究清楚，使「人認識自己」呢？潘先生指教我們：

「因爲人是囫圇的，整個的，並且是個別的囫圇的整個的。」

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囫圇的，而其所以爲有機，所以成爲囫圇，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又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捨此一切是迂濶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

因此，潘先生極力推崇『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古語，認為『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他並指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即由於『一般人不能控制自己』，致被『野心家所控制』而『產生』的，『野心家』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也『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既然如此，那麼，要怎樣才能辦到各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呢？底下便是潘先生的最後的答案兼結論：

「我們認為解決這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以上就是潘先生新近所發見或所發明的關於『人的學術』的有系統的主要論據。我們這樣不憚煩地把它重述出來，未免有使讀者感到難於忍耐。但爲了讓人們來欣賞潘先生的這一新發明，爲了我們自己便於對這一『發明』來下一個評判，也就不得不如此。

首先，我們將潘先生的論據（如前面所介紹的）稍微檢閱一下，便發見了如下違反初步邏輯而自相矛盾的幾個問題

第一、潘先生既肯定『人是個別的、個體的或整個的』，『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既然如此，那末，試問你又怎能知道『每一別的個人』『不認識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呢？我想，潘先生除了說這是根據『每一別的個人』的言語和行動的表現看出來的以外，恐怕再不能有別的答案吧！假如是根據『每一別的個人』的言行表現可以判斷其是否認識了自己和控制了自己，那就不但我們可以研究自己，而且可以研究『別的個人』了，可以『越俎代謀』了！

第二、潘先生既認定「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各自控制自己，……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既然如此，那你又爲甚麼要來提倡「教育」呢？或者你說的「教育」是指你自己教育自己吧！那末，你自己私下「教育」自己好了，又何必大寫文章來提倡，甚至還要「頗願取得廣大之讀衆」呢？（見《觀察》一卷二期潘氏《致安平書》）大寫文章來提倡「教育」，來「取得廣大之讀衆」，不是等於「越俎代謀」嗎？如果你說寫文章爲的只是叫「每一別的个人」知道去自己「教育」自己，那就更加是「越俎代謀」了！那你不怕人家反唇相譏地說，這是「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嗎？

第三，既是「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而「每一個人和每一別的个人又不一樣」。那麼，潘先生所謂的「人的學術」，便成了「每一個人」所「研究」出來的「人學」，而和「每一別的个人」所「研究」出來的「人學」「又不一樣」了。這樣說來，我們這地球上有二十萬萬以上的「個人」，那就將有二十萬萬種以上的「人學」了！潘先生對此不感到一點「迂濶不切」或「支離破碎」嗎？

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麻煩潘先生，也許有人會感到這是我們在同潘先生開玩笑，但實際上正是潘先生的「人的學術」在同「每一個人」大開其玩笑呢！倘使潘先生這套「人的學術」只在私下裏閒談閒談，不把它發表在《觀察》上，不「以爲文化問題癥結端在於此，亦頗願能取得更廣大之讀衆」的話，我是絕不願在這兒來浪費筆墨的。但玩笑也只限於此。現在還是讓我們認真地來略談一下關於「人」的問題吧。

「人」究竟是甚麼？

「我們前面已引過潘先生的定義，他說「人是圓圖的、整個的」，因而一個人除了「自己認識」，別個人對於他或她是莫

明其妙的。不幸，真正令人『莫明其妙』的正是潘先生這個『人的定義』。我們且問：可稱『囫圇的、整個的』，難道只限於『人』嗎？其他的動物（如牛、馬、犬等）甚至無機物（如太陽、石頭、鐵塊等）就不能稱之為『囫圇的、整個的』了嗎？又難道凡是所謂『囫圇的、整個的』，就不能從外面來認識而一定要自己來認識自己嗎？這些問題，當潘先生下『人的定義』時竟沒有想到，這證明他自己的思想未免太『囫圇』、太『整個』了！

不錯，潘先生還提出了另一個定義說：『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這定義比起那個『囫圇的、整個的』來確要高明得多，但也並不見得更正確些。因為所謂『個性』，所謂『自作主張』的也並不限於人，即其他較高等的動物，如猩猩或類人猿也多少具有這些特點的。即以人來說，在原始民族共同體的人們便很少『個性』，很少『自作主張』的。『個性』與『自作主張』，只有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才獲得較高度的發展。而且在現代同一社會的人們當中，各個人的『個性』，和『自作主張』的發展程度，也是大有差別的。最後，就是一個人，他的『個性』與『自作主張』也往往因環境的變遷與年齡的增長而有改變和消長的。總而言之，專用『個性』與『自作主張』來作為『人的定義』，不僅僅是不夠的，而且是錯誤的。因為人的『個性』與『自作主張』最後說來是由人以外的客觀環境，由社會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換句話說，人的『個性』與『自作主張』，根本就是社會的產物。所以要正確而深刻地認識『人』（連自我認識在內），只有正確而深刻地從認識『社會』，認識社會的各種關係及其對於『人』的影響。

老弗蘭克林早就告訴過我們：『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是對於『人』所下定義中的唯一正確的定義。我們只有

從這一『人的定義』出發，才有可能達到對於人的認識，並有可能尋出各種各式的人們的觀念、情感、願望、言語和行動等等之各自不同的原因，因而獲得理解。

由於人的製造工具，因而能自行生產（即不專賴自體的器官而利用工具從自然界取得並改造其生存的必需品），並在生產過程中創造了生產關係，構成了經濟基礎，且在這基礎上樹起了政治的、法律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物。總而言之，由於人能製造工具，便因而創造了特有的人類社會。而且工具愈發展，社會也就愈進步。自從這一社會形成和發展之後，人不但只能生活在這一社會之內，而且一切觀念、一切言行，都絕不可免地要受這社會內一定關係的約束。換句話說，一定的『人』乃是一定的『社會』之產物。潘先生所謂的『個性』和『自作主張』更不過是社會的派生物而已。正因此，某一定的社會便產生某一定的人的『個性』和『主張』。另一方面，自從社會被分成階級（這是由於私有財產制發生的結果）之後，屬於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們，由於利害關係、生活環境、習慣、傳統及其所受的教育等等之不同，因而有各種不同的『個性』和『主張』，有各種不同的觀念、情感、志趣、願望和行爲等等。例如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便具有它獨特的意識形態，雖然這個階級內部的各層人們的精神生活是有些些差異的，但在本質上總是大體類似的。同樣，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至於某一個別的人，其意識與感情往往從其所出身的階級而轉向另一階級，自有其更為複雜的因素，但也只有從社會的關係上才能找到解釋。

如果我們理解了上敘的基本觀點（這是現代的社會學——歷史唯物論所提供的觀點），那我們不但可能『認識自己』（也只有從這觀點出發才能真正認識自己），而且可能

認識別人」。我們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不管「人是囫圇的、整個的」，也不管「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更不管「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別的個人不一樣」，假如我們能正確而靈活地、即辯證地運用這一觀點去觀察某人，我們不但可能從他的思想和行動的表現中「認識」他，而且可能指出他的思想和行動的客觀原因及其可能趨勢。

即以潘先生所指出的野心家或天罡星的希特勒來看罷。據潘先生說：

「希特勒有種種慾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慾望。他自己不知所以用意志來控制這慾望，反而無窮地施展出來，一任這慾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愈見得大，控制了德國不夠，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

潘先生對於希特勒的這種「認識」，我們且不說他是「越俎代謀」，至少是有一點「智能不足」的嫌疑。因爲「慾望」是每個人都多少具有的。而慾望多的人，也一定由其環境所養成。至於慾望之能否達到，更要由客觀條件來決定。所謂「野心」也差不多如此。「愛權柄」亦相類似。希特勒無疑地是有種種「慾望」，有絕大的「野心」，是極「愛權柄的」。但其原因在那裏呢？尤其重要的是：何以德國成千萬的人們也跟着希特勒的「慾望」、「野心」和「愛權柄」方面自願或不自願地受他的「控制」走呢？更有進者，何以現時英國和美國不產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類的人物，而只有邱吉爾和羅斯福一類的角色呢？難道在英美就沒有多「慾望」，具「野心」和「愛權柄」的人嗎？或者可以依照潘先生的公式來解釋，邱吉爾和羅斯福或其他的人們是全能「控制」其自己的「慾望」嗎？這些問題，我想，依照潘先生的「人學」是絕對無法解答的。但如果根據我們前面所指出的社會

學的觀點來看希特勒，就不難明白了。

希特勒的『慾望』、『野心』和『愛權柄』，絕不是憑空而來的，而只是德國那個社會的產物。大家都知道，德國的資本主義在西方是後起的，正因此沒有能像英法那樣奪取了廣大的殖民地市場；但另一方面，德國自普法戰爭之後，經濟上突飛猛進，深深感到了國內市場的狹隘，因而迫切地需要向國外爭取殖民地市場；——由此便形成了以前威廉第二的『野心』，因而發生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一次大戰後失敗的德國，不但原有的一點殖民地全被剝奪了，就是它本國的土地也被割了不少；但它的生產力卻不會被摧殘，所以經過短短的時間後又恢復起來，於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市場更感到狹隘了。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條路：就是德國無產階級走向政權，在歐洲建立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以此推進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把全世界變成一個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的整體，到那時就根本無所謂市場了。戰後德國的無產階級曾幾次站起來企圖向這一條路奔跑。但這對於德國的資產階級是極端害怕的。所以這個階級的領導層，——財政寡頭和托拉斯主們便深深感到須要一種特殊的力量來摧殘德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種情形下，希特勒的『種種慾望』、『野心』和『愛權柄』便應運而生了，他的『納粹主義』提出來了，他的『納粹黨』也組織起來了。結果，希特勒得到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資助，獲得了陷於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底渣滓的擁護；最後，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背叛與無能，讓他輕易地踏上了政權，建立了極權政制。而希特勒的『野心』就如此這般地獲得第一步的實現了。但德國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而希特勒又向英、法提出了德國的『生存空間』問題，要同它們分沾殖民地市場。英法當然絕對不願意。因而就掀起

了第二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其結果同第一次大戰一樣，德國仍然是失敗，並且失敗得更慘。這難道還不是事實，不夠明白嗎？因此，我們可以說，希特勒的「慾望」、「野心」和「愛權柄」，都不過是德國資產階級的「慾望」、「野心」和「愛權柄」之一種集中的反映和表現。換句話說，希特勒的意識和言行都不過是德國資產階級陷於極端矛盾（生產力與市場的矛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絕望的、孤法一擲的產物。假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生在英、美，縱令不成爲邱吉爾和羅斯福，也會是他們的同僚或擁護者的。反之，如果邱、羅生在德、意，縱令不成爲希、墨，也可能成爲他們的同僚或擁護者。這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我們關於希特勒的「野心」說了這許多話，對於本文似乎有點不相稱，但爲了揭露和反證潘先生的「人學」之虛偽與無用，是很有意義的。因爲解釋了希特勒的「野心」的秘密所在，則關於其他「別的個人」（如墨索里尼、羅斯福、邱吉爾乃至斯大林等）的「野心」或「慾望」也就不難依法去「認識」了。因此，我們有理由和權利說：現代的科學不僅「研究」了「物」、「認識」了「物」、而且也「研究」了「人」、「認識」了「人」。屬於前者的是自然科學，屬於後者的便是社會科學。潘先生不懂得這種社會科學，又不願努力去研究這種社會科學，即大嘆「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責備「人不認識自己」，這又未免犯了一點「智能不足」的嫌疑哩。

也許潘先生會反問說，既然研究了人、認識了人，何以「人」還不能「控制自己」呢？但這又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從社會的研究上才能獲得解答。簡括地說來，自從人類社會發生了私有制度，分成了階級之後，「控制物」（社會的

財富)的少數人們，自己也就被『物』(社會的制度)所『控制』，並以此『控制』了絕大多數的人們。例如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無論是那一階級或階層的『人』都免不掉要受這一制度的『物』所『控制』。要想全體人類從這一制度的『物』的『控制』下解脫出來而達到自由地、合理地『自己控制自己』，並以此自由地、合理地去『控制物』，那首先必須摧毀這一制度，讓絕大多數的人們獲得提高生活和文化水準的先決條件。假如人類社會階級對立全消滅了，『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的物質條件完成了，那時全人類也就自然而然地『每一個人』都會合理地『認識自己』、『控制自己』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恰好與潘先生的結論相反，解決『人的控制問題的基本途徑』，正『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換句話說，正在於以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現時最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要教育的話，那就是『教育』絕大多數的民衆為這種改變舊制度與實現新制度的歷史任務來奮鬥。但依照潘先生的『人學』來『教育』人民大眾，那只有誘導民衆繼續忍受現存社會制度的『控制』，並被拖進原子能戰爭的無底深淵。在這一點上，潘光旦先生與李林台爾先生兩人的文章所能盡的作用是殊途同歸的。

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

(一九五〇年一月)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曾經寫道：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歷史上數見不鮮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的學說所遭遇的一樣。在偉大革命家活着的時候，壓迫階級經常的緝捕他們，對他們的學說極端的憎惡，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在他們死了之後，便企圖把他們作為無害的神像，所謂把他們加入聖人之列，略略表彰他們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闕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滅這個革命學說的鋒銳，使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者，正是用這種方法來「製造」馬克思主義。他們忘記、拋棄、曲解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那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份，提到第一位，而加以頌揚。」(《國家與革命》第一至二頁)

* 本文原本寫於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間。後來，由於被迫離開香港，沒有寫完就放下了。一直到最近清理舊稿，才把這篇三十多年前寫的文章找出寄來。作者認為「文內對毛澤東這個「理論」的批判（尤其對毛關於中國的歷史發展，以及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錯誤判斷），都保有原來的價值。至於本文沒有寫完的部份，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文化」，後來毛在這方面的實踐，即在1949年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年的路綫（具體表現在《共同綱領》中），很快被迫加以改變，已足夠證明毛的有關主張的破產，經不起證驗了。」

列寧所描敘這一極端可鄙和險惡的情景，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放肆姿態在全世界範圍內重演出來！主要不同之點：在當時的「工人內部運動」導演背叛角色的，是與列寧敵對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特別是俄國的孟塞維克，而至今天却是自稱列寧的繼承者的斯大林及其黨徒（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在現時的中國，甚至整個的東方，毛澤東已成了這一串演背叛角色的第一號「明星」。

毛澤東自得到斯大林的指示發明其「新民主主義」，並著之為《新民主主義論》後，不但由「中國共產黨」（這是共產主義其名而背叛其實的政黨）大肆宣傳，並已由該黨當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而寫在它的黨章上面了。（見《中國共產黨黨章》的「總綱」。中共是沒有黨綱的，承認「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就等於承認毛澤東的一切寫作或毛澤東本人為「黨綱」！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古怪現象。）隨後，更繼續獲得了各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或「民主人士」所「接受」，所擁護。（以前，這些「黨派」或「人士」的領袖們，對於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與思想，差不多都是「極端憎惡，極端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指出李濟琛、黃炎培、張東蓀、馬叙倫、羅隆基、章士釗……一批人的名字就夠了。）迄至最近，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甚至通過所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中共及各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所指派的代表會議）而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了。（見《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序言」）雖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較之以前第二國際叛徒們的「機會主義」要遠為淺薄與荒唐，但在「中共」的軍事冒險空前勝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偽裝之下，已經發生了鉅大的影響，迷惑了千百萬的群眾，我們迫於歷史的責任，為了將中國的

工人階級、貧苦農民及一切革命份子從「新民主主義」的騙局下解脫出來，爲了儘可能挽救中國免於未來的巨大災難，對於毛澤東這淺薄而荒唐的「新民主主義」，不得不進行較有系統的檢討和批評。雖然，這一檢討和批評，因各式敵人的迫害而拖延了時間，但現在來完成還是不算過遲的。

「中國歷史的特點」究竟何在？

毛澤東爲了建立他的「新民主主義」的「體系」，首先便希圖從中國歷史上去搜尋一些「特點」，來作爲他的「歷史根據」。下面便是他所發明的「特點」的總結：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爲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見《新民主主義論》第三節「中國的歷史特點」）

這一「總結」，雖然是一種純粹抽象而又十分幼稚的圖式，但毛澤東對於「中國歷史特點」與「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之曲解與無知，却已充分給暴露出來了。讓我們先從「中國的歷史特點」說起：

「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單只這一圖式，就已足夠暴露毛澤東對於中國歷史的一般發展，（且不說它的「特點」

吧！）是如何地外行！實際上，秦以前的社會和秦代及其以後的社會，是有着極大的區別的。毛澤東所謂周代社會，即西周、春秋和戰國時代的社會，固然是一種封建社會；但秦始皇的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正是建立在此種封建社會的破滅上，即建立在被消滅的戰國諸侯的封建割據的廢墟之上的。——這是一個絕對不可否認的劃時代的歷史事實，是理解秦以後的歷史及其特點之鎖鑰。可是毛澤東對此不但毫無所知，却反而加以曲解道：「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見毛著《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四頁）讓我們問：如果「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也稱之為「封建國家」，則「封建國家」在社會學上的定義又是甚麼呢？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與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說，所謂封建國家，只能是各個諸侯互相對立的分治的（即反中央集權的）國家，或「諸侯割據稱雄的國家」——這在現時已成了一般的常識。然而毛澤東却恰好缺乏了這種常識！所以當他特為「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指出「各主要特點」時，雖然背誦了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的公式，却完全沒有提到「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乃是封建社會在「政治制度」上的主要特徵，是「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之一種必然的反映。因而他昏瞶地把君主「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即在摧毀「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並與之對立的國家），也稱之為「封建國家」了！如果依照毛澤東的說法，則秦始皇之併吞六國，摧毀各個諸侯的封建割據制度，變封建為郡縣，建立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政權，都沒有任何客觀條件為其基礎，而成為毫無意義的任意胡爲了？！

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凡是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絕不是任何英雄好漢的任意胡爲所造成的。事實上，秦始皇之摧毀戰國

的封建割據，而建立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政權，完全是由於：自春秋戰國以來，手工業與農業生產之生長，商業資本之發展，貨幣流通範圍之擴大，原有公社土地之變成自由買賣，社會階級之分化與新的階級之形成，等等客觀條件所促成的。換言之，秦始皇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乃是由於春秋戰國以來，商業資本的鉅大發展，浸蝕了「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基礎之歷史邏輯的產品。這在客觀上，正是為商業資本肅清了道路，替它準備了相當統一的國內市場，這從秦始皇之統一文字、貨幣與度量衡等設施上，異常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參考一下歐洲歷史發展的事實，那就更為明顯。歐洲自經過「十字軍東征」之後，特別是經過新大陸與至印度洋航路的發現之後，商業資本獲得了空前鉅大的發展，因而中世紀的「封建諸侯的割據」制度急劇地倒塌了，代之而起的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已絕非中世紀的「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反而是在摧毀這種封建國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此種君主專制的時期，並不等於封建社會時期，而是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因此，馬克思曾稱此時期為「前資本主義時期」。中國歷史，自秦代至清末，在本質上正類似歐洲此種「過渡時期」，所不同者：在歐洲的「過渡時期」只經過二百餘年，而在中國則拖延了二千餘年。這正是中國歷史長期停滯的具體表現。

毛澤東說：「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就長期停頓起來。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同上引書三至四頁）「長期停頓」，如果就秦以後的歷史說，自然是事實，甚至還可算是一個「特點」。但毛澤東將秦以前的歷史也放在「長期停頓」之列，那就完全謬誤了。周以前的歷史，我們這裏姑且不提。（毛澤東所說的「奴隸制度」雖未指出屬於何時代，但一般說，像古希臘羅馬那種奴隸制度，却還沒有根據證明在中

國歷史上存在過。)但自西周經過春秋至戰國，這一段歷史，不但不是「長期停頓」，而且是逐步發展的。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時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盛時期，而戰國則是這一制度發展到了頂點，同時又趨於衰落的時期。這不但由春秋戰國的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經濟之逐步發展，獲得了證明；即春秋戰國時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種蓬勃煥發的思想文化，也足為佐證。而毛澤東却以「長期停頓」四個字，將中國歷史上這一發揚光大的上升階段完全抹煞了！

毛澤東不但抹煞了秦以前的歷史發展，即對於秦以後的歷史「停頓」也是莫明其所以然的。因為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內專論秦以後的歷史特點一章（標題為「古代封建社會」）中，雖然說到秦以後的歷史如何「停頓」，却完全未曾提到這種停頓的根本原因。但說明這種根本原因，對於瞭解秦以後的歷史特點，是極關重要的。就秦所建立的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政權來說，在某種限度內確已為商業資本開闢了道路，為它準備了一個國內市場。可是，商業資本要走上工業資本，絕不是在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範圍內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個廣大的國際市場。歐洲的商業資本主義能夠過渡到工業資本主義，根本原因就是由於美洲與向東方航路之發現，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整個地球為範圍的國際市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及其他文獻中，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解釋，就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秦代及以後的中國，還根本談不到這個國際市場的條件。所以當時的商業資本，根本沒有進至工業資本的可能。因而便「長期停頓」了下來。這不僅中國如此，所有古代的「文明國家」，從巴比倫、埃及、印度、乃至古希臘和羅馬，雖然都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商業資本，但因為這個根本條件（國際市場）之缺如，都遭受了同樣的、甚至更壞的命運。

正因為商業資本不能進到工業資本，根本沒有前途，它就

只能轉入農村，去收買土地，放高利貸，壟斷農產品，與地主、官僚糾結在一起，形成整個君主專制的支柱，空前殘酷地去壓榨農民。（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會裏，壓榨農民是要受「自然經濟」的限制的。）迄至農民群眾被迫到無法生存時，於是暴動起來了，且曾多次形成了全國範圍的農民戰爭。（這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會裏，是不會發生過的。）每一次農民戰爭的結果，雖往往推翻了舊王朝，（這王朝也常是被商業資本所腐蝕了的。）但由於缺乏新興城市階級的領導，（這又是由於商業資本轉入農村，不能在城市發展工商業，形成一個像歐洲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那種城市「第三等級」的結果。）致被統治階層內的某一部份所利用，有時為外來落後民族的侵略者所利用（如滿清），因而又產生了新的王朝。從農民暴動中湧現出來的新王朝，起初也多少遷就農民的壓力，打擊舊官僚地主，抑制商業資本的跋扈，減輕租稅，甚至承認農民在暴動中所爭得的某些權利（土地權在內）。但經過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之後，商業資本又抬起頭來，與新興的官僚、貴族、地主重新結合去壓榨農民。經過一定時期之後，於是新的農民暴動又重演出來了。這種由商業資本無出路而轉入農村所造成的循環的農民暴動，及其後果所促成的「改朝換帝」，便是秦以後的歷史所以「長期停頓」之最主要的原因，及其最基本的特徵。正因此，長期積累下來的歷史沉澱物：專制主義的毒害，官僚的橫暴腐化，封建式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以及極端保守與野蠻的積習，成為一份「遺產」，一直到今天沉重地壓在全民族的頭上。

毛澤東看到了秦以後農民暴動的事實，曾經強調地說：「只有這種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見全上引書第五頁）這不但沒有證明毛澤東認識了秦以後的最基本的歷史特點，反而暴

露了他自己的農民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固然打擊了官僚、地主、商業資本的統治，（可不是『封建的統治』）却並不會『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反地，『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常是大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把整個的社會經濟基礎倒退到更原始的狀態裏去的。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農民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固然是主要的社會生產者，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主要負擔者，是最受剝削和最被壓迫的階層。但因為它所代表的手工生產方式，及其所具有的一切落後的保守根性，是無法推動社會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所以它屢次被迫而舉行的暴動，既不能解除自身的鎖鑰，更無法發展社會的生產力，其主要的歷史作用，只能是替統治階級的腐敗機體輪迴輸血，使其苟延生命而已。要想真正使『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來『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就必須在一個代表更進步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城市階級領導之下，這樣的階級，在以前的西歐（如英法）是資產階級；在現時的中國，就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徹底粉碎壓榨農民的一切舊制度，創造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來代替它，才有可能。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了秦以後的歷史特點，並從循環的『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痛苦經驗中，所能得出來的唯一教訓。毛澤東正因為不瞭解這特點和教訓，所以長期地，並愈來愈深地陷在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泥潭中。（我們在下面各章中，將逐步暴露他這種反動思想的廣度和深度。）

什麼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

毛澤東對於『中國的歷史特點』之無知與曲解，既是如此，那他對『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之判斷，其謬誤又究在何處呢？

首先就在於他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也當作構成『社會性質』的基本因素，套在『現時中國』的頭上。這不

但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也是違反了一般的常識的。所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只能是表示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於另一國家或民族的隸屬或依附的關係。可是，絕不能拿這種隸屬或依附的關係來判定那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性質。要判斷某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能從那個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構成的經濟關係來決定。同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許多國家，他們中間的經濟基礎，往往大有差異，因而其社會性質也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加拿大與阿比西尼亞，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都同樣算是殖民地國家，但前者的社會性質，早已是資本主義的，而後者則還停留在半封建的，甚至半氏族的階段上。又如土耳其與阿富汗，直至今天都還是半殖民地的國家，但前者的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佔了優勢，而後者則尚停滯在封建關係佔優勢的狀態中。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同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中，也因其經濟上的發展，而表現其社會性質的變化。十九世紀初與廿世紀初的加拿大，其地位都同樣是殖民地；但在十九世紀初的加拿大，很難談得上甚麼資本主義，而到了廿世紀初它却已明顯地成爲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土耳其，在十九世紀中葉即已淪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但在那時它還是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而現在，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已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佔優勢了。假使我們把這個地球上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按照它們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列出一個表來，那我們將看到從原始氏族式的、半封建的、落後資本主義的，一直到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的一幅歷史逐步上升的畫圖。如果依照毛澤東的說法，不但赤道非洲那些氏族式的殖民地，封建關係佔優勢的阿比西尼亞與阿富汗，資本主義佔優勢的土耳其與印度，以及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加拿大，都要被列在同一的社會性質的水準上（統統名之爲「殖民地」、「半殖民地」，甚或「自治領」的社會），而且一百年來的加拿大、印度和土耳其

等國家的社會性質，都不會有過任何的變化了。想不到自稱「馬列主義者」的毛澤東，其荒謬，其缺乏常識，竟達到如此的地步！

至於毛澤東說：「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如果依照這種說法，那末，中國就不是「半封建的社會」，而應當稱為「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了。然而這還不過是毛澤東的思想混亂與自相矛盾的表現之一，他的真正荒謬還不在於此，却在於「封建制度佔優勢」的斷語的本身。

我們試問：「封建制度佔優勢」的證據究在那裏？毛澤東不但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內沒有一句提到，即在他那《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內專論社會性質的一章中，（標題為「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不會明白告訴人們。他迫於不可否認的事實所指向的，反而是：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曾經對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分解的作用。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及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七頁）

「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乃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是毛澤東自己也不敢否認的。但既然這一「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那又怎能談得上「封建制度佔優勢」呢？！毛澤東的「矛盾邏輯」，真是愈來愈稀奇！但尤其稀奇的還是底下的話：

「於買辦階級之外，帝國主義還需要一種更大的社會力量，作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這種社會力量就是中國的封建殘餘。」（見全上引書第十頁）

既然號稱「封建殘餘」，怎麼能成為「統治中國的支柱」？！更怎能在「現代的中國社會制度」裏「佔優勢」呢？！無論毛澤東如何精於詭辯，他總是無法跳出他自己所造成的這種「矛盾」的。不錯，毛澤東還有一個重要的，或者算是最後的辯解，那就是：

「封建時代的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與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顯著的優勢。」（全上引書第十二頁）

我們先要問：甚麼是「封建剝削的根基」？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回答，那就只能是：「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這一封建制度的基礎。但毛澤東已經承認這一經濟基礎「已被破壞了」，那就等於承認「封建剝削的根基」已被破壞了。因此，便絕不能說「地主階級」還「保持着」「封建剝削的根基」，只能說它「保持着」封建式的剝削方法而已。中國現代的地主階級，對農民保持着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無疑地是真實的。不但地主階級如此，即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工人及其他勞動者，也採取了這種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這是一切落後國家的普遍而共同的現象。但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絕不等於封建制度本身。因而即令這種剝削方法「與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顯著的優勢」，也就絕不是等於「封建制度佔優勢」了。何況「買辦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正是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之構成因素呢！毛澤東希圖藉「封建剝削」來證明他的「封建制度佔優勢」這一詭辯，一經揭穿之後，只是愈加暴露他頭腦昏亂與其邏輯自相矛盾罷了。

實際上，中國典型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早在二千餘年前即已被秦始皇摧毀了。封建制度的物質基礎——公社式的土地制度，早已變成了商品。固然，在一個漫長的時期內，「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還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優勢」。但自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不僅此種「優勢」激劇地被破壞，而且現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其交換方法，也逐步地被移植過來，逐步地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增加它們的作用，顯出它們的威力。換句話說，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資本主義的因素，逐步地打擊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那種前資本主義因素的「優勢」地位，並企圖取而代之，——這一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新工業獲得巨大的發展後，便已確定地完成了。自從那時以後，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無論從那一方面，都可以顯出資本主義因素的「優勢」來。在金融方面，現代式的銀行（這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樞紐）完全壓倒了那些前資本主義式的錢莊和匯號；在工業方面，較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固然還很幼稚，但機器的生產品（如棉紗、棉布、絲綢、針織品、搪瓷、煤、鐵……乃至麵粉、香煙等），顯然已支配了整個的國內市場；在運輸上，帆船、手輪車，甚至人挑等的事實，雖然還普遍地存留着，但火車、輪船、汽車、甚至飛機，已經成為轉運重要物資和旅客的主要工具了；在交通上，有線電、無線電、海底電線、長途電話、自動電話，以及通過火車、輪船、飛機等攜帶郵件的郵局，更是成了全國主要的通訊網。至於在農村方面，生產的方法固然還停滯在手工式的狀態裏，但其生產品却已普遍地商品化了，我們的農民不僅要為國內市場而生產（如食糧與原料等），而且還必須為國際市場而生產呢。根據這種種事實，難道還不夠充分證明：資本主義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已經「佔着顯著的優勢」嗎？因此，中國現時的社會性質，不但絕不是甚麼「封建制度佔優勢的」或「半封建的」，反而是資本主義因素佔着「顯著的優勢」，因而是「資本主義的」。不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比起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來，遠為「落後」而已。然而這正是東方落後國家（連沙俄在內）的資本主義的特徵。即以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是經過逐步發展才進到現在的高度水準的。例如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和同世紀中葉的美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但它們那時的資本主義較之它們現時的資本主義，不但是遠為落後的，甚至是不可比擬的。將現時最高度發展的資本

主義國家，來作為測量歷史上初期的以及東方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尺度，那是完全違反了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其判斷或結論，不可免地要變成荒唐無稽。

中國社會各階級與中國革命的性質 ——不斷革命

〔這裏原稿失去十三頁，是論述資產階級的反動和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作者認為把他起草的《中國革命共產黨綱》作為本卷附錄，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因為《中國革命共產黨綱》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已作確切的分析了。——編者按〕

.....

……如沒有廣大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農和僱農）動員起來積極參加鬥爭，沒有排山倒海的普遍全國的土地革命浪潮，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是不可想像的。但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在經濟上的孤立性、分散性，地域上的隔離性，心理上的偏狹性，以及其各層份（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等）間的利害關係之不一致等等——這些缺點綜合起來，使農民本身在組織上絕難成爲一種全國規模的統一集中的力量，在政治上更無法提出正確的政綱（連他自己的土地綱領在內），導演任何獨立的政治作用。在中國現時城市工商業經濟關係已經支配了農村的條件之下，農民只有受城市階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團結，才能集中，並在政治上和行動上獲得指揮和監督，以補充其生來的缺點，而發揮其偉大的革命力量。忽視農民偉大的革命優點，固然會陷於教派主義（機會主義的變種）的死巷，但忘記農民的嚴重缺點而誇張其革命的作用，更不可免地要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而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主義」，正是他不瞭解或忘記了農民的嚴重缺點所產生的。

● 毛澤東在實際上雖堅持着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主義，但他在口頭上總算承認了「中國無產階級有他許多特出的優點，使他在中國革命中能夠成爲領導的力量。」（全上引書二三頁）可是當他描寫無產階級的「特出優點」時，不但十分膚淺，而且是異常虛偽的。其膚淺的地方，可以從他所描敘的下面兩點看出來：「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別的任何階級來得特別堅決和特別徹底。……」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於剛從農民破產出來的成份佔大多數），便於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全上引書二三至二四頁）這裏面既不會清楚提到無產階級對於「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的確切關係，更沒有指出他在全國經濟命脈，即生產和交通運輸中所佔的決定作用。其實，中國無產階級不僅是受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的殘酷壓迫，而且受他們的殘酷剝削的。（其中一部份是受帝國主義者——外國廠商——的直接剝削，而其他一部份則受那些和帝國主義競爭的本國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另一方面，中國無產階級不但「同廣大農民有一種親密的聯系，…便於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同盟。」而且農村經濟的改革，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對於他們的生活改進具有重大的影響，特別重要的是：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如不幫助農民謀取徹底解放，並與後者結成鞏固的同盟，是根本談不到的。因此，摧毀帝國主義的枷鎖和封建殘餘勢力，完成「民族獨立」與「土地革命」，無產階級無論在自身的利益、同盟者的利益以及全民族的利益上，都是絕頂需要的。同時，由於無產階級在生產上和交通運輸上都控制着國家一切經濟系統的神經中樞，由此使他有可能（也只有他有可能）把分散的農民及一切勞苦群眾團結到自己的周圍來，領導他們向着共同的目標——民族獨立與土地革命——去進行堅決的鬥爭。

至於毛澤東描繪無產階級第二個「特出優點」說：「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爲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的階級。」這幾句話，那就不只是膚淺，簡直是完全虛僞的了！不錯，「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這本應成爲他的一個「特出優點」。但異常不幸，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即落在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俄國孟塞維克的變種）的操縱之下。斯大林以「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通過「國共合作」的方式，把中國無產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的俘虜，在第二次革命中，不僅癱瘓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而且摧毀了這個階級中一部份積極份子的肉體！一直到今天，毛澤東還是奴顏婢膝地秉承着斯大林的機會主義，用「四個階級（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有系統地在愚弄工人，壓抑工人！！但不管中國無產階級已往及現在，如何遭受了並還在遭受着斯大林所指使的「中共」的欺騙，他在中國社會經濟及階級關係的物質條件上，始終是革命的基本動力，始終是革命的唯一領導力量。只有當這個階級擺脫了毛澤東黨的羈絆，徹底地覺悟過來，堅決地站立起來，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領導廣大農民及城鄉一切勞苦群眾去進行真正的革命鬥爭，把政權奪在自己手裏，建立自己的專政，中國民族民主的任務，才能獲得徹底的完成。

正因爲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是革命的唯一領導力量，只有他才能夠領導農民及一切勞苦群眾起來進行堅決的鬥爭，奪取政權，以此解決民族民主的任務，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因爲「無產階級一經奪取政權後，便絕不能以解決民族民主任務自限，而必須將社會主義的任務，（即沒收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銀行、礦山、森林、土地及房屋爲國有）提出於議事日程加以解決，以此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尤其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完全陷入死港，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已

爛熟的現階段，中國革命民族民主任務的解決，絕對不是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已絕沒有可能）清除道路，而只能是替社會主義的建設開闢前途。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歷史階段或時期來隔絕，而是由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便是「中國革命的性質」。這個「不斷革命的性質」，早已由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無比準確地指示出來了。」（詳見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黨綱」八至九頁）

就俄國當時革命的直接任務說，乃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即徹底剷除沙皇制度和解決土地問題。因此，孟塞維克根據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便認爲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堅持無產階級應與資產階級合作，與之成立「聯合陣線」，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然後再來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無須說，這是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劃了一道「萬里長城」（列寧語）但列寧認爲俄國資產階級既不是革命的動力，不能解決民主的任務，而這一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來完成，所以他頑強地反對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主張，反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形式的「聯合陣線」。他在二月革命後，更堅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公社式的政府（即無產階級專政——見《四月提綱》），以此來完成民主的任務。正由於列寧的堅持，俄國無產階級能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不但因此徹底完成了民主的任務，而且隨即將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到議事日程加以解決，把俄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途程。於是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地不斷地聯繫了起來，並替其他所有落後國家的革命發展標示了一個走上勝利的唯一方向。而中國第二次革命之慘遭失敗，正是完全違反了這一方向（即希圖與資產階級合作完成「國民革命」，而置社會主義的革命於遙遠的將來）

所造成的。

但毛澤東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既茫無所知，而對於他自己曾經參加過的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慘苦經驗，又完全曲解。所以他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就只能根據他十分有限的知識，根據他對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任務和動力的機會主義邏輯作出結論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全上引書三二頁）「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論》第五頁）這顯然是俄國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階段論」（即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劃爲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或「過程」）的中文翻版，其稍異之點僅在於：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民主主義」上簽了一個「新」的商標而已。

「新民主主義」的根源

俄國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其「階段論」即此種主義的結晶），經過了列寧長期的分析與精細地駁斥，以及經過了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史考驗，已經徹頭徹尾地被宣告破產了。何以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毛澤東，還要死死將這一已經徹底破產的機會主義搬運到中國來呢？！這是值得我們特別化點時間來加以研究的。

據毛澤東解釋他的「新民主主義」的根源說：

「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

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

爲甚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新民主主義論》七頁）

毛澤東在前面這兩段話裏所提出的前提，如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是很有意義的。但他既不理解此前提，所以他作出的結論便完全錯誤了！第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如果就它本身所包含的「民主任務」來說，無論「在這以前」或「在這以後」，都是一樣的，其性質絕沒有甚麼「變化」。因爲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與反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絕沒有因「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而「改變」了它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性質。這是稍具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們都能懂得的。第二，如果就「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之反帝國主義這一方面說，在客觀上即是反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統治，是幫助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解放的一個助力，一枝同盟軍。那就不管「在這以前」或「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都可以說是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因此，毛澤東希圖用甚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以及甚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來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在「在這以前」及「在這以後」的「變化」，不僅全是抽象，簡直是無稽之談。

假如正確地理解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所引起的「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之「

改變」，特別是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向」之「改變」，那就只能得出如下的結論：(一)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的民族工業會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因而產生了一個相當廣大數量的無產階級。從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才得到了一個「基本的動力和領導」，這在客觀上，使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有「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二)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奪取了政權，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之後，立即踏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此，便給了中國及一切落後國家的民主主義革命「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活的榜樣」。所謂「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的意義，其主要的標誌正在於此。因為「在這以前」，一切機會主義者，特別是俄國的孟塞維克，都一致認為東方落後國家（俄國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歷史的階段，只能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民主範圍內，絕不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直接地不斷地聯繫起來。但「在這以後」，東方落後國家的民主主義革命，不但可以，而且必須與社會主義的革命直接地不斷地聯繫在一起了。換句話說，「在這以前」的一切機會主義者對於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論」，經過「十月革命」的嚴重考驗之後，已經完全暴露其荒謬和破產了。從此，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示的（見馬恩一八五〇年三月《替德國共產黨中央部起草的通告》），為托洛茨基所闡發的（見一九〇五年托氏著的《回顧與前瞻》），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實現的「不斷革命論」，便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別是東方落後國家革命的唯一「方向」。

而走上這一「方向」的中心問題，便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所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中，即特別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與必要性，指示了無產階級只有徹底

粉碎戴民主假面具的資產階級專政，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真正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才能走上社會主義的勝利。隨後，列寧並替共產國際起草了著名的「二十一條」，其中一條宣稱：凡願加入共產國際的，必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在他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及其演說中，更特別指出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無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可以通過蘇維埃政權的形式直接走上社會主義。因此，他特別強調地說：「在落後國家支持農民去反抗地主和封建殘餘，是特別重要的。我們首先必須儘可能努力賦予農民運動以革命的性質，組織農民及一切被剝削者於蘇維埃中。」在一個《補充提綱》（為列寧參加起草和改正的）內更加詳細地說明：「…無產階級的黨，必須對蘇維埃的觀念進行堅強的和有系統的宣傳，並儘可能快地組織農民和工人的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與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蘇維埃共和國合作，進行徹底推翻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共產國際第一和第二兩次世界大會上，根據十月革命的教訓，所通過的這些提綱和演說，是曾經被正式承認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憲章的。

但當毛澤東追叙他的「新民主主義」的根源時，不僅絕對沒有提到共產國際前兩次大會所通過的「憲章」，反而是完全違反了這些「憲章」所指示的「方向」。那末，它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據毛澤東的「坦白」自供，是得自斯大林，是由於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間給南斯拉夫的米舍契一封論民族問題的信中有如下的話：「歐戰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新民主主義論》十頁）但這幾句話所含的內容，經過我們前面對毛澤東說的與此同義語的駁斥，其虛偽已經很明白了。這就足夠證明毛澤東「得自斯大林」的絕不是上面這幾句話，而是整個斯大林主義的體系和精神。因此，我們必須略微敘述斯大林主義的來源

、發展及對各國「共黨」的控制作用，然後才能徹底瞭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淵源及其本質和內容。

斯大林在俄國的三次革命中，除了串演一種無關重要的角色之外，便是暗地裏帶着孟塞維克主義的思想在布爾塞維克黨內鬥爭。當二月革命後至列寧回國的這一段時間中，斯大林曾與孟塞維克一道公然主張支持社會革命黨（以克倫斯基為代表）與資產階級聯合的臨時政府，並堅持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合併為一個黨。當列寧提出「四月提綱」，主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斯大林還是站在背後支持加米涅夫等反對列寧。在十月暴動的前夕，斯大林也以同樣曖昧的態度，同情加米涅夫和季洛維也夫反對暴動的行為。當十月革命勝利，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斯大林最熱中的是權力的爭取。尤其當列寧在病中的時候（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間），斯大林藉着總書記的地位，與加米涅夫和季洛維也夫組織了「三頭小組」，團結一切官僚份子於其周圍，其用意在排斥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革命派，準備篡奪黨及蘇維埃的領導權。因此引起了列寧的極度憤怒，以致他提議撤消斯大林的總書記職位（見列寧《遺囑》），最後甚至表示了與斯大林斷絕一切私人關係（見列寧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致斯大林的信）。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更肆無忌憚地排擠了托洛茨基及其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把黨、蘇維埃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權，操縱在自己手裏，破壞了黨及蘇維埃內的民主制度，並於一九二四年秋天發表了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頭徹尾是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雖然可以在一個國家內開始進行革命，奪取政權，但要完成這個革命，尤其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只有在國際的範圍內才有可能。所以《共產黨宣言》最末的一句話，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所以列寧屢次宣稱俄國「十月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並堅決地表示：「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

義的完全勝利是不可想像的；這個勝利，要求若干前進國的最積極的合作，俄國却不能算在前進國之內。…」（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第六次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說）但依照斯大林發明的「理論」，「社會主義」却可以在俄國「一個國家裏」（一個不能算在前進國之內）的國家裏）「完全勝利」，這就再明顯不過地表示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與列寧的國際主義思想完全相反了。

顯然地，斯大林此種「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階段論」是一脈相承的。孟塞維克企圖將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所容許的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絕不讓它跨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而斯大林則希圖將已經勝利的十月革命，壓縮在俄國一個國家的範圍內，不許它發展到世界各國去；這還不是孟塞維克的「階段論」之繼續和在新環境下的發展麼？！同時，斯大林此種「理論」，又恰是俄國革命後乘機爬進各機關的小資產階級官僚層的保守思想之反映。這個官僚層，以前都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害怕得要死的。迄至革命勝利後，他們當然更害怕革命向世界各國發展，害怕世界革命妨害了他們新得的特權利益，因而希圖將這一革命限制在俄國一個國家內，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以便安然享受其果實。但爲甚麼這個反動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竟能獲得革命後的無產階級的容忍呢？那主要是由於落後俄國的無產階級經過第一次大戰，經過十月革命與內戰時期的嚴酷鬥爭，不能及時獲得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援助，因而陷於孤立，陷於疲勞，陷於消沉，致使新興的官僚層獲得了機會，壓倒一切革命份子，反轉過來控制他們了——這些條件所造成的。這又恰好證明：「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本身，正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後，不能發展到國際上去，因而陷於孤立，趨於墮落之一種反映。

斯大林自發明了「一國社會主義」之後，便更加具有「信心」。他相信：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可以同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或「共存共榮」。他從此即以此種「理論」為根據，以他所代表的蘇聯官僚層的特權利益為軸心。以後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都全視他所代表的軸心利益為其轉移了。

自從這時起，斯大林對內政策的表現是：在國內盡力延緩計劃經濟的實施，向富農讓步，同時嚴酷地壓制代表工人和貧農的左派反對派活動；在國外，則一方面命令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以建立四個階級聯合的「國民政府」為限，反對武裝工農及組織蘇維埃；另一方面，則命令蘇聯職工會與英國黃色工會的領袖們建立「英俄委員會」，幫助後者欺騙英國工人。其結果是：蘇聯的富農抬起了頭來進行抵制，造成城市食糧的危機；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和英國大罷工（一九二六年）都遭受了慘敗。但斯大林不僅不因此得到教訓，反而將他失敗的怒火向左派反對派噴射，大規模地舉行「肅清工作」，幾萬最積極的革命份子被開除出黨和撤職，幾十個領導十月革命和內戰的布爾塞維克領袖，如托洛茨基、斯米也爾加、莫拉洛夫、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被逮捕，被監禁，被充軍——這是蘇聯內第一次真正的特爾米多反革命政變！從此，蘇聯的黨權、政權、和軍權都集中到斯大林一人手裏，他通過格柏烏（秘密警察）控制一切，予取予求。於是，斯大林便完成了他特有的官僚的邦拿巴特獨裁。差不多同時，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的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六年秋天），排除了各國的一切不滿意於他的革命領袖，把共產國際完全變成了克里姆林宮官僚獨裁者的外交輔助工具。

斯大林幹完了這一切之後，他於一九二九年，宣佈了有名的「第三時期」，這就是說，他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轉到了極左的「盲動主義」（機會主義之變態）。在這「第三時期」的路線之下，斯大林在國內神經質地厲行「五年計劃」，用行政的鞭子消

滅富農階級，「肅清」曾經與他一道打擊左派反對派的「右派」（以布哈林、李柯夫、托姆斯基爲首）。在國際上，則指使各國共黨進行毫無結果的暴動（在中國的表現，即是在荒僻之區建立「紅軍」與「蘇維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等），並指斥社會民主黨爲「法西斯」，拒絕與它領導下的群眾進行任何聯合陣線以反對真正法西斯的威脅。而其主要結果是：把一九三〇年至三三年最有勝利希望的，足以轉變整個國際局勢的德國革命，完全斷送，幫助希特勒輕易地踏上了政權，加速了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到來，把蘇聯置於法西斯進攻的危險中。

斯大林在希特勒勝利的異常威脅之下，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即從「盲動主義」的「第三時期」，驚慌失措地轉到了比前更右的「陣線」主義時期。在國內，他雖緩和了「五年計劃」的瘋狂速度，並頒佈了「新憲法」以鞏固官僚集團的特權。但同時却雷厲風行地進行「清黨肅軍」，舉行了幾次「大審判」，不僅剷除了整代老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如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柯夫等，即是在這幾次「審判」中處死的），而且將在內戰中建立過鉅大功勳的紅軍頭腦（杜哈車夫斯基所領導的整個參謀部）也給砍掉了。在國際方面，斯大林則卑躬屈膝地向英美法等民主帝國主義國家謀取妥協，哀求與它們建立「民主陣線」或「和平陣線」，並將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在這以前，不僅列寧，就是斯大林本人也稱之爲「國際強盜分贓機關」的），希圖以此去反對希特勒所領導的「侵略陣線」或「法西斯陣線」，去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同時，斯大林又命令各國共黨向社會民主黨（以前稱之爲「法西斯」的）及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力求建立「人民陣線」，（在中國的表現，仍是指使中共放棄土地革命，取消「蘇維埃」與「紅軍」番號，向國民黨投降，接受三民主義——以前是稱此主義爲「殺民主主義」的——建立「國防陣線」及「聯合政府」等），企圖以此

爲其「反侵略陣線」的輔助工具。然而結果，除了葬送了法國的大罷工（一九三六年六月）和西班牙的革命之外，更愈益促進了希特勒的冒險決心，愈益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迄至一九三九年秋天，看到希特勒已經決心發動大戰時，斯大林則又突然地放棄了「民主陣線」或「和平陣線」，不顧羞恥地轉到希特勒的懷裏，與之訂立「德蘇協定」，以此幫助希特勒立刻向波蘭進攻，正式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諷刺的是：斯大林竟一反其以前反法西斯侵略的宣傳，替希特勒的「侵略戰爭」作辯護，並攻擊他以前譽之爲「民主」的英美法，稱之爲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可是，當希特勒獲得斯大林的有力的幫助，「閃電地」征服了西歐，轉而將其勝利的鋒芒向蘇聯進攻時，斯大林又驚慌失措地，並奴顏卑膝地向英美帝國主義求援。

這時，斯大林不但宣稱英美帝國主義對德國的戰爭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因此，他不但命令英美各國的共黨無條件地擁護這一戰爭，擁護各國的帝國主義政府，而且甚至指使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的共黨反對這些國家的獨立運動。在中國，自「八一三」開始抗日戰爭後，斯大林即命令中共「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擁護英美聯邦」，壓制工農的迫切要求，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和政客們力謀「合作」，要求建立「聯合政府」，要求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共和國」等等。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便是在此種國內外的環境裏，在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的領導下，尤其是在他的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下所產生的。

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既是繼承了孟塞維克主義的一切傳統，並在新環境下代表官僚層的特權利益發展成爲「一國社會主義」，所以它不僅具有孟塞維克的一切機會主義的特點，而且還具有官僚主義的一切保守貪婪、腐敗與專橫的性質。這種「主義」在蘇聯內表現的主要特徵是：在絕對維護整個官僚層的特權利

益，特別是維護斯大林個人的特權利益底下，可以向小資產階級作某種讓步，但對於工人及貧農的合理要求則絕對予以壓抑。尤其對於代表工農利益的革命份子，更不惜採取任何卑鄙和殘酷的手段予以摧毀。在對外方面，此種「主義」雖有時擺出「左傾」的姿態，但在本質上總是圖謀與帝國主義盡力尋求妥協，爭取「和平」。因而命令、乃至強迫各國共黨盡量與各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進行「聯合陣線」或「人民陣線」，建立「聯合政府」或「人民政府」，等待至「適當時期」轉變為共黨官僚的獨裁，以此為克里姆林宮官僚獨裁者謀取「和平」或「反戰」的輔助工具。因此，它不但公開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而且對於凡是趨向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運動和黨派，都不惜採用任何手段（制止、中傷、出賣、乃至暗殺等等）去絞殺它們。

如果我們明白了前面所敘的斯大林主義的來源、發展和它對於各國共黨的控制作用，以及其所具有的一切特徵，不但對於毛澤東敘述他的「新民主主義」根源時所佈置的迷霧一掃而空，而且對於此種「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和「實踐」上表現的一切及其趨勢，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

毛澤東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不僅常常引證孫中山的文句作為他解釋「新民主主義」的根據，而且還特別闢了「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一章，以顯示其「新民主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淵源和關係。因此，迫着我們對此不得不予以簡略的批評。

毛澤東根據他的「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死板公式，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標界，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區分」為「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

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論》二二至二三頁）但實際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絕無所謂『新舊』之分，只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運用而已。

如果就孫中山在一個長時期內反對滿清的行動來說，是具有革命意義的，一直到今天還值得人們尊重。但孫中山的根本思想，即他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由於他所代表的階級意識使然，不但不是革命的，而且是有類似俄國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理論。』（見列寧一九一二年七月寫的《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派》一文）但代表資產階級的孫中山，何以要採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理論』呢？那為的是要爭取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到自己方面來，為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服務。這原是一切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初期代表所慣幹的勾當。如果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內容稍加分析，其不徹底性，乃至反動性，就更加明顯。他的『民族主義』，在辛亥革命以前，僅限於排滿，絕不會提到反帝國主義的問題。迄至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不但沒有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且甚至不斷地希圖與帝國主義『合作』，以『發展中國實業』。（見孫著《實業計劃》）即在他最後的『民族主義』演講中，對於民族主義的解釋也不僅不徹底，而且充滿了混亂和反動的意識。（孫中山對滿、蒙、回、藏等弱小民族的態度，便全是採取了大漢族主義的反動立場。）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雖然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但他的『軍政、訓政及憲政』的計劃又全是反動的。尤其是他以人民為『阿斗』，以自己的黨為『諸葛亮』的主張，更是反動之至。他的『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除了完全空想之外，也是反動的。因為這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希圖欺騙農民。也許毛澤東認為這一切都是

屬於「舊範疇的三民主義」吧！但毛澤東仍稱此種「舊三民主義在舊時代是革命的」，（同上引書三六頁）這就證明他把列寧認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理論」，也當作是「革命的」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對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評斷，毛澤東與列寧是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上的。

但毛澤東所極口稱讚的「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全上引書三二頁）又究竟如何呢？事情非常之明顯：孫中山之「聯俄」，乃是因為他在一個長期內玩弄軍事陰謀（即拉攏一派軍閥以反對另一派軍閥）的完全失敗，以及向帝國主義求援的毫無結果，才轉而利用蘇聯的威望，尤其是利用它的物質援助（包括金錢與軍火）來進行反軍閥的戰爭，以便最後取而代之，再與帝國主義進行妥協。他之「聯共」，是因為看到了新興的共產黨不但與蘇聯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在工人及一般群眾中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因此，容納共產黨到國民黨內，一方面既可以經過它為媒介而獲得蘇聯的信任和更多的援助；另一方面，而且是特別重要的一方面，又可以約束它的一切革命思想和行動（即使它不致越過資產階級利益所容許的範圍），並以它為工具去籠絡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來替資產階級服務。至於所謂「扶助工農」政策，那更是以改良主義的幻想，去直接地騙取工農群眾到國民黨方面來，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效勞。像這樣的「新三民主義」或「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固然是「聰明的」，對資產階級極端有利的；但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解放運動，却是一條絞繩！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正是在此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下絞死的！

但在第二次革命被絞殺了十餘年之後，毛澤東還在做夢似地敘說：「聰明的孫中山……得了列寧與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

民的同情，舉行了第二次大革命。」（全上引書三六頁）這真是一幅「美麗的畫圖」！但請允許我們向毛澤東先生提出一個問題：那次「大革命」的結果究竟怎樣呢？不是國民黨藉着「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因而造成了它的極端反動、極端恐怖的軍事獨裁麼？！不是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被槍斃，成千成萬的工農群眾被屠殺嗎？！不是全中國的土地上都染上了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的血跡嗎？！這種「新三民主義」造成的如此這般的「結果」，在中國資產階級看來自然是「聰明」的，然而這與「列寧……的助力」不但絕無關係，並且根本是違反列寧的一貫思想的。因為列寧的一貫思想是：堅持共產主義的原則，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任何主義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保持共產黨的完全獨立，領導工農群眾走上政權。以「共產主義」與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建立「統一戰線」，叫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即放棄其獨立）而「建立」國共合作，——這樣的政策，還不算是根本違反了列寧一貫的革命思想麼？！絕對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聰明的孫中山」得到「助力」的不是從「列寧」（當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時，列寧正在嚴重的病中），而是從斯大林，從斯大林的「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並且這一機會主義的「助力」起初是通過第三國際，最後則由鮑羅庭之手直接交給孫中山的。毛澤東所謂「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的那個「宣言」，其起草人便是鮑羅庭，這是毛澤東所完全知道的。這裏又一次證明：毛澤東不但把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所造成的可恥失敗描繪成爲光榮的成就，而且還要盜用列寧的名字來掩飾斯大林的機會主義失敗的罪惡行爲呢！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經過了第一次革命的流產，又加上它在第二次革命中所造成的罪惡悲劇，已異常明顯地變成爲中國革命運動的死敵了。要想中國革命獲得最後的勝利，代表無產階級

和貧農的政黨，便必須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管它的新舊）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而毛澤東直到今天還以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自任，「願為」此種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那今後中國革命運動的死敵，便不是國民黨代表的三民主義，而是毛澤東所代表的「新三民主義」，即他的「新民主主義」了。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什麼？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據他說，是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但這種「共和國」，與其他的共和國有甚麼不同，其根據又何在呢？毛澤東告訴人們的是：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但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的國家形式，唯一的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也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形式。」（《新民主主義論》一六頁）

毛澤東的機會主義，在這一段裏可算是最深刻地最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為關於國家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問題中最基本最中心的問題，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者與一切機會主義者間對立得最為尖銳，最不可調和的問題。現在讓我們從列寧對國家政權問題的話中，引一段出來與毛澤東前面的話對照一下吧：

「主要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當這個社會的基礎上所包藏着的階級鬥爭稍稍嚴重尖銳起來的時候，除了資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能有甚麼中間的道路，一

—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指第二國際內的機會主義者—彭）所不明瞭的地方，這就是他們的理論上的近視，他們之被資產階級的偏見所支配，他們之在政治上背叛無產階級的地方。關於甚麼中間道路的幻想，都是小資產者之反動的悲觀的情緒的反映。各先進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和工人運動一百多年的發展底經驗，尤其是最近五年來的經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整個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內容，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說明，在一切商品經濟之下資產階級專政之經濟上的必然性，而代替資產階級的，除了資本主義本身所發展、繁殖、團結、鞏固起來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之外，就沒有別的人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

從前面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異常清楚地看出：列寧根據L先進國內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運動一百多年的發展底經驗，尤其是近五年來的經驗¶，（即俄國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專政以來的經驗）以及L整個政治經濟學，全部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關於國家政權所得出的結論是：L除了資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能有任何中間的道路。¶而毛澤東却堅稱：除了這兩種專政之外，還有L第三種形式¶（即L中間道路¶）。這難道還不夠證明：在國家政權這一最基本最中心的革命問題上，毛澤東與列寧是站在絕對不可調和的地位上了嗎？！而毛澤東的主張，不正是列寧所指斥的L理論上的近視¶，L被資產階級的偏見所支配¶，L在政治上之背叛無產階級¶，L是小資產者之悲觀的情緒的反映¶嗎？！

也許毛澤東要起而替自己辯護道：L列寧所說「不能有甚麼中間的道路」，指的僅是先進國家的情形。他所主張的「第三種形式」，乃是專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中

的國家形式」而言的」。但實際上，列寧所指的是適用於一切國家的。因為列寧那個「提綱和報告」，乃是整個共產國際的綱領，又沒有聲明落後國家除外，當然是適用於一切先進與落後的國家的。我們姑且讓一萬步承認那個「綱領和報告」，只適用於先進國家。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所提出的《民族與殖民地提綱》以及《補充提綱》中，不是仍然堅持「在落後國家…組織農民及一切被剝削者於蘇維埃中」。「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對蘇維埃觀念進行堅強的有系統的宣傳，並盡可能組織農民和工人的蘇維埃」麼？

或者毛澤東還要辯解：他並非根本反對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建立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只是主張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必須建立「第三種形式」的國家，即「過渡形式」的國家。但依照毛澤東的「過渡形式」國家的邏輯，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是不須要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他後來在《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更明顯地說了出來：「經過人民民主專政直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文獻》第四頁）。換句話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或「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一種過渡的國家形式。然而這恰恰是同馬克思和列寧的主張完全相反的。馬克思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是：

「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變到後者的轉變時期。同時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也是同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時期的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任何國家」（見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一二五頁所引，重點是我加上的。）

列寧除了完全贊成馬克思上叙的意見之外，並加以解釋道：「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段進展，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而且非如此不能成功。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的抵抗，沒有其他的人，

也沒有其他的方式。『（全上書一二九頁）最後，列寧根據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的經驗，更將馬克思前面的公式加以具體化說：

 『蘇維埃共和國不但為民主制度底最高的形式……而且最可能保證最健全的進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的唯一形式。』

（列寧《論立憲會議的提綱》）

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除了無產階級專政外，沒有別的任何國家。』而毛澤東則堅持還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列寧認為『蘇維埃共和國』是『最能夠保證最健全的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唯一形式。』而毛澤東則堅持：在落後國家中還有『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或『人民共和國』，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形式』，而且是『唯一的不可移易的形式』。毛澤東之背叛馬克思和列寧，難道還有辯解餘地嗎？！

至於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或『人民民主專政』，其本身也是極端荒謬的，自相矛盾，根本違反階級鬥爭的邏輯的。第一，『人民共和國』即等於『人民國家』，但恩格斯曾認為「『人民國家』與『人民自由國家』是一樣的荒謬，一樣的離開社會主義的。」（見《國家與革命》九七頁）為甚麼？因為『國家』決不是代表抽象的人民，而只能是代表某一階級的專政機關。或如列寧所說的：國家不是別的，就是一階級壓倒另一階級的機器。所以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堅決地反對把『人民』與『國家』『連接起來』。第二，毛澤東所謂人民，是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而言，所以他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四個階級的民主專政』。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前者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而後者則為壓迫者、剝削者。試問：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與壓迫者和剝削者之間怎能談得上『民主』，更怎能同在一個政權內來執行『專政』呢？！

或者某些庸夫俗子們還要起來替毛澤東申辯說：不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何，「人民民主專政」較之「無產階級專政」總是要「民主」得多。因為前者把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都包含在一個政權內，讓各階級都獲得民主的權利；而後者，則只是無產階級一階級的專政，這不但對於資產階級要壓迫，而且對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也不給民主了。但當列寧批評叛徒考茨基時，早已答覆了這種庸夫俗子的民主觀。他宣稱：「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要更加民主到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更加民主到百萬倍。」因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它的形式之一即為蘇維埃政權），恰恰為絕大多數的民衆、為被剝削者與勞動者的民主，能得到世界上向來所沒有見過的發展與擴張。」（全上二一八頁與二一五頁）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對待資產階級而言，只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動行爲，而對於廣大的勞苦群衆，對於廣大的貧苦農民和被壓迫的下層小資產階級份子，則是最民主的，是最民主的精神來提高他們的地位，提高他們的自覺，發揮他們的創意力的。而包含幾個階級的政權表面上雖然「民主」，但實際上如不是戴假面具的資產階級專政，便是一種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邦拿巴特獨裁。歷史上的許多「聯合政府」是屬於前者，而十月革命前一個時期內的克倫斯基政府便是屬於後者。而現在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克倫斯基式的邦拿巴特專政之一個變種而已。

五十年來的中國政局*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八日)

今年恰當廿世紀第二個五十年代的開始，同時也是第一個五十年代的終結，在本世紀開幕直至現在整整的半世紀中，中國政治形勢的演變，不但是異常之繁複，而且是異常的深刻。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西方國家近三百年來在政治上之各種各式的形態，都在我國這短短的半世紀中，以非常壓縮的、糾纏的、因而帶着某些畸形的面貌表演出來了。倘使我們要將這半世紀來的政治演變及其因果關係，加以適當的描寫和闡釋，便非寫整本的政治史不可。但本文所能容許的篇幅極為有限，故只能替這半世紀來的政治演變，畫一個極粗疏的輪廓而已。假使讀者能從這個極粗疏的輪廓，窺察出一些中國近代政治變化的綫索及其動向，以此推斷未來發展的趨勢，那便算已達到作者的最大願望了。

政治背景

爲了便於描述和闡釋近五十年來的政治變化，讓我們首先在這裏將它的歷史背景給以簡略的說明。

* 本文是彭述之在越南時應西貢《遠東日報》的主編烏存厚特別邀請，爲該報出版「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特刊》而寫的，雖然爲環境所限寫得很簡單，但也給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來的中國政局」一個輪廓，可供研究近代史的參考。

中國歷史，自秦始皇摧毀古典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後，二千餘年來，無論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本質上都無多大改變，一般說是陷於長期的停滯狀態的。但從前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西方國家衝破了我國「閉關自守」的城堡後，不論在對外的國際關係上，和對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上，都已發生了空前劇烈的變化！

在對外方面，自鴉片戰爭的慘敗（一八四〇——四二年）以至甲午中日戰爭，中國不但完全喪失了原有的所謂屬地，償付了巨額的賠款，而且簽訂了大批的不平等條約（如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海關、郵局乃至自由駐軍等事），事實上中國是時已完全淪為半殖民地了。在社會經濟方面，由於靠着優惠條約的外國商品的不斷輸入，因而從根破壞了舊式的手工業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同時又盡力防阻了新式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在政治方面，更是明顯地暴露了滿清君主專制政府的絕對腐朽無能。由此，歷史早已向中國民族提出的民族民主問題愈益顯得明顯：（一）對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完成民族獨立；（二）對內改革土地制度，開闢國內市場，發展現代化的經濟；（三）建立適宜於執行上述任務的民主政權。倘若不能解決這幾個民族民主的根本任務，中國民族將不可避免地陷於衰弱，混亂和各種災禍的沼澤中。

但解救中國民族厄運的這些民族民主的歷史任務，直至前世紀末，還遠沒有被中國民衆所瞭解。最初，統治階層中一部份官僚們（李鴻章即其代表）所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堅砲利，因而要求「振興洋務」，希圖以此抵抗外來的繼續進攻。但經過了甲午的慘敗，這種「振興洋務」的政策已完全破產了。從此傾向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新官僚和智識份子（以康有為為代表），感到有進一步改良政制之必要，因而提倡「變法維新」，即要求改君主專

制爲君主立憲，以爲這是「救亡圖存」之不二法門。但經過「戊戌政變」的悲劇之後，又充分證明從上至下的「日本維新式的」改良主義，在中國是此路不通！

「戊戌政變」的悲劇，不但愈益促起西太后的反動走上極端而且由此引致了「庚子事變」的浩劫。

祇不過庚子事變也意外地收到了的兩種效果：由於中國民族運動發展，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不像從前似的明顯了，而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尤暴露了滿清政府之極端反動，再沒有改良的餘地，跟着推翻專制與建立共和政體的思想，亦漸次萌生。由此可知，以庚子與辛丑這兩年作爲本世紀第一個五十年代的開始，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其意義是何等深刻和重大呢！

從變法、立憲到辛亥革命

(1901-1911年)

極端反動的滿清政府，在庚子事變的致命打擊之下，爲了挽救它的末運，便不得不表示一點「變法」來愚弄人民了。於是三年前被西太后那雙血手所撕毀的「維新法令」（裁冗員，廢科舉，興學校等），現在又由同一雙血手一道一道地重新頒佈下來了！但這套「變法」的滑稽劇不僅不足以騙取人民，反而愈益引起了人民的憤懣。從這時起，國內外激進的智識份子都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反對滿清政府的革命途程。首先在上海出現了「愛國學社」；並前後出版了《大陸月報》，《蘇報》，《國民日報》以及《革命軍》，《慘世界》等小冊子，均以鼓吹革命，推倒滿清，恢復漢族主權爲中心。差不多同時，在日本的留學生也組織了不少團體（如「廣東獨立會」，「留學生會館」及「興華會」等），而鼓吹革命的刊物則有著名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同盟會」——《民報》的前身。於是，前世紀末盛極一時的變法運動，到本世

紀初便已爲革命運動所代替了。中國的歷史便由此跨進了一大步。

尤其到了一九〇五年，因沙俄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而引起的俄國第一次革命，更給了中國革命運動一個有力的影響。在這一年的秋天，中國第一個提倡推翻滿清專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黨——「同盟會」，在孫中山的領導之下，在東京正式宣告成立了。這便將辛丑以來各種各式的，然而十分渙散的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統一和集中了起來，並宣佈了一個政綱：「驅除韃奴，恢復中華，成立民國，平均地權」，（即同盟會黨綱）作爲號召革命的指標。雖然這個革命黨的組成份子始終限於智識界，會黨，軍人和部份華僑，還沒有能接近真正的生產羣衆；雖然它的政綱帶着偏狹的排滿主義和模糊不清的意識（如對土地問題），因而埋伏了往後革命流產的因子。但在當時，這個黨確已成立了一個較有計劃有組織地與滿清政府作戰的軸心。所以從一九〇五年起，中國政治運動的主流已經走入實行推翻滿清政府的河床了。

正當同盟會在各方面聯絡會黨，運動新軍，不斷進行軍事暴動之時，滿清政府以「準備立憲」來籠絡漢人中一部份改良主義者（贊成康梁的立憲派），希圖以此阻緩革命，苟延殘喘。但在滿清政府這一立憲幌子背後，却包藏了愈益排斥漢人，愈益集中政權於少數皇族的陰謀。在這陰謀底下，不僅令所有的立憲黨人絕望，甚至連那個曾經叛賣光緒，因此取得西太后寵幸以代替李鴻章地位的袁世凱，也被排擠出去了。也就正因此，滿清政府愈益陷於極端孤立的危機地位。所以一至武昌工兵營的砲聲一响，滿清政府即應聲倒塌下來了。

這樣，「驅除韃奴，恢復中華，成立民國」，算是很快地達

到了。可是南京臨時共和政府的總統位置，隨着滿清的退位，却由孫中山轉讓給了袁世凱。這絕非革命的勝利，只是由漢人袁世凱代替了愛新覺羅氏而已。中國的政治從此又陷進了一個極黑暗的時期。

這次革命流產的原因雖很複雜，但主要乃是由於同盟會組成份子（其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弱點及其黨綱之缺陷（如前面所指出過的）。所以當滿清一被推倒時，絕大多數的「革命黨人」所最熱中的只是與袁世凱謀取妥協，以便博得一官半職。因為黨綱所指出的只是「驅除韃奴」而已。於是歷史向中國民族所提出的那幾個民族民主任務：對外民族獨立，對內解決土地問題，建立民主政治，又原封不動地遺留了下來，等待着另一個革命去完成。

從袁世凱的反動到五四運動

（1913-1919年）

袁世凱既一手從滿清攫取了「實權」（北洋軍隊），一手從革命接受了「名位」（共和總統），於是他便積極團結一切反動勢力，採取一切反革命手段來排除從革命中興起的敵人。他以金錢與名位收買了當時與國民黨（由同盟會員與其他份子合組而成者）對抗的共和黨（由立憲派及其他投機政客組成者），使之成為他在國會內外鬥爭的工具。接着以暗殺手段結果了他認為當前最有害的政敵宋教仁（因宋實為當時國民黨的主要領導者，堅主組織責任內閣，且大有被國會推選為內閣總理之可能）。由於「宋案」所引起的贛，皖，粵等省的獨立反抗，袁世凱即乘機（在外債資助之下）進行軍事「討伐」，將忠於國民黨的幾個督軍消滅了。這就給了國民黨的「實力」以致命的打擊。對於那個由國民

黨員佔多數的國會，袁世凱經過一番利誘威迫，軟化和分化之後，最後便以解散收拾了它。袁世凱的反動就這樣地「奏凱」了！

但袁世凱還遠不以此為滿足。當他修改「約法」，幾乎取得終身總統的地位之後，又立刻燃起了「恢復帝制」的野心。「籌安會」所導演的「洪憲」醜劇竟搬上了當時的政治舞台。而且為了博取日帝國主義對他恢復帝制的支持，竟不惜簽訂了非常可恥的「廿一條」賣國條約。歷史固然常常盤旋進退，但當時的中國剛剛經過推翻滿清帝制的革命火燄雖被壓抑，可並未完全熄滅。所以一經蔡松坡在雲南舉起反對「洪憲」的「護國」旗幟，不僅與袁氏有利害衝突的省份（如桂粵等）隨即響應，就是他所素倚為心腹的鷹犬（如馮國璋、李純、湯蔭銘、陳宦等）也表示反對或叛離。最後，甚至日帝也提出了「異議」。黃袍尚未加身，袁世凱在自行「取消洪憲」之後，竟於羞憤交加中氣絕了。

但袁世凱雖在「洪憲」的惡夢中匆匆死去，而他所培植下來的北洋軍閥系統，却長久地成為此後中國反動政治和軍閥混戰的禍根。

自段祺瑞繼承袁世凱操縱北京政權開始，他便在日帝卵翼之下希圖效法袁氏以武力統一南方，因此又釀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那時南方已成立軍政府）。在這種局面下，所謂「護法運動」，「參戰（即參加歐戰）糾紛」，「張勳復辟」，總統問題，「南北議和」，以及北方馮（國璋）段（祺瑞）的暗鬥，南方國民黨政學系與研究系的互相衝突等等，紛至沓來，真是光怪陸離！

但從這種光怪陸離的反動局面背後，同時也就孕育了未來革命的種子。那便是「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社會根據。因為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工商業曾獲得了空

前發展的機會，由此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因而發動了新的社會思潮（爲那時的《新青年》所代表的），結果便爆發了「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

「五四」運動所直接攻擊的政治目標，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安福系（在大戰初乘機迫使袁世凱簽訂「廿一條」之後，隨即佔領青島及膠濟鐵路等，並以大量債款誘使段祺瑞簽訂賣國條約）。這是中國學生、工人及商人以罷學、罷工、罷市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的第一種群眾運動。但當這一運動往前發展時，因爲缺乏一個革命政黨的領導，便轉變成爲專門反對中國一切舊思想、舊道德、舊傳統、舊文字，而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啓蒙運動了。所以這一運動在當時的實際政治上沒有能發生何等決定的影響，雖然如此，但它在思想和人才方面，都替未來的革命準備了最基本的條件，由此，中國的政治又開始逐步走向一個新的革命時期。

第二次革命 (1925-1927年)

從「五四」到「五卅」，這是新的革命勢力的醞釀與聚集期。首先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在國內思想的激劇演進，與俄國十月革命的間接影響之下，於一九二〇年，與李大釗等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這有如一九〇五年的同盟會，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劃時代的。

隨着共產黨的成立與活動，孫中山亦在五四運動的一般影響與蘇俄的積極推助之下，尤其在陳炯明倒戈的刺激之下，對已往的軍事運動感到失望，因而決定「聯俄聯共」，實行改組國民黨，重新訂定黨綱，該黨綱的主要內容爲反帝，反軍閥及扶助工農

等政策（見一九二四一月國民黨改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接受蘇聯的援助，容納共產黨人於國民黨內，因而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兩黨共同進行「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綫。雖然此種「聯合戰綫」預備了未來革命進程中的一切主要矛盾，及其演成悲劇的根由，但在當時確曾給了革命一個巨大的推動。

在這革命勢力的醞釀期間，正是北洋軍閥爲互爭中央政府，不斷進行大規模混戰（如直皖戰爭與直奉戰爭等），與南方軍閥爲掩飾其地方割據，高喊「聯省自治」的時候。因此，人民對於反帝反軍閥的情緒和運動，也就愈益昂進起來。所以從廣州平定「商團」與楊（希閔）劉（鎮賓）叛變，到馮（玉祥）胡（景翼）倒曹（琨），成立「國民軍」，孫中山北上提倡「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因而死於北京之時，底層革命的火藥已經完全埋伏了，只待一根火柴引燃。而「五卅」上海兩京路的流血，恰好引燃了這一根火柴，於是一個新的革命爆裂開來了！所謂革命根據地的廣東，恰於此時成立了「國民政府」，消滅了陳炯明等的反革命勢力，分化了廣西湖南的軍隊（如李宗仁唐生智的投入國民黨），組織了八個「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便在此等客觀與主觀條件的配合之下正式動員起來。

「北伐軍」因爲獲得了各地群眾的有力支持（上海的群眾會以暴動事先影響），便有如狂風掃秋葉，於數月之間，即摧毀了吳（佩孚）孫（傳芳）的軍隊，佔領了長江流域。這時，似乎革命的成功已在眉睫。但正當革命要踏進勝利的最後關頭時，「國民革命的聯合陣綫」破裂了！首先是蔣介石所領導的一部份勢力在南京宣佈成立政府對抗武漢，進行「清黨」，解散工農群眾的組織等。隨後不久，汪精衛政府所領導的「武漢政府」也走上了蔣氏的同一道路。於是這次革命又同辛亥

一樣變成了流產！因為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完成民族獨立與對內解決土地問題，開闢國內市場的民族民主任務，終國民黨專政期間，是沒有獲得絲毫解決的。

國民黨的專政與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1937年)

自國民黨排斥共產黨，單獨取得政權之後，即與北洋的殘餘軍閥，謀取妥協，建立「一黨專政」。但在這專政的開頭幾年，它的內部又陷於不斷分裂和戰爭，如：寧漢之戰，蔣桂之戰，以及蔣與馮、閻的戰爭等。結果便招致了日帝「九·一八」與「一·二八」的軍事進攻，預伏了往後的中日大戰。

另一方面，共產黨在武漢被清之後，即由以前的右傾妥協政策轉變到極端的軍事冒險（如「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及「廣州暴動」等）。在一連串的盲動冒險完全失敗之後，又乾脆地放棄了城市的工人運動，以全力在農村進行組織所謂「蘇維埃」、「紅軍」與「土地革命」，企圖以此挽救它在過去革命中遇到的厄運。正因此也就演成了長期的「國共合作」，使中國的政治經濟重陷於停頓與混亂的無出路中。

國民黨政府爲了集中「剿匪」，便不惜對日採取完全「不抵抗主義」（致當時抗戰的十九路軍和主張抗戰的份子都遭受了壓迫）的政策。但這一政策之下，雖勉強將共黨趕出華南，却招致了全國民衆對它的憤懣，因而大大地影響了它的軍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首先表現於十九路軍在福建的反叛（所謂「閩變」）中，隨後則演成爲「西安事變」（即蔣介石被張學良扣留）。

西安事變的結果是：共黨在克里姆林宮的指使下（此時蘇聯在希特勒的威脅下，正由以前的極左暴動路線轉到與西方民主國家建立「民主陣綫」時期），爲了獲得與蔣介石謀取妥協，便迫使張學良釋放了後者，並自行取消「蘇維埃」與「紅軍」番號，放棄土地革命。從此便進入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

中日戰爭與國共衝突 (1937-1945年)

日帝在「八·一三」的兇猛進攻，乃是它窺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爆發，西方列強在希特勒威脅之下，不敢直接以武裝干涉，因而企圖乘機一舉併吞中國。而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放棄前此的「不抵抗主義」，起而「應戰」，除美、英發表支持與共產黨擁護外，主要是由於當時全國民衆激烈反日之不可抵抗之壓力。因爲當時國民黨政府如仍然表示不抵抗，則它在日帝狂襲與民衆（包括軍隊在內）憤怒夾攻之下，勢將立趨瓦解，所以國民黨政府的抗戰，實由於客觀形勢使然。

在抗戰開始時，國民黨政府雖曾宣佈開放黨禁，號召全國人民及各黨各派聯合起來抵抗當前的敵人。但它對民衆任何自動的組織和武裝都嚴加禁止，對於各黨派又毫不予以信任（當時召開的「參議會」雖容納各黨派代表及所謂社會賢達參加，但該會對政府決定大政方針毫無干預的能力，事實上是形同虛設。）更不用在政治和經濟上實言有利抗戰的必需改革了。相反地，官僚們乘着抗戰之機會，益發橫徵暴斂搜刮人民，軍閥們愈益克扣軍餉，剝削兵士（所謂發「國難財」），其貪污腐化，更遠甚於抗戰以前的任何時期。

因此，自「八·一三」後，在軍事上不斷遭慘敗：僅數月

間即失去了平津、上海和武漢；不到一年來，整個的華北華南，和華南的重要城鎮及交通網，全落於日帝之手。這時偏安西南的政府，其中有一部份對抗戰的態度已根本動搖起來，汪精衛所代表的一派竟乾脆地投降了日本。僅因為第二次大戰的及時爆發，尤其是因為太平洋戰爭接着爆發，美英爲了牽制日帝，表示積極援助國民黨政府；以及一般民衆和兵士們的忍痛犧牲，才使中國的抗戰勉強支持下去。

但這種勉強支持的開戰情況下，國民黨與民衆及各黨派間的矛盾，尤其是與共產黨間的矛盾，也就越來越緊張了。

因爲共產黨雖有自己的軍隊，而這軍隊在抗戰中又日益擴大起來，這已非國民黨所能容忍，於是，國共兩黨的衝突日益尖銳起來。後者的「新四軍」之被強迫解散（會經過了一場惡戰），便是國共衝突走上新高潮之一個表徵。從此以後，兩黨的「積極合作」（在抗戰初曾經雙方大肆宣揚的）變成了「水火不容」，國民黨的大部份精力固集中於「防共」，而共黨的主要方針當然也在「反國」。從前綫到後方，從政治到軍事，甚至每一角落都佈滿了國共兩黨衝突的氛圍，而且愈來愈烈。僅因爲日帝的過份威脅和隔離，以及美蘇的從中彌縫（因當時美蘇已站在反抗德日的同一戰線上），才沒有公然的爆發爲全國範圍的戰爭，然而往後的內戰實已導源於此。

不錯，抗日戰爭是「最後勝利了」，但必須承認事實：這「勝利」並非從「國共合作」的努力得來，主要乃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屈服了日帝附帶地產生的。也就正因此，美國勢力在「勝利」後的中國特別膨脹起來，這就加速了美蘇及其所主持的國共的生死鬥爭。

從國共內戰到共黨奪取政權

(1945-1950年)

在上述的「勝利」(有人稱之「慘勝」)情況下，假如國民黨政府能「深自警惕」，「改弦更張」(像某些人們對它所建議的)，或者還能延長其政治的生命。但這個政府在回到「收復區」後更暴露了其前所未有的驕橫貪婪和腐化：不但將對敵產的「接收」變為飽私囊的「劫收」，任意敲詐，盡情揮霍；而且對待久被日帝蹂躪與壓榨的「收復區」人民，也儼然臨之以「勝利者」的驕橫態度，肆意壓迫與剝削(如抽糧、抽丁等)。於是，在「勝利」初會對國民黨政府抱着若干希望的人民，便一下由希望變成了失敗與憤懣。雖然，國民黨政府主席曾鄭重宣言(見所謂《九·三》文告)，要改革政治、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減低田賦等等。但這一些都不過是純粹的空頭支票而已。

在國際上，中國會因「勝利」而「取消了不平等條約」，且列為「四強」或「五強」之一(雖然是在表面上)，假如國民黨政府是善於利用此種新情勢，對於中國的民族獨立未始沒有幫助的。但它不但不企圖因此進一步去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反而處處依賴華盛頓。這更招克里姆林宮妒嫉，給了共黨以反美的有力口實。

在這種情形底下，共黨看到「勝利」的果實既全被國民黨獨吞(共黨會要求「接收」東北及平津等大城市，但均被國方拒絕)，同時又感到後者進攻的威脅，便決心起而從事火併。所以當中日戰爭剛到終結，而國共的內戰即緊跟着爆發出來了。

在頭一個時期(一九四五年秋——四六年冬)，美國會企圖以和議方式消弭國共的內戰；首先由美大使赫爾利把毛澤東帶到重慶訂立了《蔣毛和平協定》。但當毛澤東一回到

延安時，那個和平協定即成了廢紙。隨後，馬歇爾以杜魯門特使資格來華調解國共糾紛，曾勸誘國共成立了一個和談「協商會議」，希圖迫使國民黨在政治上作若干讓步（即成立所謂「聯合政府」，容納共產黨份子加入），以換取「整編」共黨的武裝（即取消其獨立軍隊）。然而不僅共產黨絕對不願取消自己的獨立武裝，就是國民黨也毫無放棄一黨專政之意。（後來國民黨召集「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成立「聯合政府」，事實上僅是一黨專政的粉飾而已，所以當和談進行時既未曾停止過戰爭（所謂「邊談邊戰」），而在和談決裂後便公然爆發為兩黨的全面戰了。

當國共內戰開始時，從武裝和兵力上說，後者都居於劣勢。所以前者採取攻勢，並在某些方面獲得了進展（如攻取延安及綏遠等），但當全面戰爭爆發後，情勢很快就逆轉了。國民黨的軍隊除了在東北及徐蚌稍微表示激烈的抵抗外，而在長江以南及西北和西南等地區內，不是集體投降，就是事先逃走。因此，不到兩年，整個的中國大陸便已全落於共黨之手。

現在中共是輕易地（出乎它自己的意外地）擊敗了國民黨，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所謂「人民民主政府」。這在中國歷代政治上，無疑地是一個劇烈而大的變化。但中國民衆，能否從此獲得真正的解放和幸福，中國民族能否從此踏上復興的道路呢？就讓歷史去慢慢評判好了。

附 錄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黨綱*

（一九四八年建黨大會通過）

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社會經濟及其矛盾

中國長期停滯的社會經濟，自被資本主義強行侵入後，即激起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且從此被迫牽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體系之中。

資本主義列強挾着強大的炮艦，一步一步摧毀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城堡，迫使早已衰朽的滿清政府低首屈膝，償付巨額的戰爭賠款，簽訂大批的不平等條約：割據領土，開闢商埠，建立租界，設置領事裁判權，自由駐軍，控制關稅，最後劃分「勢力範圍」，——中國就這樣陷入一個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跟着炮艦的轟擊而來的，是潮水一般的商品。這種「價廉物美」的資本主義產品，由各城市注入所有的鄉村，首先給了手工業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以致命的打擊，並迅速地變中國為單純消納工業產品和供給原料的市場。隨後（當資本主義發展至帝國主義階段時候），為了順利推銷產品，收購原料，尤其為了利用低賤勞力及操縱政治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又進而競相投資和借款：建築鐵路、電線，開辦銀行、輪運、礦山及紡織廠等，將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支配地位握在它們的魔掌中！

* 這個文件是由彭述之起草，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九月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中，經過討論、修改後正式通過的

資本帝國主義，爲着自己榨取超額利潤，在開發中國資源和輸入新式技術的過程中，雖在某種限度內也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推動了國家向前發展，但它的基本政策總是壓抑着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阻礙着中國走上現代化的。因此，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在一個長期內（半世紀以上），不但殘暴地破壞了舊有的經濟基礎，而且頑強地阻擋了新的經濟的發展。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忙於戰事，中國才首次獲得機會，相當大規模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業，很快地跨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這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在戰後立即受到歐洲勝利列強捲土重來的打擊，而且在大戰中及戰後，又遭逢了日美帝國主義的猛烈進攻，並由此在中國舞台上第一次形成了日美對抗的局面。尤其是日帝乘着歐戰的空隙，拼死在中國擴張其經濟和政治勢力，一下造成了它的特殊優勢，以致釀成了它往後不斷的軍事侵略，終於爆發了八年慘酷的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僅由於和第二次大戰糾纏在一起，並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屈服了日帝，中國才倖免於朝鮮第二的命運，但却因此又被帶到了菲律賓的邊緣。現在不平等條約表面上雖被取消了，但香港九龍既遠未收回，而有關全國經濟命脈的海關權實際上仍然操在美帝手裏，美國的海陸空軍仍可自由屯駐各要地，它的輪船仍可自由航駛海港內河，它的一批一批的巨額借款，更將整個中國拴縛在華爾街的指揮棒上，所謂平等的『中美商約』，只是繼續以前不平等條約的一種代替物。第二次大戰後的中國，不過是從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轉變爲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而已。

在此種半殖民地的長期束縛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就帶着一種極不平衡的和綜合的性質。在工業經濟上，輕

工業（特別是紡織業）雖已達到相當規模的成績，但重工業却遠落在背後。另一方面，最落後的手工業生產還普遍地殘存着，而新工業的組織和技術（因係直接從先進國移植過來）却是大規模的和最現代式的。同時，由於「官辦」或「官商合辦」的歷史傳統，無論在工業、金融、運輸乃至商業方面，都具有一種畸形的「官僚資本」（也就是與世界金融資本發生有機聯系的買辦資本）的集中性和壟斷性，這在抗戰中及戰後表現得更為露骨。因為官僚資本集團（它是資產階級中最橫暴的一部份）既利用特權在戰前及戰爭中盡情搜刮，在戰後又將接收日帝的全部產業和大量財富據以肥私，於是國家一切金融、工業、運輸以及國內外貿易的支配權，都被它所壟斷去了。此種官僚資本集團（所謂五大家族）現在已成了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一切勞苦群眾的最橫暴的壓榨者，國民經濟發展的最不可忍受的制動機！

帝國主義的侵略，如果在某種限度內還推動了中國城市工商業的發展，但它對於農村經濟却一般地導演了反動和破壞的作用。它爲了利用中國商人、地主、官僚和軍閥，盡量幫助保持前資本主義一切落後的社會關係，一切封建式的剝削方法。它既用廉價的機器製品直接摧毀了農村的手工業（農民副業），又以收購原料把農民緊緊地束縛於城市的商品市場；它的巨額賠款和借款，不僅最後轉嫁於農民大眾身上，且由此加劇了貪官污吏的勒索過程；它所指使下的不斷的軍事混戰，更給了農民以沉重的打擊；在農民被束縛於商品市場之後，商人、富農和地主更利用此種關係進一步加緊壓榨農民；由於以上種種原因，高利貸便在農村獲得了無比跋扈的機會，起着特殊的腐蝕作用；——在這一情形底下，中國農村經濟便陷入於一種不斷衰敗和破產的狀態中了。其主要特點是：（一）絕大多數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土地愈來愈集

中於極少數的地主手裏，而地主的剝削方法又都是封建式的；(二)這些地主差不多同時又是商人、高利貸者或政府官吏，他們直接和間接與城市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結成對農民剝削的一種有機聯系；(三)由於落後的耕種方法絕少改進，土地的極度細分，農業生產表現稀有的衰敗，甚至造就大量的土地荒蕪；(四)絕大多數的農民陷於奇異的貧困，不但缺乏任何購買力，且經常掙扎在死亡線上，及不斷地大批地逃出農村，變成失業遊民。中國農村經濟的這些特點所構成的險惡情況，遠在這次中日戰爭前已達到了可怕的程度。在戰後，由於抗戰所帶來的一切悲慘後果，再加上國共內戰所造成的大量破壞，徵糧徵兵的雷厲風行，農產出口品的完全壟斷（官僚資本用農貸、蠶貸及其他種種的方法，有系統地壟斷了一切出口的農產品），貪污土劣肆無忌憚的搜刮，更使農村經濟的險惡情況達到登峯造極，現在已迫近一個真正總崩潰的爆發點了！

中國的社會經濟，在帝國主義的長期侵略下，在不平衡和綜合發展律的支配下，既已發生了如此劇烈而深刻的變化，迫使中國從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一躍而成爲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就積累了無比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矛盾：舊有階級（地主與農民）的分化、新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產生和對立、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的衝突，等等。而此種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生產力遭受了不可忍受的束縛。中國民族陷於無了無休的貧困、衰敗、混亂和災禍，其根源即在於此。

革命的任務、動力及其性質

要想中國的生產力從一切舊的束縛和新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讓它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把中國人民大眾的精神和

物質生活提高到新時代所迫切要求的水準上，把中國民族從貧困、衰敗、混亂和災禍的深淵中拔救出來，跨上現代化的道路，首先便必須徹底粉碎一切帝國主義的枷鎖，完成民族獨立，消滅一切封建殘餘的束縛，解決土地問題，——這是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也就是延遲未決的革命的民主任務。

這兩個任務的解決，是緊相聯系不可分離的。如果不徹底摧毀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一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鎖鍊，中國的民族工業便絕難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因而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沒有任何的前途。同樣，如果不給予廣大農民群眾以解除其不可忍受的重壓和痛苦的希望，使之能夠積極行動起來，發揮其偉大的力量，則要想中國從帝國主義的鎖鍊中解脫出來，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兩種運動必須適當地配合起來，形成爲整個的革命運動，才有可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但甚麼階級來擔負這個革命運動，並適當地將它配合起來，這就牽涉到了革命的動力問題，這是中國革命問題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要正確決定這個問題，必須正確估量各主要階級的力量和關係，尤其是它們對於帝國主義和土地的關係。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就它的數量說，就它對於帝國主義壓迫的仇視，特別是對於土地改革的迫切要求說，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力量。中國革命只有這個最偉大的群眾普遍地動員起來，積極地參加鬥爭，革命才能獲得真實的廣大隊伍，才能浩浩蕩蕩地向前邁進。但農民雖有這種最偉大的革命力量，因爲它在經濟上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在文化上的落後性，在心理上的狹隘性，以及它的各層分（富農、中農、貧農及僱農等）間的利害矛盾，因而其內部缺乏一致的團結性等等——這些缺點綜合起來，農民本身在組織上便絕難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力量，在政治上更無法導演

任何獨立的作用。因此，農民必須從城市階級中找到領導。在現代城市工商經濟支配鄉村的條件下，農民只有受城市階級的領導，才能團結，才能集中，並在政治和行動上獲得監督和指揮，以發揮其偉大的革命力量。農民若沒有城市階級的領導，而企圖以自己的力量單獨解決自己的命運，將不可避免地採取分散的孤立的暴動形式，而得不到出路。這是中外一切歷史經驗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的。

在城市階級中，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起決定作用的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所有東方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它在國際上既與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發生了有機的不可分離的聯系，而在本國基本的農業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又是有機地不可分離。這就決定了它在革命中的妥協和反動作用。雖然中國資產階級也希望本國的資本主義能有獨立的發展，希望帝國主義的鐵手能放鬆一點，但它絕不敢，也不能起而根本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而只能以取得某部份可憐的讓步為滿足。固然，當某一帝國主義（例如日帝）過分摧毀中國資產階級的基礎時，它也會起而「抵抗」，甚至從事軍事的「應戰」，但這種「抵抗」和「應戰」，總是投靠另一派帝國主義，並在其容許、援助和指揮之下進行的。這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至多只能表演奴隸選擇奴主的勾當，而絕對不敢一般地扭斷所有奴主們的鎖鍊。對農村經濟方面，一部份資產階級（工業家）雖也希望予以某種改良，提高農民對於他們的工業品的購買力；但他們絕對害怕無償地沒收地主的土地交還貧農，因為這樣就要侵犯現存的財產關係，而根本動搖城鄉整個資產階級的剝削基礎了。尤其當城市的工人階級已經生長起來，並為民族民主及自身的利益而奮鬥時，資產階級更是恐懼、更為反動，更感到有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妥協來對付這個新興勢力之

必要。在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資產階級之無恥地向帝國主義屈膝及與反動軍閥妥協，轉而以稀有的殘酷屠殺工農群眾，便是絕對無可否認的證明。『資產階級愈到東方愈是卑怯無能』，中國資產階級更是卑怯無能的典型代表。因此，解決中國革命民主任務的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年青的無產階級肩上了。

中國無產階級，無論是對於帝國主義及對於封建殘餘的關係，都與資產階級完全相反，都站在不可調和的地位。不但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是帝國主義（外商廠家）直接的被剝削者，就是其他的一部分，也因帝國主義的競爭而特別受到本國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無產階級不僅與農民保有某種血緣關係（因為它中間的許多份子都是不久以前才從農村走出來的），與農民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農村經濟的改革，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對無產階級生活的改進更具有重大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只有在幫助農民的徹底解放下，與後者結成鞏固的同盟，才能完成。因此，摧毀帝國主義的束縛，完成土地革命，無產階級無論在自身的利益、同盟者的利益以及全民族的利益上說，都是絕對必須的。

一切機會主義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政客們，也許還要懷疑說：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太少了，文化太低了，不能成為革命的主要動力，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然而這正是俄國孟什維克及一切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陳詞爛調，早已為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事實徹底駁斥過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數量與文化，而在於無產階級在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所佔的比重地位。俄國無產階級在全人口中雖只佔極少數，雖然它的文化很低，但它却領導農民奪取了政權，解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並由此踏上了社會主義的途程。中國無產階級同

俄國無產階級相類似，它在全人口數量中所佔的比率雖然極小，文化雖然很低，（中國資產階級所佔的比率不但微乎其微，就是它的文化也十分有限哩！）但它在生產上和運輸上却控制着國家一切經濟系統的神經中樞，在政治上，由於它的過份被剝削和被壓迫，具有特殊的反抗性和易於覺悟。它並一般地在經濟上政治上代表着廣大勞苦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的真實利益。而且在第二次革命中，在『五卅』運動、『省港罷工』及『上海暴動』等等的過程中，中國無產階級所表現的偉大力量和對其他群眾的領袖作用，已成了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僅因為被一種最可恥的機會主義所領導，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苦力』，以致革命遭逢極悲慘的失敗，因而革命的民主任務也就無從獲得解決而被拖延下來。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教訓，尤其是中國第二次革命慘敗的教訓，愈益證明：只有中國無產階級堅決地領導農民及一切城鄉的勞苦群眾，把政權奪取過來，建立自己的專政，民族獨立與土地革命的民主任務，才能達到徹底的完成。

但中國無產階級一經奪得政權，便絕不能以完成民主任務自限，而必須將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到議事日程，立刻加以解決（沒收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銀行、房屋及土地森林為國有），以此直接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中國未來的革命，由於經濟和政治上更尖銳的矛盾，比之俄國革命將更為急進，即在革命的初期，反富農的鬥爭和動搖某部份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將表現出來）。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陷入死巷，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已經爛熟的現階段，中國革命民主任務的解決，絕不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道路，而只能替社會主義的建設開闢前途。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歷史階段或時期來隔離，而是從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

這便是中國革命的性質。這一不斷革命的含義，早已由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準確地指示過了。凡是堅持中國革命有一個民主的歷史階段和時期，民主任務的解決只是爲資本主義清除道路，固是最可恥的機會主義幻想；但認爲民主革命已經過去，未來的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也是一種無望的教派主義空談——這兩種思想都是屬於階段論的範疇，同是革命的絞索，必須予以無情的排斥。

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既已成爲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構成部份，中國的革命更只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且只能在世界革命勝利的範圍內才能獲得最後的完成。不但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一定會推動中國革命的興起，即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必然要促進其他國家革命的爆發。而中國革命的徹底完成，更只有獲得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勝利後一切必須的援助，才是可思議的。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僅僅是背叛『十月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官僚層之一種極端反動的民族主義體現，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中國的革命徹頭徹尾是國際主義的。

革命的領導

如果『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則此種危機，在中國更以其尖銳和痙攣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中國的無產階級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起，便以最英勇的姿態，站在全民族的最前線上反抗帝國主義的暴行，並由此開闢了一個偉大的革命時代（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在這整個的革命時期中，無產階級會團結了極廣大的群眾（手工業者、店員、學生及農民等）於其周圍，同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進行了極堅決的鬥爭，在全國中心的上海，並舉

行了勝利的暴動，把政權奪在手裏，企圖履行歷史所賦予它的使命，將中國民族推上一個新的時代去。但當時領導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完全爲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亦即孟什維克主義的變種）所操縱。斯大林認定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聯盟或合作，因而強迫中共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維護反動而又空想的三民主義，把無產階級的雙手綑綁起來，在革命達到高潮時，不但絕對禁止無產階級組織蘇維埃及武裝自己和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準備奪取政權，且將已經奪到手裏的權力也交給資產階級，希冀在『國共合作』及其『聯合政府』（武漢政府）下『完成中國國民革命』，其結果恰好準備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

當反革命完全奏凱的時候，斯大林突然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盲動主義，命令中共連續舉行暴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及廣州暴動等），組織蘇維埃，奪取政權，將革命失敗殘留下來的一些無產階級先鋒份子盡情揮霍，以供其最無謂的犧牲。此後，中共即從城市完全退到鄉村，背離無產階級，很快墮落成爲騎在農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專門在山上建立『蘇維埃』，組織『紅軍』，進行游擊戰與土地革命，反對反動的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希圖以此創建『中華蘇維埃』。但這樣地經過了八年的時光，浪費了無數的生命之後，斯大林却藉口於『聯合抗日』，又命令中共向同一反動的國民黨投遞降書（爲的是重新『合作』），不但『中華蘇維埃』及土地革命被一筆勾銷，『紅軍』的番號被改變，並宣誓『願爲實現革命的（曾經斥之爲反動的）三民主義而奮鬥』，『擁護蔣委員長』，擁護民主帝國主義，宣傳『階級合作』等等，——中共就帶着這種比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更可恥的機會主義走進了中日戰爭的漩渦中。

中日戰爭，原是中國工農群眾重新抬頭，轉變國民黨的「應戰」為革命抗戰，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機會。但中共的機會主義政策，恰成了工農群眾運動興起的絆腳石，替日帝的進攻排除障礙，並帶便幫助國民黨渡過了種種難關，維持了它搖搖欲墜的政權。其所得到的第一個酬報，便是新四軍的解散。

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的統治回到「收復區」來，其腐敗、無能與動搖遠超過它以前的任何時代，同時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工人階級和一般民衆又已開始昂起頭來，一個新的革命局勢正擺在前面等待着領導。而中共此時在群眾中確也擁有廣大的信仰，但它却更迷戀於「階級合作」的政策，不斷與國民黨談判組織「聯合政府」，成立「政治協商會議」，討價還價，讓國民黨獲得了充分的時間，在政治上，尤其在軍事上，得以從事準備，首先得以將軍隊運到華北和東北。準備就緒後，一個「全面戡亂」的戰爭便被正式宣佈了。於是，一個新的革命局勢也就被遏阻了下來。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同所有其他國家中的「共產黨」一樣，早已自覺地成了克里姆宮官僚獨裁者的外交政策的御用工具，成了斯大林的私黨，而它自身更是完全墮落成爲小資產階級的政派，與馬克思、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任何傳統都絕了緣。它在已往的二十餘年中，既以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葬送了一切革命運動，現在更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雙管齊下，即：一方面，仍然堅持「階級合作」與「政協路線」，企圖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所謂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土地改革，某部分大企業的國有化及聯合政府等。其實這只是一種披上外衣的舊改良主義和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之混合物。這在最近那個號稱新民主主義典型的南斯拉夫事變中，已經完

全暴露它的破產了！)；另一方面，又以全力進行軍事冒險，自陷於毫無出路的內戰中。這就充分證明：這個自稱代表革命的傳統的黨，已經完完全全地變成中國革命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礙物了。

至於在抗日戰爭中臨時湊合攏來號召群眾，要求國民黨施行民主改革的『民主同盟』，在戰後很快就因利害懸殊而分裂了：它的右派（青年黨與民社黨）乾脆地投降了國民黨，變成後者裝飾『民主政府』的破花瓶；它的『左派』則完全追隨在斯大林黨之後，變成了機會主義的尾巴，正希圖在『新政協會議』中尋求個人的出路；它的某些中派份子，雖然還以不左不右的『中間派』自居，但也在左顧右盼，等待着機會謀取一官半職；——這便充分證明：在中國凡是站在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企圖利用民主招牌來號召『民主改革』的黨派或集團，除了替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斯大林黨的機會主義效犬馬之勞外，再也不能起任何獨立的作用了。

從斯大林黨的惡毒墮落與民主同盟的可恥投機，便充分顯示出中國目前政治整個形勢之最深刻的危機了！要解消這個危機，只有形成一個新的革命領導——這就是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中國革命共產黨，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忠實地保持了馬克思、列寧及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切革命傳統，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全部教訓。它的前身（左派反對派及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托洛茨基的思想領導之下，將近二十年來，同斯大林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及其執行工具——中共作了極堅決的鬥爭。在這一長期的鬥爭中，不但溶化了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寶貴教訓，吸收了國內外一切新的鬥爭經驗，而且它對於每一重大政治變化的分析及對中共

每一重要政策的批評，都經得起事變的考驗：當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表示完全失敗後，斯大林還堅認革命在不斷高漲，因而命令中共不斷進行盲動主義的冒險，建立『蘇維埃』及『紅軍』時，我們曾向中共領導機關再三解釋革命局勢已經過去，現在正踏進了一個反動的時期。因此我們除提出過渡的民主要求（如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及國民會議等）以抗禦反革命的進攻外，並繼續指責了斯大林領導的那種脫離城市工人運動在農村專事游擊戰爭的冒險政策，絕沒有任何的勝利前途。其結果，不是被反動的國民黨擊潰，即不可免要向它屈服。往後的事實證明：我們的指責完全成了正確的預言。當斯大林藉口抗日而命令中共投降國民黨、『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擁護美帝在中國的政策時，我們更嚴重地指明：國民黨的『應戰』完全是爲了自保，它的抗戰政策只是它過去在美英等帝國主義支持下的一貫的反動政策之延續。要想抗戰獲得真正的勝利，只有號召工農及全體民衆團結起來，武裝起來，轉變國民黨的『應戰』爲革命的抗戰，才有可能。因此，我們除提出自己的獨立抗戰政綱外，並指斥斯大林黨投降國民黨的『國共合作』及擁護美英的政策，只能癱瘓民衆的抗日運動，將又一次幫助後者渡過難關，結果將使抗戰日趨失敗，最後且有陷中國爲菲律賓的危險。抗戰的後果，又不幸證明我們的預斷是正確的。當戰爭結束後，斯大林黨正忙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和談，幻想與國民黨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和國』時，我們除了號召民衆起來要求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此解決中國當前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國共問題在內）時，又嚴重地警告：『政治協商會議』及其他一切和談，不僅是一種幻想，而且是讓國民黨獲得時間從事進攻的準備。沒有民衆有力的干涉，國共的內戰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兩年餘來事變的發展

，又恰好證實了我們的警告！最後當斯大林黨在『和談』完全失敗與國民黨公開宣佈『戡亂』以後，公佈『土地法大綱』（去年雙十節），實行土地改革來代替『減租減息』的妥協政策時，我們除了批評它這個『土地法大綱』的不徹底及其所包含的機會主義毒素外，並同時指出：『這是將土地革命搬出來當作一種威脅的姿勢，根據「江西時代」後的歷史經驗，中共的土地改革既已當作換取統治階級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則它這次的『土地法大綱』也就很有可能變為未來謀取「合作」的犧牲』。為時不到數月，斯大林黨即在其『五一號召』的『新政協路綫』中，為了謀取『工商界人士』或『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又開始在其所控制下的『新解放區』取消土地改革，而重復回到『減租減息』的老機會主義路綫去了。這不是又一次很快地證實了我們的預測麼！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把中國革命的領導任務肩負起來，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

過渡綱領

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其主要矛盾，在於革命客觀條件之成熟性與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之不成熟性。克服這一矛盾，乃是下一時期——一個鼓動、宣傳與組織的革命的前期——的戰略任務。但要達到這一戰略任務，如不充分注意一切（甚至細小的和部分的）策略問題，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必須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的過程中去找到當前的民主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這橋樑便是第四國際中國黨的過渡綱領，它的任務就是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為中國革命有系統地動員群眾，一直走到一個最後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一) 爭取民族獨立 要想中國民族從現時一切沉重的痛苦和災禍中解脫出來，必須首先徹底解除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羈絆。不但舊的不平等條約必須廢止，就是任何新的不平等條約也得加以取消。香港、九龍和澳門必須收回，美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及其軍事顧問團必須撤退，掌握海關的『客卿』必須撤職，『中美商約』及其他與美國簽訂的一切公開的及秘密的條約必須廢棄。帝國主義所給予中國反動政府之一切新的債款和舊的債款，中國人民不負任何責任。但根據『雅爾達秘密協定』的『中蘇條約』也必須廢除，旅順和大連的蘇聯軍隊也必須撤退。 因為『中蘇協定』及蘇軍佔據旅大，不但只是代表蘇聯反動官僚的利益，而且在客觀上正是幫助帝國主義繼續侵略中國民族之一種最有力的藉口。因此反對蘇聯官僚對中國的反動政策，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互相聯系的。

(二) 沒收土地歸貧農 中國土地問題的極端嚴重，農村經濟極度衰敗，農民生活的異常痛苦與農村的普遍騷亂，不但迫使斯大林黨放棄『減租減息』的妥協政策，進行土地改革，就是某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主張土地必須加以改良了。這又一次證明我們一貫堅持土地革命是最合乎客觀的迫切需要的。但我們不僅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改良欺騙，而且反對斯大林黨的反覆無常及其現行的半改良主義——一方面分配土地，一方面『承認自由經營買賣』。我們主張無賠償地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集體的地產，如祠產、廟產……等包括在內）平均分配給無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貧農，並由貧農組織委員會處理分配事宜。但土地的所有權必須歸國有，以後絕不許自由買賣。同時必須廢除一切苛捐雜稅，代之以最低限度的土地單一稅。取消一切高利貸，由國家銀行貸以最低利息的貸款。但農民的徹底解放，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取得政

權，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之下，推行集體化的農業生產和分配，才有可能。現時斯大林黨半吊子式的土地政策，及其主張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來完成這類政策的總路向，不僅是機會主義的幻想，而且將是陷農民於一個新的大災難的禍根。我們必須加以排斥。

(三) 爭取一般的民主權利 在國民黨長期的軍事獨裁下，在其特務隊的任意迫害下，不但人民大眾的一般民主權利遭剝奪，就是連生命也沒有任何保障。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其自身的物質基礎大受削弱，政治上暴露其稀有的腐敗無能，與人民大眾對它深表不滿的情勢下，雖然它一時被迫而向民衆表示若干讓步，屢次宣稱「保障民權」，乃至將人民的民主權利寫在它一手製造的「憲法」上。但實際情形改變甚微。尤其是最近一年來，國民黨政府在其「戡亂」藉口之下，不但人民的民主權利依舊被剝奪，特務隊依舊到處橫行，而且還製訂了整套「戡亂」的「緊急治罪條例」，組織了「特別刑事法庭」，任意逮捕、監禁、乃至處決人民，尤其是工人和青年學生們。因此，我們堅決主張：首先必須立刻取消各種各式的「緊急治罪條例」及「特別刑事法庭」，解散一切特務組織，釋放一切政治犯；人民必須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罷工及示威的完全自由；這不但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而且是走向徹底解放的絕對必須的前提。

(四) 按物價指數增加工資以及按實際情形規定工時 高漲的物價與失業這兩個基本的經濟的苦惱，原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之日益增加的不合理的概括表現。但在這次大戰後的各國，尤其是在中國，這兩個基本的經濟苦惱，更達到最不可忍受的程度了。因為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政策，盡量將戰爭的損害及其所遺留下來的經濟恐慌、通貨膨脹以及一切其

他資本主義在死亡痛苦中所發生的災難，都通通加在勞苦群眾的身上。中國革命共產黨對於這種政策宣佈不可調和的鬥爭，堅決地爲一切工人及勞苦群眾要求必須的生活條件和就業權利。爲了對抗通貨的飛躍膨脹，必須嚴格按照物價指數增加工資，其指數必須由工會及其他職業團體聘請經濟學及統計學專家製訂，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任何僞造。如果資本家藉口虧本來抵抗按照物價增加工資時，則要求公開他們的業務秘密。同時由工農及一般民衆組織物價委員會，管制物價。爲了反對普遍的失業（不管是『結構性的』或『行情性的』），必須按照實際情形規定工時。即將現有的工作在一切現有的工人中分配，並與此相應，規定出工時的長短。首先就要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實行星期日休假。同時實施社會保險（保險費由資方負擔），及由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救濟失業。在目前這個異常可怖的災難時期，爲了避免廣大勞苦群眾的毀滅，這兩個基本要求是絕對必須實現的。這是一個唯一具有創造力和進步階級的生死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全體民衆未來的生死問題。至於這些要求之能否實現，在目前是一個力量關係問題，只有鬥爭才能決定。在鬥爭的過程中，勞苦群眾一定可以充分瞭解現社會這種奴隸制度有取消的必要，而會團結成爲真正的力量的。

（五）保衛童工及女工的利益 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總是盡量向弱者進攻的。所以即在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童工和女工們也總是成爲資產階級藉以任意提高剩餘價值的主要對象。這在落後國家內更是如此。帝國主義爲了榨取中國勞動者的超額利潤，中國資產階級爲了抵抗帝國主義的競爭以及彌補其技術的落後，都特別以剝削童工和女工爲其主要利潤的資源。正因此，童工和女工，不但在中國工人階級中構成了極大的部份（特別在輕工業中），而且是最受剝削和壓迫

的一部份。因此，我們主張對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必須加以特殊的保衛：首先必須以合理的技術訓練來代替學徒制度，童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必須給予童工以享受二小時以上的學校教育權利，一切學雜費由資方負擔；女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廢止夜工，每月放生理假三日，產前產後休假各一月，工資一概照發，嬰兒由資方設托兒所養育或給予相當的托兒費；童工和女工與男工擔負同等工作時，必須取得同等工資；——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必須寫在『勞工保護法』上。青年工人和女工由於他們的過份受剝削和壓迫，是最富於革命性，最易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的，我們必須走進他們的隊伍中，為他們的特殊利益及一般利益而鬥爭。

（六）過渡時期的工會 工會是群眾組織的主要形式，在爭取部份的及過渡的要求的鬥爭中，尤其在缺乏民主傳統的中國，是十分需要的。中國革命共產黨在一切鬥爭中都站在最前綫的戰壕裏，它首先堅決要求一切產業工人有權依照產業部門組織自己的產業工會，由各個產業工會，一直到產業總工會的權利，它必須積極地參加到那些群眾的工會裏面，去為工人群眾爭取一切物質的和民主的（即令是最微小的和部份的）利益而奮鬥，去增強他們的地位，提高他們的鬥爭精神。它不可調和地反對資產階級國民黨把工會變成為官僚特務的附屬組織，以及用『強迫仲裁』或其他的警察監視的形式束縛無產階級的一切陰謀。只有站在工會內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進行反對任何改良派（斯大林的官僚改良派也包括在內）欺騙的鬥爭。它不僅應經常努力爭取工會的民主化，工會代表及其執行機關應由工人群眾普選，反對任何指派，以此去不斷刷新工會的領導，在緊急關頭，勇敢果決地提出新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領袖以代替那些腐化的官僚

和投機政客，排除特務份子，且應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創造一些與群眾反對資本主義社會鬥爭的問題更為切合的獨立戰鬥組織，必要時就是與工會的保守機關來一個直截了當的分裂亦所不顧。最後，必須按照工人運動的發展情形，創造一些與之相適應的能夠包容整個鬥爭群眾的組織：罷工委員會、工廠委員會與蘇維埃。工會並非目的，只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一種手段。

(七) 工廠委員會與工人監督生產 在過渡時期中，工人運動並不是帶着一種有系統的和極其平衡的、而是帶着一種狂熱的和爆炸的性質。一切口號與組織形式均應隸屬於運動的指標，應當敏捷地反應群眾的創造精神，靜坐罷工便是這一類創造精神的最新現象。每一次靜坐罷工都以實際的方法提出這個問題，誰是工廠的主人：資本家，還是工人？假如靜坐罷工是插話式地提出這個問題，則工廠委員會便是給它以有組織的表現。由工廠的一切被僱傭者選舉出來的工廠委員會，會馬上產生一種與廠方的命令相拮抗的力量。工廠委員會的最大意義，是在於它變成爲工人階級中工會通常所不能推動的層份的戰鬥的大本營。正從這些較被壓迫的層份裏，才產生未來革命的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隊伍。工廠委員會甫經出現，一種事實上的兩重政權便在工廠裏建立起來，它實質上代表一種過渡的狀態，因爲它本身包含兩種不可調和的改制：資本家的與無產階級的。工廠委員會的根本意義，假如不是給一個直接的革命時期開關門戶，就是給一個革命前期——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改制之間的時期開關門戶。因此當靜坐罷工這類形態發生時（這在最近將來是不可避免的），必須及時發動一個有利於工廠委員會的運動，以免坐失時機，遭受意外的打擊。

在戰後的中國，一方面官僚資本盡量壟斷國家一切生產

和運輸的重要部門，肆無忌憚地侵蝕國有的財產；另一方面某些私人企業又日益趨於破產而以關廠來威脅工人群眾；——在這種情形下，工人監督生產的口號更具有最現實的意義。只有工人監督生產，才能防止官僚們對國有產業的貪婪侵蝕和私人企業任意關廠的威脅。但要實施真正的生產監督，只有工廠委員會才有可能，只有它才能請到真誠願獻身於人民的專家：如會計師、工程師、科學家等，為恢復、維持及提高生產來服務。工人監督生產，乃是走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路的第一步。

(V) 徵收財產累進稅，廢除工資所得稅及一切苛捐雜稅

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政策，一向除了濫發紙幣，不斷刺激物價高漲，陷人民生活於極度困境外，就是向人民強徵各種各式的苛捐雜稅，盡情搜刮。近年來，除了數不清的苛捐雜稅外，更從一切靠工資為活的工人及一切靠薪金為活的職員們（公職人員在內）徵收直接所得稅。在中國，一般靠工資及薪金為活的人們，尤其是工人群眾，其所得本來就十分低微，遠不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國民黨政府還要從他們最低的所得中扣取一部份，這就迫使依靠工資或薪金為活的人們愈益無法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於擁有巨量財富的資本家、地主及官僚軍閥等，却絲毫不敢侵犯，讓其任意窮奢極侈。因此，我們堅決主張：不但必須廢除對工人及一切出賣體力和腦力者的工資和薪金的所得稅，而且必須取消一切手工業者、小販及小商人們的苛捐雜稅，而以強制徵收財產（包括遺產）累進稅來代替。國民黨政府既是專門保護大財產所有者的利益，則它的財政也就應該全由後者來負擔。

(VI) 沒收官僚資本集團的財產 戰後的官僚資本集團，所謂「四大家族」或「五大家族」，不但是侵蝕國有財產的

最具有寄生性的集團，而且是最橫暴的搶劫人民大眾和阻止國民經濟發展的極大的障礙物。因此，沒收這些官僚資本集團的財產，不但已逐漸成爲一般民衆的要求，且已爲某些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斯大林黨在內）所叫喊出來了。但我們在民衆的要求與小資產階級的叫喊之間必須加以嚴格的區別：（一）我們拒絕任何賠償；（二）我們要求民衆只能依賴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三）必須把沒收財產的問題與工農民衆奪取政權的問題聯繫起來。

（十）工人自衛團、糾察隊與工人民軍 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橫暴統治下，在全國各角落佈滿了特務隊的情勢下，差不多每一罷工和示威運動都要遭受特務份子的干涉和襲擊。因此，組織工人自衛團的口號，必須寫在工會革命派的綱領上去。當群眾罷工一經發動，以及群眾走到街上示威的時候，便必須從年青的工人中組織自衛團、糾察隊等，加以訓練，以便隨時保衛罷工和運動，抵禦特務份子出其不意的侵襲。如果當群眾運動達到高潮時，更須把各個自衛團和糾察隊的單位聯繫起來，組織工人民軍。無產階級的武裝，乃是最後解放的一個絕對必需的條件。

（十一）「徵兵」與兵士的權利 中國的軍隊一向由招募（即僱傭）而來，以此形成爲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最盲目的工具。用「徵兵制」來代替「募兵制」，在落後國家原爲一種較爲進步的表現。但現時國民黨政府的「徵兵」或「抽壯丁」，却徹頭徹尾是反動的，它對於一般貧苦人民，尤其是農民，簡直是一種極大的災禍。一方面，各級地方官吏及保甲長等，藉此大肆橫敲勒索，迫使無數的農民破產；另一方面，成千百萬的貧農被綁縛送到軍營和戰場充作無謂的犧牲。對於此種殘暴無比的「徵兵制」，中國革命共產黨站在人民方面堅決予以反抗。我們並不根本反對人民去學習使用武器，

但必須人民自己有權選出代表去監督徵兵的進行，選出自己的軍官訓練自己，率領自己。尤其是對於參戰，必須由人民選出的代表來加以最後的決定。凡是現時在軍隊中服役的兵士，必須組織兵士委員會，反對上級將領剋扣軍餉，要求監視軍餉的合理分配，改善士兵的生活，要求士兵有權選拔和撤換軍官及參加政治活動的自由。只有如此，士兵群眾才能獲得生活的改善，才能從統治階級手裏壓迫人民的工具開始轉變到為人民服務的一方面來。但最後我們是堅持以民軍代替常備軍的。

(ㄅ) 教育民主化 工人、農民及一切貧苦人民，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水準，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必須爭取教育的民主化，就是說，必須爭取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一切教育費用（包括學生的學、膳、宿費在內）必須由國家負擔。但現時中國的教育，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的教育，且全為反動的國民黨所把持，所毒化。因此，我們要堅決主張：現時的教育，必須來一個徹底的民主改革，首先從國民黨的把持下解脫出來。一切教育行政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由人民選舉的代表來擔任和監視，一切學校的校長應由全體學生和教職員代表會議選舉，教授及教員的進退應取得大多數學生的同意，校內教員的講學和學生的研究應完全自由，一切工農及貧苦出身的學生，應獲得全部的免費，教職員的生活應獲得必須的保障。只有經過這種民主化的改革，中國教育才能脫離專制的、野蠻的黨化、特務化，走上民主化、平等化的道路。也只有如此，一般勞苦大眾的文化水準才能提高起來，才能覺悟起來，脫離野蠻落後的狀態，踏進一個新的文化時代。

(ㄆ) 國內弱小民族自決 一個壓迫別民族的民族，其自身是不會獲得真正的解放的，這對於中國民族說尤其真實。

中國民族，一方面備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但同時，中國統治階級又極力將國內的一切弱小民族作為延長自己腐敗統治的犧牲品。這便是漢族與國內其他民族不斷發生紛擾、衝突乃至戰爭的禍根。中國革命共產黨站在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群眾的解放利益上，堅決主張本國內一切弱小民族（蒙、回、藏等）應有完全的民族自決權，即，各弱小民族根據其經濟利益和文化及地理條件，有權脫離漢族的統治，建立自己獨立的政府，——只有在這個民族自決的原則上，漢民族才能與其他弱小民族獲得真正的諒解與合作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各民族一切勞苦群眾利益的、相互援助與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社會主義共和聯邦。這不但是各弱小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全體被壓迫民衆解放的坦途。

（四）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一切落後國家，尤其是在資產階級地主的軍事專政及其官僚機構達到異常橫暴與腐化的中國，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的口號尚保有它的全部力量。因為只有這個口號才能在政治上經常號召和動員全國最廣大的群眾起來對抗資產階級地主的專政，打擊它的官僚機構。但這一口號一定要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與其他的過渡要求不可分離地聯繫起來，並必須由普選產生，及賦予它以解決國家一切重大問題的全權，才能對抗現時資產階級國民黨所製造的偽國民會議、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改良派把國民會議描寫成爲和平改良的議會主義的幻想。無產階級用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口號武裝自己，動員群眾，到了某個時期，即革命潮流到來的時候，應當而且必須產生蘇維埃。只有蘇維埃才能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同時開啓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

(五) 工農政府 在資產階級國民黨專政日趨腐化、無能與動搖，以及斯大林黨提出『聯合政府』來號召的情勢下，我們必須提出『工農政府』來對抗斯太林黨的『聯合政府』，以此暴露它的妥協性、反動性與欺騙性。我們向工農群眾指出：斯大林黨既以代表工農群眾的利益自居，那它就應當提出工農『聯合』，成立自己的政權來代替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專政。但它不但不如此，反而強烈地要求與資產階級『聯合』成立政府，這就充分證明這個黨並非真正代表工農的利益，而只是利用工農作幌子來與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的投機買賣而已。

但我們提出的『工農政府』口號與斯大林以前那個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的內容，毫無共同之點，而是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這個口號的原來意義，即表示與資產階級完全決裂而成立工農自己的政權的意義。因此，圍繞工農政府的口號的鼓動，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種巨大的教育價值。但這個口號的實現，只有在蘇維埃的形式之下，才有可能。從它的最確切的意義說，乃是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專政的一個通俗名稱。

(六) 蘇維埃 當社會危機達到某種深度、革命局勢展開的時候，社會一切最被壓迫的層份，千百萬勞苦過度的『小人物』，將不斷地帶着他們久被抑壓的願望與要求，走向前來，參加鬥爭。農民群眾、兵士、城市的被壓迫者、女工、管家婦、失業者、知識份子中的無產化的一群，——一切這些將找尋統一和領導。但能夠給一切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種種鬥爭要求與行動以統一的組織形式並予以政治領導的，只有經過蘇維埃。因為只有蘇維埃才能將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勞苦群眾的鬥爭團體的代表聯合起來，並在政治上予以民主集中的體現。蘇維埃隨着革命運動的進展而擴大，其核

心則一次再次的更新着。無產階級一切黨派都可以在最廣大的民主基礎上爭奪蘇維埃的領導權。因此，蘇維埃的口號便統率了過渡要求的綱領。

當群眾運動已經進入一個公開革命階段的時候，便必須產生蘇維埃；但也只有當這個時候，蘇維埃才能生長。因此，當中國第二次革命達到高潮時斯大林禁止成立蘇維埃，固是葬送革命的最可恥的機會主義，但他在革命失敗後命令中共組織蘇維埃，也是不可饒恕的盲動主義的罪行。在革命高潮中組織起來的蘇維埃，有如一個軸心，聯合着成千百萬的勞苦群眾於其周圍，從事於反剝削者與壓迫者的鬥爭，它們自從出現的第二天起，便成爲地方政府的，以後成爲中央政府的競爭者和敵對者。假使工廠委員會是在工廠裏產生的兩重政權，則蘇維埃便是在一個國家內造成一個兩重政權的時期。

兩重政權乃是過渡時期之最高點。兩個政制：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政制，是不可調和地互相反對的。社會的命運全靠其結局如何來決定。如果蘇維埃獲得勝利，那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就要抬頭。

到第三次革命勝利之路

給中國民族第一個解放希望的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但由於資產階級的卑怯無能變成了流產，致使中國陷入一個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及其長期混戰的痛苦狀態中。一九二五年『五卅』開始的第二次革命，本大有可能將中國民族從痛苦的深淵中拔救出來，帶上一個新的時代去。但由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的罪惡領導，這個革命又給葬送了。因此形成了資產階級國民黨極端反動與腐敗的軍事獨裁，並招致了日帝國主義長期兇猛的侵略，最後造成了現時最難堪的與無

比殘破與痙攣的國共內戰局面：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完全控制着國民黨政府，企圖以全力維持其反動透頂的統治，把中國變成爲它未來反蘇戰爭的東方主要基地；另一方面，『共產黨』在蘇聯反動官僚獨裁者的直接指使下，希冀在中國建立東歐式的衛星政權，以爲防禦美帝他日進攻的堡壘。此種雙方互鬥的形式如任其繼續發展下去，中國勢必淪爲以原子彈爲主要武器的美帝進攻蘇聯的第三次大戰的主要戰場之一，中國的人民大眾將不可避免地成爲這個最慘酷戰爭的主要犧牲者！

要想避免這個行將到來的空前浩劫，要想保衛蘇聯十月革命的遺產（社會主義財產制），中國工農及一切民衆必須從今天起立即進行準備一個狂風暴雨的大革命——第三次革命來直接干涉內戰的雙方，以革命的手段粉碎美帝國主義以及蘇聯反動官僚的工具，建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政權，把中國及全世界推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不是革命的勝利，便是戰爭的毀滅，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歷史已經充份證明：中國民族的悲慘命運，只能由一個勝利的第三次革命來挽救了。但革命的勝利，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革命領導。中國革命共產黨堅定地站在代表中國革命動力的無產階級立場上，向它的階級及一切勞苦民衆指出中國的危機及其出路，貢獻一個革命的綱領，這綱領是建立在中國過去兩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以及全世界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爭取解放鬥爭的經驗上的。這是走向第三次革命勝利之路的唯一可靠的指標和武器。

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們，走到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旗幟底下吧！它是引導你們避免戰爭浩劫和走上革命勝利的旗幟！

輓 師 友 ①

導師方逝
良友隨亡
悲傷莫甚於此日

決戰快臨 ②
勝利不遠
凱旋可預卜他年

① 與列寧攜手合作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組織紅軍以保衛它的托洛茨基，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被斯大林的特務刺殺於墨西哥。中國第一個反斯大林主義的詩人王獨清，在親斯大林黨的文人（如郭沫若之流）的排斥和污蔑之下，同年同月三十日（即托被刺死後的十日）貧窮病歿於上海，故作此聯以輓。

② 指抗日戰爭。

反第二次世界大戰

浪淘沙

(一九四二年三月)

遍地起烽烟
殺氣騰天
山堆屍骨血成川
若問箇中爲底事
奪地爭權

傷感是徒然
奮勇爭先
掃除瘴氣與污烟
奴隸一朝翻立起
齊唱凱旋

鄉 村 偶 住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機轟炸上海甚急，暫避居靜江鎮鄉下)

城市生涯廿六年*
鄉村偶住倍增鮮
田禾萬頃翻碧浪
野樹千株聳翠烟
曉月疏星浮霧海
晚霞斜日鬥雲天
若非戰亂煎人急
安得閑情賞自然

* 編者按：指作者一九二〇年初離開家鄉以後，就沒有到過鄉村，以前在城裏讀書當然不計算在內。

去 國 行

(一九五〇年一月被迫離開香港，流亡歐洲)

孤輪昂首向西行
別國離懷且慢尋
萬頃青波相角逐
一輪紅日自沉昇
無邊宇宙深深識
易逝時光緊緊擒
此去前程知艱險
但當奮力挽乾坤

彭述之選集

第二卷

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次版

出版：十月書屋

地址：九龍大南街321-323號4樓A座

電話：3·862780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屈臣道2-8號屈臣氏大廈B座408室

定價：平裝港幣四十五元

精裝港幣六十元